

爱与资本

马克思家事

[美] 玛丽·加布里埃尔 | 著 朱艳辉 | 译



《爱与资本》作者 / 玛丽·加布里埃尔

我看到丈夫和妻子的故事：他们彼此深爱，即便经受失去四个孩子的痛苦，遭受贫困和疾病，被社会排斥，他们的爱依然热烈如火。我看到三个女儿的故事：她们崇拜父亲，即便自己失去了梦想，甚至失去了孩子，仍把他的伟大思想的前景当作信仰。我看到一群人的故事：在19世纪欧洲的革命浪潮中，他们璀璨、高昂、不屈、有趣、激情。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萧伯纳

他达到了一个人能用文字实现的最高成就。马克思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思想。

《我们两个：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统治者，合作伙伴，对手》 作者 / 吉莉安·吉尔

玛丽·加布里埃尔不仅让新时代的读者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家族传奇的一生，并提出充分的理由使人们相信：在东欧共产主义衰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分析在21世纪仍与现实有关联性。

《华盛顿邮报》 / 伊莱恩·肖沃尔特

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爱与资本》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作者前无古人地呈现了大篇幅的研究，每个段落、每一页，或出人意表，或细致入微，或感人肺腑，又或发人深省，让我想引用当中的每一个内容。从未想象过卡尔·马克思的书会让人如此爱不释手，这本书打破了我的想象。



上架建议：历史·传记

ISBN 978-7-5561-0386-7



9 787556 103867 >

定价：128.00元

爱与资本

马克思家事

[美] 玛丽·加布里埃尔 | 著 朱艳辉 | 译

LOVE AND CAPITAL

CBS |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 / （美）加布里埃尔（Gabriel, M.）；
朱艳辉.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561-0386-7

I. ①爱… II. ①加… ②朱… III. ①马克思, K. (1818~1883)
—生平事迹 IV. ①A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5700号

AI YU ZIBEN MAKESI JIA SHI

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

著 者 [美] 玛丽·加布里埃尔
译 者 朱艳辉
审 校 鲁长安 王 煜

出版统筹 张宇霖
特约策划 刘彩薇
产品经理 傅钦伟
责任编辑 姚晶晶
装帧设计 泽信·品牌策划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410005
0731-83683357

印 刷 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41.25
插 页 1.5
字 数 6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386-7
定 价 12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献给约翰
并以此纪念我亲爱的祖父

———— ★ ————

我最开始接触到卡尔·马克思（以下简称卡尔或马克思）家的故事，是通过伦敦一家杂志的一篇文章。文章是关于伦敦名人的，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大意是说：马克思幸存下来的三个女儿中，两个选择了自杀。读到这里，我停下了，我意识到自己对马克思的家庭或者说他的个人生活一无所知。那时候，我眼里的马克思是坐落在海格特公墓里花岗岩墓碑底座上的那个巨大的头像，是出现在数百本著作中的理论体系。我一直未曾想过，在他艰辛地创造出一个为世界带来革命的理论的时候，他身边的女人每天是如何照顾他的，也从未想过，这个造就了欧洲社会主义，并将共产主义传递到包括俄国、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的男人，他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开始读更多关于他们一家人的故事。我发现，马克思哲学的每一个角度以及他的文字的每个细微差别，都有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没有一本英文著作完整地讲述马克思一家人的故事。^①无数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一本完全聚焦于他的妻子燕妮和孩子们，以及对他们而言，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海伦妮·德穆特。关于燕妮·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的传记倒是有几本，但没有一本完整地讲述她们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或者讲述她们的辛酸对马克思工作的影响，因此我想试一试。

^① 非英文的著作，我不敢说，但我的确没有发现哪本书从马克思的童年一直讲述到他最后一个女儿离世。

我搜集了马克思一家人相互间以及他们与朋友们在 60 多年间的通信，多达数千页。其中很多保存在莫斯科的档案馆，之前从未用英文出版过。我还阅读了马克思一家更远一些的亲戚朋友谈论他们的信件。我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和同一时期不同信件这两个维度，来阅读这海量的文字。我仿佛听到里面的人物正随着事件的展开在对话。我倾听他们每天的言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20 年时间里几乎每日都相互写信，马克思家庭里的女性写的信也很多。一个画面逐渐浮现在我眼前：一家人牺牲了一切，为的是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当他们在世时，这种思想仍主要存在于马克思的脑海里。

我看到丈夫和妻子的故事：他们彼此深爱，即便经受失去四个孩子的痛苦，遭受贫困和疾病，被社会排斥，他们的爱依然热烈如火。我看到三个女儿的故事：她们崇拜父亲，即便自己失去了梦想，甚至失去了孩子，仍把他的伟大思想的前景当做信仰。我看到一群人的故事：在 19 世纪欧洲的革命浪潮中，他们璀璨、高昂、不屈、有趣、激情，却最终以悲剧收场。终究，这是个（个人的和政治的）美好愿望被残酷现实所击碎的故事。

看到马克思一家人写下的这些文字，我发现：过去 125 年来的传记呈现的很多细节是对事实的篡改或误读，有的基于政治原因，有的基于个人原因。受争议的人物往往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我敢说，马克思更是如此。有些例子广为人知：马克思在 1883 年逝世后，追随者们便马上试图把他完美化——不再提到他的缺点，以及从大学时代便开始有的绰号“摩尔”。冷战时期以及柏林墙被推倒后，马克思的传记成为东西方思想对抗的战场。他（和他的家人）生活中的各个细节根据需要被删改——就看是把他刻画成共产主义的圣人，还是蛊惑人心的恶徒。读者只有知道作者站在哪一方，才能理解马克思的一生为什么会被那样描述。

恶意批评者经常贬低马克思假意为工人战斗，实际上过着奢华的资产阶级生活。这样的指控早在马克思还活着时便已出现，直到 20 世纪都没有停歇，因为总有人试图诋毁他和他的工作。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还出现过很多错误和误导的例子，已经被研究马克思的学者发现并尽量纠正。不幸的是，还有一些仍在被当做事实，不仅马克思的传记作家在重复，研究他的战友的传记作家也在重复。为

了尽可能澄清更多这种尚未揭晓的秘密，我追根溯源，到历史的主要参与者留下的文字中去寻找，尤其是马克思家的女人们，她们的信件被很多研究者几乎完全忽视了。（当然，众所周知，马克思必要时会在事实面前打马虎眼，换言之，他言之凿凿说是事实的，并不一定是事实。这时，我会尽量说明他所说的事实版本并不值得完全相信。）

马克思一家的故事极为丰富，而且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因为它们就发生在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背景下。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与马克思的女儿们在同一时期成熟。到 19 世纪末，她们代表工人进行的战斗与父亲在 19 世纪中期时的战斗已经完全不同。他当时的战斗相对温和，她们的战斗却已变得凶猛。事实上，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故事的这个方面也越来越重要。

开始本书写作后，我眼前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时，很少有人质疑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周期中。但当我的调研工作结束，准备动笔写作时，对这一制度绝对正确的信念开始动摇，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在秋天达到高峰后，学者和经济学家们开始公开质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价值，讨论有没有其他选择。面对这样的混乱，马克思的著作显得极具预见性和说服力。在 1851 年资本主义刚刚发展时，他便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对革命即将爆发的预测显然是错的，但他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显然得到了应验。因此，我不再局限于开始时的想法，即仅仅讲述马克思一家人的故事，而是加入了马克思的更多理论，更加详细地描述了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最终，我也发现，没有这些因素，马克思家的故事不会完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革命中吃饭、睡觉、呼吸。正因如此，以及对马克思的爱，一家人才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公元 120 年，普鲁塔克在去世前撰写罗马和雅典伟人的传记时说：理解这些人物的关键，不在于他们在战场上的搏杀或者他们取得的胜利，而在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性格——小到一个动作或者一句话。我相信：阅读这本马克思家庭故事的读者，能够通过普鲁塔克建议的方式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我希望：读者在读完后能够对马克思生命中的女人们多一分欣赏，因为，在她们成长的那个社会，她们的角色大多是辅助性的。我认为，她们的勇气、力量和光辉已经被放置在阴影中太久了。没有她

们，就不会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世界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做了几个决定，需要读者知悉。

马克思一家人相互间使用多种语言通信：英文、法文或德文（经常三种都有），还时不时掺杂些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希腊文。我不想让读者费力去查找翻译，因此，直接使用了英文，只有在外文对于理解原意十分关键时，才保留了原语言。

此外，有些信件包含种族主义语言，我没有将其收入本书，首先，因为它们与整个故事并无关系，其次，它们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美国尚在实行奴隶制）。它们不需要被呈现给当代读者。我觉得把这些种族主义语言加入进来（很少，数千页信件中只出现过寥寥十数次）只会不恰当地转移读者的注意力。马克思和燕妮显然都不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反对女儿嫁给一个混血儿，也因为马克思极为坚定地反对奴隶制。如果我觉得需要把这些内容加入进来，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家人，我肯定已经这样做了，但我的确认为，这些话不能反映这一家人，而只能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此外，马克思、燕妮和恩格斯有时说一些反犹太的话语——经常是在说斐迪南·拉萨尔。对于马克思是不是反犹太主义者，已经有过无数研究。我决定把这个争议留给其他人，没有在本书提及。马克思本身是犹太人，我相信，他、燕妮和恩格斯所说的反犹太话语同样只是 19 世纪社会文化的反映，而非他们本人具有何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目 录

CONTENTS

序幕：1851年，伦敦 / 2

第一部分 马克思和男爵的女儿

- 1 私定终身 / 8
- 2 学术与诗歌里的大学时光 / 17
- 3 24岁的《莱茵报》主编 / 27
- 4 在克罗茨纳赫终成眷属 / 39

第二部分 流亡的一家

- 5 巴黎的激情岁月 / 44
- 6 爱情的纽带 / 52
- 7 初遇一生的守护者 / 61
- 8 幸福的婚姻 / 69
- 9 英国见闻 / 76
- 10 新思想的孕育 / 82
- 11 壮丽的事业 / 94
- 12 《共产党宣言》的诞生 / 103
- 13 燃起革命的火焰 / 108
- 14 人民之春 / 118
- 15 《新莱茵报》与新斗争 / 126
- 16 笔杆子不得不服从枪杆子 / 134
- 17 坚守堡垒 / 143
- 18 梦碎巴黎 / 152

第三部分

流寓伦敦的家庭苦难

- 19 伦敦新家 / 160
- 20 小福克斯之死 / 174
- 21 黄金时代的艰辛 / 182
- 22 流亡者的指挥中心 / 194
- 23 家庭生活的苦乐 / 208
- 24 穆希之死 / 218

第四部分

贫病交困中携手前行

- 25 分离的痛苦 / 224
- 26 疾病缠身 / 236
- 27 福格特事件 / 247
- 28 荷兰之行 / 263
- 29 死亡的阴影 / 270

第五部分

从《资本论》到公社

- 30 流亡者的圣地 / 284
- 31 拉法格之恋 / 300
- 32 《资本论》问世 / 312
- 33 劳拉的婚礼 / 327
- 34 小燕妮登上舞台 / 339
- 35 普法战争 / 356
- 36 公社万岁 / 367
- 37 姐妹被软禁 / 381

第六部分

马克思家庭的悲与欢

- 38 小燕妮恋爱 / 388
- 39 杜西的烦恼 / 401
- 40 家庭转机 / 420
- 41 外祖父的快乐 / 430
- 42 燕妮离世 / 441

- 43 两个女婿 / 451
44 伟人陨落 / 462

第七部分

共同的革命事业

- 45 杜西的幸与不幸 / 468
46 艾威林的传言 / 480
47 同床异梦 / 491
48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 502
49 第二代革命者 / 510
50 恩格斯的遗嘱 / 518
51 “将军”逝世 / 526
52 杜西走上绝路 / 532
53 拉法格夫妇自杀 / 540

- 致谢 / 545
参考书目 / 549
注释 / 558

天才只向自己负责；手段只能由他决定，因为目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序幕：1851年，伦敦

Prelude: 1851, London

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

——卡尔·马克思^[1]

在浓浓的大雾中，他们的身影若隐若现，宛如幽灵，出没在伦敦索霍区第恩街的巷弄和门廊间，人数足有数万。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伦敦慷慨、开明，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在北海漆黑翻滚的水域上，犹如一座灯塔，给遭遇不幸和了无依靠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之所。最先来这里避难的是为了逃离贫困和饥荒而来的爱尔兰人。之后，随着整个欧洲陷入动荡，大量的德国人、法国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挤上轮船，涌入伦敦。他们在本国试图推翻专制统治、获得基本的自由，失败后，只得远走伦敦，躲避政治迫害。风雨如晦中，为权利而战的梦想显得如此遥远可笑，而伦敦这座灯塔，原来也不过是个错觉——对他们打开了迎客之门，却没有拿出任何待客之物，他们无比饥饿。

在都市的喧嚣声中，他们没日没夜地大声叫卖。为了生存，他们什么都卖，不管是碎布头，还是纽扣、鞋带。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把自

已摆上货架，不论是做日工还是小时工，是出卖体力还是肉体。他们即将被绝望所淹没，有人在苦难面前，走向了犯罪。运送肉食和奶酪到富裕区域的轮车，经过索霍广场和圣贾尔斯教区时，总要加快速度，以防被偷或被抢。^{〔2〕}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难民甚至连偷抢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原本满怀希望，长途跋涉来到英国，现在却只能依靠仅存的一点希望支撑着。

在第恩街一栋四层房子的顶层阁楼里，一名 33 岁的普鲁士人正繁忙地工作着，他虽名不见经传，却勇敢地向迫害人民的制度宣战，而且他对自己的意图丝毫不加掩饰。阁楼虽有两个房间，但非常拥挤，只有一张桌子，桌上堆满缝补的衣服、玩具、破碎的杯子和其他杂物，他就趴在这张桌子上，为革命绘制出了一张蓝图。家里有些吵闹，孩子们把他庞大的身躯当做了游乐场，在他背上爬上爬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工作。

整个英国，富有远见卓识的人都在努力工作着：达尔文正在研究藤壶，狄更斯刚刚完成自己最满意的著作《大卫·科波菲尔》，巴泽尔杰特正在思考如何在伦敦地下建设庞大的管道，冲走城内要命的污水。而在伦敦索霍区的这间房子里，马克思嘴里叼着雪茄，正思考着如何推翻君主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的革命，不是政治流亡者加入秘密组织后，聚集在啤酒屋里虚张声势、高谈阔论、想象虚幻的胜利——那只会让他感到可笑，也不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宣扬的乌托邦式革命，他们只会空想完美的模范社会，对于如何通过具体步骤实现这样一个社会却完全没有概念。他的革命深植于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削他人，历史的车轮终有一天会走向被剥削者的胜利。

同时，马克思深知：广大被剥削者尚未意识到自己可以发出政治声音，更不用说要求权利。他们也完全不知道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运作方式。但马克思相信，只要自己能够阐明 19 世纪中期社会现实形成的历史过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秘密，就能建立一个理论基础，并借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基础，结果只能带来混乱。为此，他的家庭需要做出牺牲，在他完成《资本论》之前，家人们肯定不能指望他了。

马克思的小家庭对于贫穷已经习以为常。他们虽然住在阁楼里，不像很多人只能露宿街头，但境况也好不了多少。马克思在1851年开始写这本著作时，已经有两个孩子死于贫穷导致的疾病，装着他们瘦小身体的简易棺木，就曾放在其他孩子吃饭和玩耍的房间里。他的妻子燕妮是一名普鲁士男爵的女儿，非常美丽。为了还钱，免得债主三天两头登门，她不得不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当掉，先是银饰，后来甚至连鞋子都当了。他们的儿子埃德加很是顽皮，很早就跟街上的爱尔兰少年混在一起，熟悉了街上的道道儿，跟他们学会了吹口哨、偷东西。

但最让马克思和燕妮烦扰的还是他们的女儿。从早到晚，登门来找马克思的几乎都是像他们一样的流亡者。这些人聚集在房间里，讨论革命，言语粗俗，或者叼着雪茄，或者抽着烟袋，搞得屋里烟雾缭绕，孩子们根本没有地方玩耍。埃德加却在这种氛围里如鱼得水。他喜欢听这些人讲他们的革命事迹，觉得很是刺激，还喜欢大声唱马克思的朋友教他的革命歌曲，这让马克思非常惊讶和欢喜。马克思和燕妮都知道，要让女儿们摆脱一辈子受穷的命运，就必须给她们资产阶级式的抚养，让她们跟有教养的女孩一起长大。不管他们如何执着于自己的事业，无论是马克思还是燕妮，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嫁的人，像每天登自己家门的人一样——脑袋里满是激进的梦想，却连肚子都填不饱。

燕妮痛恨命运，让自己和孩子如此穷困，只能租住在这样一个破旧的房子里，还要一直担惊受怕，怕万一再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到马路上去。他们没有收入，没有积蓄，一家人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一个朋友的慷慨解囊和一位店主的好心帮忙。

马克思告诉燕妮，她和孩子们不会一直如此受穷。他的书一出版，她们的好日子就会来到，整个世界都会感谢她们之前做出的牺牲。1851年4月，马克思非常乐观地告诉自己的战友恩格斯说：“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³⁾但事实上，直到十六年后，《资本论》才完成，而且出版后不但没能点燃广大工人的反抗热情，甚至没能产生多大反响。

马克思的家人为这部被忽视的伟大著作牺牲了一切。燕妮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却有四个不幸夭折，活下来的三个女儿也没能度过一个像样的童年，她自己更是因为疾病而美貌不再。燕妮去世后，悲剧还在继

续，幸存下来的三个女儿中，两个选择了自杀。

最终，一家人得以拥有的，只有马克思的思想——仅此而已。而且，她们只看到这些思想活跃在马克思的大脑里，犹如不断酝酿的风暴，却几乎没有其他人认可，甚至理解。然而，马克思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目的（无论在那个忍饥挨饿的年代显得如何遥不可及）：他改变了世界。

★ 第一部分

马克思和男爵的女儿

- 1 私定终身 / 8
- 2 学术与诗歌里的大学时光 / 17
- 3 24岁的《莱茵报》主编 / 27
- 4 在克罗茨纳赫终成眷属 / 39

1 私定终身



只有真正的热忱才能唤起她的兴致，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有一些有意思的柔弱需要她去支持和保护。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是特里尔城里最让年轻小伙子们着迷的女孩。

当然，和她相比，一些女孩家里更富有，或是父亲的爵位更高——毕竟当地拥有爵位的人也不少——有世袭的，也有自己挣来的；还有些女孩，看上去比她更漂亮、更迷人。但没有哪个能像她那样，不但出身高贵、受人尊敬，而且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特里尔城坐落在摩泽尔河沿岸，拥有居民 12000 人，宛如一处世外桃源。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里尔政府的枢密顾问官，作为普鲁士政府任命的特里尔最高行政长官，他拿的薪水也最高。^[2]路德维希的父亲因为参加七年战争，被授予爵位，后来娶了一位苏格兰大臣的女儿，而这个苏格兰家庭则源自阿盖尔和安格斯伯爵家族。^[3]燕妮这个名字、她的深褐色头发和淡绿色眼睛，还有令她更为夺目的叛逆性格，都来自她的这位苏格兰祖母。阿奇博尔德·阿盖尔是一位苏格兰自由斗士，在爱丁堡被砍头；家族的另一名亲戚，改革家乔治·威沙特在爱丁堡被烧死。^[4]

1831 年，17 岁的燕妮尚未显露政治方面的任何叛逆迹象，倒是经常光顾各类舞会。舞会上，年轻的女孩们身着长裙、发型精致、光彩夺目，男士们为吸引她们的注意，也穿着裁剪合身的晚礼服，举止优雅，并极力展示——在他们看来最有力的武器——财富。这里有如一个市场，本

质就是交易，不过多了些烛光的点缀罢了。无论是在社会期望上，还是在等级地位上，燕妮这样的贵族与舞会上其他人的区别都极为明显。⁽⁵⁾

在父亲的指导下，燕妮开始学习，内容包括浪漫主义和来自法国的乌托邦哲学——社会主义。⁽⁶⁾她对前者尤其着迷，在众多德国作家、音乐家和哲学家的推动下，浪漫主义已经非常知名，在这些人看来，人生的最高意义是为理想而活，抛弃一切妨碍自由的东西，当然，最重要的是创造，不管创造的是一门新哲学，还是一件艺术品，或者是一种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交流的方式。至于成不成功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一直追寻梦想，不计代价。⁽⁷⁾就像光一样，之前被看作源自远方的神祇，现如今已经成为内在；人类自身的探求开始变得神圣起来。⁽⁸⁾

在燕妮看来，浪漫主义令人果敢、振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让燕妮喜欢浪漫主义运动：很多浪漫主义者支持女性拥有平等权利。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说过：“不能独立、必须依靠他人的人不能称之为人类，因为他已经失去自己的所在，成为他人的所属物。”⁽⁹⁾如果把康德的这句话套用在女性身上，情况恐怕还要恶劣百倍。浪漫主义则描绘了一个让所有人，不论男女，拥有真正自由的前景——不仅有自由打破僵硬的社会契约，还有自由质疑数百年来自封为上帝的使者、却在治理国家时为所欲为的国王。

到1832年2月度过18岁生日时，燕妮已经开始吸收这些思想，这时，她周围的世界好像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想强迫国王和大臣们接受社会变革，并据此更好地治理国家，另一个阵营则一心维持现状。这种分歧在她家里也非常明显：父亲虽然是普鲁士政府任命的官员，却极为欣赏法国社会主义创始人克劳德·昂利·圣西门伯爵。父亲的这些思想也影响了燕妮，但影响的程度却是他始料未及的。⁽¹⁰⁾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很早以前就对法国的平等和博爱思想有所了解。在他8岁时，拿破仑控制了他生活的西普鲁士。1789年法国大革命思想和《拿破仑法典》的精神在这一地区得以传播，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宗教宽容、废除农奴制、按标准纳税等。⁽¹¹⁾但这些观念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有在未来发生变革后，才能发挥作用。法国革命和启蒙哲学家相信人性本善，只是统治者千方百计让人民保持愚钝，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如果能够帮

助人们摆脱统治者的愚弄，就能创造更美好的社会。^[12]在这个新的社会秩序中，决定个人成就的将是能力，而非出身。这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3]

实际上，随着法国律法的推行，占领区的愤恨情绪还在加剧，很多人站出来反抗法国统治。1813年，路德维希煽动叛乱，被判叛国罪，要在撒克逊堡垒服刑两年。随着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路德维希很快得以释放。路德维希虽然站出来反抗法国人，却和很多西普鲁士人一样，继续践行法国人的思维方式。^[14]

1830年，法国的影响再次来袭。由于法国国王查理十世对于新兴大资产阶级的要求不予理会，又想撤销前任国王已经向人民许诺的有限宪章权力，这年7月，法国爆发起义，查理十世被推翻。^[15]取而代之的是“平民国王”路易·菲利普。法国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菲利普想“用物质享受来浇灭革命热情”。^[16]这位新国王知道，给民众一些自由，有利于增强法国经济发展。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受他启发，纷纷在各自国家走上街头，要求进行变革。

此后，在1830年爆发的其他起义都很快被残忍地扑灭，尤其是在波兰。但也出现了一些持久的胜利，比如，比利时脱离荷兰获得独立；比如，各个国家内部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重要力量。带头的是大资产阶级精英阶层，他们相信：必须建立开放的社会。^[17]此外，还出现了一支之前未曾受到关注的劳动力大军：无产阶级——新的工业世界将由他们的双手创造。^[18]此时，社会主义是一种温和的思想，在法国，便如基督教中的不同教义。但在法国之外，社会主义和要求变革的声音却让统治者极为警惕。德国统治者在西部边境地区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控制的39个德意志联邦地区，自由、发展和机会之门被硬生生彻底关闭，贵族阶层一点特权都不愿放弃。

不过，还是有一个自称“年轻德国”的组织在民众中间呼吁，要求更多权利。民众此时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积怨颇深，因为他在15年前承诺——只要民众帮他击败拿破仑，他便推行宪法，但随着他的胜利，这个承诺变成了空谈。当时，人民响应他的号召加入军队，新兴商业阶层帮助手上从来没有现钱的贵族阶层支付战争所需。最终，拿破仑被击败了。^[19]但1815年出现的德国联邦议院却完全由

王公贵族组成，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完全是为专制统治设计的双保险”。⁽²⁰⁾政府可以立起雕像来纪念战死的自由斗士，却不肯进行改革来奖赏活着的人。⁽²¹⁾相反，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变本加厉地镇压反对的声音，压缩本已非常有限的自由。⁽²²⁾骚乱和暴力反抗持续了几乎整整一年，并且不断有领导人被捕。⁽²³⁾

燕妮同父异母的哥哥斐迪南比她大 15 岁，是路德维希已逝的第一任妻子丽塞特所生。可以说，父亲有多开明，斐迪南就有多保守。1832 年，斐迪南在普鲁士政府任职，他把这看作一生的事业，对于成为国王的仆人感到尤为自豪。他的父亲此时却在研究政府一心要镇压的社会主义思想。从这些社会主义者身上，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听到了年轻时非常熟悉的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理想不仅具有很好的连贯性，而且具备实行的条件：特里尔的贫困人口急剧增加，部分原因是贸易和税费改革。在 1830 年，据说每 4 个居民中就有一个靠慈善救济生活，犯罪、乞讨、卖淫和传染病等与极端贫困相关的社会问题相继出现。⁽²⁴⁾路德维希认为，社会不应轻易放弃民众，社会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他希望把这些思想传递给所有愿意倾听的人。除燕妮外，他最积极的学生是一个同事的儿子，名叫卡尔·马克思。⁽²⁵⁾

1832 年，马克思 14 岁，在公立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上学，和路德维希的小儿子埃德加是同学。马克思虽然在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方面颇有天分，但数学和历史却很薄弱，在同学中间，他并不显得特别突出。⁽²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说话时的咬舌音，这可能是他比较害羞的一个原因。⁽²⁷⁾在路德维希的指导下，马克思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热情，他尤其喜爱莎士比亚和席勒以及歌德的作品。同时，马克思开始吸收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观点，那时，这些观点和他极为热爱的戏剧和诗歌一样虚幻。62 岁的路德维希和这位年轻的朋友漫步在宽广宁静的摩泽尔河河畔的山坡上，漫步在高耸的松树林里，讨论最新的思潮。在马克思心里，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他被一位学识渊博、受人尊敬的贵族当做一个成人和有知识的人对待。⁽²⁸⁾路德维希显然也享受与马克思的交流，就这样，他们的交流持续了很多年。考虑到马克思在学校表现普通，路德维希也许会感到奇怪，马克思居然能如此快速地吸取自己教给他的东西。但如果他知道，从 14 世纪以来，欧洲有数位才能最为

卓越的拉比出自马克思的家族，他就不会奇怪。如果说威斯特华伦家传承自普鲁士和苏格兰的实干者，那么，马克思的家族便传承自一系列犹太思想家，他们的才华从宗教延伸到了政治。

从 1693 年起，马克思的家族有数人在特里尔担任拉比。⁽²⁹⁾ 其中就包括马克思的父亲这一边的乔舒亚·赫舍尔·利沃夫，他在 1765 年，即美国独立战争前几年、法国大革命二十几年前，便写出了宣扬民主的《答问：月亮的脸》。据说，当时，他声名显赫，犹太人世界做出任何重要决定，都要事先征求他的意见。卡尔的祖父迈尔·哈勒维死于 1804 年，最初名叫马克思·莱维，成为特里尔的拉比后，把姓氏改为马克思。马克思家族担任拉比的传统一直持续到马克思的孩童时代，他的叔叔赛米尔在特里尔担任高级拉比直至 1827 年，他的外公也曾在荷兰内梅亨担任拉比。⁽³⁰⁾ 随着社会不断变革，犹太人社区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拉比的职责不再局限于精神层面，开始成为犹太人事务的实际管理者。⁽³¹⁾

在法国人占领西普鲁士前后，基督徒一直把犹太人视为外人，看待他们的眼光总带着一丝怀疑、甚至敌意。但在 1806 年到 1813 年法国占领期间，犹太人获得了一丝平等对待。卡尔的父亲赫舍尔·马克思抓住机会接受法律培训，成为特里尔第一位犹太人律师，在社会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还担任了当地律师协会的主席。⁽³²⁾ 他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一样，思想上更加贴近法国人，而非普鲁士人。他对伏尔泰和卢梭耳熟能详，⁽³³⁾ 自然而然选择通过他们的视角来看待未来。他希望犹太人将来能够免受歧视，从事更多职业，甚至进入政府任职。但拿破仑战败后，普鲁士政府收回了之前授予犹太人的权利，并在 1815 年正式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一年后，普鲁士政府又禁止犹太人从事法律行业。在普鲁士最西端的莱茵省，有三个人受到这一禁令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赫舍尔·马克思，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皈依基督教、继续从事律师这一职业，还是继续做犹太人。⁽³⁴⁾ 他选择了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1817 年，35 岁的赫舍尔加入路德教会，改名亨利希·马克思。⁽³⁵⁾

当时，亨利希刚刚与罕丽达·普雷斯堡结婚三年，罕丽达来自荷兰一个非常富有的犹太人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没什么文化。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并在一年后的 1818 年又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卡尔。⁽³⁶⁾ 出

于对父母的尊重，罕丽达直到他们在 1824 年去世后才皈依基督教，孩子们也一样。⁽³⁷⁾显然，他们的皈依，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基于实际需要：当时 6 岁的卡尔如果继续坚持自己的犹太信仰，就上不了公学。⁽³⁸⁾

可以说，年轻的卡尔是在文化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在他长大的城市，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他自己出身犹太家庭，而后加入了路德教会，父亲和导师表面上为普鲁士国王效力、遵守普鲁士政府压迫人的法律，暗地里却崇拜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国哲学家，尤其是威斯特华伦，他崇拜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者。⁽³⁹⁾

很多传记作家认为，马克思家和威斯特华伦家是邻居。卡尔出生那年，亨利希一家的确在距离威斯特华伦家只有几条街的地方居住过，但时间很短。1819 年，他们在西蒙街买下一处小一些的房子，就在喧嚣的市场边上，距离庞大的罗马建筑尼格拉城门很近，这座黑色的巨石城门已经历了 16 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威斯特华伦家位于小城南部的新街，离摩泽尔河较近，房子很高，窗户很是雅致，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房子里的富足生活。

两家人不仅住处离得较远，文化也千差万别。威斯特华伦家经常举办社交活动，可谓光芒四射。路德维希常在宴会上说到但丁、莎士比亚和荷马（他能随口吟诵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聊天时，随时会有拉丁文和法文从他嘴里冒出来，而且非常自然，一点也不显得突兀。他们用生动的绘画和诗作来招待宾客，餐桌铺设讲究，晚餐丰盛无比，主客尽欢到深夜，直至客人意犹未尽地高声谈笑着，坐上华丽的马车离开。⁽⁴⁰⁾

马克思家则完全相反。1832 年时，家中已经有了 8 个孩子，但还是非常安静。卡尔的父亲为人谨慎，闲暇时更喜欢阅读，而非高谈阔论。他母亲的德语带着浓重的荷兰腔，游离在特里尔的社交圈之外，似乎只关注家中的吃穿用度，根本不想扩大交际圈。他家里氛围不错，但谈不上特别令人愉悦，亨利希努力工作，家里又一贯节俭，一家人倒也吃喝不愁，还买下了两小片葡萄园，但绝算不上特别富足。虽然，马克思经常对父亲的建议置若罔闻，但很尊敬他。马克思的母亲虽然对孩子们都极为溺爱，但马克思从小与母亲的关系便有些紧张，他认为，似乎是母亲导致了家里的阴郁气氛。⁽⁴¹⁾

虽然两家人的情况千差万别，但在生活中还是有交集的。整个特里尔城只有200名左右的新教徒，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和亨利希·马克思便在其中，而且，他们精挑细选之下，还加入了同样的社交和职业俱乐部。卡尔·马克思和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是同班同学，实际上，埃德加是马克思在学校交到的唯一一个长远的朋友。^[42]卡尔的大姐，也是和他最亲近的索菲娅·马克思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是朋友。两家的孩子经常相互串门，让卡尔进入燕妮视线的，也许不是他与她的父亲的亲近关系，而是他与埃德加的友谊。埃德加比燕妮小5岁，是燕妮唯一的亲生弟弟，多年后，燕妮向一位朋友透露说，埃德加是“我孩童时心里的宝贝疙瘩……唯一一个让我喜欢的玩伴”。^[43]

埃德加面貌清秀、一表人才，散乱的头发让他很有几分诗人的模样，但他可不是那种愿意扎根到书堆里的人。相反，他稚气未脱，莽里莽撞，总需要父母和姐姐的保护（甚至溺爱）。也许在威斯特华伦家看来，更爱学习的马克思，也许能对埃德加产生好的影响。不管原因如何，马克思很快融入他们当中：埃德加成为马克思的第一个追随者，路德维希被他的才思敏捷所吸引，燕妮也无法再对他保持漠然，毕竟自己最深爱的两个男人都已经被他所折服。

1833和1834年，政府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开始向两家人逼近。在这之前，由于学校里的争论主要围绕德国哲学展开，普鲁士政府并未进行强力干预，反而给了学校很大自由。（政府希望用健康的德国思想来消除败坏的法国思想的影响。）^[44]但在德国，当时最伟大的学者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于1831年去世后，他的一些追随者开始滑向更加危险的区域，一味强调黑格尔的变化不可避免理论。普鲁士官员开始对大中学校进行更为严密的监视，抓出那些把“变化”解读为“政治变化”的激进分子。^[45]一名政府特务报告说：在特里尔马克思就读的学校，教师过于信奉自由主义，让学生阅读被禁的书籍、写政治文章。最终，一名男学生被捕，深受欢迎的校长黯然离开。^[46]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父亲，因为在自己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所属的俱乐部发表的一篇致辞，与政府产生了摩擦。卡西诺俱乐部是特里尔城顶级私人俱乐部，成员包括各行各业的精英、军人和商人。1834年1月，俱乐部成员欢聚一堂，向莱茵省议会中的自由主义

议员致敬，亨利希·马克思帮忙组织了这次聚会，并致辞感谢国王允许议会成为人民的代表机构，赞扬他愿意倾听子民的呼声。虽然他言辞恳切，却被政府官员看做是讥讽，从而对他加强了监控。数周后，俱乐部成员再次聚会，但这次引起政府官员注意的，不是讲话（虽然有些提到了1830年法国革命），而是被禁的“自由歌曲”，比如法国的《马赛曲》，在君主政府看来，这与煽动起义无异，就差没揭竿而起了。让政府官员警觉的不仅在于唱这些歌曲的是特里尔城的顶梁柱，还在于他们对这些歌曲极为熟悉。“狂热的革命精神”（参加聚会的一名军官的描述）显然不能归因于一时兴奋。俱乐部被严加监视，亨利希·马克思成了重点怀疑对象。⁽⁴⁷⁾

校长被辞退、一向奉公守法的父亲被不问理由地审查时，卡尔才16岁，正是敏感的年纪。可以想象，政府的打压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而言，如果说言论自由和平等在此之前还只是抽象的概念，现在却不再抽象。他亲身体会到了柏林政府的恐怖和不加掩饰的专制手段，还有面对如此现实、自己无力抗拒的那种愤怒和屈辱。

研究马克思的学者哈尔·德雷珀认为，普鲁士政府的高压控制，无意间导致“温和的改革者成了革命者”。的确，政府打压的结果，不过是使人们将对民主和社会主义话题的谈论从校舍转移至千家万户的餐桌上，不过使讨论的声音放得更低。这些话题讨论得越多，人们就越发不把它们看做是来自法国的舶来品，反而把它们看做是与德国具有相关性和代表性的话题。⁽⁴⁸⁾

1835年，德国社会主义之父路德维希·加尔的一本小册子出现在特里尔。书中把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创造一切财富的劳动阶级和拿走一切利益的统治阶级。⁽⁴⁹⁾亨利希·海涅的著作虽然被禁，但他依然是当时德国最受欢迎的诗人。政府对他发出逮捕令后（甚至有大臣要求处决他），他不得不移居巴黎。⁽⁵⁰⁾他对于自己被迫流亡的哀叹，在大中学生中间广为流传，而这些学生正在觉醒，成为有组织的异议者。

威斯特华伦家的气氛有些紧张，这并不奇怪。燕妮、埃德加和卡尔不仅学过号召他们对抗不公的浪漫主义，还学了社会主义，后者让他们知道，现今社会的丑恶，部分是由把农民赶出土地、把工匠赶进工厂的剥削人的新经济制度所导致的。虽然德国的工业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国，

但莱茵省是德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新的富人和穷人阶层正在出现。马克思只要环顾四周，就能找到问题的源头。

1835年，卡尔17岁，准备离开特里尔去念大学。在一篇作文里谈到未来的职业选择时，他仔细研究了梦想的甜蜜、自己在经历上的不足以及他所说的“社会关系”（考虑到父亲的社会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抱负）。最终，他得出结论：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51]

这便是马克思让向往浪漫主义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爱上自己的原因。一个出自小地方的毛头小子决定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奉献自己，这不正是父亲给自己的书中描绘的英雄人物吗——就像歌德书中的威廉·迈斯特和席勒书中的卡尔·冯·摩尔，甚至可能会成为雪莱书中的普罗米修斯。这个小她4岁的少年展现出的磅礴自信和勇气，以及对知识这种力量的确信无疑，让她崇拜不已。

19世纪初，已经出现了要求性别平等的零散呼声，但大多数有着浪漫主义梦想的女性能够期望的，也不过是为具有远大抱负的丈夫奉献自己，不让家庭拖了他的后腿。这也是燕妮为自己和卡尔许下的承诺。我们并不清楚，卡尔在那年夏天离开特里尔、去波恩上大学前，两个人是否已经向对方袒露心扉，但确定无疑的是，不到一年时间，两人便定下了终身：1836年，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偷偷同意嫁给马克思。

2 学术与诗歌里的大学时光



如果有一支像我一样的人组成的军队任我调遣，德国将成为一个共和国，罗马和斯巴达与之相比，都不过是些尼姑庵。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

17岁的马克思离开特里尔时，壮志凌云，要为人类的幸福牺牲一切，到波恩后却租下公寓，加入了波恩大学诗歌协会。他留起了胡子，卷曲的黑发虽然很长，也不加梳理。

卡尔是全家第一个上大学的，1835年10月15日，他从特里尔坐船离开时，整个家族的人清晨4点就来到河边，为他送行。作为家中长子，一家人的未来都落在卡尔身上：他要给予母亲和5个姐妹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将来还要把亨利希·马克思的遗产发扬光大。此外，他将是家里第一个脱离犹太传统桎梏的男性，父亲相信，不论是法律、文学还是政治领域，都有大把机会在等着他。^[2]卡尔刚到波恩不久，满怀自豪的父亲便写信给他说：“我希望你能成为出生在你这么好的条件下可能成为的人。你可能会实现我的最美好的愿望，你也可能会摧毁它”。^[3]

马克思并未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他正融入新的生活。到法学系报到之后，他第一学年选了10门课程，但很显然，他更沉醉于哲学和文学，他还发现了自己的诗歌天赋。父亲担心他社交生活过多，也不希望他完全钻到学术的牛角尖里去，因此，父亲提醒他说：“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4]他还非常直白地说，欣赏不了马克思的诗：

“你的诗，无论就它的真正含义，还是就它的意图来说，我都不理解。”⁽⁵⁾

亨利希有时被儿子丝毫不加控制的自负搞得手足无措。他实在无法理解卡尔怎么会同时有那么多想法——既想当律师，又想当剧作家、诗人甚至戏剧评论家。他和罕丽达恳请儿子缓一缓，想想自己的健康，想想自己和父母的声名，想想家里的经济状况。

1836年春，父母决定让他离开波恩，去更受人尊敬也更严格的柏林大学。⁽⁶⁾在马克思1836年8月22日离开时，波恩大学在给他的介绍信中说他学习刻苦、学业优秀。

对于马克思的乖张举动，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肯定从好友索菲娅·马克思那儿了解得很及时。每次父亲给弟弟写信，索菲娅都要在信末附笔说几句，期盼听到弟弟的下一个华丽篇章。与特里尔的生活相比，马克思的经历显然更为精彩。所以，就算他花了不少钱，就算家里本不富裕，也只能如此了——通过别人来欣赏外面的世界，总是要付出些代价的。

卡尔回到特里尔时，离家虽然不过10个月，却有了很大变化。他已经18岁了，身体更健壮，也更善于思考了，他的身上有了更多外面世界的气息。燕妮的变化也很大。她已经22岁，正是最为貌美的年龄。⁽⁷⁾这两个原本因为两家人的交往和共同学习而相熟无比的年轻人，再次见面时却羞涩起来。燕妮后来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们的这次见面：“啊，我的心上人，你第一次这样看了我一眼，然后急忙把目光移开，然后又看了我一眼，而我也这样，最后，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长久而深情地相互注视着，再也没有力量把目光移开。”⁽⁸⁾

卡尔是在8月回到特里尔的，10月出发去柏林前，他和燕妮私定了终身。他们告诉了马克思家，由于担心威斯特华伦家反对，便没有告诉他们，毕竟两个人的年龄差别很大，卡尔没有钱，前途未卜。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阻力，便是当时的社会契约。普鲁士社会等级制度极为僵化，上流社会间的通婚没有问题，但没有哪个父母愿意女儿下嫁到贵族阶层之外，另外还有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数年后，当有人说他因为生为犹太人而婚姻受阻时，卡尔表现得非常愤怒。但终其一生，马克思不管是在朋友还是敌人眼里，都是犹太人，他父亲虽然改变了宗教信仰，但没能改变特里尔人的这一看法。（在莱茵省，连天主教徒与新

教徒之间的结合都难逃争议。) ⁽⁹⁾ 同样改变过宗教信仰的亨利希·海涅称，皈依基督教是“通往欧洲文化的通行证”，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被接受。⁽¹⁰⁾

得到马克思家的默许后（亨利希·马克思说自己感觉就像身处浪漫小说当中），⁽¹¹⁾ 卡尔和燕妮决定在找到办法让燕妮的父母接受前暂时保密，两个人也不直接书信往来。激情的马克思踏上了前往柏林的旅途，他决心勤奋学习，找到工作，尽快独立，做一个合格的丈夫。⁽¹²⁾ 燕妮则开始等待。她决定非马克思不嫁，世俗的阻力只会让她觉得爱情更加甜美。

当然，如果马克思能够出色地完成大学学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肯定有助于说服父母接受两人的结合。马克思肯定也深知这一点。但每当他深感应该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时，总有让他分心的事情出现。他的一生都是如此，总是有更多的书需要读，更多的数据需要消化，更多的语言需要学习。而在柏林，他找到了让他分心一生的东西。

第一学期，马克思陷入了一位作家所说的“孤独天才的疯狂”模式。当时，柏林居民多达 30 万，是继维也纳之后德意志联邦的第二大城市；⁽¹³⁾ 柏林大学学生多达 2000 人，比波恩大学多了将近 3 倍；同时，柏林大学是当时欧洲最出色的大学之一，强调个体学习和原创性研究。⁽¹⁴⁾ 因此，马克思已经完全沉浸于学术文化当中，加上对燕妮的渴求，马克思的变化很大。父亲气急之下说他：“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踟躅于各个知识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虽不在啤酒杯中消磨放纵，却蓬头乱发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¹⁵⁾ 亨利希想让儿子整洁一点儿，在担负责任的同时，注意应该具有的风度。但这时的卡尔，已经无法听进父亲的建议。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第一学年过后，写给亨利希的一封长信中，说到了自己的“转变时刻”，这封信是他大学时期写给父亲的信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封：

.....
亲爱的父亲：
.....

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爱情的世界，而且起初是充满渴望的、没有希望的爱情的世界。甚至这次柏林之行我也漠然置之，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欣喜若狂，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起我对生活的兴趣。这次旅行甚至异乎寻常地使我心绪不佳，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心灵感受更峻峭、更粗犷，宽阔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饮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耐消化，就连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

.....

他还谈到自己到柏林以后，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专心于学习和研究。最开始，他选择写诗，为燕妮写了三册诗，但又觉得这些诗不足以表达自己“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之后，他开始倾力于法学和经典著作。他研究刑法、民法和教会法，把罗马法全书头两卷译成德文，用300页的篇幅阐述自己的法哲学思想。他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部分内容从希腊文翻译为德文，把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和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哀歌》从拉丁文译成了德文。他开始自学英文和意大利文，写了一部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受《浮士德》影响创作了剧本《乌兰内姆》。但他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使自己大大充实起来”。^[16]

实际上，马克思的身体和精神都出现了问题。医生让他离开城市，到乡村去待一待。卡尔听从医生的建议，徒步走了4英里，来到位于柏林大学东南方向的施特拉劳，一个紧邻施普雷河的小渔村。^[17]他在这里住了下来，和房东一块儿打猎。他告诉父亲：“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18]

这时，黑格尔去世已经6年，他的光芒在柏林大学的众多年轻教授和学生中间，已经稍有黯淡（他曾在柏林大学任教）。马克思要想继续自己的哲学追求，就必须首先迈过黑格尔。

黑格尔哲学中最基本的前提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冲突的结果。两个观点发生冲突，便产生了第三个观点，而这第三个观点继续与其他观点冲突，继续产生新的东西。因此，生命的本质是动态的，核心就是变化。黑格尔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将其称为辩证法。虽然辩证过程的根本在于紧张状态，但这反而应该是让人放心的，因为冲突不由主观决定，而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黑格尔的辩证论赋予了冲突新的含义，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19]黑格尔还提出了“精神”的概念，他认为，精神存在于根据历史条件聚集到一起的所有人身上，而当任何个体从这个大的世界中脱离或者不再作为其中的一个生产力量，就会出现精神的选择和异化。

黑格尔的哲学统治着德国的浪漫主义时代，数十个黑格尔派随即出现，纷纷对他的理论进行研究，并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思想。对于在运动中心——柏林的学生而言，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中蕴含的希望让他们感到兴奋。他们见证了改革的最初呼声和基本的自由受到腐朽保守力量的阻碍和镇压。同时，他们看到在法国西部、比利时和英国，政治、艺术和经济都在大踏步前进，因为那些地方的国王敢于让子民说出和写出心声，甚至允许政治投票。他们看到钢铁被加工成铁轨，让火车以闻所未闻的每小时 60 英里的高速驶向未曾开发的乡村；他们听到电流的劈啪声，知道第一块电池已经生产出来；他们听说有一种通信发明，叫做电报，就像魔术一般。按照黑格尔的教义，“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冲突论不仅适用于变革，还同样适用于社会革命。^[20]

在黑格尔的影响下，柏林成了一块磁铁，受到吸引的不仅有躁动的德国心灵，还有来自东方国家的思想者——来自处在封建统治下的受压迫程度更深的俄国。马克思恢复健康，从施特拉劳返回柏林后，结束了自己的浪漫主义孤独。他加入了一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组成的“博士俱乐部”，在这里，他能兼顾自己最喜欢的两项活动——哲学辩论和喝酒。^[21]

在柏林的头几个月，马克思过得很艰难，燕妮在特里尔也过得并不轻松。由于考虑到燕妮的父母，两人决定不直接通信，这使燕妮陷入猜

疑当中。想着远在柏林的卡尔可能已经把自己忘到脑后，燕妮病了，无精打采，她父母以为是身体上的原因，亨利希却知道她是忧愁使然。亨利希作为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书信传话人，受到的折磨并不比燕妮少。在写给儿子的一封接着一封的信中，他提醒儿子对燕妮负有的神圣责任，提醒他只有自己努力、赢得人们的好感和同情，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她自己心目中的地位”。他向儿子强调，燕妮答应嫁给他的那一刻，做出的牺牲难以估量，“如果你的一生中什么时候忘了这点，那就太可悲了！”⁽²²⁾

卡尔的回答是写了整整三册诗给燕妮，1836年圣诞节期间通过家人交给了她。前两册叫《爱之书》，第三册叫《歌之书》，三本书都题着“献给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²³⁾燕妮一直珍藏着这三本诗册，并在数年后取笑马克思那时的青涩。但在1836年12月，当她经过数月苦苦等待、终于收到卡尔的诗集时，心中又是高兴，又是痛苦。卡尔的姐姐索菲娅告诉卡尔，燕妮对他的爱没有变，而且她会逐渐在父母面前做些铺垫，让他们以后更容易接受自己和卡尔已经订婚的消息。⁽²⁴⁾

然而，铺垫的结果却是新的痛苦。我们找不到燕妮在那个时期写的任何信件，但还是可以透过亨利希写给儿子的信，对她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有所了解，因为当时亨利希写信给卡尔，不仅劝告他尽快想想以后做什么，还越来越多地建议他该如何安抚心绪不宁的燕妮。一方面，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一心想着拯救和指点在学问和精神上都过于不羁的儿子；另一方面，他像是一位追求者，看到心仪的女子为了一个并不值得的对手牺牲了青春和美丽，因此表现出沮丧，甚至敌意。在1837年3月写给卡尔的一封信中，亨利希言语心酸（却又极具预见性）：

.....

有时，我的心沉浸于对你和你的未来的想象中。但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郁的怀着预感的念头，有时，它们会像闪电一样划过脑海：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天赋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那个在苦海中煎熬的多愁善感的人，以很大慰藉的那些世俗的

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受其主宰的那个魔鬼，并不是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的家庭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而自从我将你的爱人当做自己孩子一样来爱的时候起，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这个疑虑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在燕妮身上，我看到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她把天真无邪的纯洁感情全部倾注于你，有时会无意地、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恐惧的心理，一种孕育着不祥预感的恐惧，这一点是瞒不过我的。我不知道，这该作何解释。只要我一提示她注意这点，她就马上想法解除我的忧虑。这应该如何理解？这会是什么意思？我无法解释，然而不幸的是，我的生活经验不允许我轻易受到迷惑。

.....

亨利希告诉卡尔，之前自己一直希望他能声名远扬（亨利希虽然从未明说，但他很可能希望通过卡尔与燕妮的结合，提高自己家的社会地位），但他现在只想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有能力去爱。“只有那时候，我才会得到梦寐以求的幸福；否则，我会眼看着我一生最美好的追求化为泡影。”谈到燕妮，他说：“只有充满温柔爱情的生活，才能补偿她已遭遇到的和即将遭遇的一切。……主要是由于我对她的关怀，才使我非常希望，你尽快迈出幸福的一步进入社会，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你看，这个富有魔力的姑娘，把我这旧脑筋也弄得有些错乱了，我最希望的是，看到她平静和幸福。只有你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值得你全神贯注的目标。”⁽²⁵⁾

马克思没办法全身心投入浪漫的感情。虽然多年以后，他也曾向孩子们描述，自己当年是如何迫切地想要见到和拥有燕妮，但同时，他还有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们要交往。⁽²⁶⁾也许是因为与这些朋友的亲近，又或者是，因为终生对知识的痴迷，当时的马克思至少暂时把在柏林的生活，放在了比在特里尔的爱情更加重要的位置。

马克思受阿道夫·鲁滕堡的影响很大，他是一名地理老师，表面上

看，他是因为被发现醉倒在臭水沟里而被开除，实际上，他很可能是因为他在报上发表煽动性文章而遭解职。⁽²⁷⁾ 马克思还受到激进神学家布鲁诺·鲍威尔的影响。黑格尔的早期追随者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曾在1835年的著作《耶稣传》中提出，基督教是基于历史的神话，鲍威尔则继续了该书没有完成的讨论。黑格尔曾认为，上帝是一种理性的力量，指导着历史的辩证过程。青年黑格尔派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从浪漫主义思想出发，认为命运应该由自己主宰，而不是由某个看不见的却又仁爱的存在来决定。按照这个思路，接下来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危险了：既然上帝不是傀儡主宰，国王也就不是由其指定的，那他的权力也可以而且应该受到其他人的挑战。⁽²⁸⁾

这简直就是个政治炸药包，而19岁的马克思就身处这争论的中心。他很快被伙伴们选为领袖，虽然他们很多都已是知名教授或作家，比他至少年长十多岁。（他们中有人甚至说，年轻的马克思已经集卢梭、伏尔泰、海涅和黑格尔于一身。）⁽²⁹⁾ 在这种炙热的煽动性讨论中，马克思形成了毫不妥协的风格，他的哲学理论也在一点一点地完善，并终于在数十年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当年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与他在莱茵省的小山上漫步时讨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他正在进行的争论相比，就像念给小孩子听的童话故事，而此时，马克思的思想像一股风暴，席卷柏林的大小咖啡馆和啤酒屋。

在这种令人膨胀的氛围里孵化出来的马克思，被称作“摩尔”。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头发漆黑，肤色偏暗，另一方面，它来自席勒在《强盗》中刻画的主人公卡尔·冯·摩尔，此人虽然凶狠，却能力非凡，如绿林好汉罗宾汉一般，带领一帮强盗对抗腐朽的统治阶级。此后，马克思的好友都用这个昵称称呼他。

但亨利希·马克思并不认可“摩尔”这样的儿子。1837年8月，亨利希身心俱疲，指责卡尔在他11岁的弟弟爱德华病重（4个月后夭折）、母亲愁得要命、自己也已抱病七八个月时，仍对家里漠不关心。亨利希说，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着“你还没有摆脱利己主义，它在你身上超过了保存自我所需要的程度”。⁽³⁰⁾ 到12月时，亨利希仍在努力，希望能劝动迷途的儿子。他列举了卡尔应尽的责任，首先便是“作为一个青年”对燕妮应该肩负的责任，“……就是为她在现实中创造一个配

得上她的前途，而不是让她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守着一盏放在一个放荡不羁的学者身边的昏暗油灯”。亨利希说，卡尔欠燕妮的父亲很多，因为他顶住家族的反对，同意了这门亲事。“真的，千千万万的父母都不会同意的。你自己的父亲在忧郁的时刻，也希望他们这样做——因为我太关心这位天使的幸福了，我爱她，犹如亲生女儿，但正因如此，她的幸福才令我十分担忧。”

亨利希非常愤怒，说自己和卡尔“从未有过理智的通信所带来的享受”。他为此责怪卡尔，说他已经自我膨胀到无礼的地步。他把卡尔写给他的一封信（信里只有几行字和以《访问》为题的日记摘录）评价为“一派胡言乱语，只能证明你如何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华和好几个不眠之夜去制造怪物”。他说自己的“儿子先生”一年花的钱比最富有的人花得都多，不无嘲笑地问卡尔“一个人怎么能每隔一两周，就要发明新花样并不得不把过去辛辛苦苦地完成的工作全部推倒，我要问，他怎么能考虑一些琐碎小事呢？”^[31]

亨利希知道，死亡正在向自己靠近。他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卡尔身上，却看不到它们得以实现。更糟糕的是，他想象不出，自己的这些希望还有没有实现的可能。1838年2月，在写给卡尔的最后一封完整的信中，亨利希没有为自己的愤怒道歉，他说自己已经厌倦，不想再跟卡尔争辩。但他希望卡尔明白，自己对他的愤怒源自于爱：“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就是：我把你放在我心灵的最深处，你是我生命中最强大的杠杆之一。……我累极了，亲爱的卡尔，我不得不搁笔了。可惜，我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去写，我多想倾尽全力拥抱你啊，可是我的病情使我无法这样做。”^[32]

马克思原本没打算在复活节期间回特里尔。他在柏林的花销超过了父亲当年的收入，父母都觉得，让他坐5天的邮车回来花费太大。但他从母亲和姐姐冬天的来信中得知父亲病重，因此决定回家。马克思在4月底回到家中，待到5月7日，也就是他20岁生日后不久，便启程了。^[33]3天后，亨利希因肺结核和肝炎去世，5月13日下葬。^[34]

有些传记作家认为，马克思对父亲的冷漠不可原谅，说他肯定觉得自己有更值得的事情要做，才没有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但这是一个误解。卡尔刚刚离开特里尔，没有回去参加葬礼，是因为他根本赶不及，

而且他毕竟已经道过别了。虽然没有描述马克思这一时期失去父亲后的痛苦的信件留存下来，但他的痛苦肯定异常深重。马克思一生都在胸兜里放着父亲的一张银版照片，在他 45 年后去世时，恩格斯把这张已经破损不堪的照片和他葬在了一起。^[35]

亨利希死后，马克思作为天资聪颖却又任性的长子，家里再也没有人要求他不要沉迷于危险的哲学，要专心成为一个受社会尊敬的人。但一个新的、更加关键的声音出现了，它来自威斯特华伦家，但不是要求，而是威胁。

3

24 岁的《莱茵报》主编

★

唉，亲爱的，亲爱的！如今你甚至都卷到政治里去了，这的确是最危险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¹⁾

在亨利希去世后的3年时间里，马克思把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当做了家人。他放弃了当初选择的课程，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从1838年夏天到1841年大学生涯结束时，他只修了两门课程，其中一门，还是他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教的。⁽²⁾但这并不轻松，他的经济状况很糟，母亲不像父亲原来那样允许他随意超过预算花钱，毕竟，此时家里收入很少，除了卡尔外，还有6个孩子需要抚养。马克思还要随时应付燕妮的哥哥斐迪南的审查，后者强烈反对他和燕妮的婚事，并在反对意见被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否决后，利用自己在柏林的关系，让人对这位未来妹夫的活动进行调查。他发现，马克思与无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各种各样的激进分子交往甚密，没表现出丝毫找份职业、养妻育儿的念头，还把柏林最壮丽的广场御林广场周围的啤酒屋和咖啡厅当做了教室。⁽³⁾在斐迪南看来，卡尔玷辱了自己信奉的一切，比如，家庭、教堂和国家，但只要父亲还同意，他们的婚事就是安全的。他坚信：妹妹嫁给马克思是个错误，所以他必须早做准备，以待时机，把妹妹解救出来。

此时的燕妮和卡尔，正努力适应异地恋情，相互写信，倾吐自己的不安全感和猜忌，添油加醋地描述自己的病痛和不适，寻求对方的同情。他们的信件充满因为相思而不断加剧的焦躁。他们好像都成了悲剧大师，在一次次彼此伤害中寻求快乐，如果说他们彼此感受不到爱，至少感受到了痛。燕妮写过一封信，让卡尔消除疑虑。

但她又不能让他觉得自己太快乐了，便继续说：

.....

我因忧心忡忡而消瘦，担心你会由于我的缘故而卷入纷争，随后会去决斗。白天、黑夜，我总是看到你受伤，流血，生病。我把一切都说给你吧，卡尔，这种想象并没有使我感到多大的不幸，因为，我甚至想象，如果你失去了右手，这倒会使我充满快乐和幸福，因为你看，亲爱的……那时，我便能记录下你的全部可爱的绝妙思想，成为一个真正对你有用的人。我如此自然地、生动地想象着这一切，以致我仿佛听到你那可爱的声音，你的亲切的话语向我滔滔不绝地涌来，我倾听着这些话语，用心地为他人保存起来。^[4]

.....

燕妮和哥哥斐迪南一样，对卡尔在柏林的活动了如指掌。但她的态度是允许。她与卡尔的恋情，让她看到一种更深层次的、更有意义的、与特里尔完全不同的生活。她通过父亲和未婚夫，了解到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的可能，要实现这样一个世界，自然需要战斗，她觉得，自己可以站到战斗的中心位置。她没有只是想想了事，反而认真起来，让卡尔帮她找些书看：“必须是别开生面的，稍微有点学术性……不是任何人都爱读的，但也不是童话，不是诗歌，这些东西，我受不了。”^[5]

1840年，普鲁士国王去世，其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位。已故国王的生命是在对抗法国人的战争中度过的，当然，对抗的不止有拿破仑，还有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但威廉四世属于新一代，继位时45岁，臣民们普遍认为，他有才智、更加开明，能够摆脱旧时代的束缚。正在壮大的资产阶级希望他进行民主改革，以便他们取得与其在工业和经济中的贡献匹配的地位，尤其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后，各邦间

实现了自由贸易，改革的需求更为迫切。正在壮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相信：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能意识到，如果不想让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就必须建立制宪政府，让商人参政，直接向国王表达意见。⁽⁶⁾在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看来，所有国王都应该被蔑视，但所有人都希望：新国王能取消对新闻和出版的限制，让人民自由地表达观点。

新国王听见了臣民要求改革的呼声，但未予理睬。他的统治和父亲统治时并无二致，政府中的要职和军队里的军官都由贵族担任。新国王在资产阶级面前做了做样子，成立了毫无实权的省议会；至于普通臣民，他认为他们都是罪恶的，竟敢质疑他的神授统治权力。新国王不仅没有颁布扩大基本自由的宪法，还对新闻、言论和集会颁布新的限制措施，让反对的声音销声匿迹。⁽⁷⁾与此同时，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提出，在整个德意志联邦境内镇压所谓的危险思想。⁽⁸⁾各大学受到严密审查，甚至后来有作家称“大学成了兵营的附属”。⁽⁹⁾青年黑格尔派奋起抗争，但他们远不是政府的对手。

马克思担心柏林大学不会授予自己学位，便把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寄给了耶拿大学。遍数各邦，耶拿大学的自由主义氛围最为浓厚，它会把博士学位邮寄给获得者。马克思是在1841年4月6日提交的论文，4月15日他便收到博士学位。⁽¹⁰⁾他把博士学位献给了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您，我的慈父般的朋友，对于我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显证据，证明唯物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¹¹⁾

已经搬去波恩任教的布鲁诺·鲍威尔说，马克思也可以去波恩教书。但由于鲍威尔猛烈攻击宗教和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他自己在波恩的位置都已岌岌可危。1841年夏，普鲁士宗教与教育大臣对鲍威尔发起一场攻击，马克思受到牵连。结果，马克思在整个普鲁士境内找到教学工作的机会越发渺茫。⁽¹²⁾

此时，卡尔23岁，燕妮27岁。她已经等了他5年，但在他找到工作前，他们还无法结合。刚进入大学时，马克思计划成为一名法官或律师，但他已远远偏离了原先的计划，而且，这一领域的竞争也极为激烈。此前20年内，德国的高等教育招生数翻了一番，结果，无数中产阶级大学

毕业生为了极为有限的工作机会挤破脑袋。⁽¹³⁾对他们而言，最后的选择是进入报业。⁽¹⁴⁾这是最低端的行业，只有那些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声名不好的、华而不实的、靠不住的”人在万般无奈之下才会考虑。⁽¹⁵⁾这个行业收入低微，有时甚至没有收入。但马克思没有更多选择，而且他认为，报人写作的目的也不应该是为了钱——报纸是受教育阶层挑战权威的首要方式。除了在一份关于浪漫主义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点诗歌外，马克思此前从未发表过任何东西，但他喜欢挑战权威，也知道如何挑战。⁽¹⁶⁾

整个 1841 年，马克思穿梭在特里尔、波恩和科隆之间，尽可能寻找写作的机会。他在特里尔待了 6 个星期，这是他自 1836 年启程去柏林以来，在家待得最久的一次。当他最初离家时，他和燕妮的约定还是秘密。⁽¹⁷⁾现在他们已得到家庭的认可，能够出双入对了。不过他们的公开亮相，还是在小城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除了燕妮，恐怕没人会觉得年轻的马克思长相英俊。一位马克思传记作家曾引用一名特里尔居民的话来形容马克思的外貌，“几乎算得上是最没有吸引力的人”。他身材像拳击手一样结实、相貌粗犷、不刮胡须、仪容不整，穿着的暗色礼服虽然质量上乘，却经常扣错扣子。⁽¹⁸⁾他的黑色胡须留得过长，显得不够庄重，按照普鲁士 19 世纪中期的社会规范，这等于是在宣告——自己是一名激进分子。他在公共场合抽雪茄，而体面的绅士只在自己家里抽。不用说话，他的身体语言已经告诉别人，他与这个保守的社会格格不入。和燕妮在特里尔一起漫步时，走在他身旁的燕妮跟他体态完全相反。燕妮个头高挑，身段柔软，优雅端庄。她有一头深褐色头发，简简单单的一串珍珠项链，让她的脖颈显得愈发修长，她的相貌和体态都极为出众，根本无需华丽的衣服来凸显，但同时，她又极为时髦。父亲的地位和母亲的品位，决定了，她的穿着打扮在特里尔绝对是最有品位的。在盯着他们的一双双眼睛看来，这两个人的差别实在太大，燕妮是如此迷人，卡尔却是如此让人生厌（甚至令人起疑）。

燕妮对关于两人外形上不协调的闲言毫不在意，却无法对关于两人年龄上的差异和卡尔没有稳定工作的碎语无动于衷，但她不会表露出任何不安让这些嚼舌的人满意。卡尔则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马克思的未来虽不明确，但充满希望。拥有金钱和民主热情的自由主义者越来越无

法忍受国王的专制统治。马克思在“无能的贵族和死气沉沉、觉得一切现实都是上帝意愿的臣民”身上，也看到彻底摧毁旧制度的可能。⁽¹⁹⁾

为了绕过政府对公开政治辩论和政党的限制，那时的作家，经常用神学和哲学术语来遮掩真正的讨论内容，以文学或哲学协会的名义聚会。⁽²⁰⁾在马克思和他的战友看来，攻击宗教就等同于攻击宗教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他们想表明，宗教不过是讲述基督的一个神话，但这个神话被用来支撑腐朽的制度和专制的统治了。因此，宗教和它所支撑的制度一样，都是邪恶的。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想创办一份名为《无神档案》的刊物来传播这些思想，但他们需要资金。⁽²¹⁾马克思也尝试过向特里尔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富人寻求资助。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燕妮间接提到一个名叫罗伯特·施莱歇尔的当地医生的反应，并在信中加上了自己的提醒：

.....

施莱歇尔刚才告诉我，他收到一位青年革命者的信，他对自己同胞的估计大错特错了。他没有估计到，他会购买股票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唉，亲爱的，亲爱的！如今你甚至都卷到政治里去了，这的确是最危险的。小卡尔，你时刻要考虑到：你家里有一个爱人，她正期待着你，惦念着你，她与你休戚相关。⁽²²⁾

.....

燕妮调笑自己这个满脑子危险思想、还四处传播的恋人，称他为“铁路上的亲爱小男人”和“亲爱的小野猪”，并开始思想和学问上为他们日后的婚姻生活做准备。⁽²³⁾她埋怨马克思，既不肯评价自己的希腊文，也不肯表扬自己的博学。她还特意提到自己很早起来，阅读发表在报上的3篇关于黑格尔的文章，以及评价鲍威尔的《共观福音书批判》的书评。⁽²⁴⁾燕妮在两个人的关系上表现出急迫和不安并不奇怪。燕妮的母亲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特意安排了燕妮的弟弟埃德加跟她一起去波恩，让他看着燕妮，确保她内外得体。⁽²⁵⁾但埃德加实在不是个好选择，他思想自由开放，对马克思和燕妮二人的愿望一直不能得到满足给予同情，他给了他们独处的机会。燕妮后来写信给卡尔说：

.....

我不会也不感到后悔，我蒙住自己的双眼，紧紧地蒙住，这样，我就看到了你那幸福地微笑着的目光——看吧，卡尔，然后我自己也在冥想中也是幸福的了。——我把一切都给了你——其他人什么也不给了。啊，卡尔，我清楚地知道，我做了什么以及我会怎样被人们瞧不起；我知道这一切，尽管如此，我仍感到高兴和幸福，甚至不会为人世的任何财宝而放弃对那些时光的回忆。我再一次体验每一个幸福的时刻，再一次躺在你的心上，我陶醉在爱情和幸福之中！……卡尔，成为你的妻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念头——也许，噢，天啊，我头都晕了！

.....

想到两人的关系如果暴露特里尔人可能会有反应时，燕妮说：“我的父母住在那里，我年老的父母是如此地爱你。啊，卡尔，我很不好，在我身上除了对你的爱情以外，不再有什么好的了。”⁽²⁶⁾自二人相恋以来，燕妮的未来从未像现在这般依赖于马克思，而在她最需要父亲来帮助她确定和马克思的关系时，父亲却已无法给她这个帮助。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一直在与疾病做斗争。1841年12月，他病情加重。马克思回到特里尔，搬进威斯特华伦家，帮着照顾路德维希，也可以跟燕妮近距离相处。⁽²⁷⁾在此期间，普鲁士内阁大臣发布了一项书报检查令。按照官方说法，检查令是国王为了让作家免受不必要的限制，但实际上它做出的限制比1819年开始施行的法令还要多。⁽²⁸⁾按照新法令，凡对基督教“不严肃的或恶意的”作品；凡妄图将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的作品；凡政府认定会对个别人或整个阶级造成攻击或诽谤的作品；甚至凡是可能产生不好影响的或具有此类“倾向”的作品，都不得发表。政府就此通过庞大的检查大军，对思想实施独断控制。

马克思利用在燕妮家的几个月时间，对检查令做出了回应，他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正面攻击。在这样一个不容忍任何异议的国家里，他没有把政治隐藏在宗教或哲学后面，相反，他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直面政府的新法令宣战。他把满腔怒火化作一篇长达22页的文章：“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

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²⁹⁾

马克思用“莱茵省一居民”的署名把文章发给德累斯顿《德国年鉴》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卢格比马克思年长16岁。之前，他由于自由主义思想被关过6年，又因为所持观点在大学得不到教职，不得不四处漂泊，办了一份报纸，却因为政治论调被禁，不得不转移到氛围更加宽松的地方。但即使是在卢格这里，马克思的文章也没能通过检查。⁽³⁰⁾ 燕妮的哥哥斐迪南已于1838年在特里尔担任重要职务，马克思的文章必然没能逃过他警惕的双眼，他肯定知道，这篇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出自父亲的房子。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在马克思把文章交给卢格一个月后去世，马克思在威斯特华伦家也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成为一家之主的斐迪南马上行动，想解除燕妮和马克思的婚约。他让燕妮的叔叔、保守的亨利希·乔治·冯·威斯特华伦向燕妮施压。我们无从知晓燕妮的母亲对女儿与马克思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何种地步是否知情，但她显然站在了女儿一边，急匆匆把燕妮带到自己在度假小镇克罗茨纳赫的一处住所，这里位于特里尔以东50英里，能够避开斐迪南的控制。⁽³¹⁾ 她们在这里躲过了这场风暴。

马克思也离开特里尔，到了科隆。他加入了一个俱乐部，成员不仅包括一些他在柏林时认识的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还有同样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本地商人。⁽³²⁾ 马克思在柏林认识的朋友格奥尔格·荣克和新结识的朋友莫泽斯·赫斯，成功说服一些商人出资办了一份报纸，取名《莱茵报》。《莱茵报》的定调是“政治、商业和工业”，让读者一看便知，这是一份针对中产阶级品位的报纸。⁽³³⁾

众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参与到《莱茵报》当中，这说明反对政府的力量极为多样，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除了来自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各种激进知识分子外，报纸的赞助人还包括自由派律师、医生和企业主。其中最知名的，当属后来出任普鲁士首相的银行家兼铁路商人卢道夫·康普豪森，以及后来担任普鲁士财政大臣的商人大卫·尤斯图斯·汉泽曼。⁽³⁴⁾

这些人能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都觉得当前的政府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1834年关税同盟成立后，普鲁士中产阶级商人变得更加壮大，他们与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商人有了更多交流，作为商人，他们有着同样的目标，竭力推动贸易和发展。在他们看来，德意志联邦各邦间的联系过于松散，各有各的统治者、法律和货币，这将限制原本潜力无限的工业发展。他们希望联邦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股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当然，融合只是一方面。正如知识分子觉得如果写什么、说什么都要由国家来控制，就等于无法呼吸一样，普鲁士的中产阶级知道，除非进行深入的社会变革，否则无法继续发展。没有任人唯贤的制度，没有言论和集会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平等纳税，国家如何进步？纳税问题是最令中产阶级无法接受的，他们缴纳着重税，遍地的贵族却一分不缴。

莱茵省是普鲁士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里呼吁改革的声音尤为响亮，而科隆则是莱茵省思想活动的中心。⁽³⁵⁾马克思到科隆时才23岁，他还带着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但不到一年，他便成为普鲁士最具影响力的反对派报纸的编辑。

《莱茵报》于1842年1月1日创刊，只有400人订阅。4个月后，马克思开始为其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根据莱茵省议会的一次辩论，讨论了新闻出版自由。⁽³⁶⁾这一主题在当时争议颇大，而且，为防止民众发表政见，普鲁士政府不允许任何文章讨论各省议会的辩论。在专制主义者看来，议会代表是“魔鬼的学徒”，他们的话只会让原本就已经很蠢的读者变得“更蠢”。⁽³⁷⁾

虽然困难重重，马克思的文章还是通过了检查。他的讨论非常复杂，以至政府派来检查文章政治纯洁度的官员也被迷惑了。同时，文章不失风趣，行文优雅雄辩，给读者以启发。文章的观点很清楚：

.....

自由是人的本质，法律应该予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

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

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³⁸⁾

.....

1842年5月5日，马克思的这篇政论文正式发表（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这天恰是他24岁生日。为安全起见，他选择了匿名，不过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作者，对他盛赞有加。副编辑莫泽斯·赫斯称赞他是“同时代人中最伟大，或者说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³⁹⁾卢格说这篇文章是相同主题的文章中写得最好的。荣克称赞文章写得极好。⁽⁴⁰⁾

大获成功的马克思回到特里尔。但特里尔迎接他的并不是在科隆获得的称赞。因为经济和前途问题，马克思和母亲陷入一场争吵。母亲抱怨他对家里不管不顾，让她承受威斯特华伦家的白眼。争吵非常激烈，以至于马克思参加完姐姐索菲娅的婚礼便离开了，而且这期间他一直住在旅馆里。他没把这个插曲放在心上，他的全部心思都在科隆。马克思对卢格说：“社会的肮脏事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私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⁴¹⁾

《莱茵报》稳步发展，但编辑部却陷入混乱。随着编辑不断更换，马克思的老朋友阿道夫·鲁滕堡于1842年夏天被任命为总编辑，但他酗酒严重，又与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不对路，看来任期也长不了。⁽⁴²⁾

这时，马克思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写得都非常精彩，受到一致称赞。而且，他总能把自己真实的意图隐藏起来，巧妙地通过政府的检查。投资人担心报纸在柏林极端分子的影响下，会变成理论辩论的阵地。马克思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他指出《莱茵报》不应纠缠于抽象理论，而应考虑“实际问题”。他还指出，报纸应该引导撰稿人写什么，而非受他们引导——作为撰稿人，这样的立场显得特立独行。

显然，马克思不想继续做纯粹的撰稿人。他的说法得到了资助人的欣赏，并在10月15日被任命为总编辑。⁽⁴³⁾上任第一天，马克思对一家竞争报纸指责《莱茵报》支持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反驳（当时共产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极为相似的哲学，只是前者的拥护者主张取消私有制，这显然是资助《莱茵报》的商人无法接受的）。他说，《莱茵报》“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它可能实现”。⁽⁴⁴⁾

《莱茵报》资助人，莱茵省商人古斯塔夫·梅维森说，马克思不论是身体还是思想都犹如一场风暴，“一个强有力的人……两颊、双臂、鼻孔和耳边的毛发又黑又密。他果断、热切、极为自信，同时又很诚恳、有学问”。⁽⁴⁵⁾自此，科隆人经常看到这位编辑急匆匆的身影，他在鹅卵石街道上躲避着大大小小的马车，口袋里塞满报纸。⁽⁴⁶⁾他还经常到咖啡馆、啤酒屋或位于地下室的昏暗餐馆里，搜寻来自德意志其他各邦或其他国家的难得一见的报纸。马克思兼收并蓄，充分利用自己在普鲁士内外发展起来的可靠消息来源，不断打败其他的竞争者，让政府中想让他噤声的人毫无办法。在马克思的引领下，《莱茵报》在普鲁士发出了自由的声音。

随着报纸越办越成功，加上马克思的卓越领导，《莱茵报》很快吸引了来自德国各地的众多杰出作家——甚至有投稿人说：“普鲁士和德国所有年轻、新近、自由思考和具有革命倾向的……人才都聚集在这里。”⁽⁴⁷⁾既然报纸吸引了众多自由思考者，编辑便需要掌握一个准绳。马克思做过撰稿人，对此颇为熟悉，他的果断之名便始于此。布鲁诺·鲍威尔说如果有人逾越准绳，马克思就会大发雷霆——但他坐在编辑这个位子上，自然经常发现有人逾越。⁽⁴⁸⁾未经马克思同意，任何东西不能上报。这就意味着现在自称为“自由人”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如果不肯“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就不能上他的报纸。⁽⁴⁹⁾“自由人”立刻指责马克思保守，但他说：“自己宁愿‘牺牲几个柏林的吹牛家’，也要保住报纸。”⁽⁵⁰⁾

马克思23岁的弟弟海尔曼在10月14日（马克思被任命为总编辑的前一天）去世，但他没有回去参加葬礼的打算。⁽⁵¹⁾他留在科隆，专心

研究一篇文章。他后来告诉恩格斯说，正是这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一起“引领他把注意力从单纯的政治转向了经济状况，并最终转向社会主义”。研究让他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物质的，也就是经济的。⁽⁵²⁾

第一篇文章的内容是关于农民在私有树林里捡拾自然落地的枯树枝但被普鲁士政府界定为偷窃的讨论。之前，穷人是允许收集枯树枝取暖的，1807年农奴制被废除后也一直如此。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对木材的需求大幅增加，林木所有者在出售中获得高额回报。政府站在了林木所有者一边（这不奇怪，毕竟他们才是在政府里担任职务的贵族），将擅自捡拾枯树枝界定为犯罪。马克思对此进行讨论时，由于贫困增加和人口激增，木材“偷窃”达到顶峰，普鲁士每6宗诉讼案便有5宗与此相关。⁽⁵³⁾马克思从林木盗窃法本身的规定出发，论证其不合理性，揭露这种允许林木所有者抢夺被他称为“自然界的布施”的枯木的制度的荒谬和伪善。⁽⁵⁴⁾

第二篇文章是关于高税负和德意志各邦间的自由贸易，导致摩泽尔河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⁵⁵⁾资助《莱茵报》的商人看到了自由贸易的好处——他们的市场得以扩大，利润得以提高；但马克思意识到，他们的收获是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小土地所有者和当地种植者无力在更大的市场上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生产者竞争。

在对“实际问题”的探索中，马克思显然未能意识到——自己批判的体系正是他的读者要保护的体系，他可能会失去报社股东的支持。实际上，随着马克思的迅速成熟，《莱茵报》也变得更加激进。它对莱茵省议会和柏林政府的报道毫不手软，对事实的说明极为精细（按照编辑的真实调查结果），调查更加深入，语调充满嘲讽。它用一种全新的、大胆的语调与普鲁士的受教育阶层对话，第一年的订阅量就从400份增加到3500份。马克思采用多种策略对付被他的报道惊动的政府当局。一名被他磨得筋疲力尽的检查官说：“马克思会死于他的观点，即便他对其中的真理深信不疑。”⁽⁵⁶⁾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也感到了疲倦，况且他还要不断与众多作者争论什么样的文章能够上报，什么样的文章不过是哲学论文或纯粹的宣传资料。

12月，马克思坐马车到克罗茨纳赫与燕妮和她母亲一起过圣诞。

他现在有了固定的职业，受到很多有权有势的自由主义者尊敬，收入还不错，已经在科隆安定下来。他终于有了结婚的能力，他和燕妮打算来年6月结婚。⁽⁵⁷⁾但马克思返回科隆后，发现政府查禁了《莱茵报》，将报社定性为违法，理由是未获得经营许可、有政府禁止的倾向。⁽⁵⁸⁾

莱茵省和柏林政府当局一直对马克思的报纸头疼不已，早在11月，他们便开始考虑进行查禁。有人认为，最后一根稻草是该报于1843年1月4日发表的一篇攻击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文章。为此，俄国沙皇召见了普鲁士驻圣彼得堡大使，敦促普鲁士约束国内的自由主义出版业。⁽⁵⁹⁾1月21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亲自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查禁《莱茵报》。政府给《莱茵报》规定的最后期限是1843年3月底，在此之前由两名检查官进行审查。⁽⁶⁰⁾

马克思于3月17日辞职，他希望自己的离开能够挽救报社（但未能如愿，报社在3月31日关闭）。不过，马克思也早已经厌倦了把控准绳。他对卢格说：“这种气氛也令我感到十分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缩手缩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迎、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⁶¹⁾

4 在克罗茨纳赫终成眷属

★

因此无论何时，身处何地，我的灵魂依然紧贴你的心；
它在那儿做着最为疯狂的梦，它在稀薄的空气中跳跃翻滚
着。

——亨利希·海涅⁽¹⁾

马克思又一次没了工作和收入，这成为他接下来数十年的主题。他一生强调经济的重要性，临到需要自己解决财务问题时，却长期无法担起责任。（他的这一声名定然广为人知，以至于燕妮的家人要求他签下一份协议，承诺妻子不为他婚前欠下的债务负责。）⁽²⁾面对经济压力，又无法从母亲那儿拿到任何钱，马克思在1843年3月时远赴荷兰，找自己的姨父莱昂·菲利普斯讨论遗产继承问题。⁽³⁾虽然，这期间并无任何记录留存下来，但马克思应该是从菲利普斯那儿提前拿到了一笔钱，因为，接下来，他一直到年底都没再为钱的问题犯愁，而他之前在科隆的工作又不可能存下钱。

在此期间，马克思还与卢格多次通信，后者正计划搬去法国，创办一份新报纸，名为《德法年鉴》，同时刊登两个国家的反对派的声音。马克思对此非常兴奋，但燕妮心有忧虑，她担心马克思去法国后会被视为叛国、被禁止再回来。⁽⁴⁾

此时，马克思在普鲁士还是有个工作机会的。一个来自家中亲戚、

柏林的莱茵上诉法院总枢密顾问埃塞尔。埃塞尔受普鲁士政府之命，向马克思提供一个进入政府工作的机会，想在这个年轻的批评家继续成长之前，把他吸收进来。另一个进入政府工作的机会，很可能来自燕妮的哥哥斐迪南，他在尝试解除二人的婚约失败后，决定退而求其次，把燕妮留在身边，便于自己随时监督她的这个在政治上任性的丈夫。⁽⁵⁾ 进入政府工作意味着稳定和声名，是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机会，但马克思全都拒绝了。

马克思更加相信，离开德国是必要的选择，如卢格所说，只有这样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创办一份不受限制的报纸。⁽⁶⁾ 1843年5月，马克思到德累斯顿与卢格和尤利乌斯·福禄培尔见面，后者是苏黎世的一位教授，拥有一家重要的出版公司。卢格和福禄培尔同意出资办报，聘请马克思共同担任编辑，工资待遇与在《莱茵报》时相差不大，同时有差不多工资一半的稿费。马克思表示同意，他说，自己会在克罗茨纳赫就开始写作，存一点稿子，以备不时之需。⁽⁷⁾ 但奇怪的是，在他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正说着这些安排时，却转而说起自己的个人生活：

.....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色彩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对手。⁽⁸⁾

.....

马克思说，自己和燕妮与双方家庭经历了“不必要的严重冲突”，暗示说，自己和燕妮自1836年订婚以来，就一直想要结婚。但实际上，真正阻碍他们结婚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他自己。他显然觉得，自己需要独自一人进行波恩、柏林和科隆的思想之旅，无论燕妮为此需要付出多少感情上的磨难，或者他们的婚约是否会因此面临风险。而燕妮也

从未因此对他失去耐心，她在写给他的信中表达焦虑的同时，一直洋溢着对他的爱。结婚前夕，她说自己已经准备好陪他到任何地方。“时而在前，时而在后地追随着你。但愿我能为你铺平道路，清除你路上的一切障碍！”⁽⁹⁾

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认为，一个人只有与其他事物或人发生关联，才能认知到真正的自己。⁽¹⁰⁾马克思和燕妮通过彼此认知到了真正的自己。1843年6月19日，他们终于，在克罗茨纳赫一座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马克思家没有人出席，燕妮家也只有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出席。此时，马克思25岁，燕妮29岁。⁽¹¹⁾

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送给女儿一套纯银餐具和织品作为结婚礼物，这些东西都有上百年历史，带有阿盖尔家族饰章，价值极为昂贵。她还出钱让这对新人去瑞士度蜜月。⁽¹²⁾燕妮结婚前非常节省，为了省钱，她没让马克思买任何东西，甚至包括婚服上的鲜花。⁽¹³⁾但她很快陶醉在新婚的快乐中，开始和马克思一样，不再吝啬于花一点小钱。他们去的是颇受新婚夫妇欢迎的莱茵—普法尔茨。返程时，他们决定坐马车慢慢往回走，一路在旅店热情招待慕名前来“化缘”的朋友。他们婚礼上得来的钱一直放在一个非常结实的箱子里，箱子就放在桌子上，从来不锁。等他们回到克罗茨纳赫，箱子已经空了。⁽¹⁴⁾这就犹如浪漫主义者的剧本——越是想得到什么，结果越适得其反，雪莱估计对此深以为然。

这对心气颇高的新人，显然没把财物的损失放在心上。在他们眼中，马克思行李箱里装的东西——他随身携带、打算蜜月期间研读的45本书，其中包括黑格尔、卢梭、马基雅维利和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显然更有价值。⁽¹⁵⁾有了燕妮的爱保驾护航，他不仅要研究这些哲学家的文字，还要检验自己在科隆学到的政治和经济知识。与燕妮结婚之后，卡尔·马克思开始迈出成为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的一步。他们的誓言坚定了彼此的信心，他们的结合将让彼此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经过蜜月期间的研究和思考，马克思得出两个非常著名的结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人类的解放只能依靠无产阶级。⁽¹⁶⁾

他们在克罗茨纳赫一直待到10月，在这里，他们在书丛中，享受二人世界。7月，燕妮怀孕了，而马克思正在努力攻克他到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¹⁷⁾

直到此时，马克思的思想受到黑格尔的影响最为重大，即便是马克思因为黑格尔只关注思想（至少在马克思看来）却忽视现实而否定他。马克思的思想框架没有变——他把黑格尔的思想辩论文字转换成了政治行动，把黑格尔辩证法转换成了自己的辩证法。他的这种改良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影响。^[18]费尔巴哈是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共同的朋友，他在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指出上帝是人创造的，是人把人类的所有美德集中到一起，投射到一个崇拜的神性的影像上。费尔巴哈认为人这样做就等于把自己最好的品质交给了其他的人或物，结果觉得自己软弱和微不足道，无法展现出本性中最好的东西。1843年，费尔巴哈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之前的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不应该把思想看作像宗教一样来自于人之外、像闪电一般进入人的脑海；实际上，是人产生思想，并通过思想创造了上帝和哲学。^[19]

马克思把上述观点应用于黑格尔的国家观念，结果发现按照黑格尔的体系，国家的运行是与人分开的，是国家把秩序感施加到人身上。但马克思认为国家就是人（整个社会的人），应该由人来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宪法。^[20]

接下来，马克思对宗教进行了仔细思考。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一个用来承载善的工具。但马克思透过宗教，只看到了人的苦难。他认为宗教是人创造出来用以麻醉自己的毒品，因为他们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马克思写道：“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没有灵魂的现实里的灵魂。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21]

为引领人民回到他们生命中的真正中心，马克思决定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他告诉卢格，这就是他们的新报纸必须要做的。卢格和福禄培尔说这样的报纸只在一个城市办得下去——巴黎。^[22]

流亡的一家

- 5 巴黎的激情岁月 / 44
- 6 爱情的纽带 / 52
- 7 初遇一生的守护者 / 61
- 8 幸福的婚姻 / 69
- 9 英国见闻 / 76
- 10 新思想的孕育 / 52
- 11 壮丽的事业 / 94
- 12 《共产党宣言》的诞生 / 103
- 13 燃起革命的火焰 / 108
- 14 人民之春 / 118
- 15 《新莱茵报》与新斗争 / 126
- 16 笔杆子不得不服从枪杆子 / 134
- 17 坚守堡垒 / 143
- 18 梦碎巴黎 / 152

5 巴黎的激情岁月



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

——卡尔·马克思⁽¹⁾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巴黎曾多次成为人类思想创造的中心，1843年便是其中之一。来自法国、德国、俄国、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改革家们与已经开始在作品中反映现实而非理想的画家、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和哲学家们混在一起。⁽²⁾赫赫有名的贵族与经历曲折的革命者聚在金碧辉煌的沙龙或是秘密协会的据点里，后者曾孕育过众多革命计划，以推翻王朝，建立新国度。政治流亡者坐在右岸咖啡馆铺着天鹅绒的座位上，享受王子般的待遇。获过奖章的士兵离开军队，走入民间，加入反对派阵营，因其无畏获得喝彩——虽然脱下威武的军装，会让时尚的女士们感到一丝遗憾。这就是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巴黎，它犹如一块磁铁，吸引着来自欧洲各个阶层的激进分子。

法国大革命期间，18岁的路易·菲利普曾短暂加入反对阵营，推翻国王，之后，他旅居英国和当时平等主义的前沿阵地美国。他接触过最先进的政治思想，54岁时他已经学会容忍反对派的声音，反对声音不管如何喧闹，只要不影响他的商业热情，都不会引起他的过激反应。他吸取了前任遭驱逐国王的教训，明白必须保持一定的宽容，才能保住

王位，让商业发展起来，让国库充实起来。巴黎因此获得了显赫的财富和声名，一件流行的礼服能耗费 250 码尚蒂伊花边和印度山羊绒，售价超过 1 万法郎——相当于当时工薪家庭一年收入的 10 倍。⁽³⁾同时，巴黎又兼容了很多宣传结束这种过度奢华的左派激进分子（他们中也有某些人的女伴穿着昂贵的顶级服装）。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说，在巴黎，“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⁴⁾

燕妮和马克思坐马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熙熙攘攘的巴黎。他们来巴黎是因为这里有自由，作家可以说任何想说的话而不用担心受到责难。但燕妮和马克思可能会对这里的自由形式感到诧异。在普鲁士时，自由由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概念、一种信念，但从未感受过。现在，他们终于见识到了：他们看到大群资产阶级响应政府的“致富”号召；他们听到各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相互间针锋相对、毫不遮掩地公开辩论，简直要将这座城市的天空掀开。他们从未离家如此遥远，到一个如此陌生的地方。但他们知道，他们属于这座城市。⁽⁵⁾

他们很快便融入巴黎的生活。燕妮喜欢戏剧，尤其喜欢在巴黎绿树成荫的大道上演出的滑稽歌剧。在巴黎，绅士们都穿着紧身的衣裤，材质和颜色的样式选择甚至不比女性服饰少。女士们则从头到脚穿戴奢华，以此吸引其他人的目光，却又假装对他人的关注不屑一顾。大街上总能看到求爱的仪式，在燕妮这样的旁观者看来，这很是滑稽，似乎巴黎的上层阶级除了爱情就没其他事值得思考的。但还有另外一群人，就在他们周围，就被他们踩在脚下，这些人将来会把他们推翻。穷人虽满腔愤怒，上层社会却丝毫未加注意，他们仍然坚定地幻想着：整个社会仍处于而且将一直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经过在特里尔父母家中数年的沉闷等待，燕妮眼见自己的青春悄悄流逝，现在终于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等马克思到即将成立的报社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未来的生活将更加美好。马克思想着可以写些书，她可以帮忙誊抄，她的孩子就要出生了，他们要在巴黎相互扶持，这里的革命都是浪漫的，士兵都有自己的风格。这个莱茵省的女儿在巴黎这个大都市看到了各种可能，沉醉其中。

马克思和燕妮抵达前不久，卢格也才刚刚带着妻子、一大群孩子和

一大块牛腿肉来到这里。他婚后虽然富有，却极为节俭，他还建议马克思夫妇也省一点。两家人跟另外一对夫妇（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和他妻子埃玛）一起租房子住。卢格为人相对循规蹈矩，在道德上相对保守，他在位于塞纳河与圣日耳曼大道间的瓦鲁路租下一栋普通公寓楼的两层。三个男人要忙于《德法年鉴》，办公室就在街对面。卢格建议：女士们负责家里的杂务。⁽⁶⁾

对燕妮和马克思而言，这样的安排看似不错，毕竟刚到异国他乡，跟同胞住在一起更容易适应一些，但这个安排很快便宣告破产。数年后，海尔维格家的儿子马赛尔说，当时他母亲一眼就看到了问题所在：“卢格夫人是撒克逊人，人很不错，但终究和马克思夫人差别极大，后者显然比前者更加聪明，更有抱负，知识也更渊博，两个人怎么可能处得到一起呢？”海尔维格夫妇看到有产生矛盾的可能，立马回绝了。⁽⁷⁾马克思和燕妮跟卢格家一起住了短短两周，就搬到同一条街上一所更大、更像样的公寓里去过二人世界了。

马克思博士和他的妻子很轻松地融入了巴黎的激进分子和民主主义者的圈子，首次以夫妻名义出现在大家面前。马克思为燕妮感到骄傲——骄傲于她的美丽，即便是在巴黎这样一个名媛云集的地方，她的美丽依然耀眼。他同样骄傲于她的智慧，自他们结婚之日起，马克思就把燕妮看作是在思想上和自己处于同一水平的人。这绝非说说而已：谈到思想方面，马克思从来不会客气，如果他不觉得燕妮足够聪明，就不会依赖于她的判断。⁽⁸⁾在马克思一生中，除了燕妮，能够得到他如此尊重和信任的便只有一个人了，那便是与他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但恩格斯只能在思想上理解和支持他，燕妮同时还是他生活中的伴侣。

私下里，马克思只要没有被工作弄得无法入睡或疾病缠身，一般来说都是个很好的伙伴：热情、体贴、和蔼。但在公众场合，他辩论起来咄咄逼人，在思想上极为自信，他没多少时间花在社交礼仪上，而且对于马克思来说，他有些习惯于脱离所有碰到的人。各种各样的辩论虽然让他劲头十足，却也让他心力分散。只有埋头于书中时，他才是最快乐的（他把书称作自己的“奴隶”）。马克思虽然内敛，却总在不知不觉间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和领导力，吸引了众多追随者。⁽⁹⁾

燕妮却是社交方面的专家。有了她的安静和优雅，人们便不至于被她的稍微有些奇怪的丈夫吓到。只有在挽着燕妮的手时，马克思才些许有些私下里的样子——放松、风趣。这个思想活跃的男人，只有妻子在身边时，才会表现出一丝温顺。

他们到巴黎时，燕妮 29 岁，马克思 25 岁。虽然巴黎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圈子都知道马克思是来自科隆的作家，但他的光芒算不上强烈。毕竟，德国有数位知名的政治和文学人物流亡巴黎，海尔维格就比马克思更为知名。几个月前，海尔维格的一本新的著作因为政治原因被禁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亲自与他会面，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政府，在普鲁士共创文化繁荣。众所周知，这位诗人拒绝了，他说自己生来便是共和主义者，无法侍奉国王。因此，他被普鲁士、萨克森和瑞士驱逐，最终来到巴黎。每一次被驱逐，都使得他的名声更加响亮。他在流亡途中娶了一位柏林丝绸富商的女儿（他的伴郎是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一直梦想着能用诗歌为新德国发出声音。^[10]

海尔维格和马克思一样，为卢格的报纸写作。两人很快成为好友，两对夫妇正好都新婚不久，也展开了交往。但马克思和燕妮很快发现：他们这位才华和相貌都极为出色的朋友，还因为花费无度等缺点而声名在外。

到 19 世纪中叶，艺术家（如以上诸位）与政治激进分子（如马克思）之间的界限已经愈加模糊。艺术家们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得到资助人的慷慨相助，这些被马克思称为“脑力劳动者”的人，现在也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可能会挨饿。^[11]面对穷困的威胁，很多浪漫主义、脱离人群的天才人物开始涉足政治。有作家称，艺术家全都能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当做最重要的政治工具。^[12]处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社会环境里，马克思和燕妮逐渐把海尔维格的缺点放在了脑后，尽管这在思想保守的德国是完全无法让人接受的。马克思一生都采用不一样的社会标准来看待诗人，他的女儿爱琳娜说，他把诗人称作“怪异的人，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不能用衡量普通人甚至出众的人的标准来衡量”。^[13]

大概是在遇到海尔维格的时候，一名德国医生把马克思引见给了亨利希·海涅。虽然自马克思孩童时代起，海涅就已流亡巴黎，但他一直存在于马克思的生活中——不是因为马克思把他当做诗歌上的偶像，而

是因为他是马克思母亲那边的远房亲戚。海涅虽然比马克思年长 20 岁，但两人还是很快亲近起来。用海涅的话说，他们“不需要说很多话，便能明白彼此的意思”。⁽¹⁴⁾

海涅年轻时非常俊秀，眼神温柔，长发稍稍弯曲，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温和的，但马克思和燕妮见到他时，却正是他处境悲惨的时候。他患上一种瘫痪症，1843 年时转移到了左脸，他担心会因此失明。他刚刚跟情人马蒂尔德（一个比他小 15 岁的法国女子，没多少文化，也不知道他如此知名）结了婚。⁽¹⁵⁾

海涅虽然处在死亡边缘，在诗歌创作中却爆发出更惊人的能量。虽然有批评家称他为“自大狂”，但他其实缺乏信心，曾因为担心受到差评而在马克思面前流泪。（这时，马克思会交给燕妮处理，她总能用智慧和耐心安抚这位桂冠诗人，让他重拾信心。）海涅与马克思夫妇变得如家人般亲近，经常相互走动。⁽¹⁶⁾与海涅的关系是马克思在巴黎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海涅更多涉足于政治，马克思则变为一个更加成熟的艺术家和男人。

按照计划，卢格的报纸为月刊，德法双语出版，1843 年 11 月开始发行。但此时资金出了问题，而且还有供稿问题——卢格连一个法国投稿人也找不到。实际上，唯一一个同意加入的非德国人，是当时也在巴黎的俄国人巴枯宁。卢格让马克思负责招募法国作家，他们还考虑过是否可以找找女作家乔治·桑和弗洛拉·特里斯坦。这两个人马克思都认识，但他有没有邀请她们为《德法年鉴》写文章却不得而知。最终，她们没有投稿，也没有任何其他法国作家投稿。虽然德国人在如饥似渴地吸收法国哲学，但法国人却似乎并不愿与德国思想牵扯到一起，他们觉得德国人现在头疼的问题，他们早在 1789 年就已经解决了。⁽¹⁷⁾

面对这些困难，卢格病倒了。报纸直到 1844 年 2 月才得以发行。终于面世的报纸采用了马克思的编辑方向，篇幅很长，内容包括海尔维格和海涅的诗作；卢格、马克思、费尔巴哈和巴枯宁批评德国的往来信件；巴枯宁、莫泽斯·赫斯以及被从巴伐利亚驱逐的报社编辑 F. C·贝尔奈斯写的短文；还有马克思和一位身在英国名叫恩格斯的德国人各自写的两篇文章，报纸共计印了 1000 份。

卢格骨子里是一名温和的民主主义者，他对于马克思将《德法年鉴》

引向更加激进的方向，以及在他看来马克思那种丝毫不加修饰的写作手法感到恼怒。^[18]（之后还有很多人批评马克思写作时长篇大论，文字模糊晦涩，辩论过于随意，完全不理睬读者是否能够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燕妮后来回忆说，这份自己希望能够带给他们保障的报纸，“第一期出来，就以失败告终”^[19]。

报纸在巴黎没有读者，又无法进入德国，卢格和福禄培尔切断了资金支持，燕妮的担心也应验了：马克思将无法回到德国，普鲁士各地政府接到命令，只要马克思、卢格、海涅和贝尔奈斯一进入普鲁士境内，就予以逮捕，罪名为叛国罪。^[20]

让普鲁士人感到恼怒的是马克思在蜜月时便开始思考的两篇文章。一篇批评了黑格尔，另一篇名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融合了他在柏林和科隆所学，同时又表现出法国思想对他的影响，尤其是他对当时尚未得到认可的无产阶级的讨论。“无产阶级”一词源自拉丁语“proletarius”，原指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人或没有资产的人，马克思则用来指社会变革的牺牲品。这些人并非一直穷困，19世纪的无产阶级原本温饱无虞，但在所谓的经济和工业进步面前却成了牺牲品。比如，人力被机器所取代，工厂雇佣更便宜的女工和童工，缩减工人工作时间和工资，或无偿延长工人工作时间。^[21]在批评黑格尔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理论本身无法带来革命，只有当无产阶级面对不公准备暴力反抗，并把哲学作为武器武装自己时，才会产生革命。^[22]他说：“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3]

关于犹太人问题，马克思认为宗教并非神学问题，而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在19世纪初的德国，犹太人根据国家的默许和限制，主要从事商业和贸易领域的活动，数十年后，这也成为整个社会和犹太人对自己的看法。1816年，马克思的父亲不得不做出选择，是继续作为犹太人，还是成为基督徒以融入社会，毕竟，犹太人在普鲁士无法享有平等权利。19世纪40年代初，犹太人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才被重新予以审视。

马克思在文章中，讨论了宗教在德国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不论是政治领域的基督教，还是主导市场的犹太教，并从非神学的角度讨论了脱离宗教束缚的意义。他以犹太人为例，指出犹太人活动集中的领域——商业——已经成为国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让犹太人从商业活

动（在马克思看来，这已经成为犹太精神的根本）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消除国家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德国社会革命才能加速到来。国家的一个支柱（这里是商业）倒下了，国家自然无法继续支撑，马克思和他的同伴一直批判的政府也就崩溃了。^[24]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这两篇文章讨论的主题差别极大，但都涉及德意志联邦的未来，结论也都是其解体。这与他在科隆时与政府书报检查官玩文字游戏不同，在巴黎，他的文章不再受到限制，从此他的写作开始倾向于革命。

《德法年鉴》终刊时，燕妮已怀孕7个月，她和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并不稳定。马克思和卢格由于在报纸的政治口径上分歧很大，又因为海尔维格发生过争吵，关系逐渐恶化。卢格对海尔维格的行为感到厌恶，说他是蠢货、浪子，“已经迷失在巴黎的灯红酒绿当中，被商店、马车、富人的奢华房间、花店和女人迷花了眼”。他愤恨于海尔维格毫无节制地花钱给迪奥高特伯爵夫人买衣服和鲜花，指责他浪荡、懒惰。一次，卢格议论海尔维格时，马克思在外面听见了，但他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回家后，马克思给卢格写了一封信，言辞激烈地为海尔维格的才华辩护，指责卢格心胸狭窄，不懂艺术。^[25]其实，马克思与卢格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卢格拒绝按照承诺支付马克思工资，而用看起来毫无价值的报纸折算。马克思对于卢格的拒绝感到愤怒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马克思没有其他收入，又马上要成为父亲；二是他知道卢格刚刚通过铁路股票大赚了一笔。^[26]

不过，在燕妮和马克思的境况变得更糟之前，科隆的格奥尔格·荣克和《莱茵报》前股东寄来一笔钱，表达对马克思的敬意，数额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担任编辑能赚到的两倍。^[27]马克思的这笔意外之财让卢格很不愉快，他向福祿培尔抱怨马克思和燕妮花钱无度。“他妻子花一百法郎买条鞭子给他做生日礼物，但他既没有马，又不会骑。他见到什么都想要：马车、漂亮的衣服……甚至是天上的月亮。”^[28]卢格在稍后一封信中对这位正与自己逐渐疏远的朋友的抱怨显然更加贴切。他说马克思狂傲、无礼、自大，“他这种性格做个学者或作家都不错，却绝对做不了报人。他读书很多，工作强度很大……但毫无成就，一切既有的东西全部打破，再一头扎进书海里去”。^[29]两人之间的裂隙已经太大，

无法复合。当然，马克思对卢格也没有客气，“长着一张雪貂脸的蠢货”已经算是最短、最客气的说辞了。^[30]

马克思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 1844 年 5 月 1 日，根据母亲的名字取名燕妮，但她的黑色眼珠和头发显然来自父亲。^[31]燕妮和马克思对于照料婴儿都没什么经验，燕妮自小家里就有很多佣人，婴儿一生下来就交给奶妈照顾，马克思虽有 7 个兄弟姐妹，但对家里的事情并不上心，经常独来独往。他们在巴黎的朋友全都放荡不羁，下午五点才肯起床，之后便泡在咖啡厅、沙龙或餐馆里直到早上五点，自然指望不上。燕妮和马克思只能苦中作乐，竭尽所能照顾着小燕妮，直到孩子病得非常严重。

这时，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人提供了帮助：亨利希·海涅。这时诗人才 46 岁，正与局部瘫痪做斗争，自己一直没有孩子。他爬上楼梯，来到马克思家时，发现小夫妻正面对不断抽搐的孩子急得快要疯掉。他让他们准备些热水，给孩子洗了个澡。^[32]小燕妮恢复了健康，但她的父母还是被吓坏了：他们决定由燕妮带着孩子回特里尔，让燕妮的母亲帮忙照顾小燕妮，度过这最危险的头几个月。

6 月初，燕妮穿上天鹅绒大衣，戴着带羽毛的帽子，怀里抱着孩子，极不情愿地坐上回莱茵省的马车，把马克思独自留在巴黎。随着马车向东行走，离巴黎渐行渐远，燕妮陷入了担心，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她担心马克思会“真的变心，抵挡不住世界城市的种种诱惑”。^[33]燕妮知道，在巴黎，所有欲望都能轻易得到满足。

她无须担心。她不在时，马克思的心思的确不在她身上，但也不在其他女人身上。这段时间，马克思开始出没于秘密社团的地下世界，开始对经济进行真正的探索，他见到了他一生中最亲密、最重要的伙伴。

6 爱情的纽带



五个人听了，但不明白；另五个人不明白，在谈论。

——亚历山大·赫尔岑⁽¹⁾

没有工作让马克思更加自由——他重新回到教室。他的教室，便是点着煤气灯的咖啡馆和酒窖，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办公室，里面挤满了人，各自抽着雪茄，烟雾缭绕得相互间都看不清楚。这里没有授课，只有讨论，路过的人经常被他们的喧闹吸引，投来好奇的目光，看着这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家伙，操着各种语言相互叫喊。他们争论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优劣，争论是应该暴力推翻政府、从废墟上建立新政府；还是应该向统治阶级呼吁：根本的社会变革正在到来，君主应该面对现实，做出相应改变。有人主张，增加资产阶级和企业主的政治权力，并且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已经让生产更快速、生活品更廉价、新市场更开放的人的进步，人类才有希望。其他人则建议谨慎而行，认为这些进步同时产生了新的更大的威胁，而且对人民的伤害比国王的更大。他们认为企业主受贪婪驱动，为追求更多财富，愿意牺牲一代又一代工人。所有人都同意社会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欧洲需要新形式的政府。专制君主和他们身边只知献媚的弄臣，以及残暴的国王和他们身边双手沾满血腥的刽子手已经属于过去时，却仍在阻挡社会和经济进步。马克思周围的人一致同意，君主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他们无法达成一致

的是如何结束，以及结束之后用什么来代替。^[2]

1844年3月，燕妮还没返回特里尔时，马克思参加过一次讨论上述话题的宴会。参与者在未来30年间，几乎都成了欧洲主要革命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观点千差万别，成熟程度各不相同，但个性已发展完全，全都与众不同。其中有两个人对马克思尤为重要：米哈伊尔·巴枯宁和路易·勃朗。^[3]

巴枯宁的父亲是一名俄国伯爵，拥有一大片土地和500名农奴。他的母亲出自穆拉维约夫家族——俄国最负盛名的家族之一，曾有家族成员在1825年因参加反抗沙皇的起义而被吊死。巴枯宁接受过军事训练，大概21岁时，他退出了军队。1840年，巴枯宁来到柏林，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俄国年轻人的圈子，成员包括他的好友小说家伊凡·屠格涅夫^[4]（“虚无主义”的创造者）。^[5]巴枯宁身材高瘦，戴着脏兮兮的学生帽，头发黑密。他是个完完全全的行动主义者，斗志旺盛，随时准备用武力保护自己的观点和朋友。

巴枯宁到巴黎时，已是众所周知的革命者。在他看来，革命者需要的是直觉，而非思想。^[6]他比马克思年长4岁，但在他们终于会上面后，他承认自己的思维能力不如马克思。从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就比较紧张。正如一位作家所说：“俄国贵族与犹太律师之子之间的差别远不止性情的碰撞，他们缺乏任何共同的传统和思想背景。”^[7]数十年后，巴枯宁写到自己 and 马克思在巴黎的时光：“我们经常见面，我敬重他的学识和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热情、严肃的投入态度——虽然这可能也与个人的自信心理有关。我非常愿意和他交谈，因为那很有趣，给我启发。如果我们的交谈不是因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埋怨引起的就更好了，但可惜的是经常如此。我们从未做到亲密无间——我们各自的性情决定了这一点。他说我是情绪化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对的；我说他自负、失信、狡猾，我也是对的。”^[8]

1844年，路易·勃朗33岁，是法国最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在法国启蒙工人中尤负盛名。不论在体态还是在思维方面，他都与巴枯宁正好相反。勃朗体型瘦小但在行动和思维上都极为强硬，这也让他得以领导运动。^[9]1840年，他出版的《劳动组织》一书号召由工人控制民主国家。在《十年历史》一书中，他批评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统治。1843

年，他与人共同创办重要的反对派报纸《改革报》，呼吁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进行普选，保障工作机会，保护工人。⁽¹⁰⁾勃朗和巴枯宁一样，在之后的数年间，与马克思交集颇多，而且大多也是针锋相对的。

他们在宴会上会面时，尚无任何国际组织定期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家面对的问题并不相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反对派组织还只存在于各自领袖的想法中。但在巴黎这个大熔炉里，人和观点开始相互融合，身处新思想前沿的人们，开始跨越语言和习俗的界限，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这些欧洲中产阶级改革者讨论的重点话题包括：自由主义、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者要求一个广泛民主的政府，让才能而非出身来决定人的成就，给予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人投票权。他们还要求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保护财产权利。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宪法，不一定非要推翻国王。极端主义者是要求废除国王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共和政体，实现更广泛的选举，进行更广泛的社会改革。民族主义者经常也是自由主义者（比如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但同时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家，塑造民族文化，包括共同的语言、历史和艺术。社会主义者与上述其他反对派伙伴最为不同。社会主义起源于法国，直接针对的是越来越强大的商业力量。其追随者反对不平等的财产权利，在他们看来，不平等的财产权等同于一种社会和政治武器，让富人更富，把依靠双手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社会主义者从否定君主制和封建制的角度上支持民主，但他们还认为民主不足以保护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免遭不公对待。⁽¹¹⁾

但是，这些主义主要存在于理论范畴，只能拿来作为话题讨论，无法进行应用。原因很明显：在马克思看来，能组成这样一支军队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改革者抱有怀疑，自然也怀疑他们的思想。

马克思也怀疑这些思想，这些反对派知识分子只讨论人类的需求，却完全遗忘了人作为个体的需求。他们的革命也只是用新的统治精英（大资产阶级）来取代旧的（贵族）统治。换言之，财富对劳动的统治不会变。况且，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本意是要治愈各种社会病症的所谓的主义与思想，根本没能真正了解那些泛滥于欧洲，且不断扩大的工业经济体系中的各种病症（相反，君主制及其问题倒很明显）。没有这一认识，真

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知道自己也还没能完全了解，所以准备寻找答案。⁽¹²⁾

通过住在瓦鲁路上的两个德国人，马克思找到一些答案。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和格尔曼·莫伊雷尔都是正义者同盟的成员，该秘密组织由流亡巴黎的德国人于1836年建立，成员大多为无产阶级。⁽¹³⁾

作为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组织，正义者同盟吸收了法国的共产主义观点，把废除私有制视为进行根本社会变革的最稳妥的方式。⁽¹⁴⁾马克思参加过这些德国工人举行的会议，也参加过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几次会议。他震惊于他们对共产主义斗争的坚定信念，发现他们完全不同于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夸夸其谈。马克思写道：“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的精神之光。”他还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身上看到了人的异化，他们出卖苦力，甚至是生命，换来的不过是微薄的工资，他们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却连一杯羹都分不到，他们创造的一切都属于工厂的所有者。⁽¹⁵⁾

马克思受到启发，重新埋头于当时正在阅读的书籍中，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光笔记就写满好几本。这些笔记一起统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这些手稿未能完成，却为马克思一生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语）的研究，马克思得出结论：这些人相信的经济体系以冰冷的、永恒不变的规律为基础，让人无法脱离。他们相信只要政府不对商业横加干预，商业最终能为全人类谋来福祉。但马克思见到和听到的事实与此完全相反，他决定剥掉经济学的神秘外衣，研究它在真实世界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的后果。⁽¹⁶⁾

在手稿中，马克思先后研究了工资、地租、利润、私有制与共产主义的对立，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对黑格尔进行了重新研究。他发现，这个新经济体系对获得金钱（以及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的渴望已经成为现代人存在的唯一动力，这歪曲了现代人看待人与人的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看待自己的方式：

奇特的是，它能让富人成为任何人。

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实际的头脑，货币占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说，他可以给自己买到颇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颇有头脑者的人，他不是比颇有头脑者更有头脑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面了吗？⁽¹⁷⁾

同时，用劳动为富人创造财富的工人却一无所有：“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¹⁸⁾

马克思想弄明白这种恶性关系从何而来。他先设想了这样一个体系：大资本家控制所有资本和生产工具，工人只能按照由财产所有者或企业主决定的工资出卖劳动，从而被剥夺人性。就如同一个人要卖一袋玉米，但他不能根据自己对玉米价值的了解来确定价格，反而只能接受买家给出的任何价格。正如卖玉米的人失去对自己粮食的价值的控制，身处新工业关系中的工人失去了对自身价值的控制。他被异化了，生产创造的一切都被另一个阶级拿走，只给他留下勉强为生的一点儿。

马克思的理论得到了印证，到处都是明证。最明显的便是从各地涌入城市的想要在新工业体系中找到工作的人，他们进城后才发现根本找不到待遇足够他们生活的工作。（法国人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新词汇——赤贫（pauperism）。）工资已持续下降近20年，生活花费同期却增长了17%。1844年，大规模食品短缺开始出现，富人的餐桌上却丰盛依旧。⁽¹⁹⁾一连串的丑闻揭示：正是法国官员让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导致

了经济的不平衡。⁽²⁰⁾因此，马克思看到的现实不是经济学家在文章里热情描述的自由市场，而是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控制的市场。

马克思两年前刚在科隆批评过共产主义不切实际，现在却将其视为让社会回归正轨的办法。人可以创造财富，但这财富不应该是私有的，而应该是共享的。人可以工作，但这工作应该是为了个体和更大的善，而不是为财产所有者做嫁衣。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解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抗的完美办法，是解决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认、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斗争的真正方式”。⁽²¹⁾他的朋友海涅担心共产主义会消灭艺术和美，但马克思说：“既然我不能反对人人都有吃饭的权利这个前提，那么我就必须接受相应而来的所有结论。”⁽²²⁾

巴黎的法国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相信，推翻腐朽的新经济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革命，协商无法让那些尝到甜头的人结束剥削，放弃如此巨大的利益。对付工业封建制度（一些共产主义者的说法）只能用对付之前农业封建制度的老办法：暴力。马克思表示同意：“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²³⁾就在马克思还在冥思苦想经济时，一场这样的暴力如期而至。德国传来消息，普鲁士西里西亚地区爆发了起义，这令马克思和巴黎工人以及所有持有相同思想的人大为兴奋，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1844年6月4日，一些纺织工人面对悲惨境地，再也无法忍受，他们聚集到一对普鲁士企业主兄弟门前，要求提高工资，高唱“你们都是恶棍，你们都是寄生虫。你们都是骗子。你们抢走穷人的一切。我们诅咒你们”。抗议者已陷入绝望，出现了愤怒。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不得不忍受低工资，甚至有工人因此饿死。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后，愤怒的纺织工人冲进院子打砸，但那对企业主兄弟完好无损地跑掉了。第二天，5000名纺织工人和家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抗。他们冲进工厂，捣毁机器，冲进导致他们挨饿的罪魁祸首的豪宅和办公室，进行抢砸。企业主求助于普鲁士军队，军队抵达后，向起义人群开枪，打死35人。起义者用石块和斧头对抗，将军队驱走，但第二天早上，增援部队抵达，纺织工人起义被镇压。

这次纺织工人起义是德国工业工人参加的第一次起义，虽然以失败

告终，却让马克思看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无产阶级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动起义的力量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某种抽象的概念，比如宗教、种族或王权，而是一种更加具体的东西——面包。马克思尤其为纺织工人把资产阶级作为起义反对的目标而感到高兴，因为资产阶级是未来的敌人，他们掌握着资本，终有一天会像在法国一样，控制政府，甚至国王。⁽²⁴⁾

受此事件激励，包括马克思、海尔维格和海涅（海尔维格和海涅还专门为起义的纺织工人创作了诗歌）在内的多达 200 名德国人周日在巴黎一个酒商的店里集会，位置就在万塞纳大街上的特罗纳栅栏附近。有人向法国警方告密，说这些人在讨论杀死国王和镇压富人及宗教等“可怕内容”。⁽²⁵⁾马克思还经常与巴枯宁和时不时来巴黎的其他俄国自由主义贵族会面，希望他们能稍微资助一下这项伟大的事业。⁽²⁶⁾1844 年 7 月，经人介绍，马克思见到了法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他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工人，1840 年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提出这一著名问题，并给出答案：“财产就是偷窃”。⁽²⁷⁾蒲鲁东明确指出，自己并非要推行任何新的体系，只是要求结束特权、实现公正。但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著作开辟了新的时代。他说蒲鲁东第一次明确例证了社会的疾病根源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体系。他们两人经常讨论共产主义，时常通宵达旦。大多时候，马克思教授蒲鲁东德国哲学，但后者不懂德语，总学不好。⁽²⁸⁾

1844 年初在为卢格的《德法年鉴》写稿并因此被判以叛国罪时，马克思还只是一个缺乏实际知识的毛头小子，但到夏天，他已经开始为巴黎《前进报》撰稿。这家在巴黎建立的周报，是欧洲唯一一家不经审查的德语反对派报纸。⁽²⁹⁾实际上，报纸的资助人是普鲁士作曲家贾科莫·迈尔贝尔，他经迪奥高特伯爵夫人认识了众多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据说他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派来的，目的就是找出躲在巴黎的德国造反分子，通过办报，让他们自己露面。

马克思的朋友贝尔奈斯被任命为总编辑，但助理编辑奥地利人阿达尔伯特·冯·博恩施泰特是普鲁士国王派来的间谍。马克思和其他撰稿人很可能知道迈尔贝尔和博恩施泰特的底细，但仍觉得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思想发表出来。毕竟，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间谍就像烟和酒一样

常见，而且他们有时也可以把这些间谍作为闲聊对象，图个乐子。⁽³⁰⁾

海因里希·伯恩施泰因创办报纸后，并未出钱资助。据他说，每周都有12到14个人到他位于右岸穆兰街杜伊勒里宫北侧的公寓参加编辑会议。“有的坐在床边，有的坐在箱子上，还有的站着或随意走动。他们抽烟都很凶，争论起来更是情绪高涨。窗户根本不能开，否则下面街道上马上就会聚集一大群路人，抬头寻找吵闹声的来源。一会儿功夫，房间里就烟雾缭绕，再进来的人，就不可能认出其他人了。”参加会议的包括马克思、海涅、海尔维格、卢格、巴枯宁、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和共产主义者艾韦贝克，他们投稿都是没有报酬的。⁽³¹⁾

这期间，马克思从巴黎写给燕妮的信都没能留存下来，但从燕妮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我们能看到燕妮对于未来的一种焦虑——很可能就是马克思的父亲多年前在她身上发现的那种恐惧。在6月21日从特里尔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燕妮显得很享受特里尔的生活，高高在上地接见很多人，用表面上的富足愚弄镇上的人。“我对所有的人都采取高傲的态度，而我的外表和装束也完全允许我采取这种高傲态度。首先，我比所有的人都高雅，此外，我在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健康和有神采。”说完自己与马克思的母亲和姐妹不期而遇的温暖场景，她写道：“可真是事事如意，不过在我们这里只有表面上如意。”但所有人谈论的仍然是马克思能不能找到固定的工作，燕妮也用了不少笔墨说自己也想过这些。“我的亲人，我们的未来，不论是不远的未来还是遥远的未来，常常使我忧心，我想我将会因为我在这里所表现的高傲和自负而受到惩罚。如果你能做到，就为此安慰我好了。在这里人们常常谈论固定收入。”

随着马克思沿着危险的道路越走越远，燕妮需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原因是她的女儿，她对丈夫的忠诚第一次需要分出一部分给女儿。她说小燕妮是“我们的爱情的最紧密的纽带”，同时又为他们不安全的状态感到焦急。“但愿我们能够坚持，直到我们的小家伙长大成人。”

燕妮一会儿说到自己的见闻，一会儿说到自己的恐惧，但在信尾，她好像认命了，马克思走的路是必然的、应该也是正确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他只是写写东西——尤其如果他能够按照她所建议的那样，不要那么动火和生气。“你的其他文章作用大了许多，这你是知道的。要么写得如实而精巧，要么写得幽默而轻松。”对于那些怀疑他的选择的

人（甚至包括她自己），她说：“噢，这群蠢驴！难道你们自己就站得住脚吗？……现在到哪里去找坚实的基础呢？社会用以建筑庙宇和货摊的那块土地下面难道不是到处都有动摇的征兆吗？”⁽³²⁾

燕妮写这封信后一个月，普鲁士真的又动摇了。在西里西亚 6 月爆发起义之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遭遇刺杀，虽然无恙，却让整个国家响起警报。刺客的动机依然不是政治，而是饥饿。在寄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燕妮这样描述行刺未果的刺客：“这个一直受到饿死威胁的人徒劳地在柏林行乞了三天——所以才发生社会谋杀！如果出事，就从这里开始……社会革命的一切苗头已经出现。”但同时，她说普鲁士人并未察觉到危险。⁽³³⁾

马克思把燕妮这封信刊登在 1844 年 8 月 10 日的《前进报》上，署名“德国一女士”。在马克思为这一最为激进的德语报纸首次撰稿 3 天后，燕妮也在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³⁴⁾《前进报》很快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注意，他们在刺杀事件后提高了警惕。政府间谍将所有与《前进报》相关的人置于监控之下后，普鲁士官员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直至报纸刊文称只有把普鲁士国王杀死，才能让普鲁士人民相信国王不是神，也是脆弱的、会犯错误的人。普鲁士政府向法国政府施压，法国政府显然不愿被其他国家政府看作是鼓吹杀死国王的流亡者的庇护所。⁽³⁵⁾主编贝尔奈斯被以报纸执照有问题为名陷害，入狱两个月。其他成员受到的指控更多，很可能受到驱逐。⁽³⁶⁾

在这种氛围下，燕妮准备返回巴黎。她在 8 月 11 日至 18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自己很快就会回到他身边，“你又陷入到了危险当中”。她的言辞不断流露着对马克思的爱，称他为“我的小宝宝的好爸爸”和“我亲爱的、可爱的小野猪”。她问他：“亲爱的卡尔，我们的小宝贝做独唱演员要做多久呢？我担心，担心爸爸妈妈重新相会，按照公有财产的原则生活时，很快就会出现二重唱。”⁽³⁷⁾燕妮一如既往地马克思面对威胁时，站在他身边。他遭到反对时，她维护他；他有危险时，她保护他，她把对家庭经济安全的考虑放在了一边。

接到燕妮的信没几天，马克思结识了他一生中另一个保护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7 初遇一生的守护者



我无法理解怎么能有人对天才怀有嫉妒之心；天才是如此特别，我们这些无法拥有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它不属于我们；如果有人对天才都能心生嫉妒，那只能说明他的心胸狭隘得可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¹⁾

恩格斯从英国返回德国时，决定绕道去巴黎看一看。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印象源自他年初为卢格的报纸写的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马克思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印象，是一个在科隆主持过《莱茵报》的独断的家伙，但他对马克思的文章满怀敬意。1844年8月28日，两人在摄政咖啡馆首次会面，之后连续交谈了10个日夜。⁽²⁾这家位于卢浮宫附近的咖啡馆，非常适于他们这意义重大的第一次会面：它名满欧洲，是象棋大师和智者较量的地方。

恩格斯这时23岁，又高又瘦，金发碧眼，身材健硕，穿着一丝不苟。恩格斯的父亲是工厂主，按照父亲的要求，他17岁便退了学，开始学习管理家族生意。恩格斯自称是商人和皇家普鲁士炮兵。⁽³⁾表面上看，除了有伙伴说他“特别喜欢喝酒”和嘲讽人之外，他与马克思没有任何相似之处。⁽⁴⁾如果说马克思让人一目了然的话，恩格斯则更加复杂。一方面，他是社会认可和喜爱的那种人：一个鲁莽的单身汉，喜欢骑马打猎，

有一只能辨别美酒的神奇鼻子。但他又是激情的革命者，青少年时期就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讽刺工业化在他家乡巴门造成的社会罪恶。8月与马克思在巴黎见面的显然是革命的恩格斯，但马克思欣然接受了恩格斯的两个方面。

恩格斯具有多方面才能，他有思想，是一名改革家；他写的文章雄辩、切题；他还是一名商人，对工业运作方式自上到下都非常了解。他处在新的工业体系中，对其导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自然无比熟悉。他如同物质世界的特使，来到马克思面前，帮他补足理论研究中的缝隙。

对恩格斯而言，他在26岁的马克思身上，看到了在其他人身从未见过的强大人格和思维能力。恩格斯后来回忆在巴黎与马克思的历史性会面时，只是很简单地说：“我们在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⁵⁾但实际上，他将成为马克思一家的救星，他不仅为马克思的理论工作提供物质资料，还将为马克思一家人的生存提供物质所需。

恩格斯是家里的老大，将来要继承他曾祖父18世纪在伍珀河谷建立且在逐步壮大的纺织厂生意。恩格斯在巴门度过少年时代时，这片位于莱茵省的区域是德国工业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流经这里的伍珀河已被污染得变了颜色。他家严格奉行虔诚派基督教义：任何公开娱乐都会受到批评；《圣经》和社区内部的决定就是最高裁决。但恩格斯刚到形成个性的年龄，就表现出叛逆的倾向，使得父母大为担心。⁽⁶⁾他父亲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对15岁的儿子受到严厉惩罚后仍不肯就范，表达了担忧。他还提到在恩格斯的桌上发现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内容极为不妥，是关于十三世纪骑士的故事。……希望上帝注视着他的性格……他本来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却让我经常感到担心”。⁽⁷⁾

恩格斯在埃尔伯费尔德中学学习期间，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他很有天赋（这与马克思不同）。他17岁时开始发表诗歌，打算成为一名文人。⁽⁸⁾但父亲希望他尽快结束学习，跟自己学做生意，因此强迫他退学。恩格斯被送到工业小城不莱梅做学徒，正是在这里，这个工厂主的儿子开始成为革命者。他早期的一些古怪反叛行为渐渐在小城传开，他跟同龄人打赌看谁的胡子长得快，这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是极为不妥的。⁽⁹⁾不过，还是有十几个人参加了这场“胡子欢庆会”。⁽¹⁰⁾他还向

妹妹夸耀说，自己不但在音乐会上展示胡子，还在周围年轻人都穿着燕尾服、戴着羊皮手套时，只穿着普通礼服、没戴手套，就此嘲笑了这些“庸人”一把。“其实，太太们倒是非常喜欢我这种样子，……最有意思的是，三个月以前这里谁也不认识我，而现在所有的人都认识了我。”^[11]但他真正的反抗还是通过文字。恩格斯化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把自己描绘为一名冷静的商业旅者）发表的《伍珀河谷来信》引起了轰动。这些文章最初在恩格斯18岁时发表在汉堡一家杂志上，后来被全德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纸刊登。^[12]文章描述很多工厂工人从6岁开始就要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奥斯瓦尔德”写道，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他们“全部的精力和生活乐趣”都被剥夺了，“不是信奉神秘主义就是酗酒”。^[13]

.....

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埃尔伯费尔德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中就有1200人失学，他们在工厂里长大，——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雇用成年工人。但是有钱的厂主们是满不在乎的，因为虔诚派教徒的灵魂不致因为使一个儿童死亡就下地狱，特别是这个灵魂如果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心安理得了。因为我们知道，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以不让工人酗酒为借口，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14]

.....

“奥斯瓦尔德”还提到妇女的解放，认为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基础。^[15]

政治方面，恩格斯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自己痛恨国王。“如果我不是对这个恶棍极端鄙视，我会恨得更厉害。同他相比，拿破仑是一个天使。……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石块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16]他说

贵族是“六十四次社会婚姻”的结果，不值一提。⁽¹⁷⁾

恩格斯在 1841 年回到巴门，之后到柏林进入军队服役一年。公余时间，他还到过柏林接触柏林大学和青年黑格尔派，他在不莱梅时就读过后者的著作。恩格斯加入了自称“自由人”的新一代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对他非常热情，因为他已发表过至少 37 篇文章，圈内人都知道他的化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¹⁸⁾

当时对恩格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中，包括马克思的朋友莫泽斯·赫斯，他是圈子里第一个赞成共产主义的。赫斯相信革命不可避免，而且将会在法国、德国和英国一起发生——法国为政治起义之地，德国为哲学中心，英国为世界商业所在。⁽¹⁹⁾幸运的是，恩格斯的自我发现之旅在柏林之后的下一站便是英国。

1837 年，恩格斯家与英国欧文兄弟合作，在曼彻斯特开办棉纺厂，恩格斯的父亲决定送他去那儿接受下一阶段的培训。这里是恩格斯学习做生意的最佳地点，对于革命的恩格斯来说，也是学习如何推翻腐朽体系的最佳地点。⁽²⁰⁾途中，他专程来到科隆，与在《莱茵报》担任编辑的马克思会面。但马克思把他当做自己根本瞧不上的“自由人”的成员，两人的会面匆匆结束⁽²¹⁾（如此匆忙，以至于两人在巴黎的重新见面才算得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会面）。

恩格斯在 1842 年 11 月抵达曼彻斯特时，一场由削减工资引发的大规模工人罢工刚刚结束，氛围很紧张。工人是世界上受到欺凌最深的人，但按照英国法律，他们有集会的自由。这让他们抱有一丝希望，期待借此改善自己的境况。⁽²²⁾有观察者如此评价当时的曼彻斯特：“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城市，贫富差距如此悬殊，贫富的界限如此难以跨越。”⁽²³⁾但恩格斯在 19 岁的爱尔兰姑娘玛丽·白恩土的协助下，很快做到了跨越贫富之间深深的鸿沟。⁽²⁴⁾

玛丽跟父亲以及 15 岁的妹妹莉迪娅（也叫莉齐）一起在恩格斯的工厂里工作。我们并不清楚恩格斯和玛丽是如何相遇的——是在工厂里，还是如一些传记作家所说，恩格斯在科学会堂（曼彻斯特市社会主义演说和活动中心）前见到玛丽在叫卖橘子。不管他们是如何相遇的，恩格斯被玛丽深深吸引。他的朋友曾描述过玛丽富有野性的美、机智和聪明。他们的结合对恩格斯非常重要。玛丽带他来到“小爱尔兰”和劳动阶

级聚集的其他区域——像他这种上层社会的人连收租都不愿踏足的区域。^[25]这些区域如污水坑一般，散发着强烈的恶臭，根本没有卫生可言，每隔二十几步就有一个猪圈，“路上泥非常深，走过时总要没到脚踝”。每家只有一两个房间，地面也都是泥泞的。恩格斯说面对这样的卫生状况和臭味，“任何稍微有些地位的人都绝对住不下去”。^[26]

这就是工人们居住的地方，就是那些为资产阶级创造美好未来的劳工们住的地方。恩格斯说，奴隶和工厂工人的唯一区别是奴隶被一次性卖掉，工人则一天一天地出卖自己。^[27]同时，恩格斯与工人一样，在如此苦痛中看到了一些希望。他相信这样的状况“会让他们想到社会改革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让机器为他们服务，而不是抢他们的饭碗”^[28]。

玛丽还把恩格斯介绍给众多爱尔兰和英国的激进分子。^[29]英国人乔治·朱利安·哈尼对恩格斯感到吃惊，“这个瘦瘦的年轻人脸上还带着一丝孩子气，英语却说得非常流利”。^[30]在曼彻斯特待了几周之后，这个看起来与世无争的普鲁士年轻人在义愤的驱动下，内心的反叛之火已经在熊熊燃烧。在父亲工厂的办事处工作期间，恩格斯为英国改革报纸撰稿，讨论德国的状况。同时他写信回德国，介绍自己在英国的发现。其中有5封信由马克思在1842年刊登在《莱茵报》上，署名“X”，他在英国发表的文章则通常署名“弗·恩格斯”。^[31]

到1843年，除实地调查外，恩格斯还扩充了自己对英国经济、政治和历史的了解，成果是长达25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初经马克思编辑后，这篇文章刊登于卢格在巴黎创办的报纸。这篇文章算得上是对当时尚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做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机器的所有者是制造经济和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他们时而过度生产，时而减少产量，目的都是压低工资，引发社会危机，加剧社会矛盾。节省劳力的技术进步不但没能缓解工人的困难，反而被用来增加利润。工人因为新机器的出现而被解雇，留下来的需要更加卖命，以弥补减少的人力。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家的收益来自工人的损失。^[32]

在1844年8月会面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方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都认为此时最好的办法是宣传。恩格斯打算回德国写一本

书，总结自己的英国之行，这便是经典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则根据自己这一年做的研究，写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恩格斯在9月离开巴黎前，和马克思共同写了一本论战性著作，恩格斯写了15页。他们在书中批判了之前一些伙伴的立场。在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头，之后他们将正面阐述自己的哲学和社会学说。马克思把这本书称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33]

燕妮回到巴黎时，马克思正忙着写在该书中自己负责的部分，她还没见到那位让马克思如此劲头十足的新朋友。恩格斯对曼彻斯特工厂的讲述，和他从内部视角对整个工业体系运作的描述，都让马克思如获至宝。马克思更加确信社会理论不能脱离真实的经验存在。布鲁诺·鲍威尔当时刚刚发表文章称人由历史驱动，而非相反，由此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首要目标。鲍威尔还提出群众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参与让革命的思想基础受到了玷污，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而且，鲍威尔还批判了蒲鲁东。^[34]

马克思希望这本书能尽快出版，在批判鲍威尔的同时，顺便有些收入。这样，加上格奥尔格·荣克7月时从科隆寄来的钱，应该足以让他和燕妮度过秋天。^[35]他们很需要这笔钱。如果法国人接受普鲁士政府的游说，要惩罚除了贝尔奈斯外《前进报》其他相关人员，马克思随时可能被逮捕或驱逐。但他越是急着尽快写完，却越是事与愿违。直到11月，在恩格斯的文字已经等待很久之后，他才完成自己的这部分初稿。^[36]初稿长达300页，却大篇幅离题讨论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哥特式小说。^[37]

马克思跑题太远了。也许是与恩格斯的合作让他过于兴奋，他还一直催促恩格斯11月就回到巴黎来。（恩格斯对此表示不现实：他正全力写一本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书，甩手离开可能会与家人闹翻，而且还有一段感情需要处理。）^[38]或者，这就是他的宣泄方式。经过数年的积淀，马克思积累了很多想法，所以《神圣家族》有些地方读起来就像一种迸发。

到1845年1月，马克思仍然没有完成终稿，他的经济学著作也没有任何进展。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劝告自己的朋友尽快把书完成，他的口气很像燕妮：“你还是先把你的国民经济学著作写完，即

使你自已觉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像我那样，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尽快付印。”^[39]

这封信写于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显然并不知道巴黎的变化。9天前，法国内政部长发布命令，要求包括马克思、海涅、卢格、贝尔奈斯和巴枯宁在内的《前进报》成员，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并在最短时间内离开法国。路易·菲利普被普鲁士著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说动（他带来了弗里德里希·威廉赠送的稀有陶瓷花瓶），同意驱逐这些“无神论者”。法国国王需要和平确保发展，他高兴地接受了花瓶，然后把这些惹麻烦的作家扔了出去。按照燕妮的回忆，一名警官星期天来到他们租住的公寓，把驱逐令交给了他们。^[41]

虽然数月来，被从法国驱逐的可能性就一直盘亘他们在心头，但当事情真的发生，他们还是没有做好准备，尤其是燕妮。她已经成为一个巴黎人，圣日耳曼广场和拉丁区之间的街区就是她的世界。巴黎是她和马克思真正开始婚姻生活的地方，是他们的女儿出生的地方，是他们的朋友居住的地方。她想留下来，但按照驱逐令的要求，要留下来，就必须签字声明以后不再从事政治活动。除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其他人都接受了这个要求。有伙伴说马克思拒绝，是因为“他的骄傲不允许他自愿把自己放在警察的监视之下”。^[41]品尝到不同于压抑的普鲁士的生活后，马克思再也不愿失去说话和写作的自由。^[42]

马克思尝试与法国政府谈判，希望自己和家人能留在巴黎。最终，24小时期限延长到将近1个月，但法国政府不肯再做让步。2月2日，马克思和年轻的报人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坐上一辆小型驿马车离开巴黎，在雨雪中一路颠簸，投向比利时。毕尔格尔斯后来描述过途中与马克思的热烈对话，以及自己唱歌给马克思听，想让他振作起来，却并不成功。1845年2月5日，他们抵达布鲁塞尔。^[43]

燕妮和8个月大的女儿，以及从特里尔跟她来巴黎的奶妈先留在巴黎，借住在海尔维格家。这期间，不断有朋友登门讨论驱逐令，协商解决的办法。^[44]她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巴枯宁（仍在与法国政府协商，希望能留在巴黎）“来对我宣泄了一番，顺便给我上了一堂关于如何说话和措辞的课”，德国报人亚历山大·魏尔自愿做她的“特别保

护人”。但燕妮最需要的帮助还是经济上的。她正在努力凑钱还债和支付去布鲁塞尔的路费。马克思留给她 200 法郎，但仅他们拖欠的房租就有 380 法郎。她在 2 月 10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不知道我们将来该如何。我今天上午又出去转了一圈。铸币厂没有开门，以后还得再去。我去问了马车的价钱，还找了一个做家具拍卖的代理人。但都没什么收获。”燕妮随信附上了“妈妈给爸爸的一千个吻和女儿给爸爸的一个吻”，在信尾说：“再见，我的朋友。期盼着尽快再次见到你。……希望我们新的国土一切都好。”⁽⁴⁵⁾

数日之内，她变卖了所有家具（照她描述，所得甚少），离开了巴黎。燕妮后来回忆说：“虽然生着病，虽然天气极为寒冷，我还是追随着卡尔的步伐，前往布鲁塞尔。”⁽⁴⁶⁾

她不知道，这不是他们最后一次仓皇搬家，他们的流浪生活才刚刚开始。

8 幸福的婚姻



我极少见到如此幸福的婚姻，两个人全身心相互扶持，共享喜悦，共担苦难，共度悲伤。

——斯蒂凡·波尔恩⁽¹⁾

比利时很小。与周围的强权君主统治的国家相比，它算得上一片净土。比利时 15 年前刚刚脱离荷兰，获得独立，有国王，也有宪法，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为自由开明的国家。它虽缺少激情（布鲁塞尔与巴黎相比，有如小镇与城市的差别），但有自由。对于来到自己领地的流亡者，国王莱奥波德一世的要求很简单：不得直接参与政治和宣传活动，以免惹恼强大的邻国。⁽²⁾ 巴黎提出过类似条件，但马克思没有接受。他之所以在比利时选择了接受，有两方面原因：个人方面，燕妮又怀孕了；职业方面，他离开巴黎时与出版商签了合同，要写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³⁾

马克思给国王莱奥波德一世写过两封信，自称“陛下最谦恭和最忠实的仆人”，请求被准许携妻子和孩子在比利时居住，“以名誉保证，不在比利时出版任何关于当前政治状况的著作”。⁽⁴⁾ 莱奥波德一世同意了，准许马克思一家在比利时居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打扰。⁽⁵⁾ 比利时政府已经接到法国人的提醒，需要注意这名普鲁士煽动者。警察总长知会布鲁塞尔市长说：“如果发现他违反约定，做出任何

有损于我们的邻居和盟友普鲁士政府的行为，请马上报告给我。”^[6]警察的怀疑将很快得到验证，马克思在这片土地上，创作了算得上19世纪最具革命性的作品《共产党宣言》。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抵达布鲁塞尔后，马克思还是尽力遵守约定。

燕妮希望自己和马克思能在布鲁塞尔安定下来，不像之前那样流离失所。马克思离开巴黎前，燕妮交给他一张清单，列着她对住处的要求，希望马克思按清单寻找住所。很难想象，因为支持弑君而被驱逐的马克思坐着驿马车穿过乡间时，口袋里还装着这样一份清单，告诉他要特别注意橱柜——“在家庭妇女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不用过于担心厨房用具。燕妮希望他能找到一处“有四间房间和一间厨房的房子，最好再有一个房间存放平时用不着的物件和旅行箱。得有三个房间有取暖设施，……我们的房间不用太雅致。我们的房间和你的书房最好有些摆设，哪怕很简单”。她让自己的“高贵的保护者”来决定如何存放书籍。^[7]她想象在布鲁塞尔有这样一个家，也许是她对遭到驱逐的反应；也许是她希望扎下根，虽不一定非要过得有多富足，但至少不会再有警察拿着驱逐令来敲门；也许她正期待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想象着他们的流浪生涯就要结束了。

但她2月底来到布鲁塞尔后，发现事情远非她想象的那样：马克思还没找到固定住所，她和女儿以及照顾女儿的奶妈，只能跟马克思一起暂住在市中心圣古都勒广场附近的野林旅店。近在咫尺的圣米歇尔大教堂高高耸立，像是在不断提醒马克思敌人（教会）的强大。野林旅店虽不是燕妮理想的家，却在德国流亡者中很受欢迎。^[8]来布鲁塞尔避难的德国人只有几百人，在这样的小圈子里，人们相互间很容易走近，很快成为朋友。

在巴黎时，马克思一家的社会交往，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私人生活上，都更加高调。他们在布鲁塞尔初期的日子则更安静，也更丰富。多年来，围绕在马克思身边的人经常被他的敌人贬称为“马克思派”。但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他们指的不过是马克思身边有数的几个密友和家人。的确，同一个圈子的人通常会因为具有同样的思想而走到一起，但除了思想，马克思和燕妮身边的人还有感情维系着。他们大多都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布鲁塞尔开始走到一起的。

马克思抵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便去寻找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为自己三年前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时对待诗人的方式向他道歉。当时，弗莱里格拉特（同时也是商人，对年轻的恩格斯启发很大）是德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与海尔维格不同，他最初的兴趣不在政治，他认为诗歌不应与社会问题牵扯到一起，并因此与海尔维格发生过公开争论。1842年，弗莱里格拉特被普鲁士国王授予年度津贴，《莱茵报》批判他已经被金钱收买，成为自由的敌人。⁽⁹⁾

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随着普鲁士政府变得愈加反动，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歌也开始涉及政治。1844年，他的著作《爱国幻想》被禁后，他将其更名为《信条》，并在序言中宣布放弃皇家津贴。国王大为光火，将该书定为非法，弗莱里格拉特只得逃到比利时避难。他和妻子伊达住在布鲁塞尔，马克思登门造访时，他们正思考接下来的打算，两家人很快走得很近。⁽¹⁰⁾弗莱里格拉特比马克思年长8岁，他说他的新朋友“友好、风趣、谦虚、坚定”。⁽¹¹⁾

弗莱里格拉特一家很快搬去了瑞士，马克思一家则从野林旅店搬进他们空出的房子。5月，马克思一家又搬到靠近卢万门的布鲁塞尔东郊。⁽¹²⁾靠着恩格斯、荣克和莱茵省其他支持者寄来的1000法郎，马克思支付了一年房租，租下了一名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的房子。房子坐落在同盟路上，附近是工人阶级社区，还有个图书馆。⁽¹³⁾同巴黎瓦鲁路的住处相比，这处房子无疑寒酸许多，虽有3层，墙壁却已经被煤烟熏黑，所处的街道也满是小摊和手工者的店铺。但燕妮并未对这寒酸的环境感到失望，已经有朋友聚集在他们周围。

与马克思一起坐车来布鲁塞尔的报人毕尔格尔斯搬到了附近，⁽¹⁴⁾马克思在科隆认识的另一位德国报人卡尔·海因岑也搬了过来。⁽¹⁵⁾莫泽斯·赫斯和恋人西比勒·佩奇（他在科隆认识的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姑娘）也在这条街租了房子，和马克思家就隔着两个门。⁽¹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前普鲁士中尉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称他“魏魏”）也搬来住了一段时间。⁽¹⁷⁾但马克思最重要的两个朋友（将来甚至成为家人）是在4月来到布鲁塞尔的：一个是海伦妮·德穆特，另一个是恩格斯。

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海伦妮有很多称呼，但他们大多叫她琳蘅。她比燕妮小6岁，比马克思小2岁，出生在特里尔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她

有6个兄弟姐妹，父亲是烘烤面包的。琳蕙11岁起便来到威斯特华伦家，她基本是和燕妮、埃德加以及卡尔一起长大的，除了日常事务外，她还要照顾主人家的孩子。⁽¹⁸⁾1845年4月，因为担心再次怀孕的燕妮照顾不好孩子，燕妮的母亲派当时25岁的琳蕙到布鲁塞尔帮忙。金发碧眼的琳蕙一到马克思家，便承担起所有家务，让燕妮有更多时间帮助卡尔和准备生育。⁽¹⁹⁾我们并不清楚琳蕙刚到布鲁塞尔时的政治信仰，但她很快就被马克思和燕妮周围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吸引，进入了这个圈子。虽然她不是出生在这个家庭，但自1845年春天起，她便被当做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她则给了他们毫无保留的爱作为回报。据马克思的伙伴说，多年来有很多人向她求婚，但她都没有答应，仍然留在马克思家，照顾他们。⁽²⁰⁾

琳蕙来得正是时候：正当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把马克思家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她的到来让马克思家重新有了条理。恩格斯租下了马克思家隔壁的房子，但除了睡觉时间，他大多都待在马克思家里。⁽²¹⁾恩格斯8个月前离开巴黎后，一直留在巴门与家人待在一起。其间，他一边完成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告诉马克思，他在书中对英国资产阶级进行了控诉，指责他们通过工厂犯下了大规模谋杀、抢劫等罪行），一边与父亲斗争。恩格斯的所做所为让父亲无法接受，为平息父亲的怒火，他同意继续回工厂工作。⁽²²⁾但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刚开始工作，就感到厌烦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做资产者，甚至还要做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讨厌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但是在我父亲的工厂里待了几天以后，它又在我的眼前重新出现了。”⁽²³⁾

恩格斯推掉了工作，告诉父亲自己再也不想理会工厂里的事，之后和莫泽斯·赫斯一起在莱茵省游荡，找人交流共产主义思想。⁽²⁴⁾恩格斯的的活动很快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察在一份报告里说他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四处游荡的作家”。⁽²⁵⁾父亲为了避免儿子被捕，便出钱让这个叛逆的儿子逃往布鲁塞尔，布鲁塞尔正是恩格斯想去的地方。⁽²⁶⁾

抵达前，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自己迫不及待要把“理论上的废话”放在一边，研究真正的事物和人。⁽²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将于5月在德国出版，他将万分乐意把这本书的稿酬交给马克思，缓解他的

经济压力，父亲给他的钱已经足够他生活。^[28]同时，他说自己既考虑过再去试试做生意，也想过实在不行就写点儿足够猛的东西，以便能被冠冕堂皇地驱逐。他说自己在巴门循规蹈矩，再这样下去，“我真担心上帝会无视我的著作而让我进天堂去”。^[29]

恩格斯的到来让马克思非常兴奋，燕妮也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他。（到目前为止，恩格斯对燕妮的了解仅限于“马克思夫人”这个生硬的称呼。）正如多年前燕妮幻想着马克思在决斗中受伤后，只能由她代笔一样，现在她成为马克思真正的助手。马克思家成了朋友们活动的中心，会议走进了他们家里。他们在布鲁塞尔认识的23岁的德国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说：“我极少见到如此幸福的婚姻，两个人全身心相互扶持、共享喜悦，共担苦难，共度悲伤。我更没见到过像燕妮那样有魅力的女士，不管是外貌还是精神都如此和谐。”^[30]

燕妮后来回忆说，他们的小群体生活非常和谐，相互帮助，共享资源，一个人的成功就是所有人的成功。他们在布鲁塞尔富丽堂皇的咖啡馆里的一串串吊灯下，一起进餐，一起跳舞，一起喝酒。^[31]他们还与其他国家的流亡者，分享对未来的期望和对故土的失望。

1845年的欧洲像被笼罩在一个魔咒之下：始于爱尔兰的谷物歉收和马铃薯枯萎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导致食物严重不足。农村人口面临艰难的抉择：是继续留在已经无法养活自己的土地上，还是到未知的地方去碰碰运气。虽然两条路的结果都可能是挨饿，但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还是选择了离开。仅1845年一年，就有超过10万人到达美国。之后连续数年，这个数字持续增加。但大多数选择离开土地的人都走不了那么远，只能来到越来越拥挤的欧洲城市。^[32]随着小农场主人数的减少，食物更加短缺。疾病开始蔓延，犯罪和拐卖儿童成为赚钱的行当。^[33]随着农业越发萧条，暴乱的威胁也越来越大。^[34]

此时，商业步入了发展过快的轨道，自1800年以来，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欧洲人口增长了近40%，企业主竭尽全力满足巨大的市场。过去，生产商按照需求生产，但随着生产过程加速，贪求利润的生产商不再坐等需求。他们自行开拓市场，本地需求不足，就通过新建成的铁路和轮船把商品卖到世界各个角落。他们认为商业的潜力没有尽头，这种想法在当时的英国尤其普遍。在这里，富裕的人不再关心“我

需要什么”，而是“我想要什么”。这些人与其他人的差别已经无比巨大。⁽³⁵⁾

虽然加速发展的商业也能创造就业，但其创造的岗位远远不能满足人口激增的需求。随着机器的应用和竞争的加剧，很多男性放弃原来从事的职业但又找不到新工作，相反，妇女和儿童工资更低，更容易受到雇用。另外，工厂和矿山提供的工作也谈不上什么稳定和安全。以前，一家人数代为同一个主人、在同一个行业或同一片土地上劳动繁衍。虽然生活艰苦，但他们属于一片社区、一片土地，他们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现在，能不能得到和保住工作完全由工头决定，工头与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他只向他的主子负责。工厂里的状况更是恶劣：工人随时面对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他们每天工作12到18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因为只有工作才能保证生存。

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计，但他们却最容易被忽视，他们没有声音、没有权力、没有领袖、没有受过教育。但一些人，比如底层工匠或知识分子，还是看到了自己的苦难和不幸。在欧洲各地的咖啡馆和酒馆里，他们都在讨论如何进行社会变革，消除他们的苦难。

交通促进了商业的扩张，也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虽然在欧洲民众的识字率仍低于50%，但对知识的渴求已然兴起。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狄更斯等采用新的写实手法描绘社会现实（上至贵族，下至社会底层）的作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认可，外国作家进入到人们的谈资中。⁽³⁶⁾报纸的转移也更加迅速，它们为了躲开检查，从一国首都转移到另一国首都。在专制统治最严重的俄国，即使沙皇尼古拉一世设立了12个检查机构，外国报纸还是流到了普通民众手中。⁽³⁷⁾马克思的俄国朋友帕维尔·安年科夫谈到过这一现象，“之前完全属于高等贵族和政府官员的特权，现在普通民众也能享受到了”。⁽³⁸⁾

但最危险的还是那些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到处奔走传播革命思想的男男女女。他们受过教育，在外面接触到了新思想，开阔了眼界。法国和美国的民主思想被一路输送到圣彼得堡，英国的商业思想在米兰被热烈讨论。在欧洲，民众也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支持者认为它们能够治愈社会疾病，救助那些因天灾人祸而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人。他们被政府驱逐，在他国首都相聚之后，关注的重点也从自己的国

家转向了世界。^[39]

当时，出于不满而爆发的示威在欧洲尚属罕见。工人似乎不知道该如何与这股潜在却庞大的力量抗衡。不过，1844年还是爆发了西里西亚工人起义（恩格斯认为这次起义标志着工人阶级运动的开始）；1845年3月底，瑞士卢塞恩一场酝酿已久的政治宗教纠纷演变为暴力冲突，导致100人死亡。^[40]这些事件使社会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君主们也已经注意到社会的变化，以前威胁来自其他君主，战争因为土地、荣誉或宗教而打响。但伴随美国和法国18世纪爆发的革命，以及1830年出现的后续影响，危险变得无法预测，“人权”这样一个恼人的概念都可能成为斗争的目标。威胁可能来自对立的君主，也可能来自某个开明的贵族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某个穿过军装的小商人。

欧洲开始驶向未知的领域，已经延续数个世纪的简单社会结构，越来越受到强有力的冲击。那么，用什么样的制度来取代它呢？实际上，欧洲大陆的未来是可以预见的，就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1845年夏天，恩格斯再次到访英国时，带上了战友马克思。

9 英国见闻



说不清这个世界是什么运道。先生，我必须努力、十分努力，才能活下去；这样却仍然不行，有时，只能忍受缺吃少穿。不，应该说经常。

——木偶戏表演者⁽¹⁾

1845年春，和恩格斯启程去英国前，马克思开始构思将要和恩格斯合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他们将摒弃“理论上的废话”，所有想法和思想都要根植于真实世界。⁽²⁾德国知识分子尤其容易被束缚到纯哲学上去，因为政府一直禁止他们讨论或出版与现实生活相关的东西。甚至社会主义者都使用“人类”和“苦难”这样的字眼，来代替他们真实的想法——人和挨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实情况要求他们抛开理论面纱，揭示物质真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总结了11条摘要，最后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³⁾胸怀伟大目标，兜里揣着预支的1500法郎稿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还未动笔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启程去英国。⁽⁴⁾

燕妮决定在马克思离开期间，和琳蘅一起带孩子回特里尔。她已怀孕6个月，旅途一定会很辛苦，但她必须回去，她的母亲与弟弟埃德加关系极为紧张。经过数年犹豫，埃德加终于参加了法律考试，却仍没有安定下来找份工作的念头。在科隆上学时， he 被发现混迹于激进分子圈

子。他花了家里很多钱，说是用在了革命事业和解决社会苦难上，实际上却被他用在了社交和剧院里了。埃德加小时极受燕妮喜爱，但燕妮告诉马克思说自己现在无法再对埃德加温柔起来。燕妮向东朝特里尔驶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在7月出发，朝相反的方向去英国。

他们在英国待了6个星期，大多数时间在曼彻斯特。英国纺织贸易的从业人数将近50万，行业的中心就是曼彻斯特。对社会学家而言，这里就是工业世界的实验室。马克思和恩格斯抵达时，纺织工业已经开始从家庭作坊向大规模工厂转变。小作坊几乎已经被公司所取代，公司对工人只担负工资的责任，而且为了利润往往将工资压得很低。人不再是人，而变成机器的附属。^[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切特姆图书馆里开展研究。在这里，他们远离外面遮天蔽日的黑色煤烟，研究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威廉·配第爵士等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些人都将在他们的书中出现。晚上，他们游荡于中产阶级商人经常光顾的酒馆；或是跟玛丽·白恩士一块儿去工人聚集的区域，这里时刻都有活动，尤其是星期六晚上，工人排队领工资的时候，场面极为疯狂。^[6]工人们一周的辛苦劳动终于变成了银币铜钱，甚至有一刻，攥着硬币的手掌好像也握住了自由的希望。工厂有时在酒馆里发工资，工人一周的血汗钱马上就交给了酒馆。男男女女迷失在幻觉里，以为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快乐。还有人拿着铜币直奔脏乱并且散发着刺鼻味道的夜市买些食物。一排排摊位，点着直冒黑烟的油灯，出售的都是白天更富裕的顾客挑剩下的东西，有的已经腐烂。地上是一层泥泞和泔水，提醒着众人生活于此的人苦难深重。^[7]

在工人居住区域，每座小屋有两间房间、一间地窖和一间阁楼，平均每座小屋住20个人，平均每120个人共用一个室外厕所。到处都是人和动物粪便的味道，房子间的距离非常近，风吹不进来，恶臭也散不出去。^[8]在棉纱厂工作的工人一年四季都穿着便宜的棉布衣服，他们的衣服因为洗过无数次早就没什么颜色了，以至于穿件稍带点颜色的衣服都成了财富的象征。他们买不起帽子，只能把硬纸浸湿，折成帽子形状戴在头上，抵挡没完没了的阴雨。手套、长袜这样的装备甚至没进入他们的词汇。鞋子也是奢侈的，不论男女老少，一年到头都光着脚。^[9]

在这样绝望的世界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家庭生活。由于妇女也需要工作，没人照顾幼小的孩子，大人不在家时，便用鸦片让他们安静。为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女孩刚满 12 岁就要“嫁”出去，男孩年满 6 岁就要到街头讨生活。一直以供养家人为荣的父亲，现在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经常要跟自己十几岁的儿子竞争工作的机会。人们无法负担病痛的医疗费用，因此死亡是比病痛更好的结果。实际上，穷人，尤其是爱尔兰穷人的葬礼非常喧闹，在狂乱的小提琴演奏声中，人们疯狂地跳着吉格舞和里尔舞，让活着的人暂时忘却要继续忍受的悲惨。⁽¹⁰⁾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找到了想要寻找的现实，此前他从未亲眼见过无产阶级的生活。他在巴黎见过工人，听他们讲过一些故事。但现在他就站在工业的污浊里，从物质和精神上都有了真切的体验，这里的景象、气味和苦痛的声音都使他备受冲击。他毕竟是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娶的妻子是贵族，交往的圈子都是文化人。他一直批评只注重理论的人，可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但他以后不会如此了。⁽¹¹⁾

两人大概在一个半月后前往伦敦，去见证这个新工业社会的另一面。他们发现伦敦拥挤异常，步行都有些艰难，但恩格斯却说，在这里人感受到的只有孤独。⁽¹²⁾在曼彻斯特，富人费尽周折与穷人保持距离，整个城市按这个原则规划，确保富裕阶层与穷人不会碰面。⁽¹³⁾在伦敦，富人和穷人虽然共用同样的街道，却又好像属于不同物种，仅有的一点交集便是把对方作为目标：穷人从富人那儿偷东西，富人从劳动的穷人手里偷东西，前者叫作犯罪，后者叫作工业。

1845 年的爱尔兰饥荒，使伦敦本已人满为患的贫民区更加拥挤，新涌入的饥民甚至瘦得没了人样。在狭窄的巷道里，老年妇人坐在湿漉漉的地面上，一动不动、毫无生气，只有从她们身旁烟管里飘出的烟雾在告诉人们：这是个活人。孩子们穿着碎布条，脸上满是厚厚的污垢，甚至看不出男女。⁽¹⁴⁾较为富裕的爱尔兰移民原来都住石屋，但现在大多只能住在泥土屋里；他们皮肤粗糙，故乡的恶劣天气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加之多年用爱尔兰山里流淌的丹宁水洗脸，他们的脸上呈现出褐色。这些移民很不受待见，甚至连已经在伦敦落下脚的同胞都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报酬多低的工作都肯做，而且他们挤占了宝贵的空间。⁽¹⁵⁾

在曼彻斯特，工人聚集的区域如野草般，沿河岸蔓延开来。在伦敦，贫民区是立体的，一座4层的房子，从地窖到阁楼，每一寸空间都挤满穷人，甚至包括楼梯。^[16]有人租不起整张床，便只租一部分；有人租下沿墙系着的绳子的一部分，好有地方坐下睡一觉。不论男孩还是女孩，男人还是女人，熟人还是陌生人，大家就这样每天晚上挤在一起。^[17]由于空间有限，人越来越多，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伦敦的堕落程度比曼彻斯特更甚。在穷人聚集的索霍广场、圣贾尔斯教区和河岸街，色情业极为出名。年轻孩子学着大人的模样，极力向路人卖弄风骚，希望能得到哪怕一丁点儿钱。^[18]她们的家庭因为没有食物和工作，不得不背井离乡。她们已经学会如何在街面上生存，她们是贫民区里“坚强”的无产阶级。曼彻斯特工厂里的工人能够出卖的只有体力，她们能出卖的，只有自己的身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城里与德国和英国的穷人代表见了面，其中有些人是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成员。马克思首次与正义者同盟接触是在巴黎，该组织在伦敦以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的名义，在索霍区红狮酒馆公开开展活动。^[19]组织的领导人包括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恩格斯在1843年首次与他们见面，称他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人的时候，留给我的良好印象”。^[20]

正义者同盟以教育联合会的名义招收成员，在瑞士和德国都有支部，教育联合会受到怀疑后，德国人又通过歌咏团和体操会等各种名义，为同盟招收新力量。^[21]1845年，这个同盟总人数仍不过300人左右。渐渐地，同盟开始吸收非德国人，名称也改成了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会员证上用20种文字写着“人人皆兄弟”。但恩格斯提到，各支部成员大多为工匠，属于劳动人民中的上层，他们的希望是成为小作坊主。^[22]

相反，在英国，早在1792年，一名皮鞋匠就成立了伦敦通讯社，要求选举权。从那时起，英国激进或改革运动的参加者就包括了工人和工匠。（这位名为托马斯·哈代的皮鞋匠被处以叛逆罪，被活生生开膛后吊死。）由于英国的工业化比其他国家要早，对这一新制度的研究也更成熟。^[23]1820年，英国首位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提出，工人的

劳动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货币形式。自此，英国激进分子开始从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思考劳动。⁽²⁴⁾他们认为生产商对剥削人的制度，负有直接责任。并且他们在追查资本的来源后发现，一直把控议会的大地主和各省富商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也在支持这种新制度，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并巩固权力，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²⁵⁾

1830年，法国和波兰爆发起义时，曼彻斯特工人试图将所有劳工聚集在工会之下，推动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男性普选权）。但两年后，《改革法案》通过时，议会把他们踢到了一边，只有部分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工人依然被排除在政治交易之外。⁽²⁶⁾但工人没有被击败，挫折反而加速了工会的形成。到1833年，一个工会组织的成员超过了50万。⁽²⁷⁾工人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在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阶级——工人阶级。激进宣传家勃朗特雷·奥布赖恩说出了工人反抗的心声：“少数者制定的法律导致了现今的不公平，多数人制定的法律将消灭所有不公。”⁽²⁸⁾

1837年，英国工人运动者向下议院提出包括彻底的政治改革在内的6项要求（即第二年提交议会的《人民宪章》），最终目标是让所有英国男性公民都有权进入议会。⁽²⁹⁾但不到5年，宪章运动便偃旗息鼓。到1845年，宪章运动者为了生存，开始寻求加强与法国和德国工人的合作。⁽³⁰⁾

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与英国工人运动领袖进行了会面，其中就包括宪章运动领袖和伦敦《北极星报》编辑乔治·朱利安·哈尼，以及宪章运动者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³¹⁾恩格斯回忆说，大家交谈后都认为包括宪章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内的各种运动都是同一场历史斗争，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³²⁾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些德国和英国的老革命者身上获益良多，不仅了解了他们开展运动的历史，而且学到了组织运动的实际经验。当他们返程时，他们心中已经决定，要带领布鲁塞尔乃至其他地方的工人大步向前。

马克思虽然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得对人轻蔑，惹人不喜欢，但他对

民众有着很深的感情，虽然很多批评者不肯承认这一点。很多同时代人可能会说马克思心中的恨比爱要多。但纵观他的一生，这两样他显然都不缺，而且，毋庸置疑，他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定然让他的爱和恨都受到很大刺激。回来后，他俨然变了个人。他在书中熟读过的字眼，他重复用过多次的字眼，都有了新的意义，都生动了起来。

这次英国之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得到了巩固。他们一年前在巴黎共处过 10 天，之后主要通过书信交流，彼此把对方看作朋友圈中的一员。但经过这次英国之行，他们发现两人在思想和个性上都极为合拍。此前，马克思工作和交流的伙伴大多年长他很多，除了海尔维格和巴枯宁，他周围的人大多属于上一代。但恩格斯和他说同样的语言，有相似的历史起点，他们的观念都来自于平常（虽然远谈不上完全一致）的经历。

作为知识分子，他们都聪明、敏锐、有预见性、有创造力，同时又都具有优越感、喜欢争论。他们都喜欢抽烟（马克思用烟管，恩格斯抽雪茄）、喝酒（恩格斯喝葡萄酒和啤酒，马克思什么都喝）、大笑（通常是嘲笑敌人，马克思经常笑出眼泪）。这对最好的朋友带着新的焦点和能量回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带回了搞清事实、揭露真相的决心，恩格斯带回来的更俗气一些——他的“妻子”玛丽·白恩士。

10 新思想的孕育



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卡尔·马克思⁽¹⁾

9月底，燕妮回到被她称为“贫穷的居住区”的布鲁塞尔，很快将生下第二个孩子。她将返回的时间一推再推，直到最后再也无法拖延——她不想抛下母亲。埃德加已经决定先到布鲁塞尔逗留几个月，之后他将前往美国试着做做生意，剩下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独自一人在家。⁽²⁾燕妮发现，一直喜欢有人陪伴的母亲，越来越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家里的财产很久以前就已耗尽，母亲已极少参加社交活动。既没有财产，又没了丈夫，她原本辉煌多彩的世界变得黯淡无光。她是个60岁的寡妇，像很多人一样，已经被世界抛弃。

燕妮和母亲极为亲近，她担心自己离开特里尔等于把母亲抛弃了。愤怒之下，她写信给马克思，诉说女人在社会中的苦难，为女人而控诉男人，甚至控诉她和她丈夫的激进思想。他们只知道无尽地讨论权利，但讨论的首先是男人的权利，浪漫主义者对女性主张的平等权利显然被他们留到了将来。控诉之余她也表现出对颠沛流离的沮丧。此外她还对曾经批判过的故国表现出了维护：

我本人在小德国可是感到愉快极了！不是吗？有句名言说，面对你们这些大德国的饕餮之徒需要很大的勇气，——在这个古老的罪人国度里，生活还是十分舒服的。反正我是在富丽堂皇的法国和比利时才认识到这种最平凡的、最狭隘的生活状况。这里的人都很平凡，非常平凡，整个生活只是一种袖珍型的生活；可是，那里的英雄也不是巨人，而且个人的生活也绝不比别人更辉煌。对男人们来说，情况可能不一样；但对要生儿育女、做针线活、烧菜做饭、缝缝补补的女人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就女人而言，我倒是很喜欢不幸的德国。⁽³⁾

毫无疑问，燕妮会返回布鲁塞尔，她在信中表达的，不过是她在女儿的责任和妻子的责任之间做出选择时的沮丧。不过时间紧迫，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争论。燕妮8月写信给马克思时，已经怀孕8个月，要想在布鲁塞尔生下孩子，就必须马上出发。

马克思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朋友建议燕妮走向西的路线，穿过普鲁士的森林和田野，由他们一站一站接力护送，途中可以在驿站和旅馆休息。燕妮考虑这样太过繁复，“路途的颠簸毕竟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她问马克思能不能到距离布鲁塞尔大概50英里的列日与自己会面，再一起返回布鲁塞尔。⁽⁴⁾他们一行及时赶回了在同盟路的住处，两周后的9月26日，燕妮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劳拉（取自燕妮夭折的妹妹的名字）。⁽⁵⁾

孩子出生前，燕妮就担心嘈杂的声音会影响马克思工作。她在信中说：“但愿大灾难不要恰好在你撰写你那部书的时候发生，我焦急地期待着这部书的出版。”她打算在楼上生完孩子后，就和孩子一起搬到楼下，这样马克思待在二层书房和被她笑称为大沙龙（虽然没有取暖设施）的区域，就可以不受打扰。⁽⁶⁾有很多原因使得燕妮如此迫切地想看到马克思的这部书（大家只知道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出版，比如让马克思获得她已期待良久的赞誉；比如让辩论更进一步，让政治改革的步伐加快。但最为迫切的还是经济原因：她和马克思都没有其他收入，朋

友们虽然一直很大方，但他们总不能（也不愿）一直依赖于他们的慷慨。

关于工作，马克思从来没有准话。每次谈到早已应该完成的著作，他总说再有一两周就能完成，或是正在进行最后的润色，或是因经济或个人原因导致了耽搁。但实际上，他距离完成还很遥远。新的想法与已有的想法相互碰撞，总会产生一些让他觉得料想不到却又十分重要的东西。他并没告诉燕妮自己这部书近期都不可能出版，因为它还处在设想阶段——还在他脑袋里呢。

多年后，燕妮会逐渐了解到，其他人珍视乃至向往的出版合同对丈夫来说，其实是种负担，会让他衰弱。她会看到他面对这种压力时受到的精神和身体的折磨，但这些她以后才能看到。在1845年，她认为既然有确定的截止日期，书自然会按时完成，他们的收入自然也有着落。

马克思是在写书，但不是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那本。在劳拉出生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写一本被他们称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书。

实际上，马克思春天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就已经开始思考《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人秋天从英国回来后，决定把所有德国哲学以及当时正在宣传的德国社会主义一起扫进垃圾堆。虽然出版商卡尔·列斯凯非常着急，等着出版马克思早该完成的经济著作，但马克思告诉他，这本书要想写出来，就必须先把挡在路上的障碍清除——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他决定和恩格斯一起做这件事。^[7]

《德意志意识形态》从人的起源讲起，首次用非常具体的语言，讲述了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的物质基础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现实与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正相反，历史不是由人以外的任何力量引导的，历史就是人，就是对人的行为的记载。如果把人仅仅看作一个演员，任由更强大的力量（无论是运动、上帝还是国王）来编写剧本，人只会变得软弱，无法看到自己在这个与同胞共享的社会中能够发挥的作用。^[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有生命，所有死亡，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都源自于实实在在的物质环境，人类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寻找答案。为了“科学地”解决问题，他们提出，人的存在根源于生产过程，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之后，便与动物区别开来了。^[9]（他们还提出，生育便是男女间的第一个社会劳动分工——想来，马克思家的婴儿啼哭声给了他们灵感。）^[10]因此他们写道，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代的肩膀

上，通过提高生产方式来发展自己，根据不同的需要改造社会。⁽¹¹⁾然而，当机器和货币成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破坏的力量”就会出现。与此精英阶层对应，会产生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¹²⁾。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所有革命性历史变革都是控制生产的阶级，与受其控制的广大人民之间碰撞的结果。⁽¹³⁾同时，他们提出仅靠暴力无法带来真正、长久的变革。依靠暴力推翻统治的精英阶层，并不能消除其成员信奉的“普遍真理”，比如其法律、艺术和已经被神圣化的制度。因此，马克思后来也强调教育和知识是革命的必要条件：

.....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¹⁴⁾

.....

因此，要想实现革命，民众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身处其中的制度无论被保护和宣传得如何神圣，都不过是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用以控制权力的工具。其次，民众要具备一定文化基础，以便建立新的社会，来取代旧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于1845年9月动笔，1846年8月完成，分为两卷，长达500多页。同他们的首部合著《神圣家族》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也集中批判了德国激进分子圈中的几个知名人物。琳蕻数年后回忆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房子里一边写作，一边畅笑不止，把所有人都吵醒了。可是，这本书带给他们的也仅限于这些欢笑的夜晚。⁽¹⁵⁾他们自己以及在德国的朋友前后找了8家出版商，但都没有结果。最终，马克思说他们把手稿“给老鼠咬也无所谓，毕竟我们已

经达到了主要目的，即理清思路”。^[16]

1845 年秋，劳拉出生后不久，有消息说普鲁士政府在想办法让比利时驱逐马克思，马克思一家又陷入恐慌之中。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人数一直在增加，柏林的普鲁士政府肯定早已收买了一些人，让他们盯紧那些爱惹麻烦的人。但是马克思并未做出任何特别的反叛行为，值得普鲁士政府如此大动干戈。可能只是有间谍报告说，马克思来到了激进流亡者聚集的布鲁塞尔，普鲁士政府就决定把他赶到离国境更远一点的地方。

马克思努力想办法摆脱困境。他写信给特里尔的治安官，要求获准移民美国。如果获得准许，他将不再是普鲁士国民，普鲁士政府自然也就不再理会他。实际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马克思有移民美国的打算，相反，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只是他的一个策略，借以让普鲁士政府放松对他的警惕。他的计划失败了：移民申请获得了准许，但对他的警惕依旧。1845 年 12 月，为避免再受普鲁士政府的牵制，马克思宣布放弃普鲁士国籍。^[17]

这样，从官方层面看，马克思不再属于任何国家。当然，这不过是个身份的变化而已，因为自从普鲁士对马克思发布逮捕令，他就已经回不了故土。对马克思来说，不再属于一个在他看来并不合法的政府，也算是得到了解放。184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年轻的图书馆员菲利普·日果开始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目的是打破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隔阂，为迎接“行动机会的到来”做好准备。^[18]委员会发给各成员的时事通讯不会有报刊检查官进行检查，唯一的威胁来自相对松散的“暗检室”——欧洲君主用以排查具有政治煽动性邮件的机构。^[19]

委员会成员很少，通信相应也少，但它却是马克思尝试组建的第一个国际性组织，是他整个政治运动的源头。燕妮承担起秘书的工作，帮马克思誊写书稿。（马克思的笔迹极难辨认，他在世期间，只有燕妮、恩格斯和他的女儿们真正掌握了他的笔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努力完成合著的同时，还和菲利普·日果一起参加通讯委员会会议。很快，在这座位于同盟路 5 号的房子里，各种活动日夜不断。马克思说自己那段时间每天大概只能睡 4 个小时，而且都是在快天亮的时候才能入睡。^[20]

远在英国的哈尼的妻子建议燕妮实行“凌晨三点或四点禁令”，即凌晨时禁止任何革命活动，以便让家人有时间休息。⁽²¹⁾应该说，这是个好主意——马克思家的气氛已经开始急躁起来，燕妮3月返回特里尔照顾生病的母亲后，情况更甚。马克思忙着“写”两本书，刚刚组建了政治组织，周围的流亡者越来越多，还有两个不到3岁的孩子在身边。孩子虽然可以由琳薇照看，马克思却没人照顾。

燕妮离开期间，通讯委员会在3月30日安排了一次会议，邀请一位名叫威廉·魏特林的裁缝讲话。魏特林是一名德国洗衣女工和一名法国军官的私生子，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的传奇人物，在劳动阶层中拥有众多追随者。他是巴黎正义者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其秘密著作《人类的现状及其未来》广受欢迎。之前，马克思曾拿他和蒲鲁东做过比较，对他表达过赞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魏特林开始失常，其思想最多只能算是空想社会主义。

很多人把这归结为他在普鲁士和瑞士的牢狱之灾。魏特林因为《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在瑞士入狱。书中，他把耶稣描述成像自己一样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可怜女人的私生子。有人认为，魏特林确实把自己当做了救世主。⁽²²⁾恩格斯说他“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²³⁾他的宝贵计划中，有一点是要打造一支由4万名罪犯组成的队伍，对统治阶级展开游击战。⁽²⁴⁾

魏特林2月抵达布鲁塞尔，受到马克思一家的热情欢迎（恩格斯描述说，马克思夫妇对他表现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²⁵⁾约瑟夫·魏德迈回忆说，魏特林和马克思、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还有他自己在马克思家打了一整夜纸牌，第二天，魏特林又在燕妮的陪同下，逛了一整天，“氛围非常好。我们一大早去了咖啡厅，之后坐火车去附近的村子维莱沃德吃午饭。我们玩得非常尽兴，坐的最后一班火车回来”⁽²⁶⁾。

随着燕妮返回特里尔，通讯委员会会议的召开，轻松的时刻结束了。他们围坐在马克思的一张绿色的小桌子周围，开始谈论政治。对政治兴趣十足却没选择任何政治道路的俄国人安年科夫当时也在布鲁塞尔，他生动地描述了德国共产主义过去的领袖与未来的领袖之间的这次会面。

安年科夫说魏特林外表完全不像狂热的革命者。38岁的魏特林比

马克思年长 10 岁，一头金发，外表俊朗，外套裁剪讲究，“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更像一名彬彬有礼的商人。马克思却完全相反，外表粗犷，但极为自信。“不管外表和行为如何，他好像自然而然拥有让人不得不尊重的力量。……行事方式虽与通常的人际交往规范不符，却又显得从容不迫，甚至有些蔑视一切的味道。”安年科夫描述马克思的嗓音如金属般锋利，语气强硬，让人无法提出异议。

与会人数不多，会议由恩格斯主持，他介绍说，对他们这些致力于改变劳动状况的人来说，有必要就实现方式达成一致。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描述说，恩格斯讲话时，马克思手里拿着一支铅笔，高傲的头微微低着，盯着眼前的一张纸。但马克思的安静没有持续多久，他要求被他称为“通过布道在德国弄出很大动静”的魏特林讲讲自己的活动。魏特林只是含糊地谈到应该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困境，用共产主义和民主思想把他们集中起来，但被马克思愤怒地打断。马克思认为把虚无的希望灌输给工人无异于欺骗，这样做只会让自己“自以为是警醒的先知，实际上不过是一无所知的笨蛋”。马克思认为，让人民知道自己的苦难还远远不够，还要让他们知道受苦的原因，唤醒工人却不为他们准备一个明确的计划或学说，只会以失败告终。魏特林想要辩解，但马克思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油灯直摇晃，喊道“无知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大家都起身离开，只留下马克思愤怒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²⁷⁾

马克思的宣泄才刚刚开始。（有同伴说他是那种“能够为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的人”。）⁽²⁸⁾ 没几天，马克思批判了另一名成员，即德国报人海尔曼·克利盖，嘲笑他是多愁善感的空想家，一篇文章用“爱”这个字眼竟然多达 35 次。⁽²⁹⁾ 之后，他又印制小册子，批判法国和德国“绵羊般的社会主义者”，批评他们不够科学，不能或是不愿讨论解决真实世界里的真实需要和真实不公的办法。⁽³⁰⁾ 在工业化的英国看到的一切深深烙在了马克思心里，让他对那些只关注抽象理论却对活生生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的人彻底失去了耐心。没有时间困惑了，他相信革命即将到来。

在马克思看来，波兰是正在到来的革命浪潮的最新明证。这年 2 月，加利西亚农民爆发起义，杀死数百名波兰贵族。起义蔓延到克拉科夫后，起义者宣布革命和废除农奴制。10 天后起义失败，部分是因为起义

者缺乏组织或计划。这正是马克思强调的：在未能彻底了解人类是如何走到目前这个历史节点之前，在没有为推翻旧制度后规划一个蓝图之前，革命无法持久，也不可能成功。^[31]

加利西亚起义再次证明，欧洲早已恶疾缠身，其影响在各国首都均已显现。各国君主都感到了食物短缺和财政危机的压力，财政危机使工人失去工作，政府财政陷入紧张。马克思认为在这种关键时刻，各国志同道合的人至少应该保持沟通，相互了解对方国家的情况，因此竭力劝说作家加入通讯委员会，但成效不大。截止到现在，只有少数几个在德国的人以及英国的乔治·哈尼周围的人给他回了信。他再次发现很难把法国人吸引进来。马克思、恩格斯和日果5月曾写信给蒲鲁东。马克思在信中非常谦虚地邀请蒲鲁东作为通讯委员会在法国的通信人，说他是合适的人选。^[32]但蒲鲁东可能已经听说马克思最近对其他社会主义者发过飙，尤其可能听魏特林在巴黎的朋友讲过，因此在回信中表示自己非常担心马克思变成“新的不容忍派”的领袖。“我们不要装作是新宗教的导师”，蒲鲁东写道，“哪怕是逻辑的宗教，或者理性的宗教”。蒲鲁东说如果马克思能保证在通讯活动中进行自由和完全的思想交流，自己可以加入，“否则，没有兴趣！”^[33]

燕妮不在期间，马克思的通讯委员会麻烦不断，恩格斯也麻烦缠身。玛丽·白恩士已经和恩格斯同居6个月，虽然两家人交往很多，还住在一起，但马克思和燕妮却从未特别在意恩格斯的这个伴侣。有传记作家认为，燕妮对于恩格斯和玛丽同居却不肯结婚感到不悦，但事实上马克思和燕妮在巴黎见过无数这样的情况，都没表现出异议。还有人暗示说燕妮自认为社会地位比玛丽优越，因此跟玛丽熟络不起来。但在燕妮一生中，从没有熟人说她表现出什么阶级偏见。原因也许很简单，那就是马克思和燕妮不喜欢——或者不了解——恩格斯的这位伴侣。当时玛丽23岁，燕妮32岁，她们一个来自爱尔兰工人家庭，一个出身普鲁士贵族，身份和文化差异实在太大。在1846年3月燕妮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她说道自己很高兴恩格斯家里发生“彻底决裂”时她不在布鲁塞尔。否则，她肯定会因为一直不赞成他们的关系而受到责难。燕妮觉得恩格斯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伴侣。“漂亮、可爱、能干的女人多的是”，她写道，“……期待着男人来解放她们、拯救她们”。不论那个春天到

底发生了什么，玛丽很快回到了英国。^[34]

在布鲁塞尔这个小小的流亡者圈子里，火药味十足，一年前的温和气氛早已消失无踪。赫斯愤怒于马克思对待魏特林的方式，他告诉马克思，自己以后与他的“党”不再有任何关系。（他后来指责马克思想要周围的人全都服从于他。）^[35]周围的人都破了产，但没人比马克思更甚。3月，出版商再也没耐心等待他的经济学著作，取消了合同，让他去找别人出版，而且出版后，记得归还预支的1500法郎稿酬。^[36]（显然，马克思依然没把这些告诉燕妮，因为她在信中说德国很多人都热切地等着他的书出版。）^[37]这时甚至恩格斯都缺钱，他写信给妹夫说自己有价值150法郎的东西在当铺里，需要妹夫给他寄大概这么多钱来。^[38]

马克思写信给已经返回德国想办法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魏德迈说，自己手头非常拮据。“为了使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在这里暂时还能过得下去，我把最后的一些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织品都当掉了”。最惨的是同盟路的房子租约到期，但没钱续租，一家人只得搬到野林旅店，恩格斯也在旅店租了房间。马克思说所有朋友都陷入了经济困难，“你看，真是困难重重！眼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39]

但这些困难没能让马克思放弃自己选择的激进道路，永远不会。对马克思和燕妮而言，情况虽然不好，但还算不上特别糟糕。如有必要，他们还能从科隆一些商人手上弄到一些钱（虽然基于政治原因，马克思会竭力避免走到这一步）。至于朋友，有像赫斯那样中途离开的，同时也有新的人加入进来。1846年4月，就有这样一个人突兀地出现了。一个身材矮小但很敦实的37岁男子（恩格斯说他看着很像德国农民，一身乡下资产阶级打扮）敲响了马克思家的大门。他名叫威廉·沃尔弗，因违反出版法被判入狱，但在被关入西里西亚一座要塞前逃了出来。他被马克思周围的人称作“鲁普斯”。紧随鲁普斯到来的还有德国报人斐迪南·沃尔弗（“红色沃尔弗”）、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比利时律师和报人律西安·若特兰、比利时律师维克多·德斯科，还有年迈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者约阿希姆·列列韦尔^[40]（燕妮还清楚地记得他每次晚上跟大家一起出去聚餐，总喜欢穿一身普通工人常穿的蓝色衣服）^[41]。马克思虽然与很多早期认识的社会主义者渐行渐远，但随着

他和伙伴们的声名越来越响，不断有新人受到吸引。

8月，恩格斯自告奋勇去巴黎建立通讯委员会分部——既然写信吸引不来法国人，他就亲自去找。^[42]但他在巴黎的收获并不比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收获多。11月，有告密者向警察告发，说听到他在工人集会上宣称不通过“暴力民主革命”，共产主义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43]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自己被警察跟踪了，警察对他的驱逐令已经发布，他因此打算先把政治放一放。^[44]

12月，燕妮已经怀孕7个月，她不想让第三个孩子在旅店出生，但手上的钱远远不够租下一处房子，近期又没有可期的收入。不过在马克思的姨父莱昂·菲利普斯和燕妮的母亲的支持下，他们还是得以搬出野林旅店，在布鲁塞尔郊区伊克塞勒租下一处小房子。^[45]马克思说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草稿已经完成，但闲放了太久，需要重写。^[46]出版商列斯凯早已放弃出版计划，马克思又找不到其他人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在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显得有些疲惫：

.....

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47]

.....

但在这封信里，马克思还是表现出了对于被德国人（或者说任何人）排斥的无所畏惧的态度。毋庸置疑，自从蒲鲁东上次在回信中对加入通讯委员会设定条件，马克思肯定已经对他有所愤恨。马克思不喜欢蒲鲁东在信中的语调，那种像对待学生般居高临下地指责他的语调，但在12月，当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他曾认为其作品开辟了新时代的人展

开攻击时，原因绝不仅仅是怨气。在过去的几年，尤其是在1846年，马克思系统地批判了所有在他努力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学习过的理论家。蒲鲁东是唯一一个还没有被批判的大家，但他的两卷本新作《贫困的哲学》给了马克思进行攻击的突破口。马克思在1846年12月收到这本书，他在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说自己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本“很坏的书”，它说明蒲鲁东根本不懂相关的历史或经济发展。他批判说，在蒲鲁东看来，人并不以前一代人的活动或生产所得为基础，因为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⁴⁸⁾如马克思所强调，这样的抽象观念一无用处，甚至危险。

马克思还批判说，蒲鲁东把奴隶制等方面冷漠地称为“经济范畴”，本身却对其并不了解。马克思写道：“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⁴⁹⁾

马克思没有就此止住，而是很快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这本书有100页，情绪激昂，很有分量。在书中，马克思以蒲鲁东为媒介，详细说明了自己的历史、经济和革命理论。在这本马克思独立完成的首部著作中，马克思首次称自己为经济学家，⁽⁵⁰⁾并总结说：

.....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双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⁵¹⁾

.....

蒲鲁东的著作在法国广受欢迎，并被翻译成德语。⁽⁵²⁾相反，马克思却找不到人出版自己的著作，虽然经济无比紧张，还是自掏腰包在巴黎

和布鲁塞尔印了 800 本。⁽⁵³⁾ 这本书虽然并不成功，却是马克思的重要里程碑。他击倒了最后一个思想巨人，完成了与老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黑格尔主义、基督教以及犹太精神的长期斗争。在斗争中，他创造出了新的东西：一个“政治 - 经济 - 社会”体系开始形成，不仅需要理论，还需要行动，并将从社会的中心改变社会。

马克思觉得，是时候加入到这个历史革命进程当中了。他和燕妮以及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同伴加入了正义者同盟。⁽⁵⁴⁾

11

壮丽的事业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党宣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正义者同盟一直以巴黎为总部，但到 1846 年秋，警察的骚扰开始增多，绝大多数最坚定的成员逃离法国。在伦敦，同盟不用担心官方干涉——部分原因是它还很弱小，不值得官方干涉。因此同盟将中央委员会转移到英国首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年前见过面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英国宪章运动者实现了联合。

1846 年初，马克思曾与正义者同盟进行过联系，邀请同盟与自己的通讯委员会联合，但马克思当时正在批判其他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盟拒绝了他的邀请。但经过通信后，到秋天，马克思已经让同盟相信：应该放弃模糊的、空想的未来完美社会目标，转而追求“科学的”共产主义，使他们理解并在物质上支持现代受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实际上，无论他们认可与否，无产阶级已经进入到革命斗争当中。^[2] 1847 年 2 月，科隆钟表匠约瑟夫·莫尔敲开马克思家的门，邀请他加入同盟。在布鲁塞尔见过马克思后，莫尔又去了巴黎找恩格斯。他告诉他们，同盟需要他们这两个年轻人加入进来，让同盟重新焕发活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这个邀请。^[3]

马克思认为同盟应该放弃最初的空想，与时俱进。肆虐欧洲大陆的经济和农业危机给出了证明，在危机面前，很多人加入骚乱，虽然同盟存在的意义便是帮助这些人，却一直未能成功地吸引他们。1845年开始的马铃薯和谷物歉收仍在继续，加上新的贸易政策剥夺了小种植者的生存空间，同时，国家允许大生产者把食物贩卖到更加有利可图的国外市场，结果，国内供应紧缺，很多生活必需品价格从1845年到1847年间翻了一番⁽⁴⁾。随着食品价格高涨，人们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急剧下降，破产者数目之多前所未有。店铺关门，饥饿开始在城市出现⁽⁵⁾。这年冬天，巴黎百万人口中多达三分之一依赖于官员、教会或慈善组织提供的救济。食物引发的暴乱很快出现，工人开始罢工，街道上出现街垒，预示着大事将要发生。有些政府为了平息城市的骚乱，从村镇调集粮食，使得农村本已糟糕的状况雪上加霜⁽⁶⁾。

有作家认为，这一历史时刻标志着古老农业秩序的结束，财富不再由收成和季节决定，新的秩序（好坏不论）将由贸易和生产主导。但在1847年，欧洲人民极为不幸地遭遇了两个秩序的同时发难⁽⁷⁾。

正义者同盟是马克思同意加入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组织。但他不喜欢组织或公开的政治活动。他是一个作家和思考者。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加入前是否犹豫过（他的最初想法是结盟，而非加入），但莫尔到来的时机很巧，正是马克思对同胞感到最为亲切的时候——他到布鲁塞尔时，马克思和燕妮的第一个儿子刚刚出生。小家伙在2月3日出生，根据燕妮的弟弟的名字取名埃德加⁽⁸⁾。从马克思和燕妮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埃德加从一出生，便是他们最喜欢的孩子。燕妮说，这个脑袋大大的小家伙恐怕永远长不了多俊俏，但她就喜欢他身上的那股野劲儿，骄傲地把他称作自己的“小怪物”⁽⁹⁾。

当然，伴随快乐而来的，是更大的经济压力。算上孩子的奶妈、琳蘅和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马克思家里现在有3个孩子和5个大人需要吃饭，随着通信越来越多，邮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包裹寄到巴黎需要6个法郎），还有很多没有家室的战友每天到马克思家解决吃饭问题⁽¹⁰⁾。但在燕妮和马克思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到经济困难时，对这些花费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即便是魏特林与马克思公开吵翻之后，依然每天到他们家里吃午饭。马克思一直说，运动事大，个人事小，牺

性不可避免。马克思让恩格斯在巴黎帮自己向朋友们收账，但即便这些钱能收到，也用不了多久，很快又会缺钱。⁽¹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显然无法带来收入：2月，出版商正式终止了与马克思的合同，收入来源变成了负债。⁽¹²⁾

牺牲虽然不可避免，可恩格斯在信件中对马克思承受的个人和职业压力好像并未放在心上，对燕妮表示的关心更少。⁽¹³⁾他仍在巴黎试图与社会主义者和关心政治的工人建立联系，还见了几个老朋友。⁽¹⁴⁾莫泽斯·赫斯得了淋病，因出版《前进报》而入狱的贝尔奈斯还没能恢复过来，藏身在法国乡村，偶尔才到巴黎，海涅住在一个小公寓里，下面是一座沉闷的庭院，由于瘫痪发作，一只眼睛永远睁不开了，以前声名狼藉的海尔维格也安定了下来——至少暂时如此，有了3个孩子。⁽¹⁵⁾恩格斯与他们以及少数正义者同盟成员进行了联系，但没能交到多少新朋友。⁽¹⁶⁾

在3月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说，巴黎的政治局势正变得更加紧张。“目前本地的警察十分可恶。看来他们想利用饥荒，竭力挑起一场暴力或者制造一桩大规模的密谋事件。”很多共产主义者被捕，即将受审。毫无收获的恩格斯竭力劝说马克思离开“枯燥乏味的”布鲁塞尔，到巴黎来，跟自己一起干。不过，他邀请马克思来巴黎与革命颠覆活动无关，如果说恩格斯此时想到过要颠覆什么的话，也应该是婚姻。他告诉马克思自己4月就会有点钱。“我们可以在一起开怀畅饮。……而且我也渴望同你在一起痛饮。”恩格斯可能也知道单凭这些吸引不了马克思，因此继续说：“这并不妨碍有时候谈一些正当的事情或者使生活带一些文雅的乐趣，而这些对我所认识的一帮人来说是办不到的。你一定得到这里来。”⁽¹⁷⁾

马克思没有去，他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比利时的政治局势也很紧张。普鲁士政府提醒比利时官员，藏身于比利时的流亡者已经违背约定，重新开始了政治活动。德国书商卡尔·福格勒在4月被捕，他也是布鲁塞尔圈子中的一员，马克思曾希望他能够出版《哲学的贫困》。⁽¹⁸⁾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为布鲁塞尔移民反对派报纸《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文章虽然政治性不强，还是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让马克思难以应付。他在写给海尔维格的信中说，普鲁士公使馆正密切监视报纸的

编辑，恐怕自己也被监视了。⁽¹⁹⁾

6月，同盟成员在伦敦聚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改组。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自己虽然很想参加，但经济情况不允许（他的《哲学的贫困》本月就要付印，他需要为此准备钱）。⁽²⁰⁾还有护照问题，虽然他也可以冒险在没有身份证件的情况下穿越边境，但考虑到警察的检查已经更加严格，这显然不是个好主意。马克思说，鲁普斯会作为布鲁塞尔支部的代表参加大会，再加上恩格斯作为法国支部的代表参加，他们应该足以介绍清楚自己对同盟的改造想法。

在6月2日开始的一周里，数十名同盟成员聚集在伦敦一家酒馆的包房里，进行讨论，同意进行重大改革，让组织的目标更加明确。首先，同盟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更加坚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但很令人安心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改组后，同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恩格斯、莫泽斯·赫斯和卡尔·沙佩尔受命起草一份共产主义纲领，用以招募新成员。⁽²¹⁾初稿在伦敦完成，通过教义问答形式，介绍什么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无产阶级的历史以及革命的途径。⁽²²⁾大会还向所有未能参加大会的成员发出了一封辞藻华丽的通告信：

.....

兄弟们！我们代表着一个伟大壮丽的事业。我们正宣布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无论就其彻底性还是就其成果的丰硕来说在世界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受这次变革的成果。可是我们知道，这次变革来势迅猛，日益临近；我们看到，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到处都有愤怒的无产阶级群众投入运动，并且用一种有时还是嘈杂的但越来越响亮和清楚的声音，要求从金钱的统治下、从资产阶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看到，资产者阶级越来越富，中间等级则日益破产，这样，历史的发展本身将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由于人民的苦难和富人的骄横，这场革命有朝一日终将爆发。⁽²³⁾

.....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在伦敦对于肩负起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感到振奋。但在当时，这实在算不上大事——他们人数太少了。柏林方面派去伦敦进行监视的警官估计说，到那年夏天为止，同盟成员大概只有84人。⁽²⁴⁾马克思夏天在布鲁塞尔建立支部时，只有18名成员。第一名成员便是燕妮，之后还有她的弟弟埃德加和恩格斯，这样算起来，除去马克思最亲近的人，只有14名成员。⁽²⁵⁾在1847年前后，这便是共产主义革命先锋队的规模。

绝大多数布鲁塞尔支部的成员是住得离马克思家很近的德国人和比利时人，这是一个团结的、近似于家人般的团体，这也很可能正是它的力量源泉。意料之中，马克思被选为支部主席，所有人都听从马克思的指令。

德国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回忆说，马克思和燕妮在伊克塞勒的家，虽然装饰简单寒酸，却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家园”。恩格斯把他介绍给马克思和燕妮时，他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欢迎。波尔恩对燕妮的热情记忆尤其深刻，把她描述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她一生中，只要是她丈夫关心和投入的，她都具有极大兴趣。……马克思深爱他的妻子，她也共担他的志向。”⁽²⁶⁾他们在一只手握紧拳头准备斗争的同时，另一只手紧紧地牵在一起相互扶持。

在布鲁塞尔，一切进展都很快。《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出版方实际上已经把报纸的控制权交给了马克思，⁽²⁷⁾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成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吸引和教育其利益未能在同盟中得到代表的工人。星期三，协会成员在位于著名的布鲁塞尔大广场上、装修豪华却不协调、镶嵌着木板的锡格尼咖啡馆碰面。马克思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的剥削过程，其他人讲授语言、科学和文化课程。星期日，有家庭聚会，内容包括诗朗诵（有时由燕妮朗诵）、流行剧目表演以及跳舞。⁽²⁸⁾马克思还被选为国际民主协会副主席，这是一个小组织，成员包括来自几个国家的行业精英，由马克思的对头组建，目的是消除他在工人中的影响。协会成立时，马克思不在布鲁塞尔，恩格斯极为聪明，选择了加入，这样不仅消除了威胁，还为马克思增添了新的力量。⁽²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他们经常通过政治辩论，利用自己无比锋利的思维和言辞击败对手，干净利落，毫不留情，乐在其中，少有败绩。让人觉得，他

们的对手甚至都无法完全理解自己是如何被击败的。

他们的活动和报纸引起了警方注意。警察在一份机密报告中说：

.....

这家报纸极为有害，以没受过教育的人为目标，向他们施加非常败坏的影响，不但向工人和劳工灌输均分财富的理论，让他们相信这是他们固有的权利，还向他们灌输对统治阶级和社会的深切憎恨。……工人协会的成员人数已经在数天内从 37 人增加到 70 人，这非常值得注意。^[30]

.....

马克思告诉海尔维格，工人协会的成员已经有 100 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31]

9 月，马克思到荷兰见自己的姨父，讨论遗产问题。^[32]自 1845 年夏天向列斯凯预支过稿酬之后（列斯凯现在正要求马克思归还），他和燕妮就再也未曾有其他收入进账。一年前，马克思的姨父莱昂和燕妮的母亲给过他们一笔钱，资助他们租房，之后，马克思从朋友那儿也要回一些小钱，但现在他们已经身无分文，花费却越来越多。房子一年的租期将在 12 月到期，马克思又想在 11 月去伦敦参加同盟第二次大会，因为恩格斯说，面对新的威胁，只有他亲自前往，才能巩固已有成果。^[33]

秋天，巴枯宁抵达布鲁塞尔后，立刻挑起了不少麻烦。他与马克思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到 1847 年，巴枯宁因为马克思对待魏特林和蒲鲁东的方式，对马克思更加怨恨。他认为，魏特林让自己从一名哲学生变成了革命者，蒲鲁东令自己更进一步，从革命者进化为无政府主义者。^[34]巴枯宁虽然接受了马克思的邀请，加入了国际民主协会，却觉得协会太过组织化，不适合自己的。他告诉海尔维格说，“这种氛围让人无法自由呼吸”。^[35]他还说，马克思仍在进行“坏工作”，用理论毁掉工人。^[36]他指责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是纸上谈兵的造反派，不过是包装得不错而已：“自负、恶言恶语、闲扯、理论上傲慢自大……整天说关于生活、行动和简单的理论，却实际上完全没有生活，没有行动。……不停地拿资产阶级这个字眼做文章，但他们自己从上到下都是小城镇资

产阶级，真是可笑至极。”^[37]

马克思的荷兰之行只求得了口头上的承诺，回来时两手空空。但考虑到自己的思想和领导地位将要受到挑战，伦敦之行极为必要，自己必须亲自参加同盟大会，即便这意味着留下燕妮独自一人应对家里的经济困难。他写信给巴黎的帕维尔·安年科夫寻求帮助：

.....

我的经济状况目前也十分危急，我的妻子可以说正受到债主们的围攻，她处于极端严重的经济困境。……我毫不客气地、坦率地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您，如果您能给我的妻子寄去 100~200 法郎，那您真的是救了我，使我免遭极大的不幸。自然，我要等到同我的家庭的经济关系妥善解决之后，才能还您这笔钱。

.....

马克思说，如果安年科夫同意，可以把钱寄到伊克塞勒。“但是，您在信中不能让我妻子看出，我从伦敦给您写了信，……我希望，下一次写信能告诉您一些比较令人愉快的消息。”^[38]马克思也只能求人，剩下就只能依靠燕妮自己了。

11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和维克多·德斯科在濒临北海的比利时港口城市奥斯坦德会合，第二天，他们坐上驶往英国多佛尔的轮船。前往英国首都的激进分子人流很是壮观，有几个组织在 11 月底举办了活动。首个活动纪念的是被残酷镇压的 1830 年波兰起义，被分裂的波兰此时仍未恢复过来，波兰也因此成为所有欧洲反对派的共同事业，法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丹麦人和英国人，聚集在索霍区大风车街上的一家酒馆里，共同缅怀起义的牺牲者。^[39]

马克思虽然不以演说著称，但还是针对波兰冲突的经验，用德语发表了演说（由沙佩尔翻译成英语）。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各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虽然无产阶级还没能形成这

样的联合战线，但他们有共同的经验可以分享，可以共同建立新的世界。

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复活。不过，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40]

所有发言者都表达了与波兰和工人阶级团结的意愿，当天的会议以所有人脱帽共唱《马赛曲》结束。

第二天，同盟大会在同样的地点开始，参加者多是老面孔。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马克思，虽然，马克思在他们这个小圈子里，早已因为在文章中对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同样毫不留情而声名远扬。正如他把世界分成了黑与白，众人对他的看法也分成了对立的两种：有恐惧和厌恶，也有喜爱和崇拜。同盟已经同意遵从他的思想领导，现在，他们终于要与他面对面，亲眼见到这位人间的避雷针。

住在伦敦的德国裁缝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形容恩格斯身材修长、敏捷，“不像学者，倒像是一名穿着整齐的年轻军官”。^[41]马克思则不论是体型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他巨大冲击。“马克思很年轻，大概28岁的样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中等身高，肩膀很宽，体格孔武有力，举手投足间显得精力充沛。他额头很高，形状好看，头发漆黑浓密，眼神具有穿透力，嘴角已经展现出让对手恐惧的嘲讽的线条。”他说，马克思说话没有半句多余，从不妄想。经过这第一次与马克思见面，列斯纳觉得马克思是天生的领袖，“代表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气质”。^[42]

接下来的十天里，同盟成员聚集在酒馆上面的一个大房间里，桌上放着啤酒罐，大家围坐在桌边凳子上，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

讨论6月初步讨论过的原则。大家穿的衣服差别很大，一眼看去，就能看出各自的社会地位不同，有工人阶层穿的棉布工服，有中等阶层知识分子穿的黑色长礼服，虽然破烂，却还是要显露应有的仪态，有来自更遥远地方的朋友穿戴的传统服装和奇异的帽子及饰物。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追随者努力让这个多元的组织免于陷入空想，极力去除纲领中任何残余的幻想。同盟要想成长，就必须与工人产生联系，就要坚定地讨论工人的需要和愿望。^[43]

会议结束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得以通过，章程规定了成员的条件，明确了同盟的多层组织结构。^[44]对同盟的目的也进行了修改，之前的目的是建议性的：“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45]修改后的目的则完全是马克思式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46]

章程规定，同盟将继续秘密开展工作，这是因为虽然在伦敦这样的地方可以公开，但在普鲁士的成员万一被发现，肯定会被逮捕。同时，同盟需要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向想要加入的人介绍自己。12月会议结束时，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快起草一份纲领。

虽然恩格斯已经对6月草拟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问答进行了重写，但在他们抵达伦敦前，他便对文件的形式有了新的想法。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的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党宣言》。”^[47]

12 《共产党宣言》的诞生



有人说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骚乱；又有人说没有见到社会上出现动乱，所以革命还远着呢。诸位先生，请恕我说，你们错了。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¹⁾

燕妮和马克思在无比拮据中，走进了1848年。新年时，德意志工人协会在锡格尼咖啡馆举行除夕庆祝活动，燕妮帮忙进行了组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称这次活动有利于加强几个国家的民主，⁽²⁾但对燕妮而言，主要是有利于加强她的勇气。之前的一年，太过困难。她对朋友说：“我的时间总是很紧，每天家里大小麻烦和伤心事不断，还要关心我亲爱的丈夫的事情。”此外，她还说到，在马克思去伦敦时，“家里大的小的都生病了，我在床上一连躺了十四天”。⁽³⁾但在新年来临之际，不幸的篇章好像已经翻过，孩子们都很好，小埃德加“长得漂亮了些”。就连经济状况都有了好转——马克思的母亲终于同意提前给马克思一些遗产。⁽⁴⁾

12月31日晚上，他们把革命暂时放在一边，专心庆祝。这是燕妮多年来第一次参加舞会。她和圈子里其他上层阶级的女士们都精心准备，穿着晚礼服，戴着项链和手套。晚上，穿着五颜六色的丝绸礼服的身影穿过大广场向锡格尼咖啡馆聚集，在周围会馆和市政府上千块方窗内的

煤气灯的照耀下，广场上熠熠生辉，这里，平时虽挤满了穿着深色外套的商人和系着围裙的商贩，但在这个晚上，如梦如幻。

报纸上说，很多人在舞会上发表了演讲，每次“端庄的女士们都愚蠢地”卖力鼓掌。⁽⁵⁾马克思也进行了演说，非常巧合的是与他的父亲1835年在特里尔发表的演说遥相呼应。当然，他父亲当时对普鲁士国王的赞扬被曲解成了讥讽，而他的本意恐怕就是讽刺。马克思赞扬比利时宪法开明，让“人性的种子”得以生长，惠及整个欧洲。⁽⁶⁾燕妮参加了戏剧表演，《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毫不意外地说，她展示了“出色的朗诵才华。看到这些非常具有才华的女士们如此卖力地提高无产阶级的知识水平，实在让人印象深刻”。⁽⁷⁾之后，乐队奏响舞曲，一对对男女走向舞池，翩翩起舞。音乐声一直持续到新年的凌晨，飘进早起的疲惫路人的耳中。

虽然马克思经常被描述成一副身体笨拙的模样，但他也喜欢跳舞，而且跳得还很灵巧。他和燕妮跳过华尔兹后，又跳了更加正式的方舞，后者需要与其他舞者具有很好的默契。如今的舞会已经与当年莱茵省的舞会大不相同，贵族与中产阶级中间不再被一根绳子隔开，不再要求所有人都穿着晚礼服——有些男士甚至把帽子塞进了兜里，这在正式的场合是非常失礼的，很可能被赶出去。但马克思怀里的女人，虽然已过13年，却依然没有变化，依然是那个让整个特里尔目眩的18岁女孩。

自从结婚以来，燕妮就开始承受经济拮据和遭受驱逐之苦。年幼的女儿疾病缠身，丈夫饱受政治迫害，这些都让她焦虑不已，但难得的是，她承受住了。她好像觉得，自己仍处在贵族特权的保护之下，也许她的阶级的确有罪过和令人心痛之处，但19世纪的社会系统就是如此（至少对普鲁士人如此），保证现有的秩序。统治阶级成员只要自己不愿意，就不会失败。燕妮曾开玩笑说，自己是“悲惨的伟大”这座宫廷里的王后，她的确把这视为一座宫廷，视为一个一心要建立没有弄臣的世界的先锋群体。⁽⁸⁾可以说，此时的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拓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群体具有社会意识，政治活跃，还很年轻，正在开拓，前途未卜，却充满光明。对一个智商高、有信仰的女人而言，这样的氛围让她感到兴奋。毫无疑问，她忠诚于丈夫的思想。但在信件中，她好像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决绝、义无反顾地抛弃她长大的世界，走向政治和社

会的洪流当中。

在布鲁塞尔的这个晚上，所有人对明天充满希望。所有朋友都参加了庆祝。恩格斯从英国把玛丽·白恩士带了回来，后者也参加了舞会。

1月初，恩格斯留下马克思独自一人在布鲁塞尔完成《共产党宣言》。此时，已经有三份草稿可用：恩格斯两份，赫斯一份。但马克思从头开始，采用了恩格斯后一份草稿中的灵感和轮廓。燕妮担任秘书，帮他加快进度。两个人的笔迹在纸张上交替出现，马克思把思想付诸笔尖时，字迹十分潦草，燕妮则用优美、女性的笔迹耐心地把丈夫对资产阶级的强烈控诉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誊写下来。革命也许的确即将到来，但马克思一如往常，又分心了。他在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同时准备在德意志工人协会讲授经济，以便把协会发展为宣传工具。他还要参加民主协会的工作，当时，这个协会正打算在纺织工业中心根特（比利时的小曼彻斯特）建立支部。1月，他在协会做了一篇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他从上一年9月便已开始准备这个主题。⁽⁹⁾

正如君主认为自己的统治是神授的权力，有些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提出自由贸易是上帝的意愿，因为贸易把人聚集到一起，促进精神和社会进步。有历史学家描述说，贸易让文明惠及的人数数倍于从前（这一说法曾在英国被用来要求取消贸易限制）。⁽¹⁰⁾但马克思说，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同时，他又欢迎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促进工业发展，从而加快社会变革，让世界分裂为两个阶级——有钱的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¹¹⁾（恩格斯后来描述为“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¹²⁾马克思预见这一制度将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和社会革命。

有人可能会指责马克思，因为面对预计将给工人带来深重苦难的贸易体系，他并不反对，反而欢迎。但马克思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无论这个事实有多残酷——便是：条件不成熟时发动的革命只能以失败告终。在绝大多数民众认识到起义的必要性前（他预计自由贸易会创造这样的条件），就妄图通过暴力手段改变他们的命运，结果只会是权力再次被少数精英阶层窃取。

马克思本想在1847年9月把自己的自由贸易理论介绍给聚集在布鲁塞尔的经济学家，可惜未能如愿。但这些思想不会白费：其中很多论

点最终出现在了《共产党宣言》中。

身在巴黎的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法国的同盟成员缺乏行动，令自己很受挫折。他说部分原因是这些人尚未看到伦敦代表大会的任何结果，“自然就变得松松垮垮”，即便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氛围都在酝酿。^[13]恩格斯的这番评论还只是温和地催促马克思尽快完成《共产党宣言》，但在1月26日，马克思收到了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信，受挫的同盟领袖在信中明确地说，如果《共产党宣言》无法在2月2日前送到伦敦，“会对他采取进一步措施”。^[14]

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接近完成。1月底，他把这份23页的文件寄到了伦敦。^[15]裁缝列斯纳把手稿送到了德国印刷商J.E. 布格哈德手中，后者在伦敦利物浦街拥有一家店铺。这本小册子的标题叫做《共产党宣言》（虽然当时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党），布格哈德给它搭配了一张暗绿色封皮。1848年2月底，印刷完成800份，作者的名字没有出现。^[16]英国宪章运动者乔治·朱利安·哈尼读到这本由马克思在布鲁塞尔郊区的小房子里创作、再由他夫人誊写的小册子后，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文件。^[17]

马克思笔下的《共产党宣言》虽不如恩格斯的教义问答形式生动，但在保持克制的同时，更加有力。马克思的小册子读起来就像是法律案件中的开场陈述（这也许证明了他的确本可以成为一名律师）。他的开篇很打动人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随后，他把这个“幽灵的神话”放在一边，开始讲述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要取代的腐朽制度。^[18]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整合其他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思想，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描述了资产阶级犯下的罪行，说这一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他说这种制度抹去了向来受人尊崇的职业，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把“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描述说资本统治的世界充满动荡，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为了不断变革生产和提高利润，在全球各地开辟新的市场。“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这种贸易制度凭借轮船和火车，从极其遥远的地区买来原料，再把产品卖到世界各地。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古老的文明也被卷了进来，未能幸免。马克思总结说：“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9]

同时，马克思解释说，这个资产阶级社会也为自己埋下了毁灭的种子，“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0]随着生产过剩，商业危机加速，支撑工业社会机器的工人大军——工人阶级或革命的无产阶级——将成为毁灭这个社会的力量。

“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1]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阶级对立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便如一代人的生产和发现成为下一代人进步的基础一样，不可避免。

马克思宣称，共产主义的核心是消灭私有制。他回应惊慌恐惧的批评者说，现存社会里十分之九的成员都不拥有私有财产，唯一会遭受损失的便是那些通过剥削获得财富的少数派。“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22]凭什么成百甚至上千人的艰辛劳动才支撑起来的产业让少数几个人独自受益？凭什么大自然的恩赐——矿产、土地和海洋——落入个人的控制，用来谋取私利？

对于有批评者指责共产主义伪善，破坏家庭基础，马克思也做了反驳。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工业制度下的孩子全被剥夺了童年，得不到教育，被当做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此外，马克思说，婚姻关系也已经被占有财富的资产阶级消灭，因为他们或者通过胁迫或者通过嫖娼，支配无产者的妻女，还以相互诱奸妻子为享乐。^[23]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马克思说，要实现这样一个联合体，“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5]

13

燃起革命的火焰



他们没有对自己和自己的命运感到绝望，也没有对他们的国王和上帝感到绝望。但最终，饥饿让他们无法不绝望。

——费里克斯·李希诺夫斯基亲王^[1]

最终，《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多达 200 种文字，但刚刚出版时，并未引起多大关注。此时，欧洲已经陷入混乱。1848 年 2 月的第三个星期，布鲁塞尔出现传言，说巴黎发生了政治地震，有些传言让人难以置信：国王路易·菲利普已经退位，开始流亡。法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法国成了共和国！24 日，布鲁塞尔火车站挤满了人群，等着从巴黎开来、但已经晚点的火车，以便了解准确消息。法国大使也来了，总要搞清楚自己在为什么政府服务，或者说还有没有政府。25 日，凌晨零点 30 分，火车终于到站。站在等候的人群中的斯蒂凡·波尔恩回忆说，火车还没停稳，工程师就跳下来，大喊“瓦朗谢纳塔顶飘起了红旗。共和国成立了！”人群马上爆发出欢呼，“共和国万岁！”法国大使和他的夫人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大多是德国人）赶紧离开。^[2]

数周内，欢呼声响彻欧洲各国首都，之前看似不可战胜的统治者如多米诺骨牌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倒在军队面前，而是倒在普通民众面前，民众的唯一武器就是人数众多。

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历史不会扫清怨恨，而是把它们像地雷一样

埋下。”⁽³⁾1848年的情况便是如此。这一年爆发的怨恨直接源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为了消除拿破仑的征服痕迹，会议重划欧洲版图，参加会议的大人物们重新划定的边界，与各国民众实际居住的地理范围严重不符。会议之后，登上统治地位的各国君主自以为拥有了新的力量，实际上，实力已经被拿破仑战争大大削弱了。各国人民为了战争流血牺牲，获胜之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税收没有被用来改善人民生活，反而被充入国库，最终被宫廷挥霍。之前，为了打退法国人而许诺给人民的权利从来没能得到兑现，反而被新的警察部门更加卖力地镇压。庄稼没有收成，政府不给予任何救济；失业率飞升，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创造工作机会。从1815年到1848年，民众逐渐找到了发泄不满的渠道，并最终在1848年揭竿而起。这一年的革命浪潮被称为“人民之春”，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席卷整个欧洲的、人民反抗统治者的革命风暴。⁽⁴⁾

虽然，这次革命浪潮于1848年2月在巴黎达到高潮，但革命的星火在1847年秋天便已开始。首先在瑞士出现，刚刚成立的联邦政府，与不肯接受新自由主义宪法、妄图从联邦分离的7个天主教州展开战争。邻国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认为战争会对欧洲传统君主统治造成威胁，因此，他竭力纠集力量对付“不尊敬上帝的激进分子”。但经过26天激战，自由主义者获胜，瑞士统一。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欧洲。⁽⁵⁾有激进分子称赞瑞士人民说：“各国人民的时钟还停留在午夜；瑞士人民却已经把指针朝着黎明拨近了几个小时。”⁽⁶⁾

紧接着，意大利巴勒莫爆发起义。当然，在那个时候，如今意义上的意大利还不存在，那时的意大利被分成两个公国、三个王国、三个独立公爵领地和教皇控制下的数个教皇领地。皮德蒙特的统治阶级讲法语，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统治阶级讲德语，整个半岛的民众则讲不同的方言，相隔几英里，语言便不通。⁽⁷⁾19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组织青年意大利运动，试图统一意大利。但这里不像欧洲其他地区那样，拥有铁路和通信网络，可以将起义者轻易地组织起来，因此看起来毫无希望。⁽⁸⁾

但在1848年1月初，西西里（后来纳入意大利版图的最贫穷的地域）食物危机引发了一场骚乱。犯罪分子趁机扩大势力范围；自由主义者受教皇九世庇护在教皇领地推行的改革影响，也开展活动。混乱中，巴勒

莫居民趁国王斐迪南不备，发动突袭，两周内便建立了临时政府。1月底，一直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失去了对从西西里到普利亚的领土的控制。2月，斐迪南为保住王位做了最后努力，推出宪法。⁽⁹⁾ 宪法之风迅速向北蔓延。身在伦敦的马志尼召集追随者返回故土，他们的民族之梦看起来即将实现。⁽¹⁰⁾

瑞士和意大利的起义虽然令人激动，但在反对君主统治的斗争中，却还只是热身而已。重量级的战斗发生在法国，这里一向是欧洲革命的发源地。与斐迪南一样，身在巴黎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也对1848年的起义感到吃惊，虽然在所有国王中，他是最不应该坐上这个位置的。他只要肯向周围看一看，就会发现很多值得警惕的迹象，但他把自己锁闭在宫殿里，自以为是地断言：“巴黎人不会在冬天发动革命。他们只会在热天闹事。”⁽¹¹⁾ 他对自己的子民了解实在不多。

近一年来，法国反对派议员一直在要求进行选举和政治改革，部分原因是1847年发布的选举法把人民的选举权变成了笑话。⁽¹²⁾ 按照该法律，缴纳200法郎选举税，方可参加选举，但在法国，即便是工人中的“贵族”——工匠——每年平均收入也不过600法郎。换言之，在900万男性潜在选民中，只有25万人买得起选票。⁽¹³⁾

面对政府对政治集会发布的新的严厉规定（未获批准，6人以上不得聚集讨论政治问题），法国人想出了规避的办法——组织大型宴会。⁽¹⁴⁾ 首次宴会于1847年7月在巴黎举行，支起的帐篷充作露天舞厅，乐队奏响70支曲子。这次沙托鲁格宴会吸引了超过1200人参加，其中多为温和的乐观主义者。之后，全国各地又陆续组织了至少22次宴会，有的宴会参加人数多达6000多人。每次宴会，论调都变得更加激进。11月，在里尔举行的宴会上，共和主义领袖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在祝酒词中，谈到广大法国人民神圣却仍未受到承认的权利。“有人说给民众政治权利是愚蠢的。他们那么无能、无知、无德，如何能给予他们权利？”但赖德律-洛兰宣称，“我相信用血汗钱纳税的人有权利参与政府对所有财富的支配”。⁽¹⁵⁾ 这时，恩格斯在《北极星报》撰文称，大多数资产阶级下层已经准备加入反对派，因为他们认识到国王和他的政府官员已经变成“一小撮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铁路股票投机家、大工业家、地主和矿主的恭顺仆从”。⁽¹⁶⁾

2月22日，巴黎第12区计划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举行前，买不起入场券的群众将集中行进到宴会现场。直到这时，国王仍没有给予宴会活动过多关注，但一直被认为在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中带头作恶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担心这次集会可能催生大麻烦，所以他对此次宴会予以了禁止。宴会的99名组织者中有80人服从了基佐的禁令，但被号召起来游行到现场的人群没有放弃。⁽¹⁷⁾虽然2月22日一早便下起冷雨，人群还是聚集到玛德莲广场，高喊“基佐下台”。⁽¹⁸⁾

第二天，天气更加恶劣，雨水夹杂着冰雹落在人们的头上和手上，如冰针般刺骨，但游行队伍变得更加壮大。拥有8万兵力的国民卫队受命控制游行民众，但他们同样受够了君主统治，枪头朝下，加入到了抗议的队伍中。人群不断高呼，要求基佐下台。

路易·菲利普或是因为年迈，或是因为厌倦了斗争，下午便向民众屈服，开除了自己的强势首相。他原以为这足以让游行者满意。到了晚上，示威人群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挤满街道，男男女女手拉着手，哄哄嚷嚷地向卡布西纳大道行进，但在途中遭到警察枪击，50人（另有报道说80人）被杀。示威人群把16具尸体装进推车，在漆黑的城市里，点起火把，继续前行。⁽¹⁹⁾原本空旷的街道上，只有金属车轮碾过路面，与湿漉漉的石块发出的撞击声，以及人们的脚步声。他们不再呼喊，不再歌唱反抗歌曲，他们的怒火在静寂中显得愈加可怕。

可以说，巴黎整夜无人能眠——无论是国王，还是抗议的人群。人们连夜建造街垒，从路面撬起超过100万块石块，砍倒超过4000棵大树，建造了1500个壁垒，用来应付军队和警察的进攻。到了早上，军队也加入了反对的阵营。⁽²⁰⁾路易·菲利普肯定想到了法国大革命时的情景，想到了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因此他在2月24日声称不愿见到法国人民流血后宣布退位，乔装逃往英国。离开前，他将王位传给年仅9岁的孙子，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成为法国的君主，由他的母亲摄政，直到成年。但形势的发展不会允许这样的闹剧再次上演，孩子和他的母亲同样逃离了法国，临时政府成立。⁽²¹⁾

贵族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虽然对反对派并不特别支持，但对巴黎起义的观察却极具说服力。起义爆发前近1个月，他便在选出的下议院的一次演说中，要求政治领袖们睁开眼睛看看，民众的需求导致

的反抗就在眼前。“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政治激情已经扩展到社会层面了吗？你们没有看见按照他们正在形成的观点和思想，他们要颠覆的不仅仅是某项法律、某个部门甚至某个政府，还有社会本身？……请你们相信，所有人失去政权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有效原因，都是他们不配再掌权了。”^[22]

美国很快承认了法国新政府，欧洲的反应则是担忧。^[23]专制君主们觉得路易·菲利普的倒台是罪有应得，他本就是借1830年革命之机登上王位，现在被另一场革命赶了下来，但他们幸灾乐祸的时间不会持续太久。^[24]

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布鲁塞尔前一个星期，马克思便已接到提醒，知道有大事将要发生。正在布鲁塞尔避难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协会成员雅克·安贝尔告诉马克思做好准备。但马克思和燕妮不仅没有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反而从相对安全的郊区伊克塞勒搬回了市中心的野林旅店。^[25]恩格斯在他们之前已经住进了旅店：1月29日，法国警察来到他在巴黎的住所，要求他在24小时内离开法国，否则他将被遣送回普鲁士。关于他突然遭到法国驱逐，^[26]有一个解释是他向敌视政府的德国移民所做的一个演说引起了法国政府的警惕，^[27]但真实的原因已经无从知晓。^[28]民主协会只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简短地刊登了一条消息，声明完全相信恩格斯对于突然离开法国给出的解释。^[29]

巴黎起义的消息令人欢欣鼓舞，马克思一家和恩格斯期待着更多消息的到来。奇怪的是，一切突然安静了下来，好像各方都在对形势进行评估，谋划下一步行动。比利时当局对于各国激进流亡者在布鲁塞尔成立的俱乐部和协会早就一清二楚，但一直并未将其看作真正的威胁。现在情况已经不同，比利时纺织业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饥荒也开始在这个小国家肆虐。研究比利时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称，每天都有“饥饿的工人砸碎店铺玻璃，把自己送进监狱，免得在外面挨饿”。^[30]当局担心国外激进组织利用与巴黎起义者的联系，在布鲁塞尔煽动暴乱，比利时工人也很可能会与巴黎起义者感受相同，他们会觉得比利时没有国王的时候会更好。^[31]

2月26日，比利时政府拟定了需要加以监视并在必要时驱逐的外国人名单。^[32]马克思和民主协会其他领导人通知协会会员和朋友，第二

天晚上举行游行，“通过适合于比利时政治制度的方式，为比利时人民带来法国人民已经获得的权利”。^[33]维克多·德斯科到市里各个咖啡厅，站到桌子上讲演，号召人民参加抗议。^[34]第二天晚上，市政府前的大广场挤满了人，有坚定地来参加抗议的，有好奇观望的。

虽然市民的初衷是和平游行，但随着人数不断增加，情绪高涨，局面开始失控。《马赛曲》的歌声和“共和国万岁！”的呼喊声夹杂在一起。市民自卫军（主要成员为中产阶级志愿兵）、警察、步兵以及从各省来援的预备部队，将广场团团围住，但看到人群变得愈加喧闹和暴躁，也显得极为紧张。示威人群高喊“自由、平等”，向各个小路分散时，恩格斯、斯蒂凡·波尔恩和鲁普斯正跟其他一些德国人一起在一家咖啡馆向外观看。突然，广场上的警察冲向群众，示威者被打翻在地，警察从四周推进，抓捕正四散而逃的群众。^[35]鲁普斯被拦住后，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刀，他被关押了起来，一同被关押的还有34名比利时人和4名外国人。他先是被审讯，移送到看守所，之后被投入监狱。^[36]马克思后来说鲁普斯遭到殴打，他被酒醉的看守“打掉眼镜，吐唾沫到脸上，拳打脚踢，辱骂……折磨”。（鲁普斯的右眼受伤严重，视力几乎不保，不过好在最后都恢复了。）^[37]

从某种程度上说，莱奥波德政府比欧洲其他政府更精明。布鲁塞尔当局相信只要能证明幕后策划大广场暴乱的是德国人，就能想办法让比利时民众相信比利时同胞并没有反对自己的政府，这样，他们就能争得时间，采取措施平息起义。他们还散播消息，说国王也是共和主义者，如果民众希望他下台，他会照做。这个传言散播得非常聪明，莱奥波德什么都不用做，便获得了民众的更多支持。^[38]

2月28日，谣言在布鲁塞尔传开，说昨天晚上的暴乱是几个激进的德国人搞起来的，这些人已经被三四个国家驱逐过。恩格斯在刊登于英国《北极星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不到一天的功夫，……全体小店主便异口同声地叫嚷着反对那些……德国造反者。……德国人曾指定一个咖啡馆为集会的地点，每个人应当把巴黎的最新消息带到这里来。但是，由于小店主喧嚷得太厉害，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风声，说政府要如何如何对付德国人，所以德国人不得不放弃这种与人无损的交往办法。”^[39]燕妮也提到警察、军队和市民自卫军都叫嚷着要对付德国人，

后者因此决定是时候武装自己了。多年后，她在自传中回忆说：“我们买了匕首、左轮手枪等武器。卡尔很高兴地出了这笔钱，因为他刚刚收到一笔遗产。”⁽⁴⁰⁾

的确，2月初，马克思收到了母亲答应给他的6000法郎。⁽⁴¹⁾这笔钱非常及时，因为他们已经欠下不少债务，接下来几个月还有花销，又没有其他收入可期。马克思很少考虑未来的经济问题。钱在他手上分分钟就能花出去。燕妮知道，提前把这笔遗产花出去意味着以后会债务缠身、生活不稳、仰人鼻息，但她并没有计较马克思把钱花在购买武器而不是家庭开支上。对于比利时政府对丈夫的活动如此警惕，她好像也极为诧异。燕妮说：“政府把这看成了密谋和犯罪计划：马克思收到钱，又购买了武器，因此，他是个必须解决的麻烦。”⁽⁴²⁾

燕妮的想法，在很多马克思传记作家中间找到了共鸣：其实比利时政府无需担心马克思和他周围的德国人，因为他们已经打算回普鲁士继续斗争。但即便是这样，比利时政府可能仍觉得自己至少有权力驱逐这些武装起来的造反者，毕竟他们决心要推翻自己的盟友。燕妮的这种异常反应说明她还没能完全认识到丈夫在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让自己无比敬佩的革命理论具有一个明确的物质基础，那便是枪杆子。

3月1日，鲁普斯和其他被捕的外国人被押上黑色的警察马车，送到火车站，驱逐到法国。马克思的时间也不多了。2月28日，有警察密探发现他与其他两个男人一起拿票据兑换了2100法郎。⁽⁴³⁾如果马克思被证明在比利时是武装反叛者，他可能被吊死。马克思想让燕妮带孩子回特里尔，但燕妮没有答应。作为马克思的妻子，她面对的骚扰也不少。⁽⁴⁴⁾（马克思的老母亲也未能免遭骚扰，特里尔政府询问她寄给儿子的那笔钱，她不得不签下一份宣誓书，发誓那笔钱是为了给马克思贴补家用。）⁽⁴⁵⁾

此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将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转移到布鲁塞尔，以便更接近巴黎。3月3日，马克思认为委员会需要再次转移——转移到巴黎。⁽⁴⁶⁾事实上，他自己可能也想到巴黎去：巴黎反对派报纸《改革报》的编辑斐迪南·弗洛孔进入了法国临时政府，他邀请“优秀和忠诚的马克思”回法国来。弗洛孔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这封信的日期是3月1日，马克思可能过了一两天才收到）说道：“专制曾将您驱逐，

但现在自由的法国欢迎您和所有像您一样为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命运这一神圣事业而奋斗的人。”⁽⁴⁷⁾弗洛孔的这封信如果能到得更早一些，显然更好。3月2日，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一世签署命令，将马克思驱逐，永远不准他再回来。⁽⁴⁸⁾

马克思、恩格斯和波尔恩为避免被捕，在这期间没有待在布鲁塞尔，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但在3月3日，马克思正好在野林旅店，下午5点，他接到驱逐令，要求他在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⁴⁹⁾燕妮和琳蕙忙着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布鲁塞尔（在这里住了三年多，收拾起来并不容易），马克思把包括恩格斯和日果在内的五名同盟成员叫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商量之后，正式决定将中央委员会转移到巴黎，并授权马克思在巴黎组建新的机构。⁽⁵⁰⁾

在旅店外面进行监视的警察报告说，在晚上9点到11点间见到几个人来探望马克思。夜里1点，店员都已进入熟睡时，警察进入了漆黑的野林旅店，爬楼梯来到二楼，马克思家在这层楼租有房间。⁽⁵¹⁾警察后来在报告中说，一名密探带着四名警察和一名女佣首先进入燕妮和琳蕙的房间，搜查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来到三楼马克思的房间，发现他穿着睡袍，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布鲁塞尔。桌子上的几个酒杯里还有未曾喝完的红酒和啤酒，证明之前确实有过集会。搜查过后，警察发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其中就包括把机构转移到巴黎的文件。警察要求马克思出示身份证，马克思拿出了法国政府之前发布的驱逐令和比利时政府刚刚发布的驱逐令，但警察认为这既不是身份证也不是护照，不予认可，把他当场逮捕。马克思穿好衣服后，被警察押送到等在外面的辆警车上。⁽⁵²⁾

燕妮被吓坏了，赶紧去找他们的朋友比利时律师律西安·若特兰。她知道一个德国人在布鲁塞尔被捕，可能意味着什么。如果警察确定马克思出钱购买了武器，肯定会以叛逆罪起诉他。虽然燕妮找到了若特兰，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马克思出来，但她还是无比焦急，深更半夜中，她跑到一个又一个朋友家中叫醒他们，寻求帮助。在漆黑的夜色中，她急匆匆地跑在布鲁塞尔中心区域的街道上，身上披着的天鹅绒斗篷随风飘动。路上，燕妮遇到了菲利普·日果，在后者的安抚下，她的身体和精神终于平稳下来。他们一起返回野林旅店，还没进去，便碰见一名警察，

他礼貌地说可以带燕妮去见她的丈夫。^[53]

日果和燕妮跟着来到警察局，却被告知马克思不在那里。接着，她也受到询问——为什么去见若特兰，以及她有没有身份证。日果提出抗议，说他们的问题荒谬而无礼，但他被关进牢房（警察后来在报告中说这都是他的勇气惹的祸）。^[54]燕妮因为没有证件，被以游荡罪名逮捕，跟三个妓女一起关在漆黑的牢房里。^[55]“我呜咽着走进牢房，一个不幸的牢友把她的位置让给了我，那是一张硬板床，我躺下了下来。”^[56]警方说燕妮在这间牢房没待多久，就被转到了另一间牢房，新牢房里有两张床，一张被一名因为袭击他人而被抓的女人占据。按警察的说法，燕妮对于换牢房非常感激，还给了狱警半个法郎。^[57]

第二天早上，天气昏暗，寒冷。燕妮回忆说自己从窗户看出去，在对面窗户的铁栏杆里面看到一张“憔悴、悲伤的脸”——是日果。“他看到我后，示意我顺着他的眼神看，我顺着望去，看到卡尔正被士兵押送着离开。”燕妮不知道马克思是不是被带走处死，她只能悲惨地在焦急中等待。一个小时后，侦讯员审讯了她，在两个小时时间里，一直想从她嘴里撬出关于她和她丈夫活动的消息，但燕妮说自己什么都没说。^[58]

“审讯只可能是纯粹的形式主义，”马克思后来写道，“我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59]

最终，马克思（他说自己夜里被和一个疯子关在一起）^[60]和燕妮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在下午三时被释放，此刻距离驱逐令的最后期限只剩短短几个小时。马克思要求比利时政府允许燕妮在布鲁塞尔多留三天，做一下准备，再带着孩子离开。但燕妮没有同意，马克思不在，她也不想留下。^[61]燕妮和琳蕻很快收拾好东西，燕妮把能卖的都卖了，并把他们一直珍视的纯银餐具和带有阿盖尔家族饰章的织品留给了书商福格勒。^[62]

马克思和燕妮的很多朋友来到野林旅店送别他们。斯蒂凡·波尔恩回忆说：“她纯净的脸上布满悲伤。我们握手道别，她将前往临时的家，一切对她而言都是临时的，她和她的孩子们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家。”^[63]

3月4日，马克思、燕妮、琳蕻和三个孩子在红色沃尔弗的陪伴下，离开布鲁塞尔，前往巴黎。在车厢里忽明忽暗的烛光下，他们看到车

上满是向南增援比法边境的比利时士兵。⁽⁶⁴⁾ 马克思和他的家人比这些士兵的旅程更远，他们前往的是起义中心，但他们不但没有惊惧，反而非常兴奋。燕妮回忆说，她当时一直在想：“还有哪里能够比身处新革命朝阳的照耀之处更能让人感到安心呢？我们一定要去那儿，一定要去！”⁽⁶⁵⁾

14 人民之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埃利泽·路斯达洛^[1]

第二天，马克思和燕妮抵达巴黎。途中，虽然车厢里铺上了厚厚的干草，但还是招架不住天气寒冷，孩子们很难暖和起来。^[2]燕妮抱着刚刚一岁的埃德加，两个女儿把小小的身躯蜷缩在男人厚厚的外套里，免得被冻僵。这次旅途比平时耗费的时间更长，因为有些铁轨已经被抗议者破坏——铁路公司被认为助长了工业的邪恶。深更半夜里，乘客不得不换上公共马车，继续旅程，直到重新找到能用的铁轨。到了黎明，大家的精神都恢复了，进入法国境内后，沿途车站都装饰着红旗和三色旗。经过乡下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幅欢庆场面，但随着距离巴黎越来越近，战争的伤痕越来越明显：不断有被烧焦和砸毁的火车头、车厢和架桥映入眼帘。到达巴黎前的最后一站是工厂集中的圣丹尼镇，这座车站已经完全被烧毁。^[3]进入巴黎后，毁坏的痕迹随处可见。起义时用来建造街垒的石块散落在原本铺设整齐的街道上。路上满是被烧毁的小推车，堆积到屋顶一样高的碎家具，还有被掀翻的马车。皇宫的窗户已被砸碎，对面的卫兵楼已成废墟，里面的卫兵早已葬身火海。^[4]在美轮美奂的杜伊勒里宫，之前墙上挂着的历代君主像已被撕为碎片，伤者横七竖八

躺在厚厚的地毯上。白色的窗帘在破碎的窗间迎风飘摆，犹如破烂的降旗。⁽⁵⁾

如今的巴黎早已不是燕妮和马克思 1845 年离开时的样子。这座瑰丽的城市已被破坏，但却迎来了自由（至少对男人如此）。他们抵达的当天，法国刚好宣布男性普选权。马克思的很多朋友和伙伴都在这里，他和燕妮再也不用生活在被捕的担惊受怕中。提醒马克思起义即将爆发的雅克·安贝尔担任了最高长官，办公室就在杜伊勒里宫。⁽⁶⁾另一位密友马克·科西迪埃担任了巴黎警察局局长，正忙着把刚刚释放的政治犯组织起来，成立一支市民自卫军。⁽⁷⁾恩格斯把这段时间称为“共和政权的蜜月期”。白天，只有干面包和土豆可吃的民众沿林荫大道植下“自由树”——起义时，大道两侧的树木被砍倒，用来建造街垒。晚上，巷陌里满是欢庆和歌声。⁽⁸⁾

由于太多人涌入巴黎庆祝，抵达当晚，马克思和燕妮花了很大功夫才在右岸梅尼蒙当区新路上的一处小公寓住了下来。这里临近巴士底狱，老板是一个妇女，她很愿意给德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住处。⁽⁹⁾住下后，马克思便马上出去参加法国前革命者阿蒙·巴尔贝斯（因为图谋对付国王而入狱，刚刚被释放）召集的会议，探望新的临时政府成员，与留在巴黎以及 2 月 24 日后陆续返回巴黎的各国政治流亡者叙旧。⁽¹⁰⁾巴枯宁便在其中。2 月 28 日，巴枯宁回到巴黎后，惊奇地发现巴黎林荫大道上最主要的景色居然不再是坐在马车上的年轻时髦男子和无所事事的闲人。⁽¹¹⁾现在，街上到处都是革命者——他们称自己为“四八年人”，留着胡须，围着饰巾，戴着宽边帽。⁽¹²⁾他们是坚强的斗士，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像浪漫主义者一样沉醉在自由的阳光中。

自从 1830 年起义后，这样的巴黎再也未曾出现过，甚至可以说，自 1789 年大革命最为轰轰烈烈的头几天之后，就再也未曾出现过。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离开家乡鲁昂，来到巴黎观察这次起义的“艺术方面”。⁽¹³⁾乔治·桑进入内政部撰写宣传公告，维克多·雨果受邀出任教育部长（他拒绝了）⁽¹⁴⁾。政治俱乐部雨后春笋般出现，只要有一张桌子，椅子足够，人们就能坐下来谈论政治，成立俱乐部。女性团体也出现了，她们支持离婚，要求消除工作场所歧视，成立日间托儿所，让女人能够出去工作。墙壁上贴满海报，大力宣传妇女权利。

这些主张妇女权利的活动主要由女性知识分子领导，男性革命者给予的支持实在太少。⁽¹⁵⁾（法国社会主义者一向因为反对女权主义而为人诟病。）⁽¹⁶⁾此外，报纸的数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仅一个月内，巴黎便新出现了 171 种报纸。⁽¹⁷⁾实际上，马克思抵达巴黎的第一天，弗洛孔便提出为马克思提供资金办报，但马克思拒绝了，说自己要保持独立，面对共和政府也是一样。⁽¹⁸⁾而且，他正忙着把德国战友组织起来，回国去战斗。伦敦的同盟领导者已经来到巴黎，布鲁塞尔的同盟成员也已经在路上。正如恩格斯所说：“汹涌的革命浪潮使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必须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¹⁹⁾

“人民之春”没有在巴黎结束，反而在欧洲不断传播，而传播速度最快的地区，便包括德意志联邦。德意志联邦的 39 个邦，无一躲过席卷欧洲的灾难性农业歉收和商业危机。1844 年以来，食品价格上涨超过一半，各邦均出现了因饥饿引发的暴动。虽然，此时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但工业还是对工匠造成了极大冲击，他们不得不到工厂里去，和缺少技术的成年人甚至孩子干同样的工作，有时甚至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各邦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1600 万人）的普鲁士问题最为严峻。⁽²⁰⁾一年前，危机便已出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向成员多为普鲁士上层社会的联合议会寻求帮助。弗里德里希·威廉把继承的财产都挥霍在了宫廷娱乐上，只得向控制着钱袋子的联合议会求助，他想通过借款修筑铁路。但他没想到，联合议会（他本以为可以相信他们的忠诚）不愿批准他的要求。议员们不想在这样关键的时候，被民众看作是纵容这位浪费而且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国王。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有数万人死于饥饿及饥饿引发的问题。以往总是忍气吞声的农村地区已经不再沉默，三分之一的反政府和反贵族抗议出现在农村。⁽²¹⁾仅 1847 年 4 月议会召开期内，便爆发了 150 起因粮食短缺引发的暴动。⁽²²⁾

联合议会提出，除非国王批准他的父亲 30 多年前就已承诺过的宪法，否则他们不会批准他的借款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没有同意，他说，不会允许一张纸夹在自己和爱戴自己的人民之间。国王就此解散议会，但在解散之前，议会进行的辩论已经刊登在全普鲁士的报纸上，而

且论调越来越大胆。有评论者指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氛围，联合议会……与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不是没有相似之处”。⁽²³⁾但过了将近一年，而且是在巴黎起义爆发和强势的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下台之后，普鲁士才出现像样的起义。

在所有的改革者眼里，已经74岁的梅特涅身上集中体现了所有欧洲政府普遍存在、尤其是君主统治存在的恶疾。他安排举行了维也纳会议，推动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组成反动的神圣同盟，其首要目的是确保这三国的强权地位，继续分裂和奴役波兰。梅特涅虽然仅仅是奥地利首相，不是国王，却在整个德意志联邦拥有很强的话语权，被很多人看作是欧洲大陆上外交手段最为高明的人。⁽²⁴⁾

2月29日，维也纳正在举行狂欢，法国起义的消息突然而至，奥地利各个阶级相互打量，充满怀疑和期待。反抗肯定会出现，但会来自哪里？不久前，一群维也纳医学生刚刚向奥地利皇帝斐迪南请愿。他们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不是激进主义者，要求的不过是普通的改革：新闻和言论自由、宪法以及学术自由。请愿无果后，数千名学生组织了游行示威。随着工人加入，又恰逢3月13日奥地利议会召开会议，示威队伍不断壮大。示威者在行进途中，遭士兵开枪射击，15人遇难。抗议范围扩大，示威者得到更多支持，国民卫队也抛弃政府，加入了反对行列。⁽²⁵⁾

骚动声势巨大，当权40年的梅特涅不得不当天便宣布辞职。（他也像路易·菲利普一样，乔装逃到了英国。）⁽²⁶⁾两天后，斐迪南承诺颁布宪法，胜利的游行学生组成学术军团，控制了维也纳。在整个奥地利帝国，布达佩斯、布拉格和威尼斯等地区相继获得自由。⁽²⁷⁾米兰爆发了持续5天的反对奥地利统治的光荣起义。工匠和劳工们用米兰城里最富裕的家庭和教堂贡献的沙发、钢琴、木桌和长凳建起1500座壁垒。米兰人只有600支步枪，他们便从博物馆和斯卡拉歌剧院找来木棍、长矛和佩剑充当武器，进行战斗。一周内，便夺回了自己的城市。⁽²⁸⁾

3月16日，维也纳的消息传到柏林。自从巴黎的消息传来，柏林便不断有暴乱和斗争在街头上演，但这些早期的抗争都是散乱的，没有组织的。它们只是民众表达沮丧的自发行为——在柏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有工作，而且其中一半的人还只是做学徒，微薄的工资甚至无法

养家糊口。柏林 40 万人口中多达 85% 身处社会下层，他们中又有超过一半依靠极为有限的救济生存。这些人只是自然而然地对抗权力，抢到什么算什么，谁阻止他们谁就是敌人。但维也纳造反的消息传来后，随着中产阶级组织者、学生和激进知识分子的加入，反抗活动更加有组织性，也更具威胁。民众再次请愿，要求自由权利。这一次，国王选择了倾听。^[29]

3 月 18 日上午 10 点，弗里德里希·威廉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进行改革。普鲁士内阁全部解职，国王重新召集被解散的议会，共同努力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王站在阳台上，向聚集在下面广场上感谢他做出让步的欢庆人群致意。人群中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柏林市民和学生，骑兵在广场四周警戒。国王的讲话淹没在人群的喧闹声中，他们只听到了自己愿意听到的，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想要的一切。鼓声响起，他们以为骑兵也要撤走了，但实际上，骑兵直接驱马冲向人群，进行驱散。混乱中，两声枪声响起，片刻前洋溢着喜悦变成了恐惧和愤怒。民众认为是国王下达了开火的命令。^[30]据目击者说，人群中很快响起呼喊声：“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被出卖了！”“武装起来！”^[31]

目击者继续描述说：“广场通往各个方向的道路都建起了壁垒。普通市民、大学生、小商人、艺术家、劳工、行业精英等各行各业的人迅速把地上的石块拎起来，建成壁垒，上面插上黑色、红色和金黄色的旗子。他们匆忙找来各种武器武装自己，先进的如步枪和猎枪，简单的如长矛、斧头和锤子。”^[32]王宫降下一面白旗，上面写着“误会”，但这太迟了。^[33]下午 4 点，教堂的钟声响起，惨烈的战斗拉开序幕。整整一夜，政府军不断向人群开炮，民众则尖叫着予以反击。最为恐怖的是，炮弹爆炸之后，伴随而来的是人临死时凄厉的叫声。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教堂的钟声再次响起。^[34]国王下令停止炮击。夜里恐怖的声音在王宫里也依稀可闻，经过一夜的思考，弗里德里希·威廉觉得保住王位的唯一办法是把自己交给民众，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宽恕和忠诚。他命令军队撤出柏林，向民众敞开大门，允许他们把首都握在手里。^[35]下午 3 点，军队开始撤退，街垒开始拆除。^[36]到星期一中午，和平协议达成。^[37]

日落时分，柏林城大街小巷所有的灯都点亮了，人们聚集在道路两

侧，目送一队队士兵撤退出城。⁽³⁸⁾之后，民众从各个方向沉默着向王宫行进。在之前的激战中，军队发射了大概 10 万枚炮弹，数百名民众丧生。身上粘满鲜血和炮灰的人把死者抬进宫院，并排放在地上。在民众的要求下，国王和王后双双出现在阳台上。⁽³⁹⁾有人高喊“脱帽！”，之前从未向任何平民弯腰的国王摘下帽子，向下面的死者致哀。⁽⁴⁰⁾

在这一刻，柏林的自由之战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斗争都更加彻底，但在斗争开始仅仅 3 天后，全副武装的民众虽然控制了城市，却并未对国王采取进一步措施，他仍然能够骑马出现在民众中间。弗里德里希·威廉下令赦免全部政治犯和政敌，允许流亡国外的普鲁士人回国。他承诺将推出宪法。数百年的专制控制好像就要结束了，普鲁士人不再是臣民，他们成为了公民。“人民的财产”这样的字眼被大胆地刻在了城内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⁴¹⁾

当时身在柏林的美国公使安德鲁·杰克逊·唐尼尔森，对柏林的这场斗争进行了记录。他在 3 月 30 日将报告发给华盛顿之前，写道：

.....

国王此间失去了权力。神奇的是，他失去了卫队，失去了他的宏伟的宫廷和高贵的仪式，但他觉得这只是一个梦，他只是在梦中失去了继承自父辈和祖辈的神秘遗产，正是这份遗产让他深信自己的统治是神授的权力。……他仍然未能明白所有人生来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不应接受任何所谓神授的政治区别或权力，不明白这一普遍真理的力量。他未能明白这些美德……乃是天意，说明改革即将到来，欧洲将拥有更好的政府和更好的人民，在新的时代里，专制将不复存在，这并非说国王都是罪大恶极者，而是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⁴²⁾

.....

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知道了柏林的情况后，谋划返回德国，确保劳动阶级获得与中产阶级同样的权利。海尔维格发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返回德国南部，通过战斗建立起共和制度。⁽⁴³⁾ 海尔维格的妻子埃玛表示支持，她相信，这样可以让丈夫的革命履历更加耀

眼、诗人之名更加响亮。⁽⁴⁴⁾数千名德国流亡者加入了这一冒险计划，新的法国政府给予了他们财力支持。

马克思认为法国人的支持别有用心：巴黎的工作机会有限，德国流亡者们离开巴黎，将有助于法国人找到工作，事实的确如此。⁽⁴⁵⁾另外，法国政府也考虑到巴黎聚集着来自各国的革命者，他们狂热而不安定，法国人希望他们离开。当然，波兰人和爱尔兰人除外——法国政府认为他们的国土正被他国侵占。⁽⁴⁶⁾不过，弗洛孔认为波兰需要被唤醒，因此他派巴枯宁带着 2000 法郎和 2 本护照到波兹南，看能不能制造混乱。⁽⁴⁷⁾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反对海尔维格的志愿军团计划，他们认为军团会很快被击败，让德国人重新想起法国人的入侵，使得政府中的保守力量更加壮大。但当马克思在海尔维格领导的民主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表达上述担忧时，他被斥责为胆小鬼和叛徒，甚至连他重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也对他恶语相加。马克思因此将他们开除，建立了单独的德意志工人协会，成员包括从伦敦来的同盟领导人沙佩尔、莫尔和鲍威尔，还有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圈子中的成员。⁽⁴⁸⁾马克思建议协会会员佩戴红色缎带，沙佩尔建议血红色，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得到了他的同意。⁽⁴⁹⁾

接下来，马克思也准备返回德国，但他组织的不是战斗者，而是宣传者。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是三三两两或者单独返回德国，悄悄地把共产主义的种子遍种在德意志联邦的土地上。

实际上，宣传早已开始。3月17日，燕妮写信给身在德国的魏德迈，让他刊登一则通讯，说明马克思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与海尔维格的组织之间的区别，她说后者使德国人“丢脸”。据燕妮说，海尔维格的组织正在普鲁士退伍军官的指挥下进行训练。恩格斯说过，海尔维格的志愿军团的一大问题是还没到德国便会暴露。燕妮的这封信印证了这一点，她接着说：

.....

请您设法尽可能广泛地在德国报纸上报道这件事。本来还想告诉您这里许多引人瞩目的活动，它每分钟都在变得更加激烈（今天傍晚有 40 万工人游行经过市政府门前）。

示威群众不断增加。但是我要料理家务并照看三个小家伙，十分忙碌，只能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⁵⁰⁾

她在信尾署名“您四处流浪的女公民——燕妮·马克思”。

4月1日，在进行了光彩夺目的阅兵式，并听过歌颂这支军队的数篇颂词后，海尔维格的志愿军团向德国进发。25天后，他的军团在首次战斗中便几乎全军覆没。⁽⁵¹⁾

马克思的协会有400名成员（当时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大约有8万人），也获得了法国政府的资助，他们于4月初陆续离开巴黎。恩格斯去了他最喜欢的招募基地伍珀塔尔，鲁普斯去了弗罗茨瓦夫，沙佩尔去了威斯巴登，波尔恩去了柏林，马克思去了科隆。⁽⁵²⁾

此次回国，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侦查，⁽⁵³⁾手上还有了武器——《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传单《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传单要求建立统一的德国，给予所有男性普选权，给立法议员发放薪金（以便穷人也可以担任议员），并武装全体人民，废除所有封建义务和税收。传单还提出，各邦君主领地和封建地产全部收归国有，成立中央银行和发行纸币，实行政教分离，限制继承权，保证所有人的工作权利，实行免费的国民教育。⁽⁵⁴⁾虽然这份传单在今天算不上激进，但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君主看来，实在是大逆不道。

马克思、燕妮、三个孩子、琳蕙、恩格斯和恩斯特·德朗克（不久前从德国监狱逃脱的一名作家）在4月6日从巴黎启程。他们有美因茨为期一年的签证，但在这里待了两天便分开了。恩格斯和德朗克分别去了各自的目标城市，燕妮和琳蕙带着孩子回特里尔，马克思则前往科隆。⁽⁵⁵⁾

恩格斯称这是斗争的第二幕。⁽⁵⁶⁾

15 《新莱茵报》与新斗争



激进的革命和所有人的解放于德国而言不是空想。空想的是不完全的、仅仅涉及政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将无法触及到房屋的支柱。

——卡尔·马克思⁽¹⁾

虽然马克思已离开科隆5年，此次回来，却发现没有多大变化。1843年时便已对政府感到挫败的商人还在挫败中。深知自己受到双重剥削——国家和资产阶级的剥削——的工人阶级仍然处在被剥削当中。唯一真正的变革出现在上个月。柏林3月18日爆发起义后，书报检查制度被取消，作家终于可以畅所欲言。马克思的3名同事莫泽斯·赫斯、格奥尔格·维尔特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打算继承马克思之前在科隆支持的报纸，创办《新莱茵报》。⁽²⁾将报纸视为有力武器的马克思知道有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后，感到更为振奋。同样让他感到振奋的还有在他抵达前的一个月，科隆已经播下一枚共产主义组织的种子。

3月3日，因救治穷人而知名的医生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连同两名普鲁士前军官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弗里策·安内克组织了一次共产主义起义，他们带领5000人到科隆市政厅提出诉求。这次起义很快以组织者被捕而告终，但共产主义的网络已经建立。被国王大赦的三人出狱后立即返回科隆，建立了新的劳动阶级组织。到4月份，成员已达

8000人。⁽³⁾但很快，马克思便同该组织的领袖哥特沙克在策略上产生了分歧。哥特沙克倾向于使用激烈的措辞要求工人权利，成立民兵，这样的思想让德国中产阶级感到害怕，这很可能让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利在人数甚众的下层阶级的反抗中失去。马克思则认为历史发展是缓慢的，在无产阶级的统治到来之前必须经历中产阶级的统治——无论这多么令人沮丧。毕竟，无产“阶级”在德国几乎尚不存在。依靠双手劳动的人虽然数目庞大，但毫无组织，也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马克思认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终极目标，首先要支持中产阶级主张的民主。他认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制度便是这样一个机会，他们应该积极参与进来，确保民主的力量在与反动力量的斗争中取得胜利。马克思还认为，自己和同伴在科隆出版的所有报纸都只能打出民主派的旗帜，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旗帜，因为民主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在德国具有更大、更直接的可能性。⁽⁴⁾恩格斯说，如果创办一家极端激进的报纸，“那我们就只好窝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一个大型的行动党了”。⁽⁵⁾

这种更加实际的做法，与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时拒绝刊登“自由人”共产主义观点的做法不无相似之处。当时，他便觉得“自由人”的观点对报纸的中产阶级读者而言，过于不切实际。他回来的目的是通过平静而广泛的努力，引导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联邦走上改革的道路。他明白此时情况的复杂：过大的变革会使中产阶级倒向旧的制度——虽然腐朽、败坏，却让他们感到熟悉、安心。

在他的很多同伴看来，马克思选择的道路过于温和；但在政府和其他人看来，他却是一名危险的激进分子。这使得他想重新获得普鲁士国籍变得极为艰难——他在4月份抵达科隆后就马上提出了申请。⁽⁶⁾不论祖国是不是已经更自由，没有国籍，他随时面临被驱逐的危险。燕妮本想待在特里尔，等着马克思的申请得到批准。苦于一直没有消息，她在6月份收拾妥当，带着四岁的小燕妮、两岁的劳拉和一岁的埃德加搬到了科隆。⁽⁷⁾此时，马克思刚刚就《新莱茵报》的宗旨问题，在与赫斯的争论中获胜（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出钱弥补了报纸的经费短缺问题），将来自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招入报社，马克思被任命为编辑。⁽⁸⁾

科隆医生罗兰特·丹尼尔斯帮马克思和燕妮在塞西利安街7号找到一处公寓住下。这里位于科隆的商业区中心地带，与莱茵河相距不过几个街区。⁽⁹⁾这里环境也不错，临近霍伊马克特广场，广场周围是商人建造的如宫殿般富丽堂皇的房子。但这里不是特别令人安心，公寓和编辑部随时要面对8000名普鲁士驻军的威胁。从早到晚，一车车物资不断运入军营，十分吵闹。随着弹药不断运入，炮兵全都配备了带刺刀的步枪。所有士兵都在忙着扩展和强化战斗的有利地点。⁽¹⁰⁾显然，他们在准备作战。但问题是，对谁作战？政府声称增援的目的是防止外部侵略，但恩格斯说军队正准备对付内部的新秩序。⁽¹¹⁾面对这样的威胁，报社无奈之下，准备了8支带刺刀的步枪和250发子弹。恩格斯把编辑部形容为一座堡垒，虽然火力比不上周围的政府军，但他们的勇气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马克思也开始随身带枪。⁽¹²⁾

这便是自称为“民主派机关报”的《新莱茵报》在1848年6月1日首刊发行时普鲁士的出版自由的情状。⁽¹³⁾实际上，把报纸称为“民主面世阵痛机关报”可能更为准确。作为一份日报，《新莱茵报》经常刊登从斗争现场发回的报道，事无巨细地记录欧洲社会不断变换的面孔——旧政府如何倒台，反对派政党如何努力取而代之。马克思认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让进步性稍差的德国人了解那些对民主的追求比德国更进步的国家的状况，以便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德国下一阶段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但其他欧洲国家传来的消息开始令人沮丧，主题不再是进步，而是倒退。

2月到6月间，革命初期的热情开始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各阶级间由于缺乏信任导致的对立。中产阶级将起义视为自己的胜利，又担心如果不把胜利的果实分给在起义中出过力的下层阶级，他们会做出何种反应。贵族在中产阶级政府中失去了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广大农民则担心中产阶级对自己加税，以筹集资金安抚在城市中作乱的饥民。到头来，推翻政府是容易的，恢复秩序却极为艰难——在大多数地方，秩序甚至无法恢复。

在法国，临时政府的总统职位象征性地交给了一名参加过法国大革命的80岁老人。但新政权的真正的领袖是贵族诗人阿尔方斯·马里·路易斯·德·拉马丁。拉马丁是共和派，极善雄辩，在很多人看来，他的

口才的威力丝毫不逊色于枪炮。临时政府的领袖个个摩拳擦掌，约束他们的责任便落在了他的身上。^[14]同他一道努力的同伴包括：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报社编辑弗洛孔、赖德律-洛兰（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宴会变得更加激进，并最终导致了2月24日彻底变革）和工人阿尔伯（又名亚历山大·马丁）。^[15]但结果是一团糟。他们全都没有执政经验，又对新政府的形式各持己见。^[16]

不过，自2月24日到4月23日进行普选期间，临时政府的成绩相当瞩目：在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实行男性普选，给予民众集会和出版自由，建立国家工厂确保就业，缩短每日工时长，废除政治罪的死刑。诸如此类，还有很多。^[17]但不论颁布多少法令，总会有部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紧张和不满情绪在滋生。

比如农村，农民一直对巴黎抱有深切怀疑，他们对于临时政府未能撤销自1827年颁布以来剥夺了农民诸多共有权利的法令（比如枯树枝这个老问题），感到极为失望。当临时政府为缓解起义导致的经济危机，决定征收45%的土地附加税时，农民的失望转变为愤怒。当内政部长赖德律-洛兰派人到农村进行宣传，以确保共和派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在国民议会里获得足够席位时，农民更加愤怒了——这些在首都享受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太可怕了，他们掠夺了钱财还不满足，还要把政治意愿强加到各省民众头上。农民和中小地主开始像贵族一样大批倒向保守派候选人。^[18]巴黎也出现了分裂，而且更加混乱。法国尚未建立真正的投票机制，无法让其超过900万男性选民全都投出选票。^[19]

到投票日，投票人数相当可观，多达84%的有资格的选民投出了选票。计票结果出来后，876名代表当选，但只有不到100人是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保守派或温和派，其中很多甚至在路易·菲利普手下当过差。没有几个巴黎工人代表进入新政府，反而是他们以为已经被自己推翻的富人阶级进入了政府。^[20]

选入国民议会的托克维尔说，自己在选举结束后回到巴黎时，对看到的场景感到震惊：

我在这座城市里看到 10 万工人武装了起来，组成多个部队，他们没有工作，忍饥受饿，挣扎在死亡边缘，头脑里却满是无用的理论。……我看到社会被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一无所有，被共同的欲求联合在一起；另一个阵营拥有一些财产，被共同的恐惧联合在一起。两大阵营间没有情谊，没有共通之处；到处弥漫着这样一种氛围：斗争不可避免，就在眼前。^[21]

5 月 15 日，不满的工人在经验丰富的极端分子领导下，袭击了刚刚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当时议会正在就波兰问题（其最近一次寻求独立的努力刚刚被镇压）进行辩论，他们以旁听辩论为名进入议会，但很快，随着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发出威胁，提出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特·布朗基也提出了几项要求，他的出现让很多温和派议员感到心惊胆颤。布朗基因为政治罪坐了很久的牢，却仍然不断发出攻击统治阶级的言论。^[22]出现在议会时，他已经出狱 2 个月左右，但牢狱生活导致的病态仍未从他的脸上消退：身体消瘦，嘴唇苍白，及膝的礼服贴在他瘦弱的四肢上，让他更加显得瘦骨嶙峋。托克维尔说他看起来就像一具干瘪的尸体。^[23]他代表着中产阶级最为恐惧的未来——又一次恐怖统治。

前政府部长路易·勃朗一进来，就被布朗基的追随者抬了起来。托克维尔回忆说：“他们抓着他的腿，把他举在头顶。我看见他挣扎着想摆脱他们，但徒劳无功，他使劲扭动身体，向各个方向使劲，想摆脱他们，同时气喘吁吁地尖声呼喊。”他们吵嚷着宣布国民议会已死，把一顶红色的帽子放在空着的议长席上，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他们的统治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便随着布朗基及其追随者的被捕而宣告结束。^[24]

法国政府成功应对了第一次挑战。虽然这次事件在如今看来完全可以当做是一次政治闹剧，但在当时，却说明极左的力量对新秩序构成的巨大威胁。同在农村一样，这次事件使得巴黎很多原本对自由主义者抱有同情的选民转而支持温和派和保守派领袖。很多人开始觉得，更大的

敌人不是来自社会上层，而是下层。

在普鲁士，随着自由主义者和中上层阶级对混乱的担心超过对真正的民主改革的愿望，局势的浪潮与工人渐行渐远。3月18日柏林起义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很快兑现承诺，组建了更加开明的内阁。首相卢道夫·康普豪森是马克思的《莱茵报》的支持者，财政大臣大卫·汉泽曼也是马克思在科隆的旧识。接着，准备选举产生新的议会，以引导普鲁士即将出现的变革，并准备在全联邦范围内选出一些人负责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但德国也面临与法国一样的问题：选民对这样大规模的政治没有任何经验。各个派别倾尽全力吸引初次投票的选民——保守派希望恢复往日的稳定，制宪派希望国家进步但不愿看到混乱，民主派坚持3月起义时的约定。哥特沙克等共产主义者指示追随者不要投票，很多农民和工人没有耐心等待，要求在选举前便有所行动——他们的要求太重大，等不及投票和计算选票。⁽²⁵⁾

3月底，起义再次爆发——工匠要求立刻恢复行业协会，以便控制竞争，确保他们的饭碗。他们攻击了富人的住所和工厂，这令人想起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农民也发动了暴动，对象是吞并小块土地、使得他们一无所有的大地主。⁽²⁶⁾

即使在经济平稳、社会稳定的时候，政治改革都是很困难的，而在国内动荡已经导致经济危机出现时推行政治改革，自然更加艰难。刚刚掌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了极为实际的考虑，如一位作家所说，发现“革命是危险的，他们的很多实际需求（尤其是经济上的）不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资产阶级从此不再是革命的力量”。⁽²⁷⁾他们可以做所有经济问题上的自由派，却不一定非要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也做自由派。⁽²⁸⁾

新政府极力稳定经济，通过行政手段促进贷款，采取措施让商业得以继续运转。（还批准了国王申请用来建造铁路的那笔贷款。）钱的问题已然解决，政府接下来要做的是安抚顽固的工匠和农民，承诺会在机会合适时解决他们关切的问题。但这样的承诺是不够的——在工匠看来，康普豪森政府比之前的政府好不到哪儿去。

新政府对民众的伤害还不止于此：政府大肆宣传选举的同时，却通过模糊的措辞剥夺了很多下层阶级成员的投票权。⁽²⁹⁾虽然选举法规定所

有达到法定年龄的男性都具有投票资格，却未曾保证他们全都有投票的权利。有些领取薪水的人不能投票，因为他们不“独立”。在城市里打零工的劳工和技术工人由于没有固定居所，不能投票。在有的地区，单身者和犹太人不能投票。⁽³⁰⁾最终计票时，真正投票的选民不到所有具有投票资格的选民的一半，在有些地区，甚至不到30%。没能投票的大多是工人和其他下层阶级成员。面对这样的现实，很多人很自然地把选举的获胜者看作是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后者已经背叛了在柏林建造街垒的民众）的傀儡。⁽³¹⁾《新莱茵报》的负责人极为愤怒，宣布新选出的德国和普鲁士议会不具备合法资格。⁽³²⁾

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尤其令人失望。作为新成立的议会，它把时间都浪费在了结构问题上。它的意义是作为统一的德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但由于德国尚未统一，它连能不能立法都尚不明确。恩格斯把它称为“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措施，通过一些谁也不感到兴趣的假想的决议”。⁽³³⁾

《新莱茵报》虽然人手不足，又缺乏资金，却还是想办法撑着，对复杂的时政加以梳理。在科隆狭窄街道的两侧墙壁上，零星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海报，为报纸做广告。啤酒和红酒商店里也张贴着订阅单。⁽³⁴⁾除这些努力之外，真正吸引读者的是报纸内容的广度和大胆无畏，这在普鲁士这样一个从未有过出版自由的国家里实在难能可贵。凭借遍布欧洲的通文人寄来的文章和通过一种非正式的交流体系得来的国外报纸文章片段，马克思的报纸刊登的国外消息比任何其他德国报纸都多。报纸的发行量快速增长，订阅人数增加到了5000人（考虑到报纸在咖啡屋和酒馆里传阅，读者人数显然比这个数字更多），成为39个德意志邦国中阅读人数最多的报纸之一。⁽³⁵⁾其声名开始吸引访客，有的甚至远自美国。

很多访客对这家发行中的激进报纸感到好奇，尤其想见到那位被警察称为“报纸的灵魂”、被恩格斯称为“报纸的独裁”的人。⁽³⁶⁾美国社会主义者阿伯特·布里兹倍恩当时正在莱茵省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进行报道。他说，自己一见到马克思就觉得他温和、内敛，同时又具备“一个无畏灵魂的高昂热情”。⁽³⁷⁾其他人却没这么宽容。后来成为美国内政

部长的德国人卡尔·舒尔茨当时 19 岁，刚刚首次品尝过反叛的滋味。他在柏林经历过 3 月 18 日斗争的高潮，之后，来到科隆，寻找新的反叛机会。他在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马克思演讲。“他当时不过 30 岁，但已经被公认为先进社会主义学派的领袖。他有些矮壮，前额宽阔，头发和胡须漆黑，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一现身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与马克思更为亲近的人，尤其是燕妮和恩格斯，却能够透过他的愤怒，看到一个坚信自己正确的人感受到的挫折。说到政治，马克思从不会有任何自我怀疑，但不了解他的人却很难把他的极度自信与自大区别开来。他并不在意。他是一名报纸编辑、一名哲学家和一名经济学家，虽然这些职业都最终涉及政治问题，但他不是政客。他很少甚至从未表现出希望得到他人的爱戴，或者喜欢。有人欣赏，那很好，他会回报以强烈的忠诚。别人不能理解，那也没什么，他没有时间考虑别人的感情或者自尊是不是受到了伤害这样的小事。

马克思在科隆期间，对他恶言相向的人在增加。不幸的是，其中很多人是对报纸的生存极为重要的商人股东。由于首相康普豪森提议将 3 月 18 日起义正式定性为暴乱，马克思在 6 月 5 日攻击了康普豪森，众股东担心马克思走向极左，最终在 6 月份抛弃了他。这次的导火线不是地方性危机，而是巴黎的血腥战斗。⁽³⁸⁾

16

笔杆子不得不服从枪杆子

★

我一睁开眼睛，就听到刺耳的金属响声，震得窗户玻璃直响，很快消失在巴黎的静寂中。

我问：“这是什么声音？”

妻子回答说：“是炮声。”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

有人说，1848年6月的巴黎，所有人不论男女都武装起来了。各阶级间的鸿沟已经变得无法逾越。政府毫无作为。民众忍饥挨饿。每天夜里都有人聚集在街头，无所事事、易怒、暴躁。^[2]5月底，有谣言说，工人阶级计划在6月举行自己的宴会。不难想象，宴会如果得以举行，必然出现工人的叛乱。最终，引起叛乱的不是宴会，而是政府的行动。^[3]6月21日，国民议会执行委员会发布法令，撤销拉马丁的部长们之前批准的确保就业计划。已经进入议会的维克多·雨果警告说，这样做会制造一支“穷人大军”，还可能在将来产生“新独裁者的禁卫军”。但政府资金短缺，打算削减昂贵的就业计划，毕竟，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计划已经成为反政府激进分子的避难所。^[4]

根据就业计划建立的国家工厂通过国家和市政项目为男人提供工作。这样的工作没有了，也就意味着很多人赖以生存的收入没有了。^[5]法国经济极为脆弱，这一计划对10万男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意味着

有没有吃的。就业计划将被修改甚至撤销的消息传出后，抗议开始爆发。“子弹或面包！子弹或工作！”的喊声响彻巴黎，街上再次立起街垒。6月23日，工人控制了巴黎部分地区。⁽⁶⁾6月24日，战争部长和前阿尔及利亚军事独裁者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将军指挥5万军队对工人发动了攻击。⁽⁷⁾

这一天，大暴雨袭击巴黎，淹没了很多地方，但战斗没有停歇。晚上6点，政府军开始炮击建筑和街垒。很多人被当场炸死，鲜血在湿漉漉的石块间流淌。建筑被炸毁，变成瓦砾。商店窗户被震碎，如果有人敢在这个地狱般的夜里出来，店里的商品绝对可以随便拿。⁽⁸⁾第一天结束前，新选出的国民议会便投票将全部执行权授予卡芬雅克。法国的民主派领袖下了赌注，相比铤而走险武装那些要发动更大革命的工人阶级，他们宁愿选择一个独裁者。⁽⁹⁾但给予卡芬雅克更大权力不但没能吓退工人，议会的怯懦反而让他们怒火更胜。战斗每天都在扩大。

数万男女展开了巷战。托克维尔虽然对平民战斗者不抱多少同情，但还是说他们在战斗中“有着不可思议的协调和丰富的军事经验，让老军官都感到差异”。妇女搬运弹药，男人开火，男人太累或牺牲后，女人就爬上街垒战斗，由小孩安装弹药。面对军队和重武器的进攻，巴黎人在圣安托万近郊、万神庙、玛德莲广场、市政厅以及城里各个角落，坚持了4天。⁽¹⁰⁾

战斗在6月26日结束。伤亡极为惨烈：大约有1500人死亡。但所有街垒都被攻克后，杀戮没有结束。陆续又有3000名叛乱者被追捕、杀害。还有15000人被捕，其中4500人被押送到阿尔及利亚。⁽¹¹⁾这样的旅途对很多人而言与死刑无异。但这样的悲剧没有让胆怯的议会感到多少不安。

卡芬雅克完成击溃工人的任务后，宣布全城戒严，沿香榭丽舍大道部署了5万军队，曾经作为巴黎骄傲的绿树林成了喂马的地方。激进俱乐部被关闭，出版自由法被修改——报纸必须交纳24000法郎的巨额遵守法纪押金，方可发行。卡芬雅克很快又撤销了不久前制定的每日工时限制令，把没有参加6月激战的工人也惩罚了一遍。⁽¹²⁾民主实验就此结束。路易·勃朗逃到英国，其他改革者没这么好运，因为宣传政治权利、工作和平等权利，被纷纷投入监狱。⁽¹³⁾

6月24日，马克思开始每日报道巴黎六月斗争的最新情况。凭借身处各地的战友的支持，德国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报道得如此迅速，引起如此高的关注。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数天之后才传到柏林，但更加血腥的六月革命的情况只需几个小时便能传到。政府担心这次巴黎之乱会再次在柏林引发后续动乱，因为柏林和巴黎存在同样的阶级对抗，同样的紧张局面很容易失控，引发骚乱。

6月26日，马克思决定报纸全版介绍巴黎的斗争。他的报道扣人心弦：“巴黎淹没在血泊中；起义发展成为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伟大的革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14]恩格斯补充说：“六月革命和过去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根本没有幻想，没有冲动。如果说在二月里，人民站在街垒上高唱《为祖国而死》，那么在6月23日，工人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祖国对他们已失去了任何意义。”^[15]

马克思说，这次斗争清楚地表明了法国的社会现实，一个资产阶级竭力掩盖、工人阶级尚未完全理解的社会现实：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16]他说，二月革命宣传的、写在法国每所监狱和营房上面的博爱不过是个骗局。^[17]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因为它得到了普遍同情，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丑恶的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18]六月革命是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恩格斯把斗争的牺牲者称为“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19]

一切已经发生变化。二月革命已经过去，但反革命（反动力量要撤销他们之前不得已做出的改革）才刚刚开始，不仅是巴黎，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写了一篇论文向革命的战败者致敬后，《新莱茵报》的最后一些中产阶级股东也抛弃了他们，他们只得另寻资助。^[20]“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横加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举无产阶级旗帜的唯一报纸。”^[21]

6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和布鲁塞尔领导人都已来到科隆，准备行动，但马克思决定将组织解散。在他看来，同盟已经过时，成为一种负担——当人们已经拿起武器，公开喊出不满，同盟这样的秘密组织

自然没了意义。从马克思看似矛盾的角度，他觉得每次革命失败，革命的种子都在壮大，密谋性的组织对革命的胜利无益。不需要再躲躲藏藏，要光明正大地战斗。同盟成员进行了投票，虽然也有异议，但还是决定解散。他们要专注于《新莱茵报》（宣传效果比同盟印刷的任何小册子都要好），专注于对抗正在重新壮大的德国保守力量。^{〔22〕}

7月2日，普鲁士出现新内阁，马克思的旧识康普豪森领导的内阁倒台了。新内阁虽然也是自由派，但宣称消灭贫困的最好办法是“恢复人们已经动摇的信心，使他们相信法律秩序是牢固的，相信君主立宪制即将出现”。^{〔23〕}宪法还遥遥无期，法律和秩序的巩固却迅速开始。7月3日，《新莱茵报》报道了哥特沙克和弗里策·安内克的被捕，后者被捕的原因是在讲演中号召工人组织联合起来，警方控告他煽动内战。据马克思的报纸报道，六七名警察在日出时分冲进安内克家中，其中四名警察进入安内克和他怀孕的妻子睡觉的卧房。他们没有出示逮捕令，便要求安内克跟他们走。报纸还说，其中一名醉醺醺的警察把安内克推下楼梯，还打碎了一扇玻璃门。报道还提到一个名叫黑克尔的国家检察官随后来到现场。^{〔24〕}不到两天，《新莱茵报》刊登了黑克尔对报道的反驳，说报道是对警察“诬蔑性的攻击和侮辱”。黑克尔说会采取法律行动。^{〔25〕}

7月6日，当局就这篇未署名的报道对马克思进行问询。^{〔26〕}7月10日，报社11名排字工人被询问文章的作者是谁。^{〔27〕}1个月后，科隆警察将目标锁定为报纸的编辑人员卡尔·沙佩尔。沙佩尔已经结婚，有3个孩子，虽然是德国公民，却被政府认定为外国人，被要求限期离开普鲁士。马克思的复籍申请尚未得到批准，很可能也是被当局认定为外国人。^{〔28〕}

对马克思周围的人来说，科隆是危险的。他们的家随时可能被闯入，家人随时面对被骚扰和驱逐的危险。警察随便实施逮捕，不遵守任何法律程序。秩序好像已经无关紧要。普鲁士议会忙着取消让其得以成立的人民权利。但他们的速度无法让国王满意。又一次政治危机过后，第三个内阁成立——这次由国王在9月任命。马克思称之为反革命的胜利，领头的都是些“没有头脑的蠢驴”。^{〔29〕}

马克思举目四顾，看到的都是政治和社会混乱。各国新选出的议会

处于瘫痪状态，在巴黎、柏林和维也纳，所谓恢复秩序的力量在对抗民主的力量，触发骚乱的饥饿和权利缺失变得更加严重。二月革命前，下层阶级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六月斗争后，他们得到了关注，但得到的是不信任和恐惧，上层阶级对他们避而远之，不再对他们的苦难抱有同情。工人也有了变化。他们已经知道不能指望任何其他人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在战斗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虽然又失去了几乎所有权利，但至少知道了暴力起义的作用。

1848年9月11日，科隆，一群醉酒的士兵骚扰一名年轻女子未果后，与市民自卫队的市民发生冲突，有市民被刺伤。直到军队指挥官命令士兵回营，冲突才算结束。⁽³⁰⁾这次暴力事件的原因是人数占多的天主教本地人与人数较少的新教普鲁士士兵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士兵深信当地人极为痛恨他们，都不敢在餐馆吃饭，怕被下毒）。⁽³¹⁾这次事件发生时，城里士兵与市民的人数比达到1：14，而且军队手里掌握着大批武器。⁽³²⁾事件使得很多科隆人相信必须成立民兵，保护自己。

两天后，多达6000人（又说1万人）聚集到科隆大教堂下的弗兰肯广场，商讨成立安全委员会。⁽³³⁾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马克思的杰作：早上，《新莱茵报》的编辑们便走上铺着卵石的拥挤街道，摇响铃铛，号召市民参加晚上的集会。⁽³⁴⁾人们举着火把，聚精会神地倾听演讲，一致支持成立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30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5名《新莱茵报》编辑，此外，还有药剂师、商人、鞋匠、屠夫、屋顶工人和杂货商。⁽³⁵⁾安全委员会的成立说明科隆市民对驻扎在此的普鲁士军队抱有普遍忧虑。⁽³⁶⁾多名《新莱茵报》成员进入委员会，加之委员会的名称令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派专政，引起了多方关切。城里的墙上开始出现海报，提醒人们警惕红色共和政权。中产阶级被这样的警报吓坏了，但工人和公民并未过度忧虑。⁽³⁷⁾他们热切地期盼行动，而唯一代表他们的行动是来自政治上的极左力量。

接下来的周日，中上阶层一直担心的暴力事件在刚刚成立的德国国民议会所在地法兰克福爆发。导火线是普鲁士与丹麦签署停战协议，将双方一直在争夺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拱手送给丹麦，给德国带来极大屈辱。⁽³⁸⁾德国人觉得停战协议如果生效，对德国而言将是一个巨大打击，强大、统一的德国将很难再实现。9月5日，法兰克福德

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停战协议，但这毫无意义，因为它无法强迫普鲁士重新开启这场代表整个德国已经打完的战争。面对如此不可能的任务，联邦政府痛快地承认无能，宣布下台。^[39]

新政府迟迟无法组建，9月16日，国民议会修改之前的决定，投票接受停战协议。第二天，国民议会所在地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附近的街区响彻愤怒的民众失望的叫喊声。^[40]国民议会议员费里克斯·李希诺夫斯基亲王和一个朋友外出骑马时被抗议者抓住，被施以私刑。军队被调入进行镇压。战斗持续48小时后，占据街垒的抗议者被击败。^[41]

《新莱茵报》对抗议者表达了同情，并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募捐。9月19日和20日，恩格斯写道，抗议者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不会放下武器，直到最终获得解放，他还警告说接下来的目标将是“小官邸”和“贵族领地”。^[42]

恩格斯的武装号召肯定伪装成了对从法兰克福到科隆和柏林一路响起的警报的报道，但文章发表4天后，科隆当局就迸发出“一股最强烈的抓人的念头”（马克思的描述）。一大早，警察便逮捕了报社的两名成员，并对其他一些成员发出了逮捕令。^[43]马克思写道：“如果这些先生们进一步实行他们的计划，不用很久，本报的编辑发行就只能成为奇迹了。……问题仅仅是，谁将首先失去幽默感，是国家检察部门的先生们还是《新莱茵报》的编辑。”^[44]

在星期一早上，多人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暴力事件频发——抢劫，与警察的冲突，甚至在科隆很多地方，煤气灯被打碎，煤气管线被切断。^[45]大多数工人在星期一休息，马克思担心当局选择在这一天实施逮捕是早有预谋，为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工人参与进来，以便让政府找到镇压的借口。马克思到工人聚集的各个地方，劝说他们不要上当，科隆驻扎着数千士兵，这个时候行动很可能失败。但到了晚上，民众的激情在酒馆里达到顶点，纷纷冲到街道上。他们建起多达40座街垒，从售卖枪支和工具的商店抢来枪支、镰刀和斧头等所有能用作武器的东西。^[46]

第二天中午，科隆当局宣布戒严，工人连战斗的机会都没有。政府解散了民兵，命令所有酒馆晚上10点关门，禁止公共集会，查禁《新莱茵报》和其他三家科隆报纸。^[47]马克思写字条给报纸的订阅者说，“笔

杆子不得不服从枪杆子”，但他相信被禁的时间不会太久。^[48]

被禁的时间的确算不上很久——但已经足以影响报纸的继续发行。由于之前一直负债经营，现在又没了订阅收入，报纸已经难以为继。更关键的是，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对鲁普斯、恩格斯和毕尔格尔斯发出了逮捕令，罪名是密谋推翻政府。^[49]

鲁普斯向西南逃到巴伐利亚的帕拉提纳特省，但很快又回到科隆，尽量减少露面。^[50]恩格斯和毕尔格尔斯却必须离开科隆，因为警察向公众描述了他们的模样。恩格斯的母亲从巴门写信给他：“你真的走得太远了。……当我拿起报纸看到上面有我儿子的逮捕令，我忍不住颤抖起来。……亲爱的弗里德里希，如果你还肯听一听我这个可怜、悲伤的母亲的话，就听从你父亲的建议，去美国吧，放弃你之前一直走的道路。”^[51]

恩格斯没有去美国，去了布鲁塞尔。10月4日，恩格斯和德朗克在一家旅店刚刚坐下准备吃饭时，被一直在注意他的警察逮捕。他们被扣押几个小时之后，被赶去了法国。^[52]恩格斯不敢多待，因为他在这里也有被捕的危险。而且，眼前的一切让他心碎：

.....

卡芬雅克的榴弹把巴黎人的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了。《马赛曲》和《进军曲》的歌声沉寂了。……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大街上只有资产者和警察密探；舞场和戏院空无一人。……总之，这又是1847年的巴黎，不过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我必须走开，不管到哪里去都行。于是我先动身去瑞士。因为我身边的钱不多，所以只好步行。并且我也不愿意选择最短的路程，因为我心里是不想轻易离开法国的。^[53]

.....

恩格斯开始了一段不得不远离革命的旅程。他已经28岁了，不再是那个在伦敦时被哈尼形容作“孩子气”的年轻人，经过数年身处思想革命第一线，他已经历过风雨，变得更加坚强。他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热

爱丝毫未减。想到革命的征程，他便两眼发亮，不自禁地欢呼：“美丽的法国！”^[54]

“什么样的葡萄酒呵！”这是恩格斯在日记《从巴黎到伯尔尼》中的感叹。这本日记记录了他的旅程（里面有非常多的感叹号），还有一张手绘的路线图。在“红色共和国”勃艮第（被恩格斯如此称呼，不是因为其政治，而是因为其红酒色的街道和人），他说，希望自己有满口袋的钱。“1848年葡萄空前大丰收，连装葡萄酒的桶子都不够。此外，质量也非常好——比1846年的葡萄酒还要好，也许甚至比1834年的葡萄酒还要好！……一路上，我尽碰见一群群非常快乐的人们、非常甜的葡萄和非常美丽的姑娘。……因此，人们会相信我：我在上山时花了更多的时间躺在草地上吃葡萄，喝葡萄酒，同种葡萄的人和他们的姑娘们谈笑。”^[55]他通过画卡芬雅克和赖德律-洛兰的讽刺画，和当地人交朋友，路上还遇到一些像他一样远离动乱的巴黎、享受田野乡间的旅者。政治在恩格斯的旅途中所占的部分极少，他到日内瓦时，已晒得漆黑，他在这里略作休整，写信给马克思说自己需要钱。^[56]

但钱也是马克思最缺少的——还有时间、帮助和平静的心情。他正焦躁着，想办法把《新莱茵报》继续办下去。报纸在10月12日，也就是科隆戒严令取消一周多之后，才开始重新发行——没办法更早，因为仅剩的几个愿意考虑继续资助的股东看到，报纸的编辑人员中有好几个逃犯，更加不愿再出钱。^[57]此外，虽然秋季订阅已经到期，但报纸恢复发行的时间未定，甚至无法确定是否能够恢复发行，仅有的订阅者尚未支付续订费。^[58]

格奥尔格·维尔特和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后者刚刚在杜塞尔多夫摆脱出版革命诗歌的指控）^[59]加入报社，弥补写作人手不足。^[60]燕妮也从舒适的公寓搬到脏兮兮，散发着浓重油墨、油灯和雪茄气味的编辑部，负责报社的各项杂事，处理像恩格斯一样逃亡在外的战友的需求，以及狱中战友的家人的需求。^[61]

奇怪的是，在科隆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候，马克思和燕妮都未曾想过，是不是应该让燕妮带着孩子离开科隆，返回特里尔。马克思很可能随时被捕，而且有迹象表明，数千驻军和科隆的武装市民都在寻找借口开战。但马克思和燕妮都没有对她的安全表现出特别的担忧。原因很可能是燕

妮的哥哥斐迪南，他在燕妮年轻时在特里尔参加舞会时，对她的保护便无处不在。最近，他在普鲁士政府升迁很快。斯蒂凡·波尔恩提到过马克思和燕妮非常少见的一次别扭，便是因为斐迪南。他听到马克思调侃燕妮说，“你哥哥那么蠢，没准将来能在普鲁士政府混上部长”。波尔恩说马克思的这番话让燕妮有些尴尬，虽然马克思经常表示看不上斐迪南，燕妮对他的亲情却很浓厚。⁽⁶²⁾ 他们的通信很温馨，彼此关切对方，虽然有政治夹在中间，他们依然亲密。⁽⁶³⁾ 斐迪南曾受邀到国王在波茨坦的宫殿，⁽⁶⁴⁾ 与多名政府高官关系密切——尤其与内政部长兼莱茵省总督弗朗茨·奥古斯特·艾希曼和即将担任内政部长的奥托·冯·曼陀菲尔男爵关系紧密。⁽⁶⁵⁾ 因此，他的妹妹虽然是声名在外的革命者的妻子，却也得到了他的保护。其他人却没这么好运了。

17

坚守堡垒

★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卡尔·马克思⁽¹⁾

《新莱茵报》复刊后，首先讲述的是欧洲反革命势力即将胜利。1848年10月6日，一出丑陋的剧目拉开序幕。奥地利战争部长泰奥多尔·拉图尔要求国民卫队协助皇家军队到匈牙利镇压独立运动，这使得本已因为目睹数月的倒退、眼睁睁看着3月时取得的革命成果即将不保而气恼的维也纳工人、学生和国民卫队更加愤怒。工人抓住拉图尔，用铁锤和铁棍对他一顿猛打，又用刀连续戳他，最后把他已经不完整的尸体挂在街灯柱上。国王马上离开维也纳，一边逃跑一边向工人许诺让步，以便顺利出逃。大多数资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留下。他们把大门紧紧关闭，担心维也纳陷入混乱，数月前学生领导的革命演变成工人的恐怖统治。皇家军队被从匈牙利召回，数千士兵向维也纳进发，要为国王和有产阶级夺回维也纳。

城内，多达5万工人、学生和国民卫队分发武器，建造街垒，准备战斗。抵达城外的奥地利军队约有7万人，等待进攻的命令。⁽²⁾10月28日，命令下达。政府军使用重武器轰击，战斗在4天内结束。事实证明，怒火终究不是大炮的对手。战斗中，3000名维也纳市民和

1300名士兵丧生。另外，还有2400人被捕，25人被处死。起义就此结束，如同梅特涅7个月前在维也纳下台一样，起义失败的消息同样震惊了欧洲。⁽³⁾

马克思对于欧洲各国政府1848年对待起义如此冷酷血腥感到愤怒，对懦弱的中产阶级面对如此残暴保持沉默感到心寒。他以罕见的愤怒语言在报上写道：“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⁴⁾

马克思虽然使用了这样煽动性的语言，但他清楚地知道暴力不是答案。之前数月的斗争让他知道：民众凭借街垒绝对不是国王和军队的手。仅仅凭借双手工作和战斗的人们无法在战斗中击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有国家和有产阶级的财富支持的军队。唇枪舌剑放在一边，马克思从10月底开始更加注重实际，寻找新的武器。他在捐税中找到了。马克思研究了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发现他们是相互依存的。他的结论与对这一关系的传统解读完全不同。各国君主宣称人民完全依存于政府，但在马克思看来，事实正好相反。统治者需要人民经营农场、工厂、商店、轮船和铁路。他们需要人民工作。此外，他们还需要人民把挣的钱交给政府。人民交的税支撑着他们的宫殿、议会和军队——换言之，人民让王国得以存在。这样说来，在专制国家，人民等于出钱让人给自己戴上枷锁。

马克思认为，当人民识破这个“经济秘密”——他们只要关闭捐税这个阀门，整个王国都会被击垮——君主自然会转向立宪政府。马克思在10月20日《新莱茵报》上对此进行了讨论，⁽⁵⁾奇怪的是，这一主题也引起了普鲁士议会的兴趣，后者在3月18日后的第三任内阁也倒台之后，已经被国王彻底削弱。

新任首相勃兰登堡伯爵属于保守派，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私生子。11月9日，他将普鲁士国民议会强行迁往位于首都以西35英里的小城勃兰登堡。为防止民众上街支持议会，4万名士兵进驻柏林，全城戒严。⁽⁶⁾议会别无他法，只得将目光投向选民，要求他们在议会被准许迁回柏林前，不要纳税。⁽⁷⁾

11月17日起，马克思用头号大标题在自己的报纸上不断重复“打倒捐税!!!”的号召。他还多次重复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在呼吁书中提出的号召。⁽⁸⁾几天内，在文件上签名的马克思、沙佩尔和卡尔·施奈德尔第二（律师和科隆民主协会主席）三人被法院传讯，被控罪名是公开号召叛乱。⁽⁹⁾这一指控并非毫无依据：从波恩到杜塞尔多夫，起义者都采用了反对捐税的口号，攻击和焚毁所有税收点。（虽然这些反抗行为一直未能壮大到足以对政府造成严重威胁。）⁽¹⁰⁾

马克思面对的法律压力全面加大。11月初，《新莱茵报》编辑部受到搜查，马克思因为报纸刊登的一封信被控叛国罪。⁽¹¹⁾12月初，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原因是《新莱茵报》⁽¹²⁾（被指为“邪恶的报纸”中最坏的）⁽¹³⁾被王室指控诽谤。开始有传言说，马克思将被逮捕。但马克思在写给仍在瑞士的恩格斯的信中说，自己会继续在报上刊登攻击政府的文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¹⁴⁾

马克思忙着应付各种官司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2月5日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并颁布“宪法”，授予自己随时收回给予的人民权利和宣战的权力，就此彻底杀死了9个月前降生的政府。他还大度地宣布重新进行选举（不是他想接受选出的议会的支配，而是需要做个样子，毕竟人民已经逼过一次宫）。马克思称这样的做法与政变无异。⁽¹⁵⁾

令人意外的是，“政变”好像对普鲁士有益——虽然是暂时的。国王恢复了自己认为合法的地位，剩下的只是扫尾工作，换言之，一劳永逸地把所有反对力量清除。

1849年1月中旬，时局转为安全，恩格斯返回科隆，帮助马克思度过这段被后者称为“极为困难的处境”。⁽¹⁶⁾之前数月因为面临被捕危险而离开普鲁士的战友大多都已回到《新莱茵报》。有的指控已被撤销，有的已被宣告无罪。恩格斯决定和马克思一同面对庭审。

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报纸发行负责人出庭，就报纸去年报道安内克被捕一事被控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警察，接受庭审。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众多听众，当庭做了反驳。

面对侮辱茨魏费尔的指控，马克思反驳说，如果《新莱茵报》这篇文章直接说茨魏费尔是人民的叛徒，那报纸的确有罪，但文章只是陈述说，茨魏费尔说过要取消民众三月革命时取得的自由，因此不构成侮辱

或诽谤。⁽¹⁷⁾马克思在抗辩中多次说到《拿破仑法典》和出版自由。他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他指出，文章表明报纸不过是在践行揭露事实的职责。最后，他回顾了过去数月的混乱，把庭审放到更大的背景中，认为这一案件必须考虑其历史背景。⁽¹⁸⁾“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法庭里叫好声一片。马克思从容坐下。⁽¹⁹⁾

接下来，恩格斯就文章提到逮捕安内克的警察中有一个喝醉了而对警察造成诽谤，进行了辩解。他说，文章连警察的名字都不知道，何来诽谤之说。况且，有证词印证文章的真实性：

.....

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位置：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你们就宣判我们有罪吧！

.....

陪审团没判他们有罪：所有罪名均不成立。⁽²⁰⁾

第二天，马克思回到法庭，参加因“拒绝纳税”言论而起的叛国罪庭审。同行的有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马克思的辩解长达近一个小时。为了说明他和其他被告有权拿捐税对抗政府，他带着陪审团回顾了一遍去年的历史。君主专制、贵族特权、商会、上当的农民——马克思说，选出的国民议会朝着经济进步、基本权利和现代社会迈进，但国王、军队和旧社会势力受到威胁，发动了政变。⁽²¹⁾他说：“当国王实行反革命

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利用革命来回答他。”他列举历史上把纳税作为革命武器的例子，美国的《独立宣言》便源自对抗英国的拒绝纳税起义。

“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力——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力。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到那时，人民就亲自出台，并且根据自己的自主权力来行动。”⁽²²⁾陪审团认可三人的行为属于践行权利范围，判定他们无罪，审判长还私下里感谢马克思的辩词让他大开眼界。⁽²³⁾

政府想通过法庭让马克思和他的战友销声匿迹，但莱茵省的陪审团并不配合，一次次取消指控或宣告他们无罪。但政府还有其他牌可打。科隆驻军司令写信给莱茵省总督艾希曼，说马克思“自从被陪审团宣布无罪以来愈发大胆，在我看来，是时候把他驱逐了”。他说马克思“用他的毒舌到处污蔑”。2月17日上午，警察局长收到一份正式的驱逐要求，说马克思自从去年4月来到科隆，行为就越来越危险和出格：“他凭借自己越来越出名的报纸，随心所欲攻击我们的宪法、国王和政府要员，还一直鼓动民众不满情绪，间接地煽动了民众造反。”⁽²⁴⁾

几天后，一份关于马克思的报告被直接送到内政部长曼陀菲尔的桌上。报告说马克思的确拿“所有人通常都尊敬和当做神圣的东西”不当回事，但驱逐他可能导致动乱。曼陀菲尔原则上批准驱逐马克思，但具体做法交由地方政府办理，后者决定等马克思自己给他们“直接的理由”驱逐他。⁽²⁵⁾

与其他被从普鲁士驱逐的人相比，马克思在煽动反政府情绪方面的作用更大。奇怪的是，他却得到了政府的更多忍让，这可能与燕妮对她哥哥的影响有关。担任西里西亚小城里格尼茨地区政府长官的斐迪南与所有能够决定马克思的命运、顺带决定燕妮的命运的人都能说得上话：过去数月，他为国王、勃兰登堡伯爵、威廉王储、艾希曼和曼陀菲尔做过事，有了交情。⁽²⁶⁾不论马克思得以留在科隆的原因为何，他受到的骚扰绝对不少。报社经常收到恶意邮件，甚至要面对人身威胁。⁽²⁷⁾曾有一名无衔军士带着武器，来到马克思和燕妮的公寓，向报纸报道军官私售军用物资讨要说法。他们说，科隆驻军全都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们要知道作者的名字，如果不把作者交出来，他们“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马克思很冷静，告诉他们可以诉诸法律，威胁没有任何用处。他把自己

放在衣服口袋里的枪露出枪托给他们看。会面陷入僵局，哪方都不想先动手。^[28]

在特里尔，打猎很普遍，马克思从小便学过射击，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对其他人开过枪。在之后数年里，他有时会因为沮丧和私人问题向敌人发起决斗，但我们不清楚他有没有那样做。他珍视生命（和工作），不想把生命交代在决斗场上。他宣传革命，但认为个体暴力毫无意义。待科隆局势缓和，家人不再受到威胁后，马克思提出正式抗议，形容那两名军士是“匪帮”，对于他们自认为代表法律、随便冲到平民家里的做法表示惊诧。^[29]

1849年3月底，经过数月的辩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终于推出宪法，让德意志联邦后来得以成为统一的国家。4月初，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宪法，理由不是宪法太过自由主义，而是觉得让自己担任全德国的国王，其他各邦的国君恐怕并不愿意。国王终究背弃了去年做出的承诺，更加自由的各邦人民对此予以嘲笑，甚至中产阶级都重新考虑起义的可能性。^[30]4月15日，在全联邦的反对声中，马克思离开科隆，到德国各地评估局势，为报纸筹集资金，与工人组织建立联系。^[31]他把家人的安全托付给了恩格斯。^[32]

离开前一天，马克思走出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要的一步，正式断绝了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之前，他一直出于实际需要与民主派联盟，因此饱受批评。经过一年，马克思目睹的这些自由主义者说好支持工人，却一次次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出卖工人，马克思受够了他们，断然退出莱茵省民主联盟。^[33]马克思传记作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奥托·门琴-黑尔芬认为这是马克思彻底加入无产阶级联盟的时刻。他再也不会寻求与资产阶级达成政治妥协。^[34]

马克思离开科隆3周。旅途期间，这位工人阶级的拥护者刚刚宣布与中产阶级永远断绝关系，接下来便在汉堡一家高级旅馆住了两周。^[35]他还时不时给自己放放假，离开贫困，享受一番最好的旅店和疗养。他好像喜欢美好的环境，这是他的一个弱点，也给了敌人口实攻击他：在他一生中（甚至在他死后），都有人说，他表面上同情受压迫者，暗地里也是精英阶层。但这误解了马克思。他不反对任何人享受，只要是他们自己挣来的，没有剥削他人。从马克思的信件判断，他喜欢跑进上层

阶级中，专门做他们的对立面，让他们一点一点喜欢上自己的陪伴（他们确实会如此），再看他们的反应。但在汉堡时，他放纵自己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知道乞讨背后的心理学：如果只想要到一点钱，直接伸手就行；但如果想要到更多，最好装作自己不需要钱。他真的需要钱：他和燕妮几乎已经花光所有积蓄，大部分用在了报纸的开支上。但他又特别不善于要钱，5月9日回科隆时比离开时还穷，只得借钱支付旅店的账单。^[36]

坏消息还不止于此：他的驱逐令下来了，签署的日期是5月11日，但直到5月16日才送到他手上。《新莱茵报》对德国最后一个革命浪潮的报道给了当局一直寻找用以驱逐他的借口。^[37]

随着国王拒绝建立统一的德国，冲突开始在德国出现。在柏林以南的撒克逊邦首府德累斯顿，巷战持续将近一周。4月时来到德累斯顿听朋友里夏德·瓦格纳在德累斯顿歌剧院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巴枯宁留了下来，5月初与瓦格纳一起在一个城区坚守街垒，位于另一个城区的歌剧院已被烧毁。巴枯宁建议大家带上所有炸药，冲进市政厅，也不用再出来了，直接点燃炸药。^[38]（他没有执行这一计划，反而逃走了，三天后被捕时，身上还带着在普鲁士逃亡期间写的色情小说。）^[39]

马克思刚从筹集资金之旅返回，一直在科隆编辑部观察斗争走势并为莱茵河谷起义草拟计划的恩格斯便从刚刚袭击了索林根附近弹药库的工人手里弄来两箱弹药，然后去埃尔伯费尔德参加起义了。^[40]恩格斯帮忙修建街垒，之后到区内各处查看起义情况。恩格斯在埃尔伯费尔德与巴门之间的桥上指导炮手时，被他的父亲发现了。他系着革命的红丝带，毫无疑问是来这儿发动起义的。他和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41]同时，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一些中产阶级组织者开始担心来自科隆的“红色”会让起义比预期更加激进。他们要求恩格斯离开。^[42]恩格斯同意，但走之前，执行了一项被他称为“侦查”的任务。他和两名战友佩带军刀和手枪，骑马到埃尔伯费尔德附近的一处军方弹药库，抢了很多武器和装备回来，交给街上的起义者。^[43]这件事又给他带来一张逮捕令。^[44]

虽然被赶走，恩格斯离开埃尔伯费尔德时的兴致并不比来时稍减。他希望在为德国统一而举起的黑、红、金三色旗的激励下，莱茵省的这

次战斗会与以往不同，会最终发展为对抗国王的战斗。他在《新莱茵报》上写道：“看人民这一次是不是又到‘脱帽’而止。”⁽⁴⁵⁾恩格斯对柏林人没能直接对抗国王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即使失败，至少也“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⁴⁶⁾

《新莱茵报》员工加班加点发行特别版，报道起义情况。办公区域极为拥挤，印刷机一刻不停地工作，撰稿人忙着完成最新的报道，交给排字工人仔细排版。伴着昏暗的油灯工作到深夜的马克思抛弃了谨慎，直接号召人民对抗国王，⁽⁴⁷⁾后者经过一年的假意改革，终于道出了真实想法：对付民主派的唯一办法是军队。⁽⁴⁸⁾马克思在报纸上把弗里德里希·威廉称为冯·霍亨索伦先生，直接免去了他自认为神授的国王称号。⁽⁴⁹⁾两天后，政府向马克思发出驱逐令。

期限在临近，报纸抓紧时间，在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发行了最后一期。这一期从头到尾充满反政府言论。马克思写道：“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他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编辑部在告别中劝告科隆人民不要造反，因为他们会失败。他们感谢读者，保证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⁵⁰⁾这一期全部用红色油墨印刷，广受欢迎，卖出2万份，是订阅人数的3倍多，有的价格涨到原价的10倍。⁽⁵¹⁾恩格斯骄傲地回忆说：“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⁵²⁾后来有报人冷漠地说，这期报纸成了收藏家的藏品。“经常听说有人花大价钱把这期报纸裱起来。”⁽⁵³⁾

但这些给不了马克思任何帮助。他和燕妮再次需要匆忙收拾，仓惶离开，以免最后被强行赶出边界。燕妮把东西收拢了一下，把他们唯一还值点钱的纯银餐具放进一只借来的箱子里。她把马克思的300本书托付给了帮他们在科隆找到住处的罗兰特·丹尼尔斯医生，把家具一件件卖掉，以便凑齐路费。⁽⁵⁴⁾马克思则在处理报社的事情。他把设备卖掉，付钱给股东、印刷工和其他员工。剩下的设备和材料转给了科隆另一家民主派报纸《新科隆报》，后者出版了一期黑边报纸，哀悼《新莱茵报》的终刊。⁽⁵⁵⁾

报社员工大多迅速离开了。恩格斯说至少还有 23 件案子悬在他们头上，自然要趁着还能走掉的时候尽快离开。⁽⁵⁶⁾ 报纸最后一期一开售，马克思、燕妮、琳蘅、三个孩子和恩格斯便坐船顺莱茵河离开了科隆，先到宾根，然后转道法兰克福。⁽⁵⁷⁾ 燕妮在法兰克福短暂逗留了一下，把银器当掉，“把我刚从布鲁塞尔典当行赎回来的纯银餐具又当了，换成现钱”⁽⁵⁸⁾，然后，她和马克思分开，带着孩子返回特里尔。虽然不得不又一次流亡，燕妮还是自信地写信给朋友说：“我们目前面对的压力正说明我们的思想即将取得更彻底的胜利。”⁽⁵⁹⁾ 她不过是在学马克思的乐观。虽然挫折不断，马克思依然相信——至少表面上——政府会被推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克福留了下来，请求全德国的起义者联合国民议会，集中力量，统一策划，对付柏林政府。毫无结果后，他们前往巴登，劝说巴登的战斗者转移到法兰克福。但没人愿意挽救倒霉的议会，他们只得返回宾根。

正当马克思已经放弃德国，准备离开时，他被捕了。回到宾根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军队抓住，一路带到法兰克福，关押了几天。被释放后，两人决定分开走。马克思和红色沃尔弗去巴黎等燕妮，德意志各起义邦的代表团已经在巴黎忙着寻求帮助和认可。恩格斯去巴登参加战斗，他的战斗基因指导他去战斗。他认为起义者必须表现出进攻者的样子。他说，“防守是所有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⁶⁰⁾

实际上，战斗已经结束，政府军已经开始清除残余的反抗力量。欧洲的国王和君主们再次坐稳了王位——但法国除外。⁽⁶¹⁾

18 梦碎巴黎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

——卡尔·马克思⁽¹⁾

有时，从重大事件的灰烬中站起来的人物很特别。法国 1848 年春天的混乱中，便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就是“他”——在一场很具现代特色的宣传运动中，免费发放的纪念章和版画上都是他，那个最终出现拯救一切的人。当巴黎人相互残杀，农村人胆战心惊，担心城市里的暴力扩散到小镇和村庄时，这个未来的救星就在伦敦，等待着合适的机会到来。他已经无处不在，巴黎的墙上贴满关于他的海报，他虽不为人所知，却有一个令人安心和熟悉的名字。

“他”就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波拿巴之侄。他相信自己也应该成为法国的皇帝。林荫大道上的手风琴师和街头歌手被人雇用散布消息，说一个叫拿破仑的人即将归来。对很多法国人而言，这个名字意味着稳定、工作、食物甚至财富——简言之，他们缺少的一切。⁽²⁾

路易·拿破仑在巴黎出生，瑞士长大，除了历史，与法国没有真正的关系，但在此之前已经在法国政坛试过两次水。⁽³⁾两次均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尤其如此。第二次时，他在1840年8月回到法国，穿戴如皇帝般。头上雄鹰相随，但这都不如他藏在帽子里的一片培根更能衬托他的不凡。他宣布法国将由自己领导，在布洛涅竖下皇旗。国民卫队很快将他逮捕，罪名是试图发动政变。⁽⁴⁾他被判终身监禁，囚禁在法国北部，但6年后（到这为止在这个国家待得最久的一次），他乔装成工人，逃往英国，继续策划坐上他叔叔曾经坐过的皇位。⁽⁵⁾

1848年5月，时机来临。路易·拿破仑虽在法国声名不显，但当他的名字出现在国民议会选举的选票上时，还是引起了轰动——他代表4个区获得胜利。⁽⁶⁾政府被吓坏了，担心这个逃亡者凭借名字的优势，真的进入国民议会，其他官员马上与他竞争。路易·拿破仑很有风度地退出，返回英国，等着法国的政客们意识到，一个软弱的拿破仑（他这样扮演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力、可塑的符号，带领法国复兴。他没有权力基础，必须依赖目前的政府领袖。他知道，政客总能找到光在哪里。9月，他回到法国，进入国民议会。⁽⁷⁾

路易·拿破仑长相难看：头部和身躯庞大，双腿却瘦小，面容呆滞。他的法语很差，外国腔很浓。不过，迎接他回来进入议会的政客们还是控制着他爬向更高的位置。他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通过他，在给民众以虚假的安全感的同时，还能让数十年来操纵政权的人继续控制法国。⁽⁸⁾12月总统选举时，路易·拿破仑赢得超过500万张选票，与他最接近的卡芬雅克不过赢得100万张。⁽⁹⁾

但这位新拿破仑可不像他装的那么傻。最开始，他迎合法国人的需要，让他们把希望、梦想和未来寄托在自己身上，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在第一年里一直藏着。的确，他最需要做的是了解这个他被选出来领导的国家。法国已经被政治争夺、猜疑和仇恨拖垮。去年的伤口远未愈合，极左势力和工人虽被击败，但并未消亡，路易·拿破仑需要巩固政府，以应对必然而至的挑战。但挑战来得不会太快：政府四分五裂，反对势力更甚；工人尚未从去年六月的斗争中恢复过来。

6月9日，马克思抵达巴黎时，城内正爆发亚洲流行性霍乱，夏日的热浪已经来袭。他在政府中已经没有朋友，为了安全起见，他在旅途中化名兰博兹先生。⁽¹⁰⁾1849年6月的巴黎与1848年2月的千差万别，但法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曲线与欧洲并无不同，经过了一样的演变过程：

从起义初期的畅快，到政治不稳，暴力频发，保皇势力重新组合，工人阶级独力战斗，最后又回到反动政府统治，只是统治阶级多了新的成员——企业家和金融家。

马克思对于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在面临选择自己的利益还是无产阶级这个他们并不了解的阶级的利益时，抛弃了无产阶级，虽感到厌恶，但并不诧异；对于庞大的无产阶级无法联合起来对抗压在头顶的政权，虽感到沮丧，但同样并不诧异。他有信心，“四百万没有稳定收入”的法国工人阶级终究会站起来。^[11]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巴黎是一片阴沉。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目前在巴黎这样逼近。……我正同所有革命派会晤。”^[12]

6月13日，革命逼近的期望实现。在国民议会中属于少数自由派的赖德律-洛兰反对路易·拿破仑进攻罗马以恢复教皇为所有教皇领地元首。^[13]其民主倾向曾推动西西里1848年起义的教皇，在罗马陷入政治混乱、一名亲密伙伴被暗杀后，逃离罗马，罗马趁机宣布成立共和国。^[14]路易·拿破仑认为帮助教皇能让自己赢得法国天主教徒的支持，在领土问题上处于更有力的位置，展示干涉欧洲事务的拿破仑传统——当然不再通过侵略。^[15]

议会驳回赖德律-洛兰就进攻罗马一事弹劾总统的议案后，他的支持者蜂拥而出，试图煽动市民。^[16]马克思虽然对革命乐观，但从1848年6月起，政治和社会氛围已经降温。造反派控制了一所学校，号召修建街垒，但据马克思说，最多能在街上找到几把破凳子。^[17]抗议徒劳无功，反而展示了所谓革命者的无能，让路易·拿破仑的镇压更加严厉——宣布戒严，对流亡者实施更多限制。政府不希望巴黎再次成为各国煽动者的避难所。^[18]警察认为德国人是某个国际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因此尤为注意德国人。马克思早期传记作家认为这个组织只存在于安全部队的丰富想象中——但其实，恐怕也存在于马克思的想象中。^[19]显然，他说什么都无法改变各国政府对灾难的想象。

燕妮、琳蕙和孩子们在7月7日抵达巴黎。燕妮从前总是不愿离开母亲，但这个夏天她期盼着离开。她告诉朋友琳娜·舍勒尔（后者在埃德加去美国前与他订了婚），母亲担心金钱，又上了年纪，变得冷酷和自私。“我这次在特里尔没有回到家的感觉。那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那里的人也不总是原来的样子。”而且，她想念巴黎。⁽²⁰⁾

燕妮又怀孕了，她和家里的小旅行者们带着在科隆收拾的行李，先是坐马车到布鲁塞尔，之后转火车到巴黎。她说，自己的旅途愉快而平安，但这应该与旅途的舒适关系不大，重要的是到了让她着迷的巴黎。经过一年在科隆忍受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铁腕统治和驻军的威胁，路易·拿破仑反动统治下的巴黎反而让她觉得自由。“巴黎眼下灯红酒绿、奢侈淫靡到了极点。贵族和资产阶级觉得，自从不幸的6月13日以来，……自己又安全了。……早在14日，所有隐藏起来的大人物就坐着豪华马车、带着穿镶边制服的仆人，从他们的洞穴中爬了出来。因此，富丽堂皇、五金十色的街道上此时人流滚滚、车水马龙。孩子们……总是紧盯着不放。”

这是她喜爱的城市，想要的家。她做新娘时便在这里度过，当时离开也非她所愿。她向琳娜描述说，他们在距离巴黎大概一个小时路程的帕西租下了一处房子，有6到10个房间，价格合理，离海涅的新家很近，装饰考究，带花园。⁽²¹⁾不过，他们目前住的地方在荣军院附近，周围环境良好，房子不大，但漂亮、舒适。红色沃尔弗和他们一起住，她还邀请琳娜（被马克思称为“红色的疯狂的罗兰”的沃尔弗对她非常着迷）来看望他们，顺便看看巴黎有多美。⁽²²⁾

就在燕妮兴高采烈地讲述他们的近况时，马克思却在四处写信找钱，支撑家用。他显然把坏消息都瞒着燕妮，燕妮并不知道他们通常就紧张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已难以为继。在科隆时，马克思已经把剩下的遗产都花在了报纸的经营上。马克思告诉约瑟夫·魏德迈，自己已经一文不名，问他能不能帮自己找些钱。他还极为乐观（即便算不上言不由衷）地说，自己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很快就将重新开售，到时就能有些收入。“如果可能的话，就请你办这件事，但是不要告诉别人。告诉你，如果我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援助，我就完了，因为我全家都在这里，而且我妻子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²³⁾他还向在巴登和起义者并肩作战的恩格斯求助：“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闭门不出，更不能陷入经济困境。”⁽²⁴⁾

但钱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燕妮写信给琳娜描述自己在众城之城的生活5天后，有人敲门。她安全和快乐地生活在巴黎的梦想被击得粉

碎。燕妮后来在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那名熟悉的警官来了，通知我们，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太太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马克思被定性为不受巴黎欢迎的外国人。^[25]他试图说服当局，自己没有其他意图，只专心写一本经济学著作，但1845年让他得以留在布鲁塞尔的说法在1849年的巴黎不再管用。^[26]马克思之前提醒过通信人，法国警察可能在检查他的信件，如果是这样，他如何辩解都没用，他显然就是一个为着早日实现他所说的“革命的复兴”而奋斗的激进分子。^[27]

按照驱逐令，马克思一家可以搬去巴黎以西近300英里的布列塔尼地区莫尔比昂省，但马克思说那里满是沼泽，疾病丛生，去那里与被判死刑无异。他提出申诉，好在法国官僚办事缓慢，让他有了一个月的缓冲时间。^[28]但这一个月并不好过，他说好像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29]而且，燕妮和孩子们都病倒了，他要充当“男护士”。^[30]在信件中，他把燕妮的这种状态归结为怀孕，但实际上，她很可能是因为4年里4度被迫搬家而感到沮丧。燕妮一生中经常在家庭困难的重压下病倒，这时，琳蕙就会充当女主人的角色，马克思（他对压力导致的疾病并不陌生）则总是对外说燕妮的疾病是身体上的。

马克思却能够利用对思想和党的追求来消除个人烦恼的影响，善于把事业和个人生活分开。（有作家说，马克思认为屈从于个人苦难是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在斗争中是不可原谅的。）^[31]在7月写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封信中，谈到一桩涉及金钱的争论时，马克思说，他们应该多谈谈政治，以摆脱这种不愉快的私事。^[32]当他在7月极为艰苦，身无分文，不知未来如何时，他写信给魏德迈说：“不管目前的情况对我们个人的处境来说是如何不利，但我还算是心满意足的。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他认为，去年击败欧洲工人阶级的各方已经出现利益冲突，相互对抗。^[33]

整个夏天，马克思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困难，想了各种挣钱的办法，比如写一些论经济问题的小册子，在柏林筹办新报纸。他甚至找到原来的出版商列斯凯（凭借那本没写的经济学著作向对方预支的稿酬尚未归还），问他有没有兴趣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所有办法均无进展。8月中旬，他的申诉最终被驳回，他或者搬去布列塔尼，或者马上离开法国。他的前景比离开科隆时更加黯淡。^[34]

别无他法，马克思写信给年轻的德国律师和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寻求经济帮助，以便全家搬离法国。他让拉萨尔对此保密，但后者显然公开讨论了他的经济状况，让他大为不满。马克思不能忍受被视作弱者、无能，也不愿敌人知晓自己个人的苦痛。⁽³⁵⁾他告诉弗莱里格拉特说，这件事把自己“气坏了”，自己“宁愿过最拮据的生活，也不愿公开求乞”。⁽³⁶⁾虽然骄傲，但他还是接受了拉萨尔的钱。别无他法。

马克思申请护照，以便搬去瑞士，但法国政府只肯给他去英国的通行证。⁽³⁷⁾8月23日，马克思写信给在瑞士的恩格斯说，自己将前往伦敦，燕妮会多留一段时间，料理一些事务。⁽³⁸⁾在之前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提到他们应该创办一个文字或商业事业。⁽³⁹⁾前往英国前，他恳请恩格斯也去英国，说在伦敦创办德文报纸的钱已经落实。“我对此事的估计是肯定的。你不能留在瑞士。在伦敦我们将有事情干。——我估计你一定不会置我于不顾的。”⁽⁴⁰⁾

马克思第二天便离开法国，8月26日渡过英吉利海峡。⁽⁴¹⁾燕妮、琳蕙和孩子们在巴黎多留了两周，但不断被并不情愿他们留下的警察骚扰。⁽⁴²⁾如果说和马克思第一次被从巴黎驱逐，众多朋友落入同样的政府陷阱时，燕妮便感受到了政治的危险，这次她感受到的是恐惧。她已怀孕7个月，巴黎的炎热让她无法外出，又没有朋友能帮忙。在巴黎与马克思家最亲近的海涅双臂已难以活动，他说自己的双腿感觉就像棉花，体重下降到了70磅，瘦得皮包骨般。他同时服用3种吗啡来止痛，从不离开房间，海涅虽然继续写诗，但依靠口述，由于下颚已部分瘫痪，说话的声音很低。⁽⁴³⁾燕妮已经无法指望挽救过她的女儿的诗人再来挽救她。

不到一个月，燕妮为自己和家人憧憬的巴黎美好未来便破碎了。她只得去英国，一个不了解的潮湿寒冷的国家。带着弗莱里格拉特慷慨解囊的100法郎，燕妮和琳蕙带着孩子们（已经分别5岁、3岁和2岁）在9月15日出发前往加莱，从那儿坐船去英国。⁽⁴⁴⁾很多她们认识的人都走过这条路线，她试着从中寻找力量。她说这些人“为了摆脱剥削者的统治，拿起剑和笔战斗，被逼到国外照样能找到活路”。但对她而言，经过6年的颠沛流离，到英国只有一个急迫的目的：她需要一个地方休息。⁽⁴⁵⁾

流寓伦敦的家庭苦难

- 19 伦敦新家 / 160
- 20 小福克斯之死 / 174
- 21 黄金时代的艰辛 / 182
- 22 流亡者的指挥中心 / 194
- 23 家庭生活的苦乐 / 208
- 24 穆希之死 / 218

19 伦敦新家



伦敦就像地狱……公平凤毛麟角，怜悯踪迹难寻。

——珀西·比希·雪莱⁽¹⁾

在 1849 年，哪怕体魄再强健的人，横渡英吉利海峡都极为辛苦，燕妮更是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才熬过这 2 天的旅程。她已经 35 岁，怀孕 7 个多月，自从 5 月被迫离开科隆以来，一直在奔波。天气寒冷，她的身上湿漉漉，加上晕船和照顾孩子（一样湿漉漉，寒冷，难受），燕妮筋疲力尽，不过总算上了船，顺泰晤士河而上，她相信很快就能与丈夫会面。但马克思并没有在码头迎接他们。他得了一种很像霍乱的病，因此，马克思派诗人朋友格奥尔格·维尔特去码头接他们。维尔特领着燕妮、琳蘅和孩子们乘坐马车，在大雾中，来到他们冷冰冰的新家：一个德国裁缝经营的一家旅店，位于伦敦西区中心莱斯特广场附近。燕妮先住下，等丈夫病好之后，再找固定住处。这期间，马克思与被他称为和金钱结了婚的德国朋友卡尔·布林德一起住在高档的格罗夫纳广场。⁽²⁾

燕妮独自坐在炭火不足的狭小房间里，思索未来。她的悲伤不难想象，她又一次被迫离开明亮、华丽和欢乐的巴黎，来到一个并不了解、语言又不通的城市。但这次转移比之前更艰难，因为家庭更庞大了，钱却少了，退路也少了。伦敦处在欧洲边缘，是成千上万像他们一样别无去处的旅者的终点。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英国收容有流亡的君主、罪

犯和起义者，给因起义或镇压而逃来的人以虚幻的自由。有意大利来客愉快地写道：“从统治五千万人的专制君主，到挨饿的手风琴师和扫大街的女孩，这片庇护之地向所有人平等开放。”⁽³⁾但英国改革者哈尼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流亡者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的自由：他有自由“上岸来到我们的土地，到污浊的天空下享受饥饿”。⁽⁴⁾

正如马克思的曼彻斯特之行，燕妮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最大和最富庶的城市，居然如此肮脏、嘈杂和穷困。伦敦也有能让她感到自在的地方，比如格罗夫纳广场。这里所有房子的房间都烧得暖暖的，人们穿着丝绸衣服，舒服地依偎在带靠垫的椅子上，这种舒适感绝对能让她想起特里尔的家。甚至在有些区域，人们安于贫穷，虽然财富不多，却保持着应有的风度，受人尊敬。但在莱斯特广场附近，丰富无影无踪，连假装的体面都寻不到。燕妮的行李箱里还装着当年初到巴黎时买的精致衣服，名片上还写着“冯·威斯特华伦女爵”。她与这片冷酷、灰暗的区域格格不入，呼吸的肮脏的空气中都蕴藏着一丝绝望的味道。

的确，马克思一家人抵达时，伦敦正进入大雾最浓的季节，整日看不到太阳。大白天，虽然有小孩专门被雇来举着油灯或灯笼站在高处，照向人行道，陌生人来到这儿，还是会分不清方向。⁽⁵⁾有外国人说大雾浓得你跟别人握手时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加之臭气熏天，这里的空气让人窒息。

每天，成千上万匹马拉着私人 and 公共马车行驶在伦敦泥泞的马路上，排泄的粪便多达 100 吨。伦敦人把粪尿倒进挖出的化粪池里，马粪的味道与池子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让人不敢呼吸。⁽⁶⁾在西区和索霍区这样拥挤的区域，有些池子里的粪便深达 3 英尺。⁽⁷⁾燕妮来到伦敦这年，伦敦人开始把粪便倒入泰晤士河，但这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更加棘手。散发出恶臭的污泥顺着伦敦早期的排泄系统随着水流来回循环，本应让城市更清洁的大河变成了臭水沟，穿过城市中心，不但散发出恶臭，还传播疾病。⁽⁸⁾1849 年，伦敦刚刚度过一个霍乱疫情周期。索霍区和莱斯特广场周围的区域疫情最为严重，部分原因是这里穷人聚集，每个角落都有人居住。⁽⁹⁾

1845 年后，马铃薯枯萎和经济危机催生了大规模移民，成千上万

欧洲人和爱尔兰人来到伦敦西区和索霍区。他们来到这些区域是因为之前已经有本国流亡者在这里开辟出小块的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聚集区，这里不用讲英语，不用按照英国人的方式生活。但新来者经常受到剥削，支付昂贵的租金，直到口袋被完全掏空。结果，很多无依无靠的不幸者只能流落街头，与伦敦庞大的流浪人口竞争，急匆匆寻找差事，即便踩到躺在臭水沟里的难民，也不会放慢脚步。无助又寒冷的难民只得到巷子里找地方栖身，随着越来越多的穷人聚集进来，这里逐渐变为城中之城，有自己的法律，甚至语言。⁽¹⁰⁾

同时，莱斯特广场周围几个街区有超过 100 处酒馆，规模都不小，耀眼炫目，只要口袋里有一个先令，就可以买上一杯，享受一番。⁽¹¹⁾实际上，这片区域氛围多样：滑稽的、黑暗的、热闹的，全都有。卖马铃薯、咖啡、热鳗鱼、豌豆汤、果饼和干果的小贩排成一排。贩售暴力或色情小书的贩子绘声绘色地进行推销（当然，不管是暴力还是色情内容都被他们夸大了）。诗人和剧作家站在角落里，声情并茂地朗诵自己的作品。但最显眼的还是意大利人。大约 800 名意大利男孩（其中很多是被贩子卖到英国的）带着宠物猴或训练过的老鼠，在街头做手风琴师，演奏的曲调跑调得让人难以辨认出是罗西尼或贝利尼的曲子，挣来的钱则要交给在克勒肯维尔和萨夫伦山给他们提供住处的旅店老板。⁽¹²⁾

这样的嘈杂，这样的生活甚至带有一丝圣维特斯舞蹈症的色彩。他们停不下来，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恐惧。燕妮经常看到像自己一样的难民被生存的压力逼得发疯。这，将是他们的新家。

马克思像很多其他流亡的“四八年人”一样，到伦敦时依然带着去年的激情，想着要带领之前已经差点让欧洲改天换地的革命力量走出低谷。起义虽然被政府和有钱人镇压了，但马克思的激情反而更加高昂。中产阶级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利，商业自由也扩大了，但工人阶级的境况反而每况愈下。他们依然在工厂里劳动，生产产品，依然在受到剥削。他们依然没有政权，依然被无视。让他们得到注意的，是人们依然清晰地记得的巴黎、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街垒，但这些记忆带来的却是警惕和怀疑。

马克思相信斗争不该如此结束，他期待下一次起义的到来。他预测下次起义的领导者将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店主、小商人和小官僚），

他们的生计受到贪婪的大资产阶级的威胁，在最近的起义后又一无所获。他们会诱惑工人加入他们，共同对抗统治阶级。马克思不情愿地承认，这样的联合不可避免，但不会长久：“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3]

但马克思远在英国，如何让欧洲大陆的工人做好准备，迎接这次社会革命呢？这就需要有一个组织、一份报纸和一个章程，来赢得他们的信任。马克思重新投身政治。他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重新建立联系，打算在伦敦重组同盟，并协助建立了一个流亡者救助委员会。他的重心是创办一份报纸。他的目标是一份德文月刊，80页左右，以后逐渐改为周报或日报，向全欧洲的流亡共产主义者发行，最重要的是，在敌人的腹地德国发行。随着同盟扩大，作为同盟的公开机关报，报纸将在欧洲大陆同胞不能自由地表达观点时，在伦敦帮他们表达，从而向反动政权施压。^[14]

报纸需要资金，马克思没有，其他盟员也没有，他们大多是像他一样的流亡者，但马克思有信心找到资金。他告诉弗莱里格拉特说，最初的几周最艰苦。这期间，他在红狮酒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给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讲授经济学，比如“什么是资产阶级财产”。^[15]他想，如果授课成功，以后可以重新登在报纸上。

这年马克思32岁，看起来很像一名大学教授。他身穿衬衫和一件破旧的暗色及膝礼服，除了这身传统绅士打扮，脖子上还系了一条围巾。蓬乱的蓝黑色头发有了一丝灰白，但胡子黑亮如旧。他不戴眼镜，只在右眼戴了一片镜片，让他本就敏锐的目光更加具有穿透力。^[16]他在黑板上耐心地解释一些规则和理论，正是这些规则和理论被认为构成了他的《资本论》的基础。听众大多是年轻的革命伙伴，虽然他们极为欣赏这位带有浓厚莱茵省口音的老师的授课，但他们是工匠或知识分子，不是同盟需要招募的工人。刚刚抵达的难民中有工人的身影，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马克思到处寻觅资金，帮助他们。^[17]

但想找到资助，并不容易，竞争很激烈。此时的伦敦有很多流亡者组织，其领导人在1848年起义中获得一定权力后，很快只得流亡英国。他们在这里建立的组织虽都不大，但竞争激烈，都想获得资助、关注

和政治支持。德国人尤其以吵闹出名——相互之间如此，面对其他流亡者组织也如此。此外，他们还最为色彩多样。⁽¹⁸⁾在相对更加单色调的英国人眼里，这些德国工匠和工人可谓怪诞，穿着吊带皮裤，装饰着镶边和流苏的外套还带个绿色的兜帽，尖尖的帽子上还要点缀上一缕头发，手指上戴满象征地位和职业的指环。⁽¹⁹⁾酒馆里的他们更是让其他顾客侧目，坐下就喝上一宿，他们的身体构造好像多少啤酒都能装下。德国人坚决、强健，既然在英国不会呆太久，自然觉得不需要适应和改变。

所有流亡者组织的领袖都自视为这场将让他们的革命得以胜利完成的新运动的领袖。他们成立委员会，制定策略，甚至建立临时政府，但除了自己 and 一小撮追随者，无人承认。他们昂首阔步，虚张声势，自以为有权有势，甚至相互攻击，以便保持支持者的战斗精神。但他们招募支持者的机会极为有限，只能到伦敦码头去找那些不幸的流民。他们争相帮助新来者，虽有出于同情之意，但同时也是为了扩大力量，为下一轮革命斗争做准备。

马克思没有像他们一样。他嘲笑他们是“民主的独裁者”，每天晚上在最喜欢的酒馆随意把身边的人任命为新部长。马克思虽然一生被指责抱有专制野心，但他很明确，不想成为任何国家（真实的亦或想象中的）的领袖，也不需要民众的赞扬，有战友说他当时认为民众“愚蠢，思想和情感都被统治阶级所支配”。⁽²⁰⁾他不想领导他们，但愿意教导他们，因为如果他的历史进步理论是正确的，他们代表着未来。⁽²¹⁾马克思相信，只有他们能击败统治阶级，但他们首要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发挥自己人多的优势。共产主义这种他认为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要想实现，就必须通过这些每天登上伦敦码头来到英国的人，通过他们发动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知道，要想尽快在他们中间建立起基础，就必须给他们最需要的——这时还不是理论，而是物质帮助（人有梦想之前总要先吃饱）。他和伙伴们向德国的改革者呼吁，帮助这些成千上万来到英国的无助难民：

.....

早上不知道晚上在何处过夜，而晚上又不知道明天早晨能在何处觅食。……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

是共和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和利益的拥护者，现在则由于同样遭到驱逐和同样遭受苦难而团结起来了。半数国民身穿破衣烂衫在他人门前乞讨。我们的流亡同胞也流落在这世界繁华都市伦敦的寒冷街头。……在这个城市的各条街道上都可以听到被流放者用我们的母语发出的怨声。⁽²²⁾

.....

他们在呼吁书中说，救助委员会委员不会从中领取任何救济金，并承诺每月公布花费明细。11月中旬，接受救助的家庭有14家，很快这一数字增加到60家，并在后来增加到500家。⁽²³⁾他们在索霍区建起公共宿舍和食堂，还建起一个小工厂，让流亡的难民练习手艺。⁽²⁴⁾

马克思周围开始出现一个团队，一起做救助工作，包括维尔特、红色沃尔弗、卡尔·布林德、盟员亨利希·鲍威尔和奥古斯特·维利希（前普鲁士军官和贵族，后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燕妮一如既往地做类似秘书的工作，恩格斯也很快来到英国帮忙。

自5月离开科隆后，恩格斯与马克思和燕妮便少有联系。恩格斯如他自己所说“身佩战刀”，直接去了巴登，担任维利希的副官，和大约800名志愿者一起战斗。巴登是德国起义中的最后一次碰撞，恩格斯对这段经历感到兴奋。⁽²⁵⁾6月天气炎热，军服换成了短袖，起义者大军中不再有社会等级区分。⁽²⁶⁾恩格斯在信中对燕妮说：“我参加了四次战斗……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²⁷⁾

巴登起义者的人数大概在6000到13000之间，却要面对6万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军队。⁽²⁸⁾牺牲者不在少数，其中就包括1847年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盟创始人之一莫尔。⁽²⁹⁾莫尔死后不久，恩格斯的部队面对失利的局面，转移进入瑞士境内，之前已经有1万人先行抵达。恩格斯想去英国与马克思会合，但边境已经关闭，直线经过法国的最短路线无法通行。10月初，他先向南到意大利的热那亚，然后经过一段长长的（显然也更愉悦）海上旅程，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英国。⁽³⁰⁾

燕妮到伦敦后，在莱斯特广场没住多久，便在一个能讲英语的朋友的帮助下，在切尔西国王路附近找到一处两居室的公寓。这里虽不像如今这般时尚（切尔西的居民大多也像马克思主义家一样穷困），还是比索霍区强上不少，燕妮也总算及时找到一处地方生下第二个儿子。⁽³¹⁾

1849年11月5日，当燕妮因为分娩的阵痛而喊叫时，整个城市好像都在回应。公寓下面的街道上聚集了一群喧闹的人。从窗户可以看到他们在燃起篝火，听到他们喊着“盖伊·福克斯万岁”和“谨记11月5日这一天”这样不明所以的话。原来是盖伊·福克斯日，英国人在纪念17世纪时天主教徒企图谋杀国王和议会成员的阴谋失败。戴着面具的孩子骑着木驴，穿着破衣碎布的“盖伊”们站在车上，用扫帚柄顶着各种面具，举得高高的，吓唬楼上的人。乐队奏乐，民众唱歌、跳舞、饮酒，纪念那场对暴乱者的胜利。⁽³²⁾

马克思和燕妮觉得第四个孩子亨利希·吉多·马克思出生在反政府行动的纪念日是个好兆头，便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小福克斯，以纪念福克斯这位伟大的阴谋家。⁽³³⁾但小福克斯一生下来身体就不好。家里请不起奶妈，燕妮便亲自给他喂奶，但他总是疼，没日没夜地哭，燕妮觉得这是因为他通过奶水从自己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忧伤和内心的痛苦”。⁽³⁴⁾马克思的战友们彼说，“这个出生在马克思家的小共产主义者……每一声嚎哭，都揪着大家的神经，不过，他会很快好起来的”。⁽³⁵⁾他没能好起来，燕妮初到伦敦的数个月都是在焦虑中度过，看着他一天天虚弱，却无能为力。

在小福克斯出生一周后的11月12日，恩格斯到达伦敦，他在索霍区住下。恩格斯的影响显而易见，他的到来给了马克思更大勇气。不过数日，流亡者委员会重组，清除了小资产阶级成员。⁽³⁶⁾虽然马克思觉得在未来的战斗中与他们的联合不可避免，但有选择时还是不愿与他们共事。他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1848年起义中的背叛，恩格斯感受到的伤痛更加深刻，他有数名并肩战斗的朋友牺牲。无论流亡者的需求有多迫切，他们都不会与更加宽裕的资产阶级合作。

但在涉及自己的事业时，马克思没有犹豫。创办报纸需要500英镑，不管是商人还是任何其他人愿意资助，他都欢迎。⁽³⁷⁾马克思曾写道：“政治中，你可以选择与魔鬼合作，但要确保你能骗过魔鬼，而不是被魔鬼

骗。”⁽³⁸⁾他有信心，正如之前的《新莱茵报》，不管是谁出钱，他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办报。

12月中旬，马克思告诉魏德迈，自己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以下简称《评论》）在汉堡找到了印刷商和发行人。《评论》理事会（地址是马克思在切尔西的住址）刊登启示说，报纸会在1月面世。

时机最为重要。马克思对未来极为乐观，告诉身在德国的魏德迈说：“我几乎不怀疑，在月刊出版三期或许两期后，世界大火就会燃烧起来。”⁽³⁹⁾但《评论》的发行由于资金问题延期了——这不难想象。别无办法，马克思学习一些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做法，准备派人去美国摘“金苹果”。⁽⁴⁰⁾美国很多城镇（其中有些为纪念“四八年人”而改名，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拉马丁）⁽⁴¹⁾是反君主专制激进分子的乐园。但马克思等人连去美国的路费都凑不齐，只得放弃这一计划。

1850年的1月很快过去，报纸未能出版，2月又很快过去。马克思病倒了，他面对的经济压力太大时便会如此——报纸因为资金无法出版，还要应付上门讨债的。尤其让他厌烦是照顾小福克斯出生的德国医生路德维希·鲍威尔。马克思说，他想“宰”自己，没到期就来要账。⁽⁴²⁾纷争对马克思和燕妮的后续影响很大。小福克斯一直病着，但以后恐怕很难再找鲍威尔看病，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会成为流亡者嚼舌的笑料。这样的境况让马克思难以忍受，但又无可奈何。他一无所有，唯一的武器便是对德国人进行更加严厉地批判，还有他的著作。

马克思为解决资金缺口，同意从报纸的未来收益中拿出一大块给发行负责人，《评论》终于得以在3月面世。报纸开始刊登被马克思称为《法兰西阶级斗争》的重要系列文章。⁽⁴³⁾评估近期的法国起义时，马克思首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后被列宁等人解读得过于激进），认为这是在达到纯粹共产主义国家的暴力过程中的一站：

.....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

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⁴⁴⁾

.....

在首期《评论》报上，马克思把1849年欧洲大陆的相对平静与美国加州发现金子联系到一起，说后者也是一种革命，带动了欧洲的经济恢复。但他认为，不管有没有金子，新经济制度的固有缺陷决定另一场经济危机必将到来，而这场危机将引发一场全面起义。⁽⁴⁵⁾

他的文字毫不克制，并不在意资产阶级资助者或读者的感受。《评论》报上的马克思是毫不含糊的共产主义者，为无产阶级而写，代表无产阶级，他说，1848年6月的巴黎起义是无产阶级发动的第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现在既然没人在街头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他和他的几个战友就通过文字把它继续下去。

《评论》作为平台，对马克思发表文章传播思想很有价值，但从一开始，它就明显无法像马克思想象的那样发展壮大。写稿和编辑在伦敦进行，发行却在汉堡，这里出版受到法律限制，校对人和发行人（万一有报道被政府追究，需要负责）因此主张先通过审查，但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克制。汉堡方面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报纸照常出版，⁽⁴⁶⁾但发行后，引起的戒备比支持更多：德国当局已经开始警惕重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同盟在德国的煽动活动。另外，报纸颠覆性论调太强，无法找到投资者。销售环节也有问题，虽然有人订阅，马克思却无法及时收到钱款冲抵花费。⁽⁴⁷⁾

马克思、恩格斯和燕妮都竭力寻找资金，追要款项，把报纸办下去。所谓的“马克思派”处境极为艰难：他们办报需要钱，同时又在帮流亡者寻求救济。加上马克思的个人经济危机也已经不受控制地被更多人所知，毫不奇怪，他在伦敦的对手开始散布传言，说他和他的同伙把救济流亡者的钱用作私用，还说马克思把募集到的钱都用在了共产主义者身上，其他人在外面受冻都不管。⁽⁴⁸⁾这些传言不仅在伦敦传播，还通过信件登上了德国的报纸，杀伤力很大。不难想象，马克思、恩格斯和燕妮极为愤怒和沮丧，他们没有金钱，名声是他们唯一能依靠的。

燕妮在5月暗自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目前处境的愤怒

和痛苦。

请您把已经或者将要收到的《评论》的钱尽快寄给我们。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笔钱。当然，谁也不能背后指责我们，说我们曾经大肆宣扬过我们这些年来作了多少牺牲，经历了多少困难。公众很少或者几乎完全不知道我们个人的事情，我的丈夫在这些事情上是很敏感的，他宁愿牺牲仅有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官方的大人物所过的民主派的乞讨生活。而他所能够期望于自己的朋友，特别是科隆朋友的，就是对他的《评论》的积极有力的支持。……由于经营上的疏忽和混乱，事情完全弄糟了，不知道最大的问题究竟是书商或者经理和科隆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我的丈夫在这里被种种生活琐事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清醒、冷静的自信心，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⁴⁹⁾

如果说魏德迈需要更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挣扎，燕妮给他描述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天：小福克斯已经6个月大，但从出生以来，从来没能一次睡到两个小时以上，又出现了抽搐，挣扎在生死线上。“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她说，自己有一天正在给他喂奶，女房东进来了，要求付给她5英镑欠款，没马上拿到这笔钱，便报了警，要燕妮必须付钱。“于是就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都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我那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燕妮叫来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后者坐上一辆马车去求助，马狂奔起来，他只得从车上跳下，流着血被人又送回了马克思家，又多了一个需要照顾的。

燕妮说，第二天马克思出去寻找住处，但他一说有4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最终，一位朋友帮他们在莱斯特广场一家旅馆租了两间小屋。他们正忙着从切尔西的房子往外搬，突然只能停下，因为按照英国法律，日落之后不能搬东西。“房东领着警察来了，声称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5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马克思和燕妮之前也有过艰难的时候，但从未受过这样的羞辱。东西都已经搬到了外面，却又要全搬进来，等天亮。^[50]

马克思一家终于搬到了莱斯特广场，但仅仅一周后，又被房东驱赶，原因自然还是房租，另外，小福克斯不停的啼哭可能也引起了其他住客的不满。燕妮的母亲终于站出来，帮了忙，给他们钱在第恩街64号租下两间屋子（其中一间极小）。

马克思的《评论》出版了不过6期，便停刊了。马克思把失败归结为缺少资金和官方的骚扰。燕妮说，普鲁士政府收买了负责报纸销售的书商，借以阻止报纸的销售。^[51]

索霍区第恩街上的这处房子位于法国人聚集区，主人是一名卖饰带的犹太人，之前租过一间屋子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亨利希·鲍威尔。鲍威尔的职业是鞋匠，春天时受同盟委托作为特使到德国重组那里的组织。他随身携带的中央委员会文件指示说，“目前在德国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文件对下一阶段革命做了说明，要求无产阶级做好准备，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文件指出，工人将来不应再自降地位，“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并做出保证，德国政府一旦被推翻，同盟中央委员会就会回归。^[52]

照恩格斯所说，鲍威尔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但鲍威尔抵达德国大概一个月后，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让他的努力变了样。^[53]5月，一名妇女试图刺杀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鲍威尔的煽动活动，中央委员会的激进言论，加上《评论》上刊登的煽动性文章，使得这一事件被直接指向同盟。^[54]普鲁士保守派报纸说刺杀是伦敦的马克思一伙策划的，还有忠于国王的报纸说马克思最近曾出现在柏林。^[55]

像之前要求法国和比利时一样，普鲁士官员要求英国将危险的极端分子驱逐。驻柏林英国大使收到普鲁士内政部的一份机密报告，说马克

思团伙不但密谋对抗德国，还想对付英女王——很可能与英国士兵有所勾结。报告还说，马克思团伙“正式研究和讨论过”谋杀君王，有20个人受过专门训练，随时准备行动。按照报告所说，维多利亚女王显然身处危险之中，有密探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大会上听到他们说“英国同样逃脱不了它的命运。英国的钢材是最好的，斧子最锋利，所有君主都要被送上断头台”。^[56]

马克思和燕妮深知官方骚扰的可怕，考虑搬到乡下去避避风头，但苦于没有路费。^[57]唯一的办法是以报道还报道，以诽谤还诽谤。他们把目光投向伦敦的主流报纸。在写给《太阳报》、《旁观者》报和《地球》报编辑的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自豪地称自己为巴登起义军上校）表示自己被与试图刺杀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极端保皇主义者刺客联系到一起实在荒谬。^[58]他们还间接向英国公众呼吁，让他们知道自己一直受到英国警探毫无道理的严密监视：

.....

说实话，编辑先生，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在英国会有像我们在短短一周中荣幸地见到的那么多的警探。不仅如此，我们住宅的门旁，还被一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严密监视着，一有人进出，他们都耐心地记下来，不管我们去哪里，步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关照。……请问，这群可怜的密探，这些显然按计件工资从最没用的告密者当中招募来的最下流的卖淫男子，从我们门坎旁搜集到的一点点情报，能给谁带来什么好处呢？^[59]

.....

英国人并不喜欢流亡者来到英国，尤其是穷人，把与自己不同的都看作异端和邪恶。但他们更倾向于不理睬他们，而不是驱逐他们。英国人相信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无比健康，无需担心外国的激进分子，对英国人而言，这是一种骄傲，英国不像欧洲大陆的君主国家那样，只是因为民众有不同政见就剥夺他们的权利。^[60]

他们的公开呼吁有没有影响到英国政府，不得而知，但后者确实没

有对马克思等人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对普鲁士政府的驱逐要求给予任何官方回复。

马克思到底是谁，引起如此关注？在 1850 年的大环境下，答案是：谁都不是。在欧洲反对派圈子之外，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甚至在这个圈子里，也并非广为人知。他是不知名的哲学家和报人。从哲学家的角度，他对社会尚无多大影响，要不是上过大学，则全无影响。从报人的角度，他不过是莽里莽撞从事了一个极不体面的职业。

当然，普鲁士官员从他开始从事煽动活动就知道他，他是他妻子的哥哥心中的一根刺，后者很快将升任内政部长。但他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他自己在当时也会承认这一点。马克思不过是普鲁士政府顺手拿来吓人的工具。1848 年后，欧洲各国政府试图将动乱归咎于报纸，指责后者夸大社会不满，煽动本来奉公守法的公民。马克思成了普鲁士政府的目标，被当作动乱和所有后续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部分因为他在报上与动乱中最为激进的共产主义者有所牵连，还有部分原因是他名不见经传，很少会有人为他辩护。

在流亡者相互对抗和竞争的伦敦，马克思同样容易成为政治对手指责和诽谤的目标，原因不是他的信仰，而是他的尖刻性情。这些使得批评马克思更加容易，而他的巨大潜力也容易招致批评。

古斯塔夫·特肖是前普鲁士军官，1848 年起义时加入起义军作战。1850 年，他在伦敦考虑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会面商谈。特肖说，马克思不仅在思维上主导，还表现得非常自我。“如果他除了智商也有情商，除了恨也有爱，即便他时不时流露出对我的轻蔑，甚至后来表现得很明显，我也会跟着他赴汤蹈火。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让我相信有能力领导我们，而且在重大事业中具有大局观的人。”^[61]

特肖对马克思的思维能力和个人弱点的描述非常准确。在马克思心里，他是要做大事的，自然没有时间考虑身边的凡人关心的小事，或者考虑自己的做法对最最爱的人的影响。

燕妮 9 月 17 日抵达伦敦，第二天，便出现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例。^[62]9 月 18 日，一个流亡者组织将马克思选入五人委员会。一般而言，他可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然，也有缺席被选的可能，但他如果没有缺

席，他对家人就太冷漠了：当她们从法国一路痛苦和迷茫地来到伦敦，他病得太重，无法去码头接她们，第二天却完好无损地去了红狮酒馆参加会议，被选入流亡者救助委员会。如果那晚他在酒馆，那便是他把家人的安好丢在一边，只考虑党和自己的理论工作的需要。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在他的一生中，经常如此。

马克思当然珍视家庭，但他更愿意超脱于日常琐事之上，使得燕妮和孩子们的生活极为艰苦。为了实现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的终极目标，他不吝任何个人牺牲，但这场对抗残酷制度的斗争，结果却是对家人的残酷。十年前，马克思在柏林一边与青年黑格尔派争论一边不断从家里拿钱时，父亲便担心他过度的“利己主义”。^[63]如同一心于创作的艺术家的艺术家，马克思希望家人紧跟自己，因为她们也知道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对自己不会犯错的过度自信，使得他忽视了家人的需求。

燕妮呢？她有没有暗示过马克思，自己不能像他那样专注于他的目标和哲学，因为那样会让自己和孩子遭受太多痛苦？通过她的信件、她的未完成的自传，还有她的朋友们的说法，可以说，至少在她们刚到伦敦的几个月中，她没有这样暗示过，她的忠诚没有动摇过。当然，作为一个出身 19 世纪贵族家庭的妻子，她除了支持丈夫，并无其他选择，而且她肯定不想因为自己抱怨而给敌人——以及自己的家人——以口实攻击马克思。不管有没有这些原因，燕妮看起来的确全身心支持马克思的工作，认可和理解这位被自己选为丈夫的天才的需要。虽然他有缺点，但她深爱他，完全信任他，像其他为了爱可以与社会和家庭决裂的浪漫人儿一样，她把他一生的事业看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燕妮在详细列举了家里的苦痛之后，又说：“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痛苦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尤其是我还有幸成为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生命的支柱。”^[64]她的愤怒是针对她觉得背叛了马克思的人，控诉是针对丈夫对抗的统治阶级。燕妮的生活是艰苦的，这毫无疑问。但她没有因为苦痛而责怪马克思。她需要的只是他的忠诚。

初抵伦敦，燕妮表面柔弱，但内心坚定。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丈夫将来会不停地遭受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败，让自己的意志和承诺一次次经受考验。而真正的悲剧是人为的。

20 小福克斯之死



我看到这个地方纯粹是靠咖啡袋、茶叶箱、鲑鱼桶、食用油瓶支撑着的田园景象，真想做一个纵火者，举着火把走遍各地。

——燕妮·马克思^[1]

1850年6月，天气干热，春季的泥泞和粪便已经干透，被马蹄刨起后，飘在空中，呛人口鼻，马克思发现一处可以躲避的地方，一处让他可以思考的天堂。那便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费了一番口舌，他让工作人员相信自己在研究非常重要，又找人写了推荐信后，马克思终于拿到了一张读书证。^[2]如果说马克思去教堂的话，阅览室便是那圣堂。从这个6月开始，这里成了马克思一生的避难所。

1850年的阅览室尚非如今的壮观圆形穹顶模样，为木质结构，如绅士们的会所般，长条桌子一排排摆放着，从地面到屋顶，全是书。负责人名叫安东尼·帕尼泽，1823年从意大利流亡来到英国，当时，他同样是分无分文的密谋者，不会讲英语，不过马克思1850年与他相识时，他已经成为阅览室的图书管理员。^[3]

不难想象，走进阅览室对马克思的健康是有益的。他得以远离吵闹和灰尘（家里家外都是），远离在工人教育协会、同盟和流亡者委员会要面对的政治纷争。一走进在博物馆，他就明显放松了下来。他最喜欢安静地学习和研究，唯一让他沮丧的是没办法一直呆在阅览室里。原因

无他：债务。马克思之前在伦敦一家商号开的一张 20 英镑的期票将在 7 月底到期，但他没钱偿还。他写信给卡尔·布林德（在伦敦时与马克思住在一起，现已搬去巴黎），请他找人帮忙：“如果我不能兑现，我可能会遭到公开的（羞辱），而鉴于这里的党派状况以及（我）同普鲁士使馆和英国内阁的关系，（可能会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后果。”但即便他借到钱偿还这笔债务，也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他的著作看不到出版的机会，没有付钱的工作可做，唯一的希望是他在荷兰的姨父，但他告诉布林德说，由于一些私事，短期内也指望不上荷兰方面。⁽⁴⁾

此时，恩格斯的家庭在向他施压，要求他离开那些危险和反叛的朋友，尤其是在他们看来毒害了他年轻的心灵的马克思。与他最亲近的妹妹玛丽亚（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建议他在他的党成功的机会不大时先回去工作。⁽⁵⁾父亲的建议更彻底：让他去加尔各答，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在那里大量出口棉花。⁽⁶⁾恩格斯考虑过纽约，因为他可以劝马克思一起去。但最终，他两个地方都没去。恩格斯知道留在伦敦的艰难。街上满是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流亡者，其中很多也是作家，也想创办报纸或把文章寄到国外发表。恩格斯觉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回到父亲的工厂工作，不但供养自己，顺带供养马克思一家。他相信，马克思只要有机会，一定能写出一本创造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从而教育无产阶级，准备起义。马克思也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他需要的是时间，换言之，钱。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中恩格斯的写作生涯更为成功，不论是作为诗人、作家还是报人，但他更相信马克思的才华，因此自愿放弃自己的抱负，让他的朋友能够写作。⁽⁷⁾

恩格斯的父亲自然不知其中的缘由，但对于恩格斯回来，还是很高兴。棉纺行业竞争激烈，他需要有一名家人留在曼彻斯特，盯着英国的合伙人。⁽⁸⁾三十岁的恩格斯将在 11 月开始工作，不到一年，年薪便达到了丰厚的 200 英镑，另外还有招待补助。（相比之下，银行雇员一年收入大概 70 英镑，有 3 个孩子的中下阶层家庭一年生活花费大概 150 英镑。）⁽⁹⁾但马克思已经债台高筑，等不及恩格斯领到第一份薪水。

燕妮也许是受到恩格斯所做的牺牲的鼓励，也想做点什么，缓解家里的压力。她决定去荷兰扎尔特博默尔见马克思的姨父。她说自己对未来感到急迫——由于一个新的原因。马克思说自己是个“多子女的父亲”，

“我的婚姻比我的工作更多产”——他是的。^[10]燕妮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在8月从荷兰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燕妮描述了她的旅程：“在海上颠簸了15个小时，忍受了15个小时的极度不适”后，却受到了冰冷的接待，莱昂·菲利普斯好不容易才认出站在自己门口的浑身湿漉漉的女人，才给了她一个拥抱。燕妮说与她熟悉的女性都不在家，这让她手足无措，她决定开门见山，说如果拿不到一些马克思的遗产，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去美国了。让她失望的是，菲利普斯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当燕妮说此行需要路费时，这个“小气鬼”又变得态度不实在了，攻击她和马克思的信仰。菲利普斯这样尖刻是有原因的，他和儿子们因为1848年起义损失惨重。燕妮回忆说：

.....
无论我何时将话题引入正题，如何将话题引入正题，都是白费力气。……我昨天晚上心情沉重得像压上了一块铅，是流着眼泪上床的……唉，亲爱的卡尔、珍贵的卡尔，我真担心，我担心自己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到头来连这趟旅行的成本都收不回来。我从昨天就在这里忍受的内心痛苦、怒火，我无法在字里行间表露出来。
.....

愤怒之下，她写道，自己当时的想法是“我看到这个地方纯粹是靠咖啡袋、茶叶箱、鲑鱼桶、食用油瓶支撑着的田园景象，真想做一个纵火者，举着火把走遍各地”。燕妮显然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向家人乞怜，却被拒绝——但她依然没有责怪丈夫。

.....
珍贵的卡尔，我想我将一无所获、大失所望、惊慌失措地重新回到你的身旁。但愿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和小家伙们。关于孩子们，我写不下去了，我的双眼开始抽动，而我在这里必须保持勇气。——那就替我亲吻他们，替我亲吻这些小天使一千次。我知道你和琳蕻会怎样照顾他们。没有琳蕻，我在这里会坐卧不宁的。……再见，亲爱的卡尔。^[11]
.....

虽然燕妮未能从莱昂·菲利普斯手里要到钱，只是给每个孩子带了一个玩具，但一回到家，马上感受到了重聚的喜悦。她回忆说：“我可怜的小埃德加蹦蹦跳跳地朝我跑过来……小福克斯把他的小胳膊伸向我，让我抱。”燕妮在回忆录中写道，她迫切地回到他们中间，不管生活多苦、多难。⁽¹²⁾

马克思来到伦敦后，在第一年便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当中，奥古斯特·维利希绝对是最耀眼的。他出生时的姓氏是冯·维利希，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放弃了这个高贵的姓氏。他出自普鲁士最古老、最尊贵的家族之一，据说祖上是霍亨索伦家族——普鲁士多名国王出自这一家族。在巴登时，恩格斯曾在他手下作战，他告诉燕妮说，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但其他时候却是个无聊的理论家和社会主义梦想家。⁽¹³⁾

维利希外表更像恩格斯说的那个战斗英雄。他衣着整洁，举止优雅，蓝色的眼睛很尖利，颊骨棱角分明，金色的胡子卷曲、浓密。他在科隆时与激进医生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相熟，并在1848年初参与尝试在科隆发动共产主义起义。但在他经恩格斯介绍到伦敦前，马克思与他并无多少交往。⁽¹⁴⁾到伦敦后，维利希便紧紧地站在了马克思一边，积极参加事务，不管是公开的还是暗地的，在英国还是在普鲁士。马克思和燕妮住在切尔西时，他有一天一大早便冲进他们的卧室，燕妮描述说，他兴致很高，进来时“像堂·吉珂德一样，穿着一件灰色羊毛紧身上衣，腰间没系腰带，围了一条红带子，高声大笑，一派普鲁士人模样，已经准备要就‘自然’共产主义进行一番长谈”。⁽¹⁵⁾马克思赶紧让他打住，但这绝不是他最后一次来马克思家寻找私密接触。

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一起处理同盟和流亡者委员会事务，但在策略上出现了分歧。马克思自从1848年后便把理论工作放在一边，进行政治煽动和创办反对派报纸，但他逐渐发现革命不会马上发生。相反，维利希讲究行动，喜欢搞秘密组织。他认为同盟人数虽然不多，但凭借意志力，照样可以发动起义，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大的社会变革数年后才能出现的看法。在马克思看来，革命想要成功，需要若干必要条件，维利希的鲁莽暴力方式显然不在其中。

争论开始公开。马克思在很多方面更像一名社会进化论者，而非革

命论者；思想是革命性的，但方法是进化性的。在他看来，革命是历史进程的结果，不能在时机未成熟时暴力发动。有专家总结说，马克思认为旧社会被新社会取代需要两个前提：其一，民众阶级觉悟提高，通过工会活动以及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积极参加社会政治发展进程。其二，无产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前，会有一段小资产阶级统治。⁽¹⁶⁾但维利希认为这是谬论，他指责马克思为了理论安全，放弃了起义的战场。

维利希不愿独自行动，更喜欢有一支队伍在身边，他开始寻找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他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他虽出身贵族，但大多数支持者德国工人流亡者。他跟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像朋友般交谈。他因此比马克思更受欢迎，后者住在家里，而且据说还拿工人阶级的钱，用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享受。⁽¹⁷⁾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战友们与一个叫作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伦敦组织结盟。领导该组织的法国人是奥古斯特·布朗基（他因为坐牢而苍白的面容和干枯的嘴唇吓坏了 1848 年的法国国民议会）的追随者。⁽¹⁸⁾马克思欣赏仍在法国坐牢的布朗基，但很快对协会的同伴大感失望，觉得他们是“革命的妄想狂”。他觉得他们可能会愚蠢地发动起义，走向又一次失败。⁽¹⁹⁾

维利希与协会的关系却愈加紧密。协会有一名成员叫艾曼纽埃尔·巴泰勒米，参加 1848 年 6 月起义被强制流亡后，刚刚逃到英国。⁽²⁰⁾他经常去位于牛津街附近拉斯伯恩广场的一家击剑馆，这里很受法国流亡者欢迎，马克思和朋友也经常来。巴泰勒米开始经常造访马克思家，但燕妮并不喜欢他。他不到 30 岁，黑色的胡子让他的面色显得更加苍白。燕妮觉得他举止奇怪，空洞洞的黑色眼珠盯着人看，令人不悦。⁽²¹⁾她和马克思不知道，这是一个暴力的人，把政治当作犯罪甚至杀人的借口，喜欢革命是因为可以把刀子捅进别人的后背。

改信共产主义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 24 岁，也在夏天来到马克思家门口。据他说，维利希和巴泰勒米开始密谋对付马克思。“他们说马克思是叛徒，叛徒就要被杀死。”⁽²²⁾此时的维利希已经向极端分子寻求支持，甚至向一年前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赶出流亡者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示好。他游说委员会与民主派联合，以便加强力量。提议被拒

绝后，维利希一怒退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几天后，在同盟的一次会议上，闹事而来的维利希侮辱马克思，向他提出决斗。问题的根源应该在于政治。^[23]

马克思未予理会，毕竟决斗在英国也是违法的。但年轻气盛的康拉德·施拉姆要保护马克思和他的家人，大骂维利希，就此卷入争执。决斗双方变成了28岁的施拉姆和40岁的维利希。马克思请求施拉姆放弃决斗，但后者没有答应，带着决斗的助手波兰军官亨里克·米什科夫斯基，与维利希和巴泰勒米一起，连夜坐船去了比利时。^[24]李卜克内西说他们同意用手枪决斗，虽然“施拉姆从没开过枪，维利希却一向百发百中”。

第二天是9月12日，李卜克内西到马克思家，与燕妮和琳蕻一起整理会议记录。李卜克内西说，他们一整天都在焦急地等待施拉姆的消息，但直到晚上他和马克思都出去后，巴泰勒米才来。燕妮和琳蕻赶忙问：“施拉姆怎样了？”他回答说：“施拉姆脑袋中了一枪。”巴泰勒米再次鞠躬之后，转身离开，留下两个女人哀伤朋友的命运。

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一个小时后回到家，向心痛的燕妮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卜克内西说他们都放弃了希望。但第二天，正当他们都在谈论施拉姆时，“门开了，大家正在哀悼的人头上缠着绷带、笑呵呵地走了进来，说自己只是被子弹擦到，就晕倒了，醒来后，发现已经身在大海上，助手和医生都在边上”。^[25]施拉姆恢复了，但马克思与维利希的关系已经无法恢复。决斗4天后，两人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分裂。

会议召开前发生的这些故事并没有出现在会议记录中。马克思的内心如钻石般坚硬、璀璨，知道自己在任何智力交锋中，都不会落败。他虽然在私事上容易动怒，但在会议上唇枪舌剑时，却一向冷静、理智，直到把对手击溃。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便是如此。会议的议题是他建议将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隆；目前的同盟章程废除，重新草拟；在伦敦组建两个分部，彼此不发生任何关系，均直接向科隆汇报。^[26]马克思说，这样才能避免内部出现公开分裂，确保即使成员间有不同意见，同盟的安全不会受到危及。他说，伦敦分为两个分部不是出于个人矛盾，而是大家对未来革命的立场不同。“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而他们[其他同盟派别]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

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马克思说希望自己的区部不超过 12 个人，另一个区部可以吸收剩下的人。⁽²⁷⁾

卡尔·沙佩尔是老盟员，也是马克思的朋友，但在这一问题上，与马克思看法相反。他不同意马克思的长期策略，说自己虽然会被“送上断头台”，还是要回德国。如果马克思分裂同盟，那就分裂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了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²⁸⁾

维利希一言未发。马克思甚至点过他为什么不发言，但他和另一名盟员直接退出了会场。投票时，只有马克思一派的人投了票，一致同意分裂。⁽²⁹⁾两天内，马克思和伙伴们又退出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不久后，又与布朗基主义者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分道扬镳，恩格斯、马克思和乔治·朱利安·哈尼甚至写信给协会，邀请他们到恩格斯在第恩街附近的住处，一起烧毁结盟协定。⁽³⁰⁾马克思击溃维利希等人的计划还差最后一步：他要求新成立的科隆中央委员会将伦敦的不同政见者驱逐，说他们处于造反状态，违反所有同盟条例和法律。科隆方面予以批准。⁽³¹⁾

马克思取得如此甜蜜的胜利的同时，哈尼也在他的《红色共和党人》报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个英文译本，首次注明作者：“公民查理·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³²⁾但马克思没有时间回味胜利。在击垮对手的同时，他也树下了数不清的敌人（他们说《共产党宣言》是反动的），恩格斯又要前往曼彻斯特。他离开后，马克思身边将剩下一群乳臭未干的年轻追随者，除了燕妮，他将再无思想上对等的伙伴，帮他应付同盟分裂后对手必然发动的反扑。此外，还有恼人的经济问题。马克思在 10 月底写给魏德迈（后者自 5 月起一直定期付钱到当铺，保住燕妮的银器）的一封信中，让他把银器卖掉，把钱寄给自己，家里需要这笔钱救命。他明确告诉魏德迈有几件东西不要卖掉：一个小酒杯，一个银盘和用盒子装着的小刀叉。这些都是五岁半的小燕妮的东西。⁽³³⁾

孩子是马克思和燕妮生命中屈指可数的亮光。虽然不断搬家，受困于金钱和政治，忍受寒冷和饥饿，生活在连其语言都不懂的陌生人中间，燕妮依然乐观，说自己的女儿个个“美丽、健壮、活泼、可爱”，说 3

岁的“胖小子”埃德加“滑稽幽默极了，满脑子是可笑的想法。这个小淘气鬼整天兴头十足地扯着嗓子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可着劲高唱弗莱里格拉特的马赛曲时，整个房子都嗡嗡作响。他唱道：快来吧，六月，你这立功的时刻，我们渴望建树新的功绩”。^[34]

在伦敦这第一年，唯一一个遭罪的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亨利希·吉多，但他很快便解脱了，11月19日，一岁生日后不久，他死于痉挛引起的并发症。马克思写信给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告诉他“小火药阴谋家”早上在痉挛症又一次发作时死了。“在这以前几分钟他还笑着，嬉戏着。……恰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你在身旁，我们感到非常孤独。”^[35]在4天后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燕妮“处于非常危险的激动和疲惫状态”。^[36]她亲自为这个孩子哺乳，并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了他的生存作出极大的牺牲”。^[37]

被燕妮称为“我备受痛苦的可怜的孩子”的小福克斯被埋在了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的奎克公墓。^[38]葬礼上，他的小棺木不用抬很远，就到了。在索霍区的各条小街上，他们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应该也没引起多少关注，否则可能会让他们的悲伤更加难以抑制。他们只是成千上万深陷贫困的家庭中的一个，而在几条街之外，幸运者将不计其数的财富收入囊中。

21 黄金时代的艰辛

★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¹⁾

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自豪地宣布，她亲爱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已经成功地通过和平和繁荣把世界团结到了一起。阿尔伯特是组织这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的名流委员会的主席。这是贸易、工业和发明的盛会。5月1日的开幕式上，四分之一的伦敦人聚集在海德公园，见证这一盛事的开幕。32岁的女王也出席了开幕式，她对周围的珍奇事物惊叹不已。展馆水晶宫的穹顶比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还要大，馆内10万件展品展示着那个时代的奇珍，从傅科的钟摆到抽水马桶，从棉纺机到月球的银版照片。博览会犹如一个大商场，各层商店的商品移动极为轻松。展出的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温室，展示着人对自然的主宰。当千人唱诗班唱起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合唱曲时，女王感叹说，“让人感觉……充满虔诚，比我听过的所有合唱曲都要动听”。⁽²⁾英国国教会宣布工业为新的信仰。英国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一词和它对应的帝国主义刚刚开始专业领域内使用）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始。⁽³⁾

实际上，资本已经在全欧洲加冕。1849年，起义被彻底镇压、反动政权力量恢复后不久，经济开始快速发展。马克思的宣扬让各国政府意识到，失业、饥饿以及由此引发的疾病对政权稳定造成的威胁，比任何思想或敌人都要大，这是因为社会的底层是基础，基础不稳，整个房子就会倒塌。为避免这一点，他们制定计划，建造铁路、房屋和工厂等既吸纳就业，更为重要的是利润丰厚的东西。⁽⁴⁾仅1851年的伦敦，建筑业便雇用超过66000人，成为首都规模最大的行业。不用说，房子不是给聚集在贫民区的穷人盖的。建筑潮主要集中在贝尔格莱维亚和肯新顿，伦敦北部的新郊区更是建起大片别墅，卖给突然暴富的中产阶级。⁽⁵⁾

大工业得到了欧洲君主和已经变得百依百顺的议会的嘉许，很多拥有铁路和在那个刺激、不断扩大的股票市场上驰骋的商人进入议会。他们提出，想要保持成功和繁荣，只需要遵循一条简单的规则：商业保持私营和竞争力，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商品（包括劳动力），把加工出的产品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在自由市场出售。这个规则便是资本主义。⁽⁶⁾

铁路、轮船和电报加快了商业扩张的步伐，时间和距离的限制被缩小，但真正让市场开始冒进甚至不顾一切的，是黄金。欧洲商人看到美国同行在加州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地聚敛财富。欧洲政府见国库空虚，不得不承认很多条例的确过时了，束缚了欧洲商人的发展，让他们落后了。⁽⁷⁾很快，各国政府解除采矿管制，推行更加自由的贸易条例，建立银行提供资金，重新制定法律以促进商业发展。⁽⁸⁾

伦敦博览会反映了贸易的这次曙光，正如普通工人无法躲避新经济制度的到来，普通伦敦人也无法躲避这次盛大的演出。为了迎接各国元首和其他可能光临的贵客，城内很多地方进行了改造：粪便刚倒进池子就被马上清走；画家用绿色、紫红色、蓝色和黄色将建筑的装饰粉刷一新；店主把脏兮兮的窗户擦得闪亮；最重要的是，睡在海德公园的数百名无家可归者被赶到了更远的区域。伦敦这个老妇人打了粉，擦上胭脂，做好了迎接宾客的准备。

让英国人没完没了庆祝的，不仅有博览会，还有英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到1851年，英国拥有的渡海轮船和铁路数量占世界一半。这些成功是哲学理性主义、政治实用主义和商业创造力的胜利，这些都在博

览会上得到了展示。⁽⁹⁾

博览会还向整个世界彰显了私有财富的力量，这尤其令马克思懊恼。之前，他对于很多想要成为革命者的人什么事都还没做就给自己树立了想象中的丰碑而感到烦扰，与他们争论，现在，他又要对付资本主义梦想家，这些人以为商人是和平的使者，通过全球贸易，把货物从中国卖到巴西，从加拿大卖到布尔共和国，就让世界更和谐。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博览会不过是当代的罗马万神庙，用来颂扬“世界主义、博爱主义和商业……资产阶级的自吹自擂”。⁽¹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家所宣称的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突破国家界限和特性，减少地区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将会导致又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而时间就在下一年。⁽¹¹⁾

在博览会的刺激下（效果甚至比燕妮和恩格斯还要好），马克思重新投入工作。在他看来，展出的工业和技术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并无不妥之处。实际上，他在摄政街的橱窗里看到一个电机模型后，兴奋得像孩子般，说电是比蒸汽“更伟大的革命者”“前景无法估计”。⁽¹²⁾但他需要给出解释：人类的伟大发明为什么会控制在如此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这些巨大的进步又为什么不该只让少数人受益。

1851年春，当大多数人还尚未听说过“资本主义”一词时，马克思已经开始对抗这一庞大的、不断进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一个后来遍布全球、影响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刚刚出现时，马克思便开始记载其兴盛，预测其衰亡。⁽¹³⁾在接下来的16年里，他经过数千张草稿的积累，才终于完成巨著《资本论》的第一卷。他的年轻追随者们才看到一张替代资本主义的蓝图——他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做事从不马虎；他彻底投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当中。一个名叫威廉·皮佩尔的年轻伙伴也偶尔来给马克思打打杂，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跟恩格斯抱怨说，“一有人来拜访，他就拿经济学的东西招呼别人，连问候都省掉了”。⁽¹⁴⁾恩格斯应该也有些诧异，马克思写给他的信中满是经济理论，征询他的意见。正是从这时起，两人开始了长达20年不间断的通信，有时甚至每日一封，直到恩格斯在1870年回到伦敦。马克思的一个女儿回忆说，家里最高兴的时候便是穿着红色军式礼服、戴

着黄色条纹礼帽的邮差到来的时候，每当他敲响住处的门，孩子们都会从楼上飞快地冲下来，因为他们知道“恩格斯叔叔”的来信会让父亲何等开心。^[15]信里不但有恩格斯对正在讨论的话题的回复，经常还会有一家人生活所需的钱。

12月搬到曼彻斯特后，这位马克思家的孩子们眼里的“天使”找了两个住处。一处是典型的商人住宅，体面，可以招待同事。另一处位于郊区，以博德曼先生和夫人的名义登记，恩格斯和玛丽·白恩士以及她的妹妹莉齐一起居住，他们的朋友大多是爱尔兰激进分子。席卷爱尔兰的饥荒虽已结束，但国力被严重削弱，短期内再也无法从英国独立，各郡资源匮乏，无力再发动独立战争。曼彻斯特的爱尔兰人满腔愤懑，不仅因为威斯敏斯特对爱尔兰的统治，还因为在英格兰工作的爱尔兰男男女女和孩子们面对的境况。

恩格斯自愿用资本主义“强卖”的收益资助革命的朋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负罪感。成为一名棉纺商人之初，他便决定供养马克思一家——甚至为此愿意动用工厂的钱——并帮扶曼彻斯特的白恩士一家。作为一个工厂主的儿子，他表现得很出色，参加适当的俱乐部，而且很受欢迎，但他真正的朋友是那些会被这个社会送上绞刑架的人。他游泳，击剑，骑马打猎。他在享受这些运动本身的乐趣的同时，也在锤炼自己的身体，做好武装战斗的准备。^[16]燕妮曾揶揄他是“棉纺大王”。他的确是，但同时有着一颗反叛的心。燕妮说自己很高兴他仍然是原来的弗里茨。^[17]

恩格斯不知道父亲会让自己留在曼彻斯特多久，但留在这里期间，他极大地缓解了马克思和燕妮的忧虑。他经常随信寄给他们一两英镑，满足他们生活所需。自来到伦敦后，他们的境况终于开始好转。马克思沉浸于经济学研究，并计划在科隆以小册子的形式出售自己的作品。^[18]他甚至开始考虑《评论》在瑞士复刊。^[19]孩子们好像也走出了小福克斯的死带来的阴影。当然，不是一切都顺利，流亡者之间的争吵仍很激烈：红色沃尔弗12月时遭到维利希的追随者殴打，康拉德·施拉姆和皮佩尔参加纪念巴黎起义的一次宴会时，受到粗鲁对待。^[20]但马克思没有参与到争吵中，而是尽量远离对手，说他们只会“模仿别人的方法”，“用自己的粪便向对方抛掷”。他还挖苦道：“各显神

通”。⁽²¹⁾（这几个字在这里虽然用作嘲弄，但在后来被马克思加以引申，成了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石。）

1月底，不知是因为小福克斯死在第恩街64号，还是因为没有付租而被驱赶（马克思月初时曾向恩格斯要钱，说自己已经欠租了），他们又搬家了。⁽²²⁾新住处在索霍区第恩街28号，相隔不过几个门，但条件其实要更好一些。这座狭窄的房子建于乔治王朝时代，已有百年历史，共4层，一层为商店，马克思家3个大人和3个孩子租下的两间房间在顶层。房子还有另外3家住户：两家意大利人（其中一家是房主）和一个从爱尔兰来的语言教师，⁽²³⁾后者把自己的一部分空间又转租给了马克思。^①

这处顶层阁楼极不宽敞。前厅有三扇窗朝街，面积不过150平方英尺，用作会客室、餐厅、休息室和书房。后屋更小，屋顶是斜的，墙角有个壁炉，是一家人做饭、睡觉和洗漱的地方。⁽²⁴⁾自来水只能供到一楼地面以上10英尺的高度，所以他们只能到一楼打水。房子里没有马桶连接到中央供水系统；他们或者到一楼用公共厕所（粪尿流到地窖里的化粪池），或者在楼上用夜壶。⁽²⁵⁾不过，住的高，也不错，至少从窗户看上去，目光掠过其他已显陈旧的房子的屋顶和烟囱，可以想象自己离天空更近。李卜克内西说，这里就像“鸽子笼，数不清的叛逆者、流亡者和难民进进出出”，在接下来的5年里，这里被称作“摩尔家”，是马克思周围的人聚集的中心。李卜克内西说，对这些流亡者朋友而言，除了墓地，这里是他们在伦敦最固定的地方。⁽²⁶⁾

搬进新住处后，一家人的生活变得规律起来。女孩子们去学校。燕妮一边帮丈夫处理事务，一边照看孩子。琳蘅负责家务，把恩格斯寄来的（或马克思借来的）钱精打细算，确保不至挨饿。钱实在不够，她就去当铺，后者在孩子们眼里成了又一个“叔叔”，像恩格斯一样给她们

① 马克思传记作家通常描述说马克思一家住在三楼，大伦敦理事会也把蓝色的历史建筑标签贴在三楼，说明这里曾是马克思的居所。但一家人实际上住在顶楼。对于他们何时搬来第恩街28号，也存在争议。有些传记作家认为时间是1850年12月2日，但马克思在这一天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留下的地址仍是第恩街64号。此外，1851年1月6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自己需要付房租给女房东，因为她也“非常穷”。第恩街64号的房东是一个女人，第恩街28号的房东却是一个男人。马克思在1851年1月2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首次提到新住处。

钱，但是需要她们抵押一些家里暂时可以不用了的物件或衣物。

马克思则每天去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顺便带上了年轻的伙伴李卜克内西，⁽²⁷⁾后者回忆说，当伦敦的其他流亡者忙着密谋推翻世界时，“我们却坐在大英博物馆里，继续学习，为将来的战斗准备弹药。……有时我们饭都吃不上一口，就赶去博物馆。……那里至少有舒适的椅子可以坐，冬天又比家里暖和，当然，很多人连家都没有”⁽²⁸⁾。

晚上的政治会议大多在一家酒馆的私人包房里举行。大家一般会喝黑啤酒，用闪闪发光的壶装着，想抽烟的可以要长长的陶制烟斗。⁽²⁹⁾如果谁都没钱（经常如此），白天一直跟着马克思的年轻流亡者们便来第恩街马克思家，这里虽然贫穷，却让他们感受到极为想念的家的味道。马克思家虽也紧张，但对这些把马克思当成领袖的人非常大方，大方到马克思都不想再要这个称号。

裁缝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说，燕妮对待他们极为轻松自在，让他们觉得面对的是母亲或姐姐。他说燕妮身材高挑，美丽高贵，但完全没有她出身的那个阶级对待下层人会表现出的骄傲或生硬。相反，她可爱，幽默。⁽³⁰⁾李卜克内西承认说，燕妮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比马克思还要大。

“她的端庄，她的高贵，不排斥亲近，却又不允许逾越，对我们具有莫大的魔力，让我们有些失礼甚至逾越。”⁽³¹⁾数年后，李卜克内西写道，燕妮是“第一个让我认识到知识女性的力量和魅力的女人。……又像母亲、又像朋友、又像知己、又像导师，她在我眼里就是完美的女人，现在依然如此”。⁽³²⁾她的魅力让渗透到马克思的圈子里的一名普鲁士间谍都招架不住，他报告说燕妮“因为对丈夫的爱，已经习惯了流浪的生活，在苦难中依然从容”。⁽³³⁾

他们的活动少不了马克思家的3个孩子。他们一直跟大人们待在一起，不是因为马克思觉得他们可以向大人学习，而是他认为大人应该向孩子们学习。（马克思喜欢说“孩子们必须把父母带大”。）⁽³⁴⁾马克思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凭借命令，而是通过建议——他们总是同意。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在家里的女人和孩子面前表现出的温和能让“英国家庭女教师感到汗颜”。⁽³⁵⁾

1848年后，第一波抵达伦敦的流亡者中有很多重要人物，但在1851年，很多老革命者来到后，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在知名度不高

的激进分子中间，掀起了一场新的、有些滑稽的竞争。⁽³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人称为“组织了大人物称号的互助保险会”。⁽³⁷⁾

马克思认识 1848 年巴黎的所有重要革命人物，现在由于路易·拿破仑政府不再容忍任何异议，他们也逃到了伦敦，并纷纷来第恩街 28 号打招呼。最先来的包括路易·勃朗，他是一大早来的。琳薇把他引到前厅，马克思在后屋赶紧起床、穿戴。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后来向他描述了当时他和燕妮透过半掩着的门观察勃朗的情形。马克思说，勃朗看了看装饰寒酸的屋子，看到一面“极为老旧的镜子，便来到镜子前，摆了摆姿势，使劲儿拉伸他短小的身躯——他穿的靴子的跟儿是我见过的最高的——含情脉脉如三月里的兔子般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马克思说和自己一起躲在门后的燕妮忍不住发笑。马克思穿戴洗漱好之后，进门前清了清嗓子，“好让这位自恋的著名民众运动家离开镜子，以合适的礼仪迎接主人进屋”。⁽³⁸⁾

实际上，马克思不想与勃朗或过去 20 年间的任何革命人物结成联盟。在他看来，参加过 1830 年革命运动的老革命者，包括深受英国喜爱、被视为刚正不阿的意大利伟大人物马志尼在内，都不过是“经验丰富的骗子”，让年轻一代做事，自己则坐收成果，享受荣誉。⁽³⁹⁾大人物和次要的激进分子以令人瞩目的速度不断组成新的联盟，相互分裂，再重新组成新联盟——不断密谋，却没有时间真正做事。这些流亡者的焦点完全在他们自己和相互之间。

马克思相信，自己有周围这几个伙伴就够了，当然，如果恩格斯在伦敦自然更好。2 月初，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很喜欢我们目前所处的公开的真正的离群索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原则。那种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折中的做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党内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⁴⁰⁾

恩格斯表示赞成，回信说：“人们越来越看出，流亡是一所学校，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不满足于同所谓的‘革命党’毫无瓜葛的独立著作家的地位，他就必然会成为傻瓜、蠢驴或者卑鄙的无赖。这是一所真正的卑鄙和下流的学校，在这里最蠢的蠢驴会成为祖国的头号救世主。”他认为目前的状态给了他们新的自由。“从现在起，

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而当这些先生需要我们的时刻到来时，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但这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安宁。当然不免有些孤独，但是，我的上帝，三个月以来我在曼彻斯特这里已经尝过这个滋味。”重要的是能出版一些东西。“如果你用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飞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41]

马克思也想尽快完成著作。政治已成闹剧，理论是唯一值得关注的领域。但一系列难题影响了他的计划。他头顶的债务数额太大，恩格斯也没办法帮他还清。他总共欠人40多英镑，已经在伦敦、布鲁塞尔和特里尔传为丑闻。别无办法，马克思甚至威胁母亲，说如果她不肯给他钱还债，自己就去普鲁士被关起来。但她显然并不在意看到儿子被关起来，什么都没给他。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说家里已经一文不名：“而欠小商人、肉铺老板、面包房老板等等的账却越来越多。……你会承认，所有这些琐事都是不很愉快的，我已经深深陷进了小资产阶级的泥坑。不仅如此，我还剥削了工人！我还追求独裁！多么可怕！”

在这一团糟中，燕妮在1851年3月28日又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弗兰契斯卡。虽然马克思说分娩是顺利的，但燕妮仍病得厉害，“其原因与其说是体质上的，不如说是生活条件方面的”。在4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下一封信中，马克思说，自己无论如何会去曼彻斯特一趟，向他当面解释。“我必须离开这里一个星期。最糟糕的是，我现在突然不得不停止我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我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42]

在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之际，全欧洲的反党派蜂拥而至。流亡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兴奋异常：访客们手上有他们需要的钞票，当然，自己得有起义的计划奉上才行。“流亡者们在有支付能力的庸人大批拥到伦敦的这段时期里比任何时候都喝得多，而花费则比任何时候都少。”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形容为“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43]

万众瞩目之下，伦敦的流亡者不能让人失望。他们制定了新鲜的计划，确定了革命的日期，发行了战斗所需的公债券（起义政府成立后赎回）。^[44]

博览会开幕前数月，有传言说，路易·勃朗和赖德律-罗兰（此时仍是对手）在海马基特一家酒馆组织世界起义，有9万名外国流亡者参

加，他们将同时在住处纵火，另外还有 20 万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天主教牧师化装成火柴商贩，进行协助。⁽⁴⁵⁾ 传言显然过于荒谬，但欧洲大陆各国还是要求伦敦警方逮捕颠覆分子，调查颠覆计划。经历过 1848 年动乱的各国政府认为英国人在动乱刚刚过去便举行博览会太过草率。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写道：“英国被看作是焦点，不仅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在这里得到宣传，甚至有人在这里煽动和鼓励谋杀和叛乱。”⁽⁴⁶⁾

燕妮的哥哥斐迪南对于伦敦极端分子的威胁直言不讳。去年 12 月他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长，负责王国的内部安全。他在 1 月 1 日的公告中严厉规定：所有政治会议必须在警察的监督下才能举行，出版行业由国家控制，报纸交纳保证金后方可发行。⁽⁴⁷⁾ 恩格斯对马克思评论说：“你的内兄也正以值得赞许的劲头在没收书籍。我所担心的只是，他作为普鲁士官僚国家的布鲁士斯不久也会对你的东西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就可能产生停止支付稿费这样的讨厌的后果。”⁽⁴⁸⁾ 随着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普鲁士却开始了十年反动时期。⁽⁴⁹⁾

斐迪南的目的是把革命材料挡在普鲁士之外。他在火车站部署卫兵，加强监控，设陷阱抓捕把违禁文字带入王国的人。他不满足于把行动局限在普鲁士甚至整个德国。他相信革命的心脏在伦敦。1851 年春，斐迪南派间谍和密探到英国挖出密谋者——他相信其中的一个自己非常熟悉。⁽⁵⁰⁾（马克思公开称斐迪南为“毫无主见的、狂热的反动分子”。）⁽⁵¹⁾ 斐迪南相信，只有找到煽动者从事反叛行为的确凿证据，女王才会同意驱逐他们。他们的犯罪材料必须令人信服——但不需要真实。⁽⁵²⁾

一个名叫威廉·施蒂贝尔的普鲁士间谍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团体。他雇用了一个名叫查尔斯·弗勒里的人假装成来伦敦报道博览会的报纸编辑施密特。⁽⁵³⁾ 实际上，弗勒里要做的是报告伦敦的德国激进分子尤其是马克思的活动——报告的最高接收者是燕妮的哥哥。^①

燕妮仍旧卧病在床，每小时喝一勺白兰地和波特酒，缓解神经疼痛。

① 施蒂贝尔后来成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头目。这不是马克思第一次遇到化名施密特的警察密探：1848 年，马克思就曾在自己的报纸上报道施蒂贝尔装扮成一个名叫施密特的艺术家，在西里西亚从事间谍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施密特”就是普鲁士间谍通常采用的化名。

她把弗兰契斯卡寄养在一个奶妈家里——可能是担心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给她喂乳，她会遭受与小福克斯一样的命运。⁽⁵⁴⁾琳蕻照料其他孩子。劳拉和埃德加还太小，感受不到家里的紧张氛围，但小燕妮5月就将年满6岁，应该有所觉察，但显然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从照片看，她从小就是一副因为周围大人的麻烦而焦虑、闷闷不乐的表情。她身体消瘦，脸色苍白，大大的黑色眼睛好像在努力理解她不需要理解的东西。数年后，她告诉劳拉说，她从儿时起，就“一直把不愉快的事情自己闷着，烦恼的事情自己憋着”。⁽⁵⁵⁾

马克思一向自豪于自己能够把个人烦恼放在一边，专注于更大的目标。但在这个5月，他得是铁打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就在这，他获悉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普鲁士的成员纷纷被捕。这次镇压行动是燕妮哥哥的命令，要把马克思在普鲁士的朋友一网打尽。5月10日，埃尔伯费尔德的裁缝彼得·诺特荣克第一个被扣押。8天后，警察根据从他手上搜获的文件，又逮捕了很多人，包括使用化名从伦敦到美因茨进行宣传的列斯纳、从4月起开始出版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的海尔曼·贝克尔、1848年帮马克思和燕妮找到住处的科隆医生罗兰特·丹尼尔斯以及多年前马克思被从巴黎驱逐时陪同他前往布鲁塞尔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总共12名马克思的战友被指控叛国和企图颠覆国家罪。11人被捕。⁽⁵⁶⁾只有弗莱里格拉特在被捕前逃出普鲁士，在5月的第三个星期抵达伦敦。⁽⁵⁷⁾其他人担心被捕，纷纷逃离普鲁士。到6月底，所谓的“马克思派”的成员或者被关在普鲁士的监狱，或者流亡在伦敦。

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责怪维利希的党羽导致了逮捕的发生，说他们总把革命当儿戏，在举行博览会时密谋，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警惕。“这些饶舌者知道，他们既没有阴谋造反，也没有追求任何现实的目标，……他们只愿做出危险的样子，……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种供认自己的目标纯粹是吹牛的党呢？”⁽⁵⁸⁾

丹尼尔斯被捕前，设法寄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给马克思，让他处理好所有信件，英国这边也会搜查住宅。马克思告诉恩格斯，把不大用得到的信件烧掉，把重要的材料交给玛丽保管。恩格斯照办之后，启程去伦敦和马克思以及刚到英国的战友们见面。⁽⁵⁹⁾恩格斯在伦敦从5月31日待到6月15日，男人们的话题肯定是政治。

马克思躲进阅览室进行经济学研究（他这一年的笔记最终写满 14 个笔记本）^{〔60〕}，但对恩格斯说，家里的混乱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使得他难以取得任何进展：

而在家，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61〕}

8 月 2 日，马克思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哀叹自己的处境：

你能想到，我正处在非常糟糕的境地。要是长此下去，我的妻子就要完了。经常的忧虑，为日常琐事的奔忙，使她筋疲力竭。此外，还要加上我的敌人的卑鄙行为。他们甚至从来也没有想在实质问题上攻击我，而是企图在生活琐事上污蔑我，散布关于我的难以言状的无耻谰言，来为他们自己的软弱无能报仇。……当然，我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都置之一笑，我的工作不会因此受到片刻干扰；但是你知道，我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都处于极不愉快的日常生活困境中……当民主派腐朽的阴沟里的恶劣气味由愚蠢的搬弄是非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精神振奋的。某些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审慎常常是难以置信的。^{〔62〕}

8 月中旬，马克思受到新的中伤。一家伦敦德语周报说，马克思为普鲁士反动报纸撰稿，是他的内兄斐迪南的间谍。^{〔63〕}马克思写信给一名德国报人，让他帮忙把信件发表，驳斥指控的荒谬，解释说斐迪南·冯·威

斯特华伦与马克思之间的唯一关系是前者把后者的发行人关进了监狱，还阻挠后者的《评论》的销售。但这未能起到效果。接到这封信的报人是奥地利间谍，读到这封信的自然只有警察。马克思的反驳未能见诸报端。^[64]

盛怒之下，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和鲁普斯的陪同下，来到这家伦敦周报，提出跟发行人决斗，后者应该没有接受这个野蛮的外国人想要恢复名誉的努力，因为决斗没有发生。^[65]

就当他们的生活已经悲惨到极致时，转机到来。马克思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寄来的一封信，邀请他成为该报 18 名有偿国外撰稿人中的一员，领域为欧洲事务。该报编辑查尔斯·达纳 1849 年到欧洲观察反革命形势时，在《新莱茵报》与马克思见过面。马克思这年早些时候写过信给美国报纸，询问他们在伦敦是否需要撰稿人，也许是这些信让达纳想起了与马克思的会面。《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行量大概 20 万份，是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66]马克思虽然对其评价不高，但还是愿意为其工作，^[67]但也有一个问题：马克思虽然已经开始通过背诵莎士比亚作品学习英语，但尚不能用英语对话和写作。^[68]他再次向恩格斯求助，说自己忙于经济学，问他能不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以前寄给我”。^[69]马克思让恩格斯可以随意“写得俏皮而不拘束”。^[70]马克思此时的风格与此完全相反。

22 流亡者的指挥中心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卡尔·马克思⁽¹⁾

恩格斯努力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但每篇文章 1 英镑的稿酬太少，即便加上他从工厂里拿钱不断接济，仍然不够马克思一家吃穿。马克思又是努力找人出版自己之前的作品，又是给《评论》找销路——一句话，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挣到钱。约瑟夫·魏德迈已经在纽约安顿下来，正在找报纸编辑的工作，但马克思说“在同鲁普斯一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建议他做政治小丛书发行人。⁽²⁾马克思自己要出版的小丛书就足够魏德迈忙上至少一年。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最好马上写一本关于经济学历史的著作，作为几卷书中的首卷，在德国出售。恩格斯说：

.....

最重要的是，你要拿出一部巨著在公众面前重新亮相，最好是丝毫不伤人的东西，如历史。……一定要打破由于你长期没有在德国的书籍市场上露面和书商们后来的胆怯

心理所造成的束缚。只要出版了你一两本富有教益的、学术性的、论据充分的，同时又很有趣的书，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书商们付的稿酬很低，你就可以不理睬他们。

.....

他还极为少有地带上了一丝批评的口吻，“这一次可要讲点生意经！”⁽³⁾

但马克思孤立、无能为力。他无法静心写作，他需要挣钱；他的战友未经审判被关在科隆的大牢里，运动不说已经结束，至少已经无以为继；他不仅被伦敦和德国的批评者嘲笑，在美国募集资金的对手也不忘给他造谣。已经有人在美国散布谣言说，“马克思派为了不当‘道德的英雄’，竟悬赏奖励罪恶”。⁽⁴⁾

尤其令人无奈的是，在谣言甚嚣尘上的同时，被马克思看作吹牛者的大批其他 1848 年流亡者却因为“勇敢”而赚得盆满钵满。他们通过发行未来政府公债券聚拢巨额资金，以发动革命的名义寻求贷款，通过演讲募集资金。一趟美国的演讲之旅就能筹集到 2 万美元。⁽⁵⁾

对抗哈布斯堡专制王朝并几乎取得胜利的匈牙利英雄约瑟夫·科苏特在 10 月来到伦敦，如同女王的勇士战斗归来般，在博览会（到最后一天，参观总人数达到 600 万）结束时，成为伦敦市长的座上宾。民众聚集在道路两侧，想一睹他的真容，他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一身匈牙利传统打扮，腰上挎着佩剑，从马车上站起身，接受民众的赞扬。⁽⁶⁾无论马克思的批评者承认与否，马克思对这类恭维从未表现出丝毫兴趣。但他显然注意到了自己与科苏特之间境况的差别。他告诉恩格斯说：“科苏特先生像使徒保罗一样：一切为了大家。他在马赛高喊‘共和国万岁’。而在南安普顿高喊‘天佑女王’。”马克思描绘了科苏特的这次筹集资金之旅，幸灾乐祸地说没有想象中的成功。⁽⁷⁾但这些其实与马克思无关。科苏特离开伦敦时有没有把口袋装满，对他的家庭没有任何影响。反正，他们一无所有。

虽然马克思家看似永远无法摆脱个人和经济状况上的不幸，但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一个远比这更重大的事件发生了，转移了整个家庭的注意——上到马克思，下到他的儿子埃德加。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

正式结束了 1848 年起义这一篇章。在军队支持下，这个 3 年前还对法国一无所知的王位觊觎者迅速废除法国第二共和国宪法，解散国民议会，自命终身总统。政变前，他已经与议会就即将于 1852 年结束的 4 年任期进行过长时间争论，而他选定的 12 月 2 日正是 1804 年他的叔叔加冕皇帝的日期。^[8]维克多·雨果说道：“一夜间，自由被宣誓过要保护自由的人践踏，法律的神圣、公民的权利、法庭的尊严和士兵的荣誉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凭借刺刀、虚伪、谋杀和刺杀而上台的独裁政府。”^[9]

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和中部的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但被全副武装的军队碾碎。在 12 月 3 日和 4 日仅仅两天的战斗中，便有大概 500 人死亡，26000 人被捕。^[10]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时，曾记录过柏林 1848 年起义的卡尔·舒尔茨正在伦敦。据他描述，政变的消息在流亡者中间引起轩然大波。所有人聚集到各个法国俱乐部，全都“群情激愤”。^[11]但无论他们如何愤怒，欧洲大陆的战斗已经结束。

马克思说，政变让一直想着回去继续战斗的流亡者的伟大梦想顿时黯淡无光。^[12]这对马克思有直接好处：他们自己被打击成这样，至少暂时没了打击他的兴致。而且，对于自己认为武装起义必将失败的预测得到应验，他肯定也感到满意。

魏德迈打算次年 1 月在纽约出版一份德语共产主义周报，名为《革命》，马克思将为首期写一份关于法国政变的文章。^[13]他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法国人民不但已经不再反对路易·拿破仑的大胆行为，反而为之兴奋起来。他的政府在全民投票中获得了令人吃惊的 92% 的选票。^[14]法国有产阶级并未反对，他们把路易·拿破仑的胜利看作自己的胜利——马克思对他们的立场做了形象描述：“他们窃笑‘罪行归他，果实归我们’。”^[15]

来自法国的紧迫消息好像使马克思家甩掉了一年的不幸。马克思给魏德迈的报纸撰稿虽然没有报酬，但至少让他的思想精力有所释放，也让他和燕妮恢复了合作。像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时一样，燕妮把他的一页页文字誊写一遍。在 12 月 17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燕妮说自己亲爱的卡尔正“在法国的污泥中，‘自讨苦吃’”，文章应该

能在恩格斯回伦敦这个周末前完成。马克思的情绪和高效很具感染力。燕妮说4岁的埃德加(已经改叫穆希上校)每天都给恩格斯写3封信,“十分认真地贴上旧邮票”。⁽¹⁶⁾数年后,燕妮回忆起那些帮马克思誊写“潦草的文章”的日子,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¹⁷⁾像马克思一样,为革命而做的工作也能平复她最悲伤的个人苦痛。

不出所料,马克思没能在周末前把文章写完,恩格斯的归来又耽搁了他一些时间。经济状况所限,马克思家的圣诞节恐怕只能简单点儿过了,不过好在恩格斯带回一些钱,加上有琳蕻做饭,倒也有吃有喝。

马克思和战友们的集会地点在索霍区以外、法灵顿街上的一家酒商处,位于伦敦报业聚集地舰队街附近。马克思把自己的俱乐部称为“会堂”。⁽¹⁸⁾一直跟着他去图书馆和“会堂”的年轻单身汉们在圣诞节和新年应该是在马克思家蹭的饭,因为马克思在1月1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自己、鲁普斯和红色沃尔弗的文章都还没有写好,自己是因为有私事,鲁普斯是因为生病,红色沃尔弗的文章则需要重写。⁽¹⁹⁾但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恩格斯所说的“狂欢”。⁽²⁰⁾

恩格斯对燕妮表示抱歉,说马克思为此在“遭难受罚的床上”躺了两周。⁽²¹⁾燕妮回复说:“您怎么能够认为我为了一次小小的纵酒而生您的气。……总之,这样的特殊事件通常会得到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效果;而这一次马克思老爹必定是在同‘大主教的侄子’^①进行夜间哲学漫游时得了重感冒。”⁽²²⁾

1月20日,马克思终于好了一些,能重新写作了,但只能待在家里写。他的问题不再是过度饮酒的副作用。问题与脑袋是否晕乎完全无关:痔疮。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没办法去阅览室,因为“这次痔疮对我的折磨比法国革命还厉害”。⁽²³⁾此间,燕妮兴致盎然地帮马克思写信,在为他的身体欠佳道歉的同时,也像马克思一样,和包括恩格斯、魏德迈在内的战友们讨论报上的新闻和政治消息。

信件中讨论最突出的是在她哥哥的镇压活动中被捕的战友。马克思和燕妮了解到,经过9个月的关押,他们不会按照之前估计的那样在1月因叛国罪受审,因为当局宣布案情复杂,需要重新调查。没有多少报

^① 指恩格斯。

纸对这 11 个被关押的人进行报道，更没有报纸理会当局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而特意拖延审判的做法。^[24]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燕妮说他们的战友还需要“再坐三个月的牢房”，受到极坏的待遇，除了马克思，周围的人无人理会。^[25]

有了燕妮做通信秘书，马克思开始夜以继日地组织宣传攻势，确保这些战友不被报纸遗忘。他说普鲁士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报刊不理睬这件案子，是因为他们代表的团体把这当做除去政敌的机会。^[26]马克思只得求助于英语报纸来关注这个案件。同时，他还在忙着完成那篇关于拿破仑政变的报道，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来自拿破仑一世 1799 年发动政变建立独裁的法国革命历日期。^[27]

马克思坐在家唯一的一张桌子前工作，周围无比杂乱。孩子们发明了一个新游戏：马克思坐在椅子上，她们在他后面排成一列，她们是马车，马克思是拉车的马，要装出用力拉车或者挨上一鞭子的样子。数年后，他的女儿写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几章是在给他的三个孩子当马的同时写出来的”。^[28]马克思只有在安静的夜里，才能集中精神工作。他经常在寒冷的前厅熬夜到天亮，时不时抽几口能买得起的“廉价破烂”雪茄。早上，他倒在沙发上，家人在周围继续一天的生活。这样的作息对他的健康有害，尤其是眼睛。^[29]他经常借助油灯或蜡烛的昏暗光线阅读。煤油灯倒是更亮，但在狭小的空间里气味太大。^[30]这些都不是好办法，但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也只能如此，伦敦的冬天极为阴暗，太阳很少出来，白天有时也要点灯。

即使这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是没能刊登在魏德迈的报纸上：马克思还没写完，报纸就倒闭了。部分原因是这篇“文章”逐渐扩展^[31]（马克思说是出于需要）^[32]成了一本书。马克思好像非常享受——此时也极为擅长——写这类报道，他能把博学与对事件的把握结合起来，把某个时刻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别人看到波浪，他却能看到潮汐。对于路易·拿破仑看似不可能的崛起，他写道：

.....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
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

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³³⁾

.....

谁都无法想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作者是一边坐在椅子上当马，一边写的，是在眼睛红肿得几乎看不见东西的情况下写的，但谁都会被书中清晰的思维折服。文字简洁、雄辩，分析和文风出色。可这却不足以让马克思找到出版商，而他又必须想办法弄到钱。他想过把批评蒲鲁东的文章再利用一下，也找过出版商商谈自己尚在概念中的经济学著作。但都不成功。⁽³⁴⁾2月底，他告诉恩格斯说：“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马克思又没外衣又没钱，无法参加纪念1848年起义的宴会。不过，他让燕妮去了，后者作为一个法国人的同伴一起参加，不用交入场费。⁽³⁵⁾

间谍们好像有第六感，知道马克思主义家什么时候有空子可钻。马克思收到匿名提醒，说有间谍渗入他和朋友们中间。⁽³⁶⁾马克思觉得自己知道是谁。去年12月，他和同伴在法灵顿街照例举行星期四集会时，有个叫威廉·希尔施的人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马克思的直觉是对的：希尔施受到普鲁士警察收买，来寻找将关在科隆监狱的同盟盟员定罪所需的证据。⁽³⁷⁾在伦敦第一年期间，马克思和同伴们听起来跟被指控的犯罪团伙的确有些相似：革命、刺杀等各种反政府活动都讨论过。但希尔施参加集会时，他们的侧重点是宣传和生存。大家从一开始就对希尔施有所怀疑，背着他把“会堂”集会改到了星期三在索霍区玫瑰皇冠酒馆举行。⁽³⁸⁾

但事情远未结束。希尔施是按件得钱的，找到证据，才有钱拿，为此，他伪造了会议记录。马克思这时还不知道希尔施的创造，也不知道

另一名间谍施蒂贝尔已经从敌对流亡者的集会上拿到一些文件，准备用来对付他的朋友。最危险的是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还有一名密探在想方设法进入他的小圈子，而这个人的告密将对他和他的朋友们造成极大伤害。

恩格斯回到伦敦过复活节，但这次并不像去年圣诞节回来时那样轻松愉快。马克思和燕妮最小的孩子弗兰契斯卡由于严重的支气管炎发作，在4月14日第一个生日后不久死了。⁽³⁹⁾在19世纪的英国，婴儿在这个年纪死亡并不少见；大约15%的婴儿在年满一岁前死亡。⁽⁴⁰⁾但这样的统计数字无法安抚任何父母的悲伤，燕妮更甚，还要遭受贫穷的折磨。家里甚至没钱给弗兰契斯卡买一副棺材。

因为没办法埋葬女儿，燕妮把孩子的尸体放在后屋，把床和被褥搬到前厅，在找到钱安葬女儿之前，一家人先住在前厅。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三个活着的孩子在我们身边躺下，我们都悲伤地为我们的天使哭泣，她的铁青、毫无生机的身体就放在隔壁。”燕妮和马克思向德国和英国朋友们借钱，但徒劳无果（连恩格斯都没有钱）。最终，燕妮找到住在附近的一名法国移民，后者给了她两英镑买棺材。“她来到这个世界时没有摇篮，离开这个世界时又很长时间连个安息的地方都没有”，燕妮回忆说。“看着她被埋进坟墓，我们的心情是何等悲伤沉重！”弗兰契斯卡被埋在了与第恩街相距几个街区的墓地——小福克斯就埋在这里。⁽⁴¹⁾

马克思和燕妮还没来得及哀悼女儿，更多的坏消息接踵而至。魏德迈一直想安排出版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终究无法实现，他告诉马克思这一消息的信刚好在弗兰契斯卡下葬那天送到。⁽⁴²⁾马克思告诉一个朋友说这封信让人崩溃。“她（燕妮）看到两年来我的整个事业如何不断遭到挫折。”⁽⁴³⁾马克思向恩格斯倾诉说：“我上星期处境之糟，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在埋葬那天，各方面答应钱全没有收到，为了向这些英国的狗东西付埋葬费，我最后不得不跑到邻居法国人那里。同时非常不幸的是，又接到魏德迈的来信，从来信看，在美国的一切希望似乎也全都破灭了。……虽然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这种混账事情这一次却沉重地打击了我。”⁽⁴⁴⁾后来他又说：“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时，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⁴⁵⁾

在某种方式上，马克思这样做了。一个名叫亚诺什·班迪亚的匈牙利报人认识了马克思，并在1852年春天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班迪亚便是那个马克思没能察觉的间谍，他的背叛给马克思带来了政治上和私人上的双重后果。从马克思写给恩格斯和美国的同伴的信件看，他完全信任班迪亚，并在4月底轻易跳进了后者设置的圈套。出于消遣，马克思写过几个在伦敦的德国反对派流亡者的讽刺性短文，讲述他们的组织、喜好和目标。班迪亚告诉马克思，柏林一个名叫艾森曼的出版商愿意出25英镑买一小本这样的短文，马克思可以匿名写。^[46]

马克思想让恩格斯一起写，但恩格斯有些疑虑。他考虑万一两个人被自己攻击的人发现，爆出丑闻，这个钱值不值得。而且，在他们的科隆朋友面临指控的时候，这样的书会不会被看作是对整个德国反对派的不忠，甚至反动。^[47]但马克思无法抵挡班迪亚提供的价钱的诱惑。匈牙利人说一收到书稿，就会尽快付款。5月底，马克思到曼彻斯特与恩格斯一起做这件事情。

马克思每次离开伦敦，燕妮都要独自面对愤怒的债主。但这次，倒有了收入可期：马克思不在家时，班迪亚给了燕妮一份合同，说是柏林的出版商根据马克思的要求拟定的。^[48]但这买不来一家人活命所马上需要的牛奶、面包、土豆和煤。马克思在这个时候离开尤其艰难，因为弗兰契斯卡死后刚刚一个月，燕妮仍沉浸在悲痛，甚至自责当中——如果他们能给孩子们提供他们应得的生活条件，弗兰契斯卡和小福克斯可能就不会死。

6月初，马克思和燕妮将小燕妮、劳拉和穆希送到了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的父亲正好去曼彻斯特，所以孩子们应该是和玛丽·白恩士、莉齐·白恩士住在一起。他们都在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件末尾写了一些话，说吃到牛排、豆子和土豆多么开心。劳拉帮穆希代笔说：“吃过丰盛的晚餐，我们还会有一顿美味的夜餐，有您最喜欢的黄油面包，还有奶酪啤酒。我们会为您和弗里德的健康干杯，如果我们喝醉了，那可是为了您的健康。再见，我最好的爸爸。”^[49]孩子们只需要这点东西，就能如此快乐，可马克思和燕妮却连这点东西也给不了她们。

孩子们回来后，马克思去了曼彻斯特。燕妮在给他的信中痛苦地说：“我坐在这里，六神无主。卡尔，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我坐在这儿，

眼睛都快哭出来了，却依然找不到帮助。我的脑袋快裂开了。一周来，我强撑着，但现在我撑不住了。”⁽⁵⁰⁾马克思的回复 90% 的时候谈公事，只有 10% 的时候安慰燕妮。可能是因为他与恩格斯一起实在太愉快了（他说他们写这些短文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体会不到燕妮的困境。或者，他知道帮助妻子的最好办法，除了寄钱，便是让她专心于事业。马克思常说燕妮生性乐观，有一点点美好的希望就能振作起来。他因此在 6 月 11 日写信给她：“我亲爱的……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经受这一切的话，那么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后，他又给燕妮布置了一系列党的任务，还夸她把另一件事情完成得非常出色。⁽⁵¹⁾

对孩子们来说，家里的政治活动、夜里来家里集会的各色人物，以及不断上门讨债的债主，都已经让他们习以为常。况且，他们也没有其他参照进行对比，玩伴们的父母大多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是投身反对派政治的贫穷德国流亡者。但马克思和燕妮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当初按照自己阶级普遍接受的方式养家，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不同。到伦敦后，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选择将要面对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每年都会加剧。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将是他们的生活最黑暗的时候之一。可以说，没有任何事情按照他们的预期发展。

马克思站在旁边口述，燕妮和恩斯特·德朗克轮流笔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百页流亡人物短文《流亡中的大人物》。完成后，班迪亚很快给了钱，扣除 7 英镑后（显然是之前借给马克思的），给了马克思 18 英镑。⁽⁵²⁾马克思付过报酬给德朗克后，剩下的钱根本不够开销，班迪亚又不肯说小册子什么时候能出版，但马克思对此寄以厚望。⁽⁵³⁾恩格斯经济也很紧张，8 月时告诉马克思说自己 6 个星期内恐怕无法给他寄钱。⁽⁵⁴⁾魏德迈的报纸凭借一个德国流亡者赞助的 40 美元复活了，也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印了，但这笔钱不够配送的费用，报纸只能堆在一边，到不了读者手里。⁽⁵⁵⁾威廉·皮佩尔的英文译本一团糟，根本无法在伦敦销售，德国又没有出版商对作品表示出兴趣。⁽⁵⁶⁾这样的耽搁很要命，因为每过一天，作品的相关性就减少一分，就会有更多的读者去看其他关于这次法国政变的作品。尤其让马克思恼怒的是，他的宿敌蒲鲁东批评路易·拿破仑的作品赚了 10 万法郎。⁽⁵⁷⁾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信件中显得非常烦恼，总谈论对手的经济状况，没钱导致的焦虑非常明显。他还极为少见地关注起别人对自己和恩格斯的攻击。尤其激怒他的是一个在美国辛辛那提旅行的德国流亡者，后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革命者，而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了出来”。⁽⁵⁸⁾ 马克思虽然总说不在乎流言，但面对 1852 年下半年凄惨的经济状况，作品又得不到认可，他的神经很容易被刺痛。

说这句话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因其救世政治幻想，被马克思称为“耶稣基督”金克尔）回到伦敦后，马克思写信质问他，但后者没有回应。马克思觉得金克尔怕自己再写信，肯定不会再收下寄自索霍区的信件，便让鲁普斯从温莎投寄给他，用的是写情书的信纸。金克尔打开这封信，就会发现在芬芳的玫瑰花和勿忘我花中间，是卡尔·马克思博士的一番挖苦。⁽⁵⁹⁾

马克思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他告诉恩格斯说，一家人都病了，却请不起医生。“八至十天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现在，四面八方都在攻击我了。”面包房老板、菜贩和肉铺老板都在向马克思要债。“从我的一些信中，你大概已经看出，当我亲身遭遇到这种坏事而不是听别人议论时，我通常都是很无所谓地容忍过去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家变成了一个诊疗所，而危机是这样尖锐，迫使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有什么办法！”⁽⁶⁰⁾

最后的办法是当铺，但估值一般只有真正价值的三分之一，算上最后要交纳的高额利息，比这还要少。马克思把燕妮的带有阿盖尔家族饰章的银器拿了一些去典当，当铺老板见一个看着如此粗俗、贫困的外国人手里拿着如此昂贵的东西时，以为他是偷来的，便要找警察来。可能是觉得羞愧，马克思没有把这件事的结果记下来。一个流传下来的说法是，马克思成功地让当铺老板相信自己的妻子出自英国最有历史的家族之一。另一个说法是马克思被怀疑偷盗，关了一晚上，直到燕妮证明了自己与阿盖尔家族的关联，马克思才被释放。⁽⁶¹⁾ 不论哪一个说法是真的，结果都一样：马克思感受到了难言的羞辱。他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被身处伦敦最肮脏的区域之一的当铺老板当成罪犯。

1852 年秋，马克思家的狭小公寓成了流亡者的指挥中心，大家一

起忙着挖出间谍、拯救被关在科隆的战友。燕妮告诉马克思在华盛顿的朋友阿道夫·克路斯说，他们在第恩街的公寓有了整套办事机构。

“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目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⁶²⁾

经过 17 个月，普鲁士被捕同盟盟员案件终于准备庭审。检察当局的证据极为荒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被无罪释放——给他们定罪已经变成事关政府声誉的问题。马克思和朋友们认为陪审法庭是专门设计的，包括三名资产阶级上层、两名城市贵族、两名地主、两名政府顾问和一名普鲁士教授，对被告不利。⁽⁶³⁾有利的方面是，两名重要的控方证人失踪，其中一人逃去了巴西，另外有确切证据表明警方有不法行为。⁽⁶⁴⁾

检察当局的起诉状长达 70 页，对聚集在伦敦（说是按照马克思的指示）的德国激进反对派的描述很是吓人。虽然从 1851 年 5 月逮捕到 1852 年 10 月开庭审理，过程已经极为漫长曲折，检察当局没有满足于此，甚至提供了早至 1831 年和同盟成立之初时的证据。⁽⁶⁵⁾在盟员被长期关押期间，当局通过强迫他们行军（每人长达 11 天）等审讯方式，从他们口中得到了一些资料。⁽⁶⁶⁾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健康都受到了损害。受到伤害最大的包括出版商贝克尔和医生丹尼尔斯，前者据说会失明，后者出现了肺病的迹象。⁽⁶⁷⁾

马克思认为，虽然当局从被告直接获得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具有反政府情绪，但并不能如诉状所称，证明他们参与了任何反政府密谋。他说，这一指控的所谓证据主要是在伦敦活动的间谍搜集到的，目的是让公众相信被告不是因为政治观点受审，而是因为他们很危险，他们的领袖更加危险。马克思虽然没有和其他 11 人一起站在被告席上，但显然他才是主要目标。⁽⁶⁸⁾

间谍施蒂贝尔提供给检察当局的文件实际上是监视维利希一伙时得到的，这伙人的确密谋过反政府暴力行为。有警察报告说马克思等人已经从上述团伙分裂出去，但当局对马克思念念不忘，对此选择了无视。⁽⁶⁹⁾“马克思派比其他流亡者、煽动者和中央委员会都要厉害。……

马克思本人更是众所周知，他手指头里的聪明都比其他人加起来脑袋里的聪明还要多。”^[70]为此，检察当局违心地把这些文件列为证据，想着马克思一伙和维利希一伙的活动重叠的地方很多，陪审员也许不会发现。

当局在施蒂贝尔的文件上要的花招没被发现，希尔施提供的证据就不行了，虚假之处太明显，马上便被拆穿。第恩街辩护委员会称：希尔施声称自己参加马克思的“会堂”会议，听到他们讨论密谋，从而记录下来的记录是伪造的，而且伪造得并不高明。辩护委员会提供了笔迹样本，证明会议记录人根本不是希尔施所说的李卜克内西和另一个叫L.W.林斯的盟员，后者几乎不识字，自然无法记录——希尔施的运气实在不好。他们还拿到酒馆老板的证词，证明他们的集会时间是星期三，而非星期四，地点也与希尔施所说不符。记录显是伪证无疑，加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法庭只得将希尔施提供的记录不予采纳。^[71]

这份证据失去后，检察机关更加坚决地要保住一份最为有力的证据。（柏林最高检察官写信给普鲁士驻伦敦使馆说：“政治警察的存在与否完全取决于庭审结果！”）^[72]一封未署名的信件和50本“红色问答书”被发现后，经鉴定，信件出自马克思之手，上面写着：“革命比某些人所想像的更迫近了。革命万岁！”还指示收到信的人在1852年6月5日午夜前把“问答书”悄悄塞进具有革命信念的人家里去。虽然这封信应该是在被告被捕后出现的，但还是被列为了证据。

这让伦敦的人难以置信，所有知道马克思的人都知道这是假的：不仅因为他永远不会搞这样无聊的事情——午夜十二点的时候把文件塞进支持者家门；还因为信件内容与他的信念相反。马克思早已因为认定革命近期不会发生而引起其他流亡者的愤怒。^[73]马克思找到英国治安法官，宣誓自己与那封信和“问答书”无关，之后把声明寄到科隆作为辩护材料，并在英国报上发表。但检察机关不为所动，拒绝将马克思的笔迹与那封信件进行对比。^[74]

站在证人席上，施蒂贝尔描述说，伦敦有一个精细的监视网络，每名“密探”背后都有一名间谍——前者一般是当地人，受后者雇佣做事，自然也受后者监视。^[75]10月时，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辩护委员会在楼上工作时，房子外面出现过可疑的人。此外，两人都觉得有人在偷偷拆看自己的信件。^[76]但他们没有让工作受到影响：5个星期里，流亡者

他们在第恩街楼里跑上跑下，搜集和拼凑证据，营救他们的朋友。他们来得早，走得晚，抽的雪茄搞得屋里烟雾缭绕，随着新的消息传来，他们一会儿大笑，一会儿愤怒。孩子们对于他们挤在自己家里又是吃饭又是喝啤酒，已经习以为常，把他们当作了家人。一天早上，燕妮还没穿戴好，一个成员便进来了，燕妮赶紧去抓衣服，穆希上校却让她不用担心，“是弗莱里格拉特”。⁽⁷⁷⁾

在这期间，马克思完全投入科隆案件，无暇他顾，便由燕妮代表他处理案件以外的事务，包括参加纪念 1848 年维也纳起义中牺牲的一个战友的大会。⁽⁷⁸⁾他写了一篇关于科隆案件的文章，长达 50 页，打算尽快出版，吸引公众对案件的关注。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自己当然无力为这个案件拿出哪怕是一分钱来。昨天我为了买书写纸，把从利物浦带来的一件上衣也当了。”⁽⁷⁹⁾这时，马克思的房东威胁他再不交房租，就把他赶出去。马克思说，房东说了很难听的话，而自己也耍了一回横，让房东灰溜溜地走了。⁽⁸⁰⁾

案件在 11 月 7 日宣判。宣判前，柏林各报纸都预测被告将被无罪释放，因为指控未能证实。⁽⁸¹⁾但陪审法庭对 11 名被告的裁决各不相同：包括丹尼尔斯在内的 4 人被无罪释放，其他 7 人被判有罪。包括报人毕尔格尔斯在内的 3 人被判 6 年徒刑，包括出版商贝克尔在内的 3 人被判 5 年，裁缝列斯纳被判 3 年。⁽⁸²⁾燕妮说，裁决结果是陪审法庭在“对这些可怕的杀人放火者的憎恨”与“对警察当局的卑鄙行为的反感”之间取舍的结果。⁽⁸³⁾

不到两周后，马克思正式宣布解散同盟。庭审的结果，普鲁士当局一定要除掉同盟而后快的决心，欧洲的反革命气候，加上马克思认为当前的时机更适合进行反思和学习而非组织运动——这些都让他觉得，同盟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⁸⁴⁾之后发生的两个事件印证了马克思的想法。12 月 2 日，共和主义的堡垒法国再次成为帝国，路易·拿破仑不满足于做终身总统，宣布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这个曾经在帽子里藏一块培根来吸引雄鹰盘旋在自己头顶的小个子骗过了最狡猾的政府部长们，成功地让民众相信他能够恢复法国昔日的荣耀和稳定。好像在他一挥手间，1815 年到 1848 年间取得的所有革命成果都消散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于知道了他们在其中坦露一切的《流亡中的大人

物》的命运：所谓感兴趣的出版商根本不存在，班迪亚把手稿交给了警察，在一个月以内从柏林两次拿到钱（这也是为什么他能那么快付钱给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来以为小册子出版后才会落到警察手里，但班迪亚的出卖使得警察在调查科隆案件时便掌握了这本书，从而对流亡者团体有了更多了解。^[85] 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兄弟责怪马克思导致了罗兰特的被捕，说如果马克思没有认识班迪亚，罗兰特就不会被捕。^[86]（这样的指责并不公平，在马克思见到班迪亚一年前，丹尼尔斯便已被捕。）班迪亚逃到了拿破仑的巴黎，成为法国警察部的特别探员。^[87]

对于拿破仑和班迪亚，马克思出乎意料地表现得很淡然，也许是因为当时有瑞士出版商对他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评价极高，表示愿意出版，马克思对此非常兴奋。^[88] 燕妮说，按照出版商的估计，首批销售就能为他们挣得 30 英镑。^[89] 马克思寄了一份手稿给华盛顿的阿道夫·克路斯，建议他看看能不能在美国出版。

.....

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那么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挣钱，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此外，案件使德国的出版商完全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就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能同他们签订合同。^[90]

.....

来自瑞士的这次机会将再次变成失望。出版商把几乎全部 2000 本印好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偷偷运到了巴登，打算从这里分发到普鲁士各地。但出现了差错：全部书籍在存放的村庄被普鲁士政府没收、烧毁。马克思出离愤怒，恼怒地表示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兴致来写作。^[91] 真是白费精神！”^[92]

但这还没完。数月内，瑞士出版商的合作伙伴要求马克思支付 424 法郎印刷费用。又一个挣钱的事儿变成了负债。^[93]

23 家庭生活的苦乐



我们有理由忧伤，但我们用心酸的幽默来排解。有谁一抱怨，就会有伙伴马上提醒他对社会的责任。

——威廉·李卜克内西⁽¹⁾

普鲁士政府赢得了这一轮，马克思决定公开声明不再涉足任何党派政治。他受到了太多的诋毁——被对手，更关键的是，被曾经的朋友。“我不愿再忍受党的任何一头蠢驴以党为借口来侮辱我了。”⁽²⁾同盟辩护委员会还剩下最后一个任务：发出呼吁，为在普鲁士被判入狱的盟员的家人募捐。⁽³⁾这件事做完后，大家各自收拾东西，离开了马克思家，各自找事做，挣钱谋生。恩格斯担心这些人离开马克思后无所事事，最终变成酒鬼。⁽⁴⁾之前他一直在支撑着委员会的费用，加上自己的花销，他说，自己已经“花掉老头子一半的利润”。他和伙伴们必须更加节省，但不是他不愿再挪用父亲的利润，而是怕被发现。

恩格斯从自己做起：搬去更便宜的住处，喝更便宜的酒。⁽⁵⁾马克思则在新年后便把自己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他现在的报酬是一篇文章两英镑，他打算每周至少写两篇。⁽⁶⁾燕妮觉得这样的收入已经足够日常开销，虽然没办法从“狭小的第恩街公寓”搬走。其实，她好像也没有急着搬走。到1853年，马克思家在索霍区已经住了近3年，连燕妮都逐渐适应了这里的贫穷、污浊和混乱。她有了自己

最喜欢的酒馆和咖啡屋见朋友或舒服地坐一坐，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找到免费的戏票去看演出。她喜欢在索霍区长时间散步。⁽⁷⁾喜欢戏剧的她开始欣赏起在她周围上演的这出大戏——伦敦生活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都色彩纷呈地展现在她眼前。

牛津街上橱窗和衣服布料店遍布，满是公共马车、私人家的豪华马车，以及穿着体面出来购物的女人。海马基特同样人流涌动，劳动妇女和女孩一边沿街叫卖一些农产或鲜花药草，一边买些需要的东西放进顶在头顶或挂在脖子上的篮子里。还有爱尔兰区，在这里，一杯咖啡就算是一顿饭了。头上戴着围巾、脸上被晒得通红的妇女坐在地上，为了更暖和一些，把膝盖和脚都蜷缩在衣服里，只露出一只手来，等着极为稀少的顾客停下来，看看她们卖的东西。⁽⁸⁾为了吸引顾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卖歌词和口号，这些叫卖声与操着各种语言闲聊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索霍区街头生活的一出实时歌剧。不论是悲伤，还是混乱，在过客眼里，都在不断变化当中，也因此一直让他们觉得有趣——只要他们不靠得太近去观察。

燕妮在这些区域漫步时，戴着暗色的面纱，体现着出身带给她的优雅，让人觉得她应该是到这里看看，而非住在这里。

对孩子们来说，索霍区是他们的家，他们经历过的最稳定的家。但由于街上经常有些不三不四、道德败坏的人搞些所谓的消遣，女孩子们没有大人陪同，一般不在傍晚或晚上出去。比如第恩街上的索霍区剧院虽然破烂不堪，还是有很多小偷和妓女聚集。⁽⁹⁾第恩街上的考德威尔舞厅同样危险，经常有德国中产阶级雇用的年轻伙计和学徒来这里。⁽¹⁰⁾

小燕妮和劳拉都还很小（小燕妮将近9岁，劳拉7岁），但都喜欢交朋友。小燕妮更像父亲：黑色的头发和眼睛，同样的面色和性情；劳拉则一头金色秀发，像母亲一样优雅。李卜克内西说，劳拉从小就有一双淘气的眼睛。⁽¹¹⁾女孩子们很多时候只能待在家里，无所畏惧的穆希却可以到处玩耍。他认识第恩街上很多爱尔兰穷人家的孩子，他们教他唱歌，他则把自己非常少的零花钱贡献出来。⁽¹²⁾马克思一家在家里说德语，但孩子们学英语学得很快，穆希的英语说得跟索霍区本地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燕妮描述过穆希的一次勇敢事迹。当时面包铺老板威胁说以后不

再赊欠面包给马克思家，问站在门口的穆希：“马克思先生在家吗？”6岁的穆希回答说：“不，他不在楼上”，然后就把三个面包夹在腋下，飞快地跑去告诉父亲。⁽¹³⁾他显然是在街上学会的这些：有观察者说，索霍区的孩子连走路都还没学会，就已经知道了偷东西。⁽¹⁴⁾

不过，对女孩子们和穆希来说，索霍区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危险。同父母一样，他们的交往圈子也是其他德国流亡者——他们甚至到伦敦以外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营参加野餐，参加者多为共产主义工人教育俱乐部成员的家人。⁽¹⁵⁾穆希与卡尔·布林德的继子斐迪南·科恩尤其亲近。⁽¹⁶⁾但孩子们最好、也是最喜欢的玩伴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有时叫他爸爸，但更多的时候叫他摩尔。他们允许他每天忙碌，但星期日必须全身心陪他们，马克思很愿意地答应了（但他还是在口袋里装个小本子，时不时偷偷写点东西）。⁽¹⁷⁾

天气好的时候，一家人和正好在家里的朋友会从索霍区出发，走上一个半小时，到汉普斯泰特荒阜野餐。琳蘅挎着一个从德国带来的篮子，装着午餐，啤酒在荒野上买。午饭后，大人们打打盹或看看报，马克思陪孩子们一起玩耍。⁽¹⁸⁾李卜克内西回忆说，有一次马克思从树上砸栗子，砸的时间太久，右臂一连8天动不了。⁽¹⁹⁾他们有时也做游戏，马克思的朋友们装成马，每人背一个小孩，展开战斗，直到有一匹两条腿的战马告饶认输。还有骑驴游戏，马克思总会参加，完全不在乎自己装起步履蹒跚的驴子时的搞笑模样。⁽²⁰⁾返回索霍区的路上，或者有人唱歌，或者马克思背诵《神曲》里的句子或扮演歌德的《浮士德》里的魔鬼靡菲斯特（李卜克内西说他演得不够好，太夸张）。接下来，马克思要讲自己的原创故事《英里》，他一停下来，孩子们便大喊“再讲一英里”。⁽²¹⁾

马克思从孩子们很小时便培养他们对文学和语言的热爱，像燕妮的父亲一样，他也让莎士比亚成了家里的尊贵客人。⁽²²⁾他和燕妮不断给孩子们吟诵莎士比亚的剧作，神奇地把混乱狭小的阁楼变成了维罗纳的辉煌宫殿、法国的宏大战场和凄冷的伦敦塔，直到孩子们把台词记住，和他们一起吟诵。他还给他们读但丁、塞万提斯、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和巴尔扎克的作品——而且尽量用原语言。这些小学者们在信件中总会流露出对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家里的朋友般熟

悉，还时不时像大人一样，用一些引用和双关语。马克思家的精神食粮是丰盛的，这也许帮助他们忍受物质食粮的彻底匮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马克思在第恩街的生活做出的最仔细的描述来自一名普鲁士间谍的一份报告。他登过马克思家的门，觉得马克思的天才和精力让人印象深刻，但个人生活一团糟。“他过的是真正散漫的知识分子生活。洗刷、打扮、换床单这类事情很少做，喜欢喝醉。……没有固定的睡觉和起床时间。”报告说马克思的三个孩子长得非常漂亮，马克思虽然性格粗鲁、急躁，但在妻子和孩子面前，“比任何男人都更温柔、和善”。但家里的状况会让任何一个绅士望而却步：

.....

马克思住在伦敦最差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最便宜。他有两间房间。……房子里没有一件干净、完好的家具，全都破了或者碎了，灰尘足有半英寸厚，到处都是片混乱。客厅中间放着一张很大的老式圆桌，铺着油布，上面有他的手稿、书籍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他妻子做针线活的篮子和碎布条，几个边上已经破损的杯子、刀叉、油灯、墨水瓶、玻璃杯、荷兰土烟袋、烟灰——一句话，乱七八糟，全放在桌子上。……想找地方坐下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把椅子只有三条腿，另一把孩子们在上面做饭玩儿的椅子倒是有四条腿，这把正是给客人坐的，但孩子们做饭玩儿的痕迹还在上面呢，真要坐下，一条裤子就毁了。

.....

他说，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和燕妮对此都不觉得难堪。“当谈话热烈起来、愉快起来，这些不足和不便好像又没有那么让人难以忍受了。慢慢地，你会逐渐习惯，觉得很有趣、很新奇。这就是共产主义领袖马克思的真实家庭生活。”^[23]

经过流亡者之间的争斗、科隆案的审判和两个孩子的夭折，从1853年起，马克思暂时把经济学著作和政治生活放在一边，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他为纽约的报纸撰稿，做每一个19世纪的丈夫和父亲都需要做的事情——养家。我们无法说他做得不错（家里一直处于负债状

态)，但也无法说他不喜欢做。革命者马克思开始了假期，开始观察和记录周围的生活，而不是尝试改变它。

这期间，马克思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日报的头版新闻的署名处。他用自己的语言在自己的国家写作会遭到查禁、迫害，但在 19 世纪中叶新闻报道无比自由、政治对话无比热闹的美国，他拥有热切的读者。《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很多读者都会同意马克思对欧洲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批评以及对奴隶制度和死刑的直言反对。他的文章经常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用作第一篇社论，确立报纸当天的基调。马克思的报道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尤其是在他嘲讽和攻击科苏特或马志尼等独立英雄的时候，他有时也抱怨自己的文章被编辑得失去了锋芒。不过，针对他的一篇具有争议的报道，《纽约每日论坛报》向这位伦敦的撰稿人表达了赞赏：“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绝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24]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知道，他们只是从积极的政治活动中抽身出来，放一个假。恩格斯甚至想过以后回到德国，工作和招募新成员，完成一直以来的愿望——创办一份报纸。^[25]他相信，“马克思派”下一次登上世界舞台时，行动的条件将会更好，因为很多旧日的投机者已经离欧赴美，年轻一代经过科隆案件的洗礼会进入党内，他们自己也将在流亡中得到锤炼。在 1853 年 4 月 12 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恩格斯描述了对未来的展望。

.....

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底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

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史的辩护。^[26]

.....

可以说，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 20 世纪共产主义发展变化（即便不能说是剧烈震荡）的一个预见性描述。但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两位 19 世纪的共产主义创始人尚未完成能够用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并指导另一个时代的著作。他们已经决定要开始，但他们首先需要解决马克思家的迫切之需。

从 1849 年来到伦敦，马克思一家便和其他数万伦敦穷人一样，不得不每年带着惊奇和艳羡欣赏城内的圣诞美景。城市各个角落，原本脏兮兮的店铺窗户焕然一新，借助店内柔和的灯光，路人可以一瞥里面的玩具、织布和首饰。橱窗里展示着舞会礼服、儿童手套以及缎面靴子——在这样一个泥泞的城市，这实在是令人无法形容的奢靡。在卖食物的商场和市场，各种肉类一应俱全，蔬菜堆积成绿色、红色和白色的小山，边上还有新鲜的水果、干果以及各类糖果。购物的人群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不断有推车和篷车咯吱咯吱从路面驶过，向店铺供应鲜货，向翘首期盼的各家送去订购的货品。到了夜里，应着石块路面上极具韵律的马蹄声，唱圣歌的人和小提琴演奏者欢快地表演着，其他歌手和乐师只能暂避锋芒。^[27]这样的欢庆让人无法视而不见，但一无所有的马克思一家只能强迫自己如此。但在 1853 年，他们决定尝尝欢庆的味道。

对马克思一家来说，圣诞节完全是世俗的节日，当孩子们问到起源时，马克思把基督的故事改成了一个被富人杀害的穷木匠的故事。他一般没多少时间放在宗教上，但他说人们可以“宽恕基督教，因为它教会我们崇拜孩子”。^[28]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大人们在前厅做些布置、准备礼物，孩子们都不准进来。多年后，小燕妮在给妹妹劳拉的一封信中，回忆起在第恩街过的这次圣诞节：“当时的情景就在我眼前闪过，我清楚地记得你、埃德加和我伸长耳朵，焦急地等待着邀请我们进屋看圣诞树的铃声响起。等到铃声真的响起，我们都被吓了一跳。……你害羞地躲在后面，我却极为大胆地冲在了前面——为了隐藏我自己的胆怯。那客厅看着是那么美妙，往日积满灰尘的旧家具竟然焕然一新。”^[29]

恩格斯和其他朋友纷纷登门帮忙布置，给孩子们带来礼物——布偶、假枪、厨房器具，还有一面小鼓。燕妮说，这是一家人在伦敦过的第一个真正欢快的圣诞节。像以往恩格斯带酒来时一样，马克思事后又病了。^[30]实际上，一家人都病了，尤其是穆希——马克思说，他发高烧，说胡话，在床上折腾。他对恩格斯说：“希望小家伙能早日恢复健康。”^[31]

与马克思的愿望相反，一家人在1854年疾病缠身。一个好了，另一个又病倒，不过如马克思所说，总算没有一起全都生病。孩子们的病是简单的麻疹或感冒，但燕妮和马克思出现了多种病症，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32]马克思因为风湿加上鼻子和嘴巴之间长了一个很大的脓包，说话或笑一笑都疼，以至于一连将近3个星期无法做事。他还承受了类似肝炎的肝部疾病的侵袭（他在1853年春天染上这一疾病，一生都受其煎熬）。^[33]据燕妮说，她的丈夫疼得无法入睡，最后不得不使用鸦片和斑螫硬膏（一种局部用药膏）。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无法写作，家里的钱箱又空了。燕妮写信给他们在曼彻斯特的可靠朋友说：“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我们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34]

马克思康复后不久，燕妮又生病了，加之精神疲劳，病情有所加重。她已经40岁，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自怀上弗兰契斯卡以来，她已经4年没有怀孕，是结婚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也许是弗兰契斯卡和小福克斯的夭折让她采取了避孕措施。不管原因如何，再次怀孕并非好事。他们的生活刚刚有所转机，虽然贫困，但总能生存下去。现在，他们又要花钱找医生、找奶妈，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以自己如此穷困的条件，孩子生下来后会遭受夭折的命运。

马克思迫切地需要找到除《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经他的妹夫介绍，马克思打算给一家以英语和荷兰语出版的南非报纸撰稿，但这个营生在3月份黄了——报纸编辑说马克思要价太高，报社承担不起。^[35]马克思还与瑞士一家报纸商量为其写些被他称为“讲述微不足道的小事”的文章。他并不认可这家报纸的政治取向，但对恩格斯说，为了安慰燕妮，自己还是接受了。^[36]

马克思说，家里变成了真正的诊疗所，担心自己的稿酬买不来家人保持健康所需的食物。让他尤其担心的是霍乱在伦敦爆发了，而且索霍区是主要流行区。^[37]在距第恩街不过一分钟路程的宽街，已经有115人死于这一疾病（这年伦敦共有将近11000人死于霍乱）。^[38]马克思像很多其他人一样认为霍乱爆发的原因是新铺设的下水管道穿过了埋有1665年瘟疫死者的坑穴。^[39]但索霍区的医生约翰·斯诺发现真正的原因是下水道破裂，污水渗入了伦敦人取饮用水的水井。宽街就有这样一口水井。^[40]

6月，燕妮怀孕3个月，卧病在床。医生说，离开伦敦对她的健康有好处，马克思因此打算让她、琳蕙和孩子们一起到一个朋友的乡下房子去住一段时间，然后燕妮再回特里尔去。^[41]这需要钱，而马克思又没钱。医生已经把去年冬天以来共计26英镑的账单寄给马克思，要求他每隔一段时间还一笔，否则，将不再给他们看病。此外，还有药费和日常开支。如果马克思没有生病，一直工作，也不至于让债主讨债上门。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陷入了困境，这些不愉快已经使他变成“一个非常沉闷而迟钝的人。没有家的人，真是幸福”。他问恩格斯自己该不该向朋友们借点钱，但实际上，他们也都身无分文。^[42]政治流亡的篇章已经告一段落，不管住的区域有多差，他们现在需要谋生，既然政治动乱不会很快发生，他们需要先把精力放在面包，而不是思想上。

甚至连运气和脾气都更好、能够熬过大多数危机的恩格斯都感到沮丧和愤怒。土耳其与扩张的俄国之间因为领土纠纷而关系紧张，战争看似一触即发，法国和英国都会被卷入。想到做撰稿人可以随时跟踪报道军事动向，加上经营父亲的厂子给他带来的疲惫，恩格斯决定向伦敦《每日新闻》投稿，做军事撰稿人。^[43]最初的反响很不错：编辑赞扬了恩格斯的作品，让他写一篇文章，试用一下。

“如果一切顺利，”恩格斯热切地告诉马克思说，“那么，夏天当我的老头来到这里时，我就摆脱生意经而移居伦敦。”^[44]但不到两个星期，该报就客气地回绝了恩格斯，说他的文章“太专门了”。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他怀疑有对手知道自己向《每日新闻》投稿，正好那个猪猡对手又与该报有联系，便告诉编辑说恩格斯“不过是当过一年志愿兵的人，是个共产主义者，职业是店员，那就一切都完了。……这件事使我很烦恼。”^[45]为了避免出现社会和政治上的麻烦，恩格斯必须再找一处房子，却苦于没钱。^[46]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们不能信赖这伙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只能你我两人相互依靠。”^[47]

的确，由于贫穷、酒精和女人，他们的朋友都在无所事事中浪费时间。曾在施拉姆与维利希决斗时给施拉姆当助手的波兰人和其他6名流亡者住在怀特柴泊一个简陋的棚子里，棚子着火后，他被烧死了。^[48]曾在马克思家短暂住过一段时间的皮佩尔又两次来到马克思家门口。第一次是因为没钱交租被赶出了住处。开始教授德语总算挣了一点钱后，却又被他花光了，第二次来到马克思家。^[49]维尔特去了美国加州，想在那儿找个老婆。^[50]李卜克内西在伦敦圈子里的两个女人之间举棋不定，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是德国人，最后娶了德国女人，却在婚礼后，就丢了工作。^[51]鲁普斯则被酒精害惨了。他在曼彻斯特同恩格斯一起喝了酒，之后又独自摇摇晃晃去了另一家酒馆，遇到6个流氓和两个妓女。他说那些流氓跟着他出了酒馆，把他打了一顿，抢了他的钱。但恩格斯说事情不止如此：鲁普斯没有回家，而是花一先令住到了一个毫不相识的英国人家里（离他自己的住所不超过200英尺）。^[52]

鲁普斯的离奇经历让马克思家的孩子们浮想联翩，他们对父亲的朋友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喜欢刨根问底。马克思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劳拉因为生病正好在家，她写信告诉在学校的小燕妮和埃德加说，鲁普斯被强盗袭击了。^[53]穆希写信给马克思，向他描述整件事的过程，好像不是父亲最先把事情告诉他们的：“我亲爱的魔鬼，希望你一切都好，我很快就回去看你。差点忘了告诉你，鲁普斯又像往常一样出去喝酒了，喝得大醉，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被小偷偷走了（无法辨认）还有眼镜和五英镑……还被打了一顿。……我是你的朋友穆希上校。”^[54]

面对如此多的乱事，7月8日，马克思送燕妮独自回特里尔。

这给家里带来了更多债务，因为如他对恩格斯所说，为了脸面，燕妮要保持“表面上的富足”，自然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回去。“这些额外的花费又使我同我那些固定的和‘日常’的债主发生冲突，等等。‘这是老生常谈了。’”——马克思无奈地引用海涅的话说。⁽⁵⁵⁾但是，事情并非全都是老生常谈。《纽约每日论坛报》想降低马克思的稿酬，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与该报编辑的争执，后者有时把他的一些文字用在其他地方，却没有给他署名。⁽⁵⁶⁾

家里只剩下孩子们和琳蕙，马克思希望通过纵情于李卜克内西所说的“狂欢”来让自己精神起来。⁽⁵⁷⁾其中最无法无天的一次，参加者还有李卜克内西和埃德加·鲍威尔，后者并未因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攻击自己的兄弟布鲁诺而离开马克思。一天晚上，几个人打算喝遍牛津街和汉普斯特街之间的所有酒馆——这段距离足有一英里半。“我们无所畏惧，”李卜克内西后来回忆说，“一路到了托特纳姆法院路尽头，都没出什么事。”但在这儿，他们与人发生了冲突，相互谩骂“该死的外国佬”和“英国小人”，还差点儿打起来，马克思等人赶紧撤退。

燕妮不在期间，这不是马克思最后一次狂饮——他的确精神了，但家里的预算也更紧张了。劳拉写信给母亲说，父亲周日一整天躺在床上，因为“昨天喝了很多杜松子酒”。⁽⁵⁸⁾但马克思没有总是喝酒。燕妮不在期间，他和朋友们还经常带孩子们到伦敦各处转转。有一次，他带着琳蕙和孩子们去了伦敦人最喜欢的避暑胜地坎柏威尔，见一位科隆朋友彼得·伊曼特。⁽⁵⁹⁾他们让伊曼特在德国的兄弟带一封信给燕妮，但对方回复说信件没能送到。“我们都被吓坏了，”小燕妮告诉母亲说，“以为你被抓了呢。”⁽⁶⁰⁾

燕妮没有被抓。她在8月底回到伦敦。她已经怀孕多个月，但得到了休息，积攒了一些体力——好在如此，她才能撑过即将到来的无边黑暗。⁽⁶¹⁾

24 穆希之死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

——卡尔·马克思⁽¹⁾

1月17日，婴儿的一声啼哭再次在第恩街阁楼公寓里响起。燕妮大概是在早上六七点钟分娩的。马克思相信未来的政治斗争需要很多男人组成一支庞大的智力队伍，因此在向恩格斯报喜时，半开玩笑地说：“可惜是个女孩。如果是男孩，就更好一些。”⁽²⁾他们给孩子取名爱琳娜。从一出生，爱琳娜就病得很严重，燕妮看着第三个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孩子，愤怒但又无力。让孩子的挣扎更加艰难的是，这年冬天极为寒冷，刺骨的寒风无视任何阻挡，轻易地钻进屋子里肆虐。

这一时期，天气阴沉。说要留着了一颗子弹杀死背叛事业的马克思的法国人巴泰勒米在1月被吊死了。⁽³⁾他脱离索霍区的流亡者后，便没再登过马克思的家门，一直跟聚集在伦敦西北圣约翰伍德附近的光鲜的流亡者混在一起，逐渐觉得自己重要起来。⁽⁴⁾1853年，他因为在决斗中杀死一名流亡者受到审讯，但只被判两个月监禁。（他成功地让法官相信自己不知道英国法律不允许用手枪私自解决问题。）⁽⁵⁾1854年12月，他又卷入两起谋杀案，但这一次，他的嘴巴无法再让他脱身。事情起源

于一个密谋：在杜伊勒里宫舞会上刺杀拿破仑。巴泰勒米已经搞到入场券和武器，但需要路费，便去找从前的雇主，后者不愿出钱，便被他杀害了。他接下来又在逃跑时杀死一名警察。⁽⁶⁾1855年1月5日，陪审团宣告他杀人罪名成立。⁽⁷⁾17天后，他在伦敦新门监狱被处决，在这里，刑法真的是用鲜血写就的。⁽⁸⁾

马克思和燕妮自然都不会哀悼他的死亡，但对他们本就不幸的伦敦初期生活而言，这件事也是一个可怕的插曲，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背离自己为之奋斗和牺牲的理想如此之远。⁽⁹⁾

到了3月，爱琳娜情况依然严重，像小福克斯一样，不停哭叫，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只得换了个爱尔兰奶妈，看能不能缓解她的痛苦。⁽¹⁰⁾马克思先是得了眼病——他说是看经济学书稿导致的——后来又开始咳嗽，也在喝药。但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家里病得最厉害的是8岁的穆希，患上了严重的胃热，马克思负责照顾他，日夜都陪着。⁽¹¹⁾马克思在3月8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说，穆希恢复得很快，医生很满意，等他再好一点，自己就可以安心地去曼彻斯特了。⁽¹²⁾

整个3月，穆希的状况时好时坏：医生刚刚对他的恢复感到高兴，新的症状就出现了，旧的症状也跟着回来。3月16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自己担心穆希恐怕好不了了，但11天之后，又说穆希有了明显好转，医生也说大有希望痊愈。⁽¹³⁾关键是穆希太虚弱了，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治疗结束，身体强健一点，到乡下去养一养——医生说，他必须到乡下去，远离伦敦污浊的空气。⁽¹⁴⁾

马克思日夜守在儿子身边，穆希需要下床时，他便背他。琳蘅也一直照看着他。但一向把穆希看作自己的自豪和骄傲、自己的天使、自己的心肝的燕妮太害怕失去他，她强迫自己待在前厅，不到儿子身边去。她担心自己的眼泪会吓到他。但躺在后屋家里唯一的火炉边上的小穆希太聪明了。他告诉姐姐们：“妈妈到我床边来的时候，记得把我的胳膊和手盖上，别让她看见我瘦成这样。”⁽¹⁵⁾他知道妈妈在担心什么。

埃德加生病期间，女孩子们照顾爱琳娜，顺便盯着请来的爱尔兰奶妈，后者虽然性格不错、举止有礼，但太偏好杜松子酒和白兰地了。燕妮说女孩子们“像鹰一样盯着她”，爱琳娜越长越健壮。⁽¹⁶⁾恩格斯帮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家里总算有一点收入进账。

3月30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穆希的状况每个小时都在变化。但恶化的程度比好转的程度要大。穆希的病开始出现肺部结核的症状，医生虽然没有明说，但看来也放弃了希望。马克思写道：“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子一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我心里难过极了，头像火烧一样，当然，我应当顶住。孩子在病中没有一分钟改变他那独特的、温和的同时又是独立的性格。”⁽¹⁷⁾

4月6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我对孩子有多大的悲伤，你是理解的。”⁽¹⁸⁾他的儿子，他的可爱的淘气鬼上校，离开了，他的色彩已经褪去，他的身体已经冰冷，家里再也感受不到他的奇思幻想、他的活力和他的幽默。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在这片破旧的闹区，在这残破的建筑里，在他们狭小的屋子里，他留下的是让他们痛苦的孤寂。

李卜克内西描述了穆希被宣布死亡后，马克思家的情景。燕妮和琳蘅在他的尸体旁哭泣，燕妮把女孩子们紧紧地搂在怀里，好像是在保护她们，不让已经夺走儿子的死神再夺走她们。马克思愤怒地拒绝一切安慰——这不是损失，这是偷窃。⁽¹⁹⁾

但窃贼是谁？穆希死于肠结核，这种病并不罕见，但营养不良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会令其恶化。⁽²⁰⁾所有父母在这个时候都会想如果当初如何，结果便不会如此。毫无疑问，马克思和燕妮也这样想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他们的灵魂最深处，结论只有一个：他们选择的革命道路害死了他。穆希是燕妮和马克思失去的第三个孩子，但他的死对他们的打击最深。燕妮说穆希死去的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那痛苦比之前所有的苦痛和悲伤加起来都要深。⁽²¹⁾马克思家的一个朋友说穆希的死让马克思一夜白发。⁽²²⁾

两天后，穆希同小福克斯和弗兰契斯卡一样，也被葬在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的奎克公墓。⁽²³⁾用灵车载着穆希的棺木去墓地的路上，马克思沉默地坐在马车上，双手抱着头，李卜克内西摸了摸他的头，想安慰他，让他知道有这么多爱他的家人和朋友在身边。但马克思大喊：“你没法把儿子还给我！”接着痛苦地呻吟着。在接下来的短短路程里，完全是死一般的沉默。李卜克内西说，穆希的小棺木放到坑里的时候，他担心

马克思会跟着跳进去，所以赶紧站到他身边，准备随时阻止他。^[24]

如果说葬礼令人悲伤，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家里的情况无疑更糟。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家里一片冷清。已经崩溃的父亲写道：“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的头就痛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25]

贫病交困中携手前行

- 25 分离的痛苦 / 224
- 26 疾病缠身 / 236
- 27 福格特事件 / 247
- 28 荷兰之行 / 263
- 29 死亡的阴影 / 270

25 分离的痛苦



要是你们稚嫩的灵魂还在空中飞翔，并未固定在永恒的沉沦之中；绕着我轻快地盘旋一番，听听你们母亲的哀叹吧！

——威廉·莎士比亚^[1]

穆希死后不到两周，马克思和燕妮坐上最便宜的火车，向北经过英国土地肥沃的乡村，去曼彻斯特与恩格斯会面。^[2]他们知道只有他能让自己恢复精神。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被一个想法折磨着：如果他们当时能把穆希早点带离伦敦，他也许就不会死。现在他们要为自己找一处避难的地方。马克思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一家位于弗罗茨瓦夫的德语报纸撰稿的任务托付给了朋友，^[3]专心照顾燕妮——11岁的小燕妮悲伤地描述说燕妮“瘦得像一根小蜡烛般，一根半便士的蜡烛，干得如干鱼般”。^[4]马克思担心妻子熬不过这道坎。燕妮本人说悲伤已经在自己心内最深、最柔软的地方扎下根，不会离开，不会变老，不会停止流血。^[5]

燕妮和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待了将近3周，离家在外的燕妮情绪有所舒缓，但一回到家，悲伤重新袭来。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卧床不起。女孩子们和琳蘅也仍未能从伤痛中恢复过来。^[6]马克思说全家仍然心情痛苦，“一直很糟”的天气好像也在应和着家里的悲伤。^[7]但好消息也有一个。燕妮的伯父终于死了。这样，他们应该

能得到至少 100 英镑遗产，省着点花，应该能撑过这一年。⁽⁸⁾但这笔遗产让他们心中又苦又甜——如果来得更早一些，是不是能用来想办法救活穆希？

7月初，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等钱到了，要带家人到伦敦以外走一走。“对心爱的不幸的孩子的怀念折磨着她，她的姐妹们嬉戏时，她也感到难过。这样的创伤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慢慢愈合。就是对我来说，这种损失也仍然像第一天那样历历在目。”⁽⁹⁾但他们不用等到这笔钱就能离开伦敦了，他们的科隆教师朋友彼得·伊曼特要去苏格兰一个月，把自己在坎柏威尔的房子借给了马克思一家住。⁽¹⁰⁾一家人抓住机会，逃离家中的悲伤和讨债者大军——后者在他们哀伤的时候数目又增加了，也更凶狠了。⁽¹¹⁾有些马克思传记作家将一家人的离开完全归因于躲避讨债者。但从他们的信件看，主要原因显然是穆希。

到坎柏威尔后不久，燕妮在写给普鲁士一名亲戚的信中描述了小燕妮和劳拉的悲伤。“她们再也不做可爱的小游戏了，也不唱歌了。她们的三人组中的第三个人不见了，她们的忠诚的、形影不离的朋友带着他的笑话和游戏离开了，再也听不到他用他那极为清脆的嗓音唱苏格兰和爱尔兰民歌了。”燕妮说两个女孩中，小燕妮受到的影响更大。⁽¹²⁾不过渐渐地，她们把关注转移到了幼小的爱琳娜身上，后者经过艰苦的几个月后开始茁壮成长起来。“她们好像把自己对珍爱的弟弟的爱转移到了这个小家伙身上，把她当作家里一片愁云惨淡的时候……上帝赐予的礼物。”⁽¹³⁾到了9月，马克思已经可以宣布远离索霍区⁽¹⁴⁾（10年后，他说这里的空气仍让他恐惧）的健康的乡村空气对全家有益。⁽¹⁵⁾燕妮的精神也有所恢复。运气更好的是，伊曼特打算在苏格兰半定居，这样马克思一家就可以一直住在坎柏威尔，等遗产到了之后，再到离第恩街远些的地方找处房子。⁽¹⁶⁾燕妮说他们打算住得离大英博物馆近一点，方便马克思的工作。在此之前，第恩街的房子保留着，以防还需要住回去。⁽¹⁷⁾

如果说马克思对世界事务的关注多少能说明他的心理状态如何，那么应该说，一家人搬去坎柏威尔时，他已经部分恢复了平静（至少已经足以让他通过投入政治来忘记伤痛）。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谈论的内容开始从私事向公事倾斜，而公事的重点几乎完全在黑海和俄国南部

克里米亚半岛，这里到 1855 年夏已经成为土耳其、俄国、法国和英国的角斗场。这是 1815 年之后欧洲强国间的第一次重大碰撞，这是第一场现代战争，蒸汽船被用来运送部队，照相机被用来记录战斗，电报被战地记者用来发回报道。⁽¹⁸⁾ 这些报道以全所未有的方式向读者讲述战场的惨状，拉开遮布，向他们展示那些糟糕的、不计后果的决定如何夺走他们所爱的人的生命。⁽¹⁹⁾

像几乎所有国际冲突一样，克里米亚战争也根源于一场更早的战争。一个世纪前，土耳其鄂图曼帝国统治者为了感谢法国在对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中给予的支持，把对圣地基督徒的统治权送给了法国，但这里并不像法国那样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而是像俄国和希腊那样大多数人信奉东正教。由于东正教国家的反对，这一“礼物”被撤销，数十年的紧张局面由此开始。1852 年，有着强大军队支持的拿破仑三世为取得法国天主教徒的支持，要求孱弱的鄂图曼统治者践行承诺，将基督圣地的统治权永远交给天主教徒。土耳其君主同意了，但俄国不同意。俄国拿出一份条约，声称据此拥有对鄂图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统治权，自然也包括圣地在内。

土耳其被夹在了中间。法国和俄国这两个强大的对手因拿破仑战争产生的敌意尚未消退，反而因为西欧国家对俄国扩张的担忧，而所有增强。土耳其评估形势后，站在了法国一边。恼怒的强大俄国做了军事部署，土耳其虽然相对弱小，但也做了相应部署，英国和法国见到他们的动作，也派出舰队到黑海，阻止出现大规模冲突，结果，自己也陷了进去。1854 年 3 月，英国和法国对俄宣战。数周内，英国军队在土耳其加利波利登陆。⁽²⁰⁾

恩格斯后来写道，任何战争，任何结果，只要能推动世界革命，他和马克思就欢迎。⁽²¹⁾ 但对于克里米亚战争，他们希望俄国落败。他们一直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发动政府，是欧洲改革的最大威胁。拿破仑战争后，俄国展现出一丝军力无敌的意味，面对西欧诸国，成了一个庞大的搅局者。1848 年，它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独立起义。之后，把无处释放的反动热情加诸在了自己的国民身上，发动了后来所说的“残酷世纪”。⁽²²⁾ 沙皇尼古拉一世看到国内很多知识分子——以前完全出自贵族阶级，现在也出自一些商人和行业精英家庭——开始接触

被他看作危险的思想，决定将这些思想全部去除。^[23]（他甚至为此要求将“进步”一词从俄语正式词汇中去除。）^[24]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尼古拉突然在 1855 年春天死去，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和谈很快在维也纳展开，拿破仑三世带着胜利的喜悦到英国访问。（他经过威斯敏斯特桥时，马克思看到了他，讥讽他是“穿制服的猴子”。）^[25]和谈无果，各方继续死人。来自前线的报道向伦敦人描述了让他们震惊的真相。英国军队的指挥者多是贵族，或者年迈，或者毫无经验，士兵则多是因贫困而入伍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人。^[26]《泰晤士报》的突破性报道描述了前线部队如何供给不足（冬天作战时只有夏衣穿），数千人如何因霍乱而死，士兵如何被无辜屠杀，以及被战死士兵的血液浸得湿滑的战场散发出如何令人作呕的死亡味道。1856 年 2 月停战时，共有 60 万人失去生命，其中大多死于疾病。^[27]

死亡如此惨重，无法想象任何一方能够自称胜利，但法国和英国还是被看作了胜利者。俄国战败后，其威胁极大降低，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下的俄国有了自由主义变革的可能。战争还使得 1853 年出现的“现实政治”更加流行。^[28]在新的世界里，各国市场因外交关系和军事力量而贯通，理想被视为获得物质利益的阻碍，从而被忽视和抛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克里米亚战争揭示了他们所说的英法两国领袖的利己同盟：商业上，他们在土耳其这个新贸易市场获得了更优待遇；外交上，他们让欧洲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转变。^[29]

1855 年秋天，马克思和燕妮一直待在坎珀威尔，等着遗产到来。但马克思着急返回伦敦工作，一方面是受到战争的刺激，另一方面是对 34 岁的伙伴罗兰特·丹尼尔斯的死亡而感到愤怒。科隆审判后，丹尼尔斯被无罪释放，但 17 个月被关押期间的条件太过恶劣，等于对他宣判了死刑。马克思写信给丹尼尔斯的遗孀阿马利亚说，失去这样一个朋友让自己很伤心，自己会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他登一则讣告。“希望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情况，使那些缩短了他的寿命的人受到比这个讣告所给予他们的更为严重的惩罚。”^[30]

但首先，马克思需要躲起来——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债务：给穆希诊治的医生追债已经追到了坎珀威尔。马克思非常少见地写了一封密信给恩格斯，说家人会继续住在伊曼特的房子里，自己则秘密到曼彻

斯特去。⁽³¹⁾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待到12月，然后偷偷回到第恩街的住处，便基本不再出门，以免撞到医生或其他讨债的人。⁽³²⁾他的主动拘禁在家终于在燕妮收到150英镑遗产后结束。马克思没能找到其他住处，伊曼特回到坎柏威尔后，燕妮和孩子们不得不情愿地搬回了第恩街。⁽³³⁾她们一回来，便被讨债大军发现，围上了门，好在马克思已经有钱还给他们。⁽³⁴⁾

同样在等他们的还有皮佩尔。他们不在时，这个不幸的多情人遇见了瓦格纳（后者在这年早些时候到过伦敦），⁽³⁵⁾他便想演奏这位德国作曲家的作品，给马克思一家提提神。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自己被皮佩尔的“未来的音乐”吓怕了。⁽³⁶⁾皮佩尔通过音乐让他们振奋的想法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到来却起到了最好的作用。没有他的滑稽表演，马克思一家刚刚回到伦敦的几周——第一次没有穆希上校的圣诞节——肯定无比沉闷。

一天，他正在给女孩子们上课，接到一个字条，邀他会面。字条的笔迹很陌生，但无疑是女人的笔迹，这让他浮想联翩。他把字条交给燕妮，后者一眼便认出是当初照顾爱琳娜的爱尔兰奶妈写的，她的形象跟皮佩尔的期待可绝对相去甚远。一家人大笑起来。但绅士皮佩尔还是赴约了，他不能让一位女士失望。⁽³⁷⁾

实际上，皮佩尔在过去一年已经变得更加现实。这个被燕妮称为“索霍区的拜伦”的男人已经知道，⁽³⁸⁾要想真正快乐，就必须找个有钱的妻子，这样才能安然度过困境。有了这个想法，他打算勾引一个蔬菜商的女儿，后者被马克思描述为“戴绿眼镜的蜡烛……身上没有半两肉”。她早就爱上了皮佩尔。皮佩尔去见她的父亲，袒露对他女儿的爱，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需要一笔钱，以便确保有个好的未来，也让他女儿有个好的未来。他向未来岳父要20到40英镑，说会在适当的时候娶他的女儿。⁽³⁹⁾

几天后，蔬菜商写了一封信到第恩街28号：不准皮佩尔再踏进他家门一步。为爱痴狂的蔬菜商的女儿来到马克思家，要跟皮佩尔私奔。皮佩尔见她也没什么钱，自然没了兴趣，闹剧就这样结束了。⁽⁴⁰⁾小燕妮和劳拉一直兴致勃勃地看着这出浪漫喜剧的发展，小燕妮说皮佩尔是莎

士比亚的《无事生非》里的“斐尼狄克——结过婚的人”，但10岁的劳拉纠正姐姐说，斐尼狄克是个机灵鬼，而皮佩尔是个小丑，而且是一钱不值的小丑。⁽⁴¹⁾

凭借燕妮的伯父留下的遗产，一家人总算一冬天都没有欠债。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极为罕见地少有说到钱的问题，即使提到，也是在讨论贸易和商业，而非个人困难。

在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帮助下，燕妮在1856年春天拿到一张护照，可以带着孩子和琳蕻回特里尔。⁽⁴²⁾燕妮回特里尔有两个原因：一是她母亲病了，二是她自己和孩子们也想离开第恩街。她们在5月22日启程，打算回去待三四个月。⁽⁴³⁾家里只剩下了马克思和皮佩尔，有人可能会觉得马克思应该趁着没有燕妮和孩子们打扰，集中精神工作，但仅仅一天后，他自己也待不下去了，打算出去走走。他告诉恩格斯说，医生建议他出去换换空气，对他的肝病有好处。⁽⁴⁴⁾从信件看，他还改变过散心的地点。在5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他清楚地表明没有家人的喧闹和打扰，他是如何很快变得无所适从。他埋头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告诉恩格斯说，自己不理解《亨利四世》中的hiren一词。对于塞缪尔·约翰逊把hiren解读为siren的做法，马克思表示疑问，他提出，这个词有没有可能不指hure（或者whore）和siren？或者是指heoren——听力之意？他总结说：“这个问题能使我产生这样大的兴趣，你看我今天的情绪是多么沮丧。”⁽⁴⁵⁾

要想工作（换言之，要想生活），马克思需要燕妮和孩子们为他提供后盾。他只有在她们的杂乱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头绪。她们是他最为需要的陪伴——他一生都是如此。这个17岁时便立志献身于全人类事业的男人，离了和他组成小家的女人们，显然便无法实现这个梦想。他尤其需要燕妮。她不仅是他的朋友和爱人，还是他最信任的思想伙伴——从13年前度蜜月时便是如此。他的心和头脑都离不开她。

6月初，马克思再也无法忍受孤独，和皮佩尔一起去了赫尔，之后独自去曼彻斯特与恩格斯会合，后者刚刚同玛丽从爱尔兰回来。⁽⁴⁶⁾在从都柏林到高尔威途中，恩格斯发现这是一片因饥荒而荒凉的土地，英国的占领显而易见——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宪兵。他说这里的人民，不论是农民还是资产阶级地主，全都士气低落，“每次都遭到惨败，不论在

政治方面还是工业方面”。恩格斯把这归罪于威斯敏斯特宫，“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或许是为了表示团结，恩格斯还像贫困的爱尔兰贵族一样，蓄起了大胡子。他说，相比英国商界同僚把胡子刮得很干净，自己这样长、这样密的胡子能把围巾和衣领完全遮住。⁽⁴⁷⁾（马克思这时的胡须也很短，也修剪。）

即使有可贵的朋友恩格斯在身边，马克思依然渴望家人的陪伴。也许是因为穆希的死带来的伤痛尚未消退，也许是因为自从一家人6年前来到伦敦后，他便从未与她们分开如此之久。无论原因为何，他深深地想念她们。在1856年6月21日（他们结婚13周年纪念日两天后）写给燕妮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的亲爱的，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跟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

马克思说虽然他的眼睛被昏暗的灯光和烟草所损坏，但仍能在心里描绘她的影像。

.....

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勾起我生命中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⁴⁸⁾

.....

不幸的是，燕妮给马克思的回信没能留存下来，但她在7月中旬写给李卜克内西的妻子欧内斯蒂内的信中，说到过分离的痛苦。燕妮详尽地描述了孩子们带给她的欢乐⁽⁴⁹⁾，每当她带着爱琳娜（由于一直小咳不断，现在有了小名“杜西”——来自法语动词 *tousser*（咳嗽）^①）⁽⁵⁰⁾和两个大一点的女孩在特里尔散步，总会引起人们的艳羡和关注。但燕妮同时说：“整个地方都少了点什么。……与‘摩尔’的分离对我极为艰难，孩子们更是想念他，连杜西都记得她爸爸，提到过他好多次。”她还承认说自己无法抑制穆希的死带来的悲伤。“我可爱的孩子离开得越久，我就越想念他，也就越痛苦。”⁽⁵¹⁾

燕妮在特里尔的时间因为又一个人的死亡而缩短——她的母亲在7月23日离世。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生病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她生命的最后11天里，女儿燕妮陪在她身边。这样的损失在燕妮状态好的时候都让她难以承受，何况发生在穆希死后不久，她极为伤痛。她写信给马克思说，自己跟斐迪南一起把母亲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就打算离开特里尔。她打算带着孩子们先去一向能给她带来慰藉和舒适的巴黎，之后去诺曼底海岸以外的泽西岛，这里不仅有利于她恢复健康，生活也比伦敦更加低廉、舒适，孩子们还能学习法语。燕妮还说，琳蘅的妹妹玛丽安娜之前一直为母亲工作，这次会跟她们一起去伦敦。⁽⁵²⁾

马克思草草回了信。燕妮不在时，他本应到远离第恩街的区域找个住处，或者，至少挣些钱。但他两样都没做。更糟糕的是，去年拿到的遗产也已经花光。他告诉恩格斯说，考虑到燕妮脆弱的精神状态，他只能赞同她的计划，但实际上，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钱来实现这个计划。⁽⁵³⁾他说燕妮根本不知道伦敦这边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我现在如坐针毡。家眷回来以前，我必须为住房操心，我不知道怎样从旧住宅搬出，又怎样搬进新住宅，因为我手头没有现款，最近也没有任何指望。”⁽⁵⁴⁾

仔细考虑之后，马克思打算采用拖字诀。他写信给燕妮说：“无论我怎样怀念你和孩子们（而这绝对是绝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我仍然希望你

① 马克思传记作家一直在思索爱琳娜·马克思的这个昵称的由来。我在小燕妮写给丈夫龙格的信中找到了答案。

们再在特里尔住一星期。这对你和孩子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为了让自己的境况显得更惨淡些，他又说：“而且，和我睡在一起的是皮佩尔，而不是你。荒唐极了！至少在这个房间里是如此。……这三个星期来把我忧郁死了。”⁽⁵⁵⁾

其实，留在特里尔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这年8月的英国酷热难耐。恩格斯说自己外部“不停地洗澡和冲洗”，“内部用各种其他的液体”。⁽⁵⁶⁾在这样的天气里，马克思从早到晚不停地为家人寻找新住处。⁽⁵⁷⁾终于，他在9月22日告诉恩格斯说，在伦敦北部汉普斯泰特荒阜附近的哈弗斯托克小山区域找到一处房子。⁽⁵⁸⁾很多股票经纪人、商人和买卖人从城里搬到这里。⁽⁵⁹⁾这片区域虽然仍在建设当中，道路和污水管道仍不完善，煤气路灯还没装好（马克思说这里的环境还“不怎样完善”），但他还是对找到这个住处而感到兴奋。⁽⁶⁰⁾

此处位于格拉弗顿坊9号的砖建三层小楼房龄7年，两侧相连的房子结构几乎完全一样。房间共有8间，比第恩街的住处大4倍，租金大概贵1倍。⁽⁶¹⁾马克思肯定急于逃离索霍区，才租下这么贵的房子，另外，他可能也在期待燕妮能从她母亲那儿分得的遗产，所以没有特别在意费用。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计算花费，以为燕妮拿到的遗产加上自己的收入足以负担这处更昂贵的房子。

燕妮的弟弟埃德加知道母亲的死讯时，正在纽约州的一处农场工作。他虽然穷困（这年5月曾通过斐迪南作保，借过一笔钱），但还是在8月写信给哥哥说：“对于母亲留下的家具和任何财产，我把我的那一份让给姐姐燕妮。”⁽⁶²⁾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只有一些债券，但燕妮和马克思觉得能继承到的遗产再少，也总该比自己拥有的财产多——他们只有50英镑左右，还需要用来还债和交纳定金。⁽⁶³⁾小燕妮都感受到了家庭的困境，写了张便条给父亲，说母亲已经把拖欠的租金交了。“我想明天我们就能回到我们原来的洞穴了。”马克思向恩格斯求助，后者自然有求必应。⁽⁶⁴⁾

马克思一家的经济困难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市场混乱导致的。美国金融地震的首批震波已经跨过大西洋，影响到欧洲银行和债券市场。卡罗琳的债券跌价严重，斐迪南不想在亏损时卖出。⁽⁶⁵⁾遭受损失的人不在少数。1849年开始并在进入50年代后仍在继续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

投机的基础上的。无数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购买几乎尚未成立的公司和尚未开建的铁路的股票。之前一向安全的银行业也采用新的高风险政策，加入了进来：银行开始接受私人支票作为支付方式，根据个人信用批准贷款，不再要求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人作为担保。金融开始等同于赌博。⁽⁶⁶⁾对那些愿意为了发财而无视规定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时候。

1856年，有些专家认识到，正在腾飞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太过薄弱，甚至没有基础，他们因此预测世界性的金融风暴将会出现。他们是对的：他们看到的是袭击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现代经济危机的开端。危机从纽约一家银行的倒闭开始，由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相互交织，局部危机将演变为整体危机。⁽⁶⁷⁾英国政府宣称女王统治下的英国商业是健康的，⁽⁶⁸⁾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坚信不仅英国的商业不健康，法国和整个欧洲都不健康。恩格斯说自己期待“这一次将是从来没有过的末日审判：全欧洲的工业完全衰落……一切有产阶级都被卷入漩涡，资产阶级完全破产，战争和极端的混乱”这一切在1857年出现。⁽⁶⁹⁾马克思也看到了社会风暴的迹象，预计自己和恩格斯将被拖回到革命行动当中。“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马克思开玩笑地跟恩格斯说，“甚至我终于又找到了住宅并弄回了自己的书这一点也使我相信，‘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⁷⁰⁾

10月初，燕妮收到97英镑6先令遗产，全家搬去了格拉弗顿坊。遗嘱的执行和财产的分配由斐迪南的妹夫威廉·冯·弗洛伦库尔负责，⁽⁷¹⁾后者虽然与燕妮没有血缘关系，却一直被燕妮视作亲近的家人。她写信感谢他的帮助，并让他代自己“向斐迪南致以最深的感谢，感谢他的爱和忠诚”。⁽⁷²⁾燕妮与哥哥之间就其他遗产的分割起过争执，但在格拉弗顿坊安顿下来之后，她好像不再纠结于个人的情感好恶，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党的事务上。她对斐迪南的亲近部分肯定也出于需要，毕竟后者掌握着家族的钱袋子。另外，在经历了失去孩子和母亲的苦痛之后，她开始更加珍视其他家人。她最近回普鲁士期间，和哥哥进行过交流，也许他们都认识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亲情比把他们拆开的政治更重要。

在写给弗洛伦库尔的信中，燕妮对新住处的描写更像是在描绘一

幅德国浪漫山水画。她说格拉弗顿坊与第恩街的住处相比，就是一座宫殿。她的新家“空气畅通，阳光足，干燥，建在砾石土上。周围是绿色的草甸，奶牛、马、山羊、绵羊和小鸡在上面悠闲地吃草。从房子正面看出去，巨大的伦敦城在雾中若隐若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从后面房间看出去，能看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和海格特公墓。⁽⁷³⁾

实际上，格拉弗顿坊周围的区域没有这般美好。燕妮在写给另一个人的信中说：“你只能在一堆堆垃圾中间找路走，下雨的时候，泥泞的红土不断粘到靴子上，拖着沉重的脚步，要走到我们家，可得费一番力气。”⁽⁷⁴⁾房子虽然宽敞，但也不过是普通的中产阶级住处。⁽⁷⁵⁾工作区域（厨房和洗衣间）在地下室；一层有两间客厅，一间卧室和一个小衣帽间；二层有三间房间；阁楼由琳薇和玛丽安娜居住。⁽⁷⁶⁾方便的是，房子有两个厕所，⁽⁷⁷⁾另外，燕妮很高兴地说，可以在花园里喂鸡。⁽⁷⁸⁾

主要问题是房子里没有家具。他们自己什么家具都没有，又没钱买新的，便去了50个处理二手家具的家庭，⁽⁷⁹⁾淘了一些旧家具回来，总算把家里布置了起来。燕妮告诉弗洛伦库尔说，这些旧东西也给家里带来了快乐：“我之前的苦痛和负担在这座精美的宫殿里消失无踪了。……孩子们非常高兴有这么多房间，小爱琳娜兴奋得不断亲着地毯和蜷缩在火炉旁毡垫上的那只‘小狗’。”⁽⁸⁰⁾

一家人在新居里安静地度过了一季。但安静没能带来平静。住在第恩街时，燕妮盼望着远离那里的记忆。但在格拉弗顿坊，她依然无法摆脱这些记忆，这里又没有事情能让她分心，暂时忘却这些记忆。她想念在西区的长途散步。她想念在索霍区和圣贾尔斯教区的酒馆（大风车街上的红狮酒馆和德鲁里街上的白鹿旅舍）里的闲谈。她想念那些不断到家里进进出出、把他们的家当作自己的家的朋友。⁽⁸¹⁾对朋友们来说，格拉弗顿坊太远了，没办法想来就来。他们住在索霍区时，弗莱里格拉特经常顺路上门看一下，但他现在在瑞士一家银行的伦敦分行担任经理，事务繁忙，没有时间远道去伦敦北部看望他们。⁽⁸²⁾像他们家门口的流浪猫一样经常登门的皮佩尔也不来了。其他人彻底离开了伦敦。鲁普斯留在了曼彻斯特，跟恩格斯在一起，红色沃尔弗在兰开夏郡当了一名小学校长。⁽⁸³⁾还有一些亲密的伙伴已经死了。燕妮刚来伦敦时到码头接她的

格奥尔格·维尔特在哈瓦那做事时死了，年仅 34 岁，死因是在国外奔波期间染上的某种疾病。⁽⁸⁴⁾他们的老朋友海涅也死了。虽然他们从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他便已经处在垂死状态，但他的最后几年极为痛苦。他的兄弟说：“七年的身体折磨让他与外部世界脱了节，他好像对这个世界上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务都没了概念。”⁽⁸⁵⁾燕妮和马克思都深爱着海涅。他的离去给一段奇妙的时光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让他们对巴黎的美好回忆有了残缺。

在格拉弗顿坊的头几个月，燕妮一直情绪低落，被药瓶所包围。她坦然地说，“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逐渐适应这种彻底的孤独”。⁽⁸⁶⁾虽然马克思之前做过计算，他们的钱又不够花了。燕妮拿到的遗产都用来布置房子了。⁽⁸⁷⁾这期间，《纽约每日论坛报》开始无法按照之前的约定每周刊登马克思两篇文章，另一家美国报纸《普特南氏月刊》这一年早些时候向马克思征过稿，马克思也寄去了他们需要的文章，却仍未收到稿酬。1856 年圣诞节前，马克思再次写信给恩格斯，寻求经济帮助。“如果我头一次就不能给房东如期交付房租，那就要完全丧失信用。”⁽⁸⁸⁾

一家人已经离开第恩街，但最棘手的问题仍紧跟着他们。他们本就身有病痛，一文不名，现在又要承受寂寞。“‘波西米亚’生活结束了，但我们不仅不能继续公开与流亡中的贫穷抗争，反而必须保持表面上的体面，”燕妮数年后写道。“我们倾尽全力想要过上雅致的生活，却仍要面对同样的琐碎压力，同样的奋争，同样的苦难，同样频繁的当铺之行——唯一消失不见的，是幽默。”⁽⁸⁹⁾

26 疾病缠身



在艰苦的日子里，希望你勇敢而坚强。世界属于勇敢的人。

——燕妮·马克思⁽¹⁾

1月底，情况更加糟糕。《纽约每日论坛报》只刊登了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其他的一律没有刊登，马克思怀疑对方想把自己踢开。“我完全搁浅了，”他告诉恩格斯说，“我仅有的一点现款已投入一所新住宅，住在这里绝不能像在第恩街那样一天一天地熬日子；既没有指望，家庭费用又越来越大。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²⁾

不论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如既往地亲近——马克思称恩格斯为挚友。⁽³⁾但到1857年，两人的生活千差万别。恩格斯已开始为欧门—恩格斯公司获取利润提成。⁽⁴⁾他的父亲视他为合格、甚至出色的商人，不再过度担忧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只要他表面上做一个出色的资本家，私下里做什么都行。从这样优越的位置，恩格斯写道：

.....
你的来信像晴天霹雳一样，使我大吃一惊。我本来以为，

眼下终于一切都已非常如意，你住进了像样的住宅，事情都已安排妥当，现在却发现，一切又都成了问题。……可惜的是你没有早两个星期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的老头拨给了我一笔钱买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因为看到一匹好马，上星期已经买下了。如果我早知道你的事情，我会等几个月再买并省下饲养马的费用。……但是我非常难过的是，我在这里得养一匹马，而你们一家人却在伦敦受穷受苦。

.....

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以后会每个月寄给他 5 英镑，但马克思需要时也可以随时再找他要。恩格斯的责任感增加可能是因为他决定要“开始新的生活”。他告诉马克思说，“近来我太闲散了”。⁽⁵⁾

马克思此时肝病复发，除了自学丹麦语，什么事都做不了⁽⁶⁾（这就是他在病床上给自己找的消遣）。燕妮也生病了，还是由于老原因：她怀孕了。但家里经济条件紧张，他们谁都不能因此就不做事。⁽⁷⁾马克思继续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燕妮做他的秘书。等到燕妮不得不卧床休息，13 岁的小燕妮和 11 岁的劳拉开始了给父亲做助手的漫长生涯。燕妮告诉恩格斯说，两个女孩完全剥夺了自己“家务总长的职权”，让她们的 43 岁的母亲安心等着又一个孩子的降生。⁽⁸⁾

1857 年春，也许是因为近期刊登马克思的文章太少，《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达纳介绍马克思做《新美国百科全书》的撰稿人，这是一项多卷本百科知识词典工程，由美国和欧洲学者共同编写。《百科全书》的编辑告诫马克思不得偷偷把自己的“党”的观点写进去。虽然受到限制，马克思还是很兴奋——稿酬不错、稳定，而且比他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轻松得多。⁽⁹⁾恩格斯甚至建议马克思找达纳把整个《百科全书》包下来，恩格斯、鲁普斯和皮佩尔帮他一起弄。“只要能够换来成色足的加利福尼亚黄金，”恩格斯得意地说，“我们提供‘成色足的’知识是很容易的”。恩格斯极为少见地非常乐观，觉得这将解决马克思的经济困境。“现在情况又会好起来，即使付钱的日期并不很近，但是这毕竟是一件牢靠的事情。”⁽¹⁰⁾马克思马上忘记了肝病，回到大英博物馆，研究百科全书条目。⁽¹¹⁾

这年春天，马克思回来时，发现阅览室进行了改造。书籍仍沿着墙，从地面一直摆到屋顶，但加设了20扇拱形窗户，围绕在上面圆顶处一面巨大的窗户下面。（图书馆没有人工照明，读者只能依靠时有时无的阳光，因此图书馆经常因为大雾关闭。）之前的长条桌也撤掉了，换成了朝向中间围成一圈圈的桌子。这样，研究者能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坐在铺着坐垫的扶手椅上，舒服地往后一靠，就能安静地进行思考。从格拉弗顿坊到博物馆的路程比从索霍区出发至少要长一倍，但马克思几乎每天都步行前往。恩格斯建议他租一处地方，专门进行百科全书研究，但马克思已经找到一处免费的地方——阅览室里位于K排和P排之间的一张桌子。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他都坐在这里。^[12]

达纳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及时，让马克思从最近的家庭悲剧中解脱了出来。7月6日，燕妮生下一个男孩，但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13]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这事本身并不算不幸，”但他又说，出生前后的情况“在我的幻觉里产生了可怕的印象”，让他“回忆起来极为痛苦”，所以不想在信中详谈。^[14]燕妮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马克思说她“情绪很坏”。他没有责怪她，但告诉恩格斯说，自己觉得厌烦。^[15]但在燕妮写的信中，她不仅没有表现出愤怒，反而不同寻常地显得很乐观。她告诉斐迪南的妻子路易丝说，新生儿（名字她没有提，也许根本没来得及取名字）出生后只存活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心中的希冀又一次被埋葬在了坟墓里”。^[16]到现在，她的死去的孩子比活着的还多。

一年多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盯着各国金融市场上的各种问题和症状，尤其是法国和美国。恩格斯曾断言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将在1857年底前出现，并催生社会革命。10月，马克思认为一切已经开始：“美国危机妙极了。它立即影响到法国工业，因为目前纽约出售的丝织品比里昂生产的更便宜。”^[17]恩格斯表示同意，称这次危机“妙极了，而且远没有过去。……现在商业又要有三四年的不景气，目前是我们走运了。”^[18]

受危机影响，《纽约每日论坛报》大幅裁减欧洲撰稿人，只留下马克思和另一个人，同时把马克思的稿酬减半。虽然自己的收入受到影响，但马克思对危机爆发的喜悦丝毫不减。^[19]他告诉恩格斯说：“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20]燕妮写信给

一个伙伴说：“尽管我们已强烈地感到美国的危机对我们钱包的影响……但您也许会想象得到，摩尔是多么兴奋。他以往的工作能力和精力已经全部恢复了，而且精神焕发心情愉快，这是自从我们遭到很大不幸——失去了我们可爱的孩子（埃德加）以后，几年来所没有的。卡尔白天为糊口而工作，夜里则为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而工作。”⁽²¹⁾

正如世界博览会和其带来的资本主义必胜观念刺激马克思重新进行经济学研究，钱主的即将垮台对他产生了同样的刺激效果。他已经把他的经济学著作搁置数年，一直忙着挣钱，以便有条件开始写。但危机让他看到完成这本书的紧迫感。看着银行关门，证券和商品市场陷入灾难，不断有企业倒闭，人们失去工作、失去房子、陷入饥饿，他担心这一制度马上就要倒塌，自己来不及对其做出阐述，来不及对资本主义后时代的世界给出指导。他写信给德国的一个战友说，自己白天把时间“消耗”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百科全书》写稿上，像隐士一样过日子。夜里，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大纲，依靠大量的柠檬水和烟草，一般能干到早晨4点钟。他说自己必须尽快“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²²⁾后来又说，“哪怕是整个房子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也要完成”。这一次，他的确会完成。⁽²³⁾

恩格斯一直在曼彻斯特向马克思报告最新的市场消息，还在信中愉快地提到，自己在这种市场情况下的异乎寻常的好心情让很多同事非常生气。他还说到，他们的绝望从酒馆的酒类销量大增就能看得出来。⁽²⁴⁾谈到自己，他对马克思说：“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1848年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全新的恩格斯计划把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猎狐。⁽²⁵⁾（在提到一次长达7个小时的猎狐活动时，他说，“这样的活动往往使我有好几天非常兴奋。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体育娱乐”。）⁽²⁶⁾

随着经济灾难在欧洲大陆扩散，直至影响俄国的铁路运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关注着相应的进展。马克思嘲笑说，之前反对为失业者创造就业的公司现在一股脑向政府寻求财政帮助，想牺牲公众的利益来维

持自己的“利润权”。^[27]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着危机波及农业，那时事情就“大了”。^[28]

马克思数年来一直与杜塞尔多夫的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保持书信往来。拉萨尔在1848年作为改革者崭露头角，但真正让他声名远扬的是为索菲·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打了12年离婚官司。拉萨尔把这场官司混淆为妇女解放斗争，通过详细地描述德国上层社会腐朽淫靡的私生活，借以吸引公众（甚至包括普鲁士国王）关注。官司打赢后，伯爵夫人和拉萨尔获得了一生享用不尽的财产，拉萨尔甚至搬去和他大20岁的伯爵夫人同居。^[29]马克思指责他宣称拥护工人阶级的同时，向贵族阶级献媚。^[30]

虽然对拉萨尔有诸多疑虑，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把他看作是与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的党的成员进行联系的重要桥梁。他与出版商有关系，这一点马克思牢记在心。到1857年，马克思已经淡出德国出版界太久，没有本地人从中介绍，很难找到出版商。他告诉拉萨尔说，自己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说作品内容完全是科学的，在审查方面不会有任何麻烦。“能不能在柏林找到一个出版商，如果你能打听一下，我当然非常感谢。”马克思说这本书可以不定期地分册出版，当然，必须得有报酬。^[31]

马克思太骄傲，没有向拉萨尔透露自己的经济困境，但他告诉恩格斯说，由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稿酬减半，他的生活又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困境，再这样下去，他宁愿“被埋葬在百丈深渊之下，也不愿这样苟延残喘。老是牵累别人，同时自己也总是疲于同卑微的日常琐事作战”。^[32]到1月底时，燕妮把披肩拿去典当，才有钱买一点吃的。^[33]马克思思考之后又说：“幸好外部世界现在发生了许多令人高兴的事。至于个人的生活，依我看，我是在过着所能想象到的最不幸的生活。这没什么！”他又补充道：“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34]

住在第恩街时，孩子们还太小，无法理解家里的穷困，但搬到格拉弗顿坊时，她们已经长大，已经能够看到自己家和周围中产阶级家庭的差别。马克思的邻居大多是英国商人家庭：整洁，稳定，固定去教堂。马克思却是一个衣冠不整、不信上帝、流亡而来的学者，连养家糊口都

做不到。邻居们不可能看不到围在马克思家门前的讨债者，肯定也听到周围店铺的人说这家人买最基本的食物都赊账。

小燕妮对家里的困境尤为敏感——她本身就是家庭困难的明显例证。13岁的她长得很高、很快，燕妮和琳蘅给她改的衣服，经常不合身。⁽³⁵⁾她和同学间的差别无从掩藏，让人羞愧。但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相反，她觉得自己是本已困顿的父母的负担。在工人阶级家庭，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已经需要离家出去工作。⁽³⁶⁾但她的父母没有这样做，她便尽力多做些家务。她虽然努力，可惜却不是一个好帮手。她给杜西缝的衣服太花哨（全套银色和红色），收拾餐桌时，用她母亲的话说，太“笨手笨脚”。“轮到她布置茶几时，”燕妮写道，“所有茶杯都有被打碎的危险，不过当你喝上一口，你就会觉得自己之前对摆放讲究的瓷器的担心没有白费——茶香如此浓郁，这个浪费的小家伙用茶杓放茶叶时总忍不住放多”。⁽³⁷⁾如果说劳拉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孩——脸颊红润、金发、娇嫩、声音悦耳，小燕妮则肤色稍暗、健壮、聪慧。⁽³⁸⁾她13岁生日时，劳拉送给她一个笔记本，但她没有用来写些女孩们的日常心思和梦想，反而写了一篇关于希腊历史的长篇文章。⁽³⁹⁾

虽然有着贫穷和政治因素，燕妮还是希望把女儿们教育成举止得体——即便不能说优雅——的淑女，以便让她们以后能找到有教养的丈夫（最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建立自己的家庭，不用承担经济和政治上的忧虑。她向一个朋友透露说自己有时想“不成熟”一回，远离一切政治上的东西（这对她和卡尔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他们而言，“很不幸，政治是最重要的问题”）。不管代价如何，她不想女儿再把革命当作生命中的动力。⁽⁴⁰⁾然而，像大多数19世纪中叶的年轻女孩子们一样，她们的未来依赖于父亲拥有的财富。而她们的父亲，几乎在所有的事业关口，都在遭受挫折。

1858年春，拉萨尔为马克思的书找到一个出版商。⁽⁴¹⁾柏林人弗兰茨·古斯塔夫·敦克尔同意马克思的分册出版计划，打算在5月出版第一分册。马克思虽然明确说过要有报酬，但他对出版的前景感到极为兴奋，说第一分册可以不收报酬。⁽⁴²⁾但敦克尔给他的报酬比在相同情况下给柏林的教授的还要高。出版商希望他每隔几个月能提供一个分册，说

已经准备好出版卡尔·马克思博士的经济学系列著作。^[43]

终于，马克思一直在头脑中酝酿的这本书即将成为现实。但从出版合同一签订，他的大脑和身体就全都开始造反：他的肝病极为严重，以至于“不能思考问题，也不能读书写文章，总之除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外，任何事情都不能做”。他告诉恩格斯说：“不健康总是不幸，因为在没有复原和能握笔以前，我不能为敦克尔准备手稿。”^[44]

马克思总算把第一分册的纲要寄给了曼彻斯特的朋友，寻求意见。恩格斯回复说“这个纲要的确非常抽象”。恩格斯表示抱歉，自己没能完全理解，暗示说可能是工厂的工作让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迟钝了。^[45]但马克思太敏感了，恩格斯如此温和的批评在他听来却如雷击般，他甚至无法回信。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燕妮身上：

.....

卡尔已经有一个星期病得根本不能动笔。他以为，您大概已从他上次写得很笨拙的信中看出，他的胆病和肝病又犯了。……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在同出版商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变得更加厉害，而且日甚一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完。^[46]

.....

燕妮和恩格斯知道，合同会对马克思造成折磨。在过去 15 年里，从巴黎时开始，马克思就从未遵守过最后期限或时限要求，也从未像接受任务时那样去完成任何任务（关于后面一点，《共产党宣言》是例外）。问题不是他缺乏积极性，而是他寻根问底的思维习惯。他不能把研究放在一边，提笔就写；他总要去探寻不知道的东西，在探寻中，他的主题不断进化，在把这个不断进化的主题的各个方面了解得一清二楚之前，他无法把理论付诸纸上。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知识的宫殿是无穷的、发展的——即便他愿意在余生都徜徉其中，合同也不允许他这样做。这时，痛苦便开始了，并且很快从思维上转移到身体上。马克思知道手头的工作的重要性，告诉魏德迈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47]实际上，这样

的危险真的很小，他只是需要找到可以责怪的人或对象。

4月29日，把纲要寄给恩格斯27天后，马克思终于再次给恩格斯写信：“我长久没有写信，可以用一句话向你解释，就是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句话的本来意义而言的（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也是这样）。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一定要写的少数几篇文章，我是向妻子口授的，但就是这一点，也只是在服用烈性兴奋剂之后才做到的。我的肝病还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发作过，一度曾担心肝硬化。”他说医生建议他去旅行，停下一切工作，出去“走走”。^[48]

恩格斯让马克思马上到曼彻斯特来，让马克思买头等票，由他出钱，他还会寄钱给燕妮，让她在马克思不在期间用。^[49]第二天，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会在5天内到达，还坦白地说，“从昨天起我又好多了”。^[50]

恩格斯的介入让燕妮轻松了许多。事实上，一家人都对马克思在恩格斯的照顾下发生的变化感到惊奇。但她们不需要的：恩格斯让马克思远离压力和责任（不管是债务还是期限），用美食、美酒和上等的雪茄招待他，希望这次彻底的放松能打开他才华的闸门。恩格斯告诉燕妮说，自己带着马克思骑了两个小时马，摩尔现在“感到非常良好”。^[51]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待到5月底，也就是第一分册书稿应该交到出版商手里的时候。马克思给拉萨尔写了一封信，里面满是半真半假的陈述和几乎有些荒唐的理由，解释说自己病了，吃了许多药，医生要求自己“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一切脑力活动，最后，以骑马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最后我无可奈何地向医生和家里人的主张让了步，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他希望拉萨尔向敦克尔解释一下自己的情况，却对何时能交稿只字未提。^[52]

回到伦敦后，马克思说感觉好多了，已能工作。“困难的是，这些手稿……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他告诉恩格斯说，“因此我得编一个目录，好很快地在某册某页上找到我工作中首先需要的东西”。换言之，在他本应已经把书稿完成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整理，而他的手稿多达800页。^[53]

7月中旬，书稿仍未完成，由于马克思的曼彻斯特之行，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加不堪，需要他把全部时间用来筹钱。伦敦正在经历一波创纪

录的高温，但马克思还是必须徒步或者坐公共马车长途跋涉到城里去，由一个熟人作保，向另外一个熟人借钱。天气炎热，干旱严重，泰晤士河里只剩下污水，臭气熏天，让人无法呼吸。^[54]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现实的处境让他无法再忍受下去。燕妮尤其令他担忧。“我的妻子被这种糟糕情况弄得精神恍惚，艾伦医生虽然也猜到症结所在，但自然不知道真实情况；他又一次——这次很坚决——对我说，如果不让她到海滨浴场住一个较长的时间，就不能担保她不得脑炎或类似的病症。”马克思说燕妮的问题是两方面导致的：日常操劳和“必然的、灾难的结局带来的阴影”。^[55]

别无他法，马克思求助于贷款社：可以贷款 5 至 200 英镑，无需抵押，有人担保便可。马克思找弗莱里格拉特和一个杂货商给自己做了保，挤出 2 英镑，交了处理费，最终却被拒绝了。他只能再次向恩格斯求助。马克思把花费和债务列了 3 个长长的清单，问他的朋友能不能想出办法，让他脱离这个经济困局。从账目看，马克思最大的花费是当铺、税、学费、医药费和报刊费。马克思说即便自己彻底削减开支——让孩子们退学，搬进工人阶级住处，把琳蕙和她妹妹送走，完全靠马铃薯填肚子——还是剩不下钱还债。他说：

.....

至今还维持住的表面尊严，是防止彻底垮台的唯一手段。对于我个人来说，只要能再得到哪怕一个钟头的安宁，使我有机会从事工作，就是住在怀特柴泊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种意外的改变会给处于目前状况的我的妻子带来危险的后果，就是对正在成长的女孩子们来说也不见得适宜.....

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56]

.....

恩格斯估计马克思马上需要大约 50 至 60 英镑，但自己再想办法

也只能弄到大概 40 英镑。他建议马克思找他的母亲或姨父“试探一下”。^[57] 马克思试探了一下母亲，给她带去一张爱琳娜的照片，希望能够修复自己已经漠视数年的关系。她的最初反应还算积极，但很快便冷淡了。^[58] 最终，还是恩格斯出钱，加上弗莱里格拉特出面安排，经过一番复杂的交涉，终于挽救了马克思。^[59]

马克思尽可能还了账，之后把燕妮送到了海滨小镇兰兹格特，这里因其健康的空气被称为伦敦的“肺”，极受英国上层社会欢迎。^[60] 燕妮认识了几个被马克思嘲讽地称为有教养的、刁钻的英国妇女。“她长期处在丑恶的社会中，或者说一点也没有社交活动，现在同一些与自己差不多的人交往，看来是合她心意的。”没几天，燕妮便让琳蕙和孩子们也去了。^[61] 小燕妮和劳拉在南汉普斯泰特女子学校的成绩非常优异：小燕妮获得了年级综合一等奖和法语一等奖，劳拉获得了年级二等奖。^[62]

这期间，马克思把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发给兰兹格特的燕妮进行誊抄，然后发往纽约，琳蕙的妹妹玛丽安娜留在伦敦照看房子。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马克思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书稿，对此，他也认识到了紧迫性。^[63] 但他不但没能工作，反而又病了。9月21日，已经数周没有给恩格斯写信的马克思写信告诉他说，自己还是肝的问题。写一点东西就要费很大劲，恐怕在两个星期以内都无法把书稿交给敦克尔。^[64] 一个月后的10月22日，马克思说还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把书稿寄往柏林。^[65]

到11月，拉萨尔也开始疑虑书稿的事。一个拜访过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告诉他说，事实跟马克思在信中说的完全相反，事实上马克思有一位美丽的妻子，生活处境很“光辉”。马克思赶紧解释说，自己和弗莱里格拉特特意给这位访客制造了光辉的假象，因为不想让这个“平凡的德国资产者”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后“幸灾乐祸”。之后，马克思又说了一些理由让敦克尔继续等待。他说自己虽然的确有疾病和家事烦扰，但耽搁的真正原因是形式的考虑。

“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首先，它是15年辛苦的成果，马克思说是他思维的黄金时代的成果；其次，

著作将首次科学地表述一个有关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他再次请求拉萨尔向敦克尔做工作，并说明了自己的进度。“大约过一个月，我才能完成，因为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写。”^[66]

接下来的数周里，马克思在全力写作的同时，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充满谎话和借口：

11月29日：燕妮正在誊抄手稿。^[67]

12月22日：书稿在年底前必须交给出版商。“失去任何一点时间都是无法弥补的。”^[68]

1月中旬：书稿仍未寄出，尽管长达192页，可编成3册，尽管书名叫《资本一般》，还一点没有谈到资本。^[69]

1月21日：“倒霉的手稿”可以寄出了，但没钱付邮资和保险。^[70]

最终在1859年1月26日，信里只写了3行字，说书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寄给敦克尔。^[71]

马克思思想，如果这本书在柏林获得成功，是不是应该在伦敦找出版商出英译本。^[72]

27

福格特事件



啊，当知识没有用处的时候，有知识也是痛苦的。

——索福克勒斯⁽¹⁾

马克思奋笔疾书时，他和恩格斯预测将催生革命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但并未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激起社会动乱或推翻任何政府。普鲁士虽然换了统治者，但原因是纯自然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在1858年精神失常，由其弟威廉摄政。威廉被认为在1848年3月命令军队向柏林民众开枪，从而导致了城内的致命骚乱，因此一直饱受批评。⁽²⁾但他摄政后，很快赢得了本要反对他的人的支持——将之前10年里实行镇压政策的人清除出政府。⁽³⁾其中便包括燕妮的哥哥斐迪南。⁽⁴⁾

反动的普鲁士好像终于迎来了黎明。威廉寻求与英国和西欧，而非俄国，成为盟友，任命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进入内阁。⁽⁵⁾政治、文化和专业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许可，甚至有传言说政治流亡者有可能获得赦免。除了新的自由，让欢庆的气氛更加热烈的是，这一年是德国伟大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百年诞辰。德意志联邦各个地方以及欧洲和美国的所有德国人都举行了庆祝活动，纪念这位被视为德国文化身份的伟人。⁽⁶⁾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能见到他们期待的革命，但局面依然让他们振奋——祖国的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他们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

的目标将更有可能实现。经过数年秘密集会，这样的组织终于可以公开活动，创造条件，终结君主—资本家—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并最终消除阶级。这样的氛围下，又没了找他麻烦的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阻挠（如果这是唯一的原因），马克思的著作也更容易出版。

在1859年初的几个月里，马克思一直在焦急地期盼着著作出版的迹象。燕妮也在期盼，她已经向普鲁士的家人夸耀过丈夫将有大部头的著作马上出版，说丈夫为了这部著作做了数年艰苦研究，甚至损害了健康。^[7] 夫妻二人不仅将其视为对“党”和马克思的声名很重要，而且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德国发行后，还可以在利润更大的英国出版英译本。^[8]

马克思交稿时晚了8个月，但他希望敦克尔不要有任何延误。他翘首等待柏林的消息，他的焦虑在写给恩格斯的每封信中都有体现。他在书房里踱来踱去，等待着邮差的敲门声，焦躁可见一斑。两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书稿寄出6个星期后，敦克尔才给马克思寄来第一个印张的校样。马克思非常沮丧。^[9] 他觉得自己的著作必须尽快出版，才与现实具有相关性，更为实际的是，他需要钱。愤怒的作家可能在想：不错，自己的书稿是交晚了，可那是因为需要创作，而敦克尔需要做的不过是排版而已。

马克思认为问题在拉萨尔。他觉得敦克尔为了照顾拉萨尔的小说，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放到了后面。^[10] 这期间，敦克尔还出版了恩格斯论述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之间军事紧张局势的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11] 9个星期后，马克思才收到三个印张的校样，换言之，总共192页的书稿才排版完成48页。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说，敦克尔是不是对揽下这本书感到后悔，所以才一副拖拉的作风。^[12]

出版遥遥无期，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困境告诉了拉萨尔，问他能不能短期借给自己一笔钱。^[13] 拉萨尔没有同意，但通过自己的表弟给马克思介绍了一份撰稿的工作，从伦敦发电讯稿给一家报纸。^[14] 虽然操作复杂，发稿成本高，马克思又不赞同该报的政治倾向，但他还是急切地接受了，并兴奋地告诉恩格斯，自己很快将有收入进账。但没过几周，这个计划就像无数其他计划一样，流产了。马克思再次怪罪到了拉萨尔头上，说他批判该报的保守倾向，却把自己也带上了，搞得好像自己也

批判了人家似的。^[15] 马克思咆哮说，“结果这个畜生使我夏季的如意打算落了个空”。^[16]

马克思到处碰壁。到5月中旬，他的经济学著作第一分册本应已经面世，却没有任何出版的消息。相反，敦克尔出版了拉萨尔的又一本小册子——一本像恩格斯的作品一样讲述军事问题的小册子。^[17] 当马克思知道拉萨尔搬出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家，住进了敦克尔家，他更加确信拉萨尔的作品获得了优先待遇。^[18]

1859年5月21日，把最后几个印张的校样寄回柏林4天后，马克思用了一个很容易被识破的策略向敦克尔施压，让他确定出版日期。马克思说自己从美国接到100本订单，因此需要知道书价。^[19] 敦克尔没有做出回应，马克思因此又寄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他，指责他故意拖延。“我坚决要求您停止这种做法，我认为其目的是极其令人怀疑的。我在英国所有的熟人都赞同我的观点。”^[20]

就在马克思将要爆发时，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准备在伦敦创办一份报纸《人民报》。^[21] 自1851年来，马克思便与教育协会和流亡者组织日渐疏远，没了联系。除家人外，他与之保持经常联系的人不过十来个。他和恩格斯虽然经常在信件中嘲笑自己这个小圈子之外的流亡者，但他们没有公开这样做，因此并未像刚来伦敦那几年一样，招致众怒。但马克思好像特意要找事。他很愤怒、沮丧，觉得可以通过报纸捣捣乱。（他写道，“在伦敦这里生活十分枯燥，八年来这样的消遣只有这么一次”。）^[22] 他告诉恩格斯说，《人民报》虽然是“浮泛的报纸”，但可以用来气一气哥特弗利德·“耶稣基督”金克尔——他们的老对手，拥有自己的报纸。^[23]

李卜克内西和《人民报》创办人埃拉尔特·比斯基普邀请马克思一起办报。一开始，马克思拒绝了，但他好像无法抵抗控制一家报纸的诱惑，很快开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各种问题提出“意见”。^[24] 他的影响不断增加；在他的推动下，《人民报》开始撰文批判金克尔和他的同伙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对手。这使得流亡者圈子对“马克思派”刚刚沉寂下来的敌意被重新唤醒。

6月，马克思去曼彻斯特看望恩格斯和鲁普斯。他们不但没能把他从狂怒的道路上拉回来，反而火上浇油，说他的突破性经济学著作仍然

没能面世完全是因为自大的出版商认识不到它的价值。6月22日，马克思再次写信给敦克尔，嘲讽他违背约定，没在6月初出版和支付稿酬，甚至威胁说，要在报上刊登声明，解释延迟的原因，因为有太多人询问情况，自己不可能一一作答——这显然又是在夸大。⁽²⁵⁾事实证明，这封信让马克思十分难堪。他不知道1000册《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在11天前出版，他的信极大地侮辱了他希望能够继续出版自己的作品的人。⁽²⁶⁾

作品的出版让马克思陷入更大的焦虑，他迫切地想知道反响如何。恩格斯说自己很喜欢，⁽²⁷⁾这相比他之前对马克思的作品的盛赞，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其他战友一片茫然。李卜克内西说从来没有一本书让他如此失望；《人民报》的比斯康普说自己不明白有什么用途。⁽²⁸⁾马克思的战友理解不了其实并不奇怪：《批判》读起来就像是马克思一个人在推理，是他的中期思想的反映，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未来的《资本论》之间。前言论述了他对历史的物质基础的看法，但后面的部分更像是一个个片断，没有形成整体，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解答。⁽²⁹⁾

在出版界，则没有反响可言，只有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写了一篇短评，一些德语报纸（主要在美国）进行了转载。⁽³⁰⁾燕妮和马克思认为，没有反响是因为有些人达成了“沉默的阴谋”。⁽³¹⁾马克思极为愤怒，写信给拉萨尔说：“但是，如果你以为，我期望得到德国报刊的赞扬或者我认为这种赞扬有任何意义的话，你就错了。我期望的是攻击或批评，只是不要完全不理，完全不理也会大大影响销路。要知道，这些人在各种场合骂我的共产主义可卖劲了。所以可以期望他们会挖空心思地反对它的理论根据。”⁽³²⁾满腔怒火的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流亡者对手们都在欢庆自己的失败。⁽³³⁾

7月，马克思又病了，他说是天气炎热所致。⁽³⁴⁾8月，他仍呕吐不止。⁽³⁵⁾除了著作带来的失望，马克思还在承受家庭经济垮台的折磨。家里已经把能当的全都当了，燕妮去郡法庭对债主提出的要求进行抗辩时，由于迟到，未能获得更宽松的还债时间。债务没有变化，沉甸甸地压在他们头顶。⁽³⁶⁾伴随这些个人的不幸，马克思开始负责《人民报》的编辑，换言之，他要在财务上对其负责。报纸的财务状况比他家里还要糟，但马克思很乐观，告诉恩格斯说，“我确信，再过六个星期，事情就有保

证了”。^[37]但在8月26日，他宣布说：“《人民报》垮台了。……但全部问题在于：随着报纸的改进，亏损增加了，而读者减少了。”^[38]不久，报纸的印刷商起诉马克思，要求他支付12英镑。^[39]

怎么看，马克思掉进的这个坑都很深。最糟糕的是，在敌人眼里，他已经被击倒了，这让他难以忍受。9月，孤独又看不到希望的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我在这里连哪怕能够说句知心话的人都没有。”^[40]但恩格斯自己也麻烦缠身。他遭到一群醉汉中的一个英国人侮辱，便用伞打了那人，不巧的是，打到了眼睛，虽然没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但那人要求赔偿。恩格斯担心花费恐怕会到200英镑。“而且还会招致公开出丑和同我的老头的争吵，因为他要出钱”，恩格斯在信中说。“最糟糕的是，我被完全握在这个恶棍和他的律师的手心里，毫无办法。……这些该死的英国人当然不愿意放过揪住一个‘可恶的外国人’取乐的好机会。”^[41]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解决之前，马克思无法指望恩格斯帮忙。^[42]

心里既想着友谊又想着借钱的马克思建议恩格斯离开，躲到欧洲大陆去，但恩格斯基于自己在曼彻斯特的社会和商业地位，不可能这样做。^[43]燕妮见哪里都筹不到钱，走出了极端的一步，背着马克思向她的哥哥斐迪南借钱。对此，马克思永远不会同意——不仅出于自尊，而且敌人知道了，会再次散播谣言说自己与斐迪南勾结。斐迪南没有答应借钱，说自己没了工作，也很穷。这样倒好，不会连累到马克思。但燕妮还是对自己不得已采取这种“不愉快的步骤”，而感到丢脸。^[44]

马克思好像在竭尽全力得罪敦克尔，确保他不会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第二分册，但到了10月，他好像又发现敦克尔仍是最有可能在德国出版自己著作的人。马克思希望拉萨尔再次代表自己与敦克尔洽谈，写信告诉拉萨尔说，自己考虑过另一家出版商（但没有迹象表明这是真的），但最后还是觉得前两个分册最好由同一个出版商出版。“我现在应当全部重新加以修改。因为第二分册的手稿是一年以前写的。”他说自己最迟应该能在12月完成。他还告诉拉萨尔，自己正把第一分册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真的）。“我在英国至少可以指望得到比在德国好一些的待遇，据我所知，在德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提到这部著作。我想至少把这第一篇完全献给德国读者。如果德国读者仍旧

对这部著作毫不关心，那么后面的各部分我打算直接用英文写。”^[45]

马克思跟恩格斯说，他有信心第二分册会很顺利，但不到一个月，又承认进展缓慢。^[46]“我很羡慕你住在曼彻斯特，能够置身于这场老鼠与青蛙之战以外。我不得不过问这全部肮脏东西，而且现在的情况本来就要占去我不少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47]

12月，马克思愁得要命。他对恩格斯说，他被一些小债主告到了郡法庭，花5英镑给《人民报》的印刷商摆平了官司，3个月来一直在供养生病了病又没有收入的比斯康普。^[48]他想让恩格斯来伦敦过圣诞节。为了让自己和妻子内心都能平静一些，马克思说：“女孩子们非常需要在家里再一次看到‘人’。不幸的孩子们过早地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49]

的确，很难想象已经分别15岁和14岁的小燕妮和劳拉在如此纷乱的家庭里，是如何应对的。他们目睹父亲在创作中遭受苦难，听到他因为敌人的阴谋而咆哮，感受债主登门带来的羞辱。在写给斐迪南的妻子的一封信中，燕妮极为乐观地描述了自己的女儿们。“两个大的可爱、友好、谦逊，让我们非常开心。她们把去学校和上众多私课之外的有限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尽心尽力地照顾她们的小妹妹。长着一头褐色卷发、极为优雅的小家伙一见到她们，就往她们怀里钻。每当她们一起背着书包和画夹从清新、舒适、常绿的草地回来，都像刚刚周游过世界返回家里一样，受到热烈欢迎。”^[50]同样的区域，之前被燕妮描述得泥泞难行，回到家，鞋上要沾上厚厚的泥。^[51]显然，实际的情况应该介于这两种描述之间。

很明确的是，女孩子们的智力发育非常出色。1859年，小燕妮再次获得学校综合一等奖，劳拉获得两个单项二等奖。^[52]她们能说英语、德语和法语，能用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读写，还懂得一点西班牙语（至少懂一些《堂·吉珂德》）。^[53]她们弹钢琴，唱二重唱，画画。她们受到的教育不比那个时期任何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女孩受到的教育差。加上父亲的熏陶，她们还接受了彻底的政治教育。

12月底，燕妮说大女儿已经代替自己誊抄马克思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在写给恩格斯祝福圣诞的信中（虽然马克思做出邀请，恩格斯还是没有到伦敦过节），燕妮说到了自己的角色转换（她开玩笑说，

可惜的是给马克思做了多年秘书，退休的时候拿不到年金）和最近一年的苦难。“要是我们今年‘比较宽裕’，那我对这堆废物的领会会更加幽默一些；但是，如果经常都要同极其麻烦的穷困作斗争（这种穷困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感到沉重，因为现在温柔、可爱、如花盛开的女孩子们不得不同我们一起遭受穷困的痛苦），那么，幽默也化为乌有了。加上还有这么一种情况：由于德国人的沉默的阴谋，我长期以来暗中对卡尔的书所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⁵⁴⁾

燕妮发现，不管境遇有多惨淡，马克思总能保持乐观，坚信自己的理想终究会成功。有时，她觉得自己不该那样现实，觉得自己这样把生活看得一清二楚是不是一种背叛。她从不怀疑马克思的才华，但她确实怀疑他的作品能不能得到接受，她对公众对他的思想的理解能力没有信心。如同一名冷酷的革命者，她相信引起公众注意的唯一办法是投出一颗更大的炸弹。她相信，马克思的下一部著作就是这颗炸弹。她对恩格斯说：“也许，第二分册会使这些瞌睡虫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到那时，他们将攻击这部著作的倾向，而且会比现在对这部著作的科学性保持沉默更为热衷。走着瞧吧。”⁽⁵⁵⁾

燕妮有理由抱有希望，因为上个月刚刚有一部晦涩难懂的科学著作在英国面世，令其原本籍籍无名的作者一时间名声大噪。查尔斯·达尔文因其《物种起源》一书，⁽⁵⁶⁾在11月22日登上舞台。他们中最先读到这本书的恩格斯评价说，“简直好极了。……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⁵⁷⁾马克思说这本书“在自然历史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基础”。⁽⁵⁸⁾马克思和朋友们谈论达尔文和自然科学的革命力量长达数月之久。李卜克内西总结说，达尔文在自己的国土英国也在“准备发动一场革命，与马克思在这个世界的狂暴中心要发动的革命相似，只是他把杠杆插在了不同的地方”。⁽⁵⁹⁾

达尔文的著作一天之内便告售罄，这给燕妮带来了一些安慰——同样突破的机会也许也在等待着自己的丈夫。她把把这个想法当作救生圈一样紧紧抓住。

但马克思没有把时间用在极为重要的第二分册上，而是在第二年与一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前议员（此时在瑞士做地理教师、报人和地方政

客)打起了口水仗。马克思说这场争论是为了党的未来。朋友们只能沮丧地看着他为了原本不该理会的一点小事把全部时间和大量金钱浪费在官司和口水仗上。

整个事情起源于1859年5月相互间传来传去的闲言碎语。当时,法国和奥地利正因为奥地利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而交战。马克思的老朋友卡尔·布林德告诉他说,德国民主主义者卡尔·福格特被拿破仑收买,为法国进行宣传——不但自己宣传,还竭力收买其他作家一起宣传。福格特和他的朋友在瑞士创办了一家报纸,宣传法国应该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得到支持。⁽⁶⁰⁾

马克思便在5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个小道消息,说福格特把自己卖给了波拿巴。⁽⁶¹⁾他还把这消息告诉了《人民报》的比斯基康普,后者把这一并无根据的指控登在了报上,并寄了一份报纸给福格特。⁽⁶²⁾德国流亡者的世界很小,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关联比蜘蛛网还要密集,但结果并非相互扶持。由于马克思与《人民报》关系密切,之前在《新莱茵报》时期便与马克思有所交恶(的确够乱)的福格特自然把马克思当作了在他看来是无耻谣言的源头。⁽⁶³⁾

至此,整件事还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仅限于德国流亡者读的小报上的闲言碎语。⁽⁶⁴⁾但在李卜克内西发现一本叫作《警告》的小册子之后,事情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本小册子对福格特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但细节更多。李卜克内西就这一丑闻向19世纪上半叶发行量最大的德语报纸奥格斯堡《总汇报》发了一篇报道。⁽⁶⁵⁾福格特对该报提起诉讼,虽然由于技术原因,未被受理,但他得到了澄清,因为《总汇报》既无法证明他是拿破仑的代理人,又核实不了消息的来源。马克思成了输家。⁽⁶⁶⁾除了他身边的人,所有人都认为他就是作者,即便布林德的一个朋友站出来承认小册子是自己写的。⁽⁶⁷⁾

难道就没有更大的事情值得争论了吗?当然有。但事情还是愈演愈烈,并在1859年底达到顶点。随着对经济学著作的失望越来越大,马克思个人财务危机更加尖锐,又无法掌握生活中的任何其他方面,便把精力疯狂地集中在这件事上,将满腔怒火发泄在福格特和所有和他相关的人身上。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与很多他最为珍视的朋友的感情遭到了损害,其中就包括弗莱里格拉特和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对他们的指责很

多，但都归于同一个问题：他认为他们没有和自己站在一边。

对于马克思的攻击，弗莱里格拉特受到的伤害最深，宣布将退出党的所有活动。⁽⁶⁸⁾对马克思来说，损失是双方面的：弗莱里格拉特从1844年起便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而且他经常依赖于弗莱里格拉特作为银行家的身份在家里陷入财务困境时加以斡旋。考虑到这些，马克思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长信致歉，但私下里仍旧没有原谅他。⁽⁶⁹⁾燕妮却与弗莱里格拉特一家断绝了一切关系，“我不喜欢做任何折中”。⁽⁷⁰⁾

就这样，在马克思本可凭借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而在德国赢得博学之名的1860年，耻辱成了主题。1月，他了解到福格特出版了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将马克思列为针对自己的诽谤的源头。⁽⁷¹⁾福格特在其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马克思是一伙流氓的头目，顶着无产阶级的名头密谋进行暴力，专门进行勒索、敲诈和伪造。福格特还说，马克思真正效忠的人是他的贵族阶级内兄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⁷²⁾

这本小册子首版印刷3000册，全部售完，又要印第二版，极受欢迎的柏林自由主义报纸《国民报》进行了摘录。⁽⁷³⁾该报说马克思是一伙叫作“硫磺帮”的敲诈勒索者的头目，很多德国人遭到他们的敲诈，不按他们的要求付钱，就会被污蔑为国家的敌人；还说马克思及其同伙与德国和法国的秘密警察合作。马克思被描绘成了一个欺骗工人和用“铁棍”管理黑帮的骗子和暴徒。⁽⁷⁴⁾

马克思尽量不让燕妮知道有关福格特的小册子和《国民报》的事情，但他在等着拿到实物看看自己到底遭到了怎样的攻击的同时，一直在和恩格斯讨论。⁽⁷⁵⁾恩格斯非常了解自己的这位朋友，知道马克思与福格特争吵将得不偿失，因此提醒马克思说，真正能让福格特和所有批评者闭嘴的办法就是尽快完成他的著作的第二分册。恩格斯恳求道：“我希望福格特的事不妨碍你继续写作这本书。最后，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马虎一次也好；对于那些糟糕的读者来说，这已经是太好了。主要的是要把东西写完出版；你所看到的缺陷，蠢驴们是不会发现的。”⁽⁷⁶⁾马克思让恩格斯放心，自己正在写第二分册，6个星期以内就能完成，但还是决定要起诉《国民报》。“这个案件将使我们能在法庭上对一切民法性质的指控给予反击。以后我们就能够着手来对

付猪猡福格特了。”⁽⁷⁷⁾

马克思开始给以前的伙伴写信，要求他们帮自己就以前的工作（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作证，但他的笔迹他们无法辨认，必须由燕妮清晰地誊抄一遍。2月初，马克思只得把福格特的事情告诉了燕妮，让她帮自己誊抄书信和法律文件。⁽⁷⁸⁾燕妮后来回忆过这些无眠的夜晚。她不仅担心丈夫，还担心孩子们，担心她们受到丈夫面临的中伤的伤害。⁽⁷⁹⁾让一家人尤为苦恼的是，中伤的报道已经传出德国，出现在纽约，甚至伦敦，孩子们的朋友很可能看见。⁽⁸⁰⁾恩格斯说，《每日电讯报》为“福格特的脏东西辟了两栏篇幅”。⁽⁸¹⁾

马克思公开声明说要对《国民报》采取法律措施，⁽⁸²⁾并私下告诉恩格斯说，自己用诽谤罪威吓了《电讯报》那些“狗东西”。⁽⁸³⁾在写给《电讯报》的信中，马克思要求该报编辑为“轻率地侮辱一个对其个人品德、过去的政治活动、著作和社会地位都毫不了解的人”道歉。⁽⁸⁴⁾作为回复，《电讯报》刊登了其柏林通讯人的一篇文章，不仅没有道歉，反而指责马克思因为无法驳倒在德国受到的指控转而攻击英国报纸。⁽⁸⁵⁾

马克思相信报纸有权攻击作家、政客、演员和其他公众人物。但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国民报》完全是从福格特的小册子中把各种诽谤之言拿出来，像“干骨头”一样拼凑到了一起。他知道，公众由于政治倾向所限，会相信坏的东西，而报纸会迎合公众的这一倾向。他说，自己已经离开政治舞台太久，公众无从判断福格特的说法是真是假。“撇开政治上的考虑不谈，”马克思说，“就是为了我的家庭，为了妻子女儿”，自己也有责任把事情拿到法庭上做个了结。⁽⁸⁶⁾

一名柏林律师同意代表马克思打这场诽谤案，马克思为了给他提供充足的弹药，一下子就寄出50多封信，联系在柏林、巴黎、布鲁塞尔、科隆和伦敦认识、现已分布到世界各地的老朋友。他的目标是按照事实记述自己的生涯，反击所谓“硫磺帮”的指控。⁽⁸⁷⁾如果必要，他甚至准备让斐迪南出庭作证，虽然燕妮不愿因此让家事为公众所知。⁽⁸⁸⁾

马克思觉得家里太过喧闹，便去了曼彻斯特，在恩格斯和鲁普斯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比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时规模小一些的辩护委员会。⁽⁸⁹⁾律师传来令马克思振奋的消息，老朋友们也不断寄来证词佐

证他的说法。马克思对一个老友说：“我应该把福格特先生的攻击看作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它使我同我们革命和流亡中的老将们更亲近了。”⁽⁹⁰⁾ 德国工人在伦敦举行集会，投票决定谴责福格特，支持马克思。⁽⁹¹⁾ 燕妮说，不论其他，这件事至少帮马克思分清了“哪些是真正的忠诚的朋友，哪些是虚伪的小人。两者之间可真是千差万别”。⁽⁹²⁾

在亚历山大二世相对开明的政策下，俄国也有了马克思的朋友，虽然他还尚未与他们相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在俄国开卖，莫斯科大学一名教授专门做了讲授。⁽⁹³⁾ “俄国一直都是你的福地。”燕妮在信中兴奋地对马克思说。⁽⁹⁴⁾

马克思去曼彻斯特对他自己和家人可谓双赢。他离开，也带走了他在家里制造的风暴——他工作的一楼房间便是风暴的中心，他在这里抽烟、踱来踱去、对着收到的信大声自言自语。他在家时，一家人为他的需要和活动服务，他的工作就是她们的工作，他的心情影响着所有人。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家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男人是太阳，家里所有女人都要围着他转。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家的女人和琳蕙不情愿这样做——她们一生的使命就是保护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但这个任务很累人，所以每当马克思去找恩格斯，就意味着女人们的假期。这一次，她们打算利用假期装饰一下房子。燕妮意外收到一笔家族投资回报，打算花出去。⁽⁹⁵⁾ 琳蕙、玛丽安娜、燕妮和女孩子们（4岁的杜西除外，她只能给大家逗逗乐）粉刷墙壁，把破损的地毯和家具重新进行布置，让房子焕然一新。她们还从当铺（燕妮说当铺店主是自己的“左膀右臂”）用旧家具换来一些新的，包括一张时髦的色彩艳丽的机织羊毛布鲁塞尔地毯，和几把藤椅——旧椅子都掉腿了。⁽⁹⁶⁾ 小燕妮上一年用彩色粉笔临摹的几幅古典画也用金色的相框裱起来，挂在了墙上。⁽⁹⁷⁾

改造工程刚好在5月1日小燕妮16岁生日前完成。虽然留存下来的信件并未提及，但毫无疑问，即便处在福格特事件的烦扰之中，一家人还是进行了庆祝。马克思家就像一个纷扰事多的小世界，每次重要场合都像国庆日一样重视。马克思尤其珍视小燕妮，不管麻烦有多大，都不会妨碍他为她庆祝。他与大女儿感情最为亲近，她作为一个孩子已经能够对他的工作有深刻的了解。她在自己和燕妮因为个人或经济上的困境或者生病而无力照顾孩子时，把弟弟妹妹照顾得很好，这些他都看在

眼里，满是欣慰。她毫无怨言，主动做出不该由一个孩子做出的牺牲，她的面容和身体都因此受到了影响。她友好、漂亮，喜欢笑，像父母一样机智，但总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忧虑已经在她的眼睛和额头留下痕迹。她本能地分担父母的痛苦，让妹妹们可以无忧无虑。她的付出很高尚，但代价很大。从十几岁起，她便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身体柔弱。

马克思说，在所有孩子中，小燕妮最像自己。^①十六岁的她认真，善于思考，没有急着谈情说爱。⁽⁹⁸⁾她想有一份职业。当然，她珍惜眼前和父亲一起工作的机会，但她同时想拥有一份自己的职业——她相信自己在戏剧中找到了。马克思一家都热爱戏剧，一有可能就去附近的萨德勒威尔斯剧院或伦敦东部的肖尔迪奇剧院（买不起坐票，就站着看）⁽⁹⁹⁾观看莎士比亚剧。一家人说话时，也时不时冒出戏剧里的台词，但燕妮和马克思不希望女儿成为一名演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连桌子腿都要包起来，才显得得体，对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女孩而言，宣称要把一生放在舞台上无异于最不体面的追求。但燕妮知道女儿的才华，她的嗓音优美（燕妮说又低又甜），演讲表现出色。私下里，燕妮告诉一个朋友说，如果女儿真的认准了这一行，只要她的健康允许，自己和马克思不会阻止。小燕妮静静地做着一些事情，改变他们的想法。

恩格斯接到父亲死于伤寒的消息后，马克思只得临时结束了曼彻斯特之行。恩格斯终于获得普鲁士政府允许，返回故土，这是他1849年在科隆被逐后第一次返家，⁽¹⁰⁰⁾待了几周后，返回曼彻斯特就重组父亲的公司与英国合伙人进行谈判。⁽¹⁰¹⁾谈判还没结束，恩格斯就拿到了一些钱，寄了100英镑给马克思，让他极为惊喜。马克思说，这笔钱是“奇迹般的意外礼物。全家欢腾起来”。⁽¹⁰²⁾

这笔钱也许缓解了一连串坏消息带来的打击。柏林检察官驳回了马克思对《国民报》编辑提出的诽谤刑事罪诉讼，理由是“此案不具备公共利益”。⁽¹⁰³⁾6月26日，马克思了解到，自己对《国民报》提出的诽谤刑事罪诉讼也被驳回，理由是缺乏犯罪构成。⁽¹⁰⁴⁾7月底，马克思的上诉被柏林高等法院驳回。⁽¹⁰⁵⁾他和恩格斯都知道案子已经毫

① 在写给奥利芙·施赖纳的信中，杜西说记得父亲说过，“小燕妮最像我，但杜西就是我”。

无希望，但马克思还是让律师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尝试走民事途径，结果是恩格斯更多的钱打了水漂。⁽¹⁰⁶⁾这期间，马克思打算写一本小册子，回击福格特。

燕妮和恩格斯眼睁睁看着一年时间就这样溜走，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他最重要的，也是一生的著作——却毫无进展。他也几乎没再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完全依靠恩格斯代笔，以便能继续领取稿酬。燕妮和恩格斯在相互的通信中表达了彼此的焦虑和沮丧。8月中旬，燕妮写信给恩格斯说，希望能在本周内开始誊抄回击福格特的小册子。

“这件事拖得太久了。我看，卡尔写得过分认真。”此外，她说马克思还没开始找出版商。⁽¹⁰⁷⁾

恩格斯极少对马克思失去耐心，但福格特这件事让他无法忍受。他见过马克思这种状态，写《神圣家族》时，便是如此，一个小册子愣是写成了长达300页的著作。恩格斯承担了马克思的报刊写作任务，竭力帮他找人出版这本对付福格特的小册子，但马克思过于沉浸其中，完全无视他的书信和建议。恩格斯生气地写信给燕妮说，按照马克思这样的进度，肯定要到1861年才能出版。“这不能怪任何人，而只能怪摩尔先生自己……我们总是写出最精彩的东西，又总是尽量使它们永远不及时出版，结果成了无用的东西。……请尽一切力量就出版人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并使小册子最后完成。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自己破坏所有的机会，结果弄得根本找不到出版人。”⁽¹⁰⁸⁾

又一个月过去，马克思仍未完成，但他找了伦敦一家出版商洽谈出版事宜。这家出版商之前从未出过书，要求马克思预先支付50至60英镑，马克思打算向朋友们借这笔钱。⁽¹⁰⁹⁾恩格斯强烈反对，说自己无法相信先要钱的出版商，而且，在伦敦出版，结果只会弄得谁也看不到它。

“出版流亡者的著作，我们已经有过成百次的经验，永远是同样的毫无成果：永远是把金钱和劳动抛到污水坑里去。”⁽¹¹⁰⁾但马克思听不进这些。他写信给拉萨尔说，“我深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在伦敦付印”。

马克思告诉拉萨尔说，出版的费用没有问题，印刷会很快。他好像几乎失去了与现实世界的接触，满脑袋都是未来的远大计划。“我们的‘小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大的党’（因为其他政党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或者不愿干自己所知道的事），已经临近应当制定自己战斗

计划的时刻了。”他估计经济学著作第二分册能在复活节前出版，“形式将稍有不同，将稍微通俗一些。这决不是出于我内心的要求，而是因为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而且，我在那里所叙述的关系也比较具体”。⁽¹¹¹⁾

这期间，马克思把燕妮和孩子们送去海滨小镇黑斯廷斯住一个星期。⁽¹¹²⁾不难想象，她们非常需要从福格特事件导致的紧张氛围中脱身出来，休息一下，但黑斯廷斯整个星期都在下雨，没给她们带来多少舒适。小燕妮说她们浑身是泥，看着跟海草似的。⁽¹¹³⁾

9月25日，她们回到伦敦时，马克思正在为自己长达200页的著作想名字。他在考虑《达—达—福格特》——源自一名阿拉伯作家，像福格特在日内瓦被收买一样，他在阿尔及尔被拿破仑收买。马克思说读者读到一半，⁽¹¹⁴⁾就会恍然大悟，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说这个名字能“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很合我的心意，而且我觉得这正适合于轻蔑嘲笑的做法”。他说自己会跟“批判的良心（指燕妮）”讨论一下。⁽¹¹⁵⁾可以想象，恩格斯估计被气得直拽自己的大胡子。他说，马克思给福格特起绰号没问题，但不能让读者把书读到一半才能弄明白！“在书名上搞轻蔑嘲笑的做法，恐怕除了把书名弄得离奇古怪或矫揉造作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¹¹⁶⁾马克思让步了——也许是因为他此前一直无视恩格斯的想法，却又需要恩格斯的钱来出这本书。但马克思没有轻易让步。他说，虽然燕妮旁征博引地指出希腊悲剧也使用难以理解的名字，自己还是听恩格斯的，把书名定为《福格特先生》。⁽¹¹⁷⁾

10月，马克思的诉讼努力最终宣告失败。他的诉讼被柏林最高法庭驳回，理由是案件缺乏根据。⁽¹¹⁸⁾这使得马克思不得不对书进行修改，加入被他称为“普鲁士司法诉讼”的部分。⁽¹¹⁹⁾随着马克思写了又改写，燕妮只能跟在后面不断誊抄。疲惫之下得了病。11月底，她出现发烧和其他症状，却不肯叫医生来。几天后，病情又有加重，马克思找了医生来。医生让孩子们马上离开房子，他虽然无法确定病症，但担心具有传染性。⁽¹²⁰⁾女孩子们当天下午便收拾东西，搬去了住在临近的肯特镇的李卜克内西家。（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本想送她们去学校寄宿，但她们由于宗教仪式，不愿意去。）⁽¹²¹⁾

不到两天，医生说燕妮得的是天花。⁽¹²²⁾几个月后，燕妮写信给

朋友说：“你可以想象一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恐惧和悲伤。”⁽¹²³⁾ 1830年以来，英国再未出现过特别严重的天花疫情，1853年后，新生儿开始强制注射疫苗，因此死亡率逐年降低。但对那些在病毒小规模爆发时不幸被感染的人来说，这样的统计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中的年轻者因为浑身长满脓包而毁容，重者不治身亡。这是一个高效的杀手，曾被殖民者用作侵入美洲的武器。燕妮被确诊时，英国每年仍有数千人死于这一疾病。⁽¹²⁴⁾

像穆希生病时一样，马克思停下一切工作，专心照顾妻子。他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是一种可怕的病。琳蕻要是传染上，我立刻就把她送进医院。直到现在，我自己担负看护的任务（主要任务）。……许多星期以来，我妻子非常焦躁，因为我们遇到了许多麻烦事，这样一来她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就减弱了，可能在公共马车、店铺或这一类地方受到了感染。”马克思说，这种情况下写文章几乎是不可能了。“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数学。……昨天夜里是可怕的，说真的，此刻我感到自己也病了。鬼知道我们是多么不走运。”筋疲力竭的马克思雇了一名护工帮忙。⁽¹²⁵⁾

马克思每天送食物到李卜克内西家，和他们一家人以及自己的女孩子们一起吃饭，但停留的时间很短。燕妮面对的危险尚未降低。她的四肢没有知觉，失去了部分身体机能，但清醒着。她非常痛，高烧不下，无法入睡。她后来回忆说：“我一直躺在敞开的窗子旁边，让11月的寒风一直吹着。房里火炉很热，他们在我滚烫的嘴唇上放了冰，不时喂我几滴葡萄酒。我几乎不能吃东西，听觉越来越迟钝，后来眼睛闭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长眠的时刻已经来临！”⁽¹²⁶⁾

病情的急性期持续了7天，但医生说，病症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好转，孩子们还不能回家。考虑到这种疾病的过程，现在受到传染的可能性比之前还要大，马克思和琳蕻都注射了牛痘，要在房子里隔离10天。马克思在11月28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孩子们都非常不安。她们只能站在房子外面，仰着头从打开的窗户看见母亲躺在病床上，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马克思说，剧烈的牙痛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反而感觉好过了一些。⁽¹²⁷⁾

在一家人的不幸当中，《福格特先生》出版了。恩格斯是在12月

5日收到书的，他评价说，这是马克思写得最好的论战性著作，这让马克思极为高兴。^[128]的确，《福格特先生》时而尖利，时而嘲讽，反驳了福格特对马克思提出的所有指控，把福格特刻画成一个“造谣诽谤”的福斯泰夫，一个卑鄙的家伙、一个满脑肠肥的混蛋、一个小丑、一只臭鼬。^[129]书中还有趣地描绘了19世纪上半叶的激进反对派，但不能算是马克思的自传（虽然有他的一些轶事），更应该说是关于一场运动的传记——身处运动中心的人物相互间的信件使得运动极为丰满。

如果福格特写的小册子卖完后，马克思马上就在德国出版这本书，反响也许会更好。他希望销量不断增加——伦敦卖出41本，伦敦卖出80本。他甚至想，“进展如此顺利，佩奇（出版商）肯定在‘考虑’出第二版”。^[130]但不会有第二版了。出版商破产了，出版和法律费用达到100英镑，马克思被印刷商起诉要求支付20英镑。^[131]

燕妮控诉“卑鄙、胆小、出卖灵魂的出版界”使得《福格特先生》落得同马克思其他近期著作一样的境地——堆在一旁，无人问津。也许马克思在写这本书之初，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结果。他在前言中写道：“我早就料到，在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出版时，因他的‘揭露’的重要性而忧虑地摇头的那些聪明人，现在将无法理解我怎能花费时间去驳斥这一类胡说；而那些曾经幸灾乐祸地在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急忙散布福格特的庸俗蠢话和无聊谎言的‘自由派’文丐们，却会认为我对付他们和他们的英雄的一套办法是心怀叵测和粗鄙无礼的。但是这不要紧！”^[132]

1870年时，马克思周围的人再次讨论了福格特事件，因为在那一年，法国政府的档案记录证明导致整个事件的那个最初的传言是真实的——福格特确在1859年，也就是马克思把传言告诉恩格斯的那一年，收了拿破仑的钱，准确的金额是4万法郎。^[133]但那已经是10年之后的事了，对那时的马克思和燕妮而言，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让他们想起很久以前的一场昂贵的斗争，而在这期间，他们又已经遭受过很多个人和事业上的失败。

28 荷兰之行



我至今始终确信，凡是真正坚强的人……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是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

——卡尔·马克思⁽¹⁾

燕妮的身体逐渐恢复，但容貌受到的伤害远未消除，原本美丽的脸上盖着一层品红色的疮痕。⁽²⁾直到圣诞节前夕孩子们才回到家，⁽³⁾那天天气干燥、阳光明媚，这样的好天气在12月的伦敦极为少见，⁽⁴⁾好像特意为这个欢乐场合而出现似的。她们冲进已经离开数周的房子，跑上楼，去看她们的母亲。但当她们看到她，喜悦变成了恐惧。三个孩子都哭起来，她们已经无法认出这个坐在母亲卧室里的女人就是母亲。燕妮后来向一个朋友透露说，自己外表的变化非常大。“五个星期以前，我和青春绽放的孩子们在一起时，还算过得去，那时我还没有白头发，牙齿和身段还很好，还算得上保养得法。但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一只怪兽，应该待在动物园里，而不是白人中间。”⁽⁵⁾

燕妮和马克思都一向为她的美丽感到自豪。但现在，她的美丽也像他们极为珍视的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受到了威胁。马克思对恩格斯说，医生相信燕妮会最终完全恢复，但附带在括号里又说，“我妻子的脸还远没有恢复正常，这种状况也许还要继续很久”。⁽⁶⁾燕妮不是肤浅

的女人，但也重视自己的外表。身体虚弱，加上担心自己面目可憎，她的情绪愈加烦躁。女儿们归来的喜悦无法冲淡疾病给她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损伤。⁽⁷⁾

马克思也不堪重负，病倒了，他自己说这是数周的无眠和担忧所致。上一年，由于福格特事件和燕妮染上天花⁽⁸⁾（马克思说这导致了一笔“惊人的医生账”），⁽⁹⁾家里的负债大为增加。接着，《纽约每日论坛报》又传来消息，说马克思多支取了19篇文章的稿酬，让他6个星期内不要再发稿。⁽¹⁰⁾《百科全书》项目也停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刚刚编到字母“C”。⁽¹¹⁾

考虑到美国报纸当时正全力关注于国内新闻，上面这些决定并非（至少并非完全）针对马克思。亚伯拉罕·林肯刚刚被选为总统，南方诸州开始退出联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林肯的当选和美国南部的骚乱感到振奋。他们从中看到了政治意义，但对马克思个人而言，这意味着他唯一的稳定收入（虽然不多）受到了威胁。他告诉恩格斯说：“你看，我像约伯那样多灾多难，虽然不是那么怕上帝。”⁽¹²⁾

弗里德里希·威廉死后，摄政的威廉于1861年1月12日登基为威廉一世，颁布法令赦免一些流亡者。⁽¹³⁾赦令措辞模糊，一些流亡伦敦的德国人被允许回国，但对面临官司的流亡者来说，大门依然紧闭。马克思觉得自己属于后者，但柏林的拉萨尔认为马克思会受到欢迎，建议他来柏林一起重办《新莱茵报》，由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提供资金。⁽¹⁴⁾最初，马克思未予考虑，但随着经济困难加剧，他逐渐有了兴趣到普鲁士首都创办一份资金充足的报纸。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主要障碍是拉萨尔的参与，以及马克思能不能回普鲁士。⁽¹⁵⁾但无论如何，拉萨尔的提议是看起来唯一可行的方案，能让马克思挣钱养家，而且此时的马克思非常急迫地需要钱。他自嘲说，好在自己有“很大的本事”，给众多债主排了个还账的顺序，才避免了全家彻底垮台。但也仅此而已，无力还债，只能拖延。

马克思每当陷入无能为力的局面，便躲到书房里去。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出于休闲，正在读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发现斯巴达克斯是“最辉煌的人物”，庞培是“十足的废物”，凯撒为了迷惑对手才故意犯了一些“很离奇”的军事错误。⁽¹⁶⁾晚上陪他一

起躲在书房里的是小女儿杜西。她这个月刚满6岁，马克思送给她的礼物是航海故事《皮特》，这是她读的第一本小说。^[17]实际上，这个一头金色卷发、记忆力惊人的小女孩早已沉浸在文学中。她把莎士比亚戏剧的很多场景记得一清二楚^[18]（她最喜欢的是《查理三世》中的独白，因为可以边说边挥舞一把小刀），^[19]通过阅读和听别人讲格林童话学习德语，^[20]思考问题时经常把自己当作小大人——在大她十多岁的姐姐面前如此，在43岁的父亲面前也是如此。她和马克思读同样的书，然后坐在书房里讨论。比如他们讨论《皮特》时，杜西告诉父亲说自己正计划装扮成男孩，跑去海边，和等着她的战船会合。马克思说，这是个好主意，但在她的计划“成熟”前，不能告诉别人。杜西还给林肯写信，给他建议如何作战，她把信交给父亲，让他代自己寄给白宫。马克思把这些信当作宝贝一样保存着。^[21]燕妮说，杜西响亮的笑声缓解了马克思的苦闷。^[22]

躲藏的时间虽然愉快，但马克思知道自己不能一直躲避麻烦。虽然数年来一直在回避，但他知道自己唯一的选择是坐船去荷兰，向姨父讨要属于自己的那份遗产。^[23]马克思途中不能使用真名，护照上的名字是卡尔·约翰·毕林，职业是木匠。离开前，马克思把燕妮和一家人的需求托付给了恩格斯。他此行行程未定，先去荷兰，然后可能会去柏林与拉萨尔讨论筹办报纸事宜。这期间，燕妮要每周付钱给杂货商、面包房老板和肉铺老板。^[24]（马克思还需要恩格斯继续给家里寄酒。他说燕妮很感谢，孩子们也很感激，孩子们“大概继承了父亲的酒癖”。）^[25]

马克思答应从荷兰给恩格斯写信，信尾少见地坦白说：“不用说你也知道，对你的极其友好的表示我是多么感激。”^[26]

莱昂·菲利普斯67岁，为人固执，是一名商人，和儿子们一起建起一家不错的公司^[27]（30年后，成为飞利浦电子公司），对帮人没什么兴趣。基于政治原因，他与外甥卡尔的关系并不好。不过这次，马克思到荷兰后，表现很好，不再是他印象中的共产主义者，转而变成了一个不羁但又高雅的作家。马克思让拉萨尔帮忙等自己到荷兰后，给自己寄一封信，信中提一下自己那本驳斥福格特的著作的“成就”，并说一下共同创办报纸的计划。马克思强调说，这封“秘密的”信要写得自己拿给姨父看时，不至于让他生疑。^[28]马克思还想办法通过他的表妹安托

瓦妮特——或许他也把这当作了一个不错的调剂——来软化她父亲。安托瓦妮特 24 岁，又叫南尼达，很快喜欢上了马克思，马克思也对她大献殷勤。^[29] 他说她迷人，聪明，有一双“危险的黑眼睛”。^[30]

马克思在扎尔特博默尔待了两个多星期，之后去柏林。在荷兰期间，他只给燕妮写了一封信，给恩格斯则一封没写。燕妮有时根本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是否安全。他的身份证件是伪造的，他与普鲁士政府的关系往好了说也只能说不确定。更糟糕的是，琳蕙病倒了：她精神有些错乱，说胡话，又唱又哭。她的腿上有炎症，医生担心她会大出血，或出现坏疽。联系不到马克思的燕妮只得求助于她唯一能指望的人——恩格斯。恩格斯提供的帮助比她需要的还多，寄钱过来让她请医生给琳蕙看病，买煤炭、食物和酒帮助琳蕙恢复。^[31]

有些马克思传记作家认为燕妮和恩格斯的关系从来就不亲近，因为他们在信中彼此称呼对方为“马克思夫人”和“恩格斯先生”。但燕妮称呼自己最亲密的女友时，也用同样正式的称呼，比如“李卜克内西夫人”或“魏德迈夫人”。燕妮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用什么称呼与她对恩格斯感激多少绝对没有关系。有人说，燕妮嫉妒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这同样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燕妮和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生命中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独立，各不相同。很明显，他们谁也不会愿意单独承担起照顾卡尔·马克思这股自然力量的重任。还有人写道，燕妮痛恨依赖于恩格斯。这无疑是对的，但燕妮不可能为此责怪到恩格斯头上，她只会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独立养家，而不是总需要这位挚友的插手。不，曼彻斯特的这位朋友一直都是他们的救星，燕妮比谁都明白他一直以来是多么无私地帮马克思抵挡私人和经济上的麻烦——几乎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便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燕妮在 3 月 16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多年来您对我们的艰难困苦给予了全心全意的帮助，我真是感激不尽！当我看到寄来的钱是我所指望的五倍时，我真是高兴极了。不承认这一点，那是虚伪的，而琳蕙比我更高兴！当我跑上楼去对她说‘恩格斯为了使你舒适，寄来了五英镑’时，她那双几乎已经失神的眼睛立即放射出了喜悦的光芒。”^[32]

3 月底，马克思写给燕妮一封短信，说自己在柏林跟拉萨尔在一起。他没有细说，只说前景很好，自己不会空手而归。另外，他寄了大概 7

英镑给她。^[33]马克思仍然没有给恩格斯写一句话，但他一到柏林，就给南尼达·菲利普斯寄去一封长信，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自己在柏林的活动。他也许是在打她父亲的主意。

马克思告诉南尼达说，拉萨尔住在柏林一条最繁华的大街上，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每天傍晚都过来相聚。56岁的伯爵夫人依然美丽，眼睛还是那样蔚蓝，金黄的头发波浪般梳在脑后，虽然这样靓丽的外表需要大量化妆品的协助。马克思说与她相处很愉快——她很活泼，不扭捏，而且最重要的是，对革命感兴趣。^[34]柏林已经装上煤气灯，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在这里学习时印象中的那个城市。^[35]马克思抵达后，拉萨尔和伯爵夫人把他当作贵客一样招待，广邀名流为他设宴接风，带他去看戏剧和芭蕾（所坐的包厢挨着国王的包厢）。拉萨尔甚至直接与警察局长交涉，为马克思争取恢复普鲁士国籍。马克思心满意足地答应多待一段时间，等事情解决了再走。这期间，他过着奢华的生活，不用担心受到国王（在普鲁士被称为“美男子威廉”）或其安全部队的骚扰。^[36]

在抵达柏林两周后写给巴门的一个朋友的信中，马克思说自己就像沙龙里的狮子，不得不与很多“卖弄聪明”的庸人见面。^[37]但他好像并不着急离开。燕妮告诉恩格斯说，马克思写给自己的信“文笔简练”到了极点。到了4月，马克思仍然没有给恩格斯写信，这让恩格斯大为惊慌，因为他看到一份德语报纸报道说马克思和家人可能会搬去柏林。燕妮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还没有给恩格斯写信，但她安慰恩格斯说报纸上的消息不可能是真的。她甚至无法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想要恢复普鲁士国籍。至于她自己 and 女儿们，她根本不想回德国，女孩子们则已经被吓到了：“离开莎士比亚之国的念头，对她们来说是可怕的；她们已经成了地道的英国人，牢牢地扎根在英国的土地上了。”^[38]无论如何，燕妮不希望女儿们处在伯爵夫人和她的圈子的影响之下。^[39]

相比马克思在柏林的生活（他的幻想不提），燕妮在伦敦的生活可谓窘迫到了极点。她想尽一切办法，向朋友借钱，向当铺抵押，维持一家人的生存。她说自己是“靴子联盟进步党”的成员，意思是每天下午花费数小时在城里转来转去，想办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和财务状况。

燕妮讨厌拉萨尔，但马克思在柏林期间，还是写了一封信给他，感谢他给予自己的“主上和主人”的友谊，但还是恳请他不要留马克思太

久。“在此，请原谅我的占有欲、自私和嫉妒。”说到去柏林，不论是常住还是探望，她都表示了否定。政治上，她说自己搜遍内心每一个角落，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祖国。个人上，她说不想让朋友们看到自己染上天花后满是斑痕的脸。“现在，我的脸上仍是一片极为流行的品红色，你们会被吓到的。我的面貌已被摧残，变得极为丑陋。”^[40]

马克思肯定从信中看到了燕妮的悲伤，虽然她极力用幽默来掩饰。马克思在柏林待了将近一个月，极少与家里联系。也许是因为与她们通信会让他想起回去后仍要面对的诸多麻烦，而他想在能开心的时候尽可能开心一些。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国籍的事情没有任何消息，办报之事也没个说法，马克思待不下去了。他好像对柏林感到了厌烦。他告诉南尼达说，自己永远不会从英国搬回德国，更不用说无聊透顶的普鲁士。^[41]事实上，有一次去埃尔伯费尔德时，马克思觉得同行的人实在太过无聊，便让朋友谎称自己嗓子哑了，不能说话。^[42]

马克思的母亲之前邀请他顺便回一趟特里尔，马克思因此在4月12日离开柏林，回莱茵省看望留在家中的亲人。他已经至少13年没有见过母亲。她已经74岁，病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没有出现大的改善，但母亲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向返家的儿子表达了温暖：撕毁了马克思之前开给她的几张借据，让他以后继承遗产时不用再被扣除这部分钱。^[43]马克思的下一站是荷兰，找他的姨父最终把事情办妥。^[44]他成功地让莱昂·菲利普斯相信自己是一名积极进取的作家，在柏林、维也纳和纽约都有很好的前景，从而从后者手里挤出160英镑。^[45]

4月28日，马克思在鹿特丹登船，第二天到达伦敦。^[46]他离家时是2月28日，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马克思显然没有告诉家人何时回来，因为燕妮说他径直打开家门，给了她们一个惊喜，全家兴奋得不得了——又是欢呼、又是拥抱、又是亲吻。所有人都睡得很晚，听他讲旅途中的故事，比量拉萨尔送的礼物。女士们都收到一件高雅的大衣，在客厅试穿时，女孩子们在边上笑哄哄地看着，穿着大衣的燕妮显得如此华丽，以至于杜西喊道“像孔雀一样！”燕妮写信向拉萨尔致谢，说自己迫不及待要穿上大衣“出去走一走”，让周围的庸人们看一看。^[47]

马克思回到家后第二天，莱昂·菲利普斯的儿子雅克来到伦敦，住进了马克思家。^[48]雅克在鹿特丹工作，是一名年轻的律师，嘴上说来和

马克思讨论政治，但马克思觉得他更像是来看望自己的女儿们的。⁽⁴⁹⁾他来的正是时候。5月1日星期三正好是小燕妮的17岁生日。孩子们的庆祝非常热烈。父亲终于回来了，她们的口袋里有钱花了，穿上了漂亮的衣服，还有一个年轻的绅士一起跳舞、唱歌。⁽⁵⁰⁾一直压在一家人头顶的乌云终于暂时退去。

乌云很快又回来了。6月，雅克走了，马克思荷兰之行拿到的钱也用完了。债主们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而且更加急促。到秋天，马克思四处向朋友借钱，向他们保证会有其他朋友帮着还，但他这样做的速度太快了，又没有跟朋友进行必要的商量，结果发现承诺无法兑现。马克思因为以恩格斯的名义进行的几次不牢靠的交易写信向恩格斯道歉时，在结尾时写道：“现在祝贺你新年幸福！如果新的一年仍像旧年一样，那么我看最好还是让它见鬼去吧。”⁽⁵¹⁾

29 死亡的阴影



但愿我最终能找到一个什么事情做做！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事业才常青。可惜，我信服这一点为时太晚了。

——卡尔·马克思⁽¹⁾

1861年底，悲愁不止笼罩着马克思一家。摄政街、牛津街和伦敦其他商业中心区域的所有店铺和门柱以及整个英国的乡村，都系上了黑丝带。因为阿尔伯特亲王在12月死了，整个英国都陷入悲痛之中。⁽²⁾伦敦没有举行任何庆祝圣诞的活动；一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称，庆祝将被视为叛逆。⁽³⁾失去了亲王后，公众也在担心维多利亚女王。阿尔伯特死后，女王退出了公众视线。曾经精力充沛、开明的英国女王陷入了茫然。⁽⁴⁾

与此同时，民众普遍认为英国可能会同美国开战。因为美国南方联盟派出的两名代表在搭乘英国“特伦特”号邮船前往欧洲为南方争取支持的途中，被北方军队抓获。该船违反了英国海上法，根据该法，中立船只战时不得载运交战国人员。⁽⁵⁾这在很多英国人看来是美国军队对英国主权船只的侵犯，就在英国政府就如何反应进行辩论时，伦敦的报童已经喊出报纸的头条标题“我们必须炮击纽约！”⁽⁶⁾

虽然英国反对奴隶制的立场坚定，但政治上极为强大的英国棉纺

商人担心美国废除奴隶制后，他们将失去低廉的棉花供应。⁽⁷⁾有批评者指责政府大臣试图以此事件为借口，介入美国内战，帮助南方的棉花寡头。⁽⁸⁾英国工人阶级站在了北方一边（他们将北方的胜利视为像自己一样的工人取得的民主胜利），很多人担心如果英国参战，社会结构将受到重大伤害，因为被招入伍参战的大多是反战最为强烈的人。⁽⁹⁾圣诞节过后，“特伦特”号事件得到解决。美国做出让步，同意释放两名南方代表——并非抓捕他们不合法，而是抓捕他们的船长未能履行适当的程序。⁽¹⁰⁾这一消息在1月8日出现在伦敦街头，并迅速传开。报社加班加点，印出三期晚间增刊。在刺骨的寒风中，民众聚集在新闻处外面，等着看最新的报道张贴出来——标题的油墨还是湿的。⁽¹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关注和讨论着美国内战的进展，如同他们本人就坐在华盛顿，听着大炮在波托马克河两岸轰鸣。很多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加入了战争，魏德迈和他们的老对手维利希都加入了北军，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却加入了南军。⁽¹²⁾马克思将奴隶制视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最基本的形式，他和恩格斯都认为消灭奴隶制将是朝着世界革命迈出的一大步。⁽¹³⁾但同时，战争对他们的生计造成了直接影响。棉花价格飞涨，导致恩格斯工厂的利润降低。马克思从《纽约每日论坛报》获得的稿酬很快减少了一半，接着是三分之二。⁽¹⁴⁾最终《纽约每日论坛报》在3月写信说，以后不再需要伦敦撰稿人投稿。⁽¹⁵⁾

马克思家的经济一直如此糟糕，根本谈不上什么时候算危机。马克思挣钱、借钱、躲债，就这样带着一家人熬过一年又一年。在刻薄的人看来，他12年来不断向恩格斯要钱无异于专业乞讨。但恩格斯不这样看。他觉得自己挣的钱属于共产主义，换言之，不仅属于他自己，更属于马克思和其他有需要的“党”内战友。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不是白拿钱，他的经济学著作能够推进党的目标。如果出现延迟，或者马克思的效率欠佳，恩格斯会感到沮丧，但不会因此不愿再出钱。但美国内战让恩格斯也没了办法。爆发的时间太不巧了，马克思刚刚把最后的办法都用过了——把自己装扮成手头一时紧张的成功作家，才终于从他那个极为实际的商人姨父手里弄到一些钱，短期内不可能再找他了。

1862年，恩格斯的公司接不到订单，开工时间只得减半。他担心如果美国内战不尽快结束，自己一年的收入恐怕都不会超过100英镑，

比他每年寄给马克思家的还少。春天，他告诉马克思说，自己在7月之前都很难帮上忙。^[16]总结一番形势之后，恩格斯简单直接地告诉马克思说：“如果我们想不出弄钱的办法，那你除了找一个门道试试从亲戚那里弄几个钱以外，也未必有其他出路了。你想一想吧。”^[17]

小燕妮这年18岁，可远算不上健康。她在过去一年间瘦了很多，部分是因为贫困，还有沮丧。她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不该再依靠父母。对同龄人而言，这意味着嫁人，但她还不想这样做。^[18]她背着父母找到一个演员出身的美国戏剧老师，看能不能在舞台上找到事做。但还没等有任何结果，她便病倒了。^[19]马克思知道了这件事，他自责说她的病和做出这样轻率的决定都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顿带来的“压力和……屈辱”。他告诉恩格斯说：“面对所有这些，这样穷困的生活实在不值得活下去。”^[20]

恩格斯虽然没有寄钱，但寄来8瓶波尔多酒、4瓶1846年陈莱茵酒和2瓶雪莉酒。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开始想办法减少开支，寻找挣钱的途径。为了减少开支，恩格斯搬去了玛丽和莉齐住的房子，但出于身份，城里的住处还得保留着。^[21]马克思让燕妮去当铺试试运气，一家人把能当的全当了，包括孩子们的物件和以及琳蘅和玛丽安娜的东西，甚至包括靴子和鞋子。^[22]

在经济状况出现曙光之前，马克思只得“消失”一段时间，躲避煤气公司（已经威胁要停止供气）、钢琴老师（“一个很粗鲁的家伙”）、学费（“尽一切努力不让孩子们受耻笑”）和其他各种“魔鬼”。^[23]燕妮告诉上门讨账的人，丈夫不在家，自己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马克思离家前，告诉恩格斯说自己要隐藏起来，但没有说具体要怎么伪装，以免被人发现。^[24]

不巧的是，伦敦在1862年5月再次举办世界博览会，而且像首次举办时一样，再次吸引了众多欧洲参观者。^[25]拉萨尔说，要在7月来伦敦，他打算住到格拉弗顿坊，显然在期待马克思像去年他在柏林招待马克思一样在伦敦招待他。^[26]马克思连养活自己家人的钱都没有，更不用说招待像拉萨尔那样喜欢吃鹿肉和冰激凌的人。^[27]虽然他7个星期以来一个铜子都没挣到，却无法拒绝拉萨尔的要求。马克思继续向恩格斯诉苦。“妻子天天对我说，她还不如让孩子们进坟墓，的确，我也

不能责怪她，因为我们由于目前处境而忍受的屈辱、痛苦和可怕的事情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对可怜的孩子特别感到心疼，因为这一切正好发生在展览季节，她们的熟人都在尽情游玩，而她们却只怕有人来，会看到这种寒碜景象。”⁽²⁸⁾

7月9日，拉萨尔抵达伦敦，说要呆上几个星期。⁽²⁹⁾从一开始，马克思一家就被这位自认为身处历史事件中心的37岁律师的光芒给吓倒了。他姿态夸张，假着嗓子高声阔谈，讲起话来带着教训人的腔调。⁽³⁰⁾燕妮说，他的吵嚷声把邻居们都惊动了。燕妮回忆说，他还向困惑的听众们提出过一个典型的拉萨尔式问题：“我是应该作为一个古埃及专家，还是作为一个多才多能的行动者、政治家、斗士或者士兵，来让世界震惊呢？”⁽³¹⁾这还不够，他还把自己想象成唐璜。⁽³²⁾马克思家的女人们倒是被他震惊了，一家人觉得他是贪吃的好色之徒，是伪装成理想家的普里阿普斯。⁽³³⁾

在伦敦期间，拉萨尔极为铺张，他还毫不在乎地说自己在之前一次投机买卖中损失了750英镑。但他一点钱都不想借给马克思，⁽³⁴⁾相反，他问马克思和燕妮愿不愿意把其中一个女儿送去柏林给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当“女伴”。恼怒的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要不是我处于这种绝境，要不是痛恨这个暴发户炫耀他的钱包，他倒会使我非常开心的。一年不见，他完全发疯了。”⁽³⁵⁾

听着拉萨尔高谈阔论数周之后，马克思和燕妮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决定取笑他的计划，让自己开心一些，马克思说这使得拉萨尔大为生气。“他大嚷大叫、暴跳如雷，最后则确信，我太‘抽象’，不懂政治。”⁽³⁶⁾燕妮说拉萨尔发现他们居然不赞同他这样伟大的人物，很快就离开了。⁽³⁷⁾但他离开前，还发生了一点插曲。马克思一直不想让这位自己并不欢迎的客人知道自己的真实窘境，但在拉萨尔离开那天，房东来了称自己不会再忍受拖欠房租，如果无法尽快拿到钱，他就派经理人来卖掉马克思家的所有东西。同一天，马克思还接到催缴税费的通知和零售商人要账的信，他们威胁说拿不到钱，就不再向马克思家提供任何东西，并且还要起诉他。马克思怀疑这些人都认识房东，所以才在同一天进行催逼。

秘密既已泄漏，马克思只得放下脸面，向拉萨尔吐露了一切。拉萨

尔表示同情，但他说自己手头也紧，只能等到1月时给马克思15英镑。但他同时许诺，马克思可以用他的名义作保，向其他人借钱。⁽³⁸⁾

马克思向恩格斯详细描述了整个过程，恩格斯表示同情，但他自己的经济状况也日益糟糕，虽然还没到把靴子拿去当的地步。恩格斯说养马花了15英镑，裁缝、鞋匠、衬衫和雪茄的花费有25英镑，但最大的花费还是来自马克思：60英镑——直接寄给他或帮他付了账。⁽³⁹⁾但他让马克思放心，他不会丢下他不管。“我相信只要能办到，我们今后还是要互相帮助的，完全不在于谁在某个时候是‘榨取者’还是‘被榨取者’，这种角色是会调换的。”⁽⁴⁰⁾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采取一些“财政行动”，从家里搞点钱，或者尽快把书写完，这样也能获得70英镑的收入。⁽⁴¹⁾此间，恩格斯在上个季度已经支援马克思的钱之外，又通过以拉萨尔的名义作为还款担保，⁽⁴²⁾费尽周折帮马克思搞到了60英镑。这使得拉萨尔极为恼怒，或许他已经忘记当初给马克思的承诺，或许马克思故意曲解了他的意思。无论如何，他们借到了钱，至于拉萨尔做何感想，他们也顾不上了。⁽⁴³⁾

马克思用这些钱打发了逼得最凶的债主，然后在8月底把家眷送去了兰兹格特海滨，因为小燕妮的病一直没有好，这让马克思极为担心。一年来，她体重不断减轻，还开始不断咳嗽，这说明不是感冒那么简单。⁽⁴⁴⁾“这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能干的孩子，”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但她在这里却受到双重痛苦。首先是肉体上的；其次是家中的烦恼严重地影响了她。”⁽⁴⁵⁾这期间，马克思又去荷兰找了他的姨父，但发现菲利普斯不在荷兰。他便返回特里尔看望母亲，但她仍像以前一样，不愿帮忙。马克思无功而返，甚至回来时比出发的时候还穷，不过，与南尼达的又一次见面应该让他感到高兴。⁽⁴⁶⁾通过她，马克思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她印象中的样子：一个文雅的哲人和作家；而不是现实中的自己：一个连家人都养活不了的到处躲藏的穷鬼。

马克思形容自己“坐在火药桶上”。9月回到伦敦后，他决定迈出之前从未考虑过的一步：找份工作。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在1863年初可能去英国一个铁路营业所工作，现在两个人都要被“榨取”了。⁽⁴⁷⁾美国内战看来很难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快速结束，这场在美国战场上不断夺走生命的战争，也快要夺走英国棉纺业的生命。恩格斯说，截至1862

年秋天，棉纺织品的价格上涨了5倍。已经习惯于货足价低的消费者自然不肯接受如此高的价格。^[48]到了11月，恩格斯说，自己“囊空如洗”了。^[49]

马克思通过报纸和在大英博物馆（现在是由劳拉陪着）借阅政府文件，^[50]了解美国内战的进展。他也去一家美国咖啡馆阅读美国报纸（南方和北方报纸都看），因为他觉得英国报刊在报道战争走向时有所取舍。^[51]

随着战争的进行，马克思对林肯的崇拜不断增加，他称他是“史册上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马克思认为，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宣言”）虽然充满律师式的词句，却无疑是“联邦成立以来史上最重要的文件”；林肯的风格虽不激昂，却比欧洲领袖们仪式性的表演更有力量。“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如此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上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52]马克思说，此时的美国“发生的事件具有世界意义”。^[53]

马克思没能得到铁路营业所的工作，因为他的字迹太潦草。恩格斯在夏天为他筹来的60英镑已经用完，可新年的到来要花更多的钱，尤其是1月就要交房租。^[54]12月，马克思在让燕妮去巴黎，跟“文学圈”的朋友谈书的出版事宜，并找一个落魄时受过他们帮助的银行家。但旅途从一开始就多灾多难，如果少一些悲剧色彩，甚至可以说有点搞笑。

燕妮乘坐的船遇上了强风暴，经过剧烈的颠簸，她总算到了巴黎坐上火车去找那位银行家朋友，但火车发动机又出了故障晚了两个小时。接下来她乘坐的马车又翻了车。^[55]等她总算到了银行家家里，却发现他在自己到的前一天患了严重的中风。结果，她在巴黎唯一的收获是一个报人朋友的许诺：马克思的经济学第二分册出版后，他协助出版法文版。

坏运气还没完，回到伦敦后，燕妮乘坐的马车和另一辆马车相撞，她只得下车，雇了两个男孩子帮她拿着行李和在巴黎买的圣诞礼物，在雨雪和泥泞中一路步行回家。期盼着家人热情问候的燕妮进屋后，却发现房子里一片静寂，原来琳蕙的妹妹玛丽安娜在两个小时前因为风湿热去世了。她写信给朋友说：“小燕妮和劳拉一脸苍白和无助地走向我，小杜西满脸泪水。……你可以想象海伦妮的悲伤，她们姐妹的感情是那

么好。”^[56]

圣诞节前夜，玛丽安娜在马克思家装殓入棺，三天后下葬。^[57] 这个圣诞节，没有圣诞树、没有果肉布丁、没有圣诞装饰，只有一具黑色棺木一直放在前厅。燕妮说“全家人都沉默而悲伤”。^[58]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有很多时候他都表现得极其以自我为中心。即便面对最深爱的人，他有时也会无视他们的感受和需要。1863年1月便是如此。1月7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的伴侣和爱人玛丽·白恩士死了。“昨天晚上她很早就去睡了，当莉齐在12点左右准备上床的时候，她已经死了。非常突然：不是心脏病就是脑溢血。……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以她整个的心灵爱着我。”^[59]

第二天，马克思便回了信，但他只在开头两行讲到玛丽，表达了自己的意外和震惊。接下来，他用31行文字描述自己的经济困难——或许，他是在采用“顺势疗法”，用“一种灾祸消散另一种灾祸所引起的悲伤”，以此向恩格斯挚爱的伴侣致哀。或许，他希望恩格斯能从自己相似的情感中找到慰藉，他说：“相比玛丽，为什么不是我的母亲呢，她也一身是病，反正现在过得很痛苦，而且也算长寿了？”^[60]

恩格斯过了将近一周才给马克思回信，信里充斥着令人胆寒的普鲁士命令式语调。“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冷冰冰的态度，使我不可能早些回信给你。我的一切朋友，在这个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悉听尊便吧！”^[61]

11天后，马克思写了一封忏悔的信，努力挽回自己在最尊敬也需要的人心中的形象。他基本上把自己的冰冷都责怪到了燕妮头上。他说，那天接到玛丽去世的消息，房东的经理人正好登门。孩子们都没有去学校，因为没钱交学费，而且她们也没有能穿得出去的衣服。他说燕妮非让自己把这些苦难都告诉他，而且信一发出去他就后悔了。他还说，恩格斯的第二封信让他看清了事实，他打算采取数月前就已经想过的办法，就是马克思宣告破产，让两个大女儿出去做家庭教师，琳蘅去其他家做事，自己带着燕妮和杜西搬去政府提供的模范公寓，红色沃尔弗时运不济时就在那里住过。^[62]

恩格斯原谅了马克思。他像燕妮、琳蕙和其他无数人一样，知道马克思的缺点。他也像她们一样，深爱着马克思，不会让这些缺点掩盖马克思的优秀品质——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爱和忠诚（虽然恩格斯在这样的时候还能想着这些着实不易）。恩格斯与燕妮、琳蕙一样，都认为有责任保护马克思，期待他的伟大。他对马克思说，虽然马克思对玛丽去世最初的反应让他无法释怀，但他还是决定让这件事过去。“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她的死使我深为悲恸。我觉得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久的和最好的朋友。”接下来，恩格斯想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他把一张支付给欧门—恩格斯公司的票据，改成了支付给马克思，从而给马克思寄去 100 英镑，让他们不用搬家，孩子们也可以继续上学。他说自己正在试着学斯拉夫语，想以此让自己忘记伤痛，“但孤独我实在忍受不了”。^[63]

1863 年冬天，马克思家的生活依旧艰难。4 月，小燕妮又病了，燕妮也在卧病在床，几乎完全失去了听觉（很可能是天花的后遗症），^[64]马克思的肝病也发作了，而且比之前更加严重。但他仍坚持撰写经济学书稿，并在 5 月告诉恩格斯说，自己会把这本“倒霉的书”誊清后，带到德国去找出版商。^[65]他说，第二分册将比第一分册“百分之百更容易理解”。^[66]他说，自己这段时间没有在家工作，而是拖着疼痛的身体去大英博物馆，避开上门的讨债声。恩格斯也许是从马克思的描述中听到了求助的声音，便给马克思弄到一些钱，让他还了债。^[67]加上燕妮在德国的一个朋友的帮助，马克思家的女人们终于又得到到海边度了一次假。^[68]

琳蕙回德国照料一个生病的姐妹期间，她们只能自己料理家务。劳拉是个很有天分的厨师，她做的馅饼、蛋糕和酱汁都非常漂亮，小燕妮负责打扫，燕妮负责洗衣服，她不想女儿们的双手受到损伤。她们还用到了燕妮所说的“洗衣坊”：经过染色、翻转和打补丁，穿久磨破的衣服也能变得像新的一样。^[69]（但这并非总是成功，小杜西去年就曾因为一顶自制帽子的样子太奇怪，而遭到邻居小孩嘲弄。）^[70]

女孩子们已经开始社会生活，必须穿得体面些了。（燕妮告诉朋友说，孩子们没有一点虚荣心，这让她暗暗感到奇怪，“尤其是与她们的

母亲年轻时相比较”。)⁽⁷¹⁾燕妮想，以后登门的朋友中肯定有年轻人，给客人留下好印象自然就极为重要，虽然女儿们好像还没有嫁人的想法。

劳拉已经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姑娘，她与曾经让特里尔城倾倒的母亲一样，拥有淡褐色的秀发和碧蓝的眼睛。她具有穷人家的孩子不具有的矜持和高贵。她骄傲、自重，但不傲慢，在写作和语言方面极有天分。她在厨房和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一样舒适自在，在舞场上能翩然起舞，在大海里能从容游泳。在三个女孩中间，她显得最为可爱。⁽⁷²⁾她有个绰号叫卡卡杜，出自一本小说中的一名时尚裁缝，因为她是马克思家的女人中最会穿衣打扮的。⁽⁷³⁾小燕妮则更加复杂，作为最年长的女儿，她迫切地想要为家庭承担得更多。她像中产阶级家的男孩一样长大，愿意面对挑战。她很可爱，但不如劳拉那样美丽。她个头高挑，线条优美，但五官不如妹妹那样匀称，母亲说她的鼻子不够翘。⁽⁷⁴⁾

虽然外形不同，但小燕妮和劳拉还是相似之处更多，她们是最亲密的朋友。从小时候开始，她们便分享彼此对家庭的想象。长大后，她们才发现想象与朋友们所处的社会千差万别，在父母注意不到的细微之处，她们相互扶持。（比如，小燕妮生病时，琳蘅、燕妮和马克思都忙着给她弄吃的或者喂药，劳拉却每天给她写一首诗，振奋她的精神。⁽⁷⁵⁾她知道，姐姐的症状虽然是身体上的，但根源却是精神上的。）两个年轻的女孩相互依靠着度过了家里无数黑暗的时刻，现在依然彼此依靠。

琳蘅回来后，马克思家的女眷们去黑斯廷斯住了四周，她们租的公寓有三面大窗户和一个花园。但最吸引她们的还是大海。燕妮带着孩子们划船、游泳、吃牡蛎，在一名议员家的花园里看烟火、爬山，直到小燕妮的脸颊终于又红润起来。⁽⁷⁶⁾回到伦敦后，她们发现离家期间，马克思的书有了重大进展——手稿已经有700多页，燕妮告诉朋友说，这本书会“像炸弹一样降落”在德国土地上。⁽⁷⁷⁾

就在一切看似终于走上正轨之际，马克思的工作又被打断了。他长了两个脓疮：一个在面颊上，一个在后背。后背上的一大得吓人，长成了拳头大小的痂。⁽⁷⁸⁾医生将病因归咎为卫生状况不佳和体质太差，但燕妮觉得是马克思在之前几个月里工作太过拼命，“抽的烟是平时的两倍，用的各种药丸是平时的三倍”。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她表达了沮丧之情：“这本不幸的书好像注定永远完不成似的。我们大家就像做着一

个噩梦。只要利维坦游起水来就好了。”⁽⁷⁹⁾这期间马克思疼痛难忍，只能卧床休息。

医生让家人每隔两小时给马克思换一次热压布，并让马克思尽量增加饮食。马克思对吃的从来没多大兴趣，但酒精有助于缓解疼痛。接下来的两周里，他每天喝一夸脱半黑啤、三四杯波尔图酒和半瓶波尔多酒。燕妮每天夜里守在马克思床边，或者睡在地上，却没有累倒，反而是帮忙的琳蘅因为辛苦和担心，病了。⁽⁸⁰⁾

11月底，马克思接到德国来信，他母亲去世了，这时他才刚刚能每天下床走上半个小时。⁽⁸¹⁾（她很早以前就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时间——11月30日下午4点，正是她结婚时的日期和时辰。）⁽⁸²⁾马克思虽然身体尚虚，但他必须回特里尔去。他带着两大瓶药上路了，虽然后背仍在流脓，但他相信路上总能遇到愿意帮他换药的“好心人”。⁽⁸³⁾

马克思顺利抵达了特里尔，却发现母亲的事情到荷兰才能解决。遗嘱的情况比较乱，姨父莱昂是两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之一。马克思在特里尔停留时，也许是感伤于母亲的离世或者自己的病痛，他寄给燕妮一封爱意绵绵的信。在信中他试图抹去多年来的痛苦，好像所有的悲伤从未发生，他们又回到了身在莱茵省的年轻时代。1863年12月15日，他写道：

.....

我亲爱的、热爱的燕妮……这样迟才给你写信，可决不是由于健忘。恰恰相反，每天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此外，每天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里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⁸⁴⁾

.....

几天后马克思从特里尔启程去了荷兰。在荷兰期间，他的背上又长了一个痈——正好长在之前的那个下面。他再次被病痛折磨，他觉得自

己在1月前恐怕都回不了伦敦了。他告诉恩格斯说他的姨父亲自给他糊药，他的可爱而伶俐的表妹、27岁的南尼达“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和照顾我”。⁽⁸⁵⁾

虽要忍受疼痛，但马克思至少吃得好、住得暖，燕妮和孩子们却只能再次依靠恩格斯。冰柱从窗外垂下，一家人需要大量的煤，才能让屋里暖和起来。⁽⁸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过冬时每处房子都要在地窖储存一吨煤才能够用，如果储存得不够，临时需要时再用马车往家里拉，只会带来又一笔费用。

圣诞期间，马克思没有给燕妮写信。新年后，燕妮主动写信给马克思，结束两人长达8天的信荒。她有些狡猾地说，如果不是他在荷兰过得很舒适、被照顾得很好，自己在节日里肯定会觉得“非常非常孤单”。接着，她描述了她们在伦敦的节日是多么黯淡，马克思肯定会意识到她在说自己真的非常非常孤单。燕妮说，家里既没有圣诞树也没有装饰，小燕妮和劳拉为了让杜西高兴起来，给20多个玩偶穿上了不同的服装——她们还把杜西的一缕头发粘在一个玩偶的下巴上，把玩偶打扮成一个中国老人。房东没有来讨债，因为他知道马克思不在家，而且他和周围“相关的邻居们”都知道马克思病了。但节日一结束，房东便再次登门。

欢乐的时刻也是有的。新年夜时，她们在家里招待了法国人洛里默斯一家。大家一起唱歌、跳舞，迎接新年钟声的到来，客人们一直待到夜里2点才离开。但最大的惊喜来自鲁普斯，他给了孩子们3英镑，她们用这些钱请全家人去了剧院。燕妮说这个夜晚让“悲剧演员”小燕妮非常开心，大家一起坐出租马车回的家。她说，所有人都非常开心，但从她的语调中看出，“所有人”不包括她自己。在信尾，她没有像往常一样送上一千个吻，而是写道：“再见了，老家伙！希望早些收到你的信。”⁽⁸⁷⁾2月，马克思仍没有回到伦敦，燕妮更加失望。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她毫不遮掩地描述了自己的情绪：“离他如此遥远，被担心和焦虑折磨着，长期病痛带来的高昂费用和债务如山一般压在身上……我们孤独地坐在家里，悲伤着，希望渺茫”。⁽⁸⁸⁾这期间，燕妮度过了自己的50岁生日，只有女儿们陪在身边，加上伦敦创纪录的严寒，她的心情更加孤寂，真的有了被遗弃的感觉。⁽⁸⁹⁾

燕妮把这段时间看作一生中 most 糟糕的一段时间之一。马克思虽然又

长了豆子般大小的疖和高尔夫球般大小的痈，又是疼痛又是高烧，他却告诉他的姨父说，在荷兰度过的两个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片段。⁽⁹⁰⁾马克思在2月19日回到伦敦，⁽⁹¹⁾比离开时胖了些，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比家里的女人们更加健康。

马克思从母亲的遗产中能够继承大概1000英镑（但无法马上全部拿到，而且要扣除大约300英镑的借款）。⁽⁹²⁾他从中拿出一部分（像燕妮在1856年时一样），带一家人搬去了一处更好的地方。格拉弗顿坊虽然没有像第恩街一样总是带来死亡，却还是让他们磨难不断。一搬进去，一家人感受到的就是极端的孤寂、病痛和贫困，以至于马克思和燕妮的婚姻都受到了损害。

新住处位于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离格拉弗顿坊不远，也在汉普斯泰特荒阜周围，却要好很多。⁽⁹³⁾这是一座三层的郊外别墅，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房后有个花园，房前有处公园，客厅外侧还有一间温室。女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卧室，⁽⁹⁴⁾杜西收养的动物（这时已经有两只狗，三只猫和两只鸟）⁽⁹⁵⁾也有了足够的空间。马克思选了一层面对公园的房间做书房，其他的空间就都归女人们了。燕妮相信一家人将在这里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里可以让女儿们自豪地向朋友们展示，可以让她一展自己所长，让家庭真正体面起来。

他们显然没有从格拉弗顿坊吸取教训，有钱租下房子并不意味着一直能供养得起，但马克思还是签了三年租约，每年租金高达65英镑。⁽⁹⁶⁾一家人一如既往，高兴地跟着他跳进了新的更加昂贵的冒险当中。

4月底，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他对鲁普斯的健康状况感到忧心。鲁普斯已经55岁了，饱受头痛的折磨，身体极为虚弱，医生却只是给他治疗脚上轻微的痛风。恩格斯找来另一名医生，但鲁普斯的病情继续恶化，症状有点像脑出血或脑膜炎。⁽⁹⁷⁾马克思大为担忧，在5月3日去了曼彻斯特。6天后，他写信告诉燕妮，鲁普斯死了。从1844年他们与鲁普斯在布鲁塞尔相识，他便一直是他们如家人般忠诚的伙伴。马克思写道：“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战友中的一个，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他是一个完美的人。”⁽⁹⁸⁾

第二天，他更加知道了鲁普斯是一个多么忠诚的朋友。鲁普斯生前

一直在曼彻斯特做家庭教师，作为一个单身汉，除了喝酒，他花费很少，存下了大概 1000 英镑。他把这些钱在遗嘱中做了处理：留给恩格斯、他的医生和席勒协会（曼彻斯特一家德国人社交和文化俱乐部）各 100 英镑，剩下的钱加上所有书籍和物品都留给了马克思和燕妮。⁽⁹⁹⁾

被鲁普斯的馈赠惊呆的马克思在葬礼上致了悼词，他哽咽着怀念这位真正的朋友。⁽¹⁰⁰⁾鲁普斯的死对恩格斯打击尤为巨大，鲁普斯和玛丽一样，是他年轻时便结交的朋友，他不断提醒他，不能陷在“资产阶级的污秽”中而忘记伟大的斗争。他和鲁普斯几乎每天都见面，他悲伤地说：“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无价的战士。”⁽¹⁰¹⁾

恩格斯悲伤难抑，无法再留在曼彻斯特，马克思邀他前往伦敦。20 年来，马克思家第一次照顾起恩格斯。

从《资本论》到公社

- 30 流亡者的圣地 / 284
- 31 拉法格之恋 / 300
- 32 《资本论》问世 / 312
- 33 劳拉的婚礼 / 327
- 34 小燕妮登上舞台 / 339
- 35 普法战争 / 356
- 36 公社万岁 / 367
- 37 姐妹被软禁 / 381

30

流亡者的圣地



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并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

——卡尔·马克思^[1]

1864年，无论对马克思一家，还是对欧洲工人阶级都是改变的一年。恩格斯写道：“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2]19世纪60年代初，随着工人们目睹工业和金融利益控制着西欧政治制度，并将资本主义的触角延伸到欧洲各国广阔的殖民地，他们逐渐认识到了恩格斯的这一说法。仅英国而言，到60年代中期，下议院席位中有148席（总席位数的近四分之一）被铁路公司占据。资产阶级发现可以用金钱收买处于统治地位（很多已经在衰落）的贵族阶级，从而打开凭借政治和社会辩论无法打开的大门。^[3]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尤为明显，在德国也变得愈加明显。

但地主阶级权力流失最为明显的国家不在西欧，而在俄国和美国。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敲响了欧洲封建制度的丧钟。次年，亚伯拉罕·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终结了美国的奴隶制。^[4]

这两件事意义重大，它们意味着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所有的欧洲和美国人为了获得工资（不论形式如何）而工作，再也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允许任何人强迫他人违背意愿毫无报酬地为其工作。

很多企业家和自由主义者奔走相告，他们认为自己奠定了劳动自由的新时代，出力终结了过去很多残暴的做法。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领袖却认为，这个所谓的新自由对没有食物、没有钱、没受过教育、健康状况不佳的人而言没有多少意义，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被自己“自由选择”为其工作的工业机器碾得粉碎。1862 年因为革命活动被捕的俄国人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民众没有必需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享受到自由和法律的好处。他担心在俄国得到放任发展的自由主义，将演变为一种比封建制度更加恶劣的制度，因为它完全以私利为基础，不考虑任何社会保障（比如公共生活设施和土地），从而导致穷者、老者和弱者无所依靠。^[5]很多欧洲和美国工人有同样的担心，在俄国，改变的现实将造就数代革命者。而在西欧和美国，造就的是工会和工人的政治组织。

在 1830 年和 1848 年的欧洲起义中，领导者大多是上层阶级中的进步成员和知识分子。但到 19 世纪 60 年代初，工人阶级的规模、力量和凝聚力都有了长足进步。最重要的是，工人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中间出现了更多的领袖，有了更多为工人权利而战的办法。他们的选择不再限于革命或投降；他们可以组织罢工或和平示威，或成立大规模的政治和行业组织。^[6]他们冷静而决绝，认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

在英国，工人以伦敦行业协会为名义实现了大规模聚集，这是自 19 世纪 40 年代宪章运动失败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组织的尝试。在德国，拉萨尔出版了小册子《工人纲领》。马克思虽然将其斥为《共产党宣言》的庸俗化，但同时代的德国人还是将其视为朝着现代工人运动迈出的第一步。^[7]在《纲领》的基础上，拉萨尔在 1863 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法国，运动也在发展，但组织性稍差，部分是因为工业发展滞后，但即使组织性稍差，他们却有更多激情。

在这种背景下，1863 年 7 月，欧洲工人在伦敦聚集支持波兰起义，这是 1848 年以来少有的革命运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被其控制的波兰看到了争取更大自由的机会。华沙民众连续两年进行和平抗议，要求

允许波兰颁布宪法。但到 1863 年 1 月，他们仍未收到任何表示，民众在极其沮丧之下开始诉诸暴力。一向宣称拥护基本权利的西欧各国政府没有向波兰人伸出援手，但聚集在伦敦的工人决定不会袖手旁观。⁽⁸⁾ 工人代表决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大会将于 1864 年 9 月在伦敦举行。⁽⁹⁾

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这些聚会，马克思也通过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为波兰人进行了募捐。但在 1864 年夏天，马克思基本上避开了政治活动。遗产给了他自由，让他可以把时间用来写书，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他说是受到恩格斯在这些方面知识的启发），跟着恩格斯踏足股票市场。⁽¹⁰⁾ 他告诉姨父说，自己一次投机就挣了 400 英镑，这个生意很合自己的胃口。“搞这种事情所用时间不多，而且只要稍微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¹¹⁾（这仍然是恩格斯的策略：10 多年来，他一直在曼彻斯特把钱从他痛恨的工厂制度里转移出来资助他的朋友，让他的朋友可以摧毁这个制度。）

实际上，1864 年夏天对马克思一家极为难得，他们舒心、自在。⁽¹²⁾ 燕妮去拍卖会给家里寻觅一些家具，女孩子们沉浸在装饰卧房的中产阶级情趣中。⁽¹³⁾ 小燕妮做了一面莎士比亚画廊，上面挂着莎士比亚和著名莎剧演员的图片，她的书架上放满最喜爱的戏剧。⁽¹⁴⁾ 她还接管了温室，这个被贫穷折磨得身体孱弱的年轻女孩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美丽的植物环绕过，她喜欢上了这里。⁽¹⁵⁾ 在莫丹那别墅安顿下来之后，马克思在 7 月中旬带着三个女儿去海边度了一次假。一年前，伦敦和兰兹格特之间新开了一条火车线路，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乘客从烟雾缭绕的首都直接送到东南方向的海边。

盛夏的兰兹格特沙滩很快变得像圣诞节时的牛津街一样，挤满伦敦人。沙滩上，长裙飘飘的女人坐在椅子上休憩，衣着讲究的男人们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散步。这里有各种活动让游人消遣——杂技、舞蹈和歌曲。⁽¹⁶⁾ 马克思家的女孩子们第一次可以放松心情，不计花费，融入社交生活中去。之前马克思又长了一个疖，使得他不得不卧床很久，他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恢复。

这期间，留在伦敦的燕妮也在享受这种她原本以为再也享受不到的生活。在写给马克思和女儿们的信中，她说自己在新家里也不用忍受炎热，因为她可以从一个房间换到另一个房间，躲避太阳。她做了 80

坛果冻和果酱，邀请朋友来吃盛大的晚餐，喝了很多啤酒，穿着被她称为“最好的衣服”（假钻石和一件白色大衣）出去参加晚宴。马克思和女孩子们从兰兹格特回来后，燕妮独自一人去布莱顿一个朋友家“借住”。⁽¹⁷⁾自从20年前嫁给马克思以来，这个夏天是她最无忧无虑的一个夏天。唯一的顾虑是马克思提醒她不要随意使用印着“燕妮·马克思夫人，娘家姓冯·威斯特华伦女爵”的名片，因为马克思在布莱顿的敌人可能会以此攻击他。⁽¹⁸⁾但这与他们之前经受的伤痛和屈辱相比，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这年夏天，燕妮在布莱顿照了一张照片，她的脸上已经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¹⁹⁾她看着轻松、美丽、优雅，就像一个一直在轻松享乐的女人。短短几个月，一家人的运气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恩格斯的运气也在变化，44岁的他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完全合伙人，虽然棉纺市场尚在混乱之中，但财富已经在向他招手。⁽²⁰⁾他和莉齐·白恩士搬去了一处大一些的房子。已经37岁的莉齐，从少女时起便跟着恩格斯和姐姐玛丽一起生活。这期间，她已经成长为一名勇敢的爱尔兰民主主义者，把她的家变成了新爱尔兰反抗英国激进分子芬尼亚会成员的安全屋。⁽²¹⁾她的房子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掩护，因为房子地处曼彻斯特爱尔兰人聚集区以外，而且在玛丽死后，她已经成为恩格斯的“妻子”。

9月，弗莱里格拉特传给马克思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拉萨尔在日内瓦中枪死了。拉萨尔的朋友说，他爱上了一个已经订了婚的19岁姑娘，她的未婚夫是一位罗马尼亚贵族，向拉萨尔提出决斗。⁽²²⁾拉萨尔不是这个被描述为“伪国君”和“骗子”的人的对手，下腹中枪，死得缓慢而痛苦。⁽²³⁾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来嘲笑起拉萨尔时毫不留情，但这件事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惊——尤其是马克思。拉萨尔正处在事业顶峰，他已经成为德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虽然有传言称他暗地里与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商谈结盟，但他对德国工人事业的推动远比任何人出色。⁽²⁴⁾马克思写信到布莱顿告诉燕妮这一消息说：“拉萨尔总不应该落到这样的下场。”⁽²⁵⁾几天后，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

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²⁶⁾

以前，每当马克思周围的队伍遭受损失，就会有援兵补充进来。这一次同样如此，在他写信给恩格斯两周后，流亡伦敦的法国人勒·吕贝邀请他于9月28日代表德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大会。虽然马克思没有参加1863年的那次会议，但直觉告诉他，这次在圣马丁堂举行的集会将非常重要。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拒绝，而是同意了。⁽²⁷⁾

到目前为止，欧洲工人只是建立了一些地区或国家性组织，为劳动权利而战，但这种区域性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各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国家间几乎所有的商业壁垒，使得贸易从1850年到60年代末期增长了260%。⁽²⁸⁾工业也已跨过国界，各国安全部队也不再将国界视为打击反政府运动的阻碍。在这种环境下，聚集在伦敦的工人一致同意，必须通过国际协作才能对付这些挑战。

事实证明，这次集会远比组织者设想的更加成功。参加者包括伦敦行业协会的英国工人，与朱塞佩·马志尼结盟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波兰的爱国者，还有代表德国的马克思和他的裁缝朋友格奥尔格·埃卡留斯⁽²⁹⁾（有作家把这次集会称为激进公民的联合国大会。）⁽³⁰⁾与会者同意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总部设在伦敦，联系和组织欧洲及美国的工人团体。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协会的章程原则和宣言，马克思是委员会成员。

拉萨尔死后，全德工人联合会急需选出新主席。李卜克内西问马克思愿不愿意担任，其他成员也请他推荐人选。很奇怪这些身在德国的人，居然向伦敦的马克思寻求意见和指导。⁽³¹⁾近15年来，他未曾参与过任何德国的政治运动，除了销量不佳、未能产生很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也没出版过什么著作。倒是卡尔·福格特的那本攻击他的小册子销量甚广、多次重印，让他保持了持续的影响和知名度。

马克思回复李卜克内西说，自己不能在普鲁士居住（恢复国籍的申请被拒了），无法担任这个职务。但马克思觉得把这作为一个策略也不错，所以他重新打开政治棋盘，他指示另一名联合会成员说，如果自己

真的当选，也是不错的选择。他到时可以公开说明自己不能接受的原因，这样也将有助于扩大国际工人协会的声望。^[32]马克思最终没有当选，但他走出了无人关注的状态，正好在需要为国际工人协会招募力量的时刻，他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的领袖及重要理论家。

10月底，马克思拿到了自己未参加的委员会会议起草的宣言和规章。他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老对手马志尼搞出的那一套陈腔滥调，模糊又不切实际。但他为避免引发争执，没有直接动手修改，而是采取了一个他在科隆时对付书报检查官的策略：把其他委员会成员拖垮。他把大家召集到家里开会，然后引着他们谈些细微末节的问题，直到夜里一点，大家都觉得应该休息了，便都告辞而去，把草稿留给马克思下次继续讨论。但他们休息的时候，马克思仍在工作。他一个人坐在宽敞的书房里，写出了《告工人阶级书》，把马志尼的那一套宣言弃之如敝履，把40条章程压缩为10条。委员会成员再次聚集时，所有成员一致接受了马克思的修改（觉得总算解脱了），只要求他加上两小句话。^[33]

马克思的《告工人阶级书》长达10页，可谓经典之作。他回顾了他所说的工人阶级的“历险”过程，描述了他们面对困境时取得的成就。1848年以来，欧洲各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他写道，但同时，这个商业进步的新纪元使得“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从这个角度，他说，工人阶级已经带着新的力量站了起来。他高度赞扬赢得十小时工作日的英国工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他同时说，只有当各国工人肩并肩一起为了解放而共同奋斗（也只有他们能实现解放），他们才能成功地击败统治阶级，赢得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收益的权利。他说，正是这个信念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协会不仅主张工人的权利，还主张公正的对外政策。一个国家的工人绝不应该对抗另一个国家的工人，在战争中对抗和牺牲只会为资本主义带来好处。全文以熟悉的口号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4]

对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和这篇宣言的影响，如何赞誉都不为过，虽然在当时真正知道这一组织成立的人并不多。马克思的宣言成为新工

人阶级运动的基础，数周内，这篇文章不断在欧洲各反对派报纸刊登，甚至远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正在等待出发打击南军的魏德迈和其他北军士兵也读到了这篇文章。⁽³⁵⁾

协会成立后，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成了“流亡者的圣地”。最先来访的包括马克思已经 16 年未见的米哈伊尔·巴枯宁。⁽³⁶⁾ 此时的巴枯宁在一代代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更加极端的虚无主义者中间，已经是近乎传奇的人物。⁽³⁷⁾

1849 年在德累斯顿（他提议到市政厅进行自杀式袭击）被捕后，巴枯宁以叛逆罪被判处死刑。6 个月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他被移交给奥地利政府，并被关入监狱，用铁链锁在墙上。1851 年 5 月，军事法庭认定他犯有叛逆罪，判处将他吊死，但在同一天，死刑又改成了无期徒刑，并把他移交给俄国，关入圣彼得堡臭名昭著的彼得保罗要塞。由于受到数年的监禁和折磨（尤其是在俄国被关期间），他的牙齿掉落了，原本强壮的肌肉松弛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让女人着迷、让男人效忠的人了。⁽³⁸⁾ 他的力量被消耗了，信仰也一样。⁽³⁹⁾ 1858 年，经过他母亲的努力，沙皇同意给他两个选择：继续待在监狱；或者去西伯利亚度过余生，条件是签署一份文件乞求沙皇释放他。他签了文件，被押送着踏上向东的长途跋涉。⁽⁴⁰⁾ 在西伯利亚，巴枯宁娶了一名波兰商人的 18 岁女儿安东尼娅。⁽⁴¹⁾ 三年后的 1861 年，他离开妻子，逃离西伯利亚，先后在俄国海岸和日本坐船，到过旧金山和纽约，终于在 12 月 27 日他来到了英国利物浦，之后来到伦敦，投奔俄国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⁴²⁾

1849 年以来，巴枯宁实际上已经淡出这个世界，他的政治思想没有变化。他没有经历那个让他的同伴成熟和冷静的过程，所以随着他的精力恢复，他在德累斯顿街垒上展示过的战斗热情也回来了。他不认规律，只认行动。赫尔岑说：“已经 50 岁的他仍是当年那个流浪的学生，那个（巴黎时的）不羁的流浪汉，不理睬明天，蔑视金钱，有钱的时候就四处乱花，没有的时候就不管不顾地四处借钱。”⁽⁴³⁾ 马克思把他描述为“一个怪物，长了一大堆肉和油”，他体重达到 280 磅，走路都困难。⁽⁴⁴⁾

马克思是通过裁缝列斯纳知道巴枯宁在伦敦的，巴枯宁正打算离开英国，去意大利，因此找列斯纳帮他做一些衣服。⁽⁴⁵⁾ 马克思想着巴枯宁

到意大利后，也许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友，制衡马志尼的影响，便邀请他上门做客。⁽⁴⁶⁾在带着安东尼娅（后来在伦敦找到了巴枯宁）前往佛罗伦萨的前一天晚上，巴枯宁拖着庞大的身躯挤进了马克思家的门，他戴的帽子太小，只能歪着戴在一边。⁽⁴⁷⁾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巴枯宁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时的关系都很紧张。但对于他们这次在伦敦见面，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应当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总之，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巴枯宁一如既往地带着孤注一掷的激情，答应献身于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协会。⁽⁴⁸⁾

如果马克思能早些意识到巴枯宁的忠诚只会给自己带来威胁而不是支持，未来也就能省去很多麻烦了。正如一位马克思传记作家所写，马克思的梦想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但巴枯宁却是毁灭的大师，他的梦想是把社会毁灭，在灰烬的基础上重新建造。⁽⁴⁹⁾

马克思一家多年的孤寂终于结束，他再次积极投身于政治。他的经济学著作就快完成了，但不再是原本要由敦克尔出版的系列中的一个分册。它已经自成一本书，叫作《资本论》。女孩子们也不再让自己处在孤独当中。1864年10月，家里举办了第一次舞会——至少燕妮是这样描述的，因为按照英国标准，舞会应该有数百人参加，而他们只邀请了50位客人。⁽⁵⁰⁾虽然此时离舞会流行的“季节”已经很久，但这并未影响马克思一家人的心情和准备。⁽⁵¹⁾请柬是这样写的：

.....

卡尔·马克思博士和燕妮·马克思夫人，娘家姓冯·威斯特华伦非常荣幸地邀请您在1864年10月12日参加他们在位于伦敦西北部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的住处举办的舞会。⁽⁵²⁾

.....

燕妮告诉欧内斯蒂内·李卜克内西说，女孩子们经常受到邀请参加这样的聚会，却从来无法答谢，出于尴尬，后来便不再参加了。这次舞会必须足够壮观、足够奢华，才能弥补数年来对女儿们的亏欠。她们一

直把自己置身于社交生活之外，担心朋友们发现她们的“博士”父亲原来是革命者，而且她们的生活原来如此穷困。楼上的客厅用于演奏音乐和跳舞，楼下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透过巨大的窗户，路人能够一瞥屋内 50 名年轻男女穿着得体的晚礼服，在煤气灯光和烛光的映照下，翩翩起舞。骄傲的父母和琳薇也加入了进来。马克思喜欢跳舞，女儿们的朋友都是他最喜欢的舞伴。社交活动的评判专家燕妮评价这次舞会“非常绚烂”和“极为成功”。剩下的食物足够第二天给杜西的朋友们举行一次儿童聚会。^[53]

在这关键的一年里，最后的一幕是亚伯拉罕·林肯成功连任美国总统。马克思非常兴奋地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给林肯写了一封祝贺信：

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54]

林肯通过美国驻英国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回了信，这使得马克思极为兴奋（他之后数月不断在信中提及此事）。^[55]亚当斯说林肯对美国公民和全世界人民给予他的信任“感到诚惶诚恐，一定证明自己不辜负这份信任”。

.....

各民族不应只为自己而存在，而是应该通过友善的交流和互相学习，谋求人类的福祉和幸福。正是基于此，联邦认为目前与维护奴隶制的暴徒展开的斗争是为了人性而战的事业，欧洲工人的证言给了联邦新的力量——美国的国民态度得到了他们的开明的支持和真挚的同情。^[56]

.....

劳拉成了父亲在大英博物馆的专职助手——他身体好的时候，就

陪他一起走到大罗素街，他身体不佳时，她便自己前往。⁽⁵⁷⁾事实上，这个 19 岁的姑娘每天都去博物馆阅览室，她一头红褐色的长发，穿着裁剪合身的衣服，腰部显得尤为纤细。想想她会在那些沉静的学者中间引起何等的轰动，实际上她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轰动。一名爱慕者请求马克思家的一位朋友传话给劳拉。“告诉她，我每年挣 350 英镑，还有 40 英亩土地，我最近就去拜访她。我昨天经过她家门口了，但害怕她爸爸，没敢进去。”⁽⁵⁸⁾柏林的欧内斯蒂内·李卜克内西说一个年轻人看过劳拉的照片后，就爱上了她。⁽⁵⁹⁾劳拉虽然比燕妮小，却更早盛开，而且她成熟的时间也很巧，正好是马克思重返党的政治之时：马克思家的女儿们一直以来见到的都是父亲的老友，但现在，新一代法国革命者开始出现在舞台上。

虽然 1848 年的革命以失败告终，而且国家倒退回了帝制，但法国的革命传统远未消亡。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很多 20 多岁的年轻人将当年在街垒上战斗的前辈视为英雄。正如英国年轻人从小便对骑士精神感到神往，这些法国年轻人从小听着反抗的故事长大，骄傲地坚信，起义的精神流淌在自己的血液里。他们最为崇拜的人物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蒲鲁东和布朗基，他们——学生、报人、艺术家、律师、医生——在拉丁区会面，一边讨论这两位前辈的思想，一边喝酒、抽烟、吃饭（如果想得起来）。

沙尔·龙格便是想不起吃饭中的一个。他身材高挑、消瘦，胡须散乱，有人说他是“你能够遇到的最典型的放荡不羁的人”。⁽⁶⁰⁾龙格出生于诺曼底一个古老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学习经典著作和法律，梦想着长大后在巴黎成为法律博士。但来到首都后，他便进入了讨论激进报纸、政治和蒲鲁东的圈子。他最喜欢光顾的地方是拉丁区的格拉瑟餐馆，他在这里与阿纳托尔·法朗士、沙尔·波德莱尔和乔治·克列孟梭等朋友见面。⁽⁶¹⁾他跟着克列孟梭在报纸上进行了第一次历险，结果受到了 4 个月监禁。⁽⁶²⁾但他没有被吓倒，出狱后他便创办了报纸《左岸》，并使得该报迅速成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报刊，⁽⁶³⁾也是第一家刊登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法国报刊——要知道 1847 年以后，马克思的著作就再也未曾出现在法国。⁽⁶⁴⁾1865 年 2 月，即文章刊登后不久，刚刚年满 26 岁的龙格来到伦敦。

另一位年轻的同志也在同一个月来到伦敦（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但有学者对时间有争议），^[65]他就是 23 岁的保尔·拉法格，一个在古巴出生的法国人，其家庭在加勒比拥有种植园。拉法格的种族反映了多样的岛屿文化：他既有黑人又有白人的血统，既是古巴人又是犹太人和法国人，他喜欢说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被压迫民族的血液。拉法格一家从古巴搬回法国后，安顿在了波尔多，他们在这里拥有葡萄园。保尔在 1861 年前往巴黎学习医学，却很快卷入了不断壮大的学生运动。^[66]他和龙格通过《左岸》报和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分部相识，他们虽然都极为坚定，但性情并不相同。这意味着他们永远无法走得很近，即便是数年后，他们都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女婿。

龙格没有记下自己对马克思的第一印象，但拉法格记下了。他回忆说，自己作为巴黎分部的信使来到莫丹那别墅时，马克思正忙于《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虽然患病在身^[67]（马克思在 2 月告诉恩格斯说自己又长了痈），但还是热情地欢迎他——他对年轻人总是很热情。（拉法格提到马克思说过“我必须训练年轻人接班，继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68]拉法格说，迎接自己的不是那个政治煽动者，而是坐在书房里的理论家。^[69]

.....

书房在一楼，窗子很大，阳光充足，向外看去，能看到一处公园。窗户对面壁炉两侧的墙壁摆放着书架，架上满是书籍，报纸和手稿堆积在上面，已经快要够到屋顶。壁炉对面窗户一侧摆放着两张桌子，上面堆满报纸、书籍和纸张。屋子中间光线最充足的地方摆着一张简单的小书桌（两三英尺见方）和一把扶手木椅。^[70]

.....

这张小桌子便是马克思写作的地方。屋里还有一张皮沙发，供马克思下午小憩。壁炉上还摆放着书籍、雪茄、火柴、烟盒、镇纸，以及燕妮、恩格斯、鲁普斯和三个女儿的照片。

与马克思的首次见面让拉法格“印象深刻”。^[71]但他和龙格在

1865年的这次来访时间都很短暂。龙格回去继续经营《左岸》报，拉法格回去继续参加激进政治活动。

2月，女孩子们为母亲举办了一场晚会。燕妮的51岁生日极为热闹，完全不同于去年的凄凉，那时，她只能独自一人回想半个世纪的苦难，马克思却在荷兰被南尼达细心照顾着。1865年2月13日，10岁的杜西写信给“最亲爱的弗雷德里克”，问他能不能寄几瓶莱茵酒和波尔多酒来。“我们要自己准备晚会，不让妈妈插手，而且我们要举办得很盛大。”⁽⁷²⁾恩格斯第二天便寄了一箱来。⁽⁷³⁾

马克思家的女人们无忧无虑，男主人却说自己被病痛和国际工人协会“折磨得不得安宁”。⁽⁷⁴⁾马克思每晚都要处理协会的事务，甚至直至凌晨，虽然他名义上只是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却是协会的真正领袖。⁽⁷⁵⁾随着众多工会组织整体加入，协会规模快速增长。4月，马克思告诉一名通信人说，仅英国便有12000人加入了协会。⁽⁷⁶⁾

不巧的是，就在马克思刚刚签署出版两卷《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之后，他却要对协会肩负更多责任。1月，马克思委托朋友与汉堡出版商奥托·迈斯纳进行协商。⁽⁷⁷⁾书稿还没有准备好，但马克思从1861年以来就已经把理论理清，他相信只需把语言润色一下，就可以把这部从1851年（即便算不上1844年）便开始努力的著作出版。⁽⁷⁸⁾恩格斯非常兴奋，他写信给马克思说：“这件事要赶快做。目前的时机对出书很有利，而我们的名字又一次得到了公众的尊敬。……不要放过时机，这在效果上有很大的不同。”⁽⁷⁹⁾

迈斯纳要求在5月底拿到书稿，并承诺在10月出版。马克思哪头都不想放下，他让小燕妮在协会给自己担任秘书，因为她比劳拉懂得的语言更多，让劳拉帮自己进行研究，燕妮和琳蕻照料家务。⁽⁸⁰⁾但这样仍然无法赶上进度。⁽⁸¹⁾5月，在本应把书稿交给出版商的时候，他告诉恩格斯说：“希望我的书（尽管多次间断）能在9月1日以前彻底完工。”⁽⁸²⁾

间断的原因多种多样。4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对林肯被刺的报道让他陷入震惊，虽然此时已经是事件发生12天后。⁽⁸³⁾马克思称，刺杀行为是南方各州所能做的“最大的蠢事”。⁽⁸⁴⁾像写信祝贺林肯获得连任一样，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写了一封信给林肯的继任者安德

鲁·约翰逊，以优美和激愤的语言缅怀林肯。马克思写道：林肯是一个安静地、谦逊地进行着自己宏伟的工作的人，“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被热情所蒙蔽的事态……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见的人物”，他的被刺使得“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群情激愤”。^[85]

马克思给约翰逊（后来被他骂作“奴隶主的肮脏工具”）写信时，家里正在准备给小燕妮庆祝21岁生日。^[86]马克思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他邀请了5名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来家中做客。他告诉恩格斯，这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生日”，^[87]虽然这些人恐怕不是小燕妮在这样重要的日子想要邀请的人。马克思知道她迫切地想要独立，却好像并不急于让她脱离自己、自己的工作 and 家庭。相反，劳拉在这方面进展很快。小燕妮生日这天，一个名叫查尔斯·曼宁的年轻人向劳拉求婚。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他很富有，而且也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但是劳拉‘对他并不在意’。”马克思很同情这个小伙子，觉得事情闹成这样很不好，因为劳拉和他的家人关系不错，他又“如痴如狂地热恋着”她。^[88]

5月中旬，恩格斯突然给马克思发来电报，说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到了曼彻斯特，第二天就会到伦敦。^[89]燕妮的这个弟弟已经46岁，自从1849年他30岁时撕毁与燕妮的一个朋友的婚约、放弃律师的职业和家庭、远赴美国寻找机会后，他们便再也未曾见过他。那时的他英俊、健壮，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当他在1865年5月敲响马克思家的门时，燕妮说团聚给自己带来的喜悦化成了悲伤：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极其憔悴、苍老，面色苍白，背都直不起来，她已经认不出他了。过了几天，她才从这个陌生人的脸庞和呆滞的眼神中找到弟弟的一点影子。^[90]

来到伦敦前，埃德加已经在美国战场上代表南方战斗了三年，当南方再也无力向军队提供补给时，他和很多士兵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没有补给，没有衣服，当他疲惫得连武器都拿不起来时，他被赶出了军队。他回到自己置办过产业的德克萨斯州，却发现产业已经被没收抵债。^[91]后来，他又失去了家庭教师的工作，只得向圣安东尼奥的朋友寻求帮助。^[92]但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有太多的家庭需要帮助，单身汉只有两个选择：战斗，或者离开。^[93]战争爆发前，埃德加写信给哥哥斐迪南，

索要属于自己的那份父亲的财产，斐迪南要求他回到德国才肯给他。埃德加此行便是出于这一目的，但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允许他继续前往柏林。

燕妮马上照顾起弟弟，女儿们也都帮忙，她们早就听说过这位舅舅的故事，但他离开布鲁塞尔时，她们还太小，没能记住他。她们叫他“鲁滨逊”，因为她们觉得这个突然登门的舅舅一身的荒野气息，与笛福笔下的鲁滨逊一样奇特和神秘。埃德加也让马克思感到困惑。他曾是马克思最早的追随者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同盟早期的成员，但他却为南方而战。^[94]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这个埃德加除了自己以外从来没有剥削过任何人，而且他始终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工人，可是他却站在奴隶主方面参加了饥饿和反饥饿的战争。”^[95]

马克思身上又长了疝。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为了尽快把书写完“像匹马一样工作”，工作之余就搞搞微分学。^[96]但燕妮告诉恩格斯说，马克思疼痛难忍，一连两个星期无法入睡，她怀疑这病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写作，美国的局势，以及经济困难。^[97]1865年7月，马克思向恩格斯坦白，母亲和鲁普斯上一年留给他的遗产都花完了。

“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使人更难忍受的要求纠缠着我。”马克思说自己继承遗产的消息弄得科隆时期的债主都冒了出来，单是偿还本地的债务和安家就花费了500英镑。

.....

我诚心告诉你，与其我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和政党的方面。就我的条件来说，我住的房子的确太贵，再就是我们这一年比以往生活得好一些。但是唯有这种办法能使孩子们维持那些可以使她们的前途得到保证的社交关系，况且，她们已经受过许多痛苦，也应当使她们有一个短时期的补偿。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看

法：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如果只有我们夫妻两人，或者这些女孩子都是男孩子，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好。

.....

马克思好像打算对恩格斯不加任何隐瞒，接下来便讲了《资本论》的真实情况。“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延期是必然的，“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東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⁹⁸⁾

马克思说自己向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撒了谎，告诉他们自己要离开伦敦，这样才有时间写作。这年夏天的伦敦极为炎热，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三个月来自己几乎每天都会呕吐，为了能凉快一点，他便坐在开着的窗前工作，结果右臂和肩胛骨得了风湿。⁽⁹⁹⁾但他承诺会尽可能快地完成《资本论》。“这件事像梦魇一样压着我。”⁽¹⁰⁰⁾

恩格斯表示同意。“当手稿送出之日，我将尽情痛饮。”⁽¹⁰¹⁾但手稿已经超过期限，每拖延一个月，出版的希望就更渺茫一分。8月，马克思胆病发作，加上天气炎热，使他无法思考。⁽¹⁰²⁾一周后，他又得了流感，只得研究些“不相关的，比如天文学”。⁽¹⁰³⁾这期间，劳拉病了，杜西出了麻疹，燕妮咬掉了下颌上的两颗牙，只得去补了四颗，小燕妮染上了白喉，埃德加倒是在恢复，但已经快把他们家吃空了。马克思说埃德加每天想的都是吃和穿。⁽¹⁰⁴⁾除了家里的这些麻烦事，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发现了马克思没有离开伦敦，便坚决要求他出席会议。⁽¹⁰⁵⁾

到1866年1月中旬，马克思的手稿已经多达1200页，在迈斯纳的不停催促下，马克思不得不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进行誊稿，希望能够在3月交稿。⁽¹⁰⁶⁾伦敦被一层没过脚踝的积雪覆盖着，⁽¹⁰⁷⁾马克思坐在壁炉旁，进行誊写和润色，或者如他所说“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¹⁰⁸⁾但是，马克思又长病了，还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小疮”。由于长病的部位特殊，他无法坐着，又因为疼痛和治疗，

他无法进行理论思考。医生说原因是夜间工作过多，但马克思说，白天协会的事务繁多，别无他法。^[109]

到2月中旬，马克思又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觉得著作尚未做好出版的准备。他告诉恩格斯说，德国和法国的农业发展过程又有新的变化需要考虑，自上次研究结束以来地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关于日本的游记中他也发现一些新的情况需要思考。在把这些情况考虑清楚之前，书稿不能交给迈斯纳。^[110]

在一个德国医生的护理下，马克思开始小剂量服用砒剂，每天服用三次。燕妮告诉朋友说，马克思经常无法入睡，即使睡着，“说梦话都说到个别章节，对这些章节总是念念不忘”。^[111]多年来，燕妮和恩格斯多次经历过马克思身体陷入危机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多半是他被交稿期限逼得焦头烂额时。但在1866年初，马克思的状况让他们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担心。恩格斯一般会敦促马克思的进度，但这次，他告诉自己的朋友必须马上停下工作，照顾自己的身体，即便这意味着《资本论》的完成要再推后三个月。^[112]他建议马克思到海边去疗养。“给我和我的家人赏个面子——治治病罢。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整个运动会怎样呢？如果你这样一意孤行，事情必然要弄到最坏的地步。”^[113]

3月，马克思同意去海边。但离开前，他还是得强打精神，在家里召开一次“作战会议”。^[114]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法国派一片混乱，正打算“反抗缺席的‘暴君’”马克思。^[115]

31 拉法格之恋



但是女人，天啊，女人！她们的命运是那么悲惨！

——德·斯塔埃尔夫夫人^{〔1〕}

由于生病和为了尽快完成著作，马克思对国际工人协会活动的躲避，给了对手攻击他的借口。找他麻烦的仍是马志尼，他的借口是在一个本应“国际化”的组织里，“德国人”的影响不应过大。但马克思有忠诚的追随者愿意代他迎战，这些人当中有5个人在3月初来到梅特兰公园路。^{〔2〕}其中3个是老朋友，另外2个是从法国来的年轻人——都不会讲英语。去年的短暂拜访之后，沙尔·龙格和保尔·拉法格再次来到伦敦，被马克思接纳为身边的战友。在法国的动荡中，他们的革命精神得到了洗礼。

拿破仑三世带给法国的最为明显变化在巴黎，他和乔治-欧仁·奥斯曼对城市进行了改造。很多小商店被拆除建造成大型百货商场，比如春天百货、萨玛莉丹百货和乐蓬马歇百货。布满狭窄、蜿蜒的街道的工人阶级聚集区被拆除，建成宽广优美的林荫大道，两侧是富人居住的公寓、文化殿堂和政府大楼。其他贫穷的居住区也被拆除，建造成铁路和精美的车站。

拿破仑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在这座城市永久地留下自己的印痕，部分是为了让市民不再有建造街垒进行反抗的环境。奥斯曼建造的宽广笔

直的马路让军队可以全副武装、排成人墙，直接面对反抗者，大炮也可以直接轰向反抗者。

但城市改造使得房租飞涨，让原本就因为食物价格昂贵而苦不堪言的工人阶级更加无法承受。虽然发展的交通体系可以让民众远离巴黎中心居住，但高昂的交通成本使得日常通勤不切实际。⁽³⁾下层阶级的不满情绪愈加普遍，到19世纪60年代，学生肩负起这一事业，开始鼓动对抗政府，拉法格和龙格就在其中。

1865年10月，国际学生大会在比利时列日召开。拉法格和一群法国学生决定抓住这一机会，抗议法国政府。⁽⁴⁾他们的表现无异于到乡村表演的马戏团：他们在市中心游行，高喊反对拿破仑的口号，穿着放荡不羁的装束——留着大胡子，戴着宽边帽，背着背包。他们没有举法国旗，而是扛着一面黑色的绸布旗，为这个被皇帝践踏得没有一丝自由的国家默哀。⁽⁵⁾

拉法格还不成熟，当机会来临时，忍不住做出大胆的姿态。有时他好像在行动之前，并没有思考过行动的意义和后果。他想让谨慎地站在一边观看的法国学生加入进来，“不管选择哪个方向，总好过漠不关心吧？”他还想让他们把衣服上的三色旗帜换成代表反抗的红带子。⁽⁶⁾他大胆地冲上发言台，宣战，但对象不是拿破仑，而是上帝。他声称科学证明上帝是无用的，上帝是魔鬼，财产是窃贼。⁽⁷⁾

在10月27日，这个有着一头浓密的褐色头发、留着长胡子、长着一双少见的杏仁眼的帅小伙还籍籍无名，28日便成了众所周知的鲁莽的激进分子。他突然处在了法国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地位已经提高（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的拉法格在列日见到了偶像布朗基。布朗基作为一个危险、毫不妥协、极为火爆的革命者，拥有这个名头的时间比拉法格活的时间都久。现在，他是一个60岁的老人，依然瘦小，头发和胡子都已花白，眼窝深陷。他的手像小鸟一样不停地动，他的声音温和、怜悯。他讲到了革命，告诫眼前这20个恭听他的教诲的学生，如果前辈们给他们的行动或思想上的意见与他们自己的信仰不符，就不听他们的（包括他自己）。拉法格被折服了，他把布朗基视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⁸⁾

11月初，拉法格回到巴黎，但他的学医生涯结束了：巴黎学术委

员会在12月开会，投票决定开除7名在列日亵渎国旗和攻击社会秩序的学生，其中就包括拉法格。巴黎反对派学生见竟然有法国人因为在国外发表言论而受到惩罚，极为愤怒，因为这样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暴乱开始出现，学生们冲出教室，在拉丁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最终800人被捕。两周后，政府不顾公愤，维持了开除令。拉法格被巴黎大学终身驱逐，两年内也不得进入其他法国大学学习。⁽⁹⁾

拉法格的父亲不想他中断学业，便送他去伦敦圣巴多罗买医院跟随一名法国医生一起工作。拉法格在2月中旬启程前往英国，与他同行的是意大利人切扎雷·奥尔西尼，他的兄弟费利切·奥尔西尼在1858年被处死，其罪名在50年代可谓无人不知——试图用炸弹刺杀拿破仑三世。⁽¹⁰⁾但他没能伤害到拿破仑，反而炸死8名无辜平民。拉法格的父亲肯定不希望儿子跟奥尔西尼这样的人同行，也同样不希望他到伦敦后继续参与任何激进活动。但抵达伦敦后不过几天，拉法格和奥尔西尼便与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见了面，拉法格被推荐加入协会，并在3月6日得到批准。⁽¹¹⁾4天后，他参加了在马克思家举行的作战会议。

龙格从1865年2月到1866年春天的革命履历要简短一些。上一年离开伦敦后，他的《左岸》报只发行了17期，便被查禁。他本人被判入狱8个月，但他在被捕前逃出了法国。他的流亡过程与年轻时的马克思有些相似，他逃到比利时，想重办报纸，但被驱逐。他去了法兰克福，又被驱逐。⁽¹²⁾最终，他像无数流亡的前辈一样，在1865年底来到伦敦。1866年1月16日，他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成员。⁽¹³⁾

3月10日，在马克思家会面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制定了一个策略，让英国会员以及所有抱有怀疑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彻底认识到马克思是协会中大陆部分无可争议的领袖。⁽¹⁴⁾他们让奥尔西尼证明他的意大利同胞马志尼无法代表工人，对“科学”持反动态度，无法理解“新的运动”。⁽¹⁵⁾（双方继续彼此憎恨：马志尼说马克思“喜欢破坏”“极为狡诈”“报复心强”“心胸狭窄”。）⁽¹⁶⁾策略确定后，马克思在3天后拖着长着痛的身体参加了协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像往常一样，他只要亲自出席，就能主宰一切。在经营家庭和遵守期限上，他可能的确是一团糟，但只要是与政治对手面对面对峙，他一如既往地果敢。更加有利的是，参加会议的主要对手并不多，很多英国会员去了其他地方

参加关于男性普选权的会议。不过，结果是最重要的：马志尼的同伙被击溃。^[17]

协会的问题解决之后，3月15日，马克思带着相对轻松的心情，独自前往英国海滨小城马尔吉特进行休养。他住进一家小旅馆，但只住了一晚便离开了，因为他见到一个他以为是瞎子、却是聋子的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餐厅里，让他感到不安。^[18]第二天，马克思住进一处朝向海边的房子，之后便开始进行自己设计的一套恢复疗法，包括慢走数英里和洗海水澡。他说自己“变成了一根游荡的手杖，整天东游西逛，处于被佛教视为人类极乐的精神虚无状态”。^[19]他曾远足16英里走到坎特伯雷，可惜发现这里缺少诗的痕迹。^[20]

马克思去马尔吉特后，一家人暂时摆脱了他的咆哮（杜西已经开始称呼他“坏脾气的卡尔·马克思博士”），^[21]也让两个年轻的法国人有机会亲近他的女儿们。当然，他们也没有忽视他——他才离开5天，便写信给劳拉抱怨说“拉法格这个讨厌的小伙子”写了很多信折磨自己。实际上，马克思觉得自己才是他们登门拜访的原因。^[22]他的确是最初的原因，但很快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其他地方。^[23]龙格对燕妮一见倾心，后者虽然比他小5岁，却像他一样严谨、慎重。但出于矜持和对政治上的爱，他没有马上向她表白。从来不加遮掩的拉法格却没这么多顾虑。他深深爱上了劳拉，而且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加遮掩。这个医学生出身的革命者在劳拉面前变成了诗人。^[24]“……她长长的卷发散发出迷人的金色光芒，就如吸收了落日的余晖……”他总是围着马克思家转悠，因此有了外号“图尔”。^[25]

3月22日，马克思家的女儿们举行了一场晚会。莱昂·菲利普斯圣诞节时寄给她们5英镑，但被燕妮和马克思借了去补贴家用，直到春天才想办法还给她们。三个女儿都参与了谋划。这次晚会不是母亲在1864年举行的那种舞会，而是如马克思向恩格斯所说，她们“一年一度的聚会”。她们邀请马克思从马尔吉特回来参加，马克思只得遵从。^[26]

马克思和燕妮觉得三个女儿都很规矩、很像英国人，不像自己以前那样不羁。所以，燕妮一直比较放心地看着她们与具有相似政治信仰的年轻人交流，虽然她不想她们嫁给革命者。她向欧内斯蒂内·李卜克内

西袒露说，她一直担心两个大些的女儿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具有“特别倾向”的教育，会使得她们与同龄人产生碰撞。她很有预见性地写道：“女孩子们成长时接受的思想 and 看法与她们生活的社会完全不相容。……她们如果富裕，那么即使没有‘浸洗、教堂和宗教’，也照样生活，否则，她们将不得不经历艰难困苦的挣扎。我经常想，自己没有财产又无法不依靠他人独立生活，就不该让她们在与世界的激烈对抗中成长。”她们可能陷入的困境让她担心、忧虑：“女孩子们觉得我经常心情很坏、很烦躁，但那是因为我知道她们在生活中将无法获得以她们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应该获得的快乐。”⁽²⁷⁾在给斐迪南的信中，她更加坦白地说，她担心自己和马克思因为运动牺牲了女儿们的未来。“我们给予其他人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孩子。”⁽²⁸⁾

但梅特兰公园路这处房子以及时不时登门与女儿们自由地谈论政治、让她们轻松自如的两个人年轻人，给了燕妮一些鼓舞。她尤其喜欢拉法格，因为根据他随口所说的话语判断，他的家庭应该比较古老、财富比较充足。但劳拉对拉法格的恋情毫无反应，甚至未加注意。也许是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才认识自己一个月，便要把心和灵魂都交给自己。的确，虽然马克思家的女儿们在政治上已经极为老道，但面对异性，她们没有任何经验。

晚会结束后，22岁的小燕妮和11岁的杜西跟着父亲去了马尔吉特，劳拉留下来陪伴母亲。她写信给姐姐小燕妮说，一天晚上一位法拉第先生来访，跟自己进行私密交谈。“我们都尽量放松，但我敢说，对于彼此的陪伴，我比他感到更愉快。”

第二天，劳拉独自在家，又有人登门——父亲的朋友彼得·福克斯。

.....

我被吓坏了！这个人明明一眼就能看出我没有谈论感情的心思，这是怎么都改变不了的，况且他之前也没跟我说过几句话。……他好像满肚子满脑袋都是牢骚，藏都藏不住。他说起波兰、爱尔兰、改革联盟、封建贵族、英国政府——还不是一个一个地说，而是混在一起说，说到屋子里已经发黑，我估计是因为屋里的死物都被他的诳语给

召唤出来了,说到他自己结结巴巴得无法再继续忽悠下去。

.....

这次单方向的交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劳拉说自己“差点就忍不住要笑出来”。⁽²⁹⁾

燕妮觉得劳拉既然已经开始谈论感情,应该很快就能走向婚姻,但她觉得大女儿也许需要自己督促一下,才会开始寻找浪漫。小燕妮仍没有放弃到剧院发展,同时她也在参与国际工人协会的事务,与父亲的朋友以及很多向父亲征求意见的年轻人进行通信。小燕妮与父亲一起待在马尔吉特时,母亲寄给她一本德·斯塔埃尔夫人的小说《德尔菲娜》。⁽³⁰⁾这是一本书信体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一直把道德和家庭责任看得比爱情更重要的女人痛苦的一生。但这对小燕妮并不管用,而且周围也没有合适的对象,一直被她视作父亲的追随者的龙格也回巴黎服刑去了。

对马克思和女儿们来说,马尔吉特之行没有预期的那样愉快,因为天气一直很差。(“好像是专门为来这里过复活节的伦敦东区人准备的。”——这位工人阶级的拥护者在伦敦东区的劳动工人面前显然很有优越感。)⁽³¹⁾已经来海边一个月的马克思越来越担心协会的事务。他不在期间,协会虽然介入了一些罢工,赢得了工人的赞誉,并吸纳了一些新成员,但争吵仍无可避免地再次出现。此外,《资本论》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对一个朋友说:“这真要把我急死。”⁽³²⁾

4月中旬,马克思带着女儿们回到伦敦,但他马上又受到牙痛、呕吐和风湿的折磨,无法服用鸦片或使用乙醚进行治疗。⁽³³⁾结果,马克思虽然回到了家,却无法恢复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密切关注德国局势。1863年夏天起,在普鲁士恢复反动统治的首相俾斯麦通过禁止政治讨论、对出版界实施检查、威胁自由派政治人物等方式,堵住批评的声音,现在他好像打算要挑起与奥地利的战争。俾斯麦要建立一个由普鲁士主导的统一的德国,将奥地利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阻碍。⁽³⁴⁾

如同拿破仑在巴黎受到反对一样,俾斯麦在柏林也遭到了学生的反对。1866年5月,一名24岁的学生试图在菩提树下大街刺杀他,他开

了5枪，但都没有打中。这个学生名叫斐迪南·科恩，是卡尔·布林德的继子，穆希儿时住在索霍区时的玩伴。科恩当场被抓，据说第二天在监狱上吊自杀。^[35]

恩格斯嘲讽科恩的鲁莽行为反而让俾斯麦称了心。但马克思表达了同情，^[36]他对恩格斯说：“科恩是一个很好的（虽然不是特别有才能的）青年，我对他特别同情，因为他是我的穆希的老朋友。”^[37]科恩的死让马克思不由自主地想，如果穆希活到了24岁会怎样，他会不会在吸收了父亲的激进思想之后，也做出这样鲁莽的事情来。实际上，在写给恩格斯的这同一封信里，马克思愤怒地指责布林德用“刺杀暴君这种蠢话”把这个可怜的孩子“送上了自由祭坛作牺牲”。^[38]

如俾斯麦所想，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争在6月爆发。马克思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强调各国工人在面对政府为了争夺领土和权力而发动战争时保持中立的重要性：他不想看到工人被牺牲在资本主义的祭坛上。6月中旬，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战争做出正式反应。虽然协会对此早有政策，即工人不对抗工人，但当战争真的爆发时，工人代表们的民族倾向开始出现。拉法格站在讲台上，宣称任何关于民族和民族特性的言论都是反动的，国家不应该存在，应该分解为公社，或者地方自制市。他在自己的长篇大论中暗示说，世界都应该等待法国开启这样一场革命，之后推广到世界。马克思批评拉法格在主张废除民族特性的同时却在用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都不懂的法语发言，使得大家哄笑一片。他又讽刺说，拉法格的否定民族特性等于是让“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其他民族。^[39]最终，中央委员会建议工人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战争实际上已经在7月3日结束，普鲁士和俾斯麦获得了胜利。^[40]

实际上，马克思取笑拉法格应该是亲近的表现，他感激拉法格对协会的忠诚（虽然他觉得他的概念尚不够清楚），他也喜欢有个医生在身边（虽然拉法格不过是个学生）。8月，拉法格好像引起了劳拉的注意，突破了她的防御。马克思在8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从昨天起，劳拉同我的那个学医的克里奥洛人拉法格先生半订婚了。她对他的态度像对其他人一样，但是由于克里奥洛人固有的那种过分的感情，由于有些担心这个青年人（二十五岁）自杀等等，由于劳拉有些喜欢他但始终

保持冷静（他是个很俊俏、有知识、精力充沛、体格健壮的小伙子），这一切使得事情多少带有半妥协的性质了。”^[41]

燕妮好像也很高兴，虽然对之前劳拉对拉法格没什么兴趣，现在却又进展如此之快感到诧异。^[42]恩格斯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不该表示祝贺，但还是祝贺了。^[43]实际上，唯一一个心甘情愿、无比高兴的人就是拉法格自己。他在劳拉面前毫无自制力，因此受到了马克思的又一次指责，而且这次不是玩笑话：

.....

如果您想继续维持您同我女儿的关系，您就应当放弃您的那一套“求爱”方式。您清楚地知道，并没有肯定结婚，一切都还没有确定。即使她同您正式订了婚，您也不应当忘记，这是费时间的事。过分亲密很不合适，因为一对恋人在长时期内将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必然会有许多严峻的考验和苦恼。我惊讶地看到您的举止在只有一个星期的地质年代里，一天一天地起变化。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如果您借口说您有克里奥洛人的气质，那么我就有义务以我健全的理性置身于您的气质和我的女儿之间。如果说，您在同她接近时不能以适合于伦敦的习惯的方式表示爱情，那么您就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明白人，只要半句话就会懂的。^[44]

.....

马克思的警告听起来好像包括对他和燕妮的长期恋爱关系的描述，这可能也让他有所反思，因为接下来，他极为少见地承认了个人的失败。他在告诉拉法格自己需要弄清他的经济状况才能最终同意他和劳拉的关系之后，又说：“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会再结婚了。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会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45]

马克思告诉拉法格说，自己对他的勤勉没有信心，他作为一个学生被赶出一个国家，又在另外一个国家想要重新开始，成功的希望很靠不住。马克思说自己不清楚拉法格的家庭是否会资助他，他的家庭对这个婚姻的看法，他能不能给劳拉安全的生活。马克思补充说：

.....
要不是我直接干预（这是我的弱点！），要不是我对您的友谊影响了我女儿的行动，事情绝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所以我个人负有全部的责任。

为了防止对这封信的任何曲解，我向您声明：您要是想今天就结婚，这是办不到的。我的女儿会拒绝您的。我个人也会反对。您应该在考虑结婚以前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而且无论对您或对她来说都需要长期考验。^[46]

.....

过了几天，拉法格让一位著名的法国医生帮自己向马克思写了一封人品推荐信，他的父亲也写信给马克思，承诺儿子结婚后，家里会出一大笔财产，并请求马克思允许拉法格把自己看作劳拉的未婚夫。^[47]马克思私下里写信给恩格斯说，拉法格是个“出色的小伙子，但也是个娇生惯养和过于淳朴的人”。为了表示对恩格斯的尊敬，马克思还说劳拉在得到恩格斯的同意前，不会同意拉法格订婚的请求。^[48]为了防止拉法格控制不住对劳拉的热情，马克思把劳拉和杜西临时送到了海滨城镇黑斯廷斯的一所寄宿学校，这里与燕妮和劳拉在伦敦上过的南汉普斯泰特女子学校没有多大区别，但距离比较远。^[49]对于拉法格，马克思向已经前往黑斯廷斯的劳拉报告说：“愁容骑士在他住房的拐角离开了我。因为在此以前他的内心已受到很大的震动，同我告别时，他倒像英雄那样若无其事的样子。”^[50]

劳拉走后，马克思把拉法格吸收进了家庭事业，让他忙于准备需要分发给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大会与会代表的文件。小燕妮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拉法格有一天为了把马克思的指导文件翻译成法语，从上午10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这个不幸的年

轻人看着极为憔悴。……胡子没刮，头发也没梳理。”⁽⁵¹⁾（拉法格也许是为了赢得杜西的好感，让她帮着自己追求劳拉，在院子里帮她搭了个秋千。）⁽⁵²⁾虽然他想尽一切办法融入马克思家，却好像依然未能进入劳拉的心。劳拉在黑斯廷斯写信给姐姐小燕妮时，提到：“我并不希望自己多愁善感，忘记是一种我还没能学会的艺术，但记忆消散，真的是一件憾事。”⁽⁵³⁾

不管劳拉是否在犹豫，车轮却在朝着婚姻的方向转动。9月26日，她和拉法格在她21岁生日那天正式订婚。劳拉的反应没有任何记载，但燕妮好像很高兴。她告诉欧内斯蒂内·李卜克内西说，保尔友善，宽容，对劳拉一心一意，更幸运的是，两人在宗教和政治上步调一致。“这样，劳拉就不会再因为她的思想而遭受苦恼和磨难了。找到一个对事务的见解一致又同时受过教育、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人太难了。”婚礼要等两年后拉法格在英国完成医学学业才能举行。这期间，他在附近租了房子，但基本上住在马克思家，也因此给马克思家增添了花费。⁽⁵⁴⁾

这年秋天，各种事情纷纷而至，让马克思疲于应对。他一直忙着为协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他不会亲自参加，但在代表聚集到日内瓦之前，大会的命运掌握在他手里。这对马克思尤其艰难，不管他事先做的准备有多充分，演员们离开他的视线，他便无法施加控制。另外，他终于能把《资本论》的手稿交到汉堡。他决定不再等所有各卷全都写完、并且满意之后再出版——甚至也不再等合同里约定的两卷都完成，而是先出版这本计划分为四卷的著作的第一卷。除了这些需要付出体力和脑力的麻烦之外，他又身无分文了，又一次被商贩和房东登门要账。⁽⁵⁵⁾有一次，一个债主上门讨债，马克思手上的钱不够，为了不让拉法格和讨债人知道，他只得让讨债人在家里等一下，自己去换钱，实际上，他从后门溜出去，向面包铺老板借到了需要的钱。⁽⁵⁶⁾他知道如果拉法格发现（被他的家庭发现就更糟）莫丹那别墅的体面氛围是假的，女儿眼前的幸福将处于危险之中。这样的风险的确存在：一个无耻的法国人向马克思要账时，威胁说如果拿不到钱，就把真相告诉老拉法格。⁽⁵⁷⁾如果这样，劳拉将和很多19世纪的女孩一样处于非常不幸的位置，她会悲哀地发现在婚姻这个买卖中，没有财富，多少爱意都没用。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自己尝试向荷兰和德国的亲戚借钱，但一无所得。燕妮已经把东西当得几乎无法出门，马克思自己“不得不在流亡中最困难的时期那样，在伦敦左借一点，右借一点。……另一方面，给我们供应东西的人又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其中有几个已经声明停止赊售，并且以向法院起诉相威胁。加之拉法格（直到几天前动身到波尔多去为止）一直待在家里，又必须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知道真实情况，这种状况就更加使人难堪。”马克思无奈之下，只能厚着脸皮继续寻求同情和帮助，他又写道，“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不仅常常中断我的写作，而且还由于竭力想在夜间弥补白天损失的时间，以致又长了一个奇怪的痛。”⁽⁵⁸⁾

恩格斯听到求助的声音后，马上做出了回应。看到马克思抱怨这么多苦难，他肯定想着马克思又会告诉他书稿需要推迟。但马克思给了他惊喜，在1866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他将《资本论》第一卷寄去了汉堡。⁽⁵⁹⁾恩格斯肯定长舒了一口气。他回信说：“得知手稿将发出的消息，我真像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因此我要特别为你的健康干一杯。你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本书造成的；你一旦摆脱了它，就又会成为完全另外的一个人了。”⁽⁶⁰⁾

燕妮也表达了欣慰。但这个跟随马克思一生不断见证希望和梦想破碎的女人也表达了担忧。在圣诞节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她说：

.....

如果汉堡书商真的能够把书印得像他所说的那样快，那么书无论如何可以在复活节前出版。看到自己面前摆着这样一大堆誊写干净的稿子，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我的肩上卸下了一个沉重负担；但是，劳神操心的事还有很多，特别是，女孩子们可能恋爱订婚，而且是同法国人和医科大学生恋爱订婚！我也愿意像别人那样把一切都看得很美好，但是，多年来无数操心事，已把我变成一个惊恐的人，我常常把未来看得有些阴暗，而朝气蓬勃的人却是很乐观地看待一切事物的。这是我们私下说说。⁽⁶¹⁾

.....

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挫折不断出现，燕妮的担心好像正在应验。迈斯纳不想只印第一卷，而是想等马克思把第二卷完成后一起出版。马克思受到失眠的折磨，身上又长了几个痈，他自己认为是心理方面的原因导致的。⁽⁶²⁾（他很恶趣味地对恩格斯说“我希望资产阶级毕生都会记得我的痈”。）⁽⁶³⁾此外，还有老问题——钱。1867年4月初，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没办法按照计划亲自把剩下的书稿送到汉堡去，⁽⁶⁴⁾因为他的衣服和表都在当铺里。⁽⁶⁵⁾因为书稿的完成而“狂喜”（燕妮的形容）的恩格斯出钱让马克思把衣服和表赎了回来。

多年前，恩格斯告诉妹妹说自己不敢纵情于愿望，因为如果他真的软弱到那个地步，他期望的东西都不会实现。⁽⁶⁶⁾但在1867年4月，在《资本论》已经超过期限两年，但最终朝着出版的方向迈进时，他允许自己有愿望和畅想，正如他对马克思所说，他终于迎来了更顺利的未来。

32 《资本论》问世



“你看到什么没？”普桑小声问波尔伯斯。

“没有，你呢？”

“没有。”

“那个老骗子在耍我们。”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¹⁾

马克思在汉诺威等着汉堡书商寄来印张的校样时，恩格斯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向他坦露自己近 20 年来一边支援他一家人一边期盼他的伟大著作面世期间未曾向他表露的话。

我一直认为，使你长期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不把这个担子抛掉，你就永远不会而且也不能脱出困境。这个一辈子也搞不完的东西，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非常清楚地了解，现在，你摆脱这个梦魔后，会感到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这种彻底的转变使我高兴得不得了，第一，是为了这件事情本身，第二，特别是为了你和你的夫人，第三，因为现在的确是使这一切都得到改善

的时候了。

.....

恩格斯说，再过两年他和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同就要期满，他就要彻底离开商业世界。“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我的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自然，这意味着收入的极大减少，但恩格斯觉得“如果事情照目前这样发展下去，即使到那时不发生革命，一切财政计划也没有终止，那么事情也总是会安排妥当的。假如不发生革命，等我脱身出来的时候，我打算开他一个大大的玩笑，写一本有趣的书：《英国资产阶级的苦恼和欢乐》。”⁽²⁾

马克思也在畅想。在汉堡时，迈斯纳对他极为热情，保证会出版他的著作。⁽³⁾满怀期望的马克思写信给日内瓦的朋友说《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⁴⁾他写信给纽约的朋友说，争取一年内出版三卷（虽然刚完成第一卷），现在他正在利用每一刻完成这部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⁵⁾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他还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希望，并且坚信，再过一年我会成为一个不愁吃穿的人，能够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且终于又能站稳脚跟。”⁽⁶⁾

马克思在49岁生日那天收到了第一批印张的校样，出版商也已经在报上登出广告，宣传这本书即将出版。⁽⁷⁾事情的发展非常顺利，马克思信心满满，在汉诺威期间，他住在一个不折不扣的崇拜者家里（或者如他所说，一个狂热的崇拜者）。路德维希·库格曼是一名妇科医生，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神圣家族》时，便注意到了他们，此后阅读和收集了他们的所有著作。库格曼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马克思看法如何不得而知，但他是纯粹的资产阶级。⁽⁸⁾不管原因如何，对于库格曼收集的作品比他们两人的加在一起还要完备，马克思感到极为诧异。暂时没了《资本论》的写作重压，又有库格曼的精心照顾，马克思说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

马克思家的女人都在抱怨将近一个月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小燕妮说大家担心他被俾斯麦抓了。劳拉说“还以为你不辞而别，打算从我们当中溜走了”。

.....

每次家里写信给马克思，都问他何时回来。他最终启程返回伦敦。马克思说，虽然“又是家庭的烦恼，内部纠纷和忙碌，而不能以蓬勃的朝气，无牵无挂地进行工作”，自己还是必须尽快回伦敦去。^[9]

4月10日，马克思从伦敦出发去德国交书稿，5月19日回到英国，途中短暂停留汉堡与迈斯纳见面，收取了部分稿酬。他可能的确急着回去工作，却又好像并不急于回到莫丹那别墅。

马克思终于回到妻子、女儿，还有对他最为期盼的拉法格身边。但马克思回到伦敦3天后，便前往曼彻斯特给恩格斯看校样。恩格斯还没有看过书的内容，马克思迫切需要听到他的评价，因为恩格斯对书的主题的了解并不比他差多少，他把恩格斯看作是最重要、也是最难通过的评判家。马克思出发去汉堡前曾建议恩格斯读一读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不出名的杰作》，他说这部小说“充满值得玩味的讽刺”，就此给了恩格斯一个暗示。^[10]巴尔扎克的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画家穷数年之力，在无比期待中创作出了一幅杰作，却没有其他人能看到或看懂。

恩格斯的第一反应有好有坏。他是分批收到的书稿，每批16页。他稍微批评说第二批比较难懂，“带有一些受痛困扰的痕迹”；“辩证”部分比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加明确，但他自己更喜欢前一本书的某些地方。^[11]总的来说，他说对于读过的部分很喜欢。

恩格斯的些许担忧显然被马克思忽略了，他说恩格斯的肯定让他感到欣慰，马克思承诺如果能找到稿酬优厚的出版商出英文版（他觉得这应该不用等很久），就给莉齐·白恩士从伦敦带一套服装。^[12]

自从劳拉和拉法格订婚，马克思一家就把大量精力放在了他们身上。1867年春，他们在汉普斯泰特荒阜学习骑马时，很是引起了一番动静。坐在马鞍上的劳拉美丽、自如，保尔却是一副害怕的样子，不敢抓缰绳，而是紧紧抓着马的鬃毛。（杜西给他做了一个垫子，让他骑马后淤青的

臀部能舒服点。)^[13]马克思的注意力却在大女儿身上。他暗暗地担心她，因为她处在一种尴尬的社会境况：妹妹已经准备结婚，自己却还没有追求者。他在德国时，曾想让她到德国去，换一换环境。但她拒绝了：“我可以向您保证，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在家里非常自在。……我一点也不需要假惺惺的笑容来怜悯我……虽然这样的笑容比比皆是。”^[14]

一直以来，小燕妮对感情都不像对思想那样感兴趣，这段时间尤其如此。随着登上舞台的希望越来越小（一方面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的女儿这样的想法并不现实），她开始尝试写剧本。^[15]她在这段时间写了一出将个人情感与政治结合的戏剧，灵感来自于莎士比亚和她自己的家庭（其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亲爱的爸爸，您的话让我伤心，让您的人民哭泣，您隐退了，谁来保护他们的事业？”）。^[16]此外，她一页一页誊写关于1848年起义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诗歌以及法语散文，同时关注国际工人协会支持的罢工在英国和法国的进展。每一天，她的政治思想和文笔都在静静地提高。

1867年夏天，拉法格的家人邀请马克思家的三个女儿跟保尔一起去波尔多游玩。马克思和燕妮不想在给女儿们购置行头上省钱。拉法格提出自己出钱，但马克思没有同意——他必须表现出有足够的 ability 照顾家人。结果，他用交房租的钱给女儿们买了船票，只能向恩格斯求助，免得被赶出去。^[17]

燕妮和马克思知道拉法格的父亲是做红酒生意的（他们觉得规模应该不小），在古巴、新奥尔良和法国都有土地和房产。老拉法格答应给儿子10万法郎^[18]（相当于大约4000英镑）作为结婚礼物，这也让燕妮觉得自己的二女儿应该能确保一生轻松、富足，没准儿还能帮两个姐妹找到合适的伴侣。他们显然从未想过，以女儿们的出众才华，完全可以不依靠丈夫，独自在这个世界闯荡出一番天地。在女儿们的问题上，燕妮和马克思的想法出奇地传统。

在保尔的陪伴下，三个年轻的女孩穿着最好的服装，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旅程，但很快她们就发现，她们应该穿平时在家里穿的更加舒适的衣服。旅途遥远，在炎热的天气里，她们不停地更换火车和马车，加上沉重的行李，她们的旅途极为辛苦。等到了目的地，她们的漂亮服装打皱了，精美的发型散乱了，洁净的脸上也弄得脏兮兮。但海上的旅程

还是很愉快的。小燕妮说大家兴致都很高，她们发现拉法格的父母都是“慷慨高贵的人”。小燕妮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忍不住反驳了保尔无比坚定的无神论主张，因为过度崇拜任何主义都是荒谬的，这让他的父母极为高兴。但她对于拉法格一家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是混血儿而感到诧异。小燕妮极为少见地说到了父亲的犹太人血统：“那些对我们的出身感到羞耻的人，倒是能跟他们找到共鸣。”

她们在波尔多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跟拉法格一家人去比斯开湾法国海岸待了很长时间。此时，小燕妮 23 岁，劳拉将近 22 岁，杜西 12 岁。这是她们三人第一次一起独自待在英国之外。小燕妮说她们的服装和穿着在法国引起了一场“轰动”，鉴于她是三人中最不虚华的，她的话应该可信。她们不论在外表上还是思想上都是强大的组合，还都很爱闹，保尔很快和她们打成一片，小燕妮和杜西都把他当作了哥哥。^[19]

她们整个 8 月都待在海边，直到 9 月 10 日才回到伦敦。虽然法国之行与她们平时的生活相比极为遥远，但在旅途中，她们还是时刻关注着父亲的书的进展，对此，马克思和燕妮都很乐观。回家前，小燕妮写信给母亲说：“这些德国蠢人终于肯给我们的摩尔一点公正了——他们永远无法报答他们所做的一切。”^[20]

印张不断在伦敦和曼彻斯特间传递。整个 8 月，邮差每次敲响马克思家的门都是带来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评价，然后马克思几乎每次都让他带上更多的资料，送往曼彻斯特。马克思经常对着恩格斯的来信自言自语——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杜西回忆说，曾听到他在书房里像恩格斯就在身边一样对话，说着“不，那样不对”或“这一点你是对的”，或者对恩格斯以非常幽默的方式提出的问题报以大笑。）在女儿们和拉法格都不在家的 8 月，马克思的进度很快。8 月 14 日，他已经校完第 48 印张，估计能在本星期内把“这些讨厌的东西”完成。^[21]他终于比预期提前了一次：两天后的夜里两点，他校完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个印张——第 49 印张。

马克思筋疲力尽，但又浑身轻松，同时心中充满感激。他写了一封短信给恩格斯：“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

马克思把《资本论》献给了另一位自始至终对他忠诚和慷慨的朋友：鲁普斯。^[22]

总的来说，对于马克思能够把复杂的经济理论用如此简单的语言轻松地解释清楚，恩格斯感到极为惊异。他说，自己第一次看到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得到如此充分和相互联系的叙述。^[23]数年后，恩格斯解释说：

“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一样，都依赖于剥削广大人民。”但恩格斯也不是没有提出批评，^[24]而他的批评正预示着书到了读者手中之后会面对的问题：

.....

但是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二百页，却只分了四个部分，……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所说明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括，以至经常从这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这使人非常疲倦，在没有密切注意的情况下，甚至会使人感到混乱。^[25]

.....

但这些意见太晚了，来不及体现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中——清样已经交给迈斯纳，印刷工已经准备印刷。9月中旬，马克思带拉法格去曼彻斯特短暂拜访恩格斯，让他看看这个年轻人，他们回到伦敦时，1000本《资本论》已经印好。^[26]

马克思周围的人刻意没有特别庆祝。根据以往的痛苦经验，马克思、燕妮和恩格斯都知道，如果无法立刻引起出版界的注意，结局仍将是失败。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所有人都动员了起来。劳拉和拉法格开始把《资本论》的序言翻译成法语，在法语报纸刊登。^[27]马克思夫妇和小燕妮写信给在德国、瑞士、比利时和美国的所有熟人，告知他们出版的消息，希望他们购买和写些书评。恩格斯写了至少7篇匿名书评，发表在欧洲和美国的德语和英语报纸上，通过不同风格和特点的文字，对《资本论》给出不同观点——有称赞，有批判；有的从经济角度，有的从社会角度。^[28]（小燕妮称赞他能如此驾驭“各种观点和各种特征”

简直就是一场成功的戏剧演出。)〔29〕

恩格斯鼓励其他朋友采用自己的办法，确保《资本论》获得成功。他告诉库格曼说，长篇和短篇的评论都需要，关键是要“使这班先生们无疑试图奉行的完全沉默的政策行不通，而且要尽快使它行不通”。恩格斯说，最好是让《资本论》受到批判：“主要的是要经常不断地发表对该书的评论。由于在这种场合下，马克思的手脚受到束缚，而且他像少女一样腼腆，所以正是我们这些第三者，必须来做这件事。……用我们的老朋友耶稣基督的话来说，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灵巧。”〔30〕

此时的马克思很郁闷。有些朋友收到书后表示看不懂。〔31〕库格曼的妻子盖尔特鲁黛便是如此，马克思只得答应把读懂这本书的“方法”告诉她，向她建议了几个比较容易读懂的章节，并让库格曼给她解释复杂的术语。〔32〕曾经用一套无边无际的闲扯让劳拉无所适从的国际工人协会英国代表彼得·福克斯说自己拿到书后，〔33〕“感觉像有人送了头大象给自己，不知道该用来做什么”。〔34〕一个年轻的德国制造商读完后，觉得马克思肯定在缝纫机行业干过。〔35〕

《资本论》出版后一个月，马克思无法入睡，又长了疝，而且位置很不巧，让他只能侧躺着。他说自己无法进行第二卷的写作，部分原因是身体状况使然，部分原因是拉法格已经完全住在了家里，经济压力更加困扰着他。但他无法思考的真正原因，显然是他急于看到公众对第一卷的反应。在这段苦闷的时间里，他找到了一个地方躲藏，那就是16世纪的法国诗歌，他还特意誊抄下来，寄给恩格斯。〔36〕

11月，《资本论》没有受到关注，不但远未能像炸弹一样在资产阶级头顶炸响，反而没能产生任何影响。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对《资本论》的沉默，很使我不安。”“那就只好像俄国人那样——等待。忍耐是俄国外交和成功的基础。但是咱们大伙都只有一条命，等到头来会等死的。”〔37〕到12月，仍然只有沉默。马克思说自己卧在了床上。〔38〕写信给恩格斯祝福新年时，他说自己“蜷着身子躺了好久，疾病来势汹汹。你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我三个星期没有抽烟！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39〕

马克思虽然说到俄国人的耐心，自己却不是有耐心的人，而且他对

民众接受改变的能力的判断并不准确——不论是接受新思想还是起义。他一直说教育工人阶级、让他们做好执政的准备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可他却同时希望他们能够吸收和理解《资本论》，而且还要马上做到。即便抛开书中的数学公式、各种语言、各种旁征博引以及抽象理论不谈，单论这本书的厚度，就让人几乎不敢接近。马克思在书中介绍的理论对他和恩格斯而言清楚明了，那是因为他们从1844年起就在不断地讨论这些。他们好像忘记了马克思的思想（虽然不全是新的或原创的^①）^{〔40〕}要制造的是一场理论地震——一场思想上的革命，目标是要动摇这个在1867年又达到一个新高点的年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41〕}在书中，马克思把一面镜子放在这个社会面前，让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像他一样透过这面镜子看清他们之间的可怕的真实关系。

此外，《资本论》给读者一种这本书是独立的两本书的错觉。马克思大量使用脚注（有的占满一页），使得读者觉得需要把正文和注释分开理解，就如一位钢琴家在同时使用两组琴键弹奏。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风格有点回归马克思家悠久的拉比传统的意味：与犹太人的传统说教典籍《阿加达》不无相似之处，通过双层方法解释典籍中的真理，比如表面上的加上隐藏着的，高声呼喊加上低声细语。

即便对能够抓住主旨并且不被形式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消化这本书也不容易。有些人把这本长达800页的著作看作一种侵略。英国社会主义者亨利·海德门这样描述同时代人对《资本论》的最初反应：“像我们今天，尤其是在英国，击剑的时候都要在剑尖上放一块柔软的扣子垫着，马克思却让剑尖裸露着，无情地向对手发动进攻，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自然无法让我们一副绅士作风的伪斗士们和只进行精神锻炼的朋友们相信他——这个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毫不留情的争论家和愤怒的攻击者——真的是对这个时代思考最深的人。”^{〔42〕}

马克思要在书中讲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运转和最终覆灭。^{〔43〕}熟悉《共产党宣言》的读者也许想在《资本论》里找到一个简

① 戴维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自费尔巴哈，阶级斗争来自圣西蒙，无产阶级专政来自巴贝夫，劳工理论来自亚当·斯密，剩余价值来自布雷和汤普森，辩证法来自黑格尔。

单、激烈的起义号召。但《资本论》很缓慢，它是导师而非斗士的作品。马克思在书中描述的革命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的结果。它可能温和到只是为了赢得更短的工作日，也可能大胆到要推翻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这种制度诞生于16世纪，却已成长为一个工业和军事的庞然大物，为了永不满足的利润追求，压榨人和环境：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山，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⁴⁴⁾

马克思首先带着读者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运转方式，这里也是容易让他的直接受众迷惑和失望的地方。在《资本论》的前250多页，他把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分解到非常细小的层次。他在书的开头便对商品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这使得读者难以看到更大、更重要的画面：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小麦和铁来举例。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等于a英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⁴⁵⁾

马克思讲明这个“共同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生产商品所耗的劳动量。马克思这位辩证唯物主义者重申了自己在之前的著作中提过的一点，

即经济学不是存在于僵硬的公式当中，不是只有懂得其规律的少数人才能理解。不认识到这一点，将导致把市场神秘化，使得民众只能奴隶般跟着那些声称掌握市场秘密的商业巫师。人类会在这样的奇迹面前颤抖，无法挣脱身上的枷锁。马克思要证明的就是神秘并不存在，即便资本主义者（把自己当作国王般）不希望无产阶级知道他们的力量没那么神圣。

马克思以 19 世纪英国的工厂为模型，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个制度：人依然在被买卖，只是方式发生了改变。工人是一种商品的主人——他自己。他把自己的劳动卖给买主或雇主一段时间，雇主让他使用设备（生产资料）并给他工资⁽⁴⁶⁾（被马克思描述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⁴⁷⁾问题出现了：工资如何确定？在马克思描述的市场中，劳动的价值由所谓的最低工资决定，也就是维持劳动者生存和劳动所需的最低额度。马克思向这个计算方法中加入了一个新的东西。他冰冷地把人看作机器——新资本主义雇主就是这样看的——得出的结论是劳动者不能永远工作。劳动者也像设备一样，会有磨损和故障。因此，劳动者不仅需要足够的工资用于吃住，还需要进行再生产——繁育后代，以便创造下一代劳动者，或者说新的机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关系具有两个独有的特点。第一，劳动者在资本家的控制下劳动，后者购买前者一段时间的劳动；第二，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归雇主所有。⁽⁴⁸⁾产品会被卖掉，收益归雇主：

.....

例如，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品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品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⁴⁹⁾

.....

为获得利润，雇主就需要想办法从他使用的产品中压榨出更多价值。马克思解释说，获得这个额外价值最容易的方法就是通过劳动力这种商

品。就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被他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根基”。^[50]

雇用工人时，雇主根据让工人生存所需的成本以及工人的技术水平来确定工资，劳动者则同意每天或每周工作多少个小时。以每天工作12小时为例，如果劳动者前6个小时的产出就已经达到雇主支付的工资，他没有也不能停下来，他还要再工作6个小时，这额外的6个小时产出的价值没有进入他的口袋，而是完全归雇主或资本家所有。这样，劳动者有6个小时的工作没有得到支付，当产品最终卖出，这部分产出变成了资本家的收益或利润。资本家有很多方式增加这部分利润，比如延长每天或每周的工作时间、裁员、雇用工资更低的女工和童工、使用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金额。”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成功的秘密在于不仅剥削劳动，还剥削未支付的剩余劳动。^[51]

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前，工匠、小工厂主或农户卖出商品，以便获得金钱，买入其他商品（马克思将这一形式描述为C-M-C），^[52]但资本家却是先买入商品，再卖出商品，获得金钱（M-C-M）：

.....

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值。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作为资本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53]

.....

每次交易环节后，资本家的金钱就离它的源头，即工人，越来越远，但马克思认为，距离变远不会让关系变弱。剩余价值不论被资本家用作享受，还是进入地产或股票市场，亦或通过借债和利息等财务形式在资本家之间转移（马克思说这只存在于资本家中间，从不会流向穷人），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剩余劳动的凝结”：^[54]

.....

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值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55]

.....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56]

马克思认可雇主得到补偿的权利：他提供了工厂和设备，工人才能从事生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虚构了一个工厂主的辩解之词：“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贫如洗，我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我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我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57]马克思并不介意任何人因为工作或财务支出甚至因为焦虑于企业的未来而获得补偿，但他坚持这不能来自于剥削其他人。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一不公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被贪婪所驱动。资本不仅没有把制造与获得的利润与工人分享，反而想方设法通过压榨工人减少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革新、时而繁荣时而崩溃的剧烈震动的市场，以及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吞并，都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工人失去工作。同时带给获胜的资本家两个好处——利润增加，规模更加庞大的失业工人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些被马克思称为“工业后备军”的失业工人既是希望，也是威胁：对雇主而言他们是稳定的劳力供应，

有工人累死或经济繁荣需要更多工人时，他们可以随时补充进来；威胁无法明言，但所有拥有工作的劳动男女都担心自己的工作被他们抢走，因为他们更加绝望，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结果，工业后备军被雇主用来减少劳动成本。^[58]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说，读《资本论》的工人别的地方也许看不懂，但至少应该明白马克思要传达的一点：“只有一个阶级，即他们自己，制造的财富比消耗的多，但多出来的财富被其他人夺走了——只因为那些人控制着生产资料，换言之，自然资源、机器、运输工具、信贷渠道等等，没有这些，工人无法进行创造，就是因为这样，这些人有了权力让所有其他人挨饿、臣服于他们。”^[59]

为了说明自己的经济理论，马克思列举了英国工厂里的很多残酷剥削实例，描述成年工人和数万童工（有的只有两岁）受到的虐待。马克思还引用文学人物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鲁滨逊虽然独自一人被困于荒岛，却“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仅凭一块表、一个账簿和一支笔，开始记账，经营自己在岛上的财富。马克思把自己在《资本论》中创造的资本家人物称作“钱袋”。^[60]书中还充满哥特式的文学语言：“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61]

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62]

马克思在这本巨著中解释说，工人虽然被虐待和剥削，但也不是没有力量。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工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劳动，这就为他们的抵抗提供了基础，但他们需要认识到团结的力量以及他们与资本的对立关

系。⁽⁶³⁾他们可以要求缩短每日工作时间和提高待遇，以便反映他们的劳动的真正价值。“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⁶⁴⁾自然，工人以卖主的身份向买主提出要求，而买主却对他们没有任何仁慈之心，这种对抗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斗争的开始。

马克思还预见资本家内部的对抗，他们会在对财富的追求中，相互残杀，凶恶地吞并对手，建立跨越国家和大陆的垄断商业帝国。而这，在马克思看来，也将最终对工人有利：处在金钱金字塔尖的寡头越少，说明下面的底座越大，而且在这个不断增大的底座里，将会出现更多的不幸，增加的不幸者也将实现更大范围的联合。⁽⁶⁵⁾他们将组成自己的社会——一个真正理解生产资料的社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生产资料。他们的阶级将壮大到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马克思认为，结果将是协作经营和对自然资源以及所有商业的车轮继续前行所需的一切设施和设备的共同占有。他预测这一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到来将远不会像资本主义的出现那样血腥。

.....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⁶⁶⁾

.....

马克思把毕生心血和思想——包括他自己的和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融入了这本书里。有的地方写得极具专业和学术风范，有的地方（可能下一段就是）却写得随意，充分体现了他在论战中的嘲讽风格。如果说恩格斯在书中看到了马克思受痛困扰的痕迹，他的家庭受到的磨难和他在伦敦及曼彻斯特看到的苦难同样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资

本论》的作者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古典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同时又非常熟悉那些生活在富裕的世界里、却遭受贫困的灵魂遭受的苦难。

就在马克思一家人等着有人肯对《资本论》表现出兴趣时，12月23日，库格曼为他的偶像送来一份特别的礼物。燕妮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

昨天晚上，我们全都坐在地下室——按照英国的楼房设计叫做炊事部门，供上面各层楼享受的“尘世的福利”就是从那儿来的——认真细致、诚心诚意地制作圣诞节吃的布丁。我们把葡萄干洗净（这是特别麻烦和费事的事情），把杏仁、橘子皮和柠檬皮捣碎，把板油剁烂，再把这些东西同蛋和面粉一起制成令人垂涎的杂拌。这时突然响起了铃声，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传来一阵上下楼梯的神秘的脚步声，整个楼房充满了一种低声细语和沙沙声；最后，从上面传来了一声：“大雕像到啦。”

.....

库格曼送给马克思一座巨大的宙斯雕像，作为他对《资本论》的作者的庄严致敬。

燕妮感谢他竭力在德国报纸上刊登对《资本论》的书评和摘录。“看来，德国人宁愿用沉默和不作声来表示自己的赞同。……亲爱的库格曼先生，请您相信我，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如果工人们知道，为了完成这部只是为了他们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写的著作，曾经不得不作出多大的牺牲，那么他们大概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关心。”结束这封长信前，燕妮还向库格曼表达了一点“不满”。“您为什么要这样庄重地称呼我为‘尊敬的’，对我这个老兵、白发苍苍的革命者、忠实的战友和伙伴使用这样的字眼？”

她在信尾署名：“不是‘尊敬的’、也不是‘尊贵的’，而是您的燕妮·马克思”。⁽⁶⁷⁾

33 劳拉的婚礼



《资本论》的稿酬甚至不够我写的时候抽的雪茄烟钱。

——卡尔·马克思^[1]

“我是脱了衣服裹着酒精压布给你写信的。前天，我第一次重新外出，也就是到大英博物馆去了一趟，不过我还不能写东西。昨天又长了一些痛。”^[2]这是马克思在1868年初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的话。他大概从拿到印好的《资本论》时开始生病，到这时已经4个月。他说，腰上又长了痛，腋下有“还没完全开放的蓓蕾”，左肩胛骨上长了个“怪物”。“看来，这个臭玩意儿老是没完没了。”^[3]此外，还出了新问题：剧烈的头痛和“全身，也就是血液里，像针刺似的发痒”。^[4]他的结论是要想保持健康，没钱是不行的，“像我这样穷得跟教堂里的老鼠似的，是不行的”。^[5]后来他又说：“我母亲说得对极了：‘小卡尔要是能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该多好啊。’”^{① [6]}

如果说马克思这样的身体状况是对他的著作遇冷的一种反应，那么燕妮却已经崩溃了。她把《资本论》当作生活的支撑，希望它能够实现盼望的结果——改变德国、改变世界、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现在，

① 相比，查尔斯·狄更斯仅1868年一年收入便有33000英镑。

书出版了，却无人关注，她回想过往的生活，不禁要问自己这样的牺牲到底值不值得：失去穆希，数年的穷困和病痛，女儿们未来可能因为父母的过往陷入困境。燕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表明她放弃过丈夫脑中盘旋的思想，但随着《资本论》继续遭受沉默的对待，她向库格曼承认说：

“最近一个时期，又遗憾地感到自己失去了不少‘信心’和活力。”⁽⁷⁾她很快就要 54 岁，给马克思做了半辈子的妻子之后，她感到了疲惫。当她知道欧内斯蒂内·李卜克内西的丈夫威廉在普鲁士被捕后，甚至仍然觉得她的状况比自己要好。“说实话，生活中比这更加让人痛苦的挣扎和苦难还有很多，”她写信给欧内斯蒂内说，“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在这样危机的关头，朋友们和党内同志给予被抓的人的妻子和孩子们的帮助，比他没被抓的时候还要多。”⁽⁸⁾

她的心情悲伤、阴郁，开始在女儿们和丈夫面前发火。她继续在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朋友面前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但变得更加独立，她尽可能独自出去旅行，更多地与“世俗的”密友们自由地交流。她爱自己的丈夫，正如她对库格曼所说，她把自己当作党的老兵，但她好像终于要脱离丈夫的阴影，寻找自由。

按照与迈斯纳的约定，马克思应该尽快去写《资本论》的第二卷。但由于病痛和第一卷带来的焦躁，他没能取得任何进展。相反，他一直在盯着有没有报纸提到自己的书，因此在 1 月中旬知道《星期六评论》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书的短评后，他极为兴奋。这篇短评是这样写的：“虽然我们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危险的，但仍然不能不承认他的逻辑严密，文字有力，他甚至使最枯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⁹⁾但这无法掩盖《资本论》受到的忽视。对马克思和家人来说，好在还有一些私人和政治事件能够让他们转移注意，不至一直沉浸在失望中。⁽¹⁰⁾其中，爱尔兰问题吸引着马克思一家（尤其是女儿们）数年。

爱尔兰的悲剧已有数百年之久，但在 1801 年达到了一个高点，当时爱尔兰受到美国和法国革命激励，发动起义，但在与英国的战争中战败，被并入英国。拥有 500 年历史的爱尔兰议会被解散，少数议员被并入伦敦威斯敏斯特议会，爱尔兰国教也被并入英国。19 世纪 40 年代马铃薯枯萎导致饥荒爆发，数百万爱尔兰人死去或逃离。这次危机的原因部分被归结为英国地主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只能在小块土地上耕

种马铃薯，还有部分原因被归结为英国政府在饥荒爆发后任由地主不管挨饿的农民的死活，把爱尔兰土地上产出的玉米和小麦出口到利润更高的外国市场。爱尔兰人牢牢记住了英国的罪行，他们知道很多英国议员在爱尔兰的灾难中获益。

饥荒永远地改变了爱尔兰，农民住在杂草和泥泞里，很多曾经生机勃勃的社区已经消失，大片富庶的土地荒废着。膨胀的人口令英国政府更多的土地饲养牲畜，见到如此大片的草场它便在 1849 年颁布法案：如果土地主人破产或无力经营，政府有权将土地收回合并。这使更多的爱尔兰人离开土地，失去工作，因为原本用于耕种的土地现在变成了牧场。⁽¹¹⁾ 马克思说从 1855 年到 1866 年，大约 100 万爱尔兰人把土地让给了 1000 万头牛、猪和羊，他认为，英国政府的目的是把爱尔兰人赶出爱尔兰，把这片土地变成英国的农业区。⁽¹²⁾

19 世纪 50 年代，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成立了爱尔兰共和兄弟会，通常称为芬尼亚会，他们计划发动武装起义，把英国人赶出爱尔兰。19 世纪 60 年代，会中很多成员通过参加美国内战，积累了战斗经验，他们潜回爱尔兰后，发动当地居民，发给他们武器，把他们组织成一支起义大军。不过数年，芬尼亚会在爱尔兰便拥有了大约 10 万名追随者。⁽¹³⁾ 据估计，在爱尔兰人聚集的曼彻斯特和周围地区，每 6 个人当中就有 1 名芬尼亚会成员或支持者。⁽¹⁴⁾

1867 年 9 月，两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爱尔兰人在曼彻斯特因为游荡罪被捕。就在这两个人即将被释放时，警察发现他们是芬尼亚会的重要成员。其中一个托马斯·凯利上校，年初他在爱尔兰领导过一次失败的起义，来英国的目的是管理这里的芬尼亚会成员。另一个是他的助手迈克尔·迪西上尉。他们的被捕在英国安全部队中间引起轰动，让英国人极为兴奋，也在曼彻斯特的爱尔兰人同样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他们马上开始想办法进行营救。⁽¹⁵⁾

恩格斯的“妻子”莉齐参与谋划了营救行动。⁽¹⁶⁾ 9 月 18 日，押送凯利和迪西的警察篷车经过曼彻斯特铁路拱门时，遭到袭击。当时正是早上，7 名警察面对 30 到 40 名爱尔兰人，他们大多拿着一些简陋的武器，但也有人拿手枪。袭击者首先打倒了拉车的马，然后冲向篷车，救出里了面的同胞。混乱中，又有很多人开枪，一名警察和一个旁观者被

杀。增援的警察包围了整片区域，迅速逮捕了在场的 20 多名爱尔兰人，但迪西和凯利在地下支持者的帮助下逃脱。⁽¹⁷⁾据说，之前热情照顾过很多逃亡的芬尼亚会成员的莉齐·白恩士把他们藏在了自己和恩格斯住的房子。⁽¹⁸⁾凯利和迪西最终逃到了美国，留下身后一片混乱。⁽¹⁹⁾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支持芬尼亚会的暴力做法，但他们坚定地站在爱尔兰人一边。⁽²⁰⁾也许是考虑到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发表声明支持爱尔兰人会导致莉齐暴露，恩格斯提醒他绝不能搞得自己好像可以对芬尼亚会的活动负责，该会的领导人都是“蠢货”和“剥削者”。⁽²¹⁾但私下里，恩格斯非常欣赏这次行动，还在事件发生 4 天后带拉法格去参观劫囚发生的地点。⁽²²⁾恩格斯写信给库格曼时大胆地说：“关于芬尼亚会成员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小突击，您大概已经听说了。事情策划得很周密，并且完成了，但遗憾的是，领导者们被捕了。”⁽²³⁾

马克思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担任在袭击现场被捕的爱尔兰人的辩护律师。26 名被告中，5 人被认定为主犯，被控谋杀。结果毫无意外：5 人全部被判有罪，并被处以死刑。每一个宣判都伴随着被告席上响起的一声呼喊，“上帝宽恕你们的灵魂”和“天佑爱尔兰”。⁽²⁴⁾但很快，5 人中的 1 人因为证据不实被赦免，其他 4 人（很多人认为同样是这次不实调查的牺牲品）成为爱尔兰人、反对派、甚至部分主流媒体的焦点。⁽²⁵⁾马克思竭力鼓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英国会员加入到支持芬尼亚会的抗议中。他说：“抛开国际公正不谈，英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个前提就是改变英国和爱尔兰目前这种强迫的联合形式，因为它等同于奴役爱尔兰，如果可能应把它改变为平等自由的同盟，如果需要应允许其彻底独立。”⁽²⁶⁾

11 月 21 日，25000 人聚集在伦敦，请求女王对被判死刑的爱尔兰人予以宽恕。但两天后，其中 3 名芬尼亚会成员被吊死。⁽²⁷⁾行刑时，曼彻斯特爱尔兰人聚集区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他们都聚集在爱尔兰天主教堂里，为绞刑架上的同胞举行葬礼。⁽²⁸⁾

代表爱尔兰威克洛郡的英国议会议员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在下议院宣称自己永远不会相信被绞死的人是杀人犯，从而引起一场骚动。这样的言论在英国议员眼里属于异端，但从索霍广场到波士顿，爱尔兰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赞扬巴涅尔身处敌域的勇气。⁽²⁹⁾恩格斯说英国

人给了爱尔兰人一直缺少的殉难者，经过这次曼彻斯特事件，“爱尔兰、英国和美国每一个爱尔兰儿童的摇篮边，都将响起歌唱这一事迹的歌声，爱尔兰妇女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出色。”⁽³⁰⁾这首歌会悲伤，但也激昂。

12月，芬尼亚会的暴力扩展到了伦敦，他们再次试图营救爱尔兰囚犯，这一次，他们在克勒肯维尔监狱的外墙上引爆了炸药，但爆炸不但没能炸毁监狱，反而炸毁了附近的房屋并炸死12人、炸伤100多人。这使整个伦敦陷入恐慌，超过15万市民自愿担任协警，保护自己的城市。爱尔兰人之前在曼彻斯特事件中赢得的同情全部葬送在了这里。⁽³¹⁾恩格斯谴责这次爆炸行为是少数狂热分子所为，这些人以为放火烧毁一些伦敦店铺就能解放爱尔兰了。⁽³²⁾

但小燕妮既认可事业，也认可方式。她为了缅怀曼彻斯特殉难者，穿上了黑衣，并用一根绿带子把她去买彩票时赢得的一枚波兰十字章戴在了脖子上。她赞成使用暴力：“纵火和子弹只要运用时机得当，将会很有效果。”⁽³³⁾她完全沉浸于爱尔兰事业，开始关注如何解放被关押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很多批评者说，这些人虽然是政治犯，拥有的权利却比杀人犯和窃贼还要少。⁽³⁴⁾恩格斯曾寄给她一份报道：一个年轻女子因为在芬尼亚会审判期间试图开枪射杀一个保护证人的警察而被判处5年苦役。⁽³⁵⁾他寄来这篇报道的原因是他是知道小燕妮对此感兴趣，还是担心她做出什么事来，所以拿这个吓她？

在所有这些政治纷争和马克思的写作停滞中，劳拉和拉法格打算择日结婚。他们好像没有理由非要经过马克思为他们规划的两年恋爱期：拉法格已经被接纳为这个家庭的一员，知道这个家庭的一切秘密，当然，经济状况除外。因此他们决定在1868年4月结婚，虽然但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简单，对马克思和燕妮来说却是难题。马克思只能向刚刚为芬尼亚会成员进行过辩护的厄内斯特·琼斯询问，如何在伦敦为劳拉和拉法格办理非宗教仪式的结婚手续。婚礼本来打算在巴黎举行，但马克思在那里需要身份证明，“这样一来，就可能惊动警察”。（法国政府仍然没有撤销对他的驱逐令，而且已经开始打压国际工人协会会员，部分原因是协会对芬尼亚会成员的支持。）燕妮则希望婚礼尽可能不要声张，免得让英国熟人议论为什么不在教堂举行婚礼。⁽³⁶⁾

琼斯两天内就回答了马克思的问题：婚礼可以在区登记官办公室举

行，带上两名或两名以上证婚人，并提前 14 天张贴结婚预告。至于燕妮的担心，恩格斯建议她“告诉庸俗的邻里们，这样做是因为劳拉信仰新教，而保尔信仰天主教”。^[37]

保尔的父亲弗朗斯瓦已经在法国办妥张贴结婚预告等必要的手续，宣布婚礼将在 4 月 1 日举行。按照拉法格的父亲的理解，这对新人的计划是到巴黎度蜜月，然后回伦敦，儿子参加完最后一门医学考试后，到巴黎参加法国的医学考试，然后去美国，住进拉法格家在新奥尔良的房产。^[38]在保尔的家人眼里，程序很明了，但马克思和燕妮仍未发布正式的结婚预告，原因是老问题：没钱。^[39]他们没钱给劳拉准备嫁妆（花费一般应该在 20 英镑左右），也没钱承担婚礼的花费。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总不能把她像个叫花子那样打发出门。”^[40]别无办法，马克思向荷兰的亲戚求助，但他的姨父已经去世，他的表亲们不愿向他提供帮助。^[41]

口袋空空的马克思一边劝说劳拉和拉法格把婚事推迟到 4 月 8 日，一边四处筹钱。他告诉库格曼说，之前 4 个月由于自己生病、处理文件、为第二卷从美国寻找材料花了太多钱，已经没钱给劳拉出嫁。库格曼听到了马克思并不隐晦的求助声，给他寄来 15 英镑。^[42]加上恩格斯的 40 英镑，马克思终于可以让劳拉体面地嫁出去，但一个新问题出现了：恩格斯说 4 月 8 日是工作日，自己无法参加。^[43]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恩格斯的缺席。拉法格本就想让他和马克思一起做证婚人。“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要让这一行为合乎社会价值，好像就必须有两个证婚人在场，”拉法格写信向恩格斯讲述自己即将迈入的婚姻。“虽然你远没有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履行这一体面而高雅的责任所需的品质，但在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场合，你是我最希望能站在我身边的人。”^[44]劳拉也恳请他到场，否则自己将“如坐针毡”。^[45]最终，马克思为照顾恩格斯的时间，将婚礼日期定为 4 月 2 日。

也许是婚礼的临近（马克思说过嫉妒拉法格娶走自己的女儿），^[46]也许是《资本论》第二卷的压力，也许是经济困境，马克思在 3 月底受到多种病症困扰：身上起了红包；大腿上长了疔，导致“走路困难”；还有一次“两眼发黑，头痛得要命，胸部闷得慌”。^[47]但在婚礼这天，马克思把疔遮住，服用了一次砒剂，穿上一件正式的黑色礼服大衣遮住

疲惫的身体。他在恩格斯的陪同下，来到圣潘克里斯注册办公室见证女儿劳拉嫁给保尔·拉法格。⁽⁴⁸⁾整个过程，马克思一直受到病痛的困扰，恩格斯身体状况却很好，他见证了他从来不肯尝试的结婚时刻。（之后，在莫丹那别墅举行的午宴上，他的笑话和调笑让年轻的新娘无法抑制泪水，离开了餐桌。）⁽⁴⁹⁾

这对新人在巴黎度蜜月时，劳拉沉醉于这个城市的种种神奇，以前，她只在很小的时候在这里短暂停留过。⁽⁵⁰⁾但她依然想念家人，每天写信回伦敦，而家人对她的想念更甚。小燕妮说，劳拉和保尔启程去法国那天：

.....

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最难受的一天。……爸爸建议大家去荒阜走一走，到山谷里去喝点茶。我们便去了，但茶喝得没一点味道，也没人有心思吃面包和黄油。……从荒阜回来，我们坐在客厅里，都想把气氛调动起来，却都像哑剧里的小丑一样，悲伤而勉强，妈妈和海伦妮忍不住，哭了出来，回到各自屋里去了。爸爸和恩格斯一起待了几个小时，我则一直让自己装作和琳娜·舍勒尔说话，问她一些根本不需要答案的问题。⁽⁵¹⁾

.....

4月11日，劳拉和拉法格到巴黎还不到一周，马克思便表现出了他如何思念自己的第一研究助手。他写信问劳拉能不能在巴黎找5个人或书店，帮自己找些目录，或和别人谈谈《资本论》。他还道歉说：“我亲爱的孩子，你也许会认为，我太喜欢书了，以致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为了书的事情还来打扰你。但是你大错特错了。我只不过是一架机器，注定要吞食这些书籍，然后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箱。”⁽⁵²⁾

劳拉和保尔在4月底回到伦敦，这对被马克思称为“形影不离的”夫妻在距离莫丹那别墅不远的樱草丘附近找了一处房子。⁽⁵³⁾5月5日马克思将度过50岁生日，他们正好来得及为他庆祝。留在曼彻斯特的

恩格斯给自己的老朋友发来祝福：“我无论如何要祝贺你的寿辰。我离这个日子，也只有短短一段时间了。二十五年前，我们曾经自豪地设想，等不到这一天到来，我们早就被砍头了，那时我们是多么富有青年人的热情啊。”^[54]

劳拉的婚礼作为马克思生命中的一个重大时刻已经过去，但他仍然无法进行第二卷的写作。5月底，他带着13岁的女儿杜西去曼彻斯特散心。只有活跃的小杜西在身边，马克思这位思维受困的天才能够得到极好的抚慰。从很小起，杜西的思维就极为敏锐。她专长的领域（年龄虽小，但这样说毫不为过）包括文学、戏剧和政治。她上学的本子封皮上写着“什锦水果冰激凌”，但里面的内容却是关于农业劳动和村落污水的剪报、她就法国历史做的笔记、以及她画的穿着婚服的新娘。^[55]8岁时，她把自己当作让法国政府颤栗的激进分子布朗基的朋友，坚定地支持波兰人在1863年反抗俄国的斗争，她还曾写信给父亲的姨父莱昂·菲利普斯说：“您觉得波兰的情况怎么样？我一直支持波兰人，他们都是勇敢的家伙。”^[56]

杜西沉浸在一家人为受压迫者而战的斗争中，又有着丰富的想象。马克思家有一个想象中的帝国，小燕妮是皇帝，杜西是她的继任者，但她需要发明一种能够用来写信的语言（虽然收信人对于书信的意思绝对一抹黑）。她假装的另一个角色叫“阿尔贝里希”——一个有时坚强、有时凶恶的矮子。

一家人好像都在鼓励她的角色，他们经常称她为“他”，一方面是因为她总喜欢扮演男性角色，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勇敢性格。^[57]马克思和燕妮肯定在她身上看到了穆希淘气的性格——她就在他死去几个月前出生，“他”这个叫法也许就是他们在悲伤和思念当中顺口叫出来的。^[58]但这个可爱的、卷曲的黑发及腰的女孩子并不是普通的一个“他”——她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小淘气鬼和坏蛋。

对杜西来说，单独跟父亲去见恩格斯算得上是一次转变之旅。他们同恩格斯、莉齐以及莉齐的7岁侄女玛丽·艾伦住在一起，杜西很快喜欢上了曼彻斯特，她自称是芬尼亚会的姐妹。这个月，爱尔兰人迈克尔·巴雷特因为克勒肯维尔爆炸案在伦敦新门监狱外被吊死，爱尔兰人的反抗情绪再次爆发。（巴雷特是最后一个在英国被公开吊死的人。）^[59]面对

爱尔兰人的愤怒，杜西把《天佑女王》进行了改写：“上帝挽救我们的绿色旗帜，保佑它永远鲜亮；上帝挽救绿色大地，让它充满胜利、和平和荣耀；上帝挽救我们的绿色旗帜，上帝挽救绿色大地。”她开始阅读《爱尔兰人》报，被卖报的人称赞为爱尔兰的真正朋友。⁽⁶⁰⁾自豪的杜西把自己在曼彻斯特的活动汇报给姐姐，后者以玩笑的口吻责怪她去参观马车袭击的现场及跑去芬尼亚会的酒馆：“你这个小反贼。没准儿哪天警察把你抓住，顺势找出恩格斯。”⁽⁶¹⁾

马克思和杜西在曼彻斯特待了两周。回到伦敦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小杜西狂热地赞美曼彻斯特的家，并且坦率地表示希望尽快回到那里去，这差点儿使我们全家都嫉妒了。”⁽⁶²⁾当小燕妮责怪杜西跑到爱尔兰人一边，不再向自己这个“皇帝”致敬时，杜西回答说：“从前我倾心于一个人，现在我倾心于一个民族。”⁽⁶³⁾但让她喜欢向北走的不只是爱尔兰人，她还非常喜欢恩格斯，像父亲多年前那样，她与恩格斯进行思想和私事上的交流。恩格斯写了6封信给她，马克思说她把信都背下来了。⁽⁶⁴⁾

杜西可能并不理解，她离开莫丹那别墅的天真愿望对马克思和燕妮而言是一种刺痛。孩子们正在一个个离开，保尔刚刚通过医学考试，已经成为皇家外科医生协会会员（被马克思称为“取得了宰杀人畜的特许权”），⁽⁶⁵⁾他和劳拉将很快搬去巴黎。⁽⁶⁶⁾小燕妮也宣布要离开。她接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但她一直瞒着父母，只向劳拉和琳蕻透露过。她肯定觉得在劳拉结婚后，自己不能再待在家里等吃等穿——劳拉的离开会时刻提醒她，她虽有野心做到一切，却实际上什么都没做成。马克思把女儿们带入了文学、政治、历史和科学的世界，却好像又指望她们安静、满足地待在家里，等着丈夫上门，把她们接走。他不能、也无法认识到女儿们想要有所作为的想法。

就小燕妮来说，他责怪她不该在她母亲身体不适时出去工作，并竭力确定女儿的这份工作没有强制性的约定。虽然对女儿决定出卖劳动的决定感到伤心，马克思还是向恩格斯展示了一个中产阶级受伤的自尊：“不管这件事使我多么难受（一个女孩子几乎要整天教小孩子）——这是用不着告诉你的——但我在提出这个保留条件以后还是同意了，首先是因为让小燕妮干点什么事情散散心，特别是让她不再总是待在家徒四

壁的家中，我认为这是有益的。我的妻子完全失去安娴和文静的性格已有好几年了——这种变化是环境造成的，然而它并不会因此而变得使人感到好受些——她常常抱怨，发脾气，心情不好，这使孩子们苦恼得要命。^[67]但是一切总归有个限度。”^①

小燕妮在1月份离家。劳拉刚刚离开不久，最喜爱的女儿又走了，马克思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杜西还在家里，她的众多小动物也还在家里跑来跑去，但没了那两个仍被他看作小女孩的女人，家里远没那么热闹了。从她们一出生起，他就带着她们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已经把她们当作了可以信任的伙伴。有她们在身边，旅程才够完整。在孩子们身边，马克思也像孩子一样爱玩（他经常说她们是自己最喜爱的玩伴）；她们走了，他也没了精神。天气也和他的心情一样阴郁：大雾笼罩着伦敦，马克思把自己关在家里，忍受着感冒和记忆的折磨。^[68]所以当他在1月1日收到拉法格从巴黎传来的喜讯——劳拉生了个儿子——马克思感到无比惊喜。他马上给恩格斯写了一封短信：“新年好！你从附上的拉法格的来信中可以看到，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外祖父的称呼。”^[69]

小家伙名叫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马克思一家人因为他的降生而热闹起来。杜西给她的猫穿上衣服，抱着它四处走，装作抱着那个“小家伙”，她还把芬尼亚会计划暂时放在一边，开始思考如何把孩子从他父母身边偷过来。小燕妮玩笑着把杜西的阴谋透漏给了劳拉，说自己听到杜西说：“要是能把小拉法格先生从那两个老家伙（保尔和劳拉）身边偷过来，变成我的……”^[70]燕妮则对于自己没有请去巴黎见证第一个外孙的出生而有些恼怒，尤其是朋友们不断问她为什么没有去巴黎（更何况还有关于孩子的浸洗仪式的问题）。^[71]

这对兴奋的年轻父母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富希特腊（在法国奥弗涅地区的方言中，有小傻瓜的意思，或者是一个不太好听的表示挫折的感叹词）。劳拉说，他长得像马克思，但不知道马克思的思想会不会让他变成又一个“费希特、康德或黑格尔”。无论如何，马克思对于又一个

① 在19世纪的英国，对于想要获得独立收入的中产阶级女性而言，家庭教师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小燕妮被雇用她的那家人当作仆人一样对待。

家庭成员的降生感到极为兴奋，更何况还是个男孩。

在 1869 年 1 月，家里比任何时候都要空，但富希特腊的出生也许预示着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将会顺利。1868 年秋天，一个好消息已经出现。马克思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鉴于您的最近一部作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极为重要，当地一位出版商（尼·波利亚科夫）愿意承担俄文版的出版工作。”《资本论》传到了俄国圣彼得堡，俄国经济学家、作家尼古拉·丹尼尔逊和两名同事想将其翻译成俄语。^[72]

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说：“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以来，我用德语、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 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国家又是俄国。”“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并不妨碍这些俄国人一旦做官就成为混蛋。”^[73]

伴随这个好消息，恩格斯也传来惊人的消息。他预期他的生意伙伴哥特弗利德·欧门会在 1869 年尝试给他一笔钱，让他退出生意，所以他需要确定拿到的这笔钱足够他和马克思支撑的时间越长越好。他在 1868 年 11 月非常突然地给马克思写信说：“亲爱的摩尔：请你尽量精确地答复下面两个问题，并且要立即答复，好让我能在星期二早上收到你的回信。（1）你需要多少钱才能还清你的全部债务，把你完全解脱出来？（2）你平时的正常开支，每年三百五十英镑是否够用（治病和意外的紧急开支除外）……如果不够，请把你需要的数额告诉我。”恩格斯解释说，他觉得能够从欧门手里拿到的数目应该足以让他在五六年里提供马克思一家所需的花费，但他需要确定他们每年的具体花费是多少。“至于五六年以后的情况将会怎样，说实话，我自己也还不知道。……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会发生许多变化，而你的写作也能给你带来一些收入。”^[74]（虽然在《资本论》出版一年半后，销售额仍不足以支付出版费用。）^[75]

在 1867 年，每年 350 英镑的收入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属于偏低的水平，但马克思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慷慨的数目，如他所说，他“十

分感动”。⁽⁷⁶⁾他和燕妮计算之后发现债务多达 210 英镑，还不包括拖欠医生的诊疗费。至于每年的花费，马克思说：“最近几年，我们的生活费都在三百五十英镑以上；但这个数目是完全够用的，因为第一，最近几年拉法格住在我们这里，因此开支大大增加；第二，由于一切都赊账，多花了好多钱。只要彻底摆脱债务，我就能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⁷⁷⁾如果把财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样的话出自根本不知道节俭为何物的朋友，恩格斯可能会觉得可笑。但这是马克思的一个承诺，他选择相信。

34 小燕妮登上舞台



人很渺小，党很盲目，他们的方法或者暴力或者无用，但在这些挫折之下，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仍不可阻挡地取得进步。

——沙尔·普罗勒斯⁽¹⁾

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已经成立4年多，力量和成员人数都已显著壮大。协会在9个国家建有分部，并掌控着国家报纸，举行过4次年度大会。但位于伦敦的总委员会从一开始便被争斗所累。委员会的每个代表团都有内部纷争，不同国家代表之间，更是因为民族倾向而相互指责——德国人权力太大，意大利人在密谋夺权，法国人喜欢残杀、英国人打算牺牲工人换取政治地位和选举胜利。马克思的职务虽然只是德国通讯书记，却是协会的大脑、心脏和灵魂。他关注所有细微的争吵，尽量从幕后解决，实在不行，则公开辩论。他的意图是在解决争斗的同时，保持协会的完整和组织的存续，即使这意味着有些人需要被牺牲。

马克思对协会的主导被他的批评者指责为独裁，有些还特意建立了对立的组织。包括维克多·雨果、路易·勃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朱塞佩·加里波第在内的知名民主派人士在1867年组建了和平与自由联盟。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成员多为自视甚高的知名人士，他们想吸引无产阶级，却没有拿出任何真正的工人纲领。⁽²⁾巴枯宁是组织的外围成员。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内容虽然不切实际、

又无主旨，却让听众疯狂，有观察者说：“如果他让自己的听众相互砍断对方的喉咙，他们也会很高兴地照做。”⁽³⁾但巴枯宁发现联盟太过温顺，因此在日内瓦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当然，加入的目的是控制协会。⁽⁴⁾他像马克思一样，无法仅仅作为一名成员，他一定要成为领袖——虽然表面上坚持推脱。就这样，巴枯宁假意忠于国际工人协会，同时却在建立一个秘密组织，伺机从马克思手中夺取领导权。

这的确是值得抢夺的，由于在几次罢工中的成功介入，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人数大为增加。1866年的经济危机重创了铁路、制造和采矿等欧洲经济核心行业，罢工随即开始。工资削减、工厂产量锐减、工时减少，使得工人无法生活。面对这一情况，协会募集罢工资金，广为宣传，更重要的是，协会把工人组织起来防止工厂管理者采用老办法从其他国家调集工贼破坏罢工。⁽⁵⁾实际上，协会的资金极为有限（1869年的收入只有大约50英镑），⁽⁶⁾负责协调的人员也极为有限。但马克思自豪地宣称（也不是没有根据），只要协会表露出介入罢工的迹象，就足以让工厂管理者回到谈判桌。⁽⁷⁾

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勉强容忍这个敌对的工人组织，直到协会对芬尼亚会成员因为曼彻斯特事件被处决表示谴责，并号召举行集会声援爱尔兰人的事业。⁽⁸⁾这样的举动受到了英国政府的谴责，巴黎会员聚集声援芬尼亚会时，法国安全部队搜查了他们的住所和办公场所，找到一些所谓的证据，将20多名会员定性为非法社团成员。⁽⁹⁾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拿破仑根本不在乎协会是否支持爱尔兰人，他不过是想向英国示好（或者如马克思绘声绘色所说：“奴颜婢膝地巴结英国政府”）。⁽¹⁰⁾1868年夏天，协会位于布鲁塞尔的一个法国分部（马克思说其成员都是“皮条客”和“暴民”）进行了一场模拟审判，宣判拿破仑死刑，这引起了法国人的警惕。虽然马克思代表伦敦总委员会公开谴责了布鲁塞尔分部的这一行为，但已于事无补，协会开始受到更多猜疑。⁽¹¹⁾

这就是劳拉和保尔回到的法国。1868年秋，他们在巴黎圣日耳曼区租下一处公寓，公寓在一幢狭窄的楼房里，下面是一条拥挤的小街，这里距医学院只有一个街区。拉法格回巴黎表面上是为了准备参加法国的医学考试，但他好像对政治更有兴趣：他马上加入了当地的国际工人协会分部，并与两年前便已认识的布朗基主义者重新取得联系。一回到

巴黎，他便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一名警察密探报告说，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6岁）大四五岁，比普通人略高，肤色偏黑，头发淡褐色。他还说拉法格流露出一种优雅感。）⁽¹²⁾

也许是出于政治原因，法国的学术官员对拉法格的英国医学证书不予认可，他被要求参加5门考试，而不是他预期的2门或者3门，才能在法国执业。⁽¹³⁾拉法格想在巴黎参加考试，但由于他之前遭到巴黎大学开除，因此必须得到教育部长和国家学术委员会批准，而这个委员会要等到12月才召集。⁽¹⁴⁾这给了他充足的时间摆脱对医学的兴趣，投身国际工人协会事务。11月，龙格被释放，很快回到拉丁区熟悉的地方，抽烟，玩骨牌——据劳拉说。⁽¹⁵⁾马克思在1848年认识的朋友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朋友有时也来看望劳拉和拉法格，他们一边顺着陡峭的楼梯爬向5楼，一边抱怨攀爬的艰难。⁽¹⁶⁾

12月底，保尔好像彻底失去了参加考试的兴趣，他和劳拉搬离医学院，在左岸谢尔什-米迪路租下一处公寓。这条街上充满热闹的巴黎生活的气息：卖面包、蔬菜和奶酪的店铺随处可见；散发出白垩粉气味的洗衣店里挤满闲聊的女人；浓浓的咖啡香味从咖啡馆里飘出。公寓虽小，也不奢华，但劳拉说正是自己喜欢的随意风格，她打算在这里开始快乐的日常家庭生活。⁽¹⁷⁾搬家的过程中，两人发现自己处在监视之下。在无法确定警察的目的之前，劳拉让姐姐小燕妮给自己写信时寄给保尔的一个亲戚桑蒂夫人，自己写给她的信则通过琳蕻转交，他们对信件的担心很快得到了验证。⁽¹⁸⁾

马克思一直与巴黎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保持通信，他们告诉他说去过拉法格和劳拉家里，奇怪的是却一直没能见到劳拉。马克思担心劳拉是不是身体不适，打算亲自去一趟巴黎。⁽¹⁹⁾（他不知道的是，劳拉生育几周前摔了一跤，到现在仍卧床不起。）⁽²⁰⁾马克思讲述拿破仑三世政变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刚刚出版第二版，他到巴黎并不安全，因此他指示劳拉和拉法格：“你们在信里丝毫不要涉及我的秘密计划。”⁽²¹⁾但一周内，就有陌生人来到他们的公寓，询问马克思先生到了没有，自己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²²⁾马克思和拉法格夫妇估计这个人应该是密探，他们的信件肯定被拦截并偷看了。马克思只得取消行程，但他依然担心劳拉的身体，打算让小燕妮和杜西代替自己去巴黎。⁽²³⁾

到1869年2月，拉法格已经回到巴黎4个月，对于参加医学考试，却仍未取得任何进展。法国学术官员本着大方的原则，同意他再参加两门课程考试，就能拿到行医执照，但必须去斯特拉斯堡考试。⁽²⁴⁾保尔对于在巴黎参加考试本就没有多大兴趣，现在又需要长途跋涉到临近德国的地方去考试，他的抵抗情绪更大。况且，他参与了一个计划，根本不能离开巴黎。他和一些布朗基主义者朋友宣布将在本月出版一份报纸，名叫《文艺复兴》，但他们拿不出政府要求办报必须缴纳的250英镑“保证金”，也没有运营资金。他们有的，只是满腔热情和布朗基的支持。⁽²⁵⁾拉法格竭力劝马克思投稿，或者担任共同编辑，⁽²⁶⁾但马克思没有同意，说自己没有时间，而且他和恩格斯都认为拉法格应该先把政治放在一边，最要紧的是成为医生。

马克思考虑的是劳拉的未来和保尔的安全，而且担心拉法格的父亲与儿子疏远。他写信给保尔说：

.....

筹划中的报纸可能会使您和您的朋友们同政府发生司法冲突。要是您的父亲知道这个报纸的编辑成员中有我，那他可能会认为是我促使您过早地从事政治活动，从而妨碍了您采取必要措施（其实我一直不断地在催促您采取这种措施）去通过医学考试和掌握您的专业。⁽²⁷⁾

.....

在写给女儿燕妮的信中，马克思说，自己也希望能帮助布朗基办报，但考虑到弗朗斯瓦·拉法格的想法，自己还是不能答应：“不管怎样，他同马克思一家结亲可没有多少理由感到高兴。”⁽²⁸⁾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马克思越来越担心保尔参与这种危险、天真的活动。布朗基已经回到巴黎，但处在躲藏之中，一天换一个地方。他开始组建十人活动小组，不同小组成员间相互不认识，以防止警察密探渗入。保尔所在的小组每周在圣路易斯岛无头女人街上的一处房子里见面，布朗基本人也经常来这里。⁽²⁹⁾布朗基半辈子被关在监狱里，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大多最终也会走到这一步。马克思打算去巴黎找自己的女婿

面谈，顺便观察一下形势。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会装作英国人前往，这样更安全。⁽³⁰⁾同时，小燕妮和杜西也会去巴黎。她们很急迫，焦虑于劳拉的状况，因为她写给小燕妮的信中流露出明显的哀伤情绪。

劳拉已经卧床3个月了，只有桑蒂陪伴，丈夫整夜待在咖啡馆里，偷偷和人谋划如何对付皇帝。⁽³¹⁾新一代反抗者与1848年时有所不同，有了女性身影出现，比路易丝·米歇尔，她总在衣服里藏一把匕首，需要的时候打扮成男人；还有波勒·曼克，她是一名报人，⁽³²⁾去拜访过劳拉和保尔，保尔也去过她家拜访。⁽³³⁾劳拉告诉小燕妮说：“你知道，图尔原来只在厨房和舞厅里才愿意听女人说话，但现在，他更愿意在阅览室见到她们。”⁽³⁴⁾这些法国女人自己挣钱，自己在社会上拼搏，相信自己与周围的男人是平等的。正如有人所说：“女人的地位并非自然低等，而是由于人为的创造和社会的制造。”⁽³⁵⁾这便是小燕妮想要成为的女性，但劳拉选择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她也逐渐意识到了在英国和在法国生活的巨大差别：在英国，她处在家庭的温暖当中；但在法国，她嫁了人，却经常独守空房。在写给小燕妮的信中，她提到法国女人觉得并不是只有丈夫才能关注自己：“相反，丈夫们有时是世界上唯一不关注她们的。法国男人好像羞于承认爱自己的妻子，法国女人则永远不会羞于承认被很多男人爱着，其中却不包括丈夫在内。”⁽³⁶⁾

小燕妮和杜西在3月23日坐船前往巴黎。到巴黎后，她们发现自己的小外甥长得非常漂亮，像他的外祖父一样有个巨大的脑门，劳拉的公寓很小，但很温馨，桑蒂夫人虽然“不好看”，却很和蔼。⁽³⁷⁾小燕妮只待到4月14日，便返回伦敦继续做家庭教师，杜西则在巴黎住了两个月。⁽³⁸⁾杜西离不开她的小外甥，还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叫施纳普斯（Schnapps，意为烈酒）——因为他太能喝（也像他外祖父一样）。⁽³⁹⁾

在伦敦，马克思家的氛围有了很大改变。考虑到退出欧门—恩格斯公司后将有一大笔钱进账，恩格斯已经开始按季度向马克思提供一笔钱。马克思的创作主要集中于以前著作的外文版或再版，比如法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俄文版《资本论》。由于第一卷没有引起多大反应（1868年6月，有英国评论指出：“我们并不指望卡尔·马克思有什么能教给我们”），马克思已经少有提到第二卷的进度（虽然他早在年前就应该已经把第二卷和第三卷书稿交给出版商）。⁽⁴⁰⁾家人好像也没有想催促他。

小燕妮写信给库格曼说：“我们流亡，我们忍受数年的孤立，这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做出的伟大牺牲，对此我并不后悔。但我不得不承认人都有其脆弱之处。对我来说，父亲的健康比《资本论》第二卷更加重要，更何况，伟大的德国民族到现在仍对第一卷无动于衷。”⁽⁴¹⁾恩格斯问到这一问题时，马克思打岔说自己正在学习俄语，以便阅读俄国关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学的新书，从而融入到下一卷当中。⁽⁴²⁾

虽然马克思仍通过文字和国际工人协会从事革命事业，莫丹那别墅却已几乎是一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模样。纠缠着他们的磨难终于消失了，家里出现了之前不敢想象的模样：稳定、舒适。小燕妮春天时写信给拉法格说，一家人那天最反叛的行为是马克思建议晚上吃一条鲜羊腿。⁽⁴³⁾的确，马克思写给待在巴黎的杜西的一封信能够充分说明他已经变得多么安静和喜欢待在家里。详细描述完各个动物的情况后，他特别讲到自己与杜西的鸟“迪基”通过音乐建立了不错的关系。⁽⁴⁴⁾5月初，燕妮把马克思抛给动物，去巴黎看望外孙，顺便接杜西回来。她走后，恩格斯邀请马克思去曼彻斯特，但马克思拒绝了，说自己已有安排。“小燕妮乐于在我妻子在巴黎短暂逗留期间，完全支配我，并使自己过得更自由一些。”⁽⁴⁵⁾

这年春天，马克思博士带着长女一起参加伦敦的社交活动。他们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小燕妮看着父亲在一次会议上，就比利时科克里尔铁厂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遭到屠杀而愤起怒斥，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⁴⁶⁾这对父女组合之后又作为“一万人上层社会”（指贵族以及文艺和政治阶层）成员盛装参加了皇家艺术与行业协会在肯新顿博物馆举行的年度晚宴。马克思凭借杰出的学术和著论成就已经入选该协会（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加入的目的是用它的图书馆）。之后，协会举办了学术座谈会，参加者多是“皇家和其他尊贵人物”，⁽⁴⁷⁾马克思和小燕妮对着请柬大笑了很久，因为上面要求参加者“帮助防止尊贵的客人受到拥挤和跟踪”。⁽⁴⁸⁾但小燕妮说，活动实际上令人厌烦。“多达七千人穿着盛装挤在一起，动也动不了，坐也坐不下，椅子本来就没有几把，相互隔得很远，也早已被一些贵妇人迅速抢到了屁股下，泰然自若地坐着。”⁽⁴⁹⁾

接下来，马克思又带着小燕妮去德国看望老朋友和新同志。去德国前，他把最小的女儿交给恩格斯照顾。⁽⁵⁰⁾杜西刚刚从巴黎回来，便又要去曼彻斯特待4个月。跟着父亲坐火车去曼彻斯特时她还只是一个14岁的女孩，但秋天回来时却已长大成人。

在莉齐·白恩士的教导下，杜西接受了关于英国不公的高等课程——不是通过书本，因为莉齐不识字，而是通过城里传诵的各种故事。莉齐带杜西去看了曼彻斯特周围被爱尔兰人视作圣地的地方：铁路拱门（现在在当地被称为芬尼亚会拱门），凯利逃亡前卖锅的市场和居住的房子，以及莉齐与另一个逃亡者迪西会面的地方。杜西写信给姐姐燕妮说：“这真的非常有趣，白恩士夫人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凯利和迪西的有趣的事情，她跟他们很熟悉，去过他们家里，每周跟他们见三四次面。”⁽⁵¹⁾恩格斯则带杜西走进了德国文学的世界。到6月，她已经能独自阅读德语原版的歌德著作以及史诗和民间故事。他们还一起读丹麦语故事。⁽⁵²⁾

但杜西对这次曼彻斯特之行记得最清楚的是恩格斯逃脱“埃及的幽囚”（马克思的描述）那天表现出的喜悦。⁽⁵³⁾1869年7月1日，恩格斯结束了自己的商业生涯。杜西数年后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他穿上高筒靴，准备出门完成最后一段商业旅程时，喊出‘今天是最后一次’时的那种喜悦。几个小时后，我们站在门口等他回来时，看到他从房子对面的一小块旷野走来，一边挥舞着一根木棍，一边唱着歌，笑容满面。我们准备庆祝一下，喝了香槟，大家都非常开心。”⁽⁵⁴⁾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好啊！从今天起再不搞可爱的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今天早晨，杜西和我在田野里长时间地散步，以庆祝我这第一个自由的日子。”⁽⁵⁵⁾

恩格斯口袋里装着大概12500英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万美元）⁽⁵⁶⁾离开了欧门—恩格斯公司。他告诉母亲自己是一个全新的人了：

.....

今天早晨，我没有到那阴郁的城市里去，而是趁天气晴朗在田野里漫步了几个小时。我的房间布置得很舒适，可以打开窗户，不必担心到处都是煤烟尘垢了，窗台上摆

着花卉，屋前长着一些树木；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的写字台前，同坐在我那间只能看到天井的阴暗房间里，工作起来完全不同了。⁽⁵⁷⁾

庆祝持续了数周。恩格斯是家里唯一一个工作的，但他周围的人都表现得像获得了解放一样。恩格斯带着住在家里的女人们——莉齐、杜西、以及莉齐的侄女玛丽·艾伦——和他的狗多多慢走6英里，来到一家酒馆，结果莉齐和杜西喝了太多啤酒，只得坐火车返回。⁽⁵⁸⁾杜西描述恩格斯有一次跟工作时的同事晚上出去庆祝，回来时“醉得一塌糊涂”。恩格斯退休后数周，她们仍在庆祝。在7月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恩格斯出去参加郊游，整个下午和晚上，杜西、莉齐和女仆莎拉都在喝啤酒和波尔多酒。恩格斯回到家，发现她们“全都四脚朝天躺在地上，紧身内衣和靴子都没穿，只穿着衬裙和棉裙”。第二天，他们目睹了经过曼彻斯特的威尔士王子和王妃。杜西提前写信给姐姐燕妮说：“要是孩子们都唱‘威尔士王子被关进了贝尔维监狱；因为他抢了别人一品脱麦芽酒’该有多好玩！”⁽⁵⁹⁾这就是爱琳娜·马克思这个夏天接受的教育。

这样的教育没有在曼彻斯特结束。秋天，恩格斯突然打算带莉齐和杜西去爱尔兰。杜西喜欢所有与爱尔兰相关的东西——小说、民歌和诗歌，现在，她又亲眼看到了荒无人烟的山区，被遗弃的村落，人们居住的用泥土堆起的屋子顶上飘出的炊烟，在都柏林潮湿冷冽的寒风中光着脚、没有外套可穿的脏兮兮的儿童，以及基拉尼湖和科克。她也看到士兵骑着马在街上巡视——穿着紧身制服和高筒靴，武器在侧。恩格斯说爱尔兰处在“战时状态”：“皇家爱尔兰团的士兵挂着猎刀，有时腰插手枪，手持警棍，分成一支支的小部队在各处走来走去；在都柏林，我们看到一个骑炮连直穿市区中心而过，在英格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与英国人联合的爱尔兰统治阶级对民众感到恐惧，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组织性，但人数却大大超过被他们痛恨的地主。

回到曼彻斯特后，恩格斯开玩笑说杜西比之前更像爱尔兰人了。⁽⁶⁰⁾这次旅行的确给杜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如马克思24年前跟

恩格斯初到曼彻斯特时给他留下的印记一样。在成长过程中，杜西一直在听这样的故事，一直知道政府是专制的，人民被剥夺了权利。但她从未亲眼见到有人饿死，或者有人拿着武器、执行国家的命令杀人。她仍旧单纯、可爱，但同时对于政治事业也更成熟了。她在信件中开始更多地思考，从中可以看出，她会成为一个为了穷人而耗尽一生全部精力的女性。马克思曾说，小燕妮是几个女儿中最像他的，但这句话没说完：爱琳娜就是他。

杜西在爱尔兰期间，警戒比往日更严，这是因为英国狱警对爱尔兰政治犯的虐待导致爱尔兰人民的愤怒在积聚。1865年英国政府采取了打击报业的行动，在都柏林抓捕了《爱尔兰人报》的相关人员，包括经理奥顿诺凡·罗萨。⁽⁶¹⁾控方称，该报鼓动向穷人分配财产和杀死包括教会神职人员在内的统治阶级。共有30人被捕，有些被告按罪名应判以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但实际上被判了20年苦役。⁽⁶²⁾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有爱尔兰人因为所谓的政治罪被捕，并被处于重刑。

1869年10月24日，伦敦海德公园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赦免爱尔兰犯人。在杜西的坚持下，马克思、燕妮、小燕妮和她自己都去参加了。⁽⁶³⁾这座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巨大公园聚集了数万名身穿丧服的示威者，他们把整个公园染成了黑色。天空却是多彩的，飘扬着人们自制的绿白红三色旗子，人们扛着上面写着“不服从暴君就是对上帝尽职”和“时刻准备作战”等标语的横幅从公园一端走到另一端，还有人用棍子把红色的雅各宾帽高高举在空中。地上挤满了人，孩子们爬到树上，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大人们高唱爱尔兰民歌和《马赛曲》，大胆地向王权表示抗议。⁽⁶⁴⁾报纸选择性地忽视了这次示威，⁽⁶⁵⁾说参加者只有7万人，是一次“悲惨的失败”，马克思却说这次游行非常成功。⁽⁶⁶⁾

之前数月，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采取了一些措施安抚爱尔兰，但他的姿态无法让爱尔兰人满意，因为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公正，还有独立。⁽⁶⁷⁾海德公园示威后不到一个月，爱尔兰选民又通过选举狠狠地嘲笑了一回英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他们选举奥顿诺凡·罗萨代表蒂珀雷里地区进入英国下议院。⁽⁶⁸⁾此时，他正在英国监狱里受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的当选非常高兴，恩格斯认为这说明芬尼亚会抛弃了密谋的

做法，转而采用更加有效和革命的方法——选举，而且这个方法是合法的。^[69]小燕妮写信给库格曼说：“在奥顿诺凡当选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我们都欢喜得跳起舞来，杜西简直像疯了一样。”^[70]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相信，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会在爱尔兰开始。马克思写道：“为了加快欧洲的社会发展，必须加速官方英国的崩溃。为此就必须在爱尔兰对它进行打击，这是它的最薄弱的环节。失去爱尔兰，不列颠‘帝国’也就完蛋了，一直处于昏睡缓滞状态中的英国阶级斗争，将会激烈起来。”马克思相信，当世界上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得到了解放，其他欧洲国家会紧随其后。^[71]

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神贯注于爱尔兰时，欧洲大陆上出现了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足以持续到下个世纪的喧闹声。自1789年以来，孕育了欧洲历次重大起义的国家即将再次爆发起义，风暴的中心仍旧是巴黎。

1870年1月10日，拿破仑三世的堂弟比埃尔·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在家里枪杀了共和派报纸《马赛曲报》的一名撰稿人，他是作为要与亲王决斗的一名布朗基主义者的助手来到他家里的。这枚子弹虽然只杀死了维克多·努瓦尔一个人，却被认为是打在了愈加强大的法国左派的心脏上。^[72]在上一年5月的选举中，反对派赢得了45%的选票，30名“赤色”候选人进入立法议会。拿破仑不得不进行自由主义改革，这引起了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的担忧，在他长达将近20年的统治中，这些人一直对他忠心耿耿，但也开始担心老迈的他还能不能对付来自左派及其工人大军的进攻。^[73]

杜伊勒里宫里的拿破仑仍能找到慰藉，弄臣和依靠他施舍的人仍在向他高呼“吾皇万岁”，法国新兴权贵资本家给予他的支持仍让他享受：他允许他们建立商业帝国，他们出钱为他保住皇位。拿破仑统治期间推行的政策无疑让巴黎更加壮丽，让法国更加富有。但长久以来的社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甚至在有些方面更加严重。在他那个奢侈的小圈子之外，不满的情绪在累计。^[74]第二帝国统治期间，工资增长高达30%，但生活花费的增长达到了50%。^[75]面对无法满足生存所需、却要搭上健康甚至生命的工资，工人们逐渐有了勇气，组织起来进行罢工。罢工没有局限于巴黎，但首都人口最多，自然依旧是反抗的中心。1869年，

自发的抗议开始在全城出现。男男女女聚集在广场或林荫大道上，警察出动，逮捕了抗议者，但第二天晚上，又会有新的抗议者站出来。⁽⁷⁶⁾

1月12日，维克多·努瓦尔的葬礼触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大约20万民众聚集在香榭丽舍大道，在哀悼努瓦尔的同时向拿破仑发出抗议。⁽⁷⁷⁾拉法格回巴黎后对他帮助极大的革命者路易丝·米歇尔说：“参加葬礼的所有人几乎都只有一个想法：要么实现共和之后回家，要么就不回家了。”⁽⁷⁸⁾政府对麻烦早有预料：他们部署了6万名士兵随时准备进行镇压。但民众没有起义，即便他们有这样的冲动。他们已经更加冷静，知道起义只会遭到屠杀，新一代法国激进分子已经吸取1848年的教训。

我们无法确定拉法格是否参加了努瓦尔的葬礼——他正忙于私事。1月1日，劳拉早产下一个女孩，起名叫燕妮。琳蘅从劳拉的来信中得知情况后非常担心，寄了些钱给拉法格夫妇，让他们好好护理婴儿。但保尔相信婴儿是健康的，没有请奶妈，他说，小燕妮如果不肯喝牛奶（当时被用作人奶的替代品），就再从伦敦请奶妈来。⁽⁷⁹⁾

此时，也许马克思觉得拉法格被家庭事务缠身、无法参加政治活动是件好事。去年夏天，拉法格的父亲写信给马克思说担心儿子丢弃了学业，这让马克思极为担心，只得匿名偷偷去巴黎待了几天。但保尔告诉他，自己无法参加考试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劳拉的健康，他答应秋季时参加考试。⁽⁸⁰⁾到来年2月，保尔仍没有参加考试，但他已经不能将原因归咎于劳拉或是革命激情的吸引。拉法格无疑是关心劳拉的，但不论他对马克思做了什么许诺，他显然已经把政治当作了自己的情人。

努瓦尔葬礼几周后，《马赛曲报》编辑亨利·德·罗什弗尔因为在一篇谈论努瓦尔被杀的文章中，号召起义推翻帝国而在巴黎被捕。⁽⁸¹⁾罗什弗尔的一名保护者是知名共和主义者古斯塔夫·弗路朗斯。弗路朗斯总是激情——有人会说鲁莽地保护他认为受到冤枉的人，罗什弗尔被捕后，他马上宣布革命。罗什弗尔被抓时，弗路朗斯正在与他会面，他扣住了当时在场的警察长官，纠集60个人装作民兵部队，他们来到巴黎工人阶级和激进分子聚集的贝尔维尔，在这里打算抢夺政府武器，发动起义。⁽⁸²⁾但起义遭受了可悲的失败：早上，弗路朗斯喊出“拿起武器”

后，却发现身边只剩下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弗路朗斯在巴黎躲藏了1个多月后逃去荷兰，后来到了伦敦。3月到伦敦后，他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并走进了马克思家。⁽⁸³⁾（这期间，陪审法庭宣布波拿巴对努瓦尔的死并无责任。）

罗什弗尔和龙格是朋友，两人几年前便在圣佩拉热监狱见过面。那时监狱里专门有一座房子用于关押未经审判的政治犯，此外龙格也曾为《马赛曲报》撰稿。拉法格与被囚的编辑虽然没有任何私人或业务上的联系，但他想在罗什弗尔被关押期间，把《马赛曲报》掌握在手中。拉法格在这一点上与年轻的马克思有相似之处，他觉得自己只要有一份报纸发表观点便足矣。保尔的这一尝试肯定被该报当作了滑稽之举——毕竟，他连一个职业报人都还算不上。他自荐后，该报出于礼貌没有退回来，却也没有给他任何回复。最终，他连文章都无法在《马赛曲报》上发表。⁽⁸⁴⁾但马克思家另一名成员的运气要好一些。

2月底，马克思发现英国报纸未能公正地报道关于被关押在英国的爱尔兰政治犯的情况，因此写信给布鲁塞尔的年轻国际工人协会伙伴塞扎尔·德·巴普，就他的报纸应该刊登的关于爱尔兰政治犯的文章提出一些建议。⁽⁸⁵⁾德·巴普把马克思的这封信分两次、一字未改地进行了刊登。⁽⁸⁶⁾马克思在信中控诉了“资产阶级自由之地”的暴行。也许是未曾料想到这封信会被刊登，马克思在信中没有采用通常的精美文字，而是使用了很多短句，反而使得效果更加出色。他详细列举了爱尔兰政治犯遭受的虐待：医生和《爱尔兰人报》副编辑丹尼斯·道林·墨尔凯希“脖子被套上铁链去拉装满石头的马车”；《爱尔兰人报》出版人奥顿诺凡·罗萨“被关在黑漆漆的地牢里长达35天，双手始终被反绑在背后”；《爱尔兰人报》编辑查尔斯·基卡姆右手脓肿无法挪动，便被强迫用左手砸砖石，每餐只有6盎司面包和热水；一个姓墨菲的六七十岁的老人（被称作奥利里）3个星期以来只靠面包和白水过活，因为他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即使受到逼迫，也不肯信仰宗教。虐待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一名爱尔兰囚犯被折磨致死。马克思还说，有人关注过囚犯受到的对待，但探监的要求被一律拒绝了。⁽⁸⁷⁾

马克思家不只有他一个人在呼吁：小燕妮对于《马赛曲报》支持英

国报纸对于是否将爱尔兰犯人视为政治殉难者持谨慎态度而极为愤怒，她在2月27日写了一篇文章（署名“燕·威廉斯”）给这家法国报纸。《马赛曲报》在3月1日刊登了文章，并邀请她再写一些。^[88]小燕妮开始了双重生活：白天是家庭教师，夜里是爱尔兰犯人的保护者。^[89]她感到极为高兴，不仅因为文章发表了，还因为自己有机会用文字对抗不公。之前，她一直期盼着父亲的文字产生巨大的影响，现在，她有机会看一看自己的文字的力量。

小燕妮的第一篇文章结尾非常尖锐：“在仁爱的英国监狱里，已有二十名芬尼亚会成员死亡或发疯。”她的下一篇文章更加大胆，指责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为了掩盖政府罪行而撒谎。^[90]她引述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作为证据，这封信用铅笔头写在厕纸上，之后被偷偷传出监狱。^[91]（已经成为马克思家的常客 of 弗路朗斯把这封信翻译成了法语，小燕妮把全文放进了文章。）^[92]罗萨在信中描述说，自己被像动物一样对待，只能趴在地上吃东西，脖子上还被套上绳索拉车。不断遭受毒打，加上食不果腹，他眼睁睁看着狱友一个个死去。“我不因我的统治者惩罚我而诉苦，我会忍受，但我要说：我有权用书信将我所受的非法扣留及虐待以大白于天下。……如果我死在狱中，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请千万别相信这些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信尾署名是：“政治苦役犯——奥顿诺凡·罗萨。”^[93]

这封信引起一场骚动，它像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奥顿诺凡·罗萨好像是从坟墓中爬出来，控诉谋杀他的人。《马赛曲报》迅速推出一期特别版，专门刊登关于政治犯的文章，小燕妮的这篇报道迅速传到布鲁塞尔、柏林、都柏林、以至美国。几天内，从曼彻斯特到伦敦，《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旗帜报》等英国报纸均进行了转载。^[94]3月16日，伦敦《每日新闻》刊登了英国内政大臣的一篇回应，否认奥顿诺凡·罗萨的指控，但承认给他戴上铁链。^[95]这给了“燕·威廉斯”素材再为《马赛曲报》写一篇文章——这篇由小燕妮和马克思合写。^[96]

马克思对女儿取得的成就感到极为自豪。她的文章促使议会要求政府对爱尔兰囚犯受到的对待进行彻底公开的调查。她的最终目的是让这些人获得自由，同时，她不断写文章，让民众保持对这一事件的关注，

以提高他们在狱中的待遇。马克思认为，她粉碎了所谓自由派政府比反动政府更加关注人权这一幻象。这期间，他在每封信中都提到女儿的文章，也不管收信的人感不感兴趣。恩格斯也极为得意。^[97]他写信给马克思说：“燕妮可以欢呼：全线胜利！没有她，‘可敬’的格莱斯顿绝不会同意进行新的调查。”^[98]

这年春天，小燕妮的世界扩大了。她的文章虽是匿名发表，但马克思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她就是作者（奥顿诺凡·罗萨的妻子玛丽开始时以为燕·威廉斯是个男人，所以一直都很友好，当她发现这位作者是个女人后，嫉妒之心超过了感恩之心）。^[99]小燕妮开始以作家燕妮·马克思的身份，而非卡尔·马克思的女儿的身份受到邀请。3月底，她受到一名意大利富商的妻子的邀请，参加一个英国名流聚集的社交晚会，朗诵了莎士比亚的剧本。据她喜不自禁的父亲说，晚会“非常成功”。她甚至重新开始学习歌唱，目光又瞄向了舞台。^[100]

小燕妮也引起了弗路朗斯的注意。32岁的弗路朗斯肩膀宽阔、头发金黄、胡须浓密，碧蓝的眼睛极为有神。他在很多方面很像1848年那一代人——激情的浪漫主义者，统治阶级的死敌。他的父亲是法国贵族和巴黎科学院成员，他本人学习过自然科学，写过一本关于人类学的著作，但他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更加远大的事业，成了自由的斗士。弗路朗斯体魄强健，但待在马克思家里时，举止温和、细致，而且风趣。^[101]马克思家的女人们都很喜欢他。小燕妮尤甚，称他“把学者和实干家非凡地结合于一身”。^[102]他们一起为爱尔兰囚犯代言，同时盯着法国——拿破仑想要恢复权威的努力好像正在导致相反的结果。

法国将在1870年5月8日举行公投，届时人们将投票决定是否修改宪法，让拿破仑可以越过国民议会直接修改法律。在拿破仑看来，公投的语言设计巧妙，措辞模糊，无论民众如何投票，他都能取得胜利。但他自以为聪明的举措在批评者眼里不过是一个不断失去权力的君主，^[103]为了骗取民众的支持而采取的绝望的手段。^①国际工人协会

^① 通过措辞，投票人如果反对拿破仑扩张作为皇帝的权力，同时也将反对立法议员提出的民主改革，而投票人如果投票授予拿破仑更多权力，则说明他的统治是正当的，有利于他获得更多支持。

会员在4月底举行的一次多达1200人参加的会议上，揭露了皇帝的这一花招，号召民众抵制这一虚假的公投。⁽¹⁰⁴⁾结果，法国安全部队袭击了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里昂、鲁昂、马赛和布列斯特的办事处，借口是协会是非法秘密组织，其成员密谋刺杀拿破仑。⁽¹⁰⁵⁾

此时，平日总是向马克思汇报法国情况的拉法格和劳拉却很安静，原因是悲伤的：2月末，他们的女儿小燕妮死了。⁽¹⁰⁶⁾劳拉说，自己在悲痛的打击下，拿不起笔来。⁽¹⁰⁷⁾马克思知道后，想安慰她，却又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言语都没有意义：“我自己为这种损失忍受的痛苦够多了，因此我深深同情你们。但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我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好听的老生常谈和宽慰话只能加重真正的痛苦。”⁽¹⁰⁸⁾

劳拉承受这一巨大的损失时，正是马克思一家刚刚要为小燕妮的成功而欢呼时，这可能让拉法格夫妇更加痛苦，因为发表她文章的报纸连保尔的一篇文章都不肯刊登。但表面上，拉法格没有受到影响，而是开始写文章批判被他和马克思认作是空想民主主义者和急于出名的资产阶级，维克多·雨果。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拉法格无意完成学业，而且这与劳拉的健康无关。⁽¹⁰⁹⁾马克思写信告诉女婿说，自己虽不强求，但觉得保尔应该给他的父亲一个解释。⁽¹¹⁰⁾但拉法格担心与父亲爆发冲突，觉得这件事由马克思来说比较好。⁽¹¹¹⁾

对于保尔放弃从医的决定，马克思一家不可能感到欢喜。燕妮和马克思同意劳拉嫁给拉法格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觉得他在经济上能够独立，职业体面，有前途。但他现在决定要从事政治和写作了，而且在这两个方面都尚未表现出任何才能。劳拉肯定也感受到了压力，母亲经受的苦难让她知道成为一个卓越的革命思想家的妻子意味着什么，她肯定对未来感到担心，害怕将来的生活空有意义，却黯淡无光。在写给姐姐燕妮的信中，她说自己被“关进了新的监狱”。⁽¹¹²⁾

5月1日，小燕妮度过了26岁生日，礼物很丰富：成果丰硕和最为成功的一年，和一个生日晚会。弗路朗斯也受到了邀请，除了赢得房子里的女人们的喜欢，他还获得了男主人的青睐。马克思向恩格斯描述他时说：“他充满幻想和对革命的热情，但仍不失为一个很有生气的青年，绝非‘一本正经’的学究之辈。”在马克思看来，弗路朗斯最大的

特点是大无畏精神，同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巴黎大学讲过学，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马克思推荐他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希望他在伦敦多待一阵——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也有为小燕妮考虑之意。⁽¹¹³⁾

弗路朗斯参加晚会时才接到消息，知道自己牵扯进了针对拿破仑的密谋。由于担心法国政府会要求引渡他，晚会的气氛从欢乐变为担忧。小燕妮说，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据对他不利，“我们尚不清楚详细情况，但弗路朗斯应该不会被马上逮捕”。情形与1848年有几分相似，当时燕妮对于比利时政府居然担心马克思购买武器武装工人感到极为诧异。小燕妮说弗路朗斯即便真的“向巴黎寄钱以便在起义爆发时用炸弹武装人民……这也并不能说明他和刺杀皇帝的图谋有任何关系”。生日庆祝暂时放下，小燕妮、弗路朗斯和其他参加晚会的人离开了马克思家，他们走到荒阜，想理一理这个突发情况。⁽¹¹⁴⁾

随着消息传开，协会中的英国会员开始放出风声，说下一次协会会议上，弗路朗斯会被扣押，协会会员也会被逮捕。马克思研究了之前多起外国人被牵扯进他国案件的情况，得出结论，弗路朗斯在正常情况下无需担心英国政府。但这次不是正常情况，英国政府还在为虐待爱尔兰囚犯的问题遭受法国反对派报纸的狂轰滥炸，他们也许会考虑把这个共和主义者送回巴黎。逮捕的流言越传越盛，以至于一些记者已经提前准备好目击警察对国际工人协会会议进行突袭，但现实让他们失望了。⁽¹¹⁵⁾

在挑战面前退缩并非弗路朗斯所愿，所以他在被正式确定为密谋的嫌疑犯后3天，便返回法国，消失在了巴黎的反对派地下世界。⁽¹¹⁶⁾小燕妮很快放弃了对爱尔兰的强烈“忠诚”，她母亲说她从那时起“完全变成了‘法国人’”。⁽¹¹⁷⁾

有了新鲜的血液加入（包括马克思的女儿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开始相互通信中把自己称为党的老人。马克思甚至开始自称“老尼克”，因为他的黑胡子已经开始变白。他们这一代人正在凋零，越来越多的伙伴死去——维尔特、魏德迈、拉萨尔和鲁普斯。最近，又加上了沙佩尔，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因为是否立刻发动革命问题与马克思发生分歧。马克思去病床前看了他，他们把认识的人的情况告诉了彼

此，谈论他们躲过的一次次圈套——但最后一个，谁也无法躲掉。沙佩尔为了不让妻子伤心，用法语对马克思说：“我很快就要做一个新鬼了。”他在第二天死去。^[118]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4 年起便是最亲密的朋友，但从 1850 年开始，他们的友情主要依靠书信保持。1870 年，恩格斯打算结束这种情况：他宣布要搬回伦敦。^[119]马克思不是唯一一个对此感到高兴的。多年来，燕妮一直告诉恩格斯，他住得那么远实在遗憾，自己一个人很难约束马克思，她对“恩格斯夫人”也有了不同的态度。她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玛丽·白恩士（至少现存的没有），但对莉齐的态度好像完全不同。7 月，她告诉恩格斯和莉齐，自己帮他们在摄政公园路 122 号找到了一处房子，距离莫丹那别墅只有大约 10 分钟路程。她说：“您知道，她到我们家来，我们全家将由衷地感到高兴。”^[120]

35 普法战争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法国与普鲁士之间的紧张局势自 1815 年来便不断升温，随着两国不断寻找盟友，巩固阵地，升级战备，到 60 年代两国关系更加恶化。1870 年 7 月，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老迈而又失势的拿破仑，需要一场痛快的军事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俾斯麦则希望通过战争达到一直追寻的两个目标：普鲁士人凌驾于欧洲大陆之上；以柏林为权力中心实现德国统一。

奇怪的是，导致战争的原因来自西班牙。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在 1868 年被军队推翻后，逃到法国，留下了一个空壳王室。新上台的亲普鲁士军方首领从马德里写信给俾斯麦，希望由威廉国王霍亨索伦这一脉的成员成为西班牙的新国王。法国自然不能忍受腹背受敌，因此宣战。

这对拿破仑而言是一个危险的决定，他已经无法让人民像他希望的那样投票，现在却又需要他们为他战斗。但这次他赌对了：法国人站在

在了皇帝这边。巴黎民众如浪潮般聚集在林荫大道上，他们一边高呼“八天占领柏林”，一边高唱《马赛曲》。⁽²⁾拿破仑的宫廷也欢声一片。经过十多年的相对平静，宫廷已经变得迟缓，朝臣们相信战争能让它再次焕发青春——至少让62岁的皇帝焕发了青春。⁽³⁾大军在握的拿破仑动员说：“法国人民们！在人的一生中，会有庄严的时刻出现，那时，国家的荣誉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主导所有利益，决定国家的命运。这样决定性的时刻在法国出现了。”拿破仑三世从圣克卢城堡出发，在大批随从的簇拥下（如移动的村落般），骑马向东与普鲁士作战。⁽⁴⁾

马克思一家被这样的变化惊呆了。“我们还没有从时局变化引起的惊讶和愤怒中恢复平静。有人认为，法国人不是为推翻帝国而斗争，而是要为它的扩张牺牲自己，不是去绞死波拿巴，而是要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小燕妮写信给库格曼说，“几个月以前，当革命在巴黎看来就要成为事实的时候，谁能料到有这种事呢？”⁽⁵⁾

面对战争的爆发，欧洲反对派一片混乱；派别太多，大家各执己见。更糟糕的是，所有派别的领袖都以自我为中心，表面上说愿意为了更大的事业奉献一切，实际上却在计算如何能确保自己在拿破仑倒台后成为新的共和国领袖。左派力量——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在政府的骚扰下受到极大削弱。在夏天根据虚构的密谋进行的虚假审判中，72名被控企图刺杀拿破仑的被告大多被判处5到20年苦役，其中就包括弗路朗斯。⁽⁶⁾

马克思对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进行分析之后，认为普鲁士在普法争斗中获胜将更为有利。德国有两个主要的工人政党：拉萨尔留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后者的领袖是奥古斯特·倍倍尔和马克思的朋友威廉·李卜克内西。该党拥有15万名成员，采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⁷⁾马克思写道：“只要把1866年以来两国的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⁸⁾当然，这是从政治方面说。在个人方面，马克思希望普鲁士获胜后，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能够战胜在法国十分盛行的蒲鲁东主义。

但不论他期待哪种结果，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坚持要求协会会员不加入任何一方的军队。协会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工人不应为国王战斗。法国工人最先伸出和平之手。7月12日，在战争已经势不可避免

时，他们还是在共和派周报《觉醒报》上写道：“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荒谬绝伦的犯罪行为。……德国弟兄们！我们彼此分裂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并保证忠于牢不可破的团结。”⁽⁹⁾德国工人迅速回应，向法国工人发出三次信息：一次通过德国报纸，两次通过法国反对派报纸。国际工人协会柏林分部写道：“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奋斗的共同事业。”⁽¹⁰⁾

战争爆发第一天，马克思代表伦敦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宣布“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¹¹⁾协会将《宣言》编为小册子出版，在英国再版印刷后，因其和平主义立场得到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伦敦贵格和平协会的高度赞扬。在后者的捐助下，小册子的法语和德语版本又印了3万册，从而使得这本反战宣言成为马克思到这时为止发行量最大的著作。⁽¹²⁾

恩格斯则从坐在书桌前进行分析的角度，彻底地享受这场战争。他在为伦敦受众甚广的报纸《派尔—麦尔新闻》撰写关于战事进程的系列文章。最开始的约定是每周两篇，但他的《战争短评》分析到位，预测准确，报纸编辑让他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多多益善。最终，恩格斯写了59篇，前3篇署名“Z”，其他的没有署名。⁽¹³⁾他自豪地抗议说自己的文章被英国其他报纸剽窃了。⁽¹⁴⁾

恩格斯从内心和经验上说，都只是一名炮兵，但由于这些军事文章的成功，小燕妮给他抬高了几个等级，开始称呼他“将军”。从这时起，马克思一家和他们周围的人都开始这样称呼他。⁽¹⁵⁾

8月2日，法军在德国边境小城萨尔布吕肯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首次遭受失利，两天后，又在阿尔萨斯地区维桑堡遭受一连串失利。⁽¹⁶⁾可笑的是，传回巴黎的却是捷报：法军连战连胜，俘虏了一名普鲁士亲王。股票飞涨4%，众多投资者从虚幻中挣得大笔钞票。到8月9日，法军在6天内接连3次战败，法国人开始考虑如果皇帝战败，国家的政治未来该如何。⁽¹⁷⁾

马克思担心，法国反对派会把这当作宣布革命的好时机。革命在条件具备时都是危险的，而在反对势力尚未实现联合、国家又处于战争时，将是灾难性的。⁽¹⁸⁾实际上，8月9日，民众已经聚集在协和广场，翘首以待共和国的成立。但左派过于分裂，未能宣布建立共和国，民众只能各自回家，担心着巴黎没有一个能够保护它的政府，也许会被普鲁士军队攻占。⁽¹⁹⁾

8月11日，巴黎施行戒严：普鲁士人已经踏上法国领土。⁽²⁰⁾6月时，劳拉和拉法格搬到了巴黎市郊的勒瓦卢瓦－佩雷镇，但没过几个星期，便被告知需要搬走，因为这里距离防御工事很近，为增加防御能力，房子可能需要拆掉。他们答应伦敦的亲人，会回保尔的父母家里躲避战争，但到8月底，他们仍然没有搬走。实际上，拉法格在考虑搬回巴黎。⁽²¹⁾他经常回市里，知道那里的混乱状况，但还是打算带着劳拉和施纳普斯先留下看看。马克思对拉法格的犹豫极为恼怒，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些傻瓜始终迟迟不返回波尔多。”⁽²²⁾9月2日，他们终于离开勒瓦卢瓦，跟着大批民众向南走，远离前线 and 巴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有多幸运。同一天，法国战败。超过10万法军被俘，皇帝也在其中，拿破仑投降了。⁽²³⁾

9月3日半夜，这一消息传到巴黎。消息传开后，民众涌出家门，聚集在大道上，在恐惧和绝望中喊叫着。⁽²⁴⁾9月4日，星期日，政治领袖聚集到一起，讨论是否正式终止拿破仑的统治，继续与普鲁士作战，成立临时国防政府。问题的关键是军队对此是否会给予支持。

答案很快揭晓，全副武装的国民卫队和机动卫队列队向位于塞纳河左岸距离协和广场不远的国民议会所在地波旁宫进发。随着部队走近，周围的民众发现所有士兵都枪头朝下，有的还在步枪上别着的小绿枝：他们不反对成立新政府。带着1848年时的喜悦，有人大喊“去市政厅！”⁽²⁵⁾民众蜂拥来到市政厅，老一辈煽动者莱昂·甘必大爬上窗台，宣布法国成立共和国。下面聚集的30万人高声回应。接下来，6万民众来到拿破仑的宫廷杜伊勒里宫，降下帝旗。⁽²⁶⁾皇后尤金妮亚已经逃走，正在坐帆船去英国的路上。⁽²⁷⁾居住在巴黎的数万德国人或已逃离，或者准备逃离。火车站，满是急迫想要坐上火车离开的人，他们担心很快被当作敌人。⁽²⁸⁾

虽然巴黎恐惧遍城，却没有出现暴力。巴黎有 30 万法国士兵驻防，但他们主要忙着泡在咖啡馆里和吸引女人，他们没有校准步枪，反而经常一边喝酒抽烟一边在林荫大道上闲逛。^{〔29〕}美国驻法国大使 E.B. 沃什伯恩说：“在星期日短短几个小时里，我目睹了一个王朝的倒塌和一个共和国的成立，此间没有流一滴血。”^{〔30〕}

星期日，《法兰西帝国政府公报》出版。星期一，报纸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31〕}这也许是最后一刻的有序过渡，暴风雨总是在平静之后到来。

9月5日星期日凌晨4点，马克思接到龙格传来的电报：“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通知德国的共和运动。”^{〔32〕}马克思照做之后，开始组织国际工人协会英国会员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英国承认法兰西共和国。9月6日，协会的法国会员开始从伦敦返回巴黎，目标是破坏新成立的国防政府，让自己的人进入领导层。马克思说，这是纯粹愚蠢的行为，并对拉法格回到波尔多感到欣慰，因为他若没有离开巴黎，肯定会卷入其中。^{〔33〕}实际上，拉法格正急着想要回到巴黎。他的朋友都在那里，他自己也急迫地想要加入到行动中去。但有两个原因让他无法离开：第一，劳拉怀孕了，他不能留下她一个人；第二，父亲对他决定放弃医学、一生从事激进政治和报业非常愤怒。劳拉告诉姐姐小燕妮说，他们的境况很不愉快。“保尔每次想为国际做些事，都会遭到他父亲的威吓；同时，他在巴黎的朋友肯定又在责怪他这个时候不在巴黎。”保尔尝试在波尔多创办《国防报》，但未果。“我对他做这件事挺恼火的，”劳拉说，“因为办那样一份报纸除了惹怒他父亲，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但她还是对姐姐说：“不过在这样的时刻，确实也很难指望他什么都不做。”^{〔34〕}

拿破仑三世虽然投降了，但他曾经的子民却没有。1870年9月19日，法兰西共和国士兵与普鲁士军队在巴黎城外展开第一次交锋。法军溃败，迅速撤回城内。市民随即关闭城门，以防普鲁士军队直接从城门轻松入城。

此时的巴黎，所有人都意识到首都已被外敌围困，与法国其他地区失去了联系，但人们反而进入了一种奇异的平静。城内虽有 200 万市民和数万士兵，人们感受到的却是孤单。“游玩的马车不见了，街道无人清扫，要不是最近下了一场小雨，香榭丽舍大道上的灰尘厚得把地上的

小树枝都能盖住，”美国大使沃什伯恩描述说。“城内成了一座巨大的兵营，……佩戴着各种武器、穿着各色制服的士兵随处可见。……杜伊勒里宫花园放满大炮。”⁽³⁵⁾沃什伯恩说，当时没人相信围城会持续太久。“如果有人预测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要到下一年2月最后一天才能再次打开城门，肯定会被当作疯子。”⁽³⁶⁾

共和国宣布成立后，被拿破仑关押的反对派领袖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被燕妮·马克思称为“亲爱的古斯塔夫”的弗路朗斯。⁽³⁷⁾他很快建起一支防卫队，以备在普鲁士人突破城墙后迎战。实际上，在巴黎的所有20个区，所有人都准备了武器——有的为了迎战普鲁士人，有的则在准备将来万一需要时与临时政府作战。左派和工人不相信新政府，因为其首脑是拿破仑任命的前巴黎军事指挥官路易·茹尔·特罗胥将军。⁽³⁸⁾

10月31日，令人心碎的消息传遍巴黎家家户户和法国其他各地：法国最后一支完整的武装力量在边境附近的梅斯战败，防卫布尔歇市的法军溃败，更让人震惊的是，国防政府试图与普鲁士达成停战协议。⁽³⁹⁾从巴黎到马赛，投降的屈辱让人民愤怒难抑。⁽⁴⁰⁾在瓢泼的大雨中，巴黎民众聚集到市政厅，高喊“不接受停战协议！”，随后冲进这栋只点着两盏油灯的建筑内，要求特罗胥下台，成立巴黎公社，由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维克多·雨果、布朗基和弗朗索瓦·拉斯帕伊等人在48小时内组织选举。⁽⁴¹⁾

弗路朗斯随即带着全副武装的伙伴冲进了这栋昏暗的建筑里。弗路朗斯站在一张桌子上，号召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命令扣押临时政府成员。虽然有愤怒的民众要求将他们处死，但弗路朗斯承诺保证他们的安全。很快，市政厅里挤满各色队伍，提出各色要求，可谓一片混乱。⁽⁴²⁾但民众的激情很快遭受了军事上的失利。政府军队通过密道进入大楼，逮捕了弗路朗斯的人（弗路朗斯逃掉了），特罗胥政府恢复。⁽⁴³⁾

实际上，冲进市政厅试图推翻政府的人是特罗胥最容易对付的问题，真正的麻烦是街上愤怒和失望的民众。由于补给无法进入，肉类变得极为稀缺。一开始，人们主要依靠马肉，后来开始吃骡肉。短缺的不只是食物，还有木柴——街道两侧的树木已经砍完。⁽⁴⁴⁾变化虽然是一点点发生的，但依然让人担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将更加恶劣。10月底，

各国政府意识到了法国首都的悲惨状况，与俾斯麦达成交易，让自己的国民离城。绝望的巴黎人只能默默地看着幸运的少数人坐上 26 辆马车，在军队的护送下，离开巴黎。⁽⁴⁵⁾

在伦敦，马克思家成了逃离巴黎的人的避难所。11 月时，流到莫丹那别墅门前的是一条涓涓细流——大多是通过国际工人协会而来的流亡者。但很快，细流变成了洪流。杜西说房子现在更像是旅馆。⁽⁴⁶⁾最先来到的是普鲁士人，紧随其后的是俄国人——他们大多为了防止在国内的政治压迫中再次被斩草除根而逃到法国，现在又不得不逃到了英国。⁽⁴⁷⁾马克思把语言奉为“生活战场上的武器”，⁽⁴⁸⁾他一直在学习俄语，以便能阅读俄文书籍，这时已经能自信地用俄语对话。他告诉一个朋友说，虽然自己已近 52 岁，但这番努力还是很值得。“俄国目前发生的思想运动，证明底层深处正在发生动荡。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⁴⁹⁾

进出马克思家的信件和报纸数量极其庞大，小燕妮说自己有时需要整理 100 份报纸——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瑞士的、美国的——以便让父亲随时了解法国的最新消息以及其他政府进行的干涉。⁽⁵⁰⁾马克思说，自己要到夜里 3 点才能睡觉，虽然健康处在令人厌恶的状况，但“谁能面对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而去考虑诸如此类的小事呢！”⁽⁵¹⁾留在伦敦的协会会员经常去马克思的书房讨论法国的情况。他们担心，法国极端激进分子会像拿破仑的朝臣渴望战争那样渴望革命。这些人自 1849 年来便只能靠边站，现在恐怕难以抵挡重回舞台中心的诱惑。

恩格斯已经搬到伦敦，他每天下午都会去找马克思一起走一走：或者在书房里，或者去荒阜。在书房时，两个人经常焦虑地从一角走到另一角，以至把地毯走出一个明显的“X”形。晚上，他和莉齐都会聚到马克思家。⁽⁵²⁾小燕妮说，恩格斯回来后，马克思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房子里的气氛也更欢乐了。她写信给库格曼说：“有天晚上，房子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爱国演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唱了二重唱。⁽⁵³⁾

劳拉在波尔多却是孤独和沮丧的。保尔的父亲已经病倒数月，经常在房里大发脾气，折磨着所有人。他在 11 月 18 日的死亡未能带来平静，拉法格夫人责怪保尔和劳拉导致自己失去了丈夫，对他们怀恨在心。⁽⁵⁴⁾劳拉告诉姐姐小燕妮说，有些细节太让人痛苦，无法诉诸笔端，

但她还是总结说：“我一生都未受过我这位年高德勋的婆婆所给我的这种凌辱——当然这都是在拉法格先生去世之后。”劳拉说，有一次保尔又受到她的责骂，自己帮保尔解释了一下，她便“极其无礼地”让自己闭嘴。此后，情况更加糟糕。劳拉被夹在了丈夫与婆婆的意志之战中。

战争不再局限于言语。虽然天气寒冷，拉法格夫人却不允许已经怀孕7个月的劳拉和她的儿子在休息和睡觉的房间里生火，也不允许女仆帮她们铺床。保尔又固执地不让劳拉自己动手，她和儿子只能干坐在寒冷的屋子里，直到女仆最终偷偷溜进来帮她们铺好床。劳拉说，婆婆舍不得给他们东西吃，舍不得给他们酒喝，舍不得给他们灯油点。最终，拉法格夫人在12月搬走了，同时带走了几乎所有家具陈设、床单被盖和厨房用具，留给他们一座空洞洞的屋子，不过劳拉说，自己至少获得了安宁。^[55]保尔肯定对重新获得自由感到欣喜，他不用再在愤怒的父母面前掩藏政治热情，这实在再好不过。

由于巴黎深陷围困，法国临时政府先是转移到图尔，最终到了波尔多。因此，拉法格与政府中的很多共和主义者又开始了紧密的联系，比如从巴黎乘热气球突破封锁来到这里汇报情况的甘必大。^[56]拉法格忙着参加各种会议，为自己设想的报纸寻找支持者，与协会会员和政府官员进行讨论。据劳拉说，保尔仍相信法国能击败普鲁士，挽救巴黎。^[57]

不过，恐怕只有像拉法格这样面对毫无意外的失败还保持乐观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信心。巴黎城里的冰已经有半英寸厚，炮火声日夜不断地从城外传来。有传言说，面包将开始定量分配。拉公共马车的马匹都已经被吃掉，燃料即将告罄。很多驻扎在城内的士兵已经冻死。在平时物产丰富的巴黎市场上，出现了“一般大小的猫，8法郎；……一般大小的老鼠，2法郎；长尾巴老鼠，2.5法郎”这样的广告，顾客还不少。^[58]

城外传来的消息依旧令人沮丧，军队节节败退。12月初，23000名士兵在一场战役中阵亡。与拉法格的乐观估计不同，美国大使沃什伯恩清醒地指出：“没有食物、没有马车、没有路灯，未来黯淡无比。”^[59]他写下这句话的时间是12月23日，围城第96天。^[60]

由于之前广泛宣传的团结宣言，法国和德国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受到各自政府的严密监视。很多时候，不相互残杀的誓言被看作叛逆。的确，

马克思提到，在10月31日市政厅爆发混乱之后，法国临时政府对付“赤色分子”比对付普鲁士人还要积极。^[61]巴黎有多人被捕，其中又包括弗路朗斯。^[62]在德国，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扣押。7月，国会投票为俾斯麦对法作战提供资金时，他们公开拒绝投票。11月，国会讨论增加战事资金时，他们再次表示反对，要求和平。12月中旬，国会会期结束后，他们被捕，罪名是叛逆罪。^[63]

马克思写信给李卜克内西的夫人，向她保证，党会在经济上照顾她和所有“受到迫害”的德国爱国者。^[64]恩格斯也写信表示支持，说战友们被捕的消息让自己感到震惊。这一天，恩格斯和马克思家都在庆祝：他们了解到，在小燕妮的文章的逼迫下，议会在长达8个月的对爱尔兰犯人受到的对待进行调查和讨论后，爱尔兰犯人得到了赦免。^[65]格莱斯顿说，只要这些爱尔兰人以后不再来英国，就可以出狱。奥顿诺凡·罗萨也在被释放者之列。^[66]

这样的成功，是小燕妮所不敢想象的。她的文字给活生生的人带来了自由。但奥顿诺凡·罗萨并没有感谢她的帮助，她的贡献在爱尔兰犯人的斗争史上也没有留下多少笔墨。奥顿诺凡·罗萨在自传中写道：“我在英国坐牢时，对我受到的虐待的宣传是让我能够活下来的唯一原因。当时伦敦有一位法国流亡者，叫古斯塔夫·弗路朗斯，他对我的事情投注了热情……比任何爱尔兰人投注的热情还多。……他把我的控诉翻译成法语和德语，在大陆报纸上发表。这使得英国政府极为恼怒……勉强同意进行调查。”^[67]如果说小燕妮的那些文章能让人获得自由的话，那么她最愿意给与的人除了父亲，就是弗路朗斯了。但现在他被关进监狱了，没有任何报纸的文章能让他获得自由。事实上，在这时的巴黎，没有人会关注某个人的苦难。整个城市都在遭受攻击。

1871年1月5日，普鲁士军队的炮弹落入拉丁区。^[68]到1月7日，每天有多达400枚炮弹落入城内。^[69]墙上开始出现海报：“给人民让路。给公社让路。”作为回应，特罗胥宣布：“巴黎政府永远不会投降。”^[70]

但不论特罗胥如何保证，投降正是法国官员心中所想。国防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孱弱疲惫的法国根本抵挡不住普鲁士的进攻。1月18日，两件大事使得临时政府领袖相信民众会更加愿意接受投降。普鲁士国王

威廉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俾斯麦很快被任命为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①没有哪个法国人会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法国已经被德国击败。^{〔71〕}

在这决定性的一天，另一件大事发生在巴黎城外的一片郊野上。特罗胥一直被要求主动进攻围城的普鲁士军队，以便缓和被困在城内忍饥挨饿的民众的怒火。为了做出竭力突破围困的样子，他决定带领国民卫队对凡尔赛附近由普鲁士重兵镇守的比泽瓦尔区域发动进攻。^{〔72〕}背着包袱和步枪的老人、孩子和妇女跟着男人一起向普鲁士阵地进发，用斗志和人数来弥补经验的不足。法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可能有多达1万人失去生命）后，难以想象地击退普鲁士人，拿下了阵地。经过数月的等待，他们终于赢得了一场胜利，胜利虽小，却也让他们极为兴奋。但特罗胥第二天便下令撤退，没有任何理由地要求卫队放弃艰难取得的果实。^{〔73〕}

法国报人普罗斯比尔·利沙加勒（一个没有偏见的见证者）报道说，返回巴黎的士兵流着愤怒的泪水。开始有传言称政府本意是让民众见证屠杀，以便宣布彻底战败和投降。很快，特罗胥宣布彻底战败，怀疑得到了证实。^{〔74〕}“听到这些要命的话，整个城市都惊呆了，好像目睹了巨大的、极其残酷的罪行，”利沙加勒说道。“四个月来的伤疤又被扯开了，人们叫嚷着复仇。寒冷、饥饿、轰炸、战壕里的长夜、数千濒死的孩子、突围时的牺牲，这一切都将耻辱地结束。”^{〔75〕}

民众聚集到市政厅，要求自治——他们要建立公社。他们怒斥特罗胥导致了比泽瓦尔溃败，而且没能保卫巴黎，但特罗胥已经被强硬派的约瑟夫·维努瓦将军取代。巴黎的反对派领袖急匆匆讨论下一步如何行动，但事态已经超出他们的控制。^{〔76〕}听命于弗路朗斯的贝尔维尔团体开始活动，他们抵达市中心时，又吸纳了很多民众，队伍更加壮大。1月23日凌晨3点，他们袭击了马扎斯监狱，释放出被囚禁在这里的弗路

^① 俾斯麦发动对法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证明普鲁士的军事强大以及对德意志其他各邦的主导。他的军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目标。凭借先进的武器和出色的组织，他们迅速击溃法国军队。大多数德意志南北各邦议会同意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此外，普鲁士击败法国、威廉加冕为皇帝后，欧洲大陆的军事和政治支点从巴黎转移到了柏林。普鲁士对法国可谓予取予求。

朗斯和其他共和主义以及激进领袖。^[77] 维努瓦迅速做出反应：关闭所有反对派俱乐部，压制反对派报纸，发出新的通缉令。^[78] 当愤怒的巴黎民众在围城第 127 天聚集到市政厅外，高喊“我们要面包”，维努瓦的军队从建筑的扇窗户朝民众开火，打死 5 人，伤 18 人。^[79]

同日，法国外交部长儒勒·法夫尔开始与普鲁士进行停战谈判，以期结束这场昂贵的战争并控制住不断加剧的社会危机。1 月 27 日，协议达成，普鲁士军队停止炮击，围城结束。^[80] 法夫尔和俾斯麦达成了初步停战协议，临时政府希望尽快选出新的国民政府批准协议。但沉寂的巴黎对停战协议的反应却是震耳欲聋的：停战协议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投降。^[81]

2 月 8 日，国民选举举行，巴黎人与其他法国人的裂痕很快变得非常明显。农村地区没有遭到围困（事实上，巴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经受战火），最想要的是稳定——之前数次选举都是如此。当选的 750 名国民议会议员中，450 人是君主主义者，大约 150 人为共和主义者。被看作极左的议员（只有 20 人左右）大多来自巴黎。“巴黎本身成了一个国家，”利沙加勒说道，“从对之抱有敌意的各省和政府中分裂了出来。”^[82]

新选出的国民议会同意了停战协议的苛刻条件：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地区和洛林的大部分地区给德国，法国在 4 年内赔偿德国 50 亿法郎（约 10 亿美元）。赔款付清前，德国军队驻扎法国东部各省。战争结束了，两国政府接下来需要解决巴黎问题。

36 公社万岁



如今，革命的士兵来自人民。昨日，他还待在自己的小店里，弯着腰，不断舞弄着锥子或针，或在打铁。多少人经过时都没有意识到或者相信那里有一个人。

——安德烈·莱奥⁽¹⁾

3月1日，普鲁士军队挺进巴黎，踏上香榭丽舍大道，他们发现这座光明之城一片黑暗——真的是一片黑暗，建筑正面盖着黑色的旗子，店铺都关着，煤气灯都熄了。任何咖啡馆胆敢向侵略者开门，便会被抢劫。各省报纸报道说巴黎犯罪猖獗，纵火频发。但实际上，没有犯罪，也没有看得见的生命。巴黎已经转入地下，准备战斗。⁽²⁾1月，在比泽瓦尔遭到屠杀而仍旧满腔怒火的国民卫队在偷偷收集武器，在城内各处部署了大约250门大炮。⁽³⁾市民也武装起来，制作弹药，把街垒建造得像建筑物一样高。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在安静但迅速地行动着，准备战斗。⁽⁴⁾

政府觉得返回巴黎太危险，留在了巴黎西南方向的波尔多，从这里发布的一连串法令怒火中烧的巴黎人火上浇油。3月13日，政府宣布，所有由于战事未能及时收取的11月以来到期的欠款，必须马上缴纳。这意味着巴黎人即便因为围城而无法工作，为了买猫肉或鼠肉充饥而花光了每一分钱，也要马上交齐之前几个月的欠租、税款和数不清的其他

款项。还有传言称国民卫队的薪俸将被取消。⁽⁵⁾ 债务法令发布的同一天，政府还下令关闭另外 6 家报社，将包括弗路朗斯和布朗基在内的去年 10 月带头袭击市政厅的人判以死刑。⁽⁶⁾

巴黎用各种色彩来回击。没有报纸传递消息，贴在墙上的各种颜色的海报成了传递信息的渠道，每有新的海报贴出来，周围都会聚集大批市民观看。⁽⁷⁾ 弗路朗斯也贴了一张海报回应自己受到的死刑判决。

面对判决，我有权用最积极的方式表示抗议，因为宪法授予我的权利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我早就明白，自由需要用殉难者的血来浇灌……如果我的血能洗去法兰西的污浊，巩固人民的团结和自由，我自愿把自己交给国家的谋杀者和一月的凶手。⁽⁸⁾

巴黎满是这样的人——比如近 30 万民兵，以及 250 个国民卫队营的士兵。⁽⁹⁾ 此外，还有拿着刀和棍棒坚守在门口的市民。当保卫巴黎的战斗打响时，他们将发挥巨大作用。

3 月 18 日凌晨 3 点，法国政府派 25000 名士兵进入巴黎。在全城居民的熟睡中，军队夺走了国民卫队的重炮。到早上 6 点，政府军控制了起义者所有的大炮，但不管是运气、宿命、还是无能的原因，军队没有带马匹来，他们无法把这些武器拖走。在他们等着马匹到来时，巴黎的妇女们醒了。每天早上给全城送牛奶的女工告诉各家：政府士兵正试图拖走大炮。很快，鼓声响起，警讯向各家传递。⁽¹⁰⁾

在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克劳德·勒孔特将军正受到妇女和孩子们的质问——他的人想做什么？为了表达对她们的无视，他命令部队向人群开火，但妇女们面对拿着枪的年轻士兵，喝问：“你们要对我们开火吗？”他们不会。⁽¹¹⁾ 他们并不想与法国同胞战斗，更何况是妇女。有些士兵去年 7 月便参加了战争。有些对政府的厌恶之情并不比对巴黎人少。他们开始加入反抗的人群，勒孔特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被国民卫队俘虏，他不得不签署命令，让部队放下大炮撤退。⁽¹²⁾

到中午，除了10门大炮未能找回外，所有大炮又回到了巴黎人手中。^[13]不幸的是，之前一直都能约束自己的民众变得残暴起来，他们处决了勒孔特和另外一名将军克莱芒特·托马。^[14]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政府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借口来发动全面进攻。

在政府的报复到来前，巴黎人在3月26日选出了自己的政府。第二天，大约20万民众聚集到市政厅，面见新领袖。兴奋的人群安静下来，看着选出的领袖系着醒目的红围巾陆续走上阳台，听着他们的名字被庄严地念出来。当巴黎政府成立，一名成员喊道：“以人民的名义，公社宣告成立。”欢腾的庞大人群站起来，高呼“公社万岁！”帽子被抛向空中。大炮鸣响，彩旗在窗口和屋顶飘起，成千上万双手挥舞着手帕。^[15]

这期间，法国国民政府已经搬到距离巴黎更近的凡尔赛，决定4月1日武力夺取巴黎。为动员不愿参战的士兵，军队指挥官把巴黎的抵抗描述为受到外国人煽动的暴乱，所以战斗打击的不是法国同胞，而是外国渗透分子。^[16]渗透分子的首脑已经确定：3月起，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报纸就开始刊登报道指控马克思指挥的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的活动，借以影响巴黎街头运动。其中一篇标题为《国际的最高首脑》的文章写道：“众所周知，他是德国人，更糟的是，是普鲁士人。”文章（错误地指出马克思住在柏林）说，马克思指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如何在巴黎开展活动的一封信被警察截获了。^[17]

这样的报道只要不会影响到巴黎局势，不会分裂法国和德国工人一直以来保持的团结，马克思就并不特别在意，他只是公开声明说，这封所谓的信是警察伪造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把国际工人协会往暴力上扯。^[18]马克思虽然发表了声明，类似的文章仍不断在报上出现。4月，劳拉寄给马克思一份法国报纸的剪报，内容让人透不过气来：“来自德国的揭发在这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现在可以完全有把握地确定，卡尔·马克思这个最有国际影响力的领袖之一，1857年曾是俾斯麦伯爵的私人秘书，而且从未同其过去的保护人断绝关系。”^[19]这样，马克思既是共产主义领袖，又是西欧最有权势的反动派的知己。换言之，不管站在哪一边，他都是个威胁。^[20]

4月2日凌晨1点，法国政府军向巴黎开火，大炮的轰鸣声把民众

从睡梦中惊醒。守城的民兵冲向阵地，市民爬上街垒，鼓声响起传递警讯。到早上8点，20000人坚守右岸，17000人坚守左岸，准备迎接政府军的进攻，并伺机反攻。抵抗者虽有武器，也都动员了起来，但缺乏指挥，被指望制定作战计划的巴黎指挥官什么计划都拿不出来。⁽²¹⁾

弗路朗斯没有气馁，4月3日，他带领大约1000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但未能成功；防守的民兵一受到攻击，便阵形大乱，溃散而逃。在战斗中累得精疲力竭的弗路朗斯对战友的懦弱感到沮丧。在副官的劝说下，他停在一家旅店进行休整，但旅店老板背叛了他们，通知政府有反叛头领入住。警察和政府军冲进旅店，当场杀死了副官。他们将弗路朗斯抓住，并根据他口袋里装着的一封信确定了他的身份。据当时在场的一名英国游客说，一名警察大声喊道：“他是弗路朗斯！”“这次抓住他，他再也别想跑掉。”的确，弗路朗斯都没能走出旅店的院子。英国目击者称，弗路朗斯在20个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前依然镇定自若的模样让审问他的警察大为恼怒，举起佩剑砍在了他的脑袋上。他的尸体倒在了地上，另一名警察把手枪对准他的眼睛，扣动了扳机。⁽²²⁾

对法国政府而说，弗路朗斯的死是在巴黎取得的第一个战利品。他的尸体被装上马车，和他的副官的尸体一起运到凡尔赛，展示给先生女士们看——这些做过皇帝的朝臣又做新政府的朝臣的男男女女看到后居然欢呼起来。⁽²³⁾在巴黎，海报没有传递弗路朗斯死亡的消息，而是说他去了凡尔赛。所有人都以为这意味着胜利，第二天，民众知道了真相，弗路朗斯死了，另外9名被抓的士兵也已被处死。⁽²⁴⁾

利沙加勒认为，巴黎战斗的性质在4月3日后改变了。巴黎人不再期待领袖来带领他们冲锋，而是把防御抓在了自己手中。⁽²⁵⁾4月5日，这样一张海报出现了：“如果你已经厌倦生活在无知中，挣扎在苦难中；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男人，让他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不是继续给工厂和战场做牛做马；如果你不想你的女儿因为你没能给她提供好的教育而成为有钱人的玩物；如果你还想要公正；醒醒吧，工人们，站起来！”⁽²⁶⁾

第二天，巴黎民众举行了一场巨大的葬礼，好像要埋葬的不仅是牺牲的人，还有破碎的希望。人们制作了三个巨大的架子，上面插上红色的旗子，每个上面放着35口棺木，抬着向拉雪兹公墓行去。利沙加勒

描述说：“今天的寡妇在明天的寡妇的搀扶下，”一起向为死者准备的巨大墓园走去。“在林荫大道上，我们有 20 万人，还有 10 万张苍白的脸庞透过窗户看着我们。”⁽²⁷⁾

弗路朗斯第二天被埋在拉雪兹公墓。⁽²⁸⁾

4 月 5 日，弗路朗斯死亡的消息传到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据说，星期一的胜利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显得更加辉煌，他就是古斯塔夫·弗路朗斯，他是最为强硬和决绝的叛乱首领之一。他的尸体在凡尔赛。”⁽²⁹⁾马克思一家人极为悲伤，尤其是女人们，她们把弗路朗斯称为“勇者中的勇者”。⁽³⁰⁾小燕妮尤其愤怒：这样一个人竟然被一个小资产阶级店主出卖，被屠夫一样的同胞杀害。⁽³¹⁾

第二天，马克思告诉李卜克内西说，杜西和小燕妮决定去法国。⁽³²⁾她们几个星期以来不断听到巴黎形势恶化的报道，现在又得到弗路朗斯死亡的消息，决定有所行动。马克思的女儿们也像他和燕妮年轻时一样，无法在起义面前无动于衷，即便不能加入战斗，也要靠得近一些。此外，还有急迫的个人原因：劳拉刚生下的男孩身体也不是很好。保尔倒是很高兴地来信说劳拉在自己照顾孩子，但一家人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担心：他们知道劳拉也病着，燕妮肯定会想起自己竭尽全力照顾小福克斯时的情形。⁽³³⁾

弗朗斯瓦·拉法格死后，保尔继承到了原本结婚时就应该拿到的 10 万法郎，但大多是房产、股票或债券。⁽³⁴⁾因此，一家人担心，劳拉在经济条件和个人精力上都不足以撑过这次危机。保尔的来信满是政治评论和宣言，他显然急着要离开波尔多，因为政府已经搬去凡尔赛，巴黎已经建立公社。劳拉坦白地说：“我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保尔几个月来都极少在家，我已经有六个月或八个月没有出过屋子了。”⁽³⁵⁾

当小燕妮得知保尔已经去了巴黎后，马克思对于她和杜西去法国不再有任何犹豫。就在俾斯麦释放 6 万名法国俘虏，让他们帮忙平叛首都时，保尔起身去了巴黎。4 月初，劳拉写信说，保尔离开后就没了消息，而且：

.....
更糟糕的是，我可怜的小宝宝近 8 天以来，一直病得

厉害，我差不多每时每刻都担心他会死去。他这两天好了一些，希望能继续好转。上星期，我几乎整天抱着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夜里也给他摇个不停。……关于保尔，我真不知该怎么想。他去的时候，当然没打算待这么久。他或许是想回来却无法办到，或许是看到街垒后，想留下战斗。对这我并不奇怪，要是我跟他在一起，我也不会反对，因为我也会去战斗。^[36]

.....

小燕妮决定马上去法国，她向库格曼说，如果父母不同意，她就偷偷走。^[37]

但安排行程时，小燕妮和杜西遇到了各种挫折。伦敦出发的轮船装满发往法国的货物，不肯载人。唯一的选择是从利物浦坐小船，但4月29日才有船，这样久的等待让小燕妮觉得极为难熬。接下来，她发现到法国后还有麻烦等着她：从港口出发的铁路线或者被切断，或者被政府军控制。^[38]此外，去法国需要护照，她和杜西必须使用假证件，才能赶到劳拉身边帮她驱走可怕的孤独。

拉法格去巴黎的原因无从得知。有人说，他是去研究一本书；有人说，他是去获取公社社员的支持，在波尔多发动起义。^[39]不论原因为何，他在4月18日前后回到波尔多，巧合的是，在波尔多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警察密探被扣押，步兵营被人投掷石头，有人高喊“巴黎万岁”。^[40]当地警察指责国际协会会员煽动了这些行为，拉法格没有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张贴海报支持公社，作为协会会员参加市选举（落选）。^[41]

警察开始调查需不需要马上逮捕这个他们眼里的政治狂，有人提供消息说，拉法格为协会招募会员，每天晚上都参加协会会议。但波尔多警方不确定这是否足以实施逮捕，便向相邻区域的上级埃米尔·德·凯腊特里咨询。^[42]

在这种背景下，小燕妮和杜西化名威廉斯家的女儿，经过4天艰难的海上旅程，在5月1日抵达波尔多。小燕妮途中一直病着，16岁的杜西却把这次旅行看作一次冒险，极为兴奋。小燕妮写信告诉父母说，杜西从早到晚待在甲板上与水手聊天，和船长一起抽烟。恩格斯建议她

们在船上举止要像英国中产阶级家的女孩，她们装得很出色。“我们在船上像公主一样对待，”小燕妮笑着说。“男旅伴和服务生抢着为我们拿毯子、凳子和靠垫，一有东西可看，船长就把望远镜给我们用，还把他那巨大的扶手椅抬到甲板上给我坐。”到法国后，她们被当作了巴黎人，并不需要出示证件或装出中产阶级的模样。

她们抵达时，波尔多平静得难以想象：咖啡馆人满为患，人们玩骨牌和撞球的兴致丝毫不减，餐馆里的食客更是兴致盎然。但表面之下却是另一番景象：像其他有鼓动者活动的省份一样，这里所有具有起义倾向的人都处在监视之下，列入嫌疑名单。⁽⁴³⁾凡尔赛政府正忙着找出起义的领导者，以便在发动最后袭击将起义粉碎之后，把他们——加以逮捕和处死，各省政府也是如此。

巴黎围城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赞成起义，他们认为结果只会是失败。但到了4月，他们在公社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英勇品质，为巴黎人欢呼——虽然他们依然预测结果会是失败。马克思赞叹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徒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鲁士军队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⁴⁴⁾

5月初，巴黎天气良好，虽然大炮的轰鸣声和炮弹落地的爆炸声仍在提醒着巴黎人自己在遭受攻击，但他们还是在巴士底广场举办了持续一周的姜饼盛会。荡秋千的孩子们的欢笑声飘在空中；男人女人们把未知的未来放在一边，转动财富的车轮；小商人忙着把便宜的日用品卖给已经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捐出去熔化制作子弹的家庭主妇。⁽⁴⁵⁾5月16日，在公社文化部门任职的艺术家古斯塔夫·库尔贝，在杜伊勒里宫北侧塞纳河右岸的旺多姆广场安排了另一场愉悦的盛会：随着乐队进行演奏，民众越聚越多，男人们花费数小时将拿破仑一世为纪念法军1805年奥斯特利茨战役胜利而建造的巨大圆柱锯倒。当圆柱倒下，波拿巴的头像滚落在地上，便如掉落在断头台上一般。民众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⁴⁶⁾

5月21日星期日下午，杜伊勒里宫花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女人们穿着耀眼的春装——利沙加勒说，她们点燃了皇家花园巷陌间的

绿意。在附近的协和广场，政府军的炮弹为音乐会提供了意外的（也是不受欢迎的）打击乐。但足有数千民众没有四散而去，他们好像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他们短期内能够参加的最后一次盛会。⁽⁴⁷⁾的确，在他们未曾察觉的情况下，政府军已经准备大规模进攻。下午3点，多达7万政府军从5个城门同时进城，准备对全城进行扫荡，装备着重武器的炮舰也已在塞纳河上就位，准备开火。⁽⁴⁸⁾

在公社新闻部门工作的保罗·魏尔兰说妻子最先告诉了自己政府军已经进城的消息——她梦到的。（魏尔兰不愧是一名诗人。）⁽⁴⁹⁾随着消息传开，男人、女人和孩子纷纷冲向街垒、大炮和阵地，准备迎接政府军顺着奥斯曼修建的大马路发动的进攻。接下来，便是后来所说的“血腥一周”。

5天里，巴黎除了战争，再无其他。战斗在每一个角落上演。男人们赤膊上阵，浑身大汗，满是炮灰，双手拿着火柴，同伴装好弹药后，他们马上点燃。⁽⁵⁰⁾在一处地方，1500名妇女聚在一起缝沙袋，加强防御，其他妇女在街垒上战斗，双手被火药熏得漆黑，肩膀被步枪磨破。男孩们在父亲战死后，拿起父亲的枪，继续战斗。⁽⁵¹⁾没人能置身事外，没人能避免战斗。

在蒙马特，为了给3月时被杀的勒孔特将军和托马将军复仇，政府军处决了42个男人、3个女人和4个孩子。这里成了行刑的场所，每天，都有被俘的公社社员被带到这块俯瞰巴黎的高地，绑在满是弹孔的墙前，被射杀，然后被扔下俯瞰圣丹尼路的斜坡。⁽⁵²⁾但公社社员同样也在施以暴行。5月25日，国民卫队处决了巴黎大主教和5名神父，但他们的枪法太差，五轮射击后仍没能把大主教杀死，最终用刺刀将他肢解。⁽⁵³⁾（国际工人协会被指控从伦敦下达了残杀的命令。）⁽⁵⁴⁾

这一周，巴黎多处陷入火海：杜伊勒里宫、皇宫、立法大楼以及卢浮宫的一部分。城内虽然没有煤气灯，但在可怕的火苗的映照下，夜里亮如白昼。⁽⁵⁵⁾（据说，8000名妇女用炸药和汽油瓶等能找到的一切东西点燃了这场大火。但这只是这个狂乱的城市无数的传说中的一个。）⁽⁵⁶⁾由于之前已经连续一周干燥，火势极为迅猛，但在战斗打响的第5天，天降大雨。很快，战斗也停止了，结束了。已经有太多人死去，巴黎已经被毁坏得太多。⁽⁵⁷⁾政府军指挥官麦克马洪元帅在5月28日

宣布：“巴黎居民，我们已经占领巴黎。”⁽⁵⁸⁾

这期间，马克思一直忙于公社相关的工作。库格曼写信给恩格斯说担心马克思的健康，但恩格斯让他放心：“马克思的生活方式还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正常。战争使他的情绪激昂起来，从那时起他没有再研究那些复杂的理论问题，生活方式相当合理。”⁽⁵⁹⁾实际上，有了恩格斯在身边，马克思的负担轻了很多。他们一起与国际工人协会在欧洲和美国的会员通信，一起在处理协会的事宜。这个之前由马克思主导的组织现在由他们两人共同经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通过两个人了解巴黎局势：一名频繁往返于伦敦和法国之间的德国商人；⁽⁶⁰⁾以及优秀的俄国年轻姑娘伊丽莎白·德米特里夫·托马诺夫斯卡娅，她经常被马克思派去巴黎执行任务，后来留在了巴黎参加战斗。⁽⁶¹⁾马克思还有一个与俾斯麦很接近的消息来源——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的一名伙伴，他经常告诉马克思德国方面的动作。⁽⁶²⁾小燕妮也从波尔多写信到伦敦——以女儿燕·威廉斯的名义写给父亲阿·威廉斯。（马克思曾告诉一个通信人说阿·威廉斯是住在自己家里的一个朋友。）⁽⁶³⁾小燕妮告诉父亲说自己要赶紧离开波尔多，再待下去，保尔可能会被逮捕。据邻居说，已经有可疑的人在打听保尔。“如果警察知道他是马克思的女婿，他早就被关起来了。我亲爱的摩尔，您在法国资产阶级眼里，可是极其可怕的人物！”⁽⁶⁴⁾

虽然马克思（以及冒着他的名做的事情）被与革命震动和暴力反抗联系起来，他依然坚信这样的行动是愚蠢的，只会导致失败。小燕妮对此很清楚，她写信给他说：“目睹了（1848年）6月时的那些日子，又看到20多年后现在的情境，您一定很痛苦。……您是否觉得这样的屠杀会毁掉革命者多年的人生？”⁽⁶⁵⁾她写这封信给父亲时，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虽然麦克马洪在5月28日宣布了公社的结束，但杀戮并未停止。同一天，被杀的大主教的尸体在拉雪兹公墓被发现。政府的反应极为残忍：拉雪兹公墓附近街区超过5000名俘虏被分成两部分：能活的和不能活的。从星期日到星期一，数千人在拉罗屈埃特监狱和巴黎军校等处被杀。目击者说行刑的枪声好像一直没有停歇。⁽⁶⁶⁾市政厅10月动乱中被捕的让-巴蒂斯特·米利埃被带到万神庙行刑，在行刑队准备开枪时，

他大喊“人民万岁！人性万岁！”但行刑的士兵回答说“去你妈的人性！”米利埃被击毙。^[67]

很多巴黎人已经因为战争和恐惧而疯狂，在被俘之前选择了自杀。穿着丝绸衣服的年轻女人拿着手枪在街上四处开火，向可能对她们行刑的士兵大喊：“现在就杀了我！”^[68]伦敦《旗帜晚报》的一名记者说：“公社的太阳在血海中降落。我们不知道，可能也永远无法知道真实的死亡人数。但我们知道，那个数字一定骇人听闻。”^[69]该报引用一位了解政府军务的官员说，两个军事法庭一天处决的人数就有500人，尸体用敞篷马车拉去居民区，让民众知道他们的失败有多彻底。^[70]利沙加勒写道：“最后，屠杀的气味让最疯狂的人都已经无法忍受。……无数苍蝇在腐烂的尸体上蝇蝇盘旋。……成堆的尸体到处可见，上面撒着白色的石灰。在理工学校，尸堆长达一百码，三英尺深。……在特罗卡代罗墓地，很多尸体埋葬得太浅，手和胳膊都露在外面。”^[71]最终，就连一直坚决反对公社的报纸都对政府的过分行为了表示了厌恶。之前数周一直在斥责起义者的伦敦《旗帜报》在6月2日刊登了其巴黎撰稿人的一篇报道：

.....

远处仍有零星的枪声响起，可怜的伤者无人理会，散躺在拉雪兹公墓的墓碑间等待死亡的到来，六千名胆战心惊的起义者带着极端的绝望在死亡面前徘徊，数不清的可怜人被急匆匆拉去枪决；但同时，咖啡馆里的食客照样喝酒、玩撞球、打牌，没了依靠的妇女在林荫大道上游荡，时髦的餐厅里的欢声笑语在静寂的夜空中清晰可闻。这无法不让人感到憎恶。任何人都会以为巴黎在庆祝喜事，根本无法想象这座城市刚刚经历过绝大多数公共建筑被毁、足足两千家庭的房子倒塌、超过两万名法国人失去生命，很多人却已开始公开享受喜悦。^[72]

.....

在这血腥一周和之后恐怖的几天里，200万市民中有4万人被抓做俘虏：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外省人还是巴黎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被戴上枷锁，或者被押送到监狱，或者被赶到港口驱

逐。^[73]愤怒的资产阶级以及认为公社社员导致了巴黎过去9个月来的不幸的人们对他们大声辱骂，要求把他们当场枪毙。对死亡人数的估计虽有不同，但当时的编年史家（以及现在的史学家）普遍认为，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巴黎有大概25000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74]另外，还有3000人死于监狱，将近14000人受到终身监禁，7万名孩童或老人由于家人或被杀或坐牢而无依无靠。^[75]

对公社社员及其支持者的追捕并未局限在巴黎。法国官员在法国各个角落甚至国外搜寻与暴力起义相关的人。指责的声音越来越指向国际工人协会和马克思。讽刺的是，马克思一生甚至在他死后，由于总被人把没做过的事情强按在头上，他真正做过的事情以及应得的功绩，反而模糊了。这次，他被描述成一个遥控巴黎起义的邪恶幕后者。

马克思受到牵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一次讲演——后来编成35页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出版。像他的所有著作一样，这本书也晚了：马克思计划在4月底完成，但直到5月30日才交给协会伦敦总委员会，此时，公社已经彻底结束。^[76]但延迟并未影响它的威力和反响。马克思在文中高度赞扬巴黎人的精神，虽然并不赞成他们的暴力方式：“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的执政特权……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捶胸顿足。”^[77]对于协会，他写道：

.....
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寄生虫生活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78]
.....

《法兰西内战》卖出成千上万本，两个月内出了三版，被翻译为各种欧洲语言，是马克思到这时为止最为成功的著作，比他关于普法战争的演说还要成功。^[79]有早期马克思传记作家称：巴黎公社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会员中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这个名字，更不要说普通人；在伦敦，他的名字基本上无人知晓。^[80]但在公社后，马克思已经为世界所知：公社的邪恶缔造者，革命之父。因为这本小册子，有人给他寄来死亡威胁，甚至远在芝加哥的报纸都对他进行批判：

《派尔—麦尔新闻》（伦敦，1871年5月）：“根据我面前这份关于这个组织的详细记载来看，虽然成立只有短短九年，它却拥有足足250万会员……这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在伦敦，领袖是一个德国人。”^[81]

《纽约世界报》（6月3日）：“已经发现，公社的真正领袖是卡尔·马克思。……截获的文件显示，这些人在伦敦，正进行新的谋划，打算在里昂、马赛、马德里、都灵、罗马、那不勒斯、维也纳、莫斯科和柏林制造混乱。”^[82]

《芝加哥论坛报》（6月5日）：“另一位知名起义者声称烧毁巴黎算不得什么，以后伦敦码头和上面的所有财富都会消失，给欧洲中产阶级一个巨大的教训。……发现的文件显示，共产主义者的行动从伦敦接受指令。”^[83]

《旗帜晚报》（伦敦，6月23日）：“对欧洲不幸的是，一个新的、比以往都更加可怖的革命党正在形成。……面对凄惨的境地，它已经把巴黎当作首个战场，但它很可能轻松地其他任何首都城市制造同样恐怖的混乱。”^[84]

如果谁还有任何疑虑的话，路易·勃朗作为反对派内部的人也说话了：公社社员中有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协会总委员会分发了大炮和弹药，并控制着革命的所有物资。^[85]

实际上，公社领导层中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很少：92名公社委员会成员中，只有17人来自协会。^[86]但为了修补遭到严重破坏的法国社会，

把动乱责怪到外人头上总是容易些。6月6日，法国外交部长说，国际工人协会是“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敌人”，建议欧洲各国政府合力将其摧毁，追捕其会员。⁽⁸⁷⁾

马克思很享受官方的愤怒，他写信给库格曼自嘲说：“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在度过二十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⁸⁸⁾

随着马克思被大肆渲染为“赤色分子”，他的女儿们、女婿和外孙必须离开波尔多。保尔向西班牙申请到护照（他出生在古巴，因此获得了批准）后，他们一行人向西南方向走，最后到了法国比利牛斯地区的巴涅尔-德-吕雄，这里因其矿物温泉而在法国闻名。在这里，他们少与人交往，使用化名（拉法格一家姓“莫拉”，小燕妮和杜西姓“威廉斯”）。除了女仆、女房东和医生，他们不让任何人进家门。劳拉的小儿子马克·罗朗已经4个月大，依然病得厉害。⁽⁸⁹⁾

他们虽然小心翼翼，马克思还是在6月得到消息，保尔被发现了，即将被逮捕。马克思用加密的语言，写信告诉他们赶快离开吕雄：

.....

总的说来，现在在征询了著名医学专家的意见和获得全面的情况之后，我认为，你们都应当离开法国的比利牛斯地区，搬到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地区。那里的气候要好得多，而你们在那里也会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你们所需要的那种变迁。这对于图尔尤其如此，假如他今后还不接受那些精通医学、深知他的身体情况、并向他以前在波尔多等地的医生征询过的人们的忠告，那么他的健康状况将会恶化，甚至可能有很大的危险。⁽⁹⁰⁾

.....

但小燕妮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们短期内无法离开。她也采用了马克思的加密语言：“由于一直比较小心注意，图尔的身体已经好多了，不用再换环境。”事实上，小马克·罗朗病得太重，承受不了颠簸，为了能让他好起来，他们必须留下。⁽⁹¹⁾但孩子没能好起来，在7月26日死去，这是劳拉在两年内失去的第二个孩子。⁽⁹²⁾他们只能把孩子埋在吕雄，

让他永远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里，这让他们尤其感到伤心。

拉法格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小心，但在8月4日，还是有人找上门了。据恩格斯描述，那人说：“我是警察，但也是一名共和主义者。我们已经收到对你的逮捕令，你被认定负责波尔多与巴黎公社间的联络。你只有一个小时时间越过边境。”^[93]拉法格听从了这名警察的建议偷偷离开吕雄，到了大概25英里以外的西班牙小镇博索斯特。^[94]他离开后不过几个小时，警察便来到劳拉、3岁的施纳普斯、小燕妮和杜西所住的房子，一番搜查之后，他们找到一些被认定与拉法格相关的国际工人协会招募会员的文件和信件。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几个女人牵涉在内，但她们所住的房子开始受到监视。^[95]很快，她们被软禁在家。

37 姐妹被软禁

★

人们会用无言的蔑视对待政府的疯狂，面对政府雇用无所事事的笨老头来浑水摸鱼这样的闹剧，也以嘲笑对之，结果，这样的闹剧带来成千上万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悲剧。

——小燕妮（女儿）⁽¹⁾

拉法格逃离吕雄两天后，马克思的几个女儿带着施纳普斯坐马车去看望拉法格，确定他是否已经安全抵达。劳拉又是担心丈夫，又是心碎于儿子的夭折，还担心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再出现任何闪失（施纳普斯也出现了生病的迹象）。⁽²⁾小燕妮却已迷失在被她描述为“无比美丽的景色中。……我们看到白雪皑皑和漆黑如夜的山峦，绿油油的草地和茂密的森林，湍急的大河和涓涓的细流。越接近西班牙，山峦愈加粗犷、起伏和原始”。博索斯特是西班牙比利牛斯地区一个贫穷的农业小镇，她们风尘仆仆、口干舌燥地抵达时，见到广场上有很多孩子在跟猪一起玩耍——这一天是镇上的集市。⁽³⁾见到如此淳朴的欢乐，又发现保尔在这里安全、舒适，劳拉终于恢复了些许精神。

这天晚些时候，施纳普斯出现了明显的病症（后来发现是痢疾）。劳拉不想拿孩子的生命冒险，决定和保尔一起留在西班牙，小燕妮和杜西回法国。⁽⁴⁾她们找到一个好心的马车夫，小心翼翼地载着她们穿过狭窄的山路，来到紧挨边境的法国小镇福斯的海关前。她们两个除了身上

穿的大衣，什么行李都没带，但还是得到了放行，车夫得到允许继续前行。但就在这时，一个检察官出现了，命令说“以共和国的名义，跟我过来”。她们只能下车，跟着他走进一间小屋，由一个女人对她们进行检查。⁽⁴⁾小燕妮和杜西都不想被这个一脸凶相的女人搜身，要求自己脱衣服。但这个女人不同意，转身出去找检察官。⁽⁵⁾趁着这个机会，小燕妮把藏在口袋里的一封弗路朗斯很久以前的来信藏在了屋里一个积满灰尘的本子里。恩格斯后来说：“要是这封信被发现，她们两姐妹肯定免不了要被送去新喀里多尼亚^①。”⁽⁶⁾

海关女人带着检察官回到了屋里。检察官对杜西说：“如果你不肯让这位女士搜身，就只有我来搜。”他也许以为这样可以把面前这个年轻的女孩吓得愿意配合，但杜西反驳说：“你没有权利搜查英国人。我有英国护照。”检察官又是一番威胁之后，她们不情愿地同意让那个女人搜身。搜查非常彻底：她们被要求脱得只剩下长袜，衣服的缝隙都搜查到了，头发也被弄散。除了小燕妮身上带的一份报纸和杜西身上一封撕碎的信（杜西想吞下去，但没成功），什么都没搜到。检察官此并不满意。他把她们的车夫打发走，让两名警察把她们带上官方马车，返回吕雄。沿途经过小村庄时，不断有村民对她们指指点点，觉得她们是窃贼或走私犯。晚上8点到吕雄后，马车停在了埃米尔·德·凯腊特里家门前——正是数月前在波尔多发现拉法格行为可疑的那名官员。但他不在家，去听周日音乐会了，而且留下话，不准任何人打扰。燕妮和杜西被带回她们的房子，等待德·凯腊特里回来。

小燕妮说，除了音乐会，自己和杜西这天晚上成了镇上最大的焦点。屋里满是密探和警察盯着她们，想要她们露出马脚。他们搜查了屋子，以确定她们有没有参与在巴黎纵火。小燕妮说，就连给孩子热牛奶的夜灯都被当作“某种邪恶的机器”进行了检查。他们试图表现得自然些，坐在椅子和沙发上，想跟小燕妮和杜西对话，但她们一直保持沉默。这些人便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她们，直到晚上十点半总检察官德·凯腊特里、两名法官和图卢兹及吕雄地区警察长官走进屋子。

杜西被带去一个单独的房间，小燕妮被留在客厅里接受几名检察官

^① 法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用于流放犯人。

的审讯。在超过两个小时的审讯期间里，小燕妮被德·凯腊特里问到拉法格、她的朋友和家庭、以及来吕雄的原因。小燕妮除了说自己患有胸膜炎，来这里泡温泉的，其他什么都没有回答。德·凯腊特里威胁说，她再不肯回答，就将被视为同伙。他说：“我告诉你，拉法格先生和他的妻子已经被捕，明天，你就得在法律面前宣誓知无不言。”

杜西被带回客厅，小燕妮则被要求转向另一边，不准影响妹妹的回答。为了防止她做手势，专门有一名警察站在她前面。他们给杜西拿来一张纸，告诉她上面的陈述是她姐姐的说法（实际上是警察想要找到证据的一些指控），让她回答“是”或“不是”。⁽⁷⁾杜西不想与姐姐的回答冲突，便在有些说法上回答了“是”。杜西后来说到这次审讯时说：“太卑鄙了，不是吗？不过他也没得到多少有用的东西。”⁽⁸⁾但小燕妮在一家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描述这段经历时非常愤怒：“一个刚刚16岁的女孩，早上5点就起来了，在8月酷热的天气里在路上奔波9个小时，只是在博索斯特吃了一点点东西，一直被盘问到夜里两点半！”晚上的折磨暂时结束，但图卢兹地区警察长官和几名警察留在了房子里。

虽然精疲力竭，但两姐妹都没能睡着。她们在想办法如何把消息送给也许尚未被捕的拉法格。小燕妮回忆说：“从窗户看出去，警察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我们根本出不去，成了囚犯，连女佣和女房东都不让见。”

第二天，她们被要求宣誓之后回答问题，换言之，如果被证明撒谎，她们可能被起诉。但一夜之后的小燕妮怒火更盛，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⁹⁾杜西也拒绝宣誓或回答任何问题。据恩格斯说，德·凯腊特里离开时对于“这一家的女人独具的毅力”感到愤怒至极。⁽¹⁰⁾

小燕妮和杜西担心父母听说了她们被捕的消息，便要求写封家书告诉父母自己一切都好，而且答应用法语写，警察可以检查。但警察没有同意，说她们会用密码传递危险的消息。他们在拉法格的物品中找到一些文件，上面说到羊和牛，猜测羊是指共产主义者，牛是指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星期一一整天，她们都被软禁在房子里。星期二，德·凯腊特里再次登门，说警察搞错了，拉法格受到的指控没有依据，他可以回法国来。但他同时说：“至于你们姐妹，你们受到的指控可比拉法格先生还多。”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她们却是他的女儿！“不管怎么说，”他继续

说道，“你们都应该被从法国驱逐。不过，释放你们的命令今天应该就会到。”对这样奇怪的转机和矛盾的消息，让小燕妮和杜西极为怀疑。她们不仅没有告诉保尔可以回法国来，反而托一个朋友寄给他一封短信，里面装了一些钱，让他继续向西班牙深处走。

两姐妹一整天都在等着被“释放”，到了晚上11点，检察官带着几名警察进来了，让她们收拾一下，跟他去监狱。小燕妮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寂静的深夜里，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被带上马车，由两个宪兵押送着，也不知道会被带去哪里。目的地原来是警察局，我们被带进一个房间，房门从外面锁上后，便不再有人理会我们。”她们又等了一整天。下午5点，小燕妮要求与德·凯腊特里面谈，问他为什么说要释放她们，却又把她们关在警察局。他解释说：“好在有我说情，你们才能待在警察局，政府本来要把你们送去图卢兹附近的圣戈丹斯监狱。”他递给小燕妮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拉法格的银行经理从波尔多寄给他的2000法郎。警察截获了这封信，现在德·凯腊特里把钱给了小燕妮，说她和杜西可以走了，却没有归还她们护照。“我们仍是犯人。没有护照，根本无法离开法国，他们显然就是想把我们留在法国，等找到机会再抓捕我们。”警察数天的骚扰，加上监禁带来的紧张，小燕妮和杜西失去了冷静。她们写信给劳拉，告诉她发生的一切，以及警察关于保尔的说法，却没有想过信能不能送到劳拉手里，或者她和拉法格有没有发生什么变故。⁽¹¹⁾

警察在福斯把小燕妮和杜西的车夫打发走之前，让他回博索斯特把拉法格接来，虽然他们尽量使这个要求显得自然，车夫还是起了疑心，没有答应。检察官和几名警察决定亲自去博索斯特。他们很快确定了拉法格一家的住所，因为村里只有两家旅店。但他们没有静悄悄地实施逮捕，而是在博索斯特的小广场上大张旗鼓，好像他们具有何等神圣的授权似的。这使得当地人有时间通知保尔他即将被捕的消息，他们带着他从旅店后门出来，并指给他一条只有“导游、山羊和英国游客”知道的小路。

法国警察决定在夜里3点对拉法格实施抓捕。他们在4名西班牙警察的引领下，冲进拉法格的房间，把卡宾枪齐刷刷对准床上，却发现拉法格不在，只有他的妻子和儿子睡在床上。施纳普斯大叫起来，愤怒的

劳拉也大声呼喊，使得整个旅店的人都聚集了过来。警察发现拉法格已经逃走后，本想抓捕劳拉，但旅店老板说西班牙法律不允许这样做。面对聚集在走廊和厅里的一双双充满敌意的眼睛，警察只能让步——但没有离开。他们在旅店建起指挥部，对劳拉进行监视。连本国警察都讨厌的当地农民自然憎恨法国人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给劳拉送信和传递消息，提醒她德·凯腊特里要亲自来博索斯特审讯她，并协助她在他到来之前逃走。农民们还通过比利牛斯地区比较偏僻的小路长途跋涉去吕雄，把博索斯特发生的事情告诉小燕妮和杜西。

就这样，小燕妮和杜西知道了劳拉是安全的，也知道了保尔还是被抓住了。逃离博索斯特后，拉法格在山里朝着更加深入西班牙的方向走了3天，抵达比利牛斯山阿拉贡地区的韦斯卡，但在这里被抓。⁽¹²⁾西班牙政府作为唯一的一个同意向法国引渡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欧洲国家，将拉法格立刻交给法国。⁽¹³⁾

西班牙做出如此大方表示的同一天，小燕妮和杜西拿回了英国护照。她们的第一想法是去韦斯卡看看保尔的情况，然后去找劳拉。但她们刚跨过法国边境，来到大西洋边上的西班牙小城圣塞巴斯蒂安，就遇上了劳拉，而且得知拉法格也许是因为无可比拟的运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已经被释放。⁽¹⁴⁾他说自己骑着骡子，押送他的两个卫兵荷枪实弹地走在他两侧。他们经过一个个村庄时，他都被当作了受警察保护的大人物。⁽¹⁵⁾拉法格说：“警察很喜欢我这样的囚犯。……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地区一切都很原始。美酒和食物极为丰富，只要花25苏，就能吃上一顿丰盛的大餐。”他得到了省长的款待，美酒香烟齐备，而且他很快发现这位省长政治开明。让德·凯腊特里无比惊愕的事情发生了：当地西班牙官员认定拉法格受到的指控没有依据，把他放了。⁽¹⁶⁾拉法格来圣塞巴斯蒂安和她们会合后，拉法格一家决定留在西班牙。但小燕妮和杜西已经受够了大陆，马上启程回了英国。

小燕妮和杜西在向北的旅程中并不孤独。英国再次成为流亡和被追捕的君主及革命者的避难所。从1870年9月到1871年3月，拿破仑三世一直被囚禁在普鲁士，被释放后，他到英国东南部肯特郡的奇斯尔赫斯特安顿了下来，他的妻子和儿子早已在这里等他。⁽¹⁷⁾大多数来到英国的流亡者直奔伦敦。马克思描述他们是“成群的乡亲……从他们

张皇失措的表情，从他们看待一切事物的惊异神态，从他们在川流不息的马匹、单马车、公共马车、大人、小孩和狗面前所感到的惊慌恐惧的神色，立刻就可以认出他们来。”⁽¹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说英语，在伦敦无亲无故。像 1848 年时一样，众多新来者聚集到索霍区，没有钱、没有食物、没有希望。

过去，英国人对流亡者并不在意，现在却担心流亡而来的公社社员会不会带来威胁，是不是应该拒他们于国门之外。报上满是可怖的故事，描绘国际工人协会要如何把伦敦烧为灰烬。⁽¹⁹⁾实际上，来到伦敦的流亡者（也许极个别的少数除外）没有烧毁这座城市的兴趣，虽然他们的确是法国政府想要引渡回去的对象。如果英国愿意找一找，他们很容易找到：他们几乎每晚都在一个已经被激进分子视为总部和圣地的地方会面——马克思的家，莫丹那别墅。

马克思家庭的悲与欢

- 38 小燕妮恋爱 / 388
- 39 杜西的烦恼 / 401
- 40 家庭转机 / 420
- 41 外祖父的快乐 / 430
- 42 燕妮离世 / 441
- 43 两个女婿 / 451
- 44 伟人陨落 / 462

38 小燕妮恋爱

★

巴黎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无产阶级中还在酣睡的最落后的阶层，推动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的开展。

——弗拉基米尔·列宁⁽¹⁾

1871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家人都在忙着筹集资金，为公社流亡者安排住所、学校和工作。对于被困在法国的公社流亡者，马克思通过英国和大陆的众多人手秘密地把护照交到他们手中，让他们能安全地离开法国。时间最为关键：法国官员已经开始重写之前6个月的历史，把公社描绘为犯罪和叛乱，把社员描绘为窃贼和暴徒，如果不抓获他们，他们将危害法国的每个村庄，甚至危害到国外。法国人好像很愿意相信这个说法。这期间法国最流行的表演是军事法庭对公社社员的审判，2000人带着扇子和长短望远镜观看了8月的首次审判。这样的剧目还要上演3年之久，数千男女因为被指控在1871年巴黎起义中扮演的角色（无论多么无关紧要）被判处死刑或放逐。⁽²⁾

利沙加勒见证过5月28日公社社员在拉雪兹公墓被大规模屠杀后，来到英国。8月中旬，龙格也来到伦敦——这需要极大的运气。⁽³⁾他指挥过一个公社民兵团，是公社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还在3月21日与人共同创作一篇文章号召工人男女脱离资产阶级统治，从而将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引入起义。⁽⁴⁾好在有一名军医冒着极大的风

险把他藏在家里，龙格才有机会逃去比利时，之后来到英国。⁽⁵⁾

与其他很多人一样，利沙加勒和龙格很快来到莫丹那别墅。李卜克内西回忆说，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家总会住着几个法国流亡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家这期间的几乎所有信件都提到无依无靠的流亡者登门求助。⁽⁶⁾从这些聚集在自己家门口、透过光亮的玻璃注视着屋内华丽家具的一家家人眼里，燕妮肯定看到了她和孩子们在1849年刚刚住到莱斯特广场时也曾有过的彷徨。她在这些流亡者眼里，无疑像是从梦中走出的天使，用自己的财富和舒适，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她的仁慈不存在任何高傲或故作谦逊。拉法格说燕妮眼里没有社会等级，她在自己家里、自己的餐桌上把工人当作王爵一样对待。“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工人能想到这个待他们如此亲善的女人是阿盖尔公爵的后人，”拉法格写道，“她的哥哥曾是普鲁士国王的大臣。”⁽⁷⁾

琳蕻却不是那样来者不拒。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帮马克思挡住不速之客。自从马克思被认定为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的领袖，远至纽约都有报纸派人来采访这位“革命的化身”。⁽⁸⁾伦敦《名利场》杂志想登他的照片。但事实上，大多数跟马克思接触过的记者可能会失望于这位住在资产阶级房子里的头发已经花白的绅士，并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有棱角。⁽⁹⁾《纽约世界报》的一名记者说，马克思的书房点缀着一个装满蔷薇的花瓶和一本莱茵省风景册，与股票经纪人的书房没多大区别。⁽¹⁰⁾有记者说马克思说话时开放、随和，受过良好教育，有才智，只是把才智献给了空想。⁽¹¹⁾还有一名记者相比马克思，好像更害怕琳蕻。⁽¹²⁾

但这些客人和他们的喋喋不休很快让马克思感到厌倦。当有记者请他揭开国际工人协会的秘密时，他毫不客气地回应说：“先生，这里没有任何需要揭开的秘密。如果说有，也许就是有些人身上的人类的愚昧。这些人顽固地无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它的活动的最详细的报告都是公开发表的，任何想读的人，都可以读到。”⁽¹³⁾但不论马克思合不合作，报道仍在继续。有报道说马克思在比利时被捕了，还有的说他死了。⁽¹⁴⁾法国报纸报道燕妮和杜西被捕时，居然离奇地把她们说成是马克思的兄弟。⁽¹⁵⁾柏林《国民报》则故技重施，说马克思脱离工人阶级，国际工人协会无耻地剥削工人：“受到蛊惑的工人拿出自己辛苦所得让委员会成员们在伦敦过上舒适的生活。”⁽¹⁶⁾这一报道被

广为刊登，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在忙着帮助流亡者的同时进行坚决反击。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说：

.....

即使一天有四十八小时，我仍然是几个月也做不完我每天的工作。国际的工作很多，加之伦敦挤满了流亡者，我们应当给予关怀。此外，各种各样的人，如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都包围着我，要亲眼看看这个“怪物”。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神话，仅仅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17]

.....

8月中旬，马克思逃到海滨布莱顿休整。但他在这里依然不得安宁。“我到这里后的第二天，在我们那条街的拐角处，又遇上了显然是在等人的那个家伙，”马克思告诉燕妮说，他又碰到了那个之前跟踪过他和恩格斯好几次的人。“你知道，一般说来，我对于密探缺乏嗅觉。可是这个家伙竟公然地在这里监视我。昨天，我对此厌烦了，我就停住脚步，转过身去，以轻蔑的目光透过长柄眼镜打量了一下这个家伙。他怎么样呢？他恭顺地脱下了帽子，而今天就不再照顾我了。”^[18]

自从搬离索霍区，马克思和燕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世界、甚至彼此之间分隔了。他们经常共担苦难，却很少有共享喜悦。他们住在一起，但关系越来越像工作上的伙伴而非伴侣。的确，如此苦难的生活很难不影响到婚姻。但从1871年开始，他们的关系再次开始改变。他们又开始温柔地关注彼此，享受彼此的陪伴。也许是恩格斯让他们解脱了经济上的烦扰，也许是恩格斯回到伦敦后他们又站在了巨大的社交网络中心。又或者，《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终于卸下了这个巨大的包袱。不论原因如何，燕妮和马克思在这一年好像又焕发了爱意。马克思从布莱顿写信给燕妮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任何事情都没有比你不在这里更使我感到遗憾。”^[19]

9月初，小燕妮和杜西终于逃脱法国的磨难，回到伦敦，正好来得及帮马克思准备国际工人协会要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秘密特别会议。（年度大会本来计划在巴黎召开，但已无法实现。又由于协会受到的负面关注太多，不宜举行公开的大会招致太多关注。）会议不仅要确定后公社时期的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需要在会上谋划如何对巴枯宁近期试图控制协会的行为进行还击。

自从1864年最后一次来到马克思家之后，巴枯宁就忙着想方设法让协会脱离马克思的主导。他在1868年成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试图与协会联合，但遭到了拒绝。为了达到协会的人会要求，巴枯宁声称已将该组织解散，实际上，他却将其改为秘密组织继续活动。⁽²⁰⁾之后，他在1870年投入到法国的混乱当中，部分原因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者圈子，最主要的是无法抵抗战斗的诱惑。但他这个体形庞大的俄国人发出战斗的召唤后，换来的却是警惕和怀疑。他被捕后，被投入里昂一座地牢，他越狱逃到马赛后卖掉了唯一的财产手枪，刮掉头发和胡子，才最终逃回瑞士。⁽²¹⁾

巴枯宁无疑是个冲动的角色，但他的不断失败好像并未影响到他的传奇色彩。马克思知道，对手对国际工人协会和对自己的领导都能产生真正的威胁。⁽²²⁾巴枯宁脱掉标志性的无边帽，戴上了绑着红丝带的宽边草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尤为成功，在瑞士也有一些追随者。伦敦这次大会非常重要，将检验他取得的进展，并解决英国代表对于马克思支持巴黎公社而产生的分歧。就在全世界都以为国际工人协会处在力量的顶峰时，它实际却面临着分裂的危险。⁽²³⁾

来伦敦参加会议的代表首先去了马克思家。很多代表从未见过马克思——他只是文件或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西班牙人安塞尔莫·罗伦佐便是首次见到马克思，这次见面让他十分难忘：

.....

我们来到一座房子前，站在门口的是一位庄重和蔼的长者。我带着小心翼翼的尊敬走近他，说自己是协会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他拥抱了我，亲了我的额头，一边带我进屋，一边用西班牙语跟我温暖地讲话。他就是卡尔·马

克思。他的家人在休息，他便亲自给我准备了一些非常精致可口的便餐。

.....

晚上，罗伦佐住在了马克思家，第二天又极为高兴地见到了马克思的女儿小燕妮和杜西。他描述说小燕妮“具有一种理想的美，不同于我所见过的所有女性的美。她让我读一些东西给她，她好听一听正确的发音”。接下来，他又见到了16岁的杜西，后者主动帮他发一封电报回西班牙。“让我极为诧异和感动的是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居然很欣然地帮助一个还不认识的外国人，这与西班牙资产阶级的传统完全相反。这位年轻的女士，或者说应该女孩，非常美丽、甜美和开心，完全就是青春和快乐的化身。”杜西不像父亲和姐姐那样能讲西班牙语，因此他们的沟通有些困难。“每次说错，我们都大笑个不停，就像多年的朋友一样。”^[24]

会议持续了5天。列斯纳回忆说，各个代表语言不同，性情千差万别，观点各异。气氛极为紧张，相互争论不休，会间风暴阻碍不断。^[25]但最终，会议通过了17条决议，对巴枯宁的威胁做出了回应，并对会员的下一步行动做出了重要说明。^[26]虽然报上骇人听闻地报道说协会想摧毁世界各国首都，它在巴黎公社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却提出了一个更加合法的起义方式。“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及实现最终目标——消灭阶级。”^[27]

9月24日，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协会举办盛大晚宴，庆祝成立七周年。^[28]（恩格斯将协会极为难得地存续如此之久完全归功于马克思：正是他不断招致批评的特点——他的“破坏性的权力和不容异己的性格”——保证了协会的凝聚。马克思无法忍受看着协会走向邪路或失败。）^[29]宴会的餐桌上摆满法式和英式食物、红酒和啤酒，多人发表了演讲。马克思发表压轴演讲时，把协会受到的迫害比作早期基督徒受到的迫害，他指出：罗马人的暴行没能挽救帝国的崩塌，无论资产阶级国家如何迫害工人运动，也无法挽救它们的失败。会议达成的第九条协议号召建立工人的政党，马克思在演讲中向试图阻碍工人参与政治的政府发出警告：“我们必须用拥有的一切直面他们。……我们必须

向政府宣布：我们会在可能时和平地对抗你们，但在必要时，我们会拿起武器。”⁽³⁰⁾

恩格斯和马克思说，这次会议比之前历次集会都更加成功，因为规模更小、秘密召开，与会代表大张旗鼓的想法更少一些。⁽³¹⁾会议结束后，他们做了之前从未做过的事——去兰兹格特海边与已经先行抵达的燕妮和莉齐会合，在这里一起住了5天。⁽³²⁾自从欧内斯蒂内·李卜克内西在1862年离开伦敦去柏林后，燕妮在运动中就没了女伴——虽然她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但欧内斯蒂内已经在1867年离世。⁽³³⁾燕妮和莉齐很快成了朋友。也许是因为出身工人阶级更加早熟一些，44岁的莉齐虽然比燕妮（57岁）小很多却更显老。燕妮则由于之前长时间一无所有，现在终于有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好像重新焕发了青春。

刚刚参加完革命活动（被政府密探描述为密谋了新的、更加邪恶的计划）的马克思、恩格斯与燕妮、莉齐一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游客。他们爬山，洗海水浴，坐在沙滩上休息，看吞火和傀儡戏表演，尽情吃喝。恩格斯说自己每天睡10个小时。⁽³⁴⁾燕妮告诉女儿们，经过长时间散步，马克思的精神好多了。⁽³⁵⁾

虽然他们4个感觉就像一家人，其他亲人（以及他们与其他亲人的关系）却远没这么亲切欢快。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翻译成德语后，一些德国报纸进行了摘录，使得恩格斯的74岁的母亲发现他不仅没有放弃激进政治，而且仍然没有离开马克思。⁽³⁶⁾她需要答案。虽然恩格斯与父亲从未亲近过，他却深爱着母亲，觉得她能够理解自己。他告诉母亲不要相信报上关于巴黎的报道。至于自己，他说：

.....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三十年来所持的观点，这您是知道的。假如事变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不仅会保卫它，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您也不应该觉得突然。……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并且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似乎是我把他带坏了。⁽³⁷⁾

.....

马克思的亲人对他选择的道路感到恐惧。住在开普敦的妹妹来伦敦探望他时，在餐桌上对他大加指责，说不能容忍自己的哥哥在体面的家庭长大，父亲是著名律师，到头来却成了社会主义者的领袖。马克思早已听过比这更加尖刻的批评，因此，在耐心地听她说完后，爆发出一阵大笑。⁽³⁸⁾他和恩格斯都不打算悔改——事实上，他们在休整之后，正打算再接再厉。《资本论》第一卷传来好消息：经过4年，1000本德文第一版终于全部卖出，出版商打算印第二版。⁽³⁹⁾

小燕妮失去了工作，已经雇她做了3年家庭教师的那家人把她辞退了，因为“他们惊恐地发现，我是煽动捍卫非法的公社运动的首领的女儿”。⁽⁴⁰⁾其实，小燕妮也已经不太可能专心于做家庭教师——她无法无视穷困的流亡者，以及马克思的战友给他寄来的大量信件。从意大利、瑞典、法国、俄国和中国香港寄来的信件已经堆积如山，巴黎公社虽已结束数月，涌来的流亡者仍不见减少。而且，秋天来到的这些人更加穷困，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不会到现在才得以逃出法国。小燕妮白天在城内为他们奔走，晚上则写信到深夜，募集资金，帮他们解决无穷的困难。这是一件累人的工作，而在过去的两年间，马克思的这名27岁的女儿身体一直不好。据医生诊断，她的呼吸问题是胸膜炎导致的，有时严重有时缓和，但呼吸一直不轻松。虽然身体最需要的是休息，她还是投身到了工作当中。在1871年12月写给库格曼一家人的信中，她说自己虽然多方努力，还是没能给流亡者找到多少帮助：“雇主们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用化名找到了工作的人，一旦被发现就被解雇。……他们的痛苦是难以描绘的：他们几乎饿死在这个‘人人为自己’的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大城市的街头。”⁽⁴¹⁾

情况最糟糕的流亡者有460人，他们在11月份来到英国前，在法国北部海岸上的浮码头被关押了5个月，最终，法国政府决定不对他们进行起诉，在狂风暴雨中将他们丢在了英国海岸上。⁽⁴²⁾他们没有食物，没有钱，没有暖和的衣物，长途跋涉到伦敦后，有的找到了国际工人协会，但协会的资金很快用完了，不足以满足他们所需。⁽⁴³⁾

工作虽然艰苦，而且时常令人沮丧，小燕妮却重新唱起歌来。恩格斯在写给拉法格的信中说，她的歌声比以往更加强劲和清晰。⁽⁴⁴⁾他把这归功于她的身体好转，但实际上，这是因为她处在了恋爱中。

龙格来到伦敦后，马上重新加入协会总委员会，重新与马克思进行交流。之前与马克思家交往时，他便对小燕妮有好感。这次回到伦敦，他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她也没有拒绝他的甜言蜜语。原因很简单。首先，龙格需要拯救：他刚刚经历过战斗，巴黎的数周恐怖经历和逃亡中的担惊受怕给他带来的精神伤害仍未消退。其次，他虽然与弗路朗斯不同，但也同样非凡。实际上，他比她之前的爱慕者更像她的父亲。32岁的龙格更喜欢作为一个作家和思考者，只有在必要时，才会诉诸武力。他的经历与马克思很像：出自诺曼底资产阶级家庭，学习过法律，办过法国最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报纸，是个优秀的辩论家，因为政治思想被一个又一个国家驱逐。也许从小燕妮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龙格尊敬她的父亲。没有任何男人可以代替马克思在她的情感和思想中的地位。她的丈夫必须知道这一点，而且明白为什么，龙格做到了。

马克思一家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已经如此亲密，直到1872年初，小燕妮不小心说漏了嘴，当时马克思说要去龙格的住处跟他商量一篇报上的文章，小燕妮脱口而出说：“你去他家找不到他的，他去找荣克讨论事情了。”她后来告诉龙格说，她的父亲、母亲和恩格斯都停下手上的事，转过头看着她，“听到我如此熟悉你的行踪，他们极为诧异”。⁽⁴⁵⁾既然无法再隐藏下去，他们决定由龙格在2月19日找马克思“谈一谈”，请求他把女儿嫁给他，小燕妮还建议他们在此之前先不要再见。但龙格无法忍受那么久不见面（“两天也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说自己星期日晚上在恩格斯家，小燕妮可以“碰巧”去。小燕妮这个周末正好约好了要练歌，但龙格说她的歌是为他而唱，他应该有优先权。“我非常清楚，我爱慕的人儿，你想把未曾言语的话唱给我听，但我已经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不需要语言，已经从你的唇传到我的唇。”他觉得这样的“偶遇”应该没有风险，因为在他们公开宣布之前，他无法想象任何人（尤其是她父亲）会细腻到发现他们的情感。“任何人都猜不到我像现在爱你那样爱你，除非他也能这样爱，但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总之，我会梦到你。……我一生要你的吻。”⁽⁴⁶⁾

与龙格的激情洋溢不同，小燕妮给他的回信条理清晰，明显表现出了对于龙格与父亲见面的焦虑，以及想到结婚后将不得不放弃作为一个活动家和作家而产生的失落。“星期一的会上，我一直想着你一定要戴

黑色、或者至少暗色的围巾，你平时戴的红色的围巾不协调，跟你的脸也不搭配。”她承认自己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忍不住想到自己的俄国革命朋友伊丽莎白·德米特里夫看到后会作何评价。“她得有多不悦，多失望！她一直希望我做一个女英雄，第二个罗兰夫人。……别忘了，是你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个女英雄。”⁽⁴⁷⁾

可惜的是，对于马克思和龙格的谈话没有任何描述留存下来，但结果是他们所希望的：马克思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马克思夫人对前景并不看好。她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

.....

龙格是个很有才华的、很好的、可爱而又正派的人，这一对年青人观点和信仰都一致，我认为这是他们未来幸福的保证。另一方面，对于这个结合，我毕竟不能不有所担心，老实说，我本来希望燕妮（为了变换一下）选择一个英国人或者德国人，而不要选择法国人，自然法国人有其民族素有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但也有其弱点和缺陷。……我不能不担心，燕妮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也会遭到那种与此分不开的操心和痛苦的命运。⁽⁴⁸⁾

.....

这个决定对马克思同样不会容易，一方面他与妻子具有同样的忧虑，另一方面他不想与最喜爱的女儿分开。龙格的请求得到应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帮马克思在巴黎完成的一项事务。上一年12月，在西班牙的拉法格为《资本论》找到一名法国出版商，支付了2000法郎给出版商作为启动资金。⁽⁴⁹⁾ 这年1月，龙格在巴黎找到一个人负责翻译。约瑟夫·鲁瓦翻译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具有翻译晦涩难懂的德语文献的经验。⁽⁵⁰⁾（鲁瓦得到马克思的允许后随时可以开始翻译《资本论》的一部分。）他答应每天用六到七个小时翻译这部著作——龙格聪明地把这一消息在与马克思谈话前告诉了他。⁽⁵¹⁾

不管马克思一家最初对这件事如何冷淡，在3月正式订婚后，他们还是开始欢喜起来。恩格斯告诉劳拉说，自己也像当时取笑她一样取笑了小燕妮。琳蘅甚至允许龙格进厨房，展示不是非常成功的法国神

奇厨艺。⁽⁵²⁾

在小燕妮的感情开花结果的同时，所有人没有注意到，杜西也步入了爱河。

爱琳娜·马克思已经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士。她的一头黑色长发将近及腰，被库格曼的女儿弗兰契斯卡描述为“的确非常迷人，但又有点花哨”。⁽⁵³⁾她的肤色像父亲一样偏黑，眉毛黝黑浓密。但马克思的脸显得严厉，杜西的脸却显得诱人。一名俄国人说她身材苗条、性感，带有德国浪漫主义女英雄的气质。像她的性格一样，她的美是自然的、清楚的，不局限于表面上。⁽⁵⁴⁾她极为勇敢和活泼，闪闪发光的眼睛总在期待着有趣的事情出现。她能在转瞬间晴转阴、阴再转回晴，但最能表现她的是她的微笑——或者说笑声。

从法国回来后，杜西开始担任父亲的通讯员，帮他写信给从欧洲大陆各地的激进分子，并此过程中成了“地地道道的政治活动家”（燕妮语）。⁽⁵⁵⁾她在信中展现了良好的语言能力（法语、德语和英语）和社会观念，既有超出年龄的成熟，又有年轻人的直率，从头到尾展示着马克思所说的“凶悍”性格。⁽⁵⁶⁾她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她从不伪装：她就是父亲的16岁的信使，有时显得学问不错，有时闹些笑话，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一个有点蠢的女孩。在当时的欧洲反动环境下，马克思的每个收信人都面临着危险，轻则受到监视，重则被捕。⁽⁵⁷⁾杜西的信却让革命这件事显得不那么危险和凶恶，反而更像是家事。

她很擅长找理由。她写信给《资本论》的俄文版译者时说：“阁下：爸爸现在非常忙，……他要我转告您……他一直要写到深夜，白天也不离开自己的房间。”⁽⁵⁸⁾同时，她又能让人感受到温暖：把莱比锡的李卜克内西称作“我亲爱的老图书馆”；写到流亡者的挣扎时说：“人家都说他们盗窃了成百万金钱，我倒希望其中一部分真的被他们拿去了”；写到自己时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认出您来，但是我相信，您不会再认出我来。仅在两三年以前见过我的人，现在都很难认出我了。……请原谅，我的字写得很糟，但是我的笔很不好使，墨水也几乎用完了。”⁽⁵⁹⁾杜西给欧洲的革命者写信时，好像把他们当作了最为平常的通信人。

杜西最亲密的朋友是她的父亲——拥有世界上最顶尖头脑的马克

思。⁽⁶⁰⁾一般人自然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流亡者中虽有数不清的人追求她，她对自己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也感到喜悦，却没有爱上其中任何人。⁽⁶¹⁾但赤色的圈子里有一个人凸显了出来：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

利沙加勒显然具有让杜西向往的男子气概，就像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在小说中刻画的人物。他出身自古老的法国巴斯克家庭，一出生便是伯爵，但由于激进的社会思想，被家庭赶了出来。他经历丰富：在一所因政治原因被辞退的教授们建立的学校里任过教；编辑过报纸，却因为报纸的激进内容被多次关进监狱；当1870年新的法国共和国需要与普鲁士作战时，加入了甘必大的军队。⁽⁶²⁾停战协议（被他视为失败）达成后，他去了巴黎创办报纸，报纸办不下去后，他把笔换成了枪，在贝尔维尔街垒上战斗。他枪法极准，用剑也是好手，在决斗中毫不退却，最终受了两处重伤。⁽⁶³⁾在伦敦，他头上悬着逮捕令，知道法国人在向英国施压，要求引渡他。

利沙加勒经常来莫丹那别墅，得到马克思一家人的盛情对待。小燕妮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曾提到马克思评价说利沙加勒的短作《五月街垒战的八天》是关于公社的唯一一本值得一读的作品。⁽⁶⁴⁾但一家人显然都未能发现这个流亡中的高贵的人与马克思的小女儿之间的情感。1872年3月，利沙加勒和杜西秘密订婚。他34岁，她17岁。

恩格斯对杜西非常了解，可能注意到了她与利沙加勒之间的一丝不同寻常。（他告诉劳拉说，杜西为姐姐小燕妮感到极为高兴，而且“表现得很想紧随姐姐的脚步”。）⁽⁶⁵⁾但马克思和燕妮不会支持。他们不想再有一个流亡的法国女婿，也不想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事实上，他们当时也无暇注意这些，一家人都在担心劳拉。

劳拉和拉法格一直安静地住在西班牙港口小城圣塞巴斯蒂安，但在1871年9月，当地官员要求保尔在6个小时内离开，否则将被逮捕。⁽⁶⁶⁾西班牙的政治气候再次发生变化。拉法格只得离开，但劳拉和施纳普斯无法跟他一起。⁽⁶⁷⁾孩子仍未从上一年夏天的病症中恢复过来，现在又出现了霍乱的症状。劳拉在9个月里一直照顾在施纳普斯的床边，盼望着能让这个唯一活下来的孩子恢复健康。到了12月，孩子仍未康复，但已能够承受颠簸，劳拉便带上他向南去马德里与拉法格会

合。⁽⁶⁸⁾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高兴拉法格在西班牙首都对抗巴枯宁在那里的影响，燕妮却担心外孙的健康，她对于保尔来信总是乐观地汇报国际工人在西班牙取得的巨大成功，却极少提到施纳普斯而恼怒。1872年2月，马克思责怪保尔只说些关于运动的有趣的细节，“对亲爱的小病人却只字未提”。⁽⁶⁹⁾3月，焦急的马克思再次询问外孙的情况。⁽⁷⁰⁾5月，他得到消息：施纳普斯仍旧病着，而且愈加虚弱。⁽⁷¹⁾

小燕妮和龙格将婚期确定在7月中旬。巴黎媒体（或者如小燕妮所说，巴黎的警察媒体）将小燕妮视为国际工人协会最高领袖的邪恶女儿，不断编造关于她的私生活的谣言。小燕妮说右翼的《高卢人报》已经把她嫁出去20次了，她在6月告诉库格曼说：“当我真结了婚的时候，想必这些白痴文人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了。”⁽⁷²⁾但婚礼没有在7月举行——考虑到劳拉和保尔，他们把婚期推迟了。⁽⁷³⁾1872年7月1日，拉法格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们可怜的小施纳普斯经过11个月的煎熬，就快死了。”⁽⁷⁴⁾7月底，孩子死了，4岁的施纳普斯是劳拉几年来失去的第三个孩子。

一直以来，劳拉就有些与人疏远，她的这一特质因为孩子的夭折而变得更加明显。这一时期的一张照片很能说明这一点：曾经艳丽的年轻女人变得低沉，眼神毫无生机，面容冷厉。她和丈夫因为拉法格的政治活动流亡到西班牙，又因为“党”（恩格斯和她的父亲）的指令而留在这里，建立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分部。不难想象，她应该会责怪生命中的这三个男人导致了自己的悲痛。他们对政治和工人的投入赔上了马克思一家，现在又赔上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她没成为寡妇，但现实比这更糟。一年前，她在比利牛斯地区奔波时还有两个孩子在身边，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让她的伤痛更剧烈（如果还能更剧烈的话）的是，她的损失好像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拉法格一直乐观地汇报西班牙的政治进步，实际上，这里的社会主义者分裂严重，巴枯宁的影响丝毫未减。（巴枯宁说拉法格是“废物堆起来的”。）⁽⁷⁵⁾根据拉法格的描述，恩格斯向伙伴们夸耀说国际工人协会已经成为西班牙工人的党，但实际上拉法格尚未对工人产生任何影响。⁽⁷⁶⁾失败不能完全归因于保尔，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将马克思对组织

的强调视为普鲁士人的“独裁主义”，对其有所怀疑，他们更愿意接受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⁷⁷⁾

政治上一无所成，又经受了丧子之痛，拉法格夫妇埋葬施纳普斯后不久，便启程前往葡萄牙，算是迈出了返回伦敦的第一步。保尔说这次旅程“有点艰苦：在热得小鸡都能孵化出来的天气里，坐了三十个小时火车。好在，我们有一个足足十八磅重的大西瓜，才算在曼恰沙漠没被渴着”。⁽⁷⁸⁾

强韧的拉法格将很快从不幸中恢复过来，但劳拉一直未能完全恢复。26岁的她还年轻，还可以生育孩子，但她没再生育。她好像把自己也一点一点埋进了巴黎、吕雄和马德里的三个小坟墓里。她失去的不仅是爱，还有信心。在马克思家的女人中，劳拉可能是唯一一个对马克思描绘的未来从根本上有所怀疑的，因为一家人为此付出了太高昂的代价。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她会继续出力推动马克思的目标，但与母亲和姐妹不同，她不再带有对事业的投入。在失去孩子、快乐和生活之后，她也失去了信仰，剩下的，不过是家庭的事务。

39 杜西的烦恼



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今后的生命，正如我以往的活动一样，将贡献给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我们深信，这种思想迟早会带来无产阶级的统治。

——卡尔·马克思^{〔1〕}

1872年5月，马克思暗示将在秋天的年度大会后退出在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位置。他已经为协会服务8年，很多会员因为与他意见相左而退出。^{〔2〕}因为他对爱尔兰人的支持而惹恼了英国会员，又因为他对巴黎公社激进分子的倾力支持而使得更多会员与他疏远。还有的会员在思想和政治上与他一致，却痛恨他果断的作风。

马克思与会员争论，与各国政府斗争，为的是给工人建立一个组织，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以便通过政治挑战资产阶级的统治。但他已经准备把火炬传递给一个新的领袖——或者说众多新的领袖。在公社之后的数月里，虽然各国政府一直强调要防范这个作恶的组织，协会还是不断在丹麦、新西兰、葡萄牙、匈牙利、爱尔兰、荷兰、奥地利和美国建立起新的支部。^{〔3〕}协会有自己的生命，马克思希望能够静静地退出，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着它继续壮大。他告诉一名比利时代表说：“我迫切地期待着下一届代表大会。那将是我受到的束缚结束之时。此后我将不再担任组织职务，我将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4〕}

马克思的确疲惫，但这绝不是他决定不再活跃于政治的全部原因。公社把马克思带入了作为一名革命战略家或者说理论家的世界。他的文字突然有了需求，不再被人无视。^[5] 迈斯纳打算发行《资本论》第二版，但马克思坚持要进行一些修改——用了一年多时间。巴黎的鲁瓦正在把第一卷翻译成法语，马克思对他的译文最初比较满意，但后来发现法译本还是需要进行大量修改。^[6]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需要发文解决协会内部的分裂问题——他们认为是巴枯宁作祟。德国有人想出版《共产党宣言》，他们为此需要写新的序言，还需要翻译成法语和英语。^[7] 此外，马克思还要竭力监督《资本论》的俄文版情况。

马克思之前一直看不起俄国同行的社会主义热忱，因为他们大多是贵族。但新一代俄国人，不管是从圣彼得堡还是从流亡的日内瓦来信的，抑或直接登门拜访马克思的，用恩格斯的话说，都是“来自民间的人。……这些年轻人的刚毅和顽强的性格以及理论素养，简直是惊人的。”^[8] 马克思的朋友和国际工人协会伙伴彼得·拉夫罗夫是一名数学教授，他从圣彼得堡被驱逐后，住在巴黎，写的很多信件得到了发表。他说，俄国知识分子亏欠普通民众甚多，正是有了民众的辛苦劳动，他们才有了特权，能够思考和发展。^[9] 很多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这一点，走向刚刚脱离农奴身份的农民，开始在俄国各个工厂和乡村进行一项被他们称为“深入民众”的宣传。^[10] 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俄国人希望祖国能够在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把西方社会的所有福利带给全体公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自然的选择，因为它反映了俄国的共有传统。^[11] 但他们在实现的方式上却有分歧，巴枯宁的追随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提倡暴力。其他人（包括接受马克思思想的人）则认为政治教育是改变俄国的重要步骤。^[12]

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了俄国书报检查官的审查，他们认为这本书太难以理解（如果有什么需要理解的话），^[13] 不会有人购买，而且也难以在司法上追究，因为它采用的是数学科学形式，但他们不允许马克思的照片出现在书中。（马克思传记作家戴维·麦克莱伦说，当局认为那样会“暗示对马克思人格的极高尊重”。）^[14] 照此规定，1872年3月，3000本俄文版《资本论》印刷完成。^[15] 书卖得很快，不到两个月便已售完，而且读者人数比书的销售量大得多。^[16] 俄国读者

经常相互借阅《资本论》，有时还把它藏在《圣经新约》的封皮里（很有预见性）。⁽¹⁷⁾与法译本不同，马克思对俄译本非常满意，说翻译得“很出色”。他在5月收到一本后，让丹尼尔逊再寄一本来，以便送给大英博物馆。⁽¹⁸⁾

面对这么多工作和期限，马克思少见地没怎么生病，他的烦恼好像都被燕妮吸收了。当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处在聚光灯下——燕妮一直希望他达到而且坚信他能达到的位置——她却怀念起他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的日子。她告诉李卜克内西说，只有马克思不要任何荣誉，也不再出头露面，“坏蛋们才一声不响。但是，一旦朋友们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使他出头露面，那么一帮警察式的人物和‘民主派’就发出同样的吼叫：‘专制、贪权、虚荣！’他要是能够继续安安静静地工作，为战斗着的人们发展斗争的理论，那对他该是多好。”

李卜克内西正在德国等待叛逆罪的判决，燕妮还告诉他说，自己经常因为他面对的政治麻烦想起他的新夫人娜塔利亚：

.....

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我们妇女的负担尽管是次要的，然而更为沉重的。男人在同外界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在敌人面前变得坚强起来——他们的人不可胜数——而我们却坐在家织补袜子。这也不能排除一些牵挂，而日常琐事却在慢慢地、但是的确地消磨着勇敢精神。我是根据三十多年的经验这样说的，但我可以说，勇敢精神并不是那么容易地丧失的。现在我太老了，没有多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巴黎公社）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一些。⁽¹⁹⁾

.....

马克思这年春天的主要工作（也是燕妮说的恼怒的主要来源）是准备为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未来与巴枯宁展开一场大战。在意大利和瑞士时，巴枯宁是出色的鼓动者，他与知名革命者联系，出版小册子，发展追随者，让他们来传播他这位强大的俄国斗士的神奇传说。1869年，巴枯

宁在日内瓦遇到 22 岁的俄国虚无主义者谢尔盖·涅恰耶夫——即便算不上是精神病患者，也绝对是个危险的炸药包。涅恰耶夫编造了自己的革命履历，声称自己是从关押过巴枯宁的彼得保罗要塞逃出来的，是俄国一个地下组织的领袖，成员有数千人之众。⁽²⁰⁾ 很难说巴枯宁有没有相信，但他显然受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影响，他唤起了他对阴谋的热爱，让他觉得与俄国重新建立了联系。

在与涅恰耶夫来往期间，巴枯宁完成了《革命者教义问答》，在其中提出两个基本原则：“结果比方法重要”和“越糟糕，越好”。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巴枯宁相信一切“推动革命的手段都是可以的，阻碍革命的都是犯罪”。不只如此，在巴枯宁看来，用街灯点亮夜晚是不够的——整个城市都应该是一片火海。“革命只有一种科学，”他写道，“破坏的科学”。⁽²¹⁾

巴枯宁本应是最不可能翻译他的敌人马克思的著作的人，但在 1869 年，他收到一个出版商预付的酬劳（比马克思从这本书挣到的钱还多），请他将《资本论》翻译成俄语。但他只翻译完 32 页，便被涅恰耶夫拉去做其他事情了。⁽²²⁾ 安排巴枯宁进行翻译的是与丹尼尔逊一起执行翻译任务的俄国年轻人尼古拉·柳巴温。为了把巴枯宁从翻译合同中解放出来，涅恰耶夫写了一封信给柳巴温，以自己庞大的虚无主义组织的名义，指控他剥削巴枯宁，并明言如果不肯取消巴枯宁的合同，自己将采取“不那么文明的方式”。⁽²³⁾ 这一威胁并非空穴来风：涅恰耶夫曾在莫斯科殴打并射杀一名学生，仅仅是因为对方质疑他的地下组织的存在。⁽²⁴⁾

马克思得知这些细节后，告诉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为了准备在 1872 年 9 月 2 日在海牙举行的协会年度代表大会上与巴枯宁摊牌，马克思开始收集他与涅恰耶夫来往以及无视协会规定继续经营他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证据。马克思希望凭借这些证据，将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驱逐出协会。⁽²⁵⁾ 对马克思来说，这并不存在道义上的问题：他要赶走巴枯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存在根本不同。巴枯宁认为工人不应参与政治斗争，也不应建立工人的政党。相反，他认为工人应该依靠武力来赢得权利。⁽²⁶⁾ 马克思从 1849 年便开始与这种思想做斗争，现在，这种思想已经传播得更快、更广，这样的思想也就愈加危险。马克思相信革命必

将流血，但暴力不应是第一选择；他尤其不希望协会会员变成暴徒。

马克思之前从未参加过在伦敦以外举行的协会年度代表大会，但1872年这次会议太过重要，他带着一家人（还包括想要成为一家人的两名法国人：龙格和利沙加勒）来到了荷兰，恩格斯自然也来了。这次会议将是巴黎公社以来协会举行的首次公开集会，报纸纷纷编造说协会将在会上决定接下来的恐怖行动。^[27]来自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到海牙，对暴力激进分子的这次集会进行报道。马克思彻底被记者包围，有的只是想看看他，其他的则想最先了解和报道他的邪恶计划。到处一片混乱。一家当地报纸警告市民不要让妻子和女儿在这期间到街上去，珠宝商要尽量暂时关门。^[28]但报纸和警察都失望了：代表们像是来参加商务会议一样秩序井然——这要归功于他们佩戴的天蓝色花结。^[29]

共有来自15个国家的65名代表来到海牙，会议前3天讨论的焦点是哪些人有资格参加会议。^[30]最终，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于9月5日在位于海牙工人阶级区域的一个舞厅里召开。会场内桌子以马蹄铁形摆放；舞厅上方有一处包厢，观众可以从这里看到革命者开会议事的情况，马克思家的女人们也在这里观看。^[31]

经历过法国和西班牙的伤痛之后，来到海牙的劳拉消瘦而虚弱，一家人都惊恐于她的变化。劳拉虽然身体虚弱，但她只会让世人看到自己身体的疼痛，不会让他们看到自己内心的悲伤。她遗传了父亲的骄傲，不会让“庸人们”看到自己的苦难而开心。^[32]之前从未见过她的库格曼说她美丽、优雅、可亲。他也是第一次见到燕妮。经过数年与她的通信，听她描述一家人的苦难，他本以为看到的将是一个身材走样、满脸倦容的老妇人。相反，燕妮依然苗条，看着比58岁的人年轻得多。她对会议极为投入，使得库格曼在会议结束离开时还以为是她引导马克思进入了激进政治。^[33]

杜西已经完全是一副年轻女人的模样：头发盘在头顶，只留几缕卷曲着散在额头，脖子上围着一条天鹅绒的丝带，领口开得也更低了一些。^[34]小燕妮是三姐妹中变化最小的，当然，与龙格订婚之后，之前总是藏在心里的快乐也更多地流露了出来。

会场里，马克思坐在恩格斯身后，包厢里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一个神秘的巨人，起义的典型代表，头发胡子居然已经花白，一边抽烟

一边在本子上急匆匆地写着。⁽³⁵⁾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少，站在边上看的人数众多（有报纸称房间里聚集的人数比能容纳的人数多十倍），而且每个人好像都有话要说。⁽³⁶⁾争吵极为激烈。维持秩序的声音被大家无视，喊声变成争论，争论几乎变成打架。

从一开始，马克思一边就占据优势：他们人数比巴枯宁的支持者多得多，而且巴枯宁本人也没有参加。第一个表决的议题是维持总委员会作为协会的领导者，而不是像巴枯宁的追随者要求的那样变成单纯的联络和通信中心。马克思一边获胜，总委员会的权力得以保留。接下来的议题被一名代表描述为不啻于一场“政变”。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先做了精心安排。恩格斯起身，手上拿着雪茄，操着平时的说话语调，时不时把窜到前额的头发往后缕一下，他建议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转移到纽约。他没有公开说的是，通过转移，马克思可以逐渐放开对协会的领导，同时确保巴枯宁无法控制协会。美国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但人数极少，而且美国人对暴力的痛恨也将使得他们难有大的作为。恩格斯说完后，会场炸开了锅。批评者说不如把委员会转移到月球上去。但正如其他出色的政治家一样，马克思事先计算过票数，他知道这个提议能够通过——的确通过了，但帮手出人意料地来自巴枯宁的追随者，他们以为马克思把协会转移到纽约的决定等于摆脱一切控制，这正是他们想要的。⁽³⁷⁾

会议最后一天轮到马克思在与巴枯宁的长期斗争中抛下一枚炸弹。来到海牙后，马克思便非常紧张，很少能够入睡。几天里，在其他入站着争论时，疲惫的他经常都是安静地坐着，但现在，他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整个会场安静了下来。他要讲一讲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如何试图秘密破坏协会，以及一件调查委员会已经讨论过但不打算公开的“个人事件”（涅恰耶夫威胁和谋杀案）证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疯狂本质。实际上，马克思并不需要讲述涅恰耶夫的事情——会场里的人都已经知道，每个人都清楚马克思的目的。⁽³⁸⁾

面对少数听众时，马克思是强硬的演说者，但听众更多时，他的语调和气势都有所减弱。上了年纪之后，马克思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博学又有些古怪的教授。他讲话时，右眼上戴着的单片眼镜时不时掉下来，他只得停下，把它弄好。⁽³⁹⁾即便如此，整个会场都仔细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更重要的是，听众与他意见一致：驱逐巴枯宁及其一名同伙。⁽⁴⁰⁾

投票结果宣读后，一名腰上系着红旗的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拔出一把手枪，指向宣读结果的代表，喊道：“这样的人应该被杀死。”^[41]他很快被制住，解除了武器。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实在是对自己批判巴枯宁的理由的最好例证。

至此，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正式结束。晚上，他带着家人和几个朋友来到海牙附近的施维宁根大酒店。这座高雅的酒店正是马克思和燕妮在特里尔莱茵河畔极为熟悉的那种场所。闪烁的煤气灯映照着北海平静的水面，管弦乐队的演奏声飘在空中。脱离了协会“束缚”的马克思将回归私人生活，做一名丈夫、父亲和理论家。这一晚便是改变的开始，他处在女儿和密友的环绕中。他们进餐，跳舞，游泳。不过，既然是马克思家的聚会，就不能没有插曲发生：一个伙伴游得太远，回不来了，好在有出色的士兵恩格斯在，挽救了这位朋友。^[42]

第二天，马克思做了自己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可以说，这个讲话比他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讲的任何内容都重要得多，因为它引起的争议让他的追随者一直争论到了下个世纪：有人认为他本质上是和平主义者；其他人认为他是暴力革命的支持者。事实上，这次讲话说明他两者都是。马克思强调，历史先例不能决定每个国家的革命如何展开，因为各个国家的答案都不相同：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必须采取暴力。

马克思保证，虽然自己的日常参与会减少，但对斗争的忠诚不会改变。“我不会退出国际，”两家报纸引用他的话报道说，“我今后的生命，正如我以往的活动一样，将贡献给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我们深信，这种思想迟早会带来无产阶级的统治。”^[43]

最终，马克思离开协会和与巴枯宁的斗争都很轻松。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确保投票时能占得优势。同时，他也得益于巴枯宁未能出席。俄国人说自己未能出席海牙会议的原因是没钱，但也可能是因为他根据经验判断自己会输——协会毕竟是马克思的产物。^[44]这一年，巴枯宁的确很不走运，他的朋友涅恰耶夫在瑞士被捕，最终将被送去彼得保罗要塞；^[45]他的年轻妻子安东尼娅有了一名意大利恋人，跟人家生了两个孩子，对此他最终许可了，因为他没有给他的妻子应得的关注。^[46]此外，本已体形巨大的他又胖了，（朋友形容他像大象。）^[47]他稍微一动就气喘吁吁，穿个靴子都能累得脸上发青。^[48]海牙会议两年后，巴枯宁宣布退出公众生活：“今后我不再打扰任何人，请别人也不要打扰我。”^[49]在一名裁缝的帮助下，他把衣服进行了翻新，摇身一变成了瑞士资产阶级。他说自己是“最后的马希坎人”，^[50]还说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三个人，其中两个也会压迫第三个。^[51]同他的德国对手一样，巴枯宁知道自己是时候退出舞台中央了。

1872年10月9日，小燕妮和龙格终于结婚，地点也是在劳拉和拉法格4年多前登记的圣潘克里斯注册办公室。^[52]但相比他们，已经28岁的小燕妮和33岁的龙格更像是走了个过场，他们的婚期是从7月推迟到现在的，而且在得到法律认可前，马克思一家人早已将他们视为夫妻。

龙格夫妇马上离开伦敦去了牛津，沙尔在那里教授法语，但他们的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不顺利。龙格的名字出现在了国际工人协会海牙大会的参会人员名单中，他的学生陆续婉拒了他的授课。^[53]他和小燕妮还没来得及过上舒心的婚后生活，便陷入了马克思一家极为熟悉的生存挣扎之中。小燕妮没有把情况告诉家人，她的独立性太强，不能接受依赖于父母的仁慈。但她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经常流露出一位新娘不该有的焦虑。10月30日，她写信给父亲说：“我亲爱的尼克：您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想再见到您。我感觉好像离开您有数个世纪之久。今天早上

我看到您的字迹时，忍不住大哭了一场。”⁽⁵⁴⁾ 在另一封信中，她写道：“我上周日特别想回到汉普斯泰特，但魔鬼阻止了我——让我们成为胆小鬼的理智告诉我要谨慎，提醒我回一趟汉普斯泰特要花费 20 个先令，所以我哪也不能去。”⁽⁵⁵⁾ 马克思也许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因此在 11 月亲自来到牛津。龙格当时正在校对《资本论》的法译本，所以马克思的到来不至于让他们怀疑自己此行的目的是查看女儿的婚姻生活到底如何。⁽⁵⁶⁾ 也许是因为马克思的劝说，也许是龙格和小燕妮都意识到没有工作就没办法在牛津生活，他们很快决定搬回伦敦。

拉法格夫妇 10 月底便已回到伦敦。他们参加完海牙大会后在荷兰休整了一段时间，回到莫丹那别墅时，马克思和小燕妮都觉得劳拉看上去比在海牙时好了不少，但还远未恢复。他们重新搬进了马克思家，琳蘅和燕妮给了劳拉极好的照顾，努力让这个失去 3 个孩子的年轻女人恢复过来。11 月中旬，劳拉好了很多，决定和保尔搬去附近的一处公寓。马克思的家刚刚送走他们，又迎进了龙格夫妇。

小燕妮虽然失望于在牛津遭受的失败，但很快承认自己离开伦敦就很难快乐起来。她告诉库格曼说：“伦敦有莫丹那别墅，而在别墅一层的书房里，我永远能找到我亲爱的摩尔。我无法向您描述我离开他时感觉有多么孤独。他告诉我说他非常想念我，我不在时，他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⁵⁷⁾

12 月 7 日，恩格斯在写给纽约一名伙伴的信中高兴地说，马克思在时隔 4 年之后终于又有全家人围在身边了。⁽⁵⁸⁾ 这虽是事实，却不意味着一定和和美美。小燕妮从牛津返回伦敦前，杜西写信给她，愤怒地描述拉法格和劳拉在马克思家与利沙加勒会面的情景。利沙加勒和一个朋友待在马克思家，拉法格夫妇与他的朋友握了手，对他却只是点了点头，第二天晚上仍是如此。杜西对他们的无礼感到吃惊，她写信给姐姐小燕妮说：“要么，正如保尔在信中所说并且他也用行动证明了的，利沙加勒是真正的君子，应当受到这样的礼遇；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君子，不该得到我们的接待；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劳拉那种极为有失妇人身份的做法实在令人不快。”⁽⁵⁹⁾

这个插曲虽然不值一提，但拉法格夫妇躲避利沙加勒的决定，的确影响了杜西和劳拉的关系，事实上，她们再也未能像原来那样温暖。拉

法格夫妇这样做的原因不得而知，也许仅仅是因为两个男人在法国报界有过交集，利沙加勒冒犯过保尔，后者无法予以原谅；也许是劳拉对他的在场不高兴。脆弱的劳拉也许不能允许又一个法国人（除了革命履历外一无所有）试图引诱马克思家的又一个女儿。当她转身看看自己和姐姐小燕妮的生活，她们不但没有摆脱母亲承受的厄运，反而陷入得更深。（小燕妮曾告诉龙格说，自己梦到像母亲一样长了天花，面目可憎，他甚至拒绝见她。）^[60]

这两对年轻的夫妇饱受经济困扰。在西班牙时，拉法格花光了继承自父亲的所有遗产。他拿到了英国的医生执业证，但不肯行医。^[61]他和劳拉只能四处寻找工作，为了帮拉法格寻找撰稿的工作，马克思甚至跟俄国的友人联系，但这样的工作很难找，报酬也极低。^[62]1873年2月，拉法格尝试经商，他与马克思在1848年认识的老朋友欧仁·杜邦一起根据杜邦的发明制造铜制乐器。但由于缺乏资金，生意很快失败。^[63]拉法格之后与社会主义者乔治·摩尔和邦雅曼·勒穆修合伙搞的雕版生意也不成功，以至于马克思为了担起拉法格的财务责任，^[64]短暂代替他入伙，但到年底，马克思也退出了，恩格斯不得不为此偿还大概150英镑的债务。^[65]拉法格应该已经意识到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但乐观的他还是继续尝试，在厨房里建起一个照片蚀刻工作室，想办法挣钱争取经济独立。^[66]丈夫在经济上屡试屡败的同时，劳拉则在教授语言私课，补贴家用。^[67]

龙格也找不到工作，他在公社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只能和众多法国流亡者一起争抢教课和撰稿的工作。^[68]和劳拉一样，小燕妮也做家庭教师补贴家用。她在附近几乎所有商店窗户上张贴海报，奔波在城内各个角落教授语言和音乐——她自嘲地把这称为“生存所必须的愉快战斗”。小燕妮觉得，龙格无法找到工作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她因此加倍努力。她告诉库格曼说，如果在小城镇，结果会大不一样，但“结婚后，我的心仍属于父亲所在的地方，其他地方的生活不属于我。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想我也只能离开。……但能撑一天算一天吧——我也不想提前想太多。”^[69]

马克思夫人却将龙格的无业归结为不够努力，她向李卜克内西抱怨说：“我们在为之前向巴黎公社及其流亡者（最为出色的政治闲人）表

示的鲁莽热情付出代价。细节不适合在信里说，我就不说了。”⁽⁷⁰⁾她在心里也许把利沙加勒也算上了。

3月，马克思和杜西一起去了布莱顿。马克思因为《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和德文第二版而筋疲力尽。法文版将分为44个部分出版，使得本就艰难的翻译过程持续了3年。德文第二版也先分部分出版（分9部分，从1872年7月到1873年4月），之后，再合为一本整书出版。⁽⁷¹⁾对马克思来说，这样的强度并不比当初写《资本论》时差多少。⁽⁷²⁾他在家就像幽灵一般：每天早上7点起床，喝几杯黑咖啡，之后就一直躲在书房里，直到中午过后，将军登门把他拽到荒阜上去走一走。⁽⁷³⁾5点吃完晚饭后（马克思一般要被叫三遍，才肯上餐桌），立刻又进了书房，直到夜里2点或3点睡觉。⁽⁷⁴⁾

杜西也需要休整：她虽然没有过度劳累，却思虑过甚。她已经18岁，投入到了一场不被允许的爱恋当中。家人已经知道她和利沙加勒的情感，但父亲罕见地动用了否决权，阻挡了她认为近在咫尺的快乐。也许马克思以为离开伦敦后，自己可以温和地劝说她，让她相信这样的婚姻不会成功。但他的强大说服力这次未能建功，反倒使得被惹恼的杜西宣布要留在布莱顿做家庭教师。马克思对变化措手不及，错以为换个地方能让杜西放弃利沙加勒，便同意了。燕妮却觉得小女儿的决定太过轻率、甚至有些危险，因此，在5月和6月间写了很多信给杜西，事无巨细加以询问。⁽⁷⁵⁾她想让杜西相信自己理解“你是多么想要工作和独立，因为只有这两者能让你度过目前的烦恼”。⁽⁷⁶⁾想到自己年轻时对马克思的爱恋得不到许可，她又说：“要勇敢，要坚强。不要被这次可怕的危机压倒。相信我，不管表面上如何，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你的处境、挣扎和痛苦。”⁽⁷⁷⁾燕妮如此急迫和频繁地给杜西写信，说明她的确明白杜西的困境，也知道由此导致的压力（甚至忧愁）会对杜西的健康造成何等影响（撇开马克思的写作困局不说，燕妮自己的忧愁就曾让她不断生病），而且她担心万一杜西误以为没人理解自己，会做出轻率的决定。

5月，杜西开始在一家女子中学兼职教授德语和法语。⁽⁷⁸⁾但不到一个月，她开始吐血，燕妮急忙赶到布莱顿照顾女儿，无论她如何祈求，杜西就是不肯回伦敦。燕妮还从管理学校的几名妇女口里知道，一个被

她们称为“杜西的未婚夫”的男子来看过杜西几次，她们没有阻止，因为毕竟他们订婚了。⁽⁷⁹⁾燕妮为了避免女儿尴尬，没有进行澄清，也没有告诉马克思这一消息。她知道马克思已经打算写信给杜西谈利沙加勒的事情，这样的消息肯定会让情势更加紧张。⁽⁸⁰⁾

事实上，马克思给杜西和利沙加勒分别写了一封信，但都没能留存下来，所以内容无从得知。^①唯一的线索是马克思几天后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杜西的回复。⁽⁸¹⁾杜西认为马克思对利沙加勒不公正，但马克思告诉她：“我只要求他（利沙加勒）不讲空话，而是给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他告诉恩格斯说：“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我要回来同你商量之后再回信。信就留在你那里。”⁽⁸²⁾

这期间，燕妮竭力劝说杜西在6月陪琳蕙去德国，以便让她离开布莱顿，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利沙加勒。杜西接受了这个提议，但问题是她有教课的任务。⁽⁸³⁾事实上，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对于杜西在学期中间请假极为不满，她们写信给燕妮，傲慢地说对这样的消息感到“非常吃惊和烦恼”。燕妮针锋相对地回复说：“亲爱的女士，对于您不肯放过我的女儿，我也感到极为烦恼。”⁽⁸⁴⁾

最终，杜西没有跟琳蕙一起去德国。第一次尝试独立失败后，杜西泄气地回到了伦敦，报纸上报道她的父亲病重的伦敦，她的姐姐小燕妮试图掩藏怀孕的事实而徒劳的伦敦。

自从1844年以来，马克思家就没有哪个孩子有福气出生在富裕和舒适的环境中，1873年9月3日出生的沙尔·费利西安·马克思·龙格（小名“卡罗”）也不例外。龙格在莫丹那别墅住了8个月后，仍未找到工作——“也没授课，也没翻译，也没通信，”马克思夫人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相反小燕妮却是不肯停歇，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都照样出去寻找教课的机会，虽然这样的工作挣得很少。……这样出色的人不该如此受苦。摩尔因为空想的爱，很多事情都看不到。但我无法如此乐观，所以很可能会赢得凶恶的岳母这样的名声。”⁽⁸⁵⁾燕妮对女儿的

^① 极为可惜的是，在马克思死后，杜西和劳拉烧毁了很多信件，有的她们担心会冒犯到朋友，尤其是恩格斯，有的涉及她们自己，但她们不想留作记录。

关心可以理解，虽然对龙格也稍微有失公允。他努力了，甚至远到曼彻斯特去找工作，但他只是一个穷困的法国人，还是公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找工作自然更加艰难。⁽⁸⁶⁾

至于马克思的健康，英国有报纸在1873年6月报道说他病得很重。消息出自总委员会的一名英国成员，很快传遍欧洲各家报纸。马克思的朋友和家人经常听到关于他死亡或被捕的报道，一般对此不会注意。但由于他去年突然地退出国际工人协会，又没有说明原因，这个消息听起来就具有了一丝真实性，很多朋友着急地来信询问，更有好奇者直接登门。⁽⁸⁷⁾李卜克内西在德国一家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燕妮跟他开玩笑说：“我希望报纸都在夸大，我亲爱的丈夫的情况没那么糟糕。”⁽⁸⁸⁾但玩笑掩盖下的真相是：马克思真的病了，而且比以往更加严重。数月来，他一直忍受失眠和剧烈的头痛。他服用安眠药，但不管用。这期间，马克思一直不肯停止修改《资本论》译文，而且除了工作上的烦扰，还要操心于女儿们的命运⁽⁸⁹⁾（被燕妮称为“重大、沉重、无法言表的家事”）。⁽⁹⁰⁾马克思的血压升高到非常危险的水平后，恩格斯劝他去曼彻斯特见唯一一位他们两人都信任的医生——80岁的德国人爱德华·龚佩尔特。龚佩尔特要求马克思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工作，改变饮食，饮用配葡萄酒的苏打水。最重要的是停止深夜写作，否则，他可能会丢掉性命。

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来时情况大为好转，燕妮、琳蕙和恩格斯对他进行监督，确保他遵照龚佩尔特的嘱咐。他们觉得确保马克思不会恢复老习惯的唯一办法是让他离开伦敦，进行一段长时间的疗养。⁽⁹¹⁾秋天，马克思带着杜西踏上了自己的第一次（以后会有很多次）康复之旅，他们去的是英国小镇哈罗格特。⁽⁹²⁾他们到的时候属于淡季，旅店里客人很少，除了他们，只有一个厌世的英国国教会牧师——据马克思说，从思想的一致性和简单的观察来看，这位牧师除了自己的肚子，什么都不关心。⁽⁹³⁾

晚年时，马克思评价过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对比：微观世界是家庭，宏观世界是其他一切，主要是政治方面。海牙会议后，他开始退回到周围人的小世界里。但他没有停止工作。他虽然已经正式脱离国际工人协会，却仍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把他看作创始人和朝圣的对象。他

逐渐把这些人的来访当作愉悦的社交活动，不再像以前那样耗费精力。即便是面对那些什么时候想起来伦敦住着一位“恐怖分子”就想来采访的记者，他也不再把他们的要求当作敌意或者挑衅，而是当成乐子。他是一只猫，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把周围的小老鼠撕碎，但他跟他们玩耍，乐在其中。他告诉库格曼说自己“毫不理睬公众的看法”。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身边的人。⁽⁹⁴⁾

其次则是他的健康。多年以来，龚佩尔特一直建议马克思去奥地利卡尔斯巴德进行水疗，但马克思一直拒绝（他说去奥地利进行水疗太无聊，也太昂贵）。⁽⁹⁵⁾不过，在哈罗格特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后，他终于开始考虑。哈罗格特的时光虽然快乐，却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龚佩尔特告诉他：只有去卡尔斯巴德才能痊愈。马克思在5月开始考虑去卡尔斯巴德，但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当其冲的就是老问题——护照。劳拉婚后搬去巴黎那年，马克思考虑过申请英国国籍但并没有申请。要去奥地利，他就必须有护照。

欧洲各国政府仍将国际工人协会视为导致社会动乱的威胁。1872和1873年，三皇同盟（奥地利—匈牙利、俄国和普鲁士）开会制订策略，结成统一战线，立刻开始了对协会的打击行动。^①但在1873年的经济崩溃面前，民众顾不得担心政府的打击，纷纷加入工人组织，躲避资产阶级市场的侵袭。⁽⁹⁶⁾伴随这一重大变革，德国工人阶级在选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⁹⁷⁾俄国则在1873和1874年爆发学生暴动，同时，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普遍受到迫害。⁽⁹⁸⁾在1874年的一次清扫行动中，多达1600名俄国社会主义者遭到逮捕；他们用来教育工人的资料中有一本就是《资本论》。⁽⁹⁹⁾此外，就在马克思考虑去奥地利卡尔斯巴德时，附近的维也纳对社会主义活跃分子进行了庭审。其中一名被告被起诉的原因仅仅是邮寄了一张“社会共产党人卡尔·马克思”的照片。⁽¹⁰⁰⁾在这种氛围下，没有英国君主的保护，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肯定是不安全的。为此，马克思在8月1日申请入籍英国。可以预料，他被拒绝了。伦敦警察厅报告说：“考虑到以上种种，我必须报告他是

^① 比如在德国，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为在政治上的激进和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身份，在1872年被判入狱两年。

众所周知的德国煽动者，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这个人不曾忠诚于自己的国王和国家。”⁽¹⁰¹⁾

到1874年，拉法格已经一文不名，他打算卖掉唯一还剩下的一份遗产——位于新奥尔良的一处房子。他非常急迫地需要现钞，恩格斯把房子拿做抵押，⁽¹⁰²⁾借给他600英镑。^①龙格没有这样的储备，也没找到工作，只能依靠他母亲给的一点钱和燕妮做家庭教师挣的收入，因此极为拮据，但他们还是在4月从马克思家搬去了附近一处公寓。燕妮后来暗示说自己 and 马克思支持他们搬出去，但他们显然一生都为此后悔。小燕妮的身体状况很差，呼吸困难，又难以入睡，到夏天，她的孩子卡罗病了。

这段时间，马克思和燕妮极为少见地一起出去旅行了。这对已经分别56岁和60岁的夫妻去了位于英国南部海岸以外5英里的怀特岛，在赖德镇一座阳光充足、面朝大海的房子租下几间房间。岛上的气候很像意大利。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这个岛是一个小天堂。”马克思为没能写信而道歉时，原因通常都是太忙。但这次，他告诉恩格斯说没写信是因为太闲散了。他和燕妮坐船游览了一番，爬了山，以一种已经数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方式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嘲笑当地一张选举海报居然直白地写着“请投富翁斯坦利一票”，还有一帮来远足的戒酒会会员居然有一半喝醉了。（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我也从未见过这样一帮堕落的、粗野的、猥亵的白痴，妇女们也是丑陋不堪。”）马克思说自己的健康状况正在好转，已经“无需服用药丸”。⁽¹⁰³⁾

正是在这10年，家人和朋友经常评价马克思和燕妮对彼此的深爱。但他们一生并非一直如此。在60年代的某些时期，燕妮好像在马克思面前把心冰封了起来。那时，当她挣扎着四处找钱买炭时，他在柏林在拉萨尔和伯爵夫人的款待下享受歌剧；当她后来和女儿们穷困地度过圣诞节，连他的一封信也收不到时，他在荷兰享受姨父莱昂和表妹南尼达的热情招待。但上了年纪后，他们又在各方面成了真正的伴侣。杜西说他们就像孩子，“一次又一次，尤其是在应该端庄安静的场合，我经常看到他们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以至于边上本应对这样的轻率行为感到

① 从1874到1878年，拉法格给恩格斯写过至少28封信要钱。

震惊的人都忍不住会跟他们一起笑了起来。我还经常看到他们彼此不敢看对方，生怕一交换眼神，就要忍不住大笑。”^[104]俄国朋友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甚至包括屠格涅夫在内，马克思最有权利说自己只有唯一的爱。”^[105]

也许，他们知道宝贵的独处时间不会太久，他们在7月底不得不回到伦敦。小燕妮的11个月大的孩子死于马克思所说的“肠胃炎的一次突然急性发作”。^[106]悲痛又一次笼罩了马克思家。两个女儿生下4个孩子，却都夭折了。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自己睡得很差。“我非常想念小家伙。”^[107]但他更担心的是已经崩溃的女儿小燕妮。恩格斯坚持让她离开伦敦，来兰兹格特与自己 and 莉齐住一段时间，小燕妮同意了。^[108]

马克思回到伦敦，正好来得及在8月6日送悲伤的女儿去兰兹格特。他们乘坐火车穿过肯特郡的田野，土地苍翠、肥沃，他们的心情却乏味、沉闷。^[109]途中，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9个月大的孩子坐在马克思和燕妮乘坐的车厢里，这让小燕妮的痛苦更加难以抑制。^[110]

外孙的夭折和女儿的悲痛让马克思感到凄凉。虽是盛夏，伦敦中午时的天空依然昏暗、阴郁。回到莫丹那别墅后，马克思写信给小燕妮说：“我亲爱的孩子：……从小天使不再使我们家活跃的时候起，这个家就变得死气沉沉了。没有他，我处处感到寂寞。想起他来，我心如刀割，这样可爱、迷人的小家伙难道能使人忘记吗？不过，我的孩子，为了你的父亲，坚强起来。”^[111]考虑到燕妮，马克思本来打算推迟去卡尔斯巴德，但恩格斯已经在照顾她，而且打算带她和莉齐从兰兹格特去泽西岛。马克思也就放心了，加上杜西也急迫地需要疗养。杜西已经生病数月，不肯吃东西，又开始吐血。她心情烦躁、抑郁，完全没了那个让人一见就喜欢的可爱的年轻姑娘模样。她的痛苦是因为父亲不准她和利沙加勒的恋爱。杜西曾在3月写信给马克思，恳求他允许自己见一见利沙加勒。

.....
我最亲爱的摩尔：

我要求您一件事，但首先我需要您答应不会生气。亲

爱的摩尔，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利沙。不见他真的太难了。我已经尽量让自己耐心，但太难了，我觉得自己无法再坚持下去。……我不能什么时候跟他出去走一下吗？……大家都知道我们订婚了，不会再有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而感到奇怪。

.....

她告诉父亲，自己在布莱顿生病时，利沙加勒每次去看她，都能令她更坚强、更快乐。“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无论我多想努力振作起来，让自己快乐、高兴一些，我都无法做到。……我最亲爱的摩尔，请不要因为我写了这些而生我的气，请原谅我的自私又惹您担心。……这是我们彼此间的秘密。”^[112]

也许是因为卡罗夭折后，家里的苦痛已经够多，禁令被取消了。^[113]8月中旬，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杜西的身体好多了，她的食欲在以几何级数增加，但这是带有歇斯底里因素的女人病的特点。别人必须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她又开始靠尘世的食物为生。不过等完全痊愈，也就不这么麻烦了。”^[114]马克思还是决定带杜西去卡尔斯巴德，让她继续恢复。他不带护照旅行，万一遇到麻烦，就去氛围较为开明的汉堡。他告诉女儿小燕妮说自己对目前的政治阴谋感到气恼，“非常有趣的是，已经很久完全没有人说起‘国际’和我了，可是恰好现在，我的名字又出现在彼得堡和维也纳进行的诉讼案中，而意大利的滑稽可笑的暴动被认为不仅与‘国际’、而且与我有直接的关系。”^[115]

卡尔斯巴德是资产阶级疗养胜地，来过这里的传奇人物包括巴赫、歌德、席勒、贝多芬和肖邦。^[116]马克思住的日耳曼尼亚旅馆同时也住着俄国小说家伊凡·屠格涅夫。两个人都没有在信件中提到彼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知道彼此。^[117]屠格涅夫在俄国既是激进主义者也是保守主义者的庇护者，还是巴枯宁在柏林最亲近的朋友之一。

库格曼为马克思和杜西的逗留做了安排，自己也带着妻女来到了此处如今位于捷克共和国的传奇疗养地——从他的信件来看，他好像几乎每年都来。为避免引起怀疑，马克思做了充足准备，入住时

登记的名字是查理·马克思，一名富有的绅士——他装得很是像模像样。这期间，波兰贵族普拉特伯爵也住在卡尔斯巴德。⁽¹¹⁸⁾马克思的装扮极为得体，以至于有客人说如果他和伯爵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肯定会以为他是伯爵。⁽¹¹⁹⁾很快，马克思和伯爵成了朋友，这使得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开始发挥想象力，报道说，普拉特伯爵是“虚无主义者的首领”（杜西说，“你可以想象这让我们的老伙计有多吃惊”。），正与“国际的首领”马克思交往。⁽¹²⁰⁾警察对马克思进行了监视，但没有采取行动，因为显然他只是来治疗肝病的，医生们说他是模范客人。⁽¹²¹⁾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比杜西小几岁，她和母亲盖尔特鲁黛显然都无法完全理解杜西的行为和马克思对她的放任。弗兰契斯卡说，杜西的衣服很高雅，但同时太显摆。（她描述马克思维护女儿说“年轻女孩子应该打扮得漂亮一点”。）库格曼家的女人觉得杜西太直接。（“她会直接把想法说出来，不管面对的是谁，也不管说的是什么。”）她们对她的举止感到震惊。（“她坐在餐厅里抽烟，读报。”）此外，杜西还拿出利沙加勒写给“我的小妻子”的信展示给盖尔特鲁黛看。⁽¹²²⁾

库格曼家的女人对杜西如此独立感到愤懑，可能与盖尔特鲁黛感受到的禁锢有关。事实上，马克思在这期间越来越因为库格曼对待妻子的方式而对他有所轻视。马克思的房间最初挨着库格曼家的套间，难免会听到库格曼不断抱怨盖尔特鲁黛对自己提供给她的物质条件不知道感恩——杜西说夫妻间“这样的场景令人感到憎恶”。尤其是有一天，地上灰尘很大，盖尔特鲁黛只是因为未能及时撩起衣服避免把裙摆弄脏，就遭到一通责怪。马克思搬去了更高的楼层，断绝了与这位崇拜者有时也是资助者的关系。⁽¹²³⁾

离开卡尔斯巴德和修养糟糕的库格曼后，马克思和杜西又游览了一些地方，其中就包括他和燕妮度蜜月时去过的地方。马克思还与老朋友和党的新成员见了面。⁽¹²⁴⁾在莱比锡与李卜克内西见面时，马克思了解到一个名叫威廉·布洛斯的25岁社会民主主义者即将出狱。布洛斯走出监狱后，不仅见到了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儿子，令他意外的是，居然还看到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和站在她身边的一位头发花白的绅士。“我见过他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了他：卡尔·马克思。”⁽¹²⁵⁾

父女俩还有一些地方要去，包括去汉堡见出版商迈斯纳以及去柏林

见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在莫丹那别墅住了6个月，从美国内战的创伤中恢复之后，便回到了柏林，虽然他仍是马克思的坚定追随者，生活上却需要家里的反动成员接济。杜西和马克思在柏林待了3天，一面躲避警察，一面与埃德加见面并游览马克思之前常去的地方。埃德加后来告诉他们：马克思和杜西从旅馆离开后一个小时，就有警察上门寻找马克思。⁽¹²⁶⁾

马克思和杜西回到伦敦时，状态大有改观。卡尔斯巴德虽然没能治愈他们的疾病，但至少暂时有所缓解，让他们能够恢复工作。更重要的是，父女间因为利沙加勒而产生的裂痕消失了。马克思好像接受了这一事实（至少暂时如此）：他的18岁的女儿做到了政治敌人和革命对手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在意志之争中击败自己。他仍然反对她的订婚，但方式是希望杜西自己有智慧结束这一段感情。看到其他两个女儿的苦难，马克思也许也曾希望她们当时具有这样的智慧。

40 家庭转机



在这方面，我不像在其他事情上那么坚强，家庭的不幸常常使我十分难过。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卡尔·马克思⁽¹⁾

第一个孩子的夭折给小燕妮带来的伤痛极深。她从卧室窗口就能看见孩子安息的地方——海格特公墓。这既给了她一丝慰藉，同时又让她无法释怀，无法摆脱负罪感、恐惧和悲伤。她告诉龙格说自己想象着他们“甜美的小鸟埋在潮湿阴冷的土里”，真希望“我们都在那里陪着他”。⁽²⁾街上和店铺里到处都是他的身影，每个孩子的哭笑声、每个棕发小男孩都让她想到卡罗要是活着应该长成什么样了。⁽³⁾她的身体强健了，对痛苦的感受也更加强烈。在卡罗死后的数周里，恩格斯和莉齐想尽办法转移小燕妮的注意力。恩格斯知道，她夜里总是因为想念孩子而无法入睡，但还是让马克思放心，她得到休息后会恢复的。⁽⁴⁾但小燕妮告诉龙格说自己在竭力掩藏真实的情感。“我把平时的面具戴上，不把绝望的脸展现在朋友们面前，不想破坏他们的陪伴。”她计算着回伦敦的时间，每一天像一个星期那样漫长，每一个星期像一个月那样漫长。⁽⁵⁾她从泽西岛写信给丈夫说：

很奇怪，面对岛上夏日里如此安静美好的景色，我却觉得愈加无法平静，无法不悲伤。昨天我们经过最美丽的乡村，看到巨大的橡树亭亭如盖，穿过巨大的栗子树和榆树间的巷陌，欣赏繁茂得从未见过的常绿树篱。……但是，我亲爱的沙尔，如斯美丽带不给我任何欢愉。……每当我闭上眼睛，出现在我脑海里的都是海格特公墓里凄冷的土地。^[6]

她还写道：“我所有的希望和欢乐都留在了冰冷的墓地里。”^[7]数周后，她仍然处在绝望之中：“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觉得我们越来越无言地更加悲伤。”^[8]

龙格寡居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在卡罗出生时来过伦敦，之后数月一直与沙尔、小燕妮和燕妮保持通信。她竭力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并在卡罗死后，愤怒地写了一封给燕妮，暗示她和马克思没有像自己一样帮助他们。燕妮在回信中很坦诚。“您认为我们的女儿不该搬出去，我们住在一起比分开住花费要更小些。说到花费，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毫无疑问，两家人住在一起花费会更少。”但她说除了“金钱问题”，还有其他方面需要考虑。

坦白说，我丈夫和我（一生动荡，饱受烦恼和煎熬）需要——我敢说，也有权——得到一点平静和安宁，尤其是我的丈夫已经承受过这么多年的痛苦。我们希望生活中的限制少一点。我们希望能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享受家里的舒适，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吃饭和睡觉时间，等等。年轻人也有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此外，有些人如果不是受到生活逼迫，就永远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天分和干劲。这也是为什么相对德国和法国，我更喜欢英国的体系。在这里，父母按照自己的条件和位置给子女提供教育。从16岁到20岁，这里的年轻人就要自己挣一点钱了。很多时候，父母（富人也是如此）会让子女自食其力。独立感就是这样在年轻人身上锻炼和发展的。……

另外，燕妮说，还有其他女儿需要考虑。她告诉龙格夫人说，家里也要讲求公正，3个女儿要同等对待，为一个女儿做了什么也需要为其

他女儿做相应的事。“我相信，我的女儿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但杜西已经与利沙加勒先生订婚，我们需要像对待小燕妮一样对待她：在家里接待他们，给他们提供帮助。不幸的是，拉法格先生投资不成功，遭受了损失。他对几个朋友信心太足，又太大方。他被出卖了，又被人占了便宜。”⁽⁹⁾（燕妮在信中没有说马克思和燕妮乐于见到龙格夫妇搬出去的另一个原因：马克思嫌龙格太喜欢争论，不愿跟他一起吃饭。）⁽¹⁰⁾

这年早些时候，燕妮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告诉他家里最新的情况时，曾说到经过30年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和母亲，自己已经不得不变得坚韧。⁽¹¹⁾失去过4个孩子的她，不觉得女儿不该如此悲伤，也不觉得龙格夫人不该对孙子的死如此沮丧。但她知道，生活要继续，不管你认为如何不可能再继续，它还是会继续。在女儿们的成长过程中，燕妮一直未能给予她们自己希望能够给予的礼物和环境，但现在，她可以给予她们力量和智慧。

我非常清楚，在遭到这样的损失之后，要恢复心灵的平静，是多么困难，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但是，生活却立即用它那些微小的欢乐和重大的忧虑、种种日常的操劳和细小的烦恼来帮助我们。短暂的忧虑压倒了巨大的悲痛，于是极度的悲痛就在不知不觉中缓和下去；当然这并不能使创伤，特别是母亲心上的创伤彻底愈合；但是在心灵中对新的痛苦和新的欢乐的新的感受性，甚至新的敏感性却逐渐苏醒过来。于是，就怀着的一颗饱受创伤但总还有希望的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这颗心最后完全停止跳动，永远安息。⁽¹²⁾

到1874年12月，小燕妮和龙格的生活出现了转机：龙格被聘任为伦敦国王学院法语教授，一年收入180英镑。此前他一直在学院担任临时教职，固定职位出现后，他提交了申请。⁽¹³⁾维克多·雨果和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历史学家埃德加·基内为他写了推荐信，他最终在150

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14]小燕妮也在河岸街附近的克莱门特·达内斯女子学校找到一份工作。^[15]在此基础上，加上恩格斯资助的100英镑，他们搬出见证了卡罗的不幸的这处公寓，搬去了一处小房子，并在1875年初从拍卖会上淘得一些家具进行布置。^[16]（龙格摆设的都是法国家具，被马克思称为垃圾。）^[17]

马克思和燕妮也搬家了。除杜西外，其他孩子已经各自成家，家里不再需要莫丹那别墅这么大的地方。1875年初，他们搬到附近梅特兰公园路上的一处房子。^[18]与格拉弗顿坊相比，这处房子依然很大，但不再是独栋，两侧都有其他家的房子相连。不过，改变只是表面上的，房子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变化。马克思的书房依然在一楼，里面飘出的文字依然足够写成数卷著作。

这期间，利沙加勒开始写《1871年公社史》，并和杜西一起经营他创办的报纸《红与黑》。^[19]杜西说，这是一份从革命角度进行政治评论的周报，希望从欧洲和美国征稿。就像很久以前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刚刚建立通讯委员会时燕妮为他做的事情一样，杜西也在为利沙加勒做着同样的事情：写信给各处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利沙的报纸征稿。可惜，1874年秋天刚刚创办时还很活跃的《红与黑》到1875年1月便沉寂了。^[20]国际间的社会主义运动再次向各国国内聚集。革命者（有了很多女性）主要在各自国家建立政党，缺少跨越边境联系的兴趣（目前如此）。^[21]

法国在公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混乱，在1875年颁布了新宪法，对下议院和参议院做出规定，两院共同选举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首位总统是率军镇压巴黎起义的麦克马洪。）^[22]这样的结构终于为工人打开一条门缝，让他们的呼声得以传达到选举面更广的政府。这样的变化在法国虽说可喜，但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德国。

3月，代表德国工人的两个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发布合并纲领草案。两党领袖找到足够的共同点后，决定合并，成立新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他们的合并意向毫不知情的恩格斯和马克思非常诧异，他们担心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共同领导社会民主工党）在原则上过多迁就另一党的教条（马克思的已死的对手拉萨尔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一教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错误地解读了历史，

未能足够强调各国工人间的团结，并且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基础，仅仅提出了一条社会要求——国家帮助。⁽²³⁾最重要的是，纲领完全没有提到工会。恩格斯告诉倍倍尔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与资本进行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即使最残酷的反动势力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这种组织。”⁽²⁴⁾恩格斯和马克思虽然有所顾虑，合并大会还是于5月在德国中部城市哥达举行，新的工人党成立（1890年成为现在仍然存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打算不发表意见，与新党的纲领保持距离。⁽²⁵⁾但最终，马克思决定做出反应，他写了小册子《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新党的纲领文件逐字逐句进行了批评。对于新党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主要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斗争，马克思指出：“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直接斗争的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²⁶⁾但同时，他又指出，在全球贸易的时代，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孤立存在，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可以位居次席，这是非常幼稚的。⁽²⁷⁾

接下来，对于哥达纲领只是模糊地号召劳动的公平分配，却没能解释如何实现，他用一句著名的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文字上首次出现）做出了解答。⁽²⁸⁾他还反驳了哥达纲领中关于人与国家关系的结论，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²⁹⁾

最后，马克思描述了走向无阶级社会的漫漫长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³⁰⁾马克思引用《以西结书》中的一句话结束了这篇长达18页的批判：“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³¹⁾

《几点意见》让人感觉马克思又变回了那个出色的、干净利落的辩论者。五年来他一直埋头于重写和翻译之前的著作，到1875年，终于将翻译和重写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马克思将其献给了女儿小燕妮）最后一批校样发回给了法国出版商。首版印刷1万册，迅速售罄，吸引了新的法国读者和英国读者。⁽³²⁾3月，伦敦《双周评论》刊登了短文《卡尔·马克思与德国社会主义》。文章批评《资本论》用骂大街

的语言谩骂权威。作者的愤怒之处好像不在马克思在书中说了什么，而在他的强硬方式。如果这篇文章出现在《资本论》8年前刚刚面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会感到兴奋。但现在，它只是又一次好笑地证明马克思的思想的确值得注意，至少会引起人的谩骂。但文中的一句话却具有一定的预见性：“民众可能会给他面子谩骂他，但不会读他。”⁽³³⁾

这年夏天，马克思一家纷纷离开伦敦。马克思决定独自去卡尔斯巴德。燕妮打算趁此机会先去日内瓦与党内（政治上的）朋友交流，之后去科隆见私交。⁽³⁴⁾8月时，小燕妮和龙格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也许是为了在儿子夭折刚满一年的时候强迫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除了夏季里酷热难耐（小燕妮只得把三层法兰绒衬裙脱掉一层）⁽³⁵⁾以及数次错过与朋友的会面之外，马克思家的女人们在旅行中极为难得地没有遇到什么戏剧性的变故。马克思的旅程也很顺利。坐船去大陆途中，他的旅伴包括一具运往美因茨的尸体和一名天主教神父。神父把空空的瓶子展示给马克思看，说自己又饿又渴，马克思把自己的一瓶白兰地递给他，神父痛饮一番后，拿其他旅客开了些无聊的玩笑。⁽³⁶⁾到卡尔斯巴德后，马克思发现来这里的人没什么变化，不是“胖得像酒桶”，就是“干瘪得像纺锤”。马克思没再像上次那样登记为富裕的绅士，因为那样需要交更高的疗养税，而是登记为“伦敦哲学博士查理·马克思”。⁽³⁷⁾

卡尔斯巴德一名负责对他进行监视的警官报告说，马克思“一直很安静，很少与其他客人交流，经常独自长时间散步。”但当地一家维也纳报纸的描述与此完全相反，该报的名人轶事专栏对这位迷人的人物丝毫不吝赞美之词：“学识出众，不仅精深，而且广博……总能拿出准确的字眼，迷人的笑容，让人开怀的笑话。”⁽³⁸⁾面对女人和孩子时，他“非常风趣，健谈。……他显然更是一名哲人，而非行动者；更是运动的史学家或者说战略家，而非身经百战的战士”。这篇炙热文章的作者有可能是马克思的医生斐迪南·弗累克勒斯，⁽³⁹⁾但不论作者是谁，关键的是该报居然肯刊登这样一篇文章——要知道，马克思一年前还被当作危险人物。

的确，57岁的马克思看上去已经不再是令人恐惧的革命者。他体格魁梧，花白的头发和胡须依然浓密，脸上充满笑容，一副生活美满的模样。在卡尔斯巴德与马克思相识并在伦敦与马克思成为朋友的俄国人

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说：“人们仍然把马克思看作对抗资产阶级学说和文化的阴郁的和自大的反抗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位兼具英国和德国修养的绅士。好在他现在的个人生活很美好，他很快乐。”⁽⁴⁰⁾

燕妮也很快乐。这年秋天，一家德国报纸刊登了她向一名英国演员致敬的一篇文章。《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对文章极为满意，邀请她多写些关于英国戏剧和文化生活的文章。这不仅意味着她能经常去剧院（她和马克思都喜欢），还意味着她的才华得到了认可。她的文章被发表不是因为她是卡尔·马克思的夫人，而是因为她自己的风格和智慧。虽然极为兴奋，但已经习惯于站在丈夫背后的她还是要求文章匿名发表。⁽⁴¹⁾

1875年12月31日，梅特兰公园路马克思家，马克思一只手牵着妻子另一只手牵着莉齐·白恩士，拉着她们踏上临时舞池的“庄重之旅”，⁽⁴²⁾所有人穿着节日的盛装，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妻子、琳蘅、以及马克思家的女儿们和各自的丈夫有充足的理由庆祝：小燕妮又怀孕了，这个孩子出生时不会再缺这少那。⁽⁴³⁾预产期在5月，小燕妮同意从3月起不再教课，龙格的收入已经足以支撑他们的小家庭所需。她还打算雇一名奶妈（杜西1855年出生后就是在奶妈的帮助下，活了下来）。⁽⁴⁴⁾龙格和小燕妮决定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好这个孩子，因为他们无法（大家都无法）再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

马克思身体颇佳。他从卡尔斯巴德回来后，连恩格斯都说他完全变了样：“健壮、精力充沛、愉悦、健康”。⁽⁴⁵⁾马克思在疗养地见到一种用于雪茄烟的过滤器，订购了200个。⁽⁴⁶⁾数年来，医生一直要求他戒烟，但有了这些过滤器，他就有借口继续抽烟了。他和恩格斯虽然都受到过量饮酒的侵害，却都没有减量。在星期日，亲戚朋友们经常聚到恩格斯家共进晚餐，每次确定的时间都是3点，但每次都要到7点才能开始，这期间，宾客们喝啤酒、波尔多酒和香槟酒，开饭之后也喝，甚至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小燕妮见一名刚刚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俄国人如此憔悴，甚至担心他被淹死在恩格斯慷慨提供的酒水里。）⁽⁴⁷⁾但最享受这样的夜晚的还是主人——当然，还有他的朋友卡尔。

小燕妮分娩几周前，龙格带母亲去了怀特岛。这期间，燕妮和琳蘅来到龙格家，清扫每一个角落，准备孩子的降生。她们清扫墙壁、地面、家具和窗帘时，小燕妮只能待在一间屋里。清扫完之后，她们又忙着给

孩子准备衣服。小燕妮告诉龙格说，自己对这些没有兴趣，但乐于见到她们像天使一样围在身边保护她。⁽⁴⁸⁾5月10日，小燕妮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让·罗朗·弗雷德里克·龙格，又名约翰尼。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婴儿名字中的让来自龙格的父亲，罗朗来自劳拉，弗雷德里克则出自将军。⁽⁴⁹⁾

杜西在1月度过21岁生日。她已经长大，对于跟利沙加勒的感情，她已经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如果她愿意冒着与父亲疏远的危险。但这对马克思的女儿来说，是不可能的。无论多么出色的追求者都不能让她们放弃她们的摩尔。马克思的要求显然是在利沙加勒地位稳妥之前，他们不能结婚。由于利沙加勒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年轻的杜西便这样被卡住了。每天，她从父母家出门去做家庭教师，期盼着情况能有改变。⁽⁵⁰⁾但利沙加勒不但没能找到工作，他好像不愿再待在英国。（来到英国5年后，他仍然不会说英语。）⁽⁵¹⁾他忙于自己那本关于公社的著作，游说法国新政府发布大赦允许流亡的公社社员返回法国。燕妮跟一个朋友说到杜西时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显然还得经受一些失望，像我们所有人一样。”⁽⁵²⁾

杜西的身体直接反映了她的心情。伦敦正在遭受热浪袭击，恩格斯和马克思两家人都无法忍受，纷纷离开伦敦。8月，杜西陪父亲去卡尔斯巴德，但旅程从一开始便麻烦不断。他们先是在途中找不到旅馆可以落脚，在火车站将就了一宿到卡尔斯巴德后，发现这里也天气炎热，还缺水。⁽⁵³⁾马克思唯一能够用以消遣的是一本关于未来国家职能的书（这样厚重的书对他而言与休闲读物没多大区别），但天气实在太热，读不下去，马克思便把时间花在了听别人闲扯瓦格纳的私生活上⁽⁵⁴⁾——他周围无所事事的富人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①

马克思和杜西在卡尔斯巴德一直待到9月中旬，返回伦敦后，马克思开始为利沙加勒的《公社史》在德国寻找出版商——已经有比利时出

① 马克思写信给女儿燕妮说，每个人挂在嘴边的问题都是“您对于瓦格纳的看法怎样？这个新德意志普鲁士帝国的音乐家十分特别的地方是，他同夫人（即同毕洛夫离婚的那位夫人），同戴绿帽子的毕洛夫以及他们共同的岳父李斯特，四个人一起住在拜罗伊特并且情投意合，他们亲热相处，相互接吻，彼此相爱而且皆大欢喜”。

版商愿意出版法文版。马克思代表利沙加勒与人协商时，说这本书是第一部真实讲述 1871 年斗争的史书，说作者流亡在伦敦，“生活自然不宽裕”。⁽⁵⁵⁾ 马克思兴趣浓厚，亲自担任编辑，校订样张；利沙加勒对马克思无比信任，让他全权代表自己与人协商。马克思家又一名女人把未来寄托在了一本书的成功上。杜西也许以为这本书能给利沙带来足够的收入，让他们可以结婚。但就在这种可能性出现时，她好像有了其他想法。

到 1876 年，杜西已经与利沙加勒在一起 4 年多了。4 年前，每一个在公社结束后来到伦敦的法国人都被马克思家看作浪漫的英雄；现在，她作为一个少女对他的狂热崇拜开始成熟。也许正是知道这一点，马克思才坚决地拖延小女儿与这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的婚姻。现在的杜西不再是那个把未来放在起义上的 17 岁少女，她的兴趣更加广泛。⁽⁵⁶⁾ 她把一半心思放在政治上，在当地一家学校理事会选举中支持一名女性候选人，把利沙加勒的《公社史》翻译成英文；同时把另一半心思放在戏剧上——利沙加勒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或心思。

杜西加入了基督徒社会主义者和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弗尼瓦尔经营的莎士比亚学会。弗尼瓦尔还是伦敦语言学学会的秘书，实施的资料收集计划最终促成了牛津英语词典的面世。他与英国精英阶层来往（是勃朗宁和乔叟学会的创始人），但没有阶级偏见（他的妻子曾是女佣）。⁽⁵⁷⁾ 弗尼瓦尔理解杜西对知识的渴望，鼓励她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兴趣——她加入协会后不久便翻译了一篇关于莎士比亚的德语文章，协会进行了出版。⁽⁵⁸⁾（原作者给她寄来一封祝贺信；燕妮希望女儿能就此迈进文学杂志的门槛，找到有报酬的工作。）⁽⁵⁹⁾ 莎士比亚学会每两周聚集一次，一般轮流在各成员家里举行，但马克思非常喜欢他们的聚会，所以聚会经常在马克思家举行。杜西的朋友圈逐渐扩大，更重要的是，她开始与同龄人交往，其中大多是英国人。虽然在德国家庭长大，杜西却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姑娘，通过钟爱的莎士比亚，她很快舒适地处在了一群兴趣相投的伙伴们当中。

到 1876 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展开严厉批判已经过去 30 年，但他和恩格斯发现他们需要再次进行同样的斗争，只是批判的对象换成了新一代空想者。德国的盲目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和大学讲师欧根·杜林不断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左的批判（他把马克思尊敬

地称为“老青年黑格尔派”），⁽⁶⁰⁾在德国新成立的工人党中赢得了很多重要的追随者。恩格斯和马克思觉得有必要进行反击，因为在巴黎公社结束后，欧洲工人阶级政治运动正蓬勃展开，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空想主义（他们认为杜林的哲学正是以此为基础）抬头。⁽⁶¹⁾

恩格斯通过著作《反杜林论》进行了反击（他说要与“令人厌烦的杜林辩个究竟”）。恩格斯在书中不仅进行了批判，还极大地帮助读者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资本论》。恩格斯用清楚流畅的语言，从两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生产通过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揭示”）的角度讲述了马克思的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⁶²⁾《反杜林论》是研究马克思的重要入门书籍和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经典著作。同时，它又不仅仅是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介绍，还体现了恩格斯的独特兴趣和专长领域。在马克思谈论货币、财产和思想控制如何被资本主义用来压迫广大人民时，恩格斯还谈到了军事力量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

多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强调投票权必须由拥有武器的权利来支撑和保证。只要武器和军队处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不管是作君主专制还是民主社会，民众都只会受到奴役。⁽⁶³⁾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经济角度讲述了武器问题，认为当一个人不能再利用石块、金属或木头制造自己的武器时，他就会受到掌握着制造更先进武器的人的奴役。换言之，哪个阶级控制着社会上的经济力量，也必将控制军事力量。恩格斯认为在19世纪中期，任何个人都无法发动起比游击战更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先进武器的生产不仅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而且“极为昂贵”。⁽⁶⁴⁾

马克思通读了《反杜林论》的校样和草稿，写了其中一章——这将是两人合作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们都将受到私事的烦扰。马克思、恩格斯和燕妮都感到他们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写给日内瓦一个朋友的信中，燕妮描述了这样的情感：“年纪越大，时光越无情，日子就过得越快。……当青春、朝气和‘美好’一去不复返，真是可怕的不幸。”⁽⁶⁵⁾工作还没有做完，但他们三个都知道自己在这出大戏中已经走到最后一幕。

41 外祖父的快乐



性格相容最必要的时候不是过往的日子，而是在某个人生阶段，当我们需要依靠彼此的支持来遗忘逝去的时间和抛弃我们的男人。

——德·斯塔埃尔夫人⁽¹⁾

自从姐姐玛丽去世，15年来，莉齐·白恩士一直被看作恩格斯的夫人，而在这其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里，她的侄女玛丽·艾伦（被他们叫作“彭普斯”）一直被视作他们的“小家伙”。事实上，恩格斯把自己视为一名丈夫和父亲，他和莉齐搬回伦敦时，他们具有富裕资产阶级家庭的所有特征。（莉齐甚至有一条狮子狗。）⁽²⁾恩格斯和莉齐站在一起并不搭。恩格斯身高6英尺，身材消瘦，举止果敢，在陌生人面前比较内敛。莉齐有些矮胖，作为一个典型的爱尔兰人对待路人都极为热情。恩格斯喜欢读书，享受安静。莉齐却不识字，喜欢说个不停。虽然有着这么多差别，恩格斯却深爱着她，骄傲地说她是自己的爱尔兰革命妻子。她和燕妮·马克思看起来也不搭调，却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19世纪70年代中期，莉齐经常生病。但在1877年夏天，她没能彻底恢复。7月，恩格斯从兰兹格特写信给马克思说：“莉齐从昨天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感到非常不舒服；海水浴对她没有发生奇效这还是第一次，我开始感到严重不安。”⁽³⁾显然，恩格斯认为，让她恢复

的唯一办法是远离伦敦，所以他们在9月回到伦敦后，马上又去了苏格兰。⁽⁴⁾

马克思、燕妮、琳蘅和杜西也都病了，考虑去卡尔斯巴德，但花费太大，让恩格斯都难以承受，他已经把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费和医药费都承担了下来。马克思的医生建议他们去德国西部一处便宜一些的疗养地巴特诺因阿尔。⁽⁵⁾琳蘅的家在这附近，马克思先把她送回去后，带着燕妮和杜西继续奔向阿尔河谷里的这处疗养地，之后还去了黑林山。⁽⁶⁾他们此次离开伦敦长达两个月，但回来时，马克思和燕妮的状况并不比离开时好，尤其是马克思的慢性咳嗽极为严重，一名朋友说，马克思咳起来的时候胸膛好像都要炸开似的。⁽⁷⁾燕妮更加严重。她连续数月头痛不止，胃痛甚至更加剧烈。11月，她去曼彻斯特找龚佩尔特诊治，后者让她服用松脂和颠茄药丸。⁽⁸⁾

在这段难熬的时期里，约翰尼·龙格不断带给外祖父母欢乐。马克思说他是“我最亲爱的宝贝”，⁽⁹⁾燕妮说，每当他坐着四轮婴儿车回来，“由老外祖母领头，大家都非常高兴地跑去迎接他，每个人都想争先抱到他”。⁽¹⁰⁾这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纯真的世界。1878年7月，小燕妮给马克思和燕妮带来了更大的快乐：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亨利——但之后一直被叫作哈里。马克思的书房仍是欧洲更年轻一代激进分子的首选目的地，老朋友们每次来伦敦，也必定来看他。但除了流亡者和造反者之外，房子里还多了个初学走路的孩子，时不时跟着三条狗（一条叫威士忌，一条叫棕榈酒，另一条名字不知，但无疑跟酒有关）⁽¹¹⁾在屋里爬来爬去，以及一个婴儿尖利的哭叫声和笑声。房子的主人极为得意；欧洲的鞭挞者在享受作为外祖父的角色。

虽然去卡尔斯巴德花费昂贵，但哈里出生后不久，马克思和燕妮还是打算前往进行疗养，但终究未能成行。这一年，有两人（一个失业工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刺杀威廉皇帝。俾斯麦借机名正言顺地颁布法律，很快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会、以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所有集会、出版物和演讲定为非法。⁽¹²⁾刺杀给了俾斯麦一直寻找的应对工人运动所需的弹药：1877年初的选举使得国会开始向左转移，社会主义工人党赢得20%的选票，获得12个

席位。^[13]在这种氛围下，马克思不能冒险去卡尔斯巴德。他考虑让燕妮一个人去：“曾经是高贵的前男爵小姐冯·威斯特华伦应该不会被当作违禁品吧。”^[14]但燕妮没有去卡尔斯巴德，而是去了英国伍斯特郡莫尔文一处著名的疗养地，小燕妮后来带着约翰尼与她会合。^[15]这期间，龙格和利沙加勒在泽西岛与其他法国流亡者会面，想办法返回法国。^[16]燕妮可能意识到龙格开始厌倦英国，告诉朋友说自己的“经常发火、叫嚷和争论”的女婿越来越暴躁。^[17]

马克思非常期待这一年的疗养之旅，9月初便去了莫尔文与妻子、女儿和外孙会合。但他刚刚抵达，便被恩格斯召回了伦敦。莉齐在9月12日凌晨一点半去世。^[18]在她去世的前一晚，57岁的恩格斯和51岁的她在来到恩格斯家的一名英国国教会牧师的主持下，结成了合法夫妻。这样，便能把她埋在天主教墓地的同时立凯尔特十字墓碑。^[19]杜西、马克思、拉法格一家、以及一些朋友参加了伦敦的葬礼，之后，恩格斯带着彭普斯和一个朋友去了南安普顿。^[20]他伤心欲绝。小燕妮接到他的一封信后，对龙格说：“他好像已经绝望了，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快乐起来。”^[21]

的确，恩格斯过去很少将党的工作置之不理，但在莉齐死后，他好像意识到不能再为了回复源源不断的来信和答应数不尽的征稿请求，而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一边。回到伦敦后，他拒绝了年轻的苏黎世编辑爱德华·伯恩斯坦的征稿请求，他解释说：“我从在伦敦度过的九年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要完成一些较大的著作而同时又积极参加实际的鼓动，是不可能的。我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如果我还想完成什么事情的话，那就应当把我的任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22]

马克思的写作如何了？虽然家里事情不断，又受到病痛的侵扰，但马克思仍在工作。同以往一样，调查工作又把他引入晦涩的领域，需要使用多种语言。（一位朋友说曾看到他读罗马尼亚报纸。）^[23]这个一生不断学习的男人在晚年依然对世界充满好奇，一如当年在科隆根据拾捡枯枝的报道，发现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的那个年轻报纸编辑。在马克思看来，所有发展——不论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不论发生在世界哪个角落，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对他都极为重要，因为他要在著作中传递对世界的深刻思考，从而尽到对全人类的责任（他少年时

在特里尔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是最具革命性的武器。

1878年秋天，马克思告诉尼古拉·丹尼尔逊说，《资本论》第二卷在德国付印很难早于1879年底——比他在汉堡向迈斯纳承诺的时间晚10年。⁽²⁴⁾到1879年春天，马克思又写信给丹尼尔逊，偷偷告诉他说自己得到消息，德国政府的反社会主义法不撤销，第二卷就不能出版。马克思说这样也好，因为在自己弄清英国当前面临的工业危机如何解决之前，第二卷无法完成，而且这样正好有了“借口”，有了时间再研究一下从美国和俄国寄来的资料。最后，他说身体也不允许自己进行长时间的工作。⁽²⁵⁾

马克思不是在伦敦就是在这个或那个疗养地，他试图让自己的身体恢复，但几乎每次都被危机打断。1879年8月，他和杜西经过长时间计划后去了泽西岛，但抵达后，便接到消息说，与龙格一起在兰兹格特海边度假的小燕妮在8月18日早产下一个男孩，取名埃德加（穆希的名字）。⁽²⁶⁾匆忙中，马克思给女儿写了一封短信：“可爱的小燕妮：世界小公民万岁！”⁽²⁷⁾燕妮已经赶去兰兹格特，马克思坚持也要去——不仅为了照顾女儿，也为了让自己安心。马克思在一场雷电交加的大暴雨中抵达兰兹格特。他抵达后写信给恩格斯说，小燕妮已经无恙，倒是自己嗓子难受，很不舒服，大脑停不下来，思绪一团糟。（他为了试一下思维能力，看了看数学笔记，却发现根本看不下去。）⁽²⁸⁾马克思写信给在伊斯特勃恩疗养的恩格斯时，劳拉和拉法格跟恩格斯在一起。⁽²⁹⁾劳拉从信中看出了父亲的焦虑，赶紧前往兰兹格特照顾他，好让母亲有时间照顾姐姐。在劳拉的照料下，马克思很快大有起色，小燕妮也好了很多，因此一大家人（小燕妮、她的丈夫、三个孩子、还有孩子的外祖父母和二姨）在9月15日如同从海边度假返程般、浩浩荡荡坐上火车返回伦敦。⁽³⁰⁾

马克思喜欢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的家长，但在欧洲各国政府高层眼里，他仍是值得注意的对象。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德国皇储妃维多利亚向英国国会议员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格兰特·达夫爵士打听马克思。⁽³¹⁾达夫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决定通过尽可能高雅的方式对他做一番了解：他邀请马克思到自己的俱乐部见面。马克思接受了邀请，两个人在德文郡共进午餐，交谈了3个小时。达夫很愉快地向皇储妃汇报说

马克思看起来“决不是一个惯于吞噬摇篮里的婴孩的人——我想那是他在警察眼中的形象。”马克思对过去和现在的把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对于马克思对未来的预测，他则不是很确定，比如马克思认为俄国将发生大的崩溃，德国随后将发生革命。当达夫问起马克思如何能确定德国军队将起来反抗政府时，马克思提到德国军队中的高自杀率，他说士兵从向自己开枪发展到向长官开枪不会很难。当达夫提出欧洲各国政府有一天也许会一致同意缩减军备从而减少战争的危险时，马克思说那是不可能的：破坏性武器方面的竞争和科学进步将使局势更加糟糕。花在战争机器上的材料和金钱将一年比一年多，形成恶性循环，无法逃避。

达夫让皇储妃放心，总的来说，马克思的想法“过于虚幻，因而不成其为危险。……总之，作为一个观点同我们完全对立的人来看，马克思可以说没有给我留下一点不好的印象。我很愿意再次和他相见。不管他有没有颠倒世界的愿望，但颠倒世界的人不会是他。”⁽³²⁾

其实，在某些方面，他已经做到了。

1879年，法国共和主义者终于牢牢地掌握了政府——包括国家和地方。1871年镇压公社的麦克马洪辞去总统，继任者为71岁的共和主义者儒勒·格雷维。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密切关注着时局变化和政治权力交替，等待着政府宣布大赦，允许逃离和被流放的法国人返回故土。与马克思家关系最为密切的3个法国人（拉法格、龙格和利沙加勒）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一切。

马克思和燕妮都病着，除了身体上的病痛，也在承受精神的煎熬：他们担心龙格带着家人回法国去。小燕妮的孩子们是马克思家里的明灯，只有他们能给燕妮带来真正的喜悦，对马克思也是如此。他的朋友和家人都经常提到他对孩子的喜爱。李卜克内西回忆说，马克思一家住在索霍区时，马克思有时话讲到一半，注意力就转到街上没人照看的孩子身上去了。他虽然极为穷困，但哪怕只有一分钱，也要分一半放到孩子的手上，如果口袋里空空如也，也会尽量给孩子安慰，跟他们轻声说话或摸摸他们的脑袋。晚年时的马克思在荒阜上散步时，后面经常跟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他这个坚定的革命者显然被当作了圣诞老人的化身。⁽³³⁾

马克思虽然极喜欢孩子，但对自己的3个女儿做的却不够，更不要

说早死的4个孩子。

为了给变革打下基础，为了避免他担心的突然革命，马克思一直坚持自己鼓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这一代，也不是为了孩子们那一代，而是为了更远的将来的人。在他眼里，家人之前做出的牺牲是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须的。但现在不需要再牺牲了，他发起的运动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生命，他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他和燕妮可以把没有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外孙们身上了。

因此，大赦的可能性就像一把利剑悬在这对外祖父母的头顶，好在这期间里家里热闹不断，分散了他们的一些注意力。杜西交往的圈子开始包括政治活动家、演员和不知名的作家。她拿到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读书证，像原来马克思和劳拉一样，几乎每天都去。⁽³⁴⁾阅览室里不准吸烟，有烟瘾的人（包括杜西）就在间歇的时候聚在一个特别的小房间里。年长的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着烟斗和雪茄，一边用不屑的目光看着这些挤占空间的年轻人，听他们从戏剧到政治再到宗教说个没完——想法还很吓人，即使算不上社会主义，也绝对算得上左派。

杜西的朋友们跟她来到梅特兰公园路，在马克思的允许下，在他书房外的客厅举行莎士比亚读书俱乐部，即多加贝里俱乐部。恩格斯和马克思把自己当作荣誉会员（有时是制造麻烦的会员）。杜西的朋友玛丽安·斯金纳回忆说，有一次轮到自己朗读《约翰王》中年轻王子亚瑟的一段对白，台词很感人，但自己就是无法聚精会神，因为她的注意力都在马克思和燕妮身上。她说马克思言语有力，气势逼人，头发有些蓬乱，他的妻子燕妮坐在他身边，虽然已经远不能与年轻时相比，但还是非常迷人。斯金纳和其他人肯定都注意到燕妮正病着。她皮肤蜡黄，眼睛下有些瘀点，“但她还是显得极具教养，举止优雅”。同样明显的是夫妻间的爱——结婚数十年后，燕妮对马克思的爱意依然明显。

多加贝里夜晚的活动还有游戏和猜谜——斯金纳觉得这应该是马克思思想出来的。恩格斯经常加入进来，以至于把杜西的朋友也变成了自己的朋友。（他曾邀请马克思去参加他为彭普斯举行的一次晚会，参加者就有杜西的这些朋友，但马克思没有参加，说不喜欢跟比外孙大的人待在一起。）⁽³⁵⁾

还有一个经常登门的是马克思最早的英国支持者之一：亨利·海

德门。^[36]海德门虽是典型的上层阶级绅士（从高顶丝质礼帽到镀银的手杖），却觉得自己有资格领导工人：他把认识的工人称为“同志”，^[37]把马克思称为“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38]海德门读过《资本论》，这也许足以让他进入马克思的书房。海德门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自己和马克思的友谊能让恩格斯嫉妒。如果他把这样的想法说出来，应该足以让马克思和恩格斯爆发出一阵大笑。果然，友谊不到一年就变了味，海德门出版了著作《大家的英国》，从《资本论》“借用”了很多内容（有时甚至逐字借用），却完全没有提到马克思。尤其恼人的是马克思的这本著作尚未出版英文版，这样，英国读者了解他的思想将是通过另一个人的名字。^[39]更加让马克思恼怒的是，海德门把马克思的思想与他自己的被恩格斯称为“国际主义措辞和沙文主义妄想”的想法混在了一起。^[40]

但这些都只是一一些小插曲，一家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巴黎的决定，决定在1880年7月发布：政府大赦，法国的大门向流亡者敞开。

利沙加勒马上离开伦敦，回法国投身报业。可以想象，马克思和燕妮肯定长出了一口气，但同时也有所担心。杜西的结婚计划一直未定；她和利沙加勒已经订婚8年，却好像谁都没有更进一步的打算。燕妮上一年写信给女儿时表达了惊讶：在说了一番自己作为母亲的喜悦之后，问道“你们两个还没有下定决心吗？”^[41]但杜西又不能被迫得太紧，以防她生病或闹出事端，小燕妮曾说，杜西在这个问题上无法沟通。^[42]

拉法格好像并不急于回法国，事实上，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回去。劳拉教课和他的照片蚀刻生意的收入都不多，他们主要依靠出售新奥尔良房产拿到的钱支撑，这部分钱用完他就真的破产了。他们能坚持下来应该也多亏有恩格斯帮助。拉法格对于向恩格斯要钱好像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总想着自己会有有钱的一天。^[43]他仍梦想着做生意挣大钱，并且决定要回法国。他咨询恩格斯在巴黎投资出版旅行书籍怎么样，恩格斯发现拉法格不仅对投资的安全没有考虑，收益也无从谈起。恩格斯对于他如此幼稚地相信虚无缥缈的合作伙伴感到沮丧，说：“别人还以为你求着被抢钱呢。”^[44]拉法格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

但所有人等待的是龙格的决定——他在赦令宣布后很快就决定了。

他的老朋友，激进分子领袖乔治·克列孟梭邀请他回巴黎负责他的报纸《正义报》的外国政治专栏。龙格骨子里是一名报人，而且他无法抵抗共和法国的吸引，他相信只要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数量足够庞大，就能保住收获的果实。他马上离开伦敦去与克列孟梭见面，但他保证会在8月中旬返回伦敦，和一家人到海边去。⁽⁴⁵⁾ 这年夏天，马克思和燕妮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疗养，而是在兰兹格特租下一处别墅，带着所有孩子住了进去，恩格斯也在。空气中好像弥漫着无奈的味道。小燕妮虽然还没有决定马上带孩子去法国，但这是迟早的事情。燕妮的身体也很糟糕：马克思这一年提到她的病症时，开始使用“治不了”这样的字眼，虽然还没有确切的诊断，但看着越来越像癌症。⁽⁴⁶⁾

杜西是唯一一个8月时没有在兰兹格特的，利沙加勒回法国后，她与拉法格夫妇的关系更紧张了，以至于恩格斯不能让两姐妹同时来自己家里。⁽⁴⁷⁾ 也许是杜西不想在被自己一心保护过的男人抛弃后，在劳拉脸上看到任何得意。一家人都知道这两姐妹的疙瘩，但没有公开讨论过。杜西8月时扭伤了脚踝，正好给了她一个的缺席理由。⁽⁴⁸⁾

奇怪的是，马克思邀请了伦敦一名记者来参加这次家庭聚会。自由主义改革家约翰·斯温顿，从伦敦一路向南来面见这位在他看来引起的政治地震比欧洲任何其他人都多的人物。马克思所住的房子为木制结构，刷过清漆，坐落在高高的海边悬崖上，周围却又有旺季海边休闲区的吵闹。在私人对话中，马克思从自己的角度带着斯温顿进行了一次世界之旅。斯温顿说，马克思就像苏格拉底，他问马克思：“您现在为什么没有从事任何工作？”马克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建议一起去沙滩上走走。他们在沙滩上见到了马克思其余的家人：燕妮、小燕妮、劳拉、孩子们、以及马克思的两个女婿。⁽⁴⁹⁾（拉法格刚刚完成一本短篇著作《懒惰的权利》——好像没有讽刺的意思。第二年出版后，他被指剽窃。）⁽⁵⁰⁾ 斯温顿说：“这是可亲可爱的一家——总共十来个人——两个为自己孩子感到幸福的父亲，和孩子们的充满生活乐趣、富有女性温柔的外婆。”马克思、斯温顿和马克思的两个女婿离开女人们，去边喝酒边闲谈。斯温顿说，自己一下午都在等着问马克思一个被他称为“存在的最终规律”的问题。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问马克思：“什么是存在？”马克思看着咆哮的海面和沙滩上欢闹的人群，回答说：“斗争！”⁽⁵¹⁾

8月中旬，龙格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兰兹格特，返回了巴黎。毫无疑问，他急着返回法国，但离开家人并不容易。他在8月24日抵达巴黎后写信给妻子说：“我想我无法快乐起来。我的航程充满悲伤，我先是愤怒，后是悲伤。……我想返回去找你们，但在这个时候，船起航了。这使得我在途中更加悲伤。我感觉好像吻你吻得不够，你会指责我缺少感情。我放不下可怜的小家伙和可爱的小哈里。……离开你们，我是如此不习惯。”⁽⁵²⁾

小燕妮需要照顾三个孩子，却只有一位奶妈帮着照看埃德加，而且迫于经济压力，她在9月重新开始教课。这虽然艰苦，但到法国后的生活将更加艰难。作为一名报人，龙格的收入远不如在国王学院，而且考虑到报社工作的极端不稳定性，他的职位没有半点保障。家人寄希望于他回到国王学院，但他在9月中旬到英国短暂逗留后，又返回了巴黎，把自己与克列孟梭捆在了一起。

看到丈夫为了巴黎而放弃在英国有保障的生活，小燕妮开始质疑他的情感。龙格走后，她冰冷又伤心地写信给他说：

.....

当我在站台上送你离开，我感到彻底的孤独，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孤独，坐在公共马车回家的路上，我只能装作有东西飘进了眼睛。在我看来，分别数月并未让你感到可惜，因为你一整天都独自在城里处理些最零碎的事情。……你首次从伦敦离开与从兰兹格特离开时差别是如此之大。巴黎又控制了你，成了你的唯一，让你再也不顾及任何其他！也许，那也没什么——因为你的态度最终对我也有了好的影响……不要自得于我在孤独中心碎。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到来时，我会接受。⁽⁵³⁾

.....

李卜克内西极为少见地来了伦敦，小燕妮带着孩子们去梅特兰公园路看他。一进屋，约翰尼（马克思的最爱）就跳进外祖父怀里，要求骑到他肩膀上。角色很快分配妥当：马克思是公共马车，李卜克内西和恩格斯是拉车的马。随着坐在马克思肩上的小家伙大喊“驾！快点！”，

这三位让各国政府颤栗的老一辈激进分子，在花园里轻快地奔跑起来。李卜克内西后来回忆说，马克思跑得汗都滴下来了，他和恩格斯一慢下来，约翰尼就做出挥舞鞭子的姿势，大喊“你们这些懒马！”，他们只能继续跑，直到马克思尽了兴，又跑不动了为止。⁽⁵⁴⁾

马克思的孩子也是恩格斯的孩子。他每天下午都到马克思家讨论政治问题、圈子里的争论、以及家里的事情（他毕竟是负责生计的人）。到188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生活已经完全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分别拥有地毯的一部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区域上踱步。恩格斯对涉及孩子们的每个决定都会提供意见，随着燕妮病重，马克思把很多家事瞒着她，只跟恩格斯商量。有趣的是，一家人留下来的唯一一张全家的合影里不是马克思、燕妮和三个女儿，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女孩子们。

他们被新一代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视为运动的“精神先驱”。⁽⁵⁵⁾（一名年轻的追随者说他们具有“终极吸引力”。）⁽⁵⁶⁾这些来伦敦面见他们的年轻人大多与马克思的女儿们一般年纪，他们纷纷来向两位寻求保护或建议，或者在筹办新政党或新报前求得他们的祝福。列奥·哈特曼便是如此，他在试图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失败后在1879年逃出俄国。（他和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扮作夫妻，在铁路附近租下一处房子，挖地道到铁路下面，计划炸毁沙皇乘坐的火车。计划在最后时刻流产。）⁽⁵⁷⁾哈特曼抵达伦敦当天便来到马克思家门前，马克思马上迎他进门。⁽⁵⁸⁾

对场运动的未来极为重要的两个人也在11月登门：苏黎世报纸编辑爱德华·伯恩斯坦和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亲密伙伴奥古斯特·倍倍尔。这时已经有无数男人和少数女人投身社会主义报业和政治，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两个人是最出色的。

他们先见到的是恩格斯，他一边跟他们进行激烈的政治辩论，一边对他们大喊“喝酒，年轻人！”。他给他们倒上一杯又一杯波尔多酒，一个小时后，他突然宣布“该去马克思家了”，便大步流星地朝马克思家走去，伯恩斯坦和倍倍尔都很难跟上他的脚步。这时，伯恩斯坦已经被恩格斯吓怕了，不过估计到马克思那儿情况更糟。“我本来以为见到的将是一个有些阴郁和极为易怒的老人，但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头发已

经全白的老人，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充满笑意、言谈极为宽容。”^[59]

马克思与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初次见面时表现得如此温和，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了自己的政治传承者和运动的新一代年轻人，而此时由于新的政治自由使得运动被拉向各个方向，马克思希望能在自己离开时把这新一代人引入正确的轨迹。他越来越明白，要承担起把他的消灭阶级的设想变为现实的，不是他，而是他们。

42 燕妮离世



所以我抓住每一个机会。我想活得再久一些，可爱的好医生。
真的很奇怪，越是故事临近结尾，你越是想抓住这尘世的艰辛。

——燕妮·马克思⁽¹⁾

到 1880 年 11 月，小燕妮和龙格已经决定在新年之后由小燕妮带着孩子搬去巴黎。就在这时，在写给龙格的信中，小燕妮的语调从对丈夫的想念转向怒气连生——有个人的，也有政治的。她说，自己对于他在《正义报》上的文章如此小心翼翼地照顾资产阶级的接受性感受震惊，说自己读完文章后，“感受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失望和孤独”。⁽²⁾她害怕这个自己了解和深爱的男人回到巴黎后在朋友的影响下改变了，她直截了当地写道：

跟你说话时，我好像在对着风自语——我显然对你毫无影响。我们在一起时尤其如此——照经验看，如果我在巴黎，你的做法跟现在相比也不会有任何两样。……你问我，你不在身边，我是怎么熬的。想到在巴黎能够见到你的时候也不会比现在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家也不能称其为家，我便哲学地进行思考，好好享受现在的平静和安

小燕妮对搬去法国充满恐惧，对龙格的母亲的强势深感不安——虽然她明确表示搬去巴黎后最好能住的离市区近一些，这样龙格离家更近，但龙格的母亲还是在阿让特伊给他们租了房子——这里到巴黎坐火车需要 20 分钟。⁽⁴⁾更让她气恼的是，龙格回法国后，在她留在伦敦更需要钱时，龙格的母亲终止了给他们的资助。“让我离开宠爱我的、生着病的可怜的母亲已经够悲伤的了，”小燕妮暴躁地说，“还要走进一个这样对待我的新家。”她指责龙格对自己为准备搬家需要做的一大堆事情视而不见。“你从空想的角度看待一切，你说这是乐观。我说要下雪了的时候，你是不是连天气都要无视，认为不会有冬天？”⁽⁵⁾小燕妮在精神和身体上都疲惫不堪，这些情绪的爆发也情有可原。她担心父母：母亲一天天瘦下去，父亲咳嗽的时候会咳出血来。她还要考虑自己的身体：36 岁的她又怀孕了，这是她在 5 年里第 4 次怀孕。⁽⁶⁾

龙格本打算到伦敦过圣诞节；从他 8 月离开起，一家人就期盼着在节日里团聚。但在 12 月初，他告诉小燕妮自己无法离开，他要参加市选举。他在咨询利沙加勒后得出结论：不留在巴黎进行宣传，将毫无获胜希望。⁽⁷⁾小燕妮对于他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咨询利沙加勒而不是自己，感到极为愤怒。她等了几天，让自己冷静下来并与父亲进行了商量后才回信。

实际上，马克思先写了信。马克思没有试图影响龙格的决定，而是告诉他问题很清楚：选择孩子还是选择政治职位。小燕妮没有强迫他做出选择。她的回复很像母亲面对同样情况会做出的反应。

很明显，如果你愿意进入这场选举的战争，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是不能离开战场的：现在是行动的时刻，我们显然应该把欢聚的时刻放在选举结束之后，总不能让这样幼稚的原因导致你的失败。如果我为了个人的欢愉，使得你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希

望自己能够一直毫无怨言地在不可避免的事情面前让步，往好处想，最重要的，永远不要站在你和你的公共职责之间。⁽⁸⁾

.....

龙格留在了巴黎，但竞选失利。

1881年2月，梅特兰公园路一片嘈杂。龙格的物品寄往法国之后，小燕妮带着孩子们住了进来。现在，到了母亲和孩子跟着去法国的时候，却一切都没有准备好。燕妮像没有生病一样，数周来忙着给外孙们缝制衣服，从外套到内衣无所不包。小燕妮告诉龙格说母亲如此专注于对孩子们的爱，好像完全没有受到疾病的侵扰（已经被医生确定为癌症）。⁽⁹⁾但她越是如此，身边的人便愈加担心她在孩子们离开伦敦之后的状况。马克思知道分别将极为痛苦。他告诉尼古拉·丹尼尔逊说：“我们的外孙——三个小男孩——对她来说，正如对我本人一样，是无穷尽的乐趣的源泉。”⁽¹⁰⁾

燕妮对女儿将要踏上的旅程充满担心，这让她想起自己在1849年的那次艰苦旅程。那时她30多岁，怀着7个月身孕，带着3个小孩子，历尽艰苦来伦敦和马克思会合。那时她虽然有琳蕙的帮助，旅程还是无比艰辛。考虑到这些，马克思和燕妮竭力劝女儿把哈里留下，因为他智力迟钝、又病恹恹的。⁽¹¹⁾但龙格不会同意，所以小燕妮在3月中旬出发时，把所有的负担都带上了。⁽¹²⁾虽然父母无比担心，她却并未特别担心。此时的小燕妮已经决定听天由命，她强迫自己乐观一些，相信法国的生活也许会很美好，丈夫也许准备好了回到家庭生活中来。⁽¹³⁾

的确，龙格急迫地想见到她们。小燕妮到达前几周，他便向她保证：新家会很好，孩子们在古斯塔夫·杜朗（公社后帮助他逃脱的那名医生，也住在附近）家会有伙伴一起玩耍，她也不需要担心他母亲的插手。⁽¹⁴⁾但当她来到阿让特伊，却发现房子不仅偏僻，而且尚在修缮，几乎无法入住。第一周，她曾经对住处离巴黎太远的担心便应验了。他在城里错过了回家的火车，第二天早上才回到阿让特伊。⁽¹⁵⁾这样的模式还会继续，小燕妮发现自己孤独地陷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独自住在四面透风、家徒四壁的房子里，只有几个孩子陪伴在身边。

两周后，她说自己在法国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她告诉劳拉说自己“神经绷得快要到了绝望的地步——精神上 and 身体上都是如此”。总有一个孩子让她夜里无法睡觉，也总有一个在生病。“在伦敦的几个月虽然单调却自由、独立和充满生机，这让我无法再适应与仆人和婴儿的战斗。这一切实在让我无法忍受，以至让我感觉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跟这些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用不了几年（不是几个月），我就会变成无可救药的白痴。”她在信尾说：“我无法代沙尔向你问候，因为他不在家。”^[16]

如果说小燕妮孤独，梅特兰公园路更加孤独。有时，当马克思听到街上传来孩子的声音，会以为是自己的外孙，当他赶快走到窗前，才意识到他们远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他告诉小燕妮说，她们离开后，家里无聊透顶。唯一的变化是给燕妮找来一位新医生，但由于燕妮的状况已经无可挽回，除了让她情绪上有所转变外没有多大区别。^[17]这期间，马克思又接待了一名访客：26岁的卡尔·考茨基，因为酒量大，他很受恩格斯喜欢。马克思却觉得他“平庸，目光短浅”，没什么意思，是天生的俗人，“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马克思说，自己尽可能地把他“打发”到恩格斯那里去。^[18]此时的考茨基虽然只是崭露头角的社会主义报人和经济学家，未来却成为了德国领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编辑了《资本论》第四卷。^[19]考茨基胡须修剪整齐，戴着窄框眼镜，给人以精明的感觉。他走进马克思的书房时，看起来更像是一名会计师，而非社会主义者。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心里紧张得怦怦跳，但马克思没有问他理论问题，而是问了他母亲的情况。

考茨基对马克思的热情感到诧异，但他发现房子里疾病弥漫，少有欢乐，唯一的笑声来自燕妮。^[20]小燕妮说，母亲虽然虚弱，依然会欢迎党内年轻成员的到来，把身上所有的力气使出来，展现出同样的“精气神和兴致，同样的对人类苦难的感伤，……这就是让她一直与众不同的原因”。^[21]

孩子们离开后，为了让家里恢复一些生气，杜西的多加贝里朋友把剧院搬到了马克思家的客厅里，这让燕妮的精神大有改观。当然，相比这些人的业余朗诵，她更加注意的是他们中间迸发出的浪漫火花，甚至在其中为杜西物色了一个人选：一个名叫的欧内斯特·雷德福的英国律

师。⁽²²⁾但这些客人无论有多风趣，都无法真正抚慰这对孤寂的外祖父母内心的伤痛。马克思告诉大女儿说：“真是怪事，没有社交根本不行，而当有社交的时候，又想竭力回避。”马克思在这封长信中写满失望和牢骚之语，唯一兴奋的时候是讲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3月遭到的刺杀。6名受审的刺杀者中，有5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就包括曾与哈特曼搭档的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马克思称赞他们“是一些能干的人，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²³⁾

4月底，小燕妮又生下一个男孩。马克思写信祝贺小马赛尔的出生：“我们家的‘女性那一半’都希望，‘新来的人’增加人类‘最美好的一半’；而我却宁愿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出生的孩子们是‘男性’。⁽²⁴⁾他们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²⁵⁾

恩格斯马上计划让马克思和燕妮去法国看看新生的小外孙（被马克思称为“伟大的陌生人”）。⁽²⁶⁾医生认为燕妮应该能够承受这次旅行，但她的状况起伏不定。她有时需要卧在床上，有时却感觉很好，还能去看戏。到了6月，她的病情迅速恶化，穿衣服都感到困难。医生建议马克思和燕妮去一趟海边，看看她到底能承受多远的路程。劳拉陪着照顾两个老人——马克思由于担心燕妮，自己的病痛也有所加剧。⁽²⁷⁾最终，马克思和燕妮旅途中表现都不错，医生对燕妮的恢复感到满意，同意他们去法国。⁽²⁸⁾马克思也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准许：克列孟梭向龙格保证，马克思来法国完全不需要担心警察。⁽²⁹⁾

小燕妮对父母和琳蕙即将到来和陪伴感到由衷的喜悦。她一直害怕收到电报说他们来不了了，每次邮差来到她家门前，她都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但消息是好的：他们会来。她回信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到星期二。……我的手抖得几乎抓不住笔。”⁽³⁰⁾

7月底，马克思、琳蕙和燕妮启程。大自然第一次在他们前往大陆的旅途中给了面子：马克思说海面平静，天气十分好。但从加莱到巴黎的火车之旅却比较艰苦，旅途中，燕妮一直遭受痉挛和腹泻的侵扰，到巴黎后，麻烦仍未结束。龙格在火车站接了他们，但他们还要去另一个车站坐车去阿让特伊。⁽³¹⁾一行人直到晚上10点才来到家里，他们一安顿下来，一向大方的恩格斯就写信给说燕妮“绝对不应克己了”。他的

钱包任由他们支配。^[32]马克思想让燕妮尽可能在阿让特伊长住。她近期频繁的胃痛在法国反而有所缓解，原因也许是孩子们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虽然马克思觉得妻子的状况没有好转，但她自己觉得有所好转。^[33]

此时，距离燕妮和马克思当年被迫离开巴黎已经过去了32年，相较燕妮熟悉和喜爱的那个巴黎，这座城市已经变了太多。奥斯曼虽然破坏了那个巴黎，却建造了一个公认的更加宏伟的巴黎。8月初，燕妮说想去看看马克思做到的事情。她越来越瘦，有时血会顺着皮肤上的裂缝往外流。马克思马上带她回伦敦，但她故意把衣物送去了洗衣店，周末才能洗好，所以他们必须待久一些。看到她病成这样却依然如此固执，马克思让步了。

一名法国医生给燕妮用了足量吗啡来缓解疼痛，以便让马克思和小燕妮能带她再去看一看这座曾带给她无比快乐的都市。他们坐着敞篷马车徜徉在1849年时还尚不存在的林荫大道上，经过马克思所说的多姿多彩永远不会散的街头集市。燕妮兴致很高，她想去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他们坐在咖啡馆外面的一张小桌子上，重温巴黎的街头生活。^[34]马克思和燕妮也许有一刻想象着回到了年轻时的岁月。那时，他头发乌黑，刚刚从哲学家变成强硬的革命者，她是特里尔的美人，依偎在他的怀里，准备一起挑战这个世界。但现在，他们只是两个老人，与其他的老人无异。他身体已经发福，头发已经花白，她已经变得如此虚弱和瘦小。唯一没变的是他们依然像年轻时那样热烈地依恋着彼此。当年，他们相互打过招呼后，眼神再也无法离开对方。如今，他们知道，他们很快将不得不永远说再见。但现在，至少在现在，他们仍陪伴在彼此身边。

回火车站的路上，燕妮又感到不适。她的体力已经无法支撑这样长时间的活动，但她是如此享受这次游览，想让马克思再次带她去巴黎。但这次未能实现，8月中旬，马克思接到杜西的朋友多利·梅特兰的来信，说杜西病得很重，却不肯看医生。^[35]8月17日，马克思独自离开法国，返回伦敦照顾她。^[36]

当一家人都着急于燕妮和马克思的身体状况和龙格一家的离开时，杜西在伦敦的新朋友圈在壮大。弗尼瓦尔付钱雇用她进行一项研究工作（后来的牛津词典），她也开始了作为权利斗士的生涯。^[37]一个名为土地联盟的组织，一直在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在爱尔兰对大地主有利的法

律，特别要求停止时不时赶走佃农的做法。土地联盟成员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爱尔兰的独立，但也有人支持目前的自治政策：爱尔兰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爱尔兰人用自己的法律治理爱尔兰。领导这次斗争的是来自爱尔兰的国会议员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他从美国募集到20万美元的捐款。^[38]小燕妮在伦敦时，曾把一些关于爱尔兰状况的文章发给丈夫的报纸。但马克思家最小的女儿没有局限于文字，而是走上街头，和民众一起聚集在一处治安法庭外，声援一位被关押的芬尼亚会会员和土地联盟创始人。但民众都被骗了，这名爱尔兰犯人已被秘密转移，杜西非常气愤，她直面一名膀大腰圆的爱尔兰人伦敦警察，指责他为英国人做肮脏的事情。^[39]

1881年春，海德门成立了民主联盟，他将其视为工人组织的保护伞。虽然马克思痛恨海德门，杜西还是加入了同盟。她既然想为英国的受压迫群体代言，就必须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关系。^[40]这样的做法合乎她的性格。小燕妮和劳拉满足于在幕后工作，但杜西更愿意冲在前面自己行动。她周围这些聚集在阅览室里的年轻人属于英国新一代政治觉醒者，与上一辈不同，他们把社会问题与艺术、文学和音乐相结合。（她的其中一个朋友是刚刚来到伦敦的爱尔兰人萧伯纳，后者读过法文版《资本论》，正处在蜕变过程中。）^[41]这样的环境让杜西如鱼得水，在他们中间，她可以同时拥有政治和戏剧。

3月，她在公社周年庆祝活动中参加了在圣潘克里斯的演出。演出厅里三分之二的观众是包括她的父亲、恩格斯、列奥·哈特曼和倍倍尔在内的知名激进分子。杜西登台朗诵了《哈姆林的吹笛者》。爱德华·伯恩斯坦回忆说她的声音非常美妙，整个人非常活泼。“由于我的英文很差，我没办法每个词都听明白。我只记得爱琳娜的朗诵充满生气，声音抑扬顿挫，赢得了热烈的掌声。”^[42]

7月，马克思和燕妮去伊斯特勃恩时，恩格斯又坐在迪莱坦特俱乐部剧院的观众席上，欣赏了杜西在两个独幕剧中的表演。他向马克思汇报说杜西“十分沉着，在舞台上显得很可爱”。^[43]他觉得她演得很不错，但他和马克思都觉得这不过是杜西的业余爱好。但上个月杜西向姐姐小燕妮吐露说想把舞台作为职业，她找到了多年前指导过小燕妮的表演老师。杜西知道马克思会反对，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燕妮生

病和小燕妮搬家，马克思身上的债务又增加了不少），但她还是告诉姐姐说，自己在教育上的花费已经比父亲预想的少了很多，而且自己会尽力赚出这部分钱来。^{〔44〕}“我希望自己能做到，那将是很大的安慰。反正我要试一试，失败也没什么。亲爱的，你看，我现在有很多选择，我觉得自己之前浪费了太多生命，我必须要做些什么了。”^{〔45〕}

对杜西而言，不幸的是，这个夏天没人有心思理会她的需要。她一个人留在伦敦。父母和琳蕻在法国，恩格斯也去了约克郡。由于劳拉对利沙加勒曾经的怠慢，杜西仍然不想跟她说话，她陷入了沮丧，并出现了厌食。马克思在8月中旬回到伦敦时，杜西已经出现失眠的症状，好几个星期没怎么吃东西，并且出现了手部颤抖和脸部痉挛的病状。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她处于“极度的神经抑制状态”。医生检查后没有发现器质性疾病，只是由于她没怎么吃东西，“胃的功能完全紊乱”，“神经系统严重的过度紧张”。^{〔46〕}

两天后，燕妮和琳蕻回到伦敦时，马克思和杜西都待在客厅里，杜西靠着垫子依偎在沙发上。燕妮写信告诉小燕妮说：“都是她那种疯狂的生活方式导致她现在处在这种虚弱但又兴奋的状态，走路比我都好不到哪去。”提到阿让特伊之行时，她对大女儿说：“我对你还有你的爱和仁善的记忆将永远是我内心最宝贵的财富，我要像守财奴一样把它们小心翼翼地看管着。”^{〔47〕}

到10月，杜西好了，但一家人都在看护着燕妮。她已经很少下床，即便下床，也是坐在屋里的一张椅子上。马克思由于数月来担心妻子、女儿和外孙们，自己的病痛也加剧了。他这段时间的主要问题都与呼吸有关，先是支气管炎，后是胸膜炎。由于吸烟，尤其是年轻时经济条件极为艰苦只能抽最为劣质的雪茄，他的肺部功能明显衰弱了。他的青春朋友、同志和“不能忘怀的深爱的伴侣”正在迎接死亡，他却被医生要求待在隔壁的小房间里，不能下床，不能去看她。^{〔48〕}小燕妮想带孩子们回来，看他们能不能让母亲恢复精神，但劳拉告诉她说母亲目前的状况已经无法再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欢乐，而且，母亲一直都把他们记在心里，她紧紧攥着小燕妮寄来的每一封信。^{〔49〕}

凭着最后一点力量，10月燕妮给小燕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交给杜西去邮寄，却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能寄到法国。“这很可能是她写的

最后一封信，却居然一直没能寄到，我悲伤得不知该如何言语，”劳拉写信给姐姐说。⁽⁵⁰⁾“母亲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极为悲伤。她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才写好这封信，在其中倾注了那么多感情，等待着你的回复，信的丢失将令她无法承受。”劳拉暗示说，杜西作为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也许是因为极端的自私和嫉妒，因此没有寄出这封信。但这应该只是劳拉与杜西之间的相互不满作怪，杜西在写给姐姐燕妮的信中，描述了母亲知道信的丢失后会多么伤心，建议姐姐假装收到了信。⁽⁵¹⁾

10月底，医生终于允许马克思去看自己的妻子了。数年后，杜西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上，父亲终于有了足够的力气走进亲爱的母亲的房里。他们重新焕发了青春——她是盛开的女孩，他是爱慕她的青年……他不是疾病缠身的老人，她也并非垂死的老人。”⁽⁵²⁾马克思会说自己等待了7年迎娶燕妮，但那就像7天般，因为他是如此爱他。杜西写道：他一生都不需要去爱他的妻子，他一直在爱着她。⁽⁵³⁾

这个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国会又多赢得3个席位。在抑制或消灭工人运动层面，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显然失败了；运动只是转入了地下，而且变得更加强大。⁽⁵⁴⁾依靠咖啡支撑的燕妮明白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她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为之欢喜。⁽⁵⁵⁾老斗士们聚在她床边，惊叹于取得的进步：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国王已经不再神圣，工人——这些曾经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无言地接受命运的广大被剥削者——已经走进政府。虽然已经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燕妮还未能像年轻时预期的那样看到丈夫站在最伟大思想家的行列，也还未能见到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像他希望的那样改变这个世界。她为了丈夫内心的理想牺牲了自己和孩子们的一生，却好像无法看到这个理想成为现实了。

11月底，伦敦西区张贴出一些海报，宣传一份叫作《现代思想领袖》的月刊，它刊登了首篇称赞马克思著作的英语文章。11月30日，马克思坐在燕妮的床边，兴奋地把这篇文章读给她听。文章的作者是年轻的贝尔福特·巴克斯，他称赞《资本论》“代表着对一种经济学说的剖析，其革命性和广泛的重要性足以与哥白尼天文学体系，或者说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相媲美”。⁽⁵⁶⁾恩格斯都无法总结得比这更漂亮。⁽⁵⁷⁾燕妮极为兴奋。她就知道丈夫是天才，虽然庸人们一直看不到这一点。马克思

形容说，她此时的眼睛“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⁵⁸⁾

燕妮在两天后的12月2日去世，享年67岁。

燕妮·马克思被埋葬在海格特公墓，离她的外孙卡罗的墓不远。马克思没有参加葬礼。外面天寒地冻，一家人都不愿他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冒险，连燕妮都在去世前对身边的护士说过：“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⁵⁹⁾恩格斯替马克思念了悼词：

.....

她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出的睿智的批判精神，敏锐的政治嗅觉，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谨慎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谨慎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⁶⁰⁾

.....

燕妮去世的消息传开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党内伙伴纷纷传来吊唁。自布鲁塞尔时期后就再也未曾见过燕妮的西比勒·赫斯写道：“由于她的逝世，自然界破坏了它自己的杰作，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聪慧而慈爱的女人。”⁽⁶¹⁾但正如马克思自己曾经所说，安慰之言本意虽好，却丝毫无法缓解最深切的悲伤。马克思的朋友们极为担心马克思失去夫人后的状况，恩格斯说得最为坦白：“摩尔也死了。”⁽⁶²⁾

43 两个女婿



李尔：这儿有谁认识我吗？这不是李尔。
是李尔在走路吗？在说话吗？他的眼睛呢？
他的知觉迷乱了吗？他的神志麻木了吗？
嘿！他醒着吗？没有的事。
谁能够告诉我我是什么人？
弄人：李尔的影子。

——威廉·莎士比亚⁽¹⁾

当然，马克思没有真的死了，但他变成了一个影子，一个失去了相伴 38 年的女人的陪伴之后，孤零零地在偌大的房子里游荡的影子。他有时会穿上厚厚的黑大衣和毡帽，到公园里去走走，或者到荒阜上去。⁽²⁾他毫无目的地游荡，一直以来依靠的地图已经不在了。他双眼极度近视，回来后经常找不到自家的门，直到发现钥匙插不进锁芯，才发现自己要开的是邻家的门。⁽³⁾女儿们、恩格斯和琳蕙一致觉得必须让他离开伦敦。梅特兰公园路便如穆希死后的第恩街一样，充满了悲伤，他在这里永远无法恢复。

但马克思反而愿意处在虚弱的状态中。按照医生的指令，他在身上抹上碘酒，使得皮肤产生难受的灼痛感。“这种处置……现在对我效用很大，”他告诉女儿小燕妮说，“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你想象一下吧，一方面是世界末日，而另一方

面是牙疼得要命的人！”愤怒也有助于他掩盖悲伤。⁽⁴⁾马克思一直对龙格带小燕妮和孩子们搬回法国心有怨言，当他看到龙格的报纸刊登的悼念妻子的文章后，不满变成了怒火。龙格在文章中提到了燕妮和马克思为了结婚需要克服的偏见，因为马克思是犹太血统。马克思指责龙格编造历史，这种偏见根本不存在。（马克思对自己重写历史应该也感到了负罪感，因为这个偏见无疑存在。）还有很多细枝末节让马克思愤怒，因为他担心它们被欧洲其他报纸不断刊登。他抱怨女婿玷污了燕妮的记忆，他对小燕妮说：“如果龙格在自己的文章中永远不再提我的名字，那就是给我的莫大恩惠了。”⁽⁵⁾

马克思告诉俄国朋友尼古拉·丹尼尔逊说，自己想尽快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好献给妻子。⁽⁶⁾但就在这个时候，迈斯纳通知他想出版《资本论》德文第三版，这就需要马克思写一篇新序言和进行一些修改。⁽⁷⁾马克思对此感到沮丧。他没心思回过头再弄一遍第一卷。他极为少见地决定尽可能少做修改，其他的留给迈斯纳处理。这在朋友和家人看来，最能说明燕妮的离去对他造成何等巨大的影响。⁽⁸⁾过去，他是绝对不会在尚未对著作进行逐行审校之前，就同意再次印刷的。

医生让他往南去，最远可以到阿尔及利亚，看能不能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侵袭中恢复过来，但马克思尚未准备好进行这样大胆的旅程，他决定去怀特岛——那座7年前他和燕妮一起去的时候被他称为天堂的小岛。⁽⁹⁾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传统，一般要由女儿（通常是最小的女儿）留在家中照看年迈的父母。在马克思、琳蕙和恩格斯看来，杜西很自然地应该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但这个时刻来得很不巧——她正打算自己做出点事业来。虽然深爱父亲，但她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做保姆。⁽¹⁰⁾她觉得父亲在要求马克思家的又一个女人为了他而牺牲一生，她拒绝了。她写信给姐姐小燕妮说，觉得自己自私，虽然深爱父亲胜过一切，但“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消除尝试做些事情的想法。独立的机会是如此甜蜜”。⁽¹¹⁾但她的反抗的代价将会很大。

小燕妮也曾追求过独立，但悲哀地过早结束了，她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杜西的想法。她尝试劝说父亲：琳蕙会比杜西更好地照顾他。⁽¹²⁾但马克思坚持让小女儿陪自己，他们在12月29日离开伦敦，准备进入这

个对他们而言极为可怕的一年。天气反映着他们的心情：岛上狂风肆虐，夜里也不停歇，天空阴云密布，大雨瓢泼而下。马克思的咳嗽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所加剧。这期间，他写信给劳拉形容杜西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又遭受神经性抽搐和失眠的侵扰。马克思说她整天读书写字，“同我一起待在这里似乎只是出于义务感，就像一个把自己作为牺牲品的蒙难者似的”。⁽¹³⁾

马克思对女儿的痛苦和原因一无所知。杜西写信给小燕妮说，担心自己就要彻底崩溃，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她睡了不到6个小时。杜西还把同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朋友克莱门蒂娜·布莱克，后者又告诉了多利·梅特兰和欧内斯特·雷德福。这些多加贝里俱乐部的成员担心杜西处在崩溃的边缘，请琳蕻去照顾她。但琳蕻无法离开伦敦，因此多利最终去了怀特岛。她的到来才让马克思意识到杜西病着，并对于她告诉朋友而没有告诉自己感到愤怒。杜西辩解说，这是因为她担心他会或者责怪她在家里最需要的时候生了病，或者过多地担心她的身体，而这两者对他们都无益。

.....

爸爸和医生甚至任何人都不理解，影响我的主要是精神上的焦虑。爸爸总是说，我首先要‘休息’，要“身体强壮”，却不知道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休息’，也不知道我如果有了确定的计划和工作，而不是无限期地等待，身体自然容易‘强壮’起来。……只能坐在这里等待，等着最后能做些什么的机会也溜走，那我真的要发疯了。

.....

杜西心里仍想着表演，觉得机会正在快速溜走。她在这个月将年满27岁。“我已经不再年轻，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之中，如果不能马上就做，以后也就没有尝试的意义了。”⁽¹⁴⁾她说自己虽然“没聪明到以一种纯知识的方式生活”，却也“没笨到只能待着，什么都做不了”。⁽¹⁵⁾

杜西希望小燕妮拯救自己，小燕妮做到了，她虽然有4个孩子需要照顾，但作为新的女家长，还是抽出身来耐心地从法国给英国的家人们

进行调解。她先是写了一封信给劳拉，告诉她杜西的状况。母亲临终前，劳拉和杜西为了让母亲安心，才勉强照了面。但她们的关系依然紧张，小燕妮只得从遥远的阿让特伊调解住的相距不过十分钟路程的两个妹妹之间的关系。^[16]她告诉劳拉说，自己担心杜西病得很重，原因应该是杜西与利沙加勒长时间、却没确定说法的关系。“她虽犯过错，但怎么说也不该遭受那么多折磨，很值得同情。我虽然觉得她的身体状况不太允许，但目前看来，要想让她好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她在戏剧方面试试运气。只有通过艰苦的工作才能让她摆脱目前这种不幸的状况，得到休息和抚慰。”^[17]

接下来，小燕妮又写信给父亲。这封信没能留存下来，但马克思收到信后马上给恩格斯写了一封短信，从中可以看出女儿对他说了什么。他说要把杜西从给自己做伴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她急切地热望，以此来开始她所希望的那种独立的、活跃的演员生涯，如果同意这一点，那么她认为这样的年纪，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种想法无论如何是正确的。我根本不想让孩子认为，似乎她当了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18]杜西在父亲的转变中看到了姐姐的作用，衷心地对她表示感谢。她宣布说，为了表示重新开始生活的决心，自己结束了与利沙加勒长达9年的婚约。“长久以来，我一直想下决心解除婚约，却一直做不到——他对我一直那么善良、温柔和耐心——但我现在已经做到了。……最终，我总算鼓足了勇气。”她暗示说有些解除婚约的原因不能在信里讲，根据马克思家的密码来看，她可能是遇见了什么人。“不过，这一切全都过去了。我是说我要努力工作，使生活比以前更加充实和美好。……明天是我的生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我有现在这样一半坚决，我就必定能干好。”^[19]

杜西的危机是小燕妮接过母亲的班、处理敏感的家庭问题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她表现得很出色。1月底，她写信给最小的妹妹说：

.....

对于婚约这些年来带给你的折磨，我感到悲伤，但又欣喜于你展现出的勇气。……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也是同样的性情。对你我来说，无所事事与死去无异。我的有

些事情会让你发笑，比如面对家里令人厌烦的枯燥和各种烦人的事务，我时常向往在学校时的苦日子，向往铁路，向往充满生机和趣味的街头。^{〔20〕}

.....

她说自己对杜西获得自由感到高兴，为她能够“过上唯一能让女人获得自由的生活方式——艺术的生活”而高兴。她还建议杜西不要害怕向退休的演员寻求帮助。“每个姓氏都有其意义所在，你的姓氏是马克思。”^{〔21〕}

马克思的医生认为他不能在伦敦过冬，但去南方的选择有限：去意大利可能会被逮捕，坐船去直布罗陀也需要护照。医生让他去阿尔及利亚，但只能从法国走，旅途会很远。马克思选择了这条路线，可以把旅途分割开，先去看看小燕妮和孩子们。杜西陪他到阿让特伊后，便返回了伦敦。^{〔22〕}

马克思在阿让特伊逗留时间很短，外孙们也无法让他的状况好转，所以他很快启程向法国南部进发。难以想象的是，在怀特岛时悬在他头顶的乌云跟着他到了伦敦之后，又在马赛等着他。他在夜里两点抵达，只能裹着大衣独自蜷缩在寒风刺骨的车站里。^{〔23〕}他告诉恩格斯说：“我冷得有些打颤，只好以‘酒精’御寒，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它。”他在马赛住了一天，之后坐船去阿尔及尔，龙格在那里有个朋友（拿破仑三世时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已经高升为阿尔及尔的上诉法官）接应他。

马克思得到了同胞们温暖的问候，但恶劣的天气依然紧跟着他。由于船上机器声和风声吵得要命，他一连两个晚上无法入睡。到阿尔及利亚时，正赶上冷雨季节。此时的他“冻得要死”。他向恩格斯描述当时的困境说：“我失眠，食欲不振，咳嗽得厉害，有点惘然若失，有时犯重忧郁症，像伟大的堂·吉珂德一样。”他考虑要不要马上返回欧洲，但不愿再在船上遭罪。他又考虑要不要继续前行，去比斯克拉，但路途要七八天。最终，天空放晴，他在阿尔及尔城外一座俯瞰地中海的小山上找到了一处旅馆住下。“再也没有比这里早晨八点钟的景致、空气、植物——欧洲和非洲奇妙的混合——更迷人的了。”但这个蜜枣很快没

了：连续9天的暴风雨开始了。马克思用轻便大衣换下从伦敦带来的厚重大衣，缩在旅馆里躲避无情的暴风。^[24]

一位当地医生检查过马克思的状况后极为吃惊，医生不准马克思再走路或谈话，要求他每天在身上涂抹药膏，把水泡挑破，安静地躺着休息。马克思只能照做，期待慢慢恢复。在这种情形下，他能做的事情便只有回忆。他告诉恩格斯说：“此外，你知道，没有人比我更讨厌随便动感情的了；但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25]

除了身体上的病痛，他这颗称得上世界上最顶尖的之一的大脑也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对此没有人比马克思自己看得更清楚。他以近乎注脚的形式对恩格斯说：“我亲爱的，你和家里的其他人一眼就会看出我在构词法、造句、语法方面的错误；由于我还精神恍惚，我总是事后才能发现它们。”^[26]

4月中旬，风仍没有停，雨已经被灰尘取代，太阳炙热。无法忍受热浪的马克思采取了极端办法：头发剪短，胡须剃掉。不过，为了不让世界忘记他最为狂暴时的模样，他在把头发献给“阿尔及尔理发师的祭坛”之前去照了相。^[27]这是马克思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不像原来那样严厉，反而有些欢快、温和。在64岁生日前夕，卡尔·马克思看起来已经有些昏沉。

由于天热和尘土飞扬，马克思又开始咳嗽，他担心再不离开可能会被又一场暴风雨困住。他在5月2日回到了欧洲，在蒙特卡洛登陆。这里已经3个月无雨，但在马克思抵达这天，下雨了。但马克思还是很高兴，至少赌场里有一间阅览室，提供的报纸都还不错，有德文的、法文的和英文的。^[28]

不读书时，马克思便把研究赌桌上的客人当作消遣。但消遣很快变成厌恶，因为他发现这些笨人居然付钱给所谓专家去了解轮盘赌的“科学”。他们为了赢钱，弯着腰坐着，手里拿着铅笔，计算着一个所谓的公式，天天想以此赢钱，天天失败。马克思说他们“就像一群疯子”。^[29]他还遇到一名阿尔萨斯医生，后者看到他在名片上的头衔是“doctor”，以为马克思也是医生，便对他和盘托出，说他的胸膜炎又犯了，气管炎应该是慢性的。^[30]

马克思发现待在蒙特卡洛对身体恢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反正他走到哪都没遇到有益于身体恢复的天气），便启程去阿让特伊。他让小燕妮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要来，他希望能安静一些。“所谓‘安静’我是指‘家庭生活’，‘孩子们的喧闹’，整个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³¹⁾但马克思想象的悠闲世界不存在，尤其在阿让特伊最不可能存在。

杜西离开法国回伦敦前，利沙加勒要求跟她在巴黎见面。陪着妹妹去圣拉扎尔火车站见面的小燕妮向马克思汇报说，这两个人彼此间像老朋友一样，没有任何恨意或出现任何事端。小燕妮尤为感到安慰，因为“利沙加勒的友谊和爱情一般不会这样简单干脆地结束”。她说自己对利沙加勒的印象比之前好多了，“因为我不得不对他没有继续坚持要成为妹妹的丈夫而心存感激。时局好的时候，法国男人都都不那么值得嫁——时局差的时候，自然更要躲远一点”。⁽³²⁾在小燕妮对利沙加勒和杜西描述的背后，是她陷入的家务困境。由于龙格很少在家，她从英国找来一个名叫埃米莉的小姑娘帮忙照顾孩子。但埃米莉不肯合作，待得越久，就变得越加喜欢争吵，她还开始在铁路站场周围晃悠，勾引铁路上的男人。小燕妮试图阻止她，她便开始散播龙格一家的谣言，确保他们如果把她开除就再也雇不到其他人。小燕妮告诉杜西说埃米莉让她“不知该如何应付”，被她逼得要发疯。⁽³³⁾

没有帮手的小燕妮只能日夜劳作，独自料理家务并照看4个儿子，而龙格在家的時候不仅什么都不做，还对她大喊大叫、抱怨不断。她搬来法国是为了让丈夫能够追寻一个让他们都感到自豪的事业。最初，克列孟梭的报纸刊登了很多龙格的文章，但到1882年初，数量开始减少。小燕妮说很明显克列孟梭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或者说欣赏龙格的文章。⁽³⁴⁾由于稿费偶尔才有，他们只能依靠借债生活——龙格的母亲把这归咎于小燕妮，说她应该出去工作。小燕妮告诉杜西说龙格好像不着急解决家里的经济困境，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自己尝试给附近的小孩上课，或者从伦敦招些孩子来寄宿，由她授课。⁽³⁵⁾（小燕妮的债主包括琳蕙，她说这使得自己像犯了罪过一样难以释怀。）⁽³⁶⁾

小燕妮某次在海边疗养时，曾写过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给龙格，描述自己的忧虑。

.....

你知道，为了挽救你于痛苦和麻烦，我可以呕尽自己
的心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为此可以忍受耻辱。……已
经给你带来诸多苦难的不规律的生活根本无法确保你在报
社拥有一个稳固的位置！我都不敢做此奢望！这个时候，
我必须再次要求你看清眼前的现实，想想你到底能不能以
做编辑为生。……要是你现在跟我在一起，我根本不敢这
样对你说，你是那么暴躁，尤其是在错的时候。⁽³⁷⁾

.....

小燕妮觉得自己已经被淹没在失望和沮丧当中，她告诉劳拉说希望
能够以“任何方式解脱出来”。她被困在阿让特伊这座四面透风的三层
老房子里，与丈夫越来越疏远，她想念伦敦的生活：地铁、法灵顿街、
泥泞的河岸街、以及街道两侧贴满的各种戏剧和音乐剧的大海报。⁽³⁸⁾“生
活的苦恼让我无法形容，”她写信给杜西说，“如果不是因为可怜的孩子
们，我想我会尽快改变这种情不投意不合的状态。”⁽³⁹⁾

如果说这些压力还不够的话，小燕妮说自己“无可言状的霉运”
又来了：她又怀孕了。她还觉得自己病得厉害。“有段时间来，我身体
里有一种奇怪的疼痛感，好像生了脓疮或肿瘤似的，但还没下定决心找
医生看。”抱孩子或者上下楼梯都会导致疼痛，有时疼得厉害，以至
于她直接坐在地上。“但爸爸并不知道这些，也不能告诉他。否则他
会担心。”⁽⁴⁰⁾的确，马克思在6月来到阿让特伊时对这些情况毫无察觉。
他很早便睡觉，起得很晚，白天大多带着孩子们在附近的树林和葡萄园
里晃悠。⁽⁴¹⁾拉法格形容马克思如同身处极乐世界，屁股后面总跟着一支
童子军。⁽⁴²⁾但马克思很快怀疑事情有些不对劲，孩子们回法国后变得有
些野，因为小燕妮一个人无法约束他们。龙格经常整夜留在巴黎，早上
回来后便直接去睡觉。⁽⁴³⁾最小的马赛尔由于不停哭叫，被叫作“巴
涅尔”（来自那位煽动性极强的爱尔兰议员）。⁽⁴⁴⁾埃德加被叫作
“小狼”，因为他18个月大的时候把一块生的肝脏当作了巧克力
咬着吃。⁽⁴⁵⁾约翰尼是他们中的头目，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但因为无聊而变得极为顽劣。⁽⁴⁶⁾哈里则仍未表现出真正的发育。

7月，杜西和琳蕙来到阿让特伊，她们是为了照顾马克思并帮助小燕妮。杜西的艺术生活进展顺利，这个月她在伦敦学院大学为罗伯特·勃朗宁学会举行的一场朗诵极为成功，以至于协会的一名老妇人要带她去见勃朗宁，让她朗诵给他本人听。杜西还曾受邀参加在怀尔德爵士夫人家举行的晚会。她告诉小燕妮说：“她就是那个无精打采和极为下流、还曾去美国出过一番洋相的奥斯卡·怀尔德的母亲。”⁽⁴⁷⁾小燕妮虽然身边麻烦不断，但仍然对妹妹的多姿多彩感到高兴：“我全身心地祝贺你，真的很开心，我们姐妹中终于有一个不用把一辈子都花在炖蔬菜牛肉汤上了。”⁽⁴⁸⁾自由的杜西在茁壮成长，她没再生病，情绪也稳定了。她像小时候一样快乐，她精神满满地来到阿让特伊帮助姐姐。

现在连马克思都知道小燕妮又怀孕了，她的麻烦让他极为担心。他发现她不断被房东追着讨要房租，而且除了怀孕外，身体状况也很不好。马克思想让杜西带约翰尼回伦敦，缓解一些小燕妮的压力，但龙格坚持要在暑期时把孩子送去诺曼底海边。“龙格根本不关心这样做是否会减轻小燕妮的负担，以及这是否会对约翰尼有好处，”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龙格先生对这个孩子‘什么’也不管，他的‘爱’就表现在他为了每天能见到他几分钟而不愿让他离去，因为龙格在阿让特伊午饭前多半是躺在床上，下午五点又要到巴黎去。”⁽⁴⁹⁾

龙格虽然反对，但马克思做了最终决定，琳蕙和杜西带着约翰尼在8月启程返回伦敦。⁽⁵⁰⁾马克思也随后离开，在劳拉的陪伴下去瑞士进行短暂的疗养。拉法格这年在一家保险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后和劳拉一起搬回了巴黎。他再次涉足政治，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但马克思却不想参与其中，他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⁵¹⁾

拉法格刚回到法国便开始树敌，既有政治立场的原因也有个人傲慢的原因。有些批评者为了蔑低他的才能，散布谣言说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均由劳拉代笔。拉法格对此付之一笑，继续自己的大业。⁽⁵²⁾在他心里，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或者如马克思开玩笑时称他“大神使”），⁽⁵³⁾这足以让他站在社会主义者圈子的高处。问题是，马克思虽然公开支持过公社，但他的思想在法国仍少有人知，“马克思主义”尚只存在于拉法格的词汇里。

拉法格的工作和政治生活无法并存，在马克思和劳拉出发去瑞士的那个月，他失去了工作。⁽⁵⁴⁾正式的原因是公司与其他公司合并了，但他的老板对他显然也并不满意。丢了工作又没钱的拉法格向恩格斯求助——马克思家的传统。他写给“将军”的信几乎总会提到要钱，因为他实在是“穷到家了”。⁽⁵⁵⁾

9月5日，龙格带着“小狼”和哈里从阿让特伊启程去诺曼底，留下小燕妮和“小巴涅尔”独自在家。小燕妮顿觉轻松，只有一个孩子在家，整个房子都安静了许多，龙格离开后，也没了争吵。⁽⁵⁶⁾平静持续了11天。9月16日，小燕妮生下一个女孩。（负责接生的是在公社后保护过龙格的杜朗。）小女孩取名小小燕妮，像马克思一样，黝黑的皮肤，黑色的头发。⁽⁵⁷⁾

马克思和劳拉接到消息时仍在瑞士，他们马上回到巴黎，来到拉法格住的公寓，却发现一片混乱，劳拉写信给恩格斯描述说：“任何言语都无法描述房间里的脏乱。……我们今天上午去阿让特伊。也不知道保尔跑到哪里去了。”⁽⁵⁸⁾被马克思嘲笑地称为“圣徒保罗”的拉法格在与盖得一起进行巡回讲演时，被指煽动谋杀、抢劫和纵火，已被发出逮捕令。⁽⁵⁹⁾马克思和劳拉尚不知道逮捕令之事，也没有等保尔回来。⁽⁶⁰⁾他们来到阿让特伊后发现小燕妮仍是一个人，龙格要到10月才回来。

马克思好像已经受够了两个女婿。他因为家事痛恨龙格，觉得拉法格在政治上毫无羞耻。尤其让马克思冒火的是拉法格居然把他自己那些显然来自前人的话当作值得重复的真理，不停地进行引用。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咒骂他们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⁶¹⁾

在燕妮去世一周年之际，马克思回到怀特岛，试图恢复健康。他把家事和几乎全部通信事务都留给了恩格斯。事实上，恩格斯已经接过了革命事务。但马克思依然无法找到平静，走到哪里见到的都是狂风、暴雨和阴郁。12月中旬，在当地一名医生的要求下，马克思闭门不出，只接收一些关于家人的消息。⁽⁶²⁾当他知道自己在不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下仍有影响，而感到极为高兴。一位俄国知名经济学家在其近作中提到了“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者”。⁽⁶³⁾马克思对劳拉说：“不论在什

么地方我所取得的成就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64]

此时的劳拉却在给恩格斯写信说，自己越来越担心小燕妮的健康。^[65]小燕妮自己描述说是膀胱上的炎症，并不严重，但劳拉觉得她是为了不让一家人担心而刻意轻描淡写。^[66]提到小燕妮的生活，劳拉说：“小燕妮和我每次见面都只做一件事，就是抱怨无情的法国。”^[67]这个月早些时候，劳拉本来指望保尔带个沙拉回家，她已经做了一天饭，想着晚上能吃顿丰盛的晚餐。结果，沙拉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送来的，她这才知道保尔被捕了。她告诉恩格斯说：“这里是糟糕的地方，生存的状态也糟糕，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68]

到11月中旬，小燕妮仍然无法下床。她决定自己给婴儿哺乳，但承认“让我感觉生活如地狱般”。^[69]龙格此时整天待在家里想要帮忙，但据小燕妮说，他只能增添混乱。他在房子里安了火炉取暖，12月底又雇来3名佣人。对此，小燕妮唯一能想到的是花费——这显然是她不该再承受的压力，以她的身体状况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70]

家人为了不让马克思担心，向他隐瞒了真实的情况。恩格斯、杜西、劳拉和拉法格都写信给他说明小燕妮经过休息和治疗，就能康复。但马克思还不至于糊涂到从字里行间看不出问题。1月初，他出现间歇性咳嗽，还有窒息感。他说这是担心小燕妮导致的，^[71]他对恩格斯说：“奇怪的是，现在每当神经受刺激，我的喉咙就立即被卡住。”^[72]

最终，家人承认小燕妮的情况很严重。拉法格和劳拉到阿让特伊后，对小燕妮的状况感到震惊。她已经几乎无法活动或说话，甚至有些呆滞。她在大量失血，但医生找不出原因。^[73]马克思想去法国，但又担心自己前去只会增加小燕妮的负担。^[74]劳拉在阿让特伊陪着小燕妮，马克思只能用拉法格的话来安慰自己：“情况似乎已经好转。”马克思虽然早就说拉法格在医学上靠不住，但还是对恩格斯说拉法格的这次诊断给了自己安慰——也许他实在不敢有其他想法。^[75]马克思在1883年1月10把这封信寄给恩格斯；1月11日，小燕妮去世。

44 伟人陨落



能控制时代的人，什么都可以取为己有，什么都可以拿去冒险，因为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

报告小燕妮死讯的电报发到了伦敦梅特兰公园路，去怀特岛告诉马克思这一可怕消息的任务就落在了杜西的身上。杜西马上从伦敦启程，在寒冷的冬日里，先是坐火车后是坐船，终于来到位于怀特岛南侧海岸的文特诺尔。她一直想着该如何开口，她觉得这个消息对父亲而言无异于一张死刑判决书。但她一句话都不用说，马克思便从她的表情知道了一切，他说“我们的小燕妮死了”。马克思让她马上去法国照顾孩子们。杜西说，自己最好留下来照顾他，但马克思不肯同意。就这样，杜西在文特诺尔停留不到半个小时，便又返回伦敦然后去阿让特伊。^[2]

马克思没有参加女儿的葬礼。他的38岁的女儿在法国下葬时，他和恩格斯以及琳蘅在伦敦为她哀悼。恩格斯肯定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要为另一个燕妮·马克思写讣闻，但他责无旁贷要用文字让人们记住这个在巴黎出生后就一直在运动中成长、跟着他们走过最艰苦的岁月的女儿。恩格斯描述说，小燕妮虽然有时拘谨得近乎羞怯，但同时“在必要的时候，她却表现出某些男人也会羡慕的沉着和刚毅”。他回忆了燕妮使得被关押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得到释放，以及她在吕雄被抓时镇静地把

弗路朗斯写给她的信藏在一本书里。恩格斯写道：“这封信可能现在还在那里。……无产阶级失去了她这样一个英勇的战士。但是，她的悲痛万分的父亲至少还有这样一种安慰，这就是欧美千百万工人分担着他的悲痛。”⁽³⁾

妻子死后，马克思对收到的吊唁表示了感激，但在女儿死后，他已经完全无心理会。妻子离世带给他的悲伤尚未缓解，女儿的早逝更让他无法承受。世界各地的朋友写信来安慰，但恩格斯回复他们说，马克思病得太厉害，无法提笔回信，甚至声音沙哑得无法言语。伦敦是最不适合他过冬的地方，但他的糟糕状况，只能留在这里。恩格斯和琳蕙一直在身边照顾他，但谁都无法让他恢复生气。⁽⁴⁾

恩格斯告诉劳拉说，马克思由于一直无法入睡，思维不济，只能看些目录和小说，琳蕙虽然做了新菜肴，马克思却依然没有胃口。马克思现在更愿意喝一口牛奶，有时加些朗姆酒或白兰地。⁽⁵⁾恩格斯告诉美国的一位朋友说，马克思在小燕妮死后，肺部出现了脓肿，使得他长期以来本就困难的呼吸更加艰难。⁽⁶⁾

3月14日，天寒地冻，恩格斯在午后来到马克思家——他10多年来几乎每日都如此。自从小燕妮死后，他一走到拐角的地方就提心吊胆，生怕看到马克思家的窗帘是合着的。^①窗帘是拉开着的。⁽⁷⁾但琳蕙开门让他进屋时，她的脸上满是泪水，她告诉恩格斯说，马克思非常虚弱。她说：“请跟我来，他快睡着了。”恩格斯跟着她走进马克思的卧室，发现他睡在火炉边的椅子上，多年来这对他都是无法形容的奢望。但这次马克思的沉睡却是长眠。⁽⁸⁾

恩格斯写信给新泽西一位国际工人协会老会员说：“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⁹⁾

^① 在19世纪的英国，家里有人死后，尸体在下葬前安放在家里期间，窗帘一般合着，以示哀悼。葬礼后，窗帘才会拉开。

卡尔·马克思享年 64 岁。

1883 年 3 月 17 日，马克思被葬在燕妮身边，^[10] 共计 11 人来到海格特公墓参加了葬礼。马克思死后，家人在他胸兜里发现三张照片：马克思的父亲、燕妮和小燕妮。^[11] 恩格斯把照片放入了马克思的棺木。恩格斯在两年里第三次悲伤地为马克思家的人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念道：“就在 15 个月以前，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曾聚集在这座墓穴周围，当时，这里将成为一位德高望重、心地高尚的女性最后安息的地方。今天，我们又掘开这座墓穴，把她丈夫的遗体放在里面。”^[12] 马克思的棺木上放着两个红色的花圈，恩格斯向聚集而来的人们简单回顾了自己这位挚友的伟大一生和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13]

“他的确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革命家，”恩格斯说到。“为工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生命要素。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比他更积极的战士。”他取得的成就已经极为突出：“他从 1864 年到 1872 年是协会公认的领袖。就外在形式而言，这个协会已不复存在；但是欧美所有文明国家工人的兄弟般的同盟关系永远地确立了。”^[14]

除了组织方面的成就，恩格斯还描述了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贡献：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了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律理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5]

恩格斯把马克思描述为“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但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山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从未有一个私敌。”^[16]

在悼词结束之际，心有悲伤、信仰坚定的恩格斯预示性地宣布：“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17]路透社最先报道了马克思的死讯，但最初的报道（像报上无数其他关于马克思的报道一样）极不准确地说，马克思死在阿让特伊。^[18]直到《泰晤士报》的一名通讯记者在巴黎一家社会主义报上看到报道，才确定马克思在伦敦去世，路透社才重新刊登消息。^[19]12年前，伴随公社结束后的报道浪潮，马克思曾登上头版，但在1883年，他的离世仅仅出现在注脚里。

接下来，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两个女儿要确保马克思的思想不会跟着他一同泯灭。

共同的革命事业

- 45 杜西的幸与不幸 / 468
- 46 艾威林的传言 / 480
- 47 同床异梦 / 491
- 48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 502
- 49 第二代革命者 / 510
- 50 恩格斯的遗嘱 / 518
- 51 “将军”逝世 / 526
- 52 杜西走上绝路 / 532
- 53 拉法格夫妇自杀 / 540

45 杜西的幸与不幸

★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伊壁鸠鲁^{〔1〕}

3月25日，恩格斯告诉劳拉说，琳蕙在马克思的文件中找到500页手稿，是《资本论》第二卷。“由于我们还不知道手稿已为出版准备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我们能否找到别的东西，所以目前最好还是不要在报纸上透露这个好消息。”^{〔2〕}两周后，第三卷手稿也找到了。没人能确定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写到了什么程度，因为他总说就快完成，却经常一推再推，甚至最终变成空想。“他总是瞒着他的工作情况，”恩格斯回忆说，“因为他明白，我们要是知道他写好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休，直到他同意发表为止。”^{〔3〕}

恩格斯检查之后发现，这些材料中的思想已经做过修改，但尚未润色。比如，第二卷手稿里满是大白话、低俗的笑话和混杂在一起的多种语言。“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原样写下来的。……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4〕}困难虽多，但手稿必须出版，马克思的逝世已经使得运动顶部出现一条裂缝，只有把他未完的作品和恩格斯的作品出版，才能为不断出现的社会主义政党提供指针和方向。已经有年轻的追随者误读马克思的理论，更改运动的历史。

有文章批评说，“善良的”马克思被“邪恶的”恩格斯引上了歪路，随后又有文章把两个人的角色对调了一下。^[5]一位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要求把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绰号“摩尔”的部分去掉，他觉得这个绰号会伤害党（好像如果运动的领袖变成了活生生的人，有了个宠物般的名字，就会失去作为社会主义者传奇的地位），这使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家人大笑不已。恩格斯回复说，“摩尔”是马克思大学时代就有的绰号，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样叫他。“假使我对他用另一种称呼，他就会以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需要和解的事情。”^[6]至于自己，恩格斯礼貌但又坚决地更正一位坚持称呼他为恩格斯博士的人说：“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不是‘博士’，而是不干了的棉纺厂主。”^[7]

马克思的葬礼后，恩格斯在家里招待朋友时，一名伦敦警察在附近巡视。恩格斯告诉劳拉说：“这些蠢人显然以为我们在制造炸药，可实际上我们在谈论威士忌。”^[8]

恩格斯和杜西是马克思的遗著的共同执行人。在琳蘅的帮助下，他们撸起袖子，把马克思的一箱箱笔记、手稿、书信、报纸、以及他在边上写满想法的书籍整理出来。^[9]马克思基本没留下什么钱：所有遗产加起来也就值 250 英镑。^[10]他一生的著述都堆积在书房里，需要时间和精力整理。杜西尤其需要注意不能让恩格斯拿到原来的书信，以防里面含有批评恩格斯或白恩士姐妹的话语。她写信给劳拉说：“我已经尽到最大努力防止我们的好将军看到任何会让他伤心的东西。实际上，我应该把所有私人信件单独存放。它们只对我们有意义。”^[11]马克思虽然走了，但她们还要继续保护他。

杜西还有另一个生活需要她的专注。她与爱德华·艾威林何时首次见面已经无从得知。1883 年 3 月时的艾威林，是一名 33 岁对艺术感兴趣的动物学博士。他们最初的见面可能发生在很多地方：他和杜西都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队伍中的一员；他在 1880 年曾站在讲台上声援被关押的爱尔兰土地联盟成员，杜西也曾在大街上进行过声援；他曾参选学校理事会，当时杜西在为一名女性候选人造势。龙格在国王学院教课时，他也在这里授课，他还是伦敦偏门报纸世界的一员。^[12]从政治到莎士比亚再到现世主义，每个杜西感兴趣的领域，艾威林都有参与。最重要的是，萧伯纳说，艾威林崇拜雪莱、达尔文和马克思。^[13]

艾威林声称第一次见到杜西是在 10 年前，当时她和她的父母一起去听他的讲座。⁽¹⁴⁾但爱德华·艾威林所说的任何历史版本都难以让人相信，因为关于他只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撒谎成性。他还惯于吸引女人，这在他们的圈子里被认为是男人魅力的来源。萧伯纳说，艾威林有“蜥蜴的眼睛和脸”。⁽¹⁵⁾还有人说，他长得“生人勿近——丑陋，甚至面目可憎”。同时代人评价说：“没人能长得像艾威林那样难看。”⁽¹⁶⁾但同时，据说即便与伦敦最英俊的男人竞争，只要让他提前半小时行动，他就能吸引到任何女人。⁽¹⁷⁾

未来的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是杜西最为亲近的朋友之一，他谈到艾威林时说：“他具有阳刚的男子气概、思维能力出色、率性，这些能够掩盖他不讨人喜欢的方面。”⁽¹⁸⁾艾威林曾是著名现世主义者安妮·贝费特的情人，并在 1883 年看上了杜西。杜西也被他吸引了，她向朋友袒露说艾威林“让我焕发出女性的光芒。我无法抵挡地被吸引了”。⁽¹⁹⁾这个自称既是爱尔兰人又是法国人（两者都是杜西这样的女人要拯救的对象）的男人好像毫不费力地迅速挤进了马克思家的核心圈子。⁽²⁰⁾

马克思留下的纸张整理之后发现，第二卷的手稿不是只有一稿，而是有好几稿，多达数千页，进展程度各不相同。对此，恩格斯不但没有气馁，反而说“喜欢这种劳动”，因为他又和自己的老朋友一起工作了。他告诉日内瓦的约翰·贝克尔（仅剩的另外一名 1848 年成员）说：“最近我清理了 1842—1862 年的书信。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的许多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想起这些往日的经历，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幽默是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²¹⁾

恩格斯虽然喜欢这个工作，但还是需要帮手。他不仅要负责出版马克思的理论著作，还要处理大批来信。信件从各地涌来，有的要求翻译出版过的文章，有的要求对过去的著作做说明，有的需要对运动给予指导意见。甚至有英国出版商表示有兴趣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虽是成功，却也是负担。恩格斯夜以继日地辨别马克思潦草的字迹，这对他的眼睛造成了伤害。恩格斯找来杜西帮忙，但她的时间要分割给他们一起的工作、她的教课工作、以及她和艾威林一起编辑的两份小报。⁽²²⁾而且，她的时间越来越多地分给了艾威林。

这年春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比阿特丽斯·韦伯在大英博物馆见到杜西后，在日记中描述了对她的印象：“很标致，穿着随意而独特，卷曲的黑色长发披散着。漂亮的眼睛有神而多情。”韦伯并不喜欢杜西，说没办法跟她讨论事情，尤其是宗教：杜西对耶稣的个人憎恶感太强，因为他在被钉上十字架前祈祷圣杯能够传下去，这在她看来，缺乏英雄气概。韦伯让杜西解释一下社会主义，但杜西拒绝了，据韦伯说：“我可能会再要求她就整个力学理论给出一个简单的公式。”⁽²³⁾在很多人看来，杜西这样少见的傲慢正说明艾威林对她的影响在增加。

恩格斯发现杜西指望不上之后，转向求助劳拉，因为他觉得劳拉有充足的时间和理由暂时来伦敦：保尔因为去年秋天（那时马克思和劳拉还在瑞士）发表的一次讲演最终入狱。⁽²⁴⁾

拉法格的入狱之旅充满宏大的姿态。他在巴黎南部蒙吕松发表煽动性讲演后，该地法庭要求他和盖得出庭，但他们未予理会。逮捕令发出后，拉法格说除非火车票能报销、而且有一处宽敞的大厅发表演说，自己才会出庭。他接下来又发表了一封致法官的信，在其中把自己的社会讽刺文学与乔纳森·斯威夫特相比。⁽²⁵⁾他受到了彻底的嘲笑（当时还活着的马克思对他都没有客气），他在12月被捕，之后在候审期间被暂时释放。⁽²⁶⁾拉法格3月在伦敦参加马克思的葬礼时，法庭做出判决，给他定了罪。⁽²⁷⁾他回到法国后上诉失败，5月时，他被关入位于巴黎东部拉丁区的著名的圣佩拉热监狱服刑6个月。⁽²⁸⁾

圣佩拉热监狱几乎是每个骄傲的法国革命者的必到之地。拉法格和盖得被关入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区域（被劳拉称为“王子楼”），可以带家具进去。拉法格带进一张桌子和一把扶手椅，要求允许妻子每天中午来陪自己一起吃饭——有时劳拉自己做，有时直接从附近的小餐吧买。⁽²⁹⁾劳拉告诉恩格斯说犯人们的食欲都“好得让人苦恼。……我每天上午10点半都得带上一篮子做好的食物和用来做午饭的食材”。她还偷偷带进去一瓶白兰地，“友爱的伙伴们”纷纷贡献出红酒、雪茄、烟袋和烟草。⁽³⁰⁾

恩格斯觉得，这说明拉法格有人照料，劳拉来伦敦能发挥更大作用。但劳拉以玩笑的口吻说，担心自己离开后，这“两位大人物”会缩小。⁽³¹⁾但劳拉对这两个囚犯的担心，可能只是为了掩盖她不愿去

伦敦的真正原因。她对于恩格斯让杜西和他共同作为马克思遗著的执行人感到不满，更让她恼怒的是恩格斯提到杜西在与一名英国出版商洽谈出版英文版《资本论》（翻译由恩格斯的律师朋友塞缪尔·穆尔承担）事宜。^[32]劳拉怀疑杜西试图独吞父亲的著述遗产，而恩格斯显然默许了。

对劳拉而言，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公正的问题。她把一生献给了父亲的工作，甚至为此牺牲了孩子。现在他死了，自己便被一脚踢开，不得触碰父亲的思想遗产，这不公平。她写了一封信给恩格斯，愤怒地说，父亲在瑞士时曾提到，希望由自己撰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负责《资本论》英文版的翻译。她和父亲本来打算新年后就去怀特岛开始工作，但由于之后发生的事情未能成行。“小燕妮死后，我说想去看看爸爸，却被告知会惊吓到他。杜西让我去伦敦的信在爸爸死后第二天才寄到。”说到马克思有两个女儿还活着，却只有一个被确定为他的遗著的执行人，劳拉的措辞更加激烈：“爸爸都绝不会把他最大的也是最喜爱的女儿确定为唯一的执行人，不让另外两个女儿插手，他会给予她们公平的爱……更不会只撇开一个女儿。”^[33]

恩格斯的回复对劳拉没有半点安抚，他说，是杜西告诉自己，马克思对他的著述做了这样的安排，而且讨论的时候拉法格也在屋里。他还引用英国法律说明杜西被选为法定代表人的原因。恩格斯说，自己不想她们姐妹再起纠纷，建议劳拉直接和杜西谈一谈。恩格斯自己则请教一下琳蕻。^[34]就这样，恩格斯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和理论重担，还继承了他的家庭内部纷争。面对诸多压力，40多年来很少被疾病战胜的恩格斯由于一种慢性疾病不得不卧床一个月。

马克思一生总在历史事件面前延误机会：《共产党宣言》出版时间太晚，未能赶上1848年起义；为公社而写的《法兰西内战》在公社结束后才面世；最典型的是他在1851年时预计《资本论》将在5个星期内完成，给首届世界博览会宣传的资本主义必胜观以迎头痛击，结果他拖延了16年。但从另一个角度上，他又已经足够早。《资本论》法文版的出版和巴克斯在1881年对他的著作的评价开启了一个热潮；到1884年底，英国已经有3个社会主义组织，其中2个以马克思思想为根基。杜西处在新运动的中心。她和很多年轻参与者在《现代思想领袖》

杂志（刊登巴克斯那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的杂志）位于圣保罗大教堂旁边佩特诺斯特街的拥挤的编辑部聚会。1884年1月，杂志变为社会主义期刊《今日》。杜西同时为《今日》和艾威林编辑的也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步》杂志撰稿和邀稿。^[35]海德门的社会主义报《正义报》也在这个月开始出版。^[36]

这些报刊面世之时，正值英国民众不满情绪加重，伦敦出现一波极端的爆炸袭击——首次袭击的目标是国会大楼，发生在马克思离世3天后（但两者并无关系）。1883年随后出现的两起爆炸袭击均以地铁为目标。1884年也以爆炸开年：1月，尤斯顿站附近的隧道里发现爆炸装置；2月，维多利亚站发生爆炸。爆炸袭击的怀疑对象是爱尔兰激进分子，但也说明了首都乃至整个国家因为经济困境出现的紧张局面。^[37]国会虽已将选举权扩展到500万男性（换言之，三分之二），但这对下层阶级无济于事，因为不管多少人获得投票的权利，他们的生活没有实质改善，因此开始把目光投向政府以外，比如很多人投向了工会——被政府内外的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视为工人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38]

有意思的是，在马克思持续地批判资本主义长达30年后，他的思想仍然难以为人所理解，甚至杜西周围的人都不能理解。比如，50岁的建筑师、艺术家、诗人、小说家和社会改革家威廉·莫里斯尝试攻克法文版《资本论》，结果被其中的经济理论搞得晕头转向。^[39]不过，他说自己也许的确没能理解剩余价值，但一眼就知道这是一个腐烂的制度。“在我看来，抢劫是通过剩余价值这个说法实现的，还是通过农奴制度或公开的抢夺实现的，并无多少区别。整个制度都是畸形的，让人无法忍受。……不需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我也知道闲人阶级富裕，工人阶级穷困，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抢劫了穷人。我知道这个，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40]莫里斯加入了海德门的组织，并很快开始与杜西一起工作。因为《资本论》而走向社会主义的萧伯纳也是如此。“卡尔·马克思，”他说，“让我成为了真正的男人。”^[41]（萧伯纳在《今日》的工作就是把自己无人愿意出版的小说刊登在报纸上。）^[42]恩格斯注意到了杜西的朋友以及这些新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组成十分复杂”，但又说“总算是一个开始”。^[43]

在梅特兰公园路，整理马克思的著述的工作仍未完成，但仅剩的两

名住户准备搬走了。1883年9月，杜西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租下一处公寓，琳蕙则搬去了恩格斯家。恩格斯对此非常高兴，自从莉齐死后，彭普斯便一直做家里半正式的女主人，但她现在也嫁人了，生了两个孩子，也搬走了。除佣人外，家里便没了女性，在恩格斯看来，没有人比琳蕙更加合适，因为她对马克思无比熟悉，更加能让他回忆起马克思的生活。

因为终于获得了长久以来期待的独立，杜西极为兴奋。她决定不在经济上依赖恩格斯，而是自己教课、写作、做研究、以及找所有能带来收入的事情做。1883年秋天，《资本论》出版16年后，终于给马克思家带来了版税收入。恩格斯处理了这件事情，把迈斯纳支付的16英镑分给了杜西、劳拉和龙格家的孩子们。^[44]金额虽然不大，但领受者极为高兴：一者为其象征意义，二者他们也实际需要。用拉法格的话说，马克思的孩子们都很“拮据”，他自己和劳拉更是如此。他除了为社会主义报纸撰稿和作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代表进行鼓动活动外，再无其他事可做，而这两者又都无法给他带来收入。

不过，他的左派呼吁和抗议终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法国工人的不满情绪比英国严重数倍，甚至农民也在遭殃。随着贸易和交通的发展，大量粮食和肉类从俄国和美国运到法国，使得法国本地农产品价格下降多达四分之一。^[45]自由贸易同时重创了制造业：德国制造的玩具以及德国和比利时制造的家具纷纷涌入法国。甚至普鲁士的传统行业假花都开始从德国和英国进口。^[46]

此外，法国正在遭受普遍的工业萧条，很多工人失去了工作。1883年3月，也就是马克思去世的那个月，大量失业工人涌上巴黎街头，随后组织了一系列罢工。他们沮丧的原因不仅仅是低工资和长工时，还有矿山和工厂工人不得不忍受的非人生存条件。工人住的木棚极为简陋，没有水也没有供热和卫生设施。很多家庭连续数代都负担不起更好的地方，只能挤在这样的木棚里。吃饱是奢望，医疗更是闻所未闻。商人担心社会主义宣传渗入这些营地，他们觉得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应该有助于减轻社会主义对工人的吸引力（在他们看来，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他们还是要求工会组织只能解决经济问题，比如工时和工资，不能涉及社会问题，比如居住条件。^[47]

拉法格和盖得从5月到10月住在圣佩拉热监狱期间，法国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日益紧张。拉法格把监禁生活描述为轻松。他喝酒喝到醉，吃龙虾的时候把壳剥掉，因为这是更“无产阶级式”的吃法，和伙伴们一起玩兔子与猎犬的游戏。但他也很无聊，告诉恩格斯说：“这墙壁居然永远都不会塌掉。”⁽⁴⁸⁾劳拉说，保尔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但她怀疑他是因为吃了太多油腻的鸭肉和禽肉。⁽⁴⁹⁾

劳拉这期间的生活却没那么有趣。他们之前已经搬到皇家港口大街蒙巴纳斯附近的一处公寓。他们的公寓与邻居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隔板，没有任何隐私或舒适，也难得有安静。他们也没有钱，劳拉开始买彩票，期待着中个大奖，日常花费则经常向恩格斯要。⁽⁵⁰⁾她接受恩格斯的钱是因为她和保尔都在为党工作，而且她也没有其他选择。

劳拉极为孤独，与唯一的妹妹关系疏远，又不能做会让她此时的生活具有意义的事情——翻译和整理父亲的著作。她无法像母亲那样，通过参与丈夫的工作寻找慰藉：劳拉很少参与拉法格夸张的政治活动，他被释放后，继续在法国各地跑，追逐他的听众。当然，最艰难的还是失去孩子带给她的痛苦。这年秋天，独自度过生日的劳拉写信给恩格斯说：“几天前，我已经38岁！这不可耻吗？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活这么久，没人让我觉得活这么久是值得的。我很羞愧地说，我的无用的泪水弄脏了这封信，但这都是你们的错！”⁽⁵¹⁾她16年前嫁给拉法格时，在恐惧的同时，肯定对即将踏上的充满希望的旅程无比期待。现在，她被困在满是巴黎下层人的房子里，一定难以相信事情怎么会到如此地步。

1884年3月，一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的活动在海格特公墓举行。同时，这也将是巴黎公社的13周年纪念。一年前，只有十几个人来到马克思的墓旁送别他。但在1884年春，多达6000人整齐地系着一抹红色，聚集在索霍区托特纳姆法院路，列队前往他的安息地。其中有来自德国和法国的代表，但绝大多数群众都是英国人。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转变，马克思一生中中共事过的英国人没有几个。队伍有序地行进数英里，穿过伦敦的大街和居民区，最终来到广阔的公墓后，却发现无法进入。杜西告诉劳拉说，500名警察驻扎在公墓里，守着大门。杜西上前询问一名警官，自己和几名女人能不能进去给父亲敬献花圈，但遭到

拒绝。队伍秩序井然，撤退到附近一处公园，向马克思表达哀思——他们未再受到阻止，却处在严密监视之下。⁽⁵²⁾

在马克思对英国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得到彰显之际，艾威林也正式登场，他像马克思的继承人一样向队伍致辞。一年前还在政治上籍籍无名的他，凭借手段站在了马克思圈子的前沿和中心。恩格斯甚至允许他协助塞缪尔·穆尔进行《资本论》的英文翻译，虽然他毫无经济学背景，翻译的样品也被恩格斯斥为“毫无用途”。⁽⁵³⁾但出于对杜西的考虑，恩格斯还是同意了——之后，他将不得不对艾威林做出更多让步，由此造成的个人和政治代价都极为巨大。后来有人提出：正是恩格斯如此绝对地包容艾威林，原本条件成熟已经开始在英国爆发的马克思思想受到了抑制。

海格特公墓的纪念活动几周后，梅特兰公园路的房子终于清空了：琳蘅和恩格斯把其中一些书籍、家具和手稿分给了各地的革命同事。恩格斯留下了最珍贵的手稿，他将根据这些手稿完成马克思未完的著作，他还拿回了马克思的一些家具，把马克思离世时躺的那把椅子放在了自己的书房。⁽⁵⁴⁾恩格斯家现在成为了马克思一家人的正式居所，他本人成了一家人真正的家长。⁽⁵⁵⁾因此，杜西在决定嫁给艾威林时，向他祈求祝福。可以想象，如果杜西向马克思提出同样的请求，马克思永远不会同意。但恩格斯不同，他一生中的两个女人都只是他名义上的妻子，因此他并不反对。

本着诚实的精神，杜西写了很多信，解释搬去和艾威林同住的原因，并寻求收信人的支持。“你应该早已知道我非常喜欢爱德华·艾威林，他说他也喜欢我，”她写信给劳拉说。“所以我们打算‘一起过’。你知道他的状况，应该说，我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我想，这是最好的。我会盼望着你的回信……请不要误会我。他人很好，你不能把我们两个任何一个想坏了。……如果你知道他的状况，我相信你不会的。”⁽⁵⁶⁾

杜西也通知了自己教课的学校的女校长，因为担心自己的情况会危及到工作（的确危及到了）。⁽⁵⁷⁾杜西非常谨慎，在接受任何邀请之前，她都要首先说明自己与一同赴约的这个男人之间的准确关系。回复其中一个邀请时，她说：

.....

我应该把目前的状况向您讲清楚。我跟爱德华·艾威林在一起，从今以后，我们会像夫妻一样在一起。……我遇到艾威林博士时，他已经独住多年。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姐姐和我的父亲的最老的朋友都完全支持我们这样做。应该说，我不是轻易做出这个决定的，我也不是没有看到这样要面对的困难。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感觉已经很坚定，到了现在，我不会再退缩……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对的。

.....

她在信尾署名“爱琳娜·艾威林”。⁽⁵⁸⁾

恩格斯和琳蕻对杜西的困境感到好笑。恩格斯告诉劳拉说，数月以来，杜西和艾威林一直装作不是情侣，“这两个可怜的傻瓜真好笑，一直以为我们没看出来”。⁽⁵⁹⁾实际上，他们最终把关系公开后，恩格斯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的秘密即便无可厚非，也可能招致敌人的口舌。恩格斯并不完全确定杜西能够免遭批评，为了保护她，他写信让卡尔·考茨基随时注意报上会不会出现关于他们的结合的报道。“很可能会有某个反动的家伙把这件事捅到报刊上去，到那时还有足够的时间。……我的伦敦，几乎就是一个小巴黎。”⁽⁶⁰⁾考茨基在1883年11月恩格斯的生日宴会上见过艾威林，觉得他令人生厌。⁽⁶¹⁾好像只有恩格斯和琳蕻支持他们的结合，也许是他们太高兴看到杜西沐浴在爱河中，所以选择了无视艾威林的缺点。

7月，恩格斯给了杜西和艾威林50英镑，让他们去德比郡度蜜月。⁽⁶²⁾（对他们的行程而言，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但被艾威林毫不费力地花光了。）杜西此时最亲密的女友叫奥利芙·施赖纳，是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和志向远大的作家，笔名拉尔夫·艾恩。奥利芙像杜西一样穿着随意（黑色的头发随意地披散在脖子和额头上），体形娇小强健，有一双可爱的黑色眼睛。杜西和她几乎每天都见面，因为杜西和艾威林这年夏天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大罗素街上租了一处公寓，奥利芙就住在这附近。杜西的亲姐姐不在身边，她便把奥利芙当作了家人，因此她和艾威林去德比郡时，建议奥利芙也去附近租一处房子。

奥利芙的最亲近的男性朋友是亨利·哈夫洛克·霭理士，后者与她在外形上完全相反。霭理士身材高挑，金发，额头很宽，头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一副典型的英国年轻绅士的模样。但他却又极为古怪，他的胡须一边修剪得很整齐，另一边却又长又散乱。他的专长领域是心理学。奥利芙知道杜西已经把称呼改为艾威林夫人后，很快写信给他说：“我很高兴见到她。我爱她。但她看起来很糟，亨利，爱情真是伟大而又神圣的东西。”⁽⁶³⁾到德比郡后，奥利芙开始明白杜西为什么显得那么忧伤。她写信给霭理士说：“我开始对艾威林博士感到恐惧。……一靠近他，我就感到害怕、恐惧。……他是那么自私，但这又构不成对他感到恐惧的理由。”⁽⁶⁴⁾霭理士打算亲自去看看。他在奥利芙之前就已经认识杜西。回忆起他们在伊斯灵顿会堂的首次见面时，他写道：“我仍记得她光芒四射、满脸笑容的样子，她就坐在我的秘书桌边上，但说了些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了。”⁽⁶⁵⁾

霭理士抵达德比郡后发现杜西“精力充沛、光芒四射”，“在身体、精神和情感上都显得成熟”。与奥利芙不同的是，他觉得艾威林很容易亲近。⁽⁶⁶⁾但他在离开后才知道被他描述为在旅店里生活自由自在、痛饮不停的艾威林没有结账便离开了，而且在附近的旅馆还做了同样的事。⁽⁶⁷⁾之后，霭理士便开始关注从海德门的民主联盟成员嘴里传出的关于艾威林的传言——民主联盟已在这年夏天更名为社会民主联盟，杜西和艾威林均是联盟成员。霭理士告诉奥利芙说，一名已经与艾威林疏远的联盟成员指责他有借钱不还的恶习，联盟委员会在考虑开除他。⁽⁶⁸⁾杜西知道这些传言，但没有放在心上。她熟悉这种骂战：父亲曾一生面对批评者的谎言。但传言没有停歇，社会主义者很快声明无法与艾威林共事。杜西欢迎这个机会：她要为这个她相信长期受到冤枉的男人辩争。数年后，当杜西痛苦的一生中最悲剧的一幕发生后，李卜克内西说：“名声越坏，反而好处越多，可以说，正是艾威林博士的坏名声为他赢得了爱琳娜更多的同情。”⁽⁶⁹⁾

到12月，社会民主联盟内部争吵极为激烈以至发生分裂，但焦点并非艾威林（虽然海德门归咎于他和杜西）而是策略。在很多成员眼里，社会民主联盟过于专制，过于国家主义，过于倾向于与其他政党联合。此外，海德门为革命确定了一个时间：1889年。这显然违背马克思的

看法：大变革不能强迫发生，只能逐渐演化。^[70]有些联盟成员加入费边社中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团体，其渐进主义座右铭引自打败汉尼拔的那位罗马将军：“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机会，像费比乌斯那样，非常耐心地等待。”^[71]包括杜西、艾威林、贝尔福特·巴克斯和威廉·莫里斯在内的其他人离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同盟。同盟的章程规定其目标：不是进行政治活动，而是教育和宣传社会主义。“在目前的英国，需要做的是教育和组织。”^[72]

恩格斯告诉劳拉说，巴克斯、艾威林和莫里斯恐怕是全英国最不善于经营政治组织的人，但还是认可了他们的热情。实际上，恩格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管理那些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不断上演的社会主义派别间的相互争斗。^[73]在这方面，他比他的老朋友更加实际。马克思愿意把理论工作放在一边，去维持纪律。但恩格斯相信：指导运动的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多地、更快地出版他们的著作。这个讲究行动的人现在完全相信文字的力量。

46 艾威林的传言



我们生活的这出戏有喜、有悲、有滑稽，周而复始。

——爱琳娜·马克思⁽¹⁾

1885年1月，也就是在马克思向出版商承诺18年后，《资本论》第二卷终于付印。恩格斯花了一年半时间，才把马克思留下的手稿中包括全书的两种稿本和个别部分的六种稿本整理分类清楚。⁽²⁾虽然恩格斯为此非常劳累，但他马上进入了第三卷的整理工作，因为只有他能辨认马克思的字迹并理解文字的含义，如果他不赶快完成，就再也没有人能做这件事情。恩格斯说，自己至少要在整理出一份完整清晰的手稿之后，才能“死掉”。⁽³⁾马克思留下的稿件中还包括第三卷的两种完整稿本和一本带方程式的笔记⁽⁴⁾（恩格斯说，其中有的部分极为混乱，会让“比我强的人都望而生畏”）⁽⁵⁾，还有大概1000张涉及第四卷的手稿，但还很粗糙。第四卷距离完成还无比遥远，恩格斯说，要在把其他各卷全部完成之后，再考虑这一册，而且这一册的工作量将很大。⁽⁶⁾

恩格斯此时已经64岁，但思维仍像20岁的年轻人一样敏锐。除了准备《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监督第二卷的出版和开始整理第三卷之外，他还在修订自己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法文、意大利文、丹麦文和英文译本：《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共产党宣言》（法文本）；《雇佣劳动与资本》（意大利文本）；《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本）。^[7]恩格斯告诉一名伙伴说，自己变成了“修改作业的教师”。^[8]

整理马克思未发表的著作带给了恩格斯极大的快乐。1885年3月，他写信给劳拉说：“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第三卷伟大。……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写这封信时是3月8日，很快又是马克思的逝世周年纪念，恩格斯写道：“到星期六就是两年了！然而，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他好像还活着跟我在—起似的。”^[9]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的日期定为1885年5月5日——马克思如果活着，将是他的67岁生日。如马克思所愿，第二卷献给了燕妮。恩格斯提到，编辑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缺乏商业算数方面的经验。马克思能够学习微分学，但不善于解读资产负债表，而这些商业交易正是第三卷的中心，这一卷描述的就是资本在商业和社会中的流通过程。^[10]在500页的篇幅中，马克思试图描绘这样一个不断扩大的制度：不断在各地建立市场，以便把产品兜售给不需要它们的顾客。

建筑业便是这样一个市场，建造者不再根据订单建造（建造过程中，买家付款，建造所需资金得到保障），反而完全依靠投机。投机涉及的不是一处或几处房子，而是数百处房子。建造者的资金远远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建造，便举债建造，想着把这些没有确定买家的房子卖出后，便可还债。这样，原本作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的房子也像其他资本投资一样变得不牢靠了。建筑业也像金融市场一样，会遭受萧条。马克思指出：万一建造者无法偿还债务，整个企业都将崩塌。“最好的情况，是房屋停建，等情况好转后再建；最坏的情况，就是半价拍卖了事。”就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把又一个行业带入了繁荣与萧条的循环。^[11]

在马克思看来，市场过剩影响的不仅是没有生命的事物。他以农业为例，大规模资本家农场主为了追求更快更大的利润，甚至会无视自然规律，引入新的牲畜喂养方法，让牲畜长得更快，更早屠宰。但这样人为加快的进程会对农业平衡造成影响，使得农民抛弃传统的粮食种植，转向收益更高的养牛、羊和猪。这又会导致有些区域供应过量，有些区

域供应不足；同时使得主食作物价格升高，比如玉米和小麦，因为这两种作物要么减少了种植，要么被卖作喂养牲畜。^[12]

继第一卷仔细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和投资对工业领域的影响之后，马克思在第二卷中又研究了它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在第二卷中，他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厂制度的社会、政治和商业破坏性扩展到了家家户户和这个国家本身。

马克思的俄国朋友自 1867 年来一直期待着第二卷的出版。恩格斯也很急迫，以至于在德文版尚未出版时，便将德文印张校样寄给了尼古拉·丹尼尔逊。恩格斯相信这第二卷必须尽快在俄国出版。^[13]1883 年，流亡瑞士的俄国人组建了劳动解放社，目标是在俄国传播马克思的著作，运动已经在起步阶段。^[14]

2 月的一个晚上，艾威林、杜西和威廉·莫里斯在牛津大学向一群本科生传播社会主义同盟的思想。会议虽被臭气弹打断，但三个人还是极为兴奋。对杜西而言，身处英国的精英中间是少有的体验。^[15]她越来越多地关注伦敦东区，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她父母刚到伦敦时的索霍区和圣贾尔斯教区还要糟糕。艾威林在西区教授社会主义夜课；社会主义同盟由于面临收费的问题，他便把授课的内容改为自然科学，向北搬去托特纳姆法院路，毫不费力地把收到的费用装入口袋。^[16]

艾威林也许是个社会主义者（与他共事过的同伴肯定有所怀疑，对他在杜西的影响下突然如此彻底地转变信仰感到难以置信）^[17]，但他更像是把运动当作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投机者。社会主义者已经吸引了伦敦的左派知识分子，艾威林能很容易地接触到某个能让他作为剧作家进入戏剧领域的人。^[18]艾威林有时对社会主义很上心，但同时代人说，他这个时候也只是机械地做事。不到两年，他便把目光转回了他的最爱——戏剧，并想方设法吸引他在授课厅周围街上看到的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的注意。

4 月，艾威林患上了被医生描述为很像肾结石的疾病，他独自去怀特岛疗养，因为他和杜西无法负担两个人的花费。^[19]杜西极为熟悉这样的情况：她的父亲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一直在试图恢复健康，杜西把艾威林的疾病也归结于疲劳。她告诉劳拉说：“除了生存必须要做的工作（总要活着），还有‘社会主义同盟’带来的无尽烦恼。从小时起，

我们就知道把自己献给‘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不用解释你也明白的。”^[20]之后，艾威林还会有很多次独自的旅行，有些与健康无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杜西这一次对艾威林起了疑心，但她确实很烦躁，她在6月写信给萧伯纳，邀他来做客。她说：“如果您愿意到我这里来一下，挽救我，让我不至于整天和整晚都陷在与自己（我现在最为讨厌的人）的密谈话中，我将非常感谢。”杜西和身边的人刚刚注意到亨利克·易卜生的戏剧，他们都为他痴迷，杜西尤其喜欢挪威人对开放性结尾的信心。她在给萧伯纳的信中说，人们抱怨易卜生的戏剧没有结尾是因为他们太蠢：“好像生活中的事情都要或者欢喜或者悲伤地‘结束’才行。我们生活的这出戏有喜、有悲、有滑稽，周而复始。在这个令人疲惫的世界上，如果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那一切就都正常了。”^[21]

萧伯纳在日记中提到，这一年有传言说，杜西与艾威林分开了，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真的，但杜西在信中的确充满对两个人的关系的焦躁。^[22]她写信给奥利芙·施赖纳说：“自从我的父母去世，我就极少再得到真正的，或者说纯粹的、无私的爱。如果你到过我家，见过我的父亲和母亲，知道他们对我的意义，你就会明白我为何如此渴望得到爱，如此需要情感支持。”^[23]

折磨杜西的还有负罪感，母亲已经去世4年，但杜西仍受到良心的责备，她觉得自己不该在母亲最后的日子，把事业和欲望放在家庭之上。马克思的女儿不该具有所谓个人成就带来喜悦这样的资产阶级想法，而应首先考虑其他人的需要——包括周围的人，以及永远不会见到、但父亲对其担负起责任的千百万人。她与姐姐们不同，她想横跨两个世界，但她担心母亲并未理解，也许父亲也没能理解。但为了让自己与父亲的完美关系没有丝毫裂纹，她强迫自己相信父亲理解了。她在给施赖纳的信中说，“对于父亲，我非常确定！在漫长的痛苦年月里，我们之间有过阴影（我得找时间把整个故事告诉你），但我们的爱永远不变，不管发生任何事，我们对彼此的忠诚和信任不会变。”但小燕妮不同：“母亲和我深爱着彼此，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我的一生有很多痛苦，但最痛苦的还是母亲去世的时候认为我冷漠无情。……但父亲，我们的天性完全一样。”^[24]

马克思的女儿在极为特殊的家庭长大成人。她们的父母无疑爱着彼此（爱得疯狂），燕妮对卡尔的忠诚是极为高尚的自我牺牲。每个女儿在各自的婚姻中都把他们当作榜样，却发现不管是爱还是磨难，另一半都没有像自己一样付出。小燕妮、劳拉和杜西都被男人诱骗了——他们摇晃着革命的旗帜，随后却像红色的彗星无影无踪，让她们独自挣扎。“爱德华今晚与奎尔特（艺术批评家）一起吃饭，兴致非常高，因为有几位女士在场，”杜西告诉施赖纳说。“我独自一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愿意独自一人，但还是很糟糕。爱德华那样的本性（纯粹、爱尔兰、法国）让人无法嫉妒，谁能在一个小时就忘记任何事情呢。”^[25]

杜西此时的惶惑反映的不仅是她个人的迷茫，还有当时她与朋友们涉及两性关系进行的深层次讨论。他们不是在探讨两性的选举权，而是更近距离地揭示男人和女人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的生活和本性。他们都明确的是，女人从属于男人，完全是因为性别：女人展示出的力量、才华和知识都足以确保她们能够独立地生活。有人甚至认为女人是最后一种被法律束缚的奴隶，但这样的地位不再被女性认为是注定的。在长期忽视这一问题之后，男性社会主义者终于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女性权利。^[26]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878年出版了《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他提出，没有两性的社会独立和平等权利，就不可能有人类的解放。艺术领域也开始直接探讨妇女权利。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极具影响，1879年面世，80年代初期首次在伦敦上演。后来嫁给哈夫洛克·霭理士的伊迪丝·利斯说，她自己、施赖纳和杜西看完后和很多人一起聚集在剧院外，仍然激动难抑。“我们争论得很激烈，甚至有些凶狠。这部剧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女人意味着生还是死？对男人意味着喜悦还是悲伤？”^[27]

大概在这个时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W.T.斯特德、救世军和其他慈善组织在其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伦敦的性交易状况令人担忧，他们提出，在确定性犯罪是否从重量刑和控制时，应把女性的年龄从13岁提高到16岁。^[28]但杜西对此极为愤怒，她认为，女性的年龄不是关键，只要一个阶级（或者说性别）有条件去购买，各种形式的性剥削（不管是在性交易中还是在婚姻中）就会继续存在。为回应斯特德的研究，杜西和艾威林发布了一本关于女性权利和性交易的小册子。

他们的结论是：女人是“男人有组织的专制下的产物”，婚姻和道德都只不过是交易。不过，他们的大胆宣言最终却以支持一夫一妻制了事，如他们所说：“一个男人忠于一个女人。”^[29]

杜西与萧伯纳讨论易卜生足有数月之久，他鼓励她重新追寻舞台梦。或许是为了做些准备，1886年1月，杜西在自己的公寓里举办了《玩偶之家》朗诵。她扮演娜拉，萧伯纳是敲诈她的柯洛克斯泰，艾威林演麻木不仁的丈夫海尔茂。^[30]1885年底，杜西受雇翻译一本讲述女性更悲惨命运的小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她描述艾玛·包法利说：“她的生活空虚、毫无意义，但这个年轻女人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一定有些可以做的事情。”^[31]这是杜西对自己的描述：她审视着自己珍视的独立带给自己的一切，思考着自己拥有的是不是就是自己想要的。

1885年秋，社会主义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选举中得到了检验。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出现被支持者视为一种胜利，但选举结果提醒他们前方的路还很长。在德国，面对《反社会党人法》，党的领袖采用了各种秘密办法：伪装成温和组织募集资金，偷偷传递材料进行交流，让候选人代表伪造的组织参加选举。最终，社会主义工人在国会中的席位增加到了24席，有了参加委员会和起草法案的权利。^[32]对德国工人阶级运动来说，这次获胜的时机很关键：德国工业雇用的人数首次超过农业，德国的工业由联合企业经营，使得权力和资本都集中在少数精英集团手中。^[33]德国无产阶级无从发动革命，只有从政府内部对这一新特权集团进行对抗。

这一年，英国的选举是选举权扩展到500万公民之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投票人数几乎是上一次的两倍。海德门的社会民主联盟有3人参选，但均告失利。这对首次登上英国全国选举舞台的社会主义者而言，虽然失望，却算不上大的挫折，但随后爆出的丑闻让一切改变了性质：海德门接受保守派贿赂，让自己的人去竞选自由派有望获胜的领域，减少自由派在这些领域能够获得的支持。就这样，社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尝试被很多人视为肮脏的交易。^[34]

很快，他们又牵涉到暴力。1885至1886年的冬天是伦敦有史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之一，伦敦东区的工人由于遭受停工，各家没钱买炭取

暖。城内各处几乎每天都有对失业和物质条件（从食物到燃料）匮乏的抗议。^[35] 1886年2月，东区居民把不满撒到了资产阶级的家门口。他们在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的组织下，从特拉法加广场沿培尔美尔街向海德公园进发，途中遭到私人俱乐部成员嘲弄。绝望的游行民众面对隔在自己与舒适地坐在火炉边的上层阶级俱乐部成员之间的那层巨大、明亮的玻璃，无法抑制将其砸碎的冲动，加之人群中混杂着一些暴躁的年轻人和罪犯，他们开始沿着培尔美尔街一路打砸街边的巨大玻璃窗户，一直砸到牛津街，留下一路碎片。^[36] 奇怪的是，混乱期间没有出现多少警察。恩格斯认为，这是警察故意为之，为的是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与暴力联系起来，败坏他们的名声。^[37] 随着骚乱消息的传开，恐慌的氛围在加剧，有报纸说，多达6万名流氓准备在伦敦游行。^[38]

但暴力威胁在法国造成的影响比在其他地方都大，广阔的左派在1885年秋天的选举中获胜后，内部分裂加剧，导致了相互消耗的权力争夺——恩格斯将其称为“议会疾病”。^[39] 数月里，代表和部长们只顾在金碧辉煌的议会大厅里相互攻击，未能听到或感受到法国大地上的震动。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和矿山，煽动者（有社会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告诉工人：他们人数众多，拥有的力量足以推翻剥削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爱弥尔·左拉在1885年出版的小说《萌芽》中不仅描述了矿工及其家人不得不忍受的非人的生存条件，还描述了罢工工人被饥饿和虐待折磨得发疯，杀死了一名矿山经理。1886年1月，比利牛斯地区中部小镇德卡兹维尔的罢工矿工（不知是否有意）做出了类似行为：他们把一名经理从他的办公室扔出窗外，让聚集在下面的人群用熏得漆黑的双手把他生生撕碎。^[40] 这样野蛮的行为让巴黎乃至各地争论得最凶的议员也暂时闭上了嘴，在议会和工厂管理者中间造成了极大恐惧，实现了和平罢工未能实现的目的：让工人的需求得到重视。^[41] 恩格斯说，这意味着空想社会主义在法国的消亡：对美好生活终会到来的空想也许能给知识分子带来安慰，但对被剥夺了包括人性在内的一切的工人而言没有意义。

虽然只有3名工人进入法国新选出的下议院，但他们还是竭力利用影响，使劳工问题得到更多重视。1886年3月，下议院通过一项前所未有的决议，命令矿山改善工人条件。恩格斯在这段时间写的信中对法

国“革命”感到极为兴奋。⁽⁴²⁾法国政府首次承认劳工的权利，拉法格和盖得的工人党（1880年由盖得组建，是法国首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组成全国总工会，在地方选举中支持自己党派和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巩固在德卡兹维尔取得的成果。⁽⁴³⁾

恩格斯认为，英国的情况短期内很难改善，因为这里的社会主义领袖幼稚，又没有恰当的计划。但他认为，工人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很积极，在法国和美国则很重要。1886年，美国8个城市的工人进行抗议，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当时的平均每周工时是60小时）。抗议在5月1日达到高潮，数十万人参加游行和罢工。恩格斯对此感到兴奋，但又担心美国的工人运动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引导。⁽⁴⁴⁾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词此时主要用来指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强调通过教育、工会和政党等方式让工人强大起来，以便达到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目的，并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思想虽然已经逐渐为更多人所知，但理解的人仍然很少，尤其是在英语国家。但随着《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的翻译工作顺利进展（虽然艾威林的贡献很少，他在其中一章便漏掉50页，这一切即将发生变化）。⁽⁴⁵⁾李卜克内西、杜西和艾威林打算踏上赴美演讲之旅，向美国民众介绍“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1886年8月31日，杜西和艾威林在利物浦坐上“芝加哥”号轮船，在9月10日抵达纽约；李卜克内西独自前往。两位男士是受到主要由德国人组成的位于纽约的北美社会主义劳动党之邀赴美，杜西不属正式来宾，但美国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让她在几乎每一站都发表演说。他们来的时机很巧。这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刚刚起步，工人问题经常登上报纸头版，部分原因是这年5月芝加哥工人集会上发生的致命爆炸，即所谓海马基特爆炸案，7名嫌疑人即将受审并可能被处以死刑。杜西出发前由于芝加哥事件非常紧张，她告诉劳拉说，估计旅程不会太顺利。但艾威林觉得黄金在大西洋对岸等着自己，他在利物浦匆忙间给劳拉和拉法格写信说：“如果能搞到数百万美元，首先就要花一点在厨师身上”，并希望拉法格夫妇到美国跟他们会合。⁽⁴⁶⁾

到纽约后，杜西和艾威林马上被媒体包围。（杜西说，他们像饿狼一样。）⁽⁴⁷⁾一名记者提到他们下船后显得有些迷糊，说艾威林穿戴

的灰色套装和宽边黑毡帽让他看着很像贵格会教徒。依偎着艾威林的杜西戴着一顶大大的白色草帽，皮肤在旅途中被晒得黝黑。旅途对她的确很艰难。⁽⁴⁸⁾ 跨越大洋的途中，船上的一名乘客死去，当他的家人悲伤地站在甲板上，看着他的棺木被放入大海，另一名乘客却笑起来，随着棺木扔了一块橘子皮。⁽⁴⁹⁾ 见到“上层阶级”对死去的穷人都如此轻蔑，杜西极为愤怒。好在她不用跟这些人在一起待太久，码头已经有戴着红丝带的人在等着拯救他们，其中就包括泰奥多尔·库诺——海牙国际工人协会大会结束后，与马克思等人到海里游泳游不回来，最终被恩格斯救回来的那位。⁽⁵⁰⁾

杜西、艾威林和李卜克内西首先向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社会主义者做了演讲，随后去纽黑文给耶鲁大学的学生做了讲演。⁽⁵¹⁾ 在12周旅程期间内，他们总共去了35个城镇，与左派人士、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见面，他们在每站都发表演说，甚至有时在一站便举行4次活动。杜西的旅费来自为报纸撰稿，艾威林参加了10次戏剧演出，旅途中间也在做兼职，为伦敦的报纸杂志撰写文艺评论。⁽⁵²⁾

11月初，他们一行人抵达芝加哥，登上了《芝加哥论坛报》头版。⁽⁵³⁾ 在他们抵达前，有人发出警告称，“艾威林和他尖刻的妻子”来伊利诺伊州的目的是煽动危险情绪。但这样的警告反而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兴趣。数千人参加了他们的演说。⁽⁵⁴⁾ 演讲中，杜西号召美国听众“向民众丢出三颗炸弹：煽动、教育和组织”。⁽⁵⁵⁾ 她像社会主义活动家一样对他们讲演，艾威林像教授一样讲述社会主义的历史，用德语演讲的李卜克内西则作为运动前五十年历史的见证人。⁽⁵⁶⁾ 他们的社会主义路演虽然辛苦，甚至乘坐火车和马车向西远到堪萨斯市，但非常成功。中途，他们还得知工人阶级在纽约取得了重大胜利：受到工会支持的联合工党候选人亨利·乔治竞选市长差点成功，可惜屈居第二，但他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虽然马克思“党”与此并无关系（也并不热衷于乔治），但这至少是个好消息，说明工人（和社会主义）在美国取得了进步，他们可以带着欢庆返回英国。

离开时，接待他们的社会主义劳动党对他们失去了热情，原因是艾威林指手画脚告诉社会主义劳动党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工人阶级在美国政治中不断壮大的力量，建议德国人主导的该党（曾宣布拥有3000名党

员)与更强大的美国劳工组织联合,包括与劳工骑士团这样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的劳工组织联合。他说,只有这样,美国的运动才能兴盛。恩格斯说过,在美国的德国人虽然理解运动理论,却在20年里未能打入急需理论指导的美国民众中间。这一建议(不论是不是对恩格斯的模仿)招致社会主义劳动党的极大不满,一者出自艾威林之口(这些经验丰富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把他视为英国暴发户),二者蕴藏着对该党的批评。⁽⁵⁷⁾从这时起,艾威林变成了敌人。实际上,他让自己成了别人攻击的目标,但他和杜西对此毫无所察,对后来遇到的凶猛攻击毫无准备。

杜西1月回到伦敦时,好消息传来:《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已经出版,德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销量在增加,虽然远谈不上畅销,但至少出现了转机,说明民众对马克思的著作的兴趣终于开始增加。⁽⁵⁸⁾但无论杜西对自己的美国演讲及父亲的著作感到如何自豪,她和艾威林到家后,却再也没心情体会这自豪感:艾威林拿到的一份《纽约先驱报》报道说,美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他就自己在美期间的过度花费给一个说法。⁽⁵⁹⁾报纸幸灾乐祸地报道说,艾威林这位“受剥削劳工的保护者”在所报的账目中,有1600美元不合规定。⁽⁶⁰⁾被艾威林代表的机械工、木匠和工人每天收入不过2美元,他自己却花费25美元买花、50美元买雪茄、42美元喝酒(在其中一家旅馆)、100美元去剧院。⁽⁶¹⁾伦敦多家报纸转登了这篇报道,其中《旗帜晚报》讽刺说:“纽约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决定再也不从衰落的欧洲君主国家邀请专业的鼓动者,他们太奢侈、昂贵。当然,这也是一件好事,让民众知道被富人无度挥霍的财富有一部分属于他们,但纽约的社会主义者不想再从国外找鼓动者来演示是如何挥霍的了。”⁽⁶²⁾

如果不是艾威林离开纽约前与社会主义劳动党就其组织策略爆发争论,该党也不会将这一丑闻公之于众。除恩格斯、杜西等极少数人外,其他人都会相信至少部分指控是真实的,而且很多人肯定会认为那些花和酒没有全部花在杜西身上。伦敦的很多伙伴都经历过艾威林的挥霍无度——反正,花的总是别人的钱。⁽⁶³⁾社会主义活动家亨利·索尔特说,只要杜西离开房间,艾威林就马上向索尔特的妻子凯特借钱。与艾威林共同处理党内事务的H.W.李说,他“为了满足欲望可以不择手段”。

艾威林为了得到好东西，不计代价。李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天，他向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一个德国裁缝订购一件天鹅绒外套和背心。这位裁缝一直拿不到钱，便找去了利瑟恩剧院，结果伤心地发现，艾威林就坐在前排观众席上，穿着没有付钱的天鹅绒外套……身边还有一位女士相伴。”^[64]

杜西和艾威林马上对社会主义劳动党的指控做出回应。艾威林解释说，自己没指望对方支付全部费用，自己只是把账单报上去，让对方决定哪些应该由对方支付，哪些属于私人花费应该由自己负责。^[65]恩格斯也为他进行了辩护，马克思一生被人指责在工人阶级背后享受奢侈的生活，恩格斯以为这次也是同样的指责。在写给翻译自己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译者的回信中，恩格斯对指控艾威林并呼吁将其驱逐出党和出版业的活动进行了批驳。他说，自己认识艾威林已经4年，知道他为党牺牲了社会和经济地位。况且，恩格斯指出，如果艾威林真的欺骗工人，杜西不可能不知道。“而那样的话，至少在我看来，控告就是完全荒谬的。我从她是个小孩子起就认识她，而最近十七年来，她经常在我身边。……说马克思的女儿欺骗工人阶级——真是笑话！”^[66]

了解恩格斯的人都知道，他一旦把谁认作忠诚的朋友，便无法再看到他身上的缺点。巴克斯说：“不论艾威林在金钱问题上的证据有多么确凿，不论他为人有多么不可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不会不信任他。更糟糕的是，恩格斯继续想把他确立为英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领袖。”^[67]

杜西的朋友则对她无法、或者说不愿认清艾威林的缺点而感到难以置信。萧伯纳的戏剧《医生的窘境》中的杜贝达和杜贝达夫人就是以艾威林和杜西为原型。他笔下的杜贝达是个自私的无赖，只喜欢金钱和女人。相熟的人出于尊重和爱，没有把他借钱以及与女人调情的事情告诉杜贝达夫人。她认为杜贝达是超脱于俗世的天才，她可以不理睬他的缺点，她需要他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她活着就是要挽救他。^[68]

杜西与艾威林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曾写信给露理士说：“有的人，你一眼就能了解，但还有的人，你即便与他共度了一生，却仍然无比陌生。”^[69]杜贝达夫人了解她的丈夫吗？杜西呢？

47 同床异梦



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做得了，我都很高兴。我非常需要工作，却很难找到。‘体面的’人都不会用我。

——爱琳娜·马克思⁽¹⁾

在社会主义活动的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工作时，抗议、反抗和起义都还很少，但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变得非常频繁。欧洲每个工业化国家随时都有罢工、抗议或暴动发生，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保护这个制度的政府。早期抗议的煽动者一般是从事和领导工人事业的上层阶级激进分子和知识分子（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是工匠，即最高等级的工人（比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成员）。但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示威经常是工人沮丧情绪的自发宣泄，由工人组织，为了工人。罢工也多由出身工人的领袖组织。这些人出身贫困，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具有天生的领导和演讲才能，在鼓动同伴方面具有任何知识分子都不具有的优势。最初，各国政府试图将工人的行动归咎于外来者——如法国官员试图将公社归咎于外国人。但从工厂到议会，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不满和表达不满的人都是土生土长的。

抗议和罢工取得的成果都很小，局限于一地，因此，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领袖在 1886 年开始讨论组建第二国际。⁽²⁾第一国际在纽约毫无意义地存续了数年之后，于 1876 年在费城解散。有些人

认为，又到了把各国工人聚集在国际之下的时刻，工人虽然抗议不断，资本主义却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时值殖民主义盛行，欧洲各国都忙着在世界地图上争掠：把更多的土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拥有更广阔的市场，来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³⁾除了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从涡轮到内燃机等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出现，也使得机器变得更快、更强。一切都在变快、扩张，其中的财富无穷无尽。⁽⁴⁾

在这种氛围下，单个工会也许能够向一名雇主争取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但另一个工厂不经过罢工就无法得到改善，而且取得的成果没有保障。单个工会就像游击队，手上只有轻武器。有些社会主义者领袖认为，抗击大军的唯一办法是拥有可以匹敌的规模和力量，而这就必须依靠国际团结。

法国社会主义者希望在 1889 年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以及法国计划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一资本主义盛事最初于 1851 年在英国举办）之际，在巴黎召集第二国际。⁽⁵⁾各国社会主义者对举行会议的必要性没有异议，这也是筹办开始后唯一没有异议的地方。各国对新国际的期待反映着他们各自的关切：法国人想进行理论辩论，德国人想聚焦政治，英国人则想讨论经济学。马克思已经不在，无法再给予指导。恩格斯发出多封信件，要求各方合作，但新国际相比第一国际混乱了很多。拉法格忙着组织这次会议，龙格也与恩格斯讨论了这次会议以及法国社会主义者间的诸多争吵。龙格等于是在走钢丝，一面与温和派结盟，一面把能用来对付他们的情况告诉恩格斯。为掩盖龙格的身份，恩格斯与他讨论敏感问题时，总是称呼他“Z”。⁽⁶⁾

小燕妮去世后，龙格与马克思一家的关系便紧张起来。琳蘅和杜西因为龙格对待小燕妮的方式而对他心怀恨意，她们认为，他既然不是好的丈夫，肯定也不会是好父亲。姐姐去世后，杜西从阿让特伊返回伦敦时带上了正在生病的哈里。令人悲伤的是，这个孩子在马克思死后 3 天便夭折了。（哈里与外祖父母一起埋在了海格特公墓。）这年春天，杜西想劝说龙格，允许自己把约翰尼带到伦敦。她不断写信给沙尔，要求知道约翰尼来伦敦的确切时间。但龙格一直不肯回信，偶尔回信，也只说自己正在考虑。⁽⁷⁾

从龙格的角度，他也许不想在自己的一个儿子刚刚死在杜西的照顾

下，就把大儿子又送去伦敦。他这样想，对杜西并不公平，正如杜西对他的看法也不公平。不论小燕妮如何抱怨龙格，他的信件说明，他深爱自己的孩子，即便他的爱有时看似疏忽。况且，对孩子们的决定权在龙格的母亲手里。她不想让他们成为外祖父的“狂热”的牺牲品，她也不喜欢劳拉和杜西。⁽⁸⁾因此，龙格把孩子送去了卡昂，交给母亲照顾，他则专注于自己丧偶之后的生活。但他继续与恩格斯保持通信谈论政治，并在1886年讨论新国际时，把约翰尼带去伦敦交给了杜西和艾威林照顾。

没有迹象表明，恩格斯支援过龙格一家。龙格的孩子们能从马克思的著作带来的版税中分得三分之一，但这部分钱放入了托管，他们的父亲拿不到这笔钱。

但劳拉对待再大的私人或政治变动好像都是如此。当家里的其他人（包括她的丈夫）都情绪高涨，她却安静如故，一生总在期待奇迹的她已经知道不会有什么奇迹。1887年春天，她对待保尔的最近一次选举失利便是如此。他参加了巴黎的市政选举，结果惨败。劳拉对丈夫不存幻想，她把他的缺点看得非常清楚，能够淡然处之。她告诉恩格斯说，她和保尔参加过一次集会后，她周围的人都觉得拉法格“好吹牛”“说大话”“说话无边无际”，她对此自嘲说，他的表现已经比之前强多了。⁽⁹⁾

劳拉一直躲在幕后工作，但她没有像她担心的那样被排除在马克思的遗著事业之外。她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了法语，⁽¹⁰⁾ 这年春天，她又受美国女权运动者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之子爱德华·斯坦顿的邀请，写了一篇关于巴黎社会主义的文章。⁽¹¹⁾ 身无分文的劳拉好像觉得，自己的命运就是如此。收到恩格斯寄来的《资本论》（英文第一版已经在两个月内卖光）的版税后，她说，钱“比春天里的鲜花和十二月里的炭火更受欢迎……永远不会过季”。⁽¹²⁾

伦敦的马克思纵队却没这么平静。从美国回来后，艾威林和杜西频繁就美国工人运动进行演讲。他们在登台向迫切的听众讲述美国的消息的同时，也在努力保住艾威林的政治生命。⁽¹³⁾ 英国社会主义者圈子对艾威林在美国受到的指控越传越丰富，他的“多姿多彩”的过去也被翻了出来。

恩格斯全力为艾威林进行辩护，斥责这些报道完全是些闲言碎语和谩骂。沮丧的战友们再次抱怨恩格斯不善识人品行，由于艾威林经常在恩格斯家，之前经常去恩格斯家的人逐渐不再登门。⁽¹⁴⁾但恩格斯好像就是不肯相信杜西的“丈夫”是个无赖。⁽¹⁵⁾经过数月面对各方面对他进行辩护，恩格斯向一位身在纽约的战友袒露了自己对艾威林的沮丧：“这个年青人由于对世事即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懂，也由于他迷醉诗意般的幻想，给自己找来了麻烦。”但他还是同情地说，艾威林“很有才能，有用处，而且非常正直，但是像少女一样易动感情，总是要干出一些蠢事来。话又说回来，我还记得我当年也是这样一个笨蛋。”⁽¹⁶⁾

杜西和艾威林通过演讲挣到了一些钱，但远远不够。杜西的朋友知道，她面对的个人和经济困境，在艾威林的问题上无法帮她，便竭力帮她寻找工作。当露理士请她协助自己推出易卜生戏剧的英文版，杜西非常兴奋，马上开始自学挪威语。⁽¹⁷⁾1887年3月，他们又讨论把左拉的作品翻译成英语。左拉对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的严肃描绘引起了诸多争议，露理士和杜西相信，英国读者会感兴趣。杜西希望也能参与这项工作，她告诉露理士说：“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做得了，我都很高兴。我非常需要工作，却很难找到。‘体面的’人都不会用我。”⁽¹⁸⁾

杜西经常提到，无论他们的经济状况有多悲惨，无论眼前有多少机会，艾威林都无动于衷，她只有独自面对这一切。打击是无情和残酷的，杜西无处诉说——艾威林是最不可能的听众。此时，他表现得不仅对社会主义失去了兴趣，对她也感到了厌烦。6月，艾威林署名“登徒子”发表的一首乏味的诗可以看作是在向杜西传递信息：

.....

你说，纯粹的爱可以长久，
可以毫无目的的投入，
没有希望，没有约束，没有终结，
但这不是我们游戏的赌注。……
亲爱的，这就是我的说法，
虽然你的眼睛征服过我，
但‘做凯撒’是我的座右铭，

我真的不觉得你可以责怪我！^[19]

.....

这首诗还有很多其他版本，但传递的消息是一样的：我们的爱虽然还不错，但结束了。即便再宽容，杜西对于他如此幼稚地公开他的感受，也感受到了羞辱。她心痛，沮丧，打算自杀。“她特意服了超剂量的吗啡，”露理士在事件发生数年后写道。“但通过给她喂下大量强咖啡，扶着她在房子里走上走下，毒性逐渐去除了。……她的朋友们很伤心，很震惊。”^[20]

也许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关系，这年8月，杜西和艾威林在埃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德租下一处乡村别墅。“想想看，劳拉，这里可是莎士比亚的家！”她写信给姐姐说。“我们每周来他的‘出生地’工作两三次……爱德华在不停地写。你有没有听说他的独幕短剧《渣滓》受到正在冉冉升起的新女星罗斯·诺里斯的关注，很快就将制作？他还有两部戏不久前也得到了认可，其中一部改编自《红字》？”^[21]

杜西描绘了一幅田园般的生活，但她的信满是假象。语调本是要表达温暖和快乐的，读起来却充满痛苦；跃然于纸上的不是欢快，而是孤独、恐惧、以及与无比疏远的姐姐重归于好的渴望（劳拉很少回杜西的信）。她对艾威林的热情也面临恶兆：他在戏剧这条路上走得越远，他们就越疏远。

在伦敦，1887年是奇怪的一年。一方面，这一年维多利亚女王迎来执政50周年纪念（可惜她到访伦敦东区时遭到巨大的嘘声，她称其为“可怕的噪声”），^[22]伦敦迎来野牛比尔的狂野西部秀（恩格斯和艾威林夫妇去观看了，恩格斯评价表演“很不错”）。^[23]另一方面，这一年也见证了血腥星期日：警察对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手无寸铁的民众发动了近乎于战争的攻击。

民众抗议的原因有很多。失业（虽是一个老现象，但在英语词典中却是个新词汇）使得很多东区人涌向西区，几乎每日在这里集会，试图引起社会对穷苦劳动者的注意。由于培尔美尔街暴乱的记忆依然深刻，东区人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出现引起了警察的警惕，警察局长命令，禁止任何人进入广场。^[24]但这样否定工人集会权利的命令引发了更多的抗

议声。后来，随着议会通过一项爱尔兰高压法案，允许爱尔兰警察和法官不经审判便可取缔组织和判处平民，爱尔兰问题再次登上行动者的日程。^[25]

11月13日，星期日，这一天被确定为抗议失业、声援爱尔兰人和保护伦敦人集会自由权利的日子。大约10万人在克勒肯维尔、霍尔本、伯蒙德西、德特福德、沙夫茨伯里大街和海马基特等各个地方聚集后向中心特拉法加广场行进。^[26]政府察觉到他们的计划后，派了2500名警察到广场周围，1500名警察和400名士兵到广场上。这样，抗议者闯过第一波阻拦后，就会陷入到警察和士兵的前后夹击中。^[27]

杜西和艾威林从不同方向特拉法加广场行进。意识到示威者将要面对的局势后，艾威林和他的队伍都逃走了（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一开始就溜了”）。^[28]杜西却组织人群继续冲击警察的阻拦。她处在混乱的中心，外套和帽子都被扯破了，她被一警棍打在胳膊上，另一警棍打在头上。她说，如果不是一个脸上流着血的陌生人把她扶起来，她肯定会被踩死。相比她，其他人的描述更加惨烈。^[29]一名目击者称：“我看到警察不断殴打女人和孩子。……当我顺着人群出来，看到一个女人问一个级别是巡官或者巡佐的警察有没有看到她的孩子。那名警察骂她是贱人，把她击倒在地。”^[30]威廉·莫里斯的女儿回忆说，周围房屋和旅店的房顶坐满穿着讲究的男男女女，对警察的作为拍手称快。^[31]

杜西被捕后又被释放，最终衣衫褴褛地来到恩格斯家门口。^[32]这个夜晚，像她一样甚至情况比她更糟的足有数千人；60人受伤住院，神奇的是，无人死亡。愤怒、不甘的抗议者在接下来的星期日再次举行示威，结果有一人失去生命。^[33]死者是一名法务助理，名叫艾尔弗雷德·林内尔，12月18日，12万人参加了为林内尔举行的盛大葬礼。体会过警察作恶的杜西变成了彻底的激进分子。一年前还在美国耐心地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她，现在号召对警察实施温和对抗。在芝加哥，虽然有证据表明海马基特爆炸案背后有政府密探操纵，4名被指控的嫌疑人还是在11月被吊死；伦敦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暴行。有人听到杜西在演讲中说：“我们必须对警察实行温和战争。看到有警察进入哪家商店，你就不要进去……不要进有警察去的旅店。”她号召在圣诞节进行温和对抗，让警察不得不工作，宣布自己要把“满身肥肉的特种警察”和“杀人的暴

徒”的圣诞晚餐破坏掉。^[34]

由于在血腥星期日事件中的参与和之后的鼓动行为，杜西和艾威林被发出“随时逮捕令”——警察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随时逮捕他们。^[35]杜西把这当作了骄傲，她觉得自己在斗争的旅途上成长很快——艾威林却没有。11月，艾威林化名“亚力克·纳尔逊”创作的又一部戏剧在伦敦上演。戏剧改变自法国戏剧《海边》，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挣扎：对年老的丈夫的忠诚和对年轻的水手的爱。^[36]杜西扮演女主角，艾威林扮演她的丈夫。恩格斯一如既往坐在观众席上，高兴地度过自己的生日。他说，艾威林和杜西演得都很好，戏剧肯定会成功。但一名评论家对杜西的表演进行了极为尖刻的批评，对艾威林却不吝赞美之词。这让杜西受到很大伤害，她甚至想这位评论家是不是对自己抱有个人偏见。^[37]杜西受到了极大打击（她再也不会公开表演），艾威林却成功了。他在12月离开伦敦，踏上巡演之旅，在新年到来前夕，留下杜西独自一人迎接1888年。^[38]1月，一个名叫弗朗西丝·艾弗的女演员扮演了杜西在《海边》中的角色。戏剧受到评论家的关注，“亚力克·纳尔逊”被描述为“正在从一名伦敦报人转变为著名剧作家”。

恩格斯很高兴看到艾威林重心的转变，甚至松了口气。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已经认识到，艾威林越来越成为运动的负担，根本担不起恩格斯为他准备的重要角色。（恩格斯告诉一名朋友说，艾威林“每当事情不合他的意，他便选择视而不见，这显然是青少年才有的做法”。）^[39]恩格斯和杜西都提到自己被英国社会主义者抵制，从他们与战友们的通信中不断提到艾威林来看，他便是原因。社会主义者组织费边社的领袖西德尼·韦伯说，自己的组织不满意的不是马克思的思想，^[40]而是传递思想的人：“当我们批判马克思主义，我们指的是艾威林。”杜西和恩格斯宣布不在意被吵闹不休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抵制，虽然杜西伤心于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一些朋友。^[41]她写信给已经和韦伯以及哈夫洛克·霭理士一样加入费边社的萧伯纳，问他都在做什么。^[42]“您再也不来看我们了，我有时在想您是不是也在抵制我们。”（萧伯纳去年春天与艾威林爆发了一次剧烈争吵，杜西或者不知道或者故作不记得。）^[43]

总之，艾威林踏上的剧作之路让他开始远离党的事务。6月，他改

编的《红字》登上日场，评论有好有坏，到了月末，艾威林的第五个剧本也上演后，恩格斯兴奋断言说：“用美国佬的话来说，是‘发现了石油’。”^[44]7月，杜西和艾威林打算去美国宣传他的剧本。恩格斯告诉劳拉说，艾威林要去“监督他的三个剧本上演，那些剧本准备在纽约、芝加哥以及天晓得还有哪个地方同时上演”。^[45]艾威林和杜西承担不起这样巨大的花费，这次又没有社会主义政党这个顺风车可以搭，但恩格斯很高兴地为了他们出了路费。杜西一向不愿接受恩格斯的钱，但为了这次美国之行，她并未拒绝。艾威林肯定把这次行程描述得对他的事业极为重要，对恩格斯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恩格斯兴奋异常，决定也去美国，同行的有杜西、艾威林、以及恩格斯的老朋友化学家卡尔·肖莱马（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在马克思家被称为“快乐的农夫”）。^[46]

恩格斯希望此行私密进行，几乎谁都没有告诉——包括拉法格夫妇。劳拉如果知道自己得不到“将军”的信任，不能提前知道他的行程，肯定会非常伤心。^[47]但恩格斯担心的不是她，而是拉法格。他知道，拉法格肯定抑制不住要宣布恩格斯出发去征服新世界了。登上“柏林”号轮船后，杜西写信给劳拉致歉：“我一知道就应该告诉你的，但“将军”一心要保密，我就没敢说。万一消息泄漏出去，我们肯定会受到责怪。”^[48]

他们一行人来到纽约，满怀期望地等着见证艾威林的成功，但他得到的只有失败。^[49]刚到美国后，杜西在信中提到艾威林在监督排练，恩格斯说，艾威林的工作已经在8月31日完成，除此之外，他们完全没再提到戏剧。^[50]恩格斯很享受这次旅程，造访一处新英格兰监狱更是旅程中的一大亮点。他非常吃惊地发现，犯人可以读书，成立俱乐部，开会时没有狱警在边上看着，每天吃两次鱼和肉，牢房里有自来水，墙上还能挂图片。“犯人能够正眼看人，没有一般罪犯那种有罪的模样。这在全欧洲是看不到的。”恩格斯此时想到的应该不是巴黎圣佩拉热监狱的“王子楼”，而是德国和俄国的堡垒。“在那儿我对美国人充满了极大的敬意。”^[51]

但在纽约，恩格斯感觉自己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首府，一切东西都是人造的，在恩格斯看来都很糟糕：

.....

我们到达纽约时天已经黑了，所以我觉得仿佛走进了但丁的《地狱》的一层。……头顶上高架铁路隆隆作响，成百辆电车叮叮当地在你身旁飞驰而过，可怕的嘈杂声来自四面八方，而最可怕的是河上的所有轮船发信号时刺耳的强烈的雾笛声。……每家商店上面都装有不加任何掩盖的弧光电灯，它们的用途不是给你照亮，而是充当吸引你注意的广告，照得人什么也看不清，眼前一片模糊。简单点说，这个城市是世界上形象最丑陋的人群居住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像从蒙特卡洛被轰出来的赌场庄头。

.....

但恩格斯同时认为，美国人具有“真正伟大民族的良好品质和素质，而这些东西只有在从来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的民族那里才可以看得到。……当事情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发生不快时，他们表现得很能容忍，但是一旦他们着手做什么事情，他们就踏踏实实地干。”^[52]

艾威林对于自己在美国未能得到认可好像并不在意，回到英国后，他很快迷失在伦敦西区的社交生活中。杜西则在关注伦敦的另一个方向——首都的“地狱”。19世纪下半叶的伦敦，高大的建筑不断耸起，形成一面墙，把伦敦东区和西区分割开来。办公大楼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举办前，职员需要地方办公这一想法是荒谬可笑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正在出现，并最终形成白领阶层。随着庞大的建筑不断在伦敦金融城竖起，财富在这里的各家公司间流动，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壁垒变得更加坚不可摧——有钱人在西区（贝尔格莱维亚和梅费尔甚至自成封闭的区域），可怜的穷人则在东区。^[53]

东区一直就比索霍区还要破败几个层次，因为索霍区至少还有穷人和富人并存，还有多姿多彩的娱乐和生活。东区的穷人却除了为富人工作之外，与富人没有任何接触。这里一贫如洗，破烂不堪。在周围工厂巨大烟囱的映衬下，这里的房屋显得愈加矮小。太阳升起了吗？落山了吗？这在怀特柴泊、贝斯纳尔绿地和莱姆豪斯是看不清的。^[54]在这些地

狱般的地方，天空只有两种颜色：被煤烟、灰尘和污垢染成的褐色，或者工厂尚未开工时的污灰色。那时，有现在早已不用的专门词汇用来描述这样污浊的天空：“漆黑如夜天”指大雾浓得无法看清物体时，稍好的“浓雾天”指大雾没有浓到看不见东西，但绝对见不到太阳。⁽⁵⁵⁾正是这样的大雾使得开膛手杰克在 1888 年的东区为所欲为——当然，也因为根本没有人关心居住在这里的“废物”。

之前十年里，这里挤满了移民。⁽⁵⁶⁾新来的中国人在莱姆豪斯建起了中国城，在鸦片的推动下发展起来。但真正改变东区面貌的是来自俄国、普鲁士、立陶宛和波兰的流亡犹太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刺客中就包括一名犹太妇女，而这也被当作了屠杀的借口：传统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凶猛地爆发出来，5000 名犹太人被杀。健壮的以及有钱或有关系的逃了出来。到 1880 年，大约 46000 犹太人生活在伦敦，其中一半属于工人阶级或者更加穷苦。⁽⁵⁷⁾

杜西初次到东区是去演讲，但她很快从讲台上走下来，走进黑暗简陋的小屋，走到这里的人中间。她在 1888 年 6 月写信给劳拉说：

.....

我无法向你描述我看到的恐怖景象，就像噩梦一般，让我无法忘记。白天我用亲眼看到，夜里我在梦中看到。我有时会想，人怎么能在那样的苦难中活下去。有一个房间尤其让我无法忘记。房间?! 那根本就是一个漆黑的地窖。里面有一个妇女睡在麻袋片和一点稻草上，一半乳房已经被癌症夺走。她只有一块老旧的红手帕遮在胸膛上，腿上遮着一点旧布，此外便与赤裸无异。她身边有一个 3 岁的婴儿，此外，还有 4 个孩子，最大的 9 岁。而她只是数十万人中的一个。⁽⁵⁸⁾

.....

这年，东区布莱恩特·梅火柴厂的女工掀起一场空前的罢工，要求提高工作条件，并以胜利告终。透过这次胜利，杜西看到了尽快缓解她亲眼见到的苦难的可能，因此更加坚定于鼓动劳工运动。⁽⁵⁹⁾从周围这些苦难者的空洞的双眼中，杜西意识到，父亲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也

根植于现实，对这些挨饿的人却依然过于抽象，他们翘首以盼的首先是工作和维持生存的工资。杜西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战斗，她在伦敦东区找到了。

杜西后来告诉一名朋友说，她通过东区的移民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说自己是“家里唯一一个对犹太人民感到亲近的人”。⁽⁶⁰⁾她自豪地拾起这一身份，写信给爱德华·伯恩斯坦说：“我是一名犹太人。”受邀为犹太社会主义者发表演讲时，她回复说：“亲爱的同志们，我非常高兴能在11月1日的会上讲话，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的父亲是一名犹太人。”⁽⁶¹⁾

杜西和艾威林越走越远，12月31日，她写信给劳拉说：“爱德华明天要去康沃尔见一些朋友，他的朋友也邀我去，但我不会去。我不喜欢有钱人。”她说，自己要去牛津观看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给漂亮女人的警告》。露理士让她看一下，以便为自己编辑的一个系列做准备。对此，她很愿意，因为这涉及社会问题，这是她认为唯一有意义的事情。⁽⁶²⁾

48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很少有救助穷人的人与穷人感同身受，富人不会知道没有食物、不能休息的艰难滋味。

——凯尔·哈迪⁽¹⁾

探寻马克思一家人的故事时，人们会不自觉地脱离大的环境，看到一个扭曲的现实。他们的思想是彻底的社会主义（少有例外），但整个世界不是。到1889年，英国总共只有不超过2000名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虽有大约75万人，但海德门社会主义者和费边社成员都不愿与工会合作，工会也同样对他们疑虑重重。⁽²⁾但马克思认为，工会是目前工人对抗资本主义最有效的工具显然是正确的，杜西和一些伙伴加入到工会的战斗中。一名社会主义者说，他们最终受到欢迎“不是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尽管他们是社会主义者”。⁽³⁾

第一场重大战斗是为煤气工人打响的⁽⁴⁾——煤气工人在1889年3月组建了英国首个非技术工人工会，杜西和艾威林为其撰写了条例和章程。⁽⁵⁾国家煤气工人联合会和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工人总工会的成员在短短数月内便达到数万人，一年内达到10万人，工会为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而组织的罢工也获得了胜利。⁽⁶⁾这场战斗的3名领袖都是工人：威尔·索恩、汤姆·曼和约翰·伯恩斯（3人后来都进入国会，还有1人成为内阁部长）。⁽⁷⁾索恩不识字，杜西开始教他。⁽⁸⁾

伦敦东区因为煤气工人的胜利而兴奋。8月13日，在炎热的夏日里，一群码头工人决定不再忍受苦难，⁽⁹⁾邀请索恩、汤姆·曼、伯恩和本·蒂利特（一名27岁的自封狂热分子）来领导自己罢工。⁽¹⁰⁾他们在8月19日组成码头工人工会，第二天，罢工开始，一个世纪来，伦敦码头首次关闭。⁽¹¹⁾

从远处看泰晤士河，五颜六色的旗子高高飘扬在停泊着的船上，预示着希望、新大陆的召唤。⁽¹²⁾但在河岸码头上，工人被像动物一样对待。索恩直截了当地说：“我相信，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其他地方的白人，需要忍受码头工人这样可怕的生存条件。”⁽¹³⁾

大多数码头工人不是按天工作，而是按小时，只能长时间等待被“叫到”，才有机会工作。本·蒂利特解释说：

.....

挣扎着，吼叫着，咒骂着，这些可怜人必须争抢那些残酷无情的人提供的少得可怜的工作。为了能离笼子（这样形容是基于用来保护喊工者的粗铁条）更近，饥饿的男人们疯狂地像争夺人生的饭票一样相互争抢，衣服被撕碎，身上被扯伤，甚至耳朵都被扯下来，把命都拼进去……强壮一点的从其他人头顶向笼子爬去，又是踢又是骂，在笼子面前，他们就像疯狂的老鼠。白天黑夜，他们都得忍着饥饿，期盼着被叫到，等着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工作机会。⁽¹⁴⁾

.....

六万码头工人决定反抗，进行罢工。他们的要求很温和：首要的一条是把最低工资从5便士每小时提高到6便士。⁽¹⁵⁾但航运公司嗤之以鼻：这些伦敦最低贱的工人居然奢望挑战控制着海上贸易的大人物？面对罢工者宁可死也不肯复工的态度，各家公司均未回应，他们自大地低估了工会的新领袖。

罢工的组织地在码头北侧赖登街上的韦德纹章酒馆。杜西和约翰·伯恩斯的夫人募集资金，宣传罢工，把市民、慈善和政治组织以及其他工会捐献的救济金分发给工人。⁽¹⁶⁾恩格斯说，杜西“完全钻进了罢工里”，工作起来“像个勇士”。⁽¹⁷⁾9月初，杜西代表罢工工人在海

德公园演讲。伦敦《工人选民》报的一名通讯员写道：“很惊奇地看到，艾威林夫人向庞大的人群演讲；很惊奇地看到，当她讲到码头工人家里的苦难，女人们看她的目光；很高兴地看到，她把戴着黑手套的手指指向压迫者；很高兴地看到，人群对她的精彩演讲给予热烈的欢呼。”^[18]

码头工人一无所有，一周过去，两周过去，他们就要饿死了。报上虽有关于罢工的报道，也有一些大学学生参与了这一事业，但组织者认为，必须把抗议搬到市中心，让整个城市注意到这些被轻易忽视的人，这样才能向码头公司施压，并且募集到能够让码头工人活下去的资金。罢工者决定穿过城市进行抗议，但游行差点失败。他们一个个体弱多病，没有体力，但也正因为如此，伦敦市民对他们感到同情。“当人们知道数千名罢工者穿过城市后居然没有偷任何一个口袋，没有打碎任何一块窗户，”有观察者说，“英国市民觉得可以安心地回郊区的别墅了，出于同情心，顺便也帮一帮这些可怜的人们。”但这样的支持仍然不够，救济金很快便干枯了。^[19]

就在他们看来必须要在死亡和投降之间做出选择时，一笔大得难以想象的支援从澳大利亚送到了：3万英镑。澳大利亚码头工人为英国工友进行了募捐，加上当地慈善组织的支援，才凑出这么大一笔款项。^[20]船运公司认为，这是不详的预兆。罢工已经让他们损失惨重，尤其现在是最繁忙的季节，如果罢工工人继续收到援助，码头可能要关闭数月，而且罢工很可能会扩散到伦敦以外。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工人倾斜。^[21]9月16日，几乎码头工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们像凯旋的军队一样，胜利地恢复了工作。他们的胜利让全世界的工厂和农场劳动者为之欢呼。最为低下、无力的工人群体有了本地的组织和国际的支援，也能取得胜利。^[22]

他们的胜利也是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索恩说，罢工后，工人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空想，而是相信它能带来有形的结果：脱离贫困。^[23]恩格斯欢呼说：“这是我们近年来最有希望的一次运动，我为还能看到这次运动而感到很自豪。如果马克思还活着并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那该多好啊！如果这些不幸的、被压迫的人们——他们已经沦为无产阶级最底层，被各行各业所遗弃，为了得到工作每天早晨在码头的大门口搏命，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并以自己的坚定的精神使强大的码头

公司害怕，那我们的确就无须为工人阶级的任何一部分感到悲观失望了。”⁽²⁴⁾

恩格斯说，现在重要的是在英国成立一个工党来代表这些工人。⁽²⁵⁾

两年来，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计划 1889 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盛大的会议，但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各种分裂、国家层面上的争吵、以及私人恩怨几乎让第二国际的诞生无法实现。主办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分裂严重，甚至决定举行两次单独的大会。5 月，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说，自己和杜西不停地奔忙才让他的“所谓的马克思派”有所成就，却总被他（邀请一派而不邀请另一派，导致与英国社会主义者疏远）和李卜克内西⁽²⁶⁾（好像无法决定德国人支持法国的哪一派）⁽²⁷⁾的接连外交昏招所累。此外，大会的日期也存在争议。按照之前的协商，大会应该在 9 月召开，但拉法格突然决定 7 月 14 日召开：因为这一天是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也是另一派社会主义者开会的日期。⁽²⁸⁾愤怒的恩格斯告诉拉法格遵守定好的日期，不要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似的。⁽²⁹⁾这期间，另一派的社会主义者试图把拉法格的大会描述为马克思的家族会议。⁽³⁰⁾

最终，拉法格获胜，大会在 7 月 14 日召开，西至美国东至俄国都有代表赶来巴黎参加大会。拉法格负责安排会场和房间，但马虎之下没能帮德国代表订好住处，而此时的巴黎由于有大批游人前来参观世界博览会，很难找到住处。⁽³¹⁾他还刻意租下一处难以容纳所有代表的会场，以便让大会显得更成功——结果事与愿违，在炎热的天气里，让代表们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实在不是个好主意。⁽³²⁾此外，他还决定大会秘密进行，因为担心如果会议不成功，报纸会有负面报道。恩格斯极为气馁，他说，大会召开的目的是吸引世界的注意，讨论“诸如八小时工作日、女工和童工劳动法、废除常备军等问题”，他想不通拉法格为什么要保密。⁽³³⁾

不过，准备工作虽有诸多失策，结果却是历史性的。在 1889 年 7 月的巴黎，艾菲尔铁塔在世界博览会上揭开面纱，第二国际也播下了种子。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次集会在火车北站和皮加勒区之间的彼得雷莱大厅进行。恩格斯没有参加（筹划过程就让他受够了），但杜西和艾威林作为英国代表见证了这次里程碑式的大会。会场内点缀着红色的旗子和条幅，他们一起追忆 1848 年起义和公社。狭小的会场挤满来自 20 个

国家的 391 名代表，其中包括很多知名的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领袖：来自德国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伯恩施坦和克拉拉·蔡特金；来自俄国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来自比利时的塞扎尔·德·巴普；以及来自英国的凯尔·哈迪。⁽³⁴⁾另一派法国社会主义者举行的大会有 600 人参加，但其中 500 人都是法国人。⁽³⁵⁾这表明另一派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国内十分强大，但在国际上要让位于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天，大会搬去了一处更加宽敞的会场，那里很恰当地命名为“幻景大厅”。⁽³⁶⁾

恩格斯本来对大会不抱多少希望，但接到大会短短 3 天的议程后，他便兴奋地宣布大会非常成功。⁽³⁷⁾6 天后，代表们通过决议：支持八小时工作日，禁止雇用童工，对女工和青少年工人的用工情况做出规定。他们还对工人成立政治组织、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民兵等达成了共识。最后，大会同意在第二年、也就是 1890 年 5 月 1 日举行首次世界范围内的大游行，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劳动立法。⁽³⁸⁾

由于在巴黎大会开始前，花费数月时间调停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斗，恩格斯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进度受到了影响。他将在这一年满 70 岁，虽然杜西说他是自己认识的最年轻的人，但他知道自己恐怕没有时间完成设定的所有任务了。⁽³⁹⁾除了监督马克思著作的出版，他还要给自己的朋友写一部传记，写一些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把自己已经拖延了数十年的几件事情完成。⁽⁴⁰⁾他认识到自己无法独立完成了，因此，选择了在运动中他最相信的两个年轻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他教他们辨认马克思的笔迹，以便他们能帮自己编辑马克思的著作，甚至在需要的时候，代替自己的位置。他们同意了。⁽⁴¹⁾

恩格斯一直都比马克思更知道时机的重要性，他感到运动在加速，出版马克思著作的迫切性大大超过从前，运动急需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了第二国际，恩格斯还通过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看到工会和社会主义者已经踏上不可逆的胜利道路，德国也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变化。他认为“1890 年 2 月 20 日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⁴²⁾这一天，德国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赢得了 140 万张选票，比 3 年前增加了一倍。3 月的第二轮投票过后，社会主义者获得了 35 个国会席位。恩格斯说这样的结果让自己陶醉。⁽⁴³⁾

德国社会主义者取得成果的同时，还见证了两位国王的死亡。威廉

一世在 1888 年死去，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但弗雷德里希患有癌症，只做了 99 天皇帝就死了。他的 29 岁的儿子威廉继位，即威廉二世。^[44]年轻的皇帝比 73 岁的首相俾斯麦更开明，至少最初对工人比较同情。俾斯麦警告说，“赤色”叛乱就在眼前，并要求将《反社会党人法》定为永久法律，加入新条款驱逐社会主义活动者。^[45]但 1890 年 1 月，国会没有通过俾斯麦打击社会主义者的方案，反而使社会民主党胆气更壮。在 2 月的选举中，选票大量涌向左派，产生的“革命性”结果让恩格斯大为高兴。^[46]3 月 17 日，威廉二世要求俾斯麦辞职，他第二天便离开了。^[47]德国的障碍已经消失，现在可以谨慎地扩大对工人阶级的鼓动了。

巴黎大会将 1890 年 5 月 1 日确定为首次国际工人大游行的日子。恩格斯提醒德国战友小心行事，虽然皇帝表面上同情工人，但恩格斯了解到德国军队已经待命随时扑灭抗议行为，秘密警察也在试图煽动混乱，以便让政府实施镇压。^[48]

但在其他地方，工人们大肆庆祝五一，这让恩格斯更加确信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速度在加快。在巴黎，工人们穿着工装顺着林荫大道走向充满节日气氛的协和广场。1870 年，民众同样聚集到这里，他们想知道法国能不能成为共和国，普鲁士军队是不是冲进了城门。很多资产阶级担心巴黎街头再次被工人掀翻，因此关闭店门出去躲避风头。但他们无需担心：工人们已经不需要通过破坏来得到认可。工人虽仍未能拥有与法国上层阶级一样的权利，但至少已经组织起来，在权力殿堂中得到露面的机会。拉法格和劳拉参加了巴黎的五一庆祝活动，拉法格说，有大批警察进行警戒，时不时推搡一下人群，或者在马背上冲刺一下，但工人心情很好，给他们让路。拉法格估计共有 10 万人参加了活动。^[49]不管确切数字如何，场面必然蔚为壮观，但与伦敦的场面相比还是相形见绌，恩格斯说伦敦的活动“规模宏大”。^[50]

伦敦的活动定在 5 月 4 日，因为这天是周日，有更多工人参加。海德公园周围建起 15 座讲台（大多是货车的车板），来自欧洲各国的演讲者向群众发表演说——主题不是政治，而是工人，比如所有工人实现八小时工作日，额外工作时间获得报酬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工人仍在无偿地让出剩余劳动，但至少朝着改变迈出了一步。

民众从各个方向涌向海德公园，参加人数大约有 30 万。一名记者说，自己从未见过公园如此拥挤：“洗衣的妇人努力跟着一个举着条幅的男人；小孩子们也希望每日八小时。”⁽⁵¹⁾演讲者来自工会（伯恩斯、索恩、哈迪、蒂利特）和英国各社会主义组织。拉法格和艾威林在同一个讲台进行了演讲。恩格斯也在讲台上，但纯粹作为听众，他评价说，拉法格讲得很好，虽然英语带有浓重的法国腔，但还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杜西和爱德华·伯恩斯坦在另一个讲台。⁽⁵²⁾自码头工人罢工以来，杜西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工人问题演讲者之一，而且作为一名女性，她赢得了特别关注。⁽⁵³⁾她告诉振奋的人群，他们的目的不是做政党的工作，而是为了工人。她把自己描述为一名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她回顾了运动的发展——从只有少数人站出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到几百人，再到成千上万人。演讲结束前，她引用雪莱写给 1819 年给遭到屠杀的英国工人的颂诗《专制者的假面游行》中的诗句：“像睡醒的雄狮一样站起来……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听众报以热烈的回应。⁽⁵⁴⁾

恩格斯后来写道：“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到这种觉醒的日子，那该有多好。……我昂首走下了那辆旧货车。”⁽⁵⁵⁾

恩格斯清楚地知道，这个新近壮大的群体首次品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如不加以引导，将会变得不顾一切。“他们之中很多人只有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意图，可是大家知道，这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⁵⁶⁾他告诉李卜克内西说，“如果他们连新教徒的那种热忱也没有，那倒是怪事。”他告诉一名荷兰伙伴说，《资本论》第三卷是他良心上的一个沉重负担，因为他必须彻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但这还需要很多工作。“有些篇章的情况是，不作仔细校订和局部的调整，就不能发表，而您知道，对于这样的巨著，我只能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这样做。”因为马克思的名义，他不能出任何差错。⁽⁵⁷⁾

2 月德国选举和 5 月工人热潮过后，恩格斯终于能够专心于自己的工作。这部分要归功于琳蘅，恩格斯后来说：“如果说马克思能够长年地安静工作，而我能够在这七年也能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⁵⁸⁾琳蘅和恩格斯从 1845 年起就是相互信任的朋友，他们甚至像是彼此的家人。他们在各方面都很相像：从对细节的讲究到喜欢喝酒和

找乐子，而且她非常清楚恩格斯如何才能安静地工作。到 1890 年，戴着标志性的亚麻帽和金圈耳环的琳蕙指挥着家里的仆人，成为了马克思一家的女家长。劳拉搬去巴黎东郊勒－佩勒的新家时，琳蕙赶去法国帮她。⁽⁵⁹⁾杜西和艾威林为保卫艾威林的名誉而战时，她面对党内的女人像恩格斯面对党内的男人一样言辞凶狠。⁽⁶⁰⁾她和蔼地打开恩格斯在摄政公园附近住处的大门，迎进来自世界各地的刺客、革命者、政治家和报人。⁽⁶¹⁾他们谈论的是政治，但如果哪位客人想要唱歌，也尽可随意，而且波尔多酒管够。伯恩斯坦说，成为恩格斯的客人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需要“在思维上有意义”。⁽⁶²⁾在琳蕙的指挥下，恩格斯家的圣诞庆祝美妙如传奇一般。屋里摆满庆祝圣诞的绿色植物，榲寄生树摆放的位置很巧妙，每个人经过时都能收到一个吻，桌上摆满食物。琳蕙最拿手的乾果布丁（她也寄去给德国和法国的朋友）是压轴的甜品。伯恩斯坦回忆说恩格斯喜欢先把灯都熄灭，等浸在朗姆酒里的布丁端上来之后，再点着灯，听大家操着各种语言发出欢呼声。⁽⁶³⁾

1890 年，琳蕙已经 70 岁了，她像恩格斯一样，行动开始迟缓。10 月时，她有些肝病的迹象。⁽⁶⁴⁾11 月初，恩格斯担忧地给拉法格写信说，琳蕙出现了大出血。医生搞不清问题所在，琳蕙又不肯让医生检查。恩格斯找来的另一名医生说，她得的可能是败血症。⁽⁶⁵⁾两天后的 11 月 4 日，琳蕙去世。站在她床边送别她的包括恩格斯、杜西、艾威林和两个仆人。⁽⁶⁶⁾

恩格斯通知亲戚朋友，“善良的、亲爱的、忠实的琳蕙”去世了，他以一种莉齐·白恩士去世时都没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损失的深切悲伤。⁽⁶⁷⁾“我同她在这个房子里一起度过了幸福的七年，”他告诉纽约的一个朋友说，“我们是最后两个 1848 年前的老战士。现在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还不知道现在我将怎样。”⁽⁶⁸⁾

49 第二代革命者



这些统治者是多么愚蠢啊！他们指望用镇压的办法就能把我们这样的运动压下去。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11月7日，琳蕙葬在海格特公墓，与马克思、燕妮和他们的外孙哈里葬在了一起。恩格斯致悼词时眼含泪水，在描述她的一生时，心里肯定想着她为马克思和燕妮做出的牺牲：和他们共担穷苦。^[2]“我们知道她对马克思和他的家庭的意义，虽然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恩格斯对前来送别的人群说。^[3]说到自己，恩格斯说：“我的家里有过阳光，但现在只有黑暗了。”

琳蕙生前和死后都在保护身边的人，恩格斯对她也是如此。琳蕙在德国还健在的最亲的亲人是她的小侄子，恩格斯写信告诉他琳蕙的遗嘱。

恩格斯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战友觉得应该有自己人承担起琳蕙的职责，保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4]奥地利社会民主派领袖维克多·阿德勒很快写信给恩格斯，推荐了考茨基的前妻路易丝。^[5]1885年，路易丝同丈夫一起从维也纳到伦敦时25岁，恩格斯见到了她，称她是“可爱的小身体”，这句话在19世纪的意思是“可爱娇小的某个人”。^[6]路易丝和卡尔·考茨基住在伦敦时经常来恩格斯家，在1888年回到维也纳后，考茨基向她提出离婚。他们之间的肥皂剧让德国、法国以及伦

敦的社会主义者看了好几个月的热闹。卡尔·考茨基爱上了一个来自阿尔卑斯山下萨尔兹堡的年轻女人，而这个女人5天后就抛弃了他，跟他的兄弟在一起了。恩格斯对考茨基想要离开路易丝感到震惊，让他同样震惊的是路易丝的“英勇”回应：她指责考茨基的朋友对他不公！考茨基的恋人与他的兄弟订婚后，他和路易丝尝试修复关系，但直到1890年也没能达成和解。^[7]

让这个非凡的女人来伦敦照顾自己的想法很快萌生，琳蕻去世5天后，恩格斯写信向路易丝提出邀请：

.....

在此以后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啊，当时我感到生活是多么空虚，多么孤单，而现在生活还是这样——我都无法向你形容。于是我面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往后怎么办？亲爱的路易丝，在我面前，日日夜夜都有一个生气勃勃的、使人高兴的形象——这就是你……

如果我这个幻想没有可能实现（这是我所担心的），或者您认为这给您带来的不便或不愉快多于好处和快乐，那么就请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过于喜爱您，不希望您为我做出什么牺牲……您还年轻，有着美好的前途。我再过三个星期就满七十岁了，毕竟活不了太长了。

.....

他在信尾署名“永远爱您的恩格斯”。^[8]

6天后，30岁的路易丝·考茨基踏上前往伦敦的旅途，去担当恩格斯家的管理者。^[9]艾威林本应寄给维克多·阿德勒一张10英镑的支票，由他交给路易丝，让她在旅途中使用。^[10]但艾威林的支票无法承兑；恩格斯显然给了艾威林10英镑现金，但被他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恩格斯向阿德勒致歉，承担了支票和产生的其他费用。说到艾威林，他写道：“这是艾威林名士派的马虎作风。”恩格斯承诺，会对他“狠狠地批一下”。^[11]

路易丝的问题解决后，恩格斯在11月28日庆祝了自己的70岁生日。虽然恩格斯说，路易丝来到后“家里又有了生气”，但琳蕻去世的

阴影仍旧笼罩着他家。（他告诉纽约的一个朋友说：“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考茨基同她离婚，大概是失去了理智。”）^[12]恩格斯本不想大张旗鼓地庆祝，但世界各地都寄来了贺信。他告诉巴黎的一个朋友说：“由于我比别人活得多，命运要我享受我已故的同辈，主要是马克思的工作所应得的荣誉。请您相信，对于这一点以及这一荣誉中属于我个人的微小的一部分，我不抱非分的想法。”恩格斯虽然没有大肆庆祝的心思，但从欧洲各地赶来的朋友都在期待一场盛会，恩格斯不能不领他们的好意。^[13]庆祝一直持续到夜里三点半，欢庆的人们喝了红酒和16瓶香槟酒，吃了12打蚝。他告诉劳拉说：“我尽力向人们展示自己还是那样生气勃勃。”^[14]

巴黎大会后，工人的力量通过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壮大，催生了众多会议。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所谓的马克思派”）在1890年秋在法国里尔召开了一次大会。杜西和艾威林参加了大会，让杜西感到诧异的是，会场里拉着一面横幅，写着“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为主席”。^[15]她本来以为，自己只是普通的与会者，但由于她在欧洲工人中的新地位，她被确认为这次会议的领袖。其间，杜西和3名法国伙伴从里尔出发，去柏林西南方向的哈雷参加德国党举行的会议。会上，新老派别出现了冲突，但杜西依然是会议的明星，她告诉留在法国的艾威林说：“所有的人都在询问我，尤其是柏林人。”^[16]两场大会都赞成再次组织五一游行并召开国际工人大会——1891年8月在布鲁塞尔进行。可以想象，各组织立刻开始抢夺阵地，都想成为所在国家的工人党。^[17]

1891年4月初，拉法格（他的工人党正在与龙格所在的更加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展开争斗）和战友盖得在里尔周围的法国北部工业区展开演讲之旅。他们在3天内到达3座小城（威涅海斯、富尔米和阿诺尔），在每处都绘声绘色地描述工人如何被剥削以及被资产阶级背叛。^[18]他们简直是在向唱诗班布道：听众并不需要两个巴黎人来讲述自己的苦难，但他们的演讲还是让各省工人感到温暖，他们的听众在增加。^[19]拉法格的措辞绝不温和：“今天，资产阶级必须受到谴责；它必须消失；它的坟墓已经掘好；现在只需要把它推进去。”^[20]一家社会主义报纸描述了他引起的骚动：“工厂里、餐馆里，到处都在谈论社会主义。……

雇主们已经对这样的煽动感到焦急，都在询问该怎样加以抑制。”拉法格相信这些工人会在5月1日向世界证明他们已经与战友们联合到了一起。⁽²¹⁾

但当5月1日到来时，富尔米1500名纺织工人参加的和平抗议走向了骚乱。工人游行到镇政府提出诉求，沿途受到两个步兵连和警察的严密监控。到了晚上，抗议者点燃火把，在摇曳的光线中变得越来越焦躁，有些人被捕。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要求警察释放他们，但遭到拒绝。有人开始扔石头，装备着全新“勒贝尔”步枪的士兵冲上去保护警察。在黑暗和混乱中，指挥官命令士兵开枪。有的士兵对着高空鸣枪，但有的不是：枪声持续了整整4分钟，结果10人被杀，近60人受伤。死者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²²⁾

拉法格在《社会主义者报》上说，这次事件清楚地表明军队效忠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而非人民。⁽²³⁾罢工开始在北方各个工业省蔓延，更多的军队开始进驻，局势一触即发。政府将混乱归咎于工人党，他们指控拉法格与一个名叫伊波利特·居林的工人党地方领袖煽动了北方工人情绪。⁽²⁴⁾一番调查之后，拉法格在7月被起诉煽动谋杀。⁽²⁵⁾他被指控向新兵演讲说：“如果你被命令开火，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应该调转枪口，然后开火。”拉法格否认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自己是彻底的理论者，不会鼓动这样的暴力行为。⁽²⁶⁾但是，他的辩词无关紧要；整个审判就是一场闹剧。4名控方证人都来自富尔米面粉厂管理层，在证词中全都重复着几乎一样的话。其中还有一个偷看藏在帽子里的纸条。辩方则提供了210名当时在场的听众的证词，证明说这句话挑动士兵叛变的另有其人。⁽²⁷⁾但由企业主、地主和商人组成的陪审团只用5分钟便得出了判决结果。拉法格被判入狱一年，必须在1891年7月30日到圣佩拉热监狱服刑。⁽²⁸⁾

在这之间，拉法格又踏上了演讲之旅，他向深知自己被冤枉的众多听众发表演说。他写信给恩格斯说：“会场挤得满满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热情洋溢的集会，要是当时举行选举，我们两人准能在诺尔省当选。”⁽²⁹⁾他在北方省是代替工人受难的人，回到巴黎去监狱报到时，他已经声名远扬。拉法格心情很好，他带着行李箱、手稿和澡盆搬进了圣佩拉热。⁽³⁰⁾一个月后，一个来自里尔的下议院议员突然死亡，这让他

更加高兴。他参加了为此举行的特别选举。⁽³¹⁾ 作为一名囚犯，他可以参加竞选，但不能出去做宣传。被关在监狱里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关键：他之前在外面参选全部落败。演讲大师盖得代替他进行竞选，38天内举行了34场集会。⁽³²⁾ 10月25日是竞选日，拉法格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数在5名候选人中位列第一，他又在第二轮选举中击败了对手。⁽³³⁾（恩格斯是通过伦敦《每日新闻》知道他获胜的：消息不长，只有一段。）⁽³⁴⁾

劳拉终于可以为丈夫感到自豪了。她告诉恩格斯说，报上刊登的保尔的一幅肖像画让他看起来“差不多与当年向卡卡杜求爱时一样年轻和窘态百出。……这里的报纸和政界已经陷入从未见过的混乱之中。……我们的人民高兴得不得了。长期以来，他们虽不甘忍受那种残酷的命运，可是也习以为常了，因此丝毫没能指望这么好的结果。”⁽³⁵⁾ 11月10日，拉法格被释放，他在履行公职期间获得了自由。⁽³⁶⁾

7天后，劳拉和拉法格到各个城市庆祝。第一个庆祝的地方自然是巴黎，工人党的朋友们为他们举办了一场舞会，一直持续到夜里两点。⁽³⁷⁾ 第二天，他们到了拉法格的新选区里尔，选民们兴奋得把拉法格抬在肩膀上。劳拉告诉恩格斯说：“而我呢，有一大群妇女围住了我，两侧各有一个挟着我，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跟在后面，她们差点把我从地上架了起来。”他们来到拉法格在里尔的正式居所（实际上属于一个朋友）后，却被告知有数百人聚集在附近的大厅等着听保尔演讲：⁽³⁸⁾

.....

八点钟，我们动身到即将召开大会的斯卡拉剧院。我们总算从侧门进了剧院，一走进大厅，我就见到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场面。大厅里拥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楼厢里已经装不下任何人，却还有数百男男女女拼命想挤进来，刚刚关上的几扇门又被撞开了，另一座楼厢（因修理而关闭）在几秒钟之内也被蜂拥而入的人群挤得没了一点空隙。⁽³⁹⁾

.....

劳拉说，人群压断了板凳，挤碎了几扇窗户。保尔终于发表了演说，

但听众要求他继续讲，否则不肯离开大厅。“保尔的脸上都淌下了汗水，他一只手抱着一大束花，另一只手挽着他的妻子。我相信他当时肯定担心我们会被挤垮，因为我们不断被他的热情高涨的选民又是挤又是压地拥着往前走，他则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外面街道上，疯狂仍在继续：男孩子、妇女和女孩子都在高呼“拉法格万岁！”等他们终于回到“家”，拉法格又发表了一次演说，才让人群满意。一个妇女告诉劳拉说：“如果拉法格的当选资格被取消，里尔肯定会爆发一场革命。”

劳拉数年来一直被失望包围，看着丈夫不断尝试经商、写作、直至竞选公职，却屡屡失败，以至于命运此次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让她感觉美好得不像是真的。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很快有人质疑拉法格获胜的资格，因为他出生在古巴，所以不是法国人。拉法格激烈地证明自己的法国血统和国籍，并在此过程中与恩格斯爆发了冲突。据路透社报道，拉法格在一次演讲中为了证明自己的“法国性”，说自己在法普战争中虽然没有加入军队作战，但也尽到了爱国责任，他把从国际工人协会普鲁士会员（其中有些人是军官）口中了解到的情报秘密通知了法国政府。如果拉法格真的说了这个话，他等于是说协会中的普鲁士会员叛国。恩格斯被吓坏了，因为这样的说法很可能被德国政府用作镇压社会主义者的借口。他立刻写信给劳拉，要求得到一个说法。

劳拉很受打击。自己刚刚因为保尔取得的胜利而高兴了一下，便被恩格斯用刺耳的责备和斥责击个粉碎。她马上回了信：

.....

如果我不是从信的字面上、而是从精神上来回复您，还要请您原谅。还要请求您原谅我说上一句：我认为此信的精神绝对不能证明是正确的。您仅仅根据一则路透社电讯，就以一种我确信是不应该有的方式责怪保尔。我相信，我和保尔自从来到这个国家，为了支持、甚至是开创国际主义的事业（这首先意味着法国和德国的团结），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也饱尝了辛酸，理应不会受到这一类指责了。如果保尔在公务和政务方面，不是光明磊落的话，那我也不会在这儿和他生活在一起了，因为他的缺点已经够多了！请原谅我告诉您，您的来信使我因为保尔当选而感

受到的短暂快乐变得索然无味。⁽⁴⁰⁾

.....

拉法格向恩格斯解释说，自己没有把国际工人协会普鲁士会员牵扯入叛国行为，恩格斯接受了他的解释，他们之间的裂缝得到了修补。⁽⁴¹⁾ 保尔的当选也得到了认可，他可以作为法国人行使公职。但不会再有庆祝了，拉法格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说便蒙受了羞辱。

12月8日，下议院会议上，当他提出要说话时，所有目光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他提议赦免所有政治犯，还极为天真地遍数社会主义的好处，号召由富人主导的下议院其他议员与自己一同拥护工人阶级。接下来，他又表现出想要支持保守天主教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并质疑左派提出的政教分离的主张，使得原本有可能支持他的左派对他大为不满。⁽⁴²⁾

从拉法格开始讲话，他的庄严的同事们就在低语。随着跨越各个政治派别的立法议员相互撞擦着侮辱这位突然变成议员的同事，低语变成了激烈的质问。议会里一片混乱，拉法格则一边漫无边际地演说，一边与质问的人比嗓门，直到坐在议长席上的激进的副议长夏尔·弗洛凯（拉法格说他坐在议长席上从背后指摘自己）让他说重点。⁽⁴³⁾ 第二天，拉法格向恩格斯描述说，自己的演说像一枚“重磅炸弹”，把一切都“炸垮”了。炸弹倒是真的，却不是他说的那个意思。⁽⁴⁴⁾ 甚至他的工人党成员都无法接受他在宗教问题上的看法。羞怒之下，拉法格连续数月没有参加下议院会议，他远离巴黎，踏上了灿烂的演说之旅。⁽⁴⁵⁾

劳拉没有跟着去，因为他们没钱支付她的旅费。法国的这个冬天极为寒冷，她说，自己把父亲留下的一件旧大衣当作毯子盖，才没被冻死在床上。因为选举胜利而兴奋不已的拉法格没有付房租，也没有给劳拉留下钱。⁽⁴⁶⁾ 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女房东已经去找了劳拉好几次，因此希望恩格斯能寄张支票给劳拉。⁽⁴⁷⁾ 恩格斯对于拉法格让事情发展到这样的情况而非常生气。“既然您知道，只要您或者她向我说一声，此事就可以避免，为什么要让劳拉受委屈呢？”⁽⁴⁸⁾

恩格斯的神经可能比较粗大，因为他在这个秋天花费数周时间帮艾威林抵挡一系列新的攻击，在此过程中，他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给各方写

信试图维护艾威林的名声。这让人不禁会想他有没有考虑过把马克思的这两个还活着的女儿关到家里，让她们远离她们的惹是生非（相互争斗）的丈夫。拉法格和艾威林都已人过中年，却全都看不出有能够取得这个年纪的男人应该取得的成就（不管是个人上还是政治上）的样子。

50 恩格斯的遗嘱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利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比起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杜西的职业生活几乎完全聚焦在了工会运动上，艾威林却继续既搞社会主义政治又搞璀璨的戏剧事业。杜西向劳拉描述说，他们的生活“为了挣来一点该死的钱，流了不知多少汗水”。艾威林仍在期待自己的剧本能够上演，但杜西说，最烦恼的是希望这个东西没法付账单。为了能付账单，她买了一台神奇的新机器为一家杂志做“翻译”和“打字”。她说，总之他们的生活就是不停地劳动。“爱德华写各种东西：好的，坏的，无关紧要的。我们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会议和这些工作上。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生有没有任何意义。”^[2]1891年8月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前，杜西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大。^[3]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在内的超过330名欧洲和美国代表将进行又一回合的社会主义运动控制权争夺。英国社会主义者马上发动了进攻：艾威林的敌人利用他的众多缺点抹黑“马克思派”。^[4]

虽然私人争斗不断，但按照恩格斯所说，布鲁塞尔大会还是使第二国际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代表们接受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的科学

社会主义（重点在工人的需求），而非法国和英国对手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说，这次大会使得第二国际“以旧国际结束的地方为开端”。⁽⁵⁾此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工会和代表工人的无数政党好像都发展起来了，他们经过数年辛苦和抵抗已经获得坚实和广泛的成果，他们再也不能接受国王的为所欲为，也不会再在军队面前止步。布鲁塞尔大会批准的决议强调了工会的重要性和全世界工人联合对抗资本主义势力的必要性，因为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开始试图联合对抗工人的工会活动。大会还号召工人利用选票（如果有的话）逼迫政府解决自己的需求。此外，虽然有代表反对，大会还是通过了一项具有争议的决议：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是和平的政党。⁽⁶⁾

1892年证明了工人政党的发展是何等迅速。在法国，在拉法格长达4个月远离下议院、到41个城市发表演说的同时，⁽⁷⁾他的工人党在市议会赢得了635个席位，控制了22个地方政府。⁽⁸⁾恩格斯说，德国的进展也很顺利。但创造历史的事件还是发生在英国，1892年的伦敦“五一”游行规模比第一次扩大了一倍，60万人涌入了海德公园。看到如此庞大的人群，恩格斯说：“很快我们就能强大到足以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战斗。”⁽⁹⁾这位老兵使用的是战争的语言，但他寻求的改变实际上会通过选举实现。⁽¹⁰⁾

7月，3名工人被选入英国国会：领导码头工人罢工的约翰·伯恩在巴特西当选；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家船员和救火员联合会主席J·哈夫洛克·威尔逊在约克郡米德尔斯伯勒当选；10岁起便在矿山工作的35岁的苏格兰人凯尔·哈迪在伦敦东区西南哈姆当选。他们代表的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刚刚出现的第三个党派——独立工党。他们以工人为支撑，该党名称里虽然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却以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

过去也曾有过候选人声称代表工人，但他们均出自上层阶级。伯恩说，那些人穿着上等的大衣、戴着精致的链表和丝制高顶帽，一看就知道不是工人，也不可能了解工人的需求——真正的工人每天都不知道能不能让孩子吃饱，能不能有个地方住。但新出现的这些人看起来像像工人。⁽¹¹⁾他们很多人依靠自学，白天在矿山或工厂工作，夜晚学习。凯尔·哈迪走进下议院时，没有挥舞着红旗，而是带着布制的工帽。

1893年1月，120名代表正式组建独立工党，并选出15人委员会负责撰写纲领。委员会成员包括艾威林、哈迪、码头工人罢工中的汤姆·曼、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者和报人H.H. 钱皮恩。^[12]4天后纲领出炉，读起来如马克思起草的一般：集体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流通方式和交易渠道；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禁止使用童工；对非劳动收入征税，以此向病者、老人、寡妇和孤儿提供救助；还包括：一直到大学的免费教育，用仲裁和裁军取代战争。^[13]哈迪被选为主席；该党后来成为英国工党的基石。^[14]恩格斯带着惊讶和赞叹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告诉柏林的倍倍尔说：“工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只要有这个意愿，就能得到一些东西。”^[15]

1893年，选举上的胜利继续在德国出现。共有44名社会民主派候选人被选入国会，党共计获得170万张选票。^[16]这次选举的时间也很巧，几个月后就是计划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三次大会。恩格斯不会参加全部议程，但将作为名誉主席发表闭幕演说。这将是他在1872年以来首次参加国际大会，他可能也觉得这将是自己的最后一次。

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最后一天走进会场的这个人已经不是凡人，他已经成为传奇，他和马克思一起创造了现代社会主义。会场中的大多数面孔在他眼里都很陌生，但他们都认识他。虽然“将军”的胡子已经花白，后背已经稍有弯曲，但当他走进会场，来自18个国家的400名代表起身向他致意，报以雷鸣般的掌声。^[17]他们背后的墙上挂着马克思的画像。恩格斯开始讲话，他指着墙上朋友的肖像说，自己只能“作为肖像挂在那上面的伟人的战友”来接受他们的盛待。接着，他回顾了过往漫长的岁月。“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十年。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个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还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

他描述了国际的发展，认为1893年的国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我们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向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自由联合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联系——这就足以保

证我们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已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了。”^[18]随着恩格斯宣布大会闭幕，兴奋的代表们再次起身欢呼。人群中有人唱起《马赛曲》，熟悉的革命旋律很快在会场中激荡。

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的确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参与其中，没有马克思家人。虽然社会主义政党在法国取得了巨大收获（30个下议院席位，70万张选票），拉法格却由于选区出现了不利于他的变化，在1893年秋天的选举中失去了下议院席位。^[19]（这在恩格斯的意料之中。他早就提醒拉法格，选民需要他在议院为他们工作，而不是在全国各地代表工人党发表演说。^[20]但拉法格认为自己是“在旅程中宣传社会主义”。）^[21]

杜西在伦敦的政治生活也遭受了挫折，她日夜不停，到爱尔兰、苏格兰以及法国和德国，组织工人对付跨国的破坏罢工行为。但她的努力给她赢得的名声都因为与艾威林而黯淡。艾威林在独立工党越来越受到孤立，因为他认为哈迪想成为工人中的“国王”。他还想把其他一些内容（包括废除君主政体）加入党的纲领，而与汤姆·曼产生冲突，最终使得自己更加边缘化。^[22]1894年春天，艾威林被独立工党驱逐。爱德华·伯恩斯坦没有细说，只是在回忆录中说原因已经“足以把他关入监狱”。^[23]

艾威林已经与杜西早期在大英博物馆认识的文艺朋友疏远，现在又与她的工会同事闹翻，但那个说话分量更重、足以左右杜西想法的人仍站在他身边：恩格斯仍没有舍弃艾威林。考虑到他们的关系在1892年经受的考验，恩格斯的忠诚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当时，恩格斯同意由艾威林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德文翻译为英文。^[24]这本书写得清晰、雄辩，完美地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基础，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恩格斯一向追求完美，这次更是要求翻译准确无误。他之前就认为艾威林的《资本论》译稿不合格，这次自然更有理由担心，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两个人约定：恩格斯将对艾威林的译文进行编辑，做出必要的修改，还将写一个序言。但让恩格斯沮丧的是，他收到的不是艾威林的手稿，而是出版商寄来的校样：书马上就要出版了，恩格斯却还没有看过。这

那个时候再进行修改，成本将会很高。艾威林把这归咎于出版商，但从恩格斯写信给艾威林的措辞看，他认为是艾威林违背自己的意愿匆忙把书稿（尚是粗糙的草稿）交去付印了。⁽²⁵⁾艾威林这样的行为显然非常危险，因为恩格斯不仅为他的很多活动提供了资金，而且正是恩格斯的肯定，才使得还有最后几个人肯与他交往。恩格斯只得又一次把其他工作放在一边，集中精力弥补艾威林造成的破坏。

艾威林的戏剧之路也在衰败，在很多人（甚至包括他自己）看来，他根本就不是有才华的剧作家。1893年，杜西告诉劳拉说，他的喜剧《青蛙》首次演出后很快就失败了。“这是我完全能预料的结果，因为那本就不是一出好剧。他自己也知道，却抱有侥幸。”⁽²⁶⁾他的职业前景虽然黯淡了，戏剧对他的个人生活却更加重要。他的社交生活仍然集中在西区的酒馆和餐厅，凭借撰写剧评，他仍能进入剧院，运气好的时候，还能跟制作人一起，或者挎着一位贴心的女演员。

杜西没有抱怨孤单——她没这个时间。由于路易丝·考茨基的存在，杜西觉得自己在恩格斯家受到了排斥。杜西担心恩格斯被路易丝彻底控制了，而路易丝不但没有帮他保护马克思的著述遗产，反而想要窃取。⁽²⁷⁾杜西不知道琳蕙死后不久，倍倍尔和阿德勒就讨论过安排一位党内成员到恩格斯家，保护或者说保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物品。她要是知道，他们既没问过自己也没问过劳拉就做出这样安排，肯定会极为愤怒。在她眼里，马克思的所有书稿只属于他的两个直系后人。

琳蕙的其中一个职责是，帮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留下的数千页手稿和信件。有些信件涉及党的事务，但更多的事关个人隐私。当杜西知道恩格斯认为完全可以让路易丝像以前的琳蕙一样梳理这些信件时，她感到了担忧。更让她担忧的是，路易丝突然嫁给了一个名叫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的维也纳医生，而且两个人打算搬进恩格斯家。⁽²⁸⁾这场婚姻听起来更像是一场生意安排。（路易丝亲口告诉杜西说，直到她决定嫁给弗赖贝格尔那一天，他们一直是“最好的伙伴，但也仅此而已，只是都觉得可以安定下来一起过日子罢了”。）⁽²⁹⁾弗赖贝格尔在1892年来到伦敦，第二年便得到恩格斯的信任，甚至看了恩格斯的遗嘱。弗赖贝格尔是恩格斯的私人医生，在杜西的想象中，这对夫妇显然是要迷惑恩格斯，让恩格斯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杜西向劳拉抱怨说，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

有单独和“将军”见面或说话。^[30]

10年来，恩格斯一直念叨（简直如祷告般）着要完成《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5月，他把最后一部分手稿寄给了出版商。^[31]他还马上把整部著作的印张寄给了圣彼得堡的丹尼尔逊，以便尽快出俄文版。^[32]恩格斯描述说，自己感到难以描述的轻松——不仅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及时。这个月，他写信给纽约的战友说：“前几天我着了凉，这使我确信我毕竟是个老年人了。过去我可以不在乎的病，这次却使我整整一个星期不能工作，而后我又有整整两个星期处在医生的严格监护之下。”他描述说，弗赖贝格尔的医疗措施很让自己烦扰，路易丝也以“两三倍”的警惕看护着自己。^[33]

74岁的恩格斯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衰老，但《资本论》第三卷（以及他仍保持阅读9种语言的报纸）说明他的大脑没有衰老。他从马克思留下的一大堆未完的手稿和笔记中，编辑出一本800页的著作来仔细地剖析垄断资本和世界市场的产生。^[34]这本书记载了被称作股票交易的巨大“骗局”的发展，也描述了掌握着“绝对权力”操纵这一骗局的“新的各种寄生虫”。^[35]第三卷对信贷体系进行了剖析，发现在这种体系下，工资奴隶也变成了债主的奴隶，因为前者的收入总是小于支出。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描述了整个体系会因为资本过度扩张必然带来的利润缩减而消亡。^[36]

终于，《资本论》完成了，恩格斯打算着手给马克思写传记。恩格斯把自己的诸多想法和计划告诉劳拉之后，又说：“我的状况如下：七十四岁，我才开始感觉到它，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四十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四十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七十四岁，那么一切都会很快就绪。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37]

这年夏天，艾威林夫妇和弗赖贝格尔夫妇去巴黎拉法格夫妇家小住。

10月，恩格斯在弗赖贝格尔夫妇的陪同下来到英国海边小城伊斯特勃恩疗养时，出现了轻度中风。他本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但杜西指责路易丝残忍地把消息告诉了等着抢夺马克思和恩格斯遗产的德国社会主义者。11月6日，路易丝和杜西仍未和好。数周前，恩格斯和弗赖贝

格尔夫妇搬去了另一处房子，也在摄政公园路上，但更大一些。^[38]这些事情使得杜西觉得，自己被恩格斯抛弃了——这可是最能让她与父亲和父亲的工作产生关联的最亲近的人。

此时，杜西独自在伦敦，因为艾薇林的医生让他出去度假。他受到肾病困扰，去了康沃尔海边的锡利群岛疗养。但从他写给伦敦一家杂志的文章来看，他在旅程中显然并未感受到任何痛苦：他写到自己在沙滩和悬崖上漫步，写到他在从彭赞斯登船后遇到的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我头一天在彭赞斯邮局见过她，我临时发了一封不需要的电报，这样好沾上她的手刚刚碰过的邮票。她非常从容、率直和美丽。”^[39]他这样不合时宜的故事显然会使得这时本就脆弱的杜西更加痛苦，因为这表明了他的生活（即便是想象的）与杜西觉得自己要面对的黑暗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绝望的杜西写信给劳拉说，非常需要她来伦敦。“我无法在一封或者更多信中解释清所有复杂的状况。”杜西说，弗赖贝格尔向伦敦的社会主义者散布谣言说自己 and 艾威林已经“被‘将军’赶走，现在，事情由弗赖贝格尔夫妇负责，一切将会不同”。她指责路易丝在德国散布同样的谣言，还对杜西进行人身攻击。“我觉得可怜的老‘将军’恐怕都没能意识到自己在受人摆布，他现在的状况就像一个小孩落入了一对邪恶的夫妻手里。”杜西说，他们欺负他，不断提醒他有什么事情他已经老到做不了。接下来，她说明了自己的恐惧：万一弗赖贝格尔夫妇被指定为马克思遗著的唯一执行人，因为她记得倍倍尔说过文稿会得到妥善保管。“我应该问一问由谁来妥善保管，”杜西对劳拉说，“如果局外人都知道应该由我们来保管，至于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做，那是我们的事，与其他人无关。”^[40]

劳拉没有回复，这让杜西更加狂乱。11月底，她再次写信，而且是和艾威林（他显然刺激得杜西更加偏执）一起。杜西说，即便弗赖贝格尔夫妇还没有拿到父亲的文稿，也已近在咫尺了，她还引用德国一家报纸关于《资本论》第四卷不会出版的报道作为证据，她认为弗赖贝格尔让恩格斯相信自己的身体条件无法再做这件事情。她再次乞求劳拉赶快来伦敦，艾威林也在后面写道：“快来，快来，快来。你不知道速来的紧迫性。”^[41]

也许，杜西向恩格斯要求看他的遗嘱后，她的心情才会平静下来。恩格斯说得很明确：杜西将拥有她的父亲的所有文稿和信件。⁽⁴²⁾但这恐怕也无法让她平静下来——她好像已经失去了所有理智。的确，这个坚强的女性能够勇敢地直面最粗暴的破坏罢工的人，能够调节尖锐的政治纷争，能够无畏地踏进伦敦东区地狱般的坑洞，现在却失去了与这个她已经认识一生的人沟通的能力。恩格斯却完全不知道她的忧虑，所以当他知道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对劳拉说马克思的所有书稿和信件当然属于她和杜西，不可能属于其他任何人。⁽⁴³⁾

艾威林与恩格斯讨论过遗产问题，给他看了劳拉为此写给杜西的一封信。杜西当时不在场，但弗赖贝格尔夫妇在场，艾威林描述说，弗赖贝格尔夫妇把恩格斯带到一边去讨论这件事。弗赖贝格尔夫妇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据艾威林描述，恩格斯听完后转身回来时，脖子上青筋暴露，大喊说，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在搞阴谋。杜西和劳拉对他的不信任让恩格斯极为愤怒。艾威林自然乞求原谅，说自己只是传话的。⁽⁴⁴⁾

早些时候，恩格斯已经写信给“我亲爱的孩子们”，详细说明自己对属于马克思和自己的书籍做出的安排，以及确保她们和龙格家的孩子都会分到自己的遗产。这封信非常大方、温暖，表明这个一辈子照顾马克思一家的男人在死后会继续照顾她们。⁽⁴⁵⁾恩格斯对杜西如此愤怒，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等着自己死。这自然会让他这样骄傲的人感到恼怒——更让他恼怒的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死亡就要来临。他还有两辈子的工作（他自己的和马克思的）需要完成，但他清楚地知道，他连完成其中一部分的时间都没有了。

51 “将军”逝世



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弗拉基米尔·列宁⁽¹⁾

1895年冬是伦敦有记录以来最为寒冷的冬天之一。从1月到3月，路上结了霜，人踩在上面，咯吱作响，还有凛冽的东北风在肆虐。⁽²⁾ 输水的主管道被冻住，很多地区的运输陷入瘫痪，恩格斯告诉库格曼说，伦敦城回到了原始时代。这样的天气反而适合恩格斯，让他想起普鲁士，他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他待在屋里，靠在大火炉边上，积极地给党内的战友写信，筹划马克思的传记。这是一项会让他享受的事情，他想尽快开始。

同时，恩格斯带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俄国的形势。他频繁地与圣彼得堡和瑞士的盟友通信，也不断有年轻的俄国人（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走进他的家门。其中便包括1878年在圣彼得堡白日里公开刺杀一名高级军官后逃离俄国的斯捷普尼亚克。斯捷普尼亚克言谈温和，举止谦逊，但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恐怖的化身：他认为任何革命男女由于政治活动被杀，战友们都应该用同样的方式为他们报仇。另一个时常登门的是组建了俄国首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杜西把他看作朋友，并把他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翻译成了英文——这是他

的第一部以英文出版的作品。

但恩格斯就俄国问题通信最多的人是尼古拉·丹尼尔逊。丹尼尔逊有时用加密的语言告诉恩格斯俄国的形势发展——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饥荒和城市的工业化已经使不满情绪激增。马克思的思想被年轻一代所吸收，他们一直想推翻沙皇统治，却苦于不知该以何种制度来取代。沙皇已经受到多次刺杀威胁，其中1887年的一次直接导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后改名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被吊死。⁽³⁾

1894年，暴君亚历山大三世死去，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新沙皇试图让经济实现现代化，却不肯结束政治镇压。⁽⁴⁾恩格斯说：“小尼古拉已为我们做了一段工作，使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了。”⁽⁵⁾他写信给丹尼尔逊说：“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您可以相信，俄国也将会是这样。……不管怎样，我相信在俄国培植资本主义的那些保守派，总有一天会对自己所做事的后果感到震惊。”⁽⁶⁾

这一年，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他到1901年才改名列宁）在圣彼得堡加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圈子，并在1895年离开俄国去西欧拜访普列汉诺夫和其他战友（有些奇怪的是，他是极为少数的几个没有去拜访恩格斯的俄国年轻人之一）。⁽⁷⁾他在巴黎见到了拉法格，法国人非常惊讶地了解到，俄国民众不仅读马克思的著作，还能理解他。他告诉乌里扬诺夫说经历了20年的宣传，法国还是没人能理解他岳父的工作。⁽⁸⁾

5月，恩格斯告诉劳拉，颈部的疼痛几乎让他发疯。“情况是这样的：前些时候，我脖子的右侧出现了一个肿块，不久它就扩散了，成为一簇位于深处的由于某种原因凝集而成的腺体。”他打算去伊斯特勃恩，也许是希望（虽然不是真的相信）所有人都认为，有效的海风能对自己有所帮助。弗赖贝格尔夫妇和他一起去，他还坚持让劳拉和拉法格以及杜西和艾威林也加入。⁽⁹⁾同行的还有塞缪尔·穆尔——《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和恩格斯的律师。穆尔是驻扎在非洲的英国殖民官员，休假后回到英国，“将军”让他修改自己的遗嘱，以便让杜西和劳拉对她们父亲的遗著更加安心。⁽¹⁰⁾

恩格斯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知道死亡来临的迹象。他已经几乎无法说话，甚至没有了写字的力气：他写的信越来越短，从通常的好几

页，变成几句话，一句话，甚至只是一个字和自己的署名。7月23日，劳拉从伊斯特勃恩返回法国后。他挣扎着写下四段话：“明天我们要回伦敦。看来我脖子上的这块土豆终于到了紧要关头，脓肿处可以切开，那样就舒服了。终于等到了！”^[11]英国的选举刚刚结束，独立工党和社会主义者遭到彻底失败。凯尔·哈迪也失去了席位，因为他反对国会在约克公爵夫人诞下孩子后向女王致贺，从而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他的理由很简单：国会不肯向一次矿难中死亡的260名工人的家属致以哀悼。^[12]恩格斯在信中告诉劳拉说，自己对结果并不感到吃惊，他和马克思早已预料到社会主义事业的起起伏伏不会少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起起落落。^[13]

恩格斯好像对一切都很乐观，甚至包括他的健康，但穆尔向杜西透露说恩格斯的状况很糟。“还有那么多只有‘将军’一人才能做的工作，”穆尔写道，“他的逝世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对他的朋友们来说也是巨大的不幸。”^[14]

杜西和弗赖贝格尔夫妇之间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因为现在涉及的不仅有马克思的遗著，还有恩格斯的财产。弗赖贝格尔看过恩格斯的遗嘱，知道恩格斯留了一部分遗产给路易丝。

1895年8月4日，杜西跑去恩格斯家。恩格斯已经无法说话。

杜西来见恩格斯的第二天，恩格斯死于喉癌。^[15]

恩格斯的遗嘱放在桌子抽屉里。他没有食言：马克思的所有文稿和信件都留给了遗著执行人杜西；恩格斯家里的家具和物品都留给了路易丝。^[16]他把1000英镑以及自己的所有书籍、信件和文稿留给了德国党。遗产分给了劳拉、杜西、龙格家的孩子、以及路易丝。^[17]恩格斯的遗产共计价值3万英镑左右^[18]（大概相当于今天的480万美元），缴纳过税费和分配之后，杜西和劳拉分别拿到大约5000英镑。^[19]那个时候，她们每年的花费大概在150英镑。

杜西手上的钱已经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但她却失去了其他一切。与姐姐们不同，她一直依赖着恩格斯，把他当作父亲、庇护人、朋友和导师。他是她乱糟糟的生活中不动的磐石，比她的父母还值得信赖。现在，他离开了。^[20]

恩格斯的最后一个遗愿是骨灰葬入大海，不举行公开葬礼。布莱顿

附近的伊斯特勃恩有他最喜欢的海岸，这里的石灰海岬高近 600 英尺，陡峭地扎进下面的海水中。8 月 27 日，杜西和艾威林在老社会主义者列斯纳和新一代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陪同下来到伊斯特勃恩，租下一条船，去送别“将军”。海水翻滚，但他们还是向着英吉利海峡深处前行了大概 6 英里才停下，把装着他们无法忘怀的朋友的骨灰的瓮放入墨黑的海水中。^[21]

列宁后来简单清楚地总结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概况：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22]

像马克思去世后的恩格斯一样，杜西承担起责任，决定尽可能多地出版父亲的著作。她以前的工作安排就很疯狂，现在更是加班加点。她不停地演讲，不演讲时，便写作，不写作时，便参加会议。她好像不敢停下来，生怕自己一停下，就要面对不愿面对的事情。她的生活一直不稳定，但她在这年秋天给自己带来稍许稳定：在伦敦南部锡德纳姆买下一处房子，房子坐落在一条名叫犹太人小径的街道上（位置让杜西很自豪）。^[23]锡德纳姆也是郊区，与梅特兰公园路有些相似，但更偏远，价格也让杜西能够承受。杜西很清楚地知道（虽然艾威林可能不知道）恩格斯留下的钱很快就会花光，而且花完之后再也不会有了。^[24]她很快告诉劳拉说房子虽然是自己买的，但购置家具的钱是艾威林出的。说他之前购置的产业升了值，才让他有了这个能力。很难想象艾威林能拥有产业。^[25]

杜西现在有了一些财产，便在恩格斯死后不久，也写了一份遗嘱。她在遗嘱中把自己的身份定为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她明确把所有财产和对父亲的著作的权益留给艾威林，版税收入留给龙格家的孩子。但在一年后，她修改了遗嘱，把版税收入在艾威林在世时留给他，在他死后，再留给龙格家的孩子。^[26]有人认为，艾威林迫使杜西修改了遗嘱。^[27]这的确很奇怪，她居然推迟把钱给龙格家的孩子，毕竟她和劳拉共同对他们负有责任，而且她一直把自己看作约翰尼的第二个母亲。

龙格家的孩子显然需要帮助，龙格深爱他们，但又实在无法独自养育他们。^[28]在很多方面他很像马克思：热衷政治，在财务上挣扎，但他

身边没有妻子或琳蕙那样的人（更不要说恩格斯）来帮助他。1891年他的母亲死后，他只得依靠劳拉和杜西。劳拉经常照顾燕妮（小名美美），杜西则在约翰尼在伦敦期间以及跟着龙格返回法国之后，一直都在照顾他。^{〔29〕}她知道约翰尼天分不错，但担心他会懒惰。^{〔30〕}约翰尼17岁时便知道自己让姨妈失望了，因为他还没有选定一个职业。杜西建议他学习医学、化学或工程，但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对这些都没有兴趣，恐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31〕}两年后，约翰尼把自己的一篇文章寄给杜西，对此，杜西虽然说“对我的小大人感到自豪”，却对他的未来感到担心。“我不想看到你成为一名报人。……要靠着为报纸写稿活下去，你最终会需要出卖自己的笔，甚至自己的良心。”^{〔32〕}

恩格斯的离世让劳拉和杜西在相互疏远23年后终于开始和解。她们此后的信件不再像之前那样刻意表现出温暖。杜西开玩笑说，劳拉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和写信的天赋，自己则继承了父亲的鼻子。^{〔33〕}杜西在使用恩格斯的钱购置房子时很保守，但劳拉和拉法格没有。他们在巴黎以南20英里外的德拉韦伊买下一处乡村别墅：有30间房间、一间大厅、一间台球室、一间工作室和一间温室，此外还有花园、果园、100只家禽和数十只兔子和绵羊。^{〔34〕}经过数年生活在破产的边沿，已经分别50岁和53岁的劳拉和拉法格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家，体会到了安全感——这，依旧要归功于恩格斯。

拉法格夫妇开始享受田园生活，杜西的生活却愈加复杂。1895年春天，社会主义者举办晚间活动，为即将在1896年夏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募集资金。艾威林组织了这次活动，并把他的独幕剧《火车里》搬上了舞台。^{〔35〕}一个名叫莉莲·理查森的女演员参加了演出，艾威林和她演对手戏。威尔·索恩后来评述说，艾威林与这位理查森小姐变得“非常熟稔”。（社会主义报界的一篇报道说她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上的伴侣。）^{〔36〕}艾威林好像突然又想到伦敦西区去碰碰戏剧的大运。由于从他和杜西居住的地方去城里需要搭火车，他开始长时间不在家里，有时彻夜不回。

杜西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她正忙于工会事务和父亲的遗著。她想看到《资本论》第四卷出版，同时又忙于出版马克思的其它文章选编，比如她把马克思写给《论坛报》的稿件编成了文笔优美的《德国1848年

的革命与反革命》，这是关于那一时期历史的无价记录。数年后，这其中的大多数稿件的作者被确定为恩格斯，而非马克思，但当时的杜西并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个错误。她干劲十足，41岁的她工作起来像恩格斯晚年与时间赛跑时一样拼命。

杜西这期间最亲密的朋友包括劳拉、威尔·索恩夫妇、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以及她儿时起便已认识的忠诚的朋友李卜克内西。⁽³⁷⁾她依赖于李卜克内西的原因可能是他见证过她的童年，因此他也许会在恩格斯离世后承担起照看她的责任。在杜西搬去锡德纳姆的头两年时间里，李卜克内西曾三次从德国来看她。对年已七十的他而言，这样的旅途并不轻松。1896年春天，杜西和李卜克内西把记忆中的地方重走了一遍。他们去了第恩街——她那时还太小，无法记得这里；他们也去了格拉弗顿坊——这里有她青春的记忆。最后，他们来到汉普斯特荒阜附近一家人最喜欢的酒馆，李卜克内西给她讲述那些她烂熟于心却又想重温的故事——儿时的记忆好像成了她生命的支柱。⁽³⁸⁾恩格斯死后，父亲在她心目中又回到了尘世，虽然他在党内成员的心目中依然高高在上。李卜克内西这年出版了对马克思的回忆录。杜西告诉劳拉说，虽然李卜克内西讲的故事很乱，但她不同意考茨基所说的让马克思变回人会损害他的教义。“毕竟，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马克思功成名就，作为普通人的马克思（正是卡尔·考茨基说的那个普通人）生活却没那么如意。”⁽³⁹⁾事实上，她甚至写信给考茨基说，李卜克内西的书只会产生有益的效果，因为“作为普通人的马克思受到了最多误解”。她甚至同意出版马克思的一些私人信件，虽然她深知父亲极为不愿他的“私生活被扯到政治中来”。⁽⁴⁰⁾

到1896年底，杜西好像已经接受了家庭的过去。她心有遗憾和伤疤，但像母亲一样，她在试着接受它们。杜西努力让自己相信，伟大的人也可能有缺点，有缺点的人也值得爱。她父亲如此，艾威林也是如此。⁽⁴¹⁾

52 杜西走上绝路



我并不认为我和你属于那种特别坏的人——但是，我们好像真的在受到惩罚。

——爱琳娜·马克思^[1]

为了给自己要教授的系列科学课筹集资金，艾威林在1月安排演出了自己的一部剧作，和他演对手戏的是一位音乐教师的女儿，名叫伊娃·弗赖伊。这位22岁的女演员，一年前还以莉莲·理查森之名和他同台演出过。^[2]47岁的艾威林，一定为自己还能赢得这个年龄不及自己一半的姑娘的芳心而欢欣鼓舞。他和杜西的生活早已成为一种工作关系，恩格斯逝世，他更轻松自在了。况且，杜西再也不是那个性感苗条的活泼女孩，随着年龄增长，她的身材也在膨胀，看上去，更像她的父亲。如果她曾被形容为美丽，那可能是因为她的内在美。杜西和西区女演员形象大相径庭，而后者显然才是让艾威林心驰神往的。

艾威林将科学课的地点定在戏院区附近，这既为他在城里待到很晚提供了理由，又便于他和伊娃亲近。他一定是被伊娃冲昏了头脑，多年来，艾威林因为经常与女人乱来而声名狼藉，而他对此毫不在乎。但在伊娃身上，艾威林期待的显然不是一时之乐。这可能与他的年龄有关：他可能担心伊娃不久就会厌倦他这个在剧院实际没什么前途的老男人。也可能与他的健康状况有关：他体侧长了个脓疮，两年多了还没好，这

让他很不舒服。

不管什么原因，6月8日艾威林和伊娃在伦敦切尔西结婚了。他在结婚证上的身份是一个名为亚力克·纳尔逊的鳏夫，丝毫未提及仍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妻子爱琳娜。⁽³⁾6月底，艾威林去了圣玛格丽特海湾，他对杜西说是要去海边疗养身体，但其实是他和伊娃的蜜月。⁽⁴⁾大约2周后，艾威林返回了伦敦，和杜西一起搬回犹太人小径。8月，他又走了，而且带走了一切能卖掉的东西，也没给杜西留地址，只说如果杜西需要联系他，可以通过一个演员同事。⁽⁵⁾

可以想象，在艾威林与伊娃结婚和艾威林离开西德纳姆那段时间，艾威林和杜西之间肯定有过争吵。也不难想到，在艾威林的婚外情步入如火如荼的那几个月，他和杜西之间一定剑拔弩张。但对杜西来说，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艾威林会没头没脑地突然离开，她完全不知道原因。她还通过艾威林所说的那名演员，给艾威林写了很多信，但都石沉大海。她知道给艾威林写信是脆弱的做法，“但一个人总不能将14年的生活一笔勾销”。⁽⁶⁾

第二天，杜西收到艾威林的一张便条，说“我已经回来。明天一早应该就能到家”。接着又收到一封电报，“确定一点半到家”。艾威林返家后，杜西说，她丈夫对于她没有跳进他怀里似乎很吃惊。“他没有任何歉辞，也没有任何解释。于是，我对他说……我们必须谈谈公事，而且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所遭受的这些，他对此什么也没说。”9月底，杜西和艾威林去了德拉韦伊，同劳拉和拉法格一起待在他们华丽的新家。劳拉没察觉出任何不对，杜西隐藏了那个夏天的痛苦。

回到伦敦后，杜西立即着手工作，她要代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罢工的机械工联合会工作。这场罢工在她看来丝毫不亚于一场“内战”——她的语言比以往更为激烈，也许正折射出她内心的烦乱。⁽⁷⁾此时，自由劳工协会的创立者威廉·科利森恢复了和杜西的友谊。⁽⁸⁾1890年，杜西在伦敦策划首次五一国际大游行，教授“那个极为出众的男人”威尔·索恩阅读和写字时，便与科利森认识了。科利森形容杜西时，说她没有宗教信仰，但在对待所有事情的态度上都像基督徒。然而，极为悲哀的是，她却找了这样一个男人，“在道德上一无是处……她曾经以贫穷为他的各种缺点做辩解，但在他步入相对富足的阶段后，

那些缺点却更为突出了。他变得令人无法忍受，而她依然忍受着他”。⁽⁹⁾

科利森的协会由没有加入工会的劳工组成，他们经常被企业主用来充当工贼破坏罢工，但因为杜西的缘故，他的工人没有同罢工的机械工做对。⁽¹⁰⁾回想起这一时期和杜西在法院巷（杜西存了父亲的一些文章在这里）附近街道的会面，科利森说：“说实在的，我认为那时她已经死了。她心如死灰，失去了一个女人所有的希望。我们一起站在刮着风的黄昏中，我没怎么说话，但我注意到她渐渐的美丽、无望的眼神、无言的悲痛深深刻在紧闭的嘴角。她似乎还有点紧张，局促地拨弄着脖子上那条毛皮的、或是羽毛的、或是蕾丝的围巾。”⁽¹¹⁾

到第二年1月，虽然收到了来自国外支持罢工的资金，机械工们却投降了，这是杜西的最后一次职业战斗。⁽¹²⁾

到这时，杜西的主要精力都在了艾威林身上，除了体侧的脓疮，艾威林还患上了肺淤血和肺炎。杜西对劳拉说，艾威林现在就像个骷髅架，医生说，一场感冒对他而言都是致命的。杜西希望艾威林能去温暖的海边多晒晒太阳，却没钱陪他一起去，他们从法国返回后的几周里，艾威林的医疗费几乎已经耗尽他们仅有的一点积蓄。⁽¹³⁾萧伯纳说，艾威林又开始耍他的老把戏——借钱然后赖账。但已经有太多人上过他的当，他收到的只有耸肩。⁽¹⁴⁾

1月13日，艾威林独自去了海边。

艾威林回来时，健康状况并不见有大的好转。他经常去伦敦看医生，却不让杜西陪着。（毫无疑问，他会利用间歇去见伊娃。）杜西忧心得不知所措——艾威林的病，还有家里的经济状况。她对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说：“有时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坚持下去！”⁽¹⁵⁾

杜西和一个名叫伊蒂丝·兰开斯特的女社会主义者成了朋友。因为婚外恋，伊蒂丝被倍觉蒙羞的家人送到了一家精神病院。⁽¹⁶⁾（在19世纪，女性要么是父亲的、要么是丈夫的财产；在法律诉讼中，她们的言辞相对他们的来说，也几乎没有分量。）在1898年写给她的一封信中，杜西若有所思地说：“我经常在想，一个人要承担那么多可怕的苦痛怎么还会坚持下去。当然，我不会对可怜的爱德华说这类话，但我经常认为做个了结实在容易得多。我不像你，还有孩子要考虑。”⁽¹⁷⁾

2月，情况更为糟糕。艾威林的医生认为，只有通过手术去除溃烂

的脓疮，他的健康状况才有可能好转。毫无疑问，他应该手术，但手术费用让杜西感到绝望，同时她还有一种模糊的感觉：除了健康状况，艾威林还有更不对劲的地方。^[18]她确定艾威林有事瞒着自己：

有些人缺少某些道德感，就如同许多人遭受耳聋、近视或其他方式的折磨一样。我开始意识到，责备患有这类疾病的人和责备受其他疾病折磨的人同样不公正。我们必须努力去治愈他们，即使没有治愈的可能，也应该尽到最大努力。在长期经历苦痛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这般去理解……所以我正竭尽所能努力承受所有这些考验。^[19]

两天后，她补充说：“有句法国格言说，‘理解就是宽恕’。太多的苦痛已经教会我去理解——然而我已经没有必要去宽恕。我能做的只是爱。”^[20]

2月8日，艾威林住进学院大学附属医院，次日进行手术。杜西在医院附近找了一间房，以便能日夜照顾艾威林。^[21]9天后，医生同意艾威林出院，并建议他去马盖特海岸疗养。这笔费用杜西既无力承担，又无法拒绝。这一次，她陪艾威林一起去了海边。^[22]

从这一时期的信件来看，很多与杜西通信的人都认为，杜西还是往常那个精力旺盛的女人，喜欢讨论政党政治、运动的历史、以及自己的工作。但面对亲密的友人，尤其是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她毫无遮掩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23]在3月1日的信中，她写道：

问题在于，我感觉精疲力竭了，而且经常觉得没有心情写。……对我而言这是非常糟糕的时期，我感觉不到什么希望，痛苦和烦恼却无比巨大。……我准备离开了，而且很乐意这么做。很长时间以来，因为他需要帮助，责任感迫使我留下。唯一对我有帮助的是来自各方的友谊，我无法向你描述不同的人对我有多好。可是为什么呢，我真

的不知道。^[24]

杜西和艾威林 3 月 27 日回到伦敦，4 天后，杜西自杀。^[25]

她的自杀很可能与 3 月 31 日清晨她收到的一封信有关。一位社会主义者同伴说，这封信揭露了某个人（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艾威林）的“极为恶劣的行为”，很可能是告诉杜西艾威林和伊娃结婚的事。^[26]接受验尸官的询问时，艾威林说，当天早上他们并未争吵，女仆也证实了这一点。^[27]但更可能的是，哭闹和生气已经完全没有必要，杜西当即就明白了自己的路在哪里。她曾说，她活着的唯一原因是尽责照顾艾威林。不管信里说了什么，它解除了杜西的这一责任。

当天早上 10 点，杜西派女仆格特鲁德·金特里去找当地的一个药剂师，她给了女仆一张便条和艾威林的一张身份显示为“爱德华·艾威林博士”的名片。便条上说因为要杀死一条狗，需要一些麻醉剂和氢氰酸（现在通常称为氰化物）。金特里带了一个小包裹回来，除了化学药品，里面还有一个需要杜西签名的本子，因为这类化学物质是有限制性规定的，杜西在登记簿上签下了“EM 艾威林”。

杜西让女仆去买毒药时，艾威林还在家，但他在金特里带着小包裹回来之前离开了。他说要去伦敦，尽管头一天他还虚弱得站不起来。杜西让他不要去，但他不予理会。杜西来到楼上，写了三封信，一封写给律师罗斯，她把当天早上收到的那封信和这封信放在了一起。在写给艾威林的信中，她写道：“亲爱的，一切就快结束了。我最后想对你说的，和我在这些漫长和悲伤的岁月里对你说的一样——爱。”^[28]她的最后一封信写给了她的外甥：“我亲爱的约翰尼，这是我最后要对你说的话。尽量做一个像你外祖父那样的人。你的姨妈杜西。”^[29]

金特里再次从药剂师处返回后，去了杜西的房间，发现她脱了衣服躺在床上。杜西还在呼吸，但看起来不太对劲。金特里问杜西是否不舒服，杜西没有回答，于是她跑出去叫了邻居过来。当她再次返回时，杜西已经断气。^[30]

这时，艾威林已经乘火车到了伦敦，一到伦敦，他就直奔社会民主联盟在伦敦的办公室。他和联盟一位成员说了话，确保那位成员留意到

了他来这里的确切时间。^[31]爱德华·伯恩斯坦说，艾威林知道杜西计划自杀，杜西的朋友推测艾威林希望他到联盟的时间被人记住是为了撇清他和杜西自杀之间的关系。^[32]至于艾威林离开社会民主联盟之后去了哪里依然是个谜，但他直到傍晚5点才返回西德纳姆。艾威林到家时，杜西的尸体仍在床上，他立刻搜寻起来，发现了杜西写给他和罗斯的信。他当场就想毁掉这些信，但被在场的验尸官阻止了。^[33]

多年前，在杜西吞服过量鸦片以求解脱时，哈夫洛克·霭理士说，她的朋友们很伤心，但并不意外。到1898年，他们更不觉得意外了。只有两个人对这场悲剧毫无心理准备。一个是李卜克内西，在监狱被关了4个月后，3月中旬才被释放的他无法理解这场悲剧——他既不相信杜西会自杀，也不相信艾威林会驱使她这样做。^[34]另一个是劳拉，尽管她们已经非常亲近，杜西还是没有对她推心置腹。劳拉一直以为，杜西在犹太人小径过得很幸福。听闻杜西的死讯，劳拉伤心欲绝。^[35]毫无疑问，劳拉对此既震惊、又悲痛，可能还有负罪感，由于一个名叫利沙加勒的男人，她和杜西疏远了多年，而这个男人最终同她们的生活并无任何交集。

4月5日，杜西的遗体在滑铁卢内克罗波利斯站火化。来自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和工人党赠送了花圈。两年前，他们也是聚集在这里，为恩格斯的离去悲痛不已，但恩格斯至少活得极为充实又有价值。可杜西不一样，她的死让这些敬重她的人太过心痛，不仅因为她才43岁，正值风华正茂之年，还因为他们无力将她从她所遭受的苦痛中解放出来。在场的有拉法格、约翰尼·龙格、海德门、爱德华·伯恩斯坦、威尔·索恩、以及其他党内和工会朋友。劳拉伤心过度，不愿面对众人，没有到场。^[36]

几个人发表了讲话，艾威林也在其中。一家工人报纸在报道中形容艾威林“没有丝毫感情，讲话和举止如演戏一般”。伯恩斯坦说：“如果不是出于党的利益的考虑，大家会把艾威林撕成碎片。”^[37]伯恩斯坦是代表德国社会主义者发表的讲话，恩格斯去世后，他和妻子同杜西走得尤为亲近。他后来写道，杜西自杀后，他多次因为自责没有将杜西从艾威林的毒害中解救出来而不能入眠。最后是威尔·索恩讲话，一家媒体报道说，这位工人中的巨人泣不成声，很难听清说了些什么。^[38]

杜西被火化前，西德纳姆验尸官办公室针对她的死亡展开了一场调查。这件事在当地报纸上引起广泛关注，报纸打出了“西德纳姆自杀惨案”这样的大标题。艾威林被传去作证，他一副自高自大的样子，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在被问到“死者是你妻子吗”这个问题时，他厚着脸皮回答，“法律意义上还是非法律意义上？”（他选择了后者）。艾威林声称，不确定杜西的年龄；他说，杜西身体非常好，尽管曾几次威胁着要自杀；又说经常听杜西说“让我们一起了结这些苦难吧”这样的话。接着轮到金特里讲述3月31日清早的事件经过。最后，药剂师乔治·埃德加·戴尔也被传来作证，他给了一个未获许可的人毒药，可能招致法律上的麻烦。“我以为艾威林医生（Dr. 既可以指博士也可以指医生）有开药的资格，因此以为给药没有问题。”他把艾威林当成了医生，且以为那张便条出自艾威林之手。⁽³⁹⁾

4月4日，法庭判定杜西是在临时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自杀的。验尸官将杜西自杀当天早上写给艾威林和律师的信一并退还给了艾威林，艾威林把它们销毁了。⁽⁴⁰⁾保尔·拉法格和沙尔·龙格也参与了调查，调查结束后，他们和艾威林一起去了附近一家小酒馆。不知道他们会因为杜西的死而同情艾威林，还是在目睹了艾威林在验尸官面前目空一切的表演后极为憎恶他，唯一清楚的是，龙格和拉法格希望艾威林和他们一起去见杜西的律师，但被艾威林拒绝了。⁽⁴¹⁾次日，艾威林参加了一场足球赛，他的难题暂时都没了。⁽⁴²⁾杜西留给他将近2000英镑现金和价值1400英镑的财产。⁽⁴³⁾他可以整天和年轻漂亮的妻子伊娃待在一起了。

杜西的朋友，只要是了解艾威林的，都瞧不起他，杜西自杀后，他们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伯恩施坦之前就已得知艾威林秘密结婚的事，他认为艾威林对杜西的死负有直接责任，并希望艾威林受到审判。

根据杜西的遗嘱，艾威林获得了马克思著作的所有收益权和版权，他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的英译本——由他和杜西共同编辑而成。⁽⁴⁴⁾在介绍中，艾威林说尽管自己做了大量编辑工作，但“最重要的部分是由名字署在封面上的另一个人完成的”（这个人就是杜西）。接着他开始吹嘘：“我经常自问，怎样的一套书才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众多建议，有人可能会说

第一本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然后就是这本书，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和《学生的马克思》。”艾威林参与了前三本的翻译，编写了第四本。^[45]

但艾威林也时日不多了，8月2日，他死在和伊娃在巴特西居住的公寓的阅读椅上。这年早些时候的病最终要了他的命，伊娃继承了恩格斯的遗产中剩下的852英镑。

李卜克内西在最终确定艾威林是个恶棍之后，宣布杜西将用回原名。她虽然离开了，但在这么多年过后，将再次作为爱琳娜·马克思为人们所知。^[46]

53 拉法格夫妇自杀



男人们战斗着，输了战争，却还是得到他们为此而战的东西，
但到手才发现，原来那并非他们当初所想。

——威廉·莫里斯⁽¹⁾

1910年夏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两个俄国人骑自行车前往拉法格夫妇在德拉韦伊的住处，他们是弗拉基米尔·列宁和他的妻子纳迪娅·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在领导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展开1905俄国起义后，开始流亡巴黎。⁽²⁾1905年1月，恩格斯早已料定的反抗在圣彼得堡首先爆发，导火索是军队向游行工人开火。反抗的火花从一个城市迅速传递到另一个城市，随后传遍了乡村，乡村的怨愤已经积压了半个世纪。反抗的目标不仅包括沙皇和他的政府，还包括那些想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发展俄国经济的企业主。这简直是1848年革命的翻版，只是范围在一国之内。列宁抵达巴黎时，妥协已经达成。立法杜马成立，诸如“宪法”“政党”“工会”之类的词被说来说去，但和西欧国家最初试图摆脱君主专制时碰到的情形一样，杜马缺乏实权，各种改革华而不实。

在巴黎，列宁开始厌烦俄国流亡者圈子里的各种阴谋，转而专注于研究和写作。1895年和拉法格会面时，法国人对于俄国民众阅读且理解马克思的著作颇感意外。1910年，列宁决定再次拜会这位令人敬佩

的前辈。当时拉法格 68 岁，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不要对非社会主义政府表现出任何妥协：社会主义者要么建立自己的政府，要么继续保持对抗（马克思初到伦敦时也这样认为）。⁽³⁾年轻时镇定自若、随和易处的拉法格，在临近 60 岁时思想变得极为坚定，在一次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上，他对一名演讲者发起人身攻击，毫不退让，最后被强行拽到台下。⁽⁴⁾列宁和他类似，也是个不喜欢妥协的人，当他发现拉法格的革命观如此坚定，既吃惊，又满怀喜悦。⁽⁵⁾

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了这次会面：列宁向拉法格讲述自己的理论研究，她则在劳拉的陪同下参观了花园。克鲁普斯卡娅说当时自己一直想着“我和马克思的女儿走在一起”。她近距离端详劳拉，但没发现任何马克思的外貌特征。⁽⁶⁾的确，她在劳拉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晚年的劳拉很迷人，随着年龄增长，她越发优雅起来，尽管有朋友说她看起来比大她 3 岁的拉法格显老一些。⁽⁷⁾劳拉与母亲一样，长期身居幕后，静静地为党工作。⁽⁸⁾1893 年的一件小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劳拉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成了法文（之前也有一位法国作家译过，但译文一团糟）。出版后，恩格斯惊讶地发现，封面上没有劳拉的名字。⁽⁹⁾她对恩格斯说：“是我把自己的名字删掉的，我觉得没必要公开宣传您愿意接受我的译作，对我来说，能通过这种方式为您尽点绵薄之力，我已经心满意足了。”⁽¹⁰⁾

恩格斯对劳拉的写作和翻译才华一直赞赏有加（他多次强调劳拉是巴黎能将马克思的作品译得最好的人），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忙碌的岁月里开始依赖劳拉。⁽¹¹⁾劳拉曾对恩格斯说：“首先我得感谢您想到了我。因为惯于待在幕后，我非常习惯于被忽略和遗忘。但一直以来，您把对摩尔的高贵友谊也延伸到了他的女儿们身上！”⁽¹²⁾在恩格斯去世、杜西自杀后，劳拉依然继续和家庭相关的写作——隐居在德拉韦伊此处没人注意的庄园里。

拉法格也基本淡出了政治圈，他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了法国和西班牙，这是他最重大而持久的贡献。⁽¹³⁾受俄国革命鼓舞，1905 年拉法格短暂参与了一段政治选举，但在选举中碰到艾蒂安·米勒兰这样的强手，他甚至没能进入第一轮投票。拉法格是昔日激进政治的遗物，他的头发同第一次向劳拉求爱时一样浓密，只是现在全白了。⁽¹⁴⁾他的脸紧实、棱角

分明，站姿笔直。他看起来就像一位那种他一辈子都在嘲笑的富有的地主。从外在看，拉法格很像一些社会主义者同伴所谴责的“生活在城堡里的大富豪”，他总是尽量躲开老朋友，因为不想给他们钱。^[15]但这种批评其实不太公道。拉法格和劳拉的热情好客广为人知，他们喜欢邀请在巴黎忙碌的朋友们来乡间聚会或是共度周末。拉法格喜欢席间长谈，尤其是政治话题，而且聊天经常演变成争论。约翰尼的儿子罗贝尔—让·龙格清楚地记得劳拉有次在政治争论中劲头十足地批评保尔，让自己很吃惊。“他每答一句话都要低沉着嗓子来这么一句……‘女人头发长见识短’，这让劳拉很恼火。”^[16]

小燕妮和龙格的孩子和孙子辈经常待在拉法格家，尤其是1903年沙尔·龙格去世之后。小燕妮去世后不久，龙格有过一次简短的浪漫史（让杜西和劳拉很生气），但不曾再婚。龙格为社会主义写作，有段时间曾在巴黎市议会工作。^[17]约翰尼追随父亲和外祖父的足迹，步入政坛，成为法国社会党的领导成员之一。完成了她未能有机会熟悉的母亲的舞台梦，成为一名歌剧演唱家，终身未婚。^[18]外甥和外甥女们让劳拉颇感自豪，但在比利牛斯痛失孩子的悲伤始终萦绕在她心头。长期的痛苦和失望，使她变得迟钝，她开始在酒精中寻求解脱，邻居多次发现她喝醉。^[19]

1911年11月25日，拉法格夫妇到巴黎买了些东西，吃过晚餐，还看了场电影，劳拉给自己买了顶新帽子。他们返回住处时，园丁发现他们似乎特别开心。他们还一起喝过茶，吃了蛋糕。^[20]11月26日清晨，女仆听见拉法格如往常一般拉开房间窗帘，但那之后，就再没了声响。一直到10点，劳拉还没说要吃早饭，女仆心慌意乱，感觉有些不妙，她叫来园丁欧内斯特·杜塞一起奔向拉法格的房间。杜塞敲门，没有应答，他推门进了房间，发现拉法格死在床上，穿着头天晚上去巴黎时穿的晚装。杜塞又来到劳拉的房间，发现劳拉也死了，躺在通往更衣室的门口，穿着睡袍。

杜塞派他的小儿子罗歇冒着凉雨去找市长，市长叫了医生。医生在屋内检查时，警察驻守在拉法格家屋外。检查过后，医生说，看来应该是拉法格头天晚上先给劳拉注射了氰化钾溶液，当天早上又给自己注射了。拉法格就让劳拉的尸体整夜留在地板上。在妻子和自己死亡的间歇，

拉法格有条不紊地回答了第二天定然会出现的疑问，答案就在他的床头柜上。⁽²¹⁾他拟好了一封发给外甥埃德加·龙格的电报，内容如下：“拉法格先生和夫人去世了，速回。园丁杜塞。”他留了一份遗嘱在外面，还有一封写给杜塞的信，告诉他如何分配庄园里的动物和家禽。⁽²²⁾最后，他还留了一份自杀说明：

.....

在心神都很健康的情况下，我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无情的高龄到来之前，在它逐一夺走我的快乐和欣喜、
撕裂我的身体和精神、麻痹我的活力之前。……多年来，
我一直向自己承诺：不要活过 70 岁；我选择了结束此生的
时间，并准备好了结束的方式：注射氰化钾溶液。我是带
着无比的喜悦死去的，因为我确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为
之献身近 45 年的事业将会获得成功。共产主义万岁！国际
社会主义运动万岁！

保尔·拉法格⁽²³⁾

.....

拉法格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一本《希腊罗马名人传》，翻开的书页描述着小加图的死亡：他用佩剑刺伤了自己，为防止医生救他，他又拽出自己的肠子。⁽²⁴⁾

拉法格回答了很多疑问，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没有回答：劳拉是心甘情愿让他注射氰化钾的吗？杜塞的妻子认为他们俩都期盼死亡，如果劳拉没有同意，拉法格就不会执行他的计划。⁽²⁵⁾没人进行调查，答案也无从知晓。有人说拉法格病了，他惯常一年只看两次医生，但从 1911 年 7 月至事发当晚，他每周都去看医生。⁽²⁶⁾还有人说，拉法格夫妇花光了恩格斯和拉法格的母亲（1899 年过世）留给他们的钱，他们不能接受再次陷入贫穷。⁽²⁷⁾

拉法格死时 69 岁，再过 2 个月便是他的 70 岁生日，而劳拉才刚到 66 岁。

对拉法格夫妇的哀悼之辞从世界各地汇集到约翰尼·龙格手里。35 岁的约翰尼现在是马克思家族的族长。

为拉法格和劳拉准备的小型追悼会于1911年11月30日在德拉韦伊举行，12月3日，他们的灵柩随着壮观的送葬队伍穿过巴黎，前往拉雪兹公墓。⁽²⁸⁾街道被红旗淹没，众人的黑丧服使红旗看起来比往日更加鲜亮。演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乐队走在队伍最前端，12点半送葬队伍出发，两小时后才抵达墓地。尽管天空还在下雨，但起初几千人的队伍，在行进途中越变越长。⁽²⁹⁾警察估算送葬队伍共有8500人，但社会主义者估算有20万人。⁽³⁰⁾

法国人、波兰人、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比利时人、荷兰人、还有俄国人（非常多的俄国人）庄重地行进在湿漉漉的大街上，前往公墓——那个犹如死城一般的地方，拉法格和劳拉将在那里被火化。当灰白的烟雾从他们身上腾腾升起，在通往骨灰安置处的台阶上，演讲开始了。这场葬礼似乎不是在祭奠两个人，而是在纪念一个时代，那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时代。新一代领袖们一个接一个登上台阶，讲述着当天被纪念的这对夫妇，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运动。卡尔·考茨基代表德国，凯尔·哈迪代表英国，让·饶勒斯代表法国。⁽³¹⁾一份警察报告提到其中一位演讲者，说“一个身份不明的俄国人”带着恳切的语气对人群说：“战斗吧，一直要战到亡者预见的情景出现——无产阶级获得胜利。”⁽³²⁾

这位演讲者就是弗拉基米尔·列宁，他对聚集的人群说，拉法格象征着两个时代：一个是和工人肩并肩为对付帝国而战的法国革命青年的时代，另一个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向资产阶级开战、为迎接社会主义运动最终胜利做准备的法国无产阶级的时代。“现在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拉法格毕生捍卫的那个事业的胜利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他说，那些受到马克思精神熏陶的人随时准备着建立共产主义制度。⁽³³⁾的确，6年后，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战友夺得政权。

.....
“他达到了一个人能够用文字实现的最高成就。马克思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思想。”

——萧伯纳
.....

致 谢

如果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信件，我肯定写不出马克思一家的故事。为此我欠两个人一笔天大的人情，他们都在莫斯科，一个是我在路透社的前同事安德烈·舒克申，另一个是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担任档案管理员的马克思研究专家瓦莱里·福米乔夫。安德烈提供了开启莫斯科众多大门的钥匙，最重要的一把便是通往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他先和档案馆的福米乔夫博士取得了联系，不久后，福米乔夫博士就慷慨无比地同意安排我查阅数百页马克思家庭成员的信件，且准许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使用其中一些。福米乔夫博士还给了我一项少有的待遇——他让我看了存放在位于档案馆地底深处防弹室中的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他们为我的写作工程献出了宝贵的时间，为了帮助我，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工作都放在了一旁。除了那些信件，在我写作的几年间，他们还充当了顾问的角色；每当我在研究中产生疑惑时，福米乔夫博士总会告诉我他的专业意见。我对他们如此善意和耐心的感激之情实在无以言表。同样，我还想感谢诺拉·莫吉列夫斯卡亚和莫斯科国立社会和政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总是无比大方地备好材料，让我和安德烈一进图书馆，就能直接开始工作。在这座图书馆，我们找到了极为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大推动了我的工程进度。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家庭信件贮藏点位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院，这个卓越机构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值得称赞。几次前来，我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他们的专业、博学和亲切。大批量的资料查找在他们这里毫不困难。我不得不特别提起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尽管很可惜，她现在已经不在这里工作。我在阿姆斯特丹期间，米克·伊泽曼斯不仅为我提供住处（就像她为其他数不清的研究者做的那样），还把我当做

真正的朋友对待。在我返回伦敦期间，米克一次又一次在研究院代我工作——安排获取写作所需的资料、图片，并以她那令人愉悦的、冷静的方式回答问题、找出疑问。在我研究材料期间，她也给了我很多提示，没有这些提示，我可能会漏掉一些重要的故事情节。我对她的感激是无尽的，而且我确信，我绝不是唯一一个对她的热心和援助满怀谢意的人。

还有其他机构为我提供了无价的帮助，譬如伊丽莎白·诺伊以及德国特里尔卡尔·马克思故居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提供的宝贵资料，尤其是那些带有照片和日期的资料，让我得以发现此前的马克思文本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伊丽莎白非常耐心地解答了我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疑惑。她提供的信息使我避开了那些在马克思传记间相互传递的错误；在我卡壳时，她甚至动员她的马克思研究学者圈，帮我解疑答惑。我还要感谢汉堡汉萨自由市国家档案馆以及德绍萨克森-安哈尔特国家档案馆，让我得以接触威斯特华伦家的信件，从而绘制出燕妮与她的兄弟间的更为清晰的关系图。非常感谢这两家机构准许我在书中使用部分信件。

在伦敦，不可不提的是马克思纪念图书馆，这里犹如一家马克思相关物品保管所，并且是一家收藏了众多国际报纸的英国报纸图书馆。最后，我还想感谢大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尽管这家机构现在已迁出马克思曾经常造访的大英博物馆，但它仍是研究者们梦寐以求的地方，这里几乎没有工作人员找不着的东西。肯特郡兰兹格特海事博物馆的迈克尔·亨特让我对那个度假小城在19世纪时的运营方式有了更好的了解，让我可以把马克思一家放在他们最喜欢的海边。

还有几个人对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无比荣幸地享受到一项殊荣：通过电话与身处巴黎的一位马克思的后代讨论马克思家的故事。她便是弗雷德里克·龙格-马克思，她和她的母亲西蒙娜及妹妹安妮一起回答了一些可能只有家庭成员才能回答的问题。我非常感激这三位家庭成员的深刻见解以及她们为此花费的时间。两位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和特雷尔·卡弗——非常热心地解答了我在写作中产生的疑问。这两位学者针对各自著述对象完成的著作一直被认为是标准的传记版本，通过邮件，我从麦克莱伦教授那里获得了与马克思相关的帮助，从卡弗教授那里获得了与恩格斯相关的帮助，这些帮助在他们看来也许是

小事，但对我极为重要，让我无比欣喜。伦敦的戴维·金让我欣赏了他宝贵的马克思照片收藏，还耐心教我如何找到一些更难得的图片。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戴维同意我使用他的一些图片。此外，伦敦还有一个人让我切实体验了马克思生活过的世界。第恩街 28 号的目前所有者萨姆·哈特亲切地带我参观了马克思家原来的居所，使我有机会感受这个家庭在这样逼仄的房间里生活的情景。

尤利亚妮·马茨在这个项目中担任我的远程助手。她不仅处理了大量德语翻译，还在德国发现了一些我没能意识到的档案资料。她非常有才干，有责任心，很大度，不管生活中出现多棘手的事，她从不会把要做的工作扔在一旁。这项工作需要她从英国前往德国、法国及爱尔兰，和她一起工作是件快乐的事。索斯藤·许尔克帮忙翻了一些难度很大的手写信件——其中的挑战不仅在于 19 世纪的语言，还在于很多字迹极难辨认，他在此过程中一丝不苟，是一位极其优秀的翻译。我和让·韦尔梅朗也有紧密的合作，他仔细翻译了几十封手写信件，为我讲解德语中的细微差别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另外几位参与翻译的人员有：英格丽德·蒙巴泽特、朱丽亚·里迪福德、夏洛特·赖兰和路易丝·米勒。我还要感谢尼古拉斯·迪金同意我使用藏于大英图书馆的哈夫洛克·霭理士的著作中的材料。

最后我还想说，没有下面三个人的强烈兴趣，也不会有这本书。他们是来自克内里姆 & 威廉斯公司的吉尔·克内里姆和布雷特内·布卢姆，以及来自利特尔 & 布朗出版社的杰夫·尚德勒。从吉尔获得策划一本以展现马克思家庭生活为主旨的书的机会开始，我的世界开始不一样起来。负责此项目的布雷特内，不仅帮我锤炼构想，还在我准备方案时为我提供了绝佳建议，且在项目始终都给了我出色的引导。可以说，她的帮助已远远超越我们对代理人的预期，这种帮助是无价的。杰夫·尚德勒让这本书鲜活起来。他的建议和疑问，使我所见的马克思家庭成员的故事变得更为清晰，也让我对他们所生活的动荡时代的描写更为贴切。这本书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杰夫始终耐心、亲切友善，不断鼓励我——对一名作家来说，这也许是最重要的。能和这样一位天才的编辑一起工作，我倍感幸运，我要感谢他，是他的帮助让最终的书稿达到了我所期望的目标。我还想感谢利特尔 & 布朗出版社的莉泽·迈耶，正是有了

她的参与，这个项目才能在如此远的距离下顺利展开。

从个人角度，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八年来毫无怨言地容忍我忽略她，把时间花在另一个家庭身上，允许我总是手持电脑出现在她的门口，进门就抢占她的餐桌。至于约翰，我想说，感谢你和我一起加入到马克思家庭的世界里来，帮我撰写、编辑和研究这本书，没有你，我不可能为它坚持如此长的时间。

|| 参考书目

Research Libraries

British Library, London. *George Bernard Shaw Papers, Havelock Ellis papers.*

British Newspaper Library, London.

Freie und Hansestadt Hamburg Kulturbehörde Staatsarchiv (State Archives of the Free and Hanseatic City of Hamburg), Hamburg, Germany. *Hugo Friedrich Beneke Collectio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Museum/Studienzentrum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tudy Center), Karl-Marx-Haus, Trier, Germany.

Gosudarstvennaia Obschestvenno-Politicheskaiia Biblioteka (Socio-Political State Library), Moscow.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Marx/Engels Papers, Eleanor Marx Aveling Papers, Jenny Marx Papers, Laura Lafargue Papers, Paul Lafargue Papers, Jenny Longuet Papers, Charles Longuet Papers, and those of associates of the Marx family.*

Landeshauptarchiv Sachsen-Anhalt Abteilung Dessau (Principal National Archive of Saxony-Anhalt), Dessau, Germany.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Marx Memorial Library, London.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sotsial'no -politicheskoi istorii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Moscow. *Marx/Engels Papers, Jenny Marx Papers, Eleanor Marx Aveling Papers, Laura Marx Lafargue Papers, Paul Lafargue Papers, Charles Longuet Papers, Jenny Marx Longuet Papers, and those of associates of the Marx family.*

Collected Work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s 1–50.* Moscow, London, New York: Progress Publisher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Inc., and Lawrence & Wishart. The English-language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with Volume I in 1975 and ended with Volume 50 in 2004. It includes all Marx and Engels's published writings—among them the first three volumes of *Capital*,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It also includes thirteen volumes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wo men, their associates, and family.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rke, Schriften, Briefe* (known as *MEGA*). Frankfurt, Berlin, Moscow. Publication of this collection of Marx and Engels's writings began in 1927 in Moscow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arx-Engels Institute's founder, David Ryazanov. *MEGA* is an ongoing project involv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is published by Akademie Verlag in Berlin. As of 2008, 55 volumes had been issued. When its projected 114 volumes are finished, *MEGA* will contain the entire body of Marx and Engels's work and correspondence.

Newspapers

The Chicago Tribune

The Coming Nation, Greensburg, Indiana

The Daily Chronicle, London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The Eastern Post, London

The Evening Standard, London

The Guardian, London

Justice, London

The National Reformer, London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The New York Herald

The New York World

Pall Mall Gazette, London

People's Press, London

Public Opinion, London

The Standard, London

The Sydenham Examiner, London

The Times, London

Books and Journals

Ackroyd, Peter. *London: The Biography*. London: Vintage, 2001.

Adelman, Paul. *Gladstone, Disraeli and Later Victorian Politics*. Essex, UK: Longman Group, 1983.

_____. *The Rise of the Labour Party, 1880–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1986.

“Aleph” (pseudonym of William Harvey). *London Scenes and London People*. London: W. H. Collingridge, City Press, 1863.

Amann, Peter. “The Changing Outlines of 18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8, no. 4 (July 1963): 938–953.

_____. “A Journée in the Making: May 15, 184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 no. 1 (March 1970): 42–70.

Andreas, Bert, ed. *Briefe und Dokumente de Familie Marx aus der Jahren, 1862–1873*. Han-nover: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 Band, 1962.

Annenkov, Pavel. *The Extraordinary Decade: Literary Memoi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8.

Aragon, Louis. *The Bells of Base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6.

Aveling, Edward. *The Student's Marx*.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892.

Aveling, Edward, and Eleanor Marx Aveling. *Shelley's Socialism*. London and West Nyack, NY: Journeyman Press, 1975.

_____. *The Woman Question*.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Le Bas & Lowrey, 1886.

_____.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n America*.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Lowrey, 1888.

Avineri, Shlomo. Moses Hess: *Prophet of Communism and Zio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Bakunin, Michael. *Marxism, Freedom & the State*. London: Freedom Press, 1998.

Balzac, Honoré de. *Lost Illusions*. London: Penguin, 1971.

_____. *Old Goriot*. London: Penguin, 2006.

_____. *The Unknown Masterpiece*.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1.

Baughman, John J. "The French Banquet Campaign of 1847–4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1, no. 1 (March 1959): 1–15.

Bax, Ernest Belfort.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of a Mid and Late Victorian*.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Berlin, Isaiah.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_____. *Political Ideas in the Romantic Age*. Princeton, NJ,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_____.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Bernstein, Eduard. *My Years of Exile: Reminiscences of a Socialist*. London: Leonard Parsons, 1921.

Besant, Annie. *Annie Besant: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T. Fischer Unwin, ca. 1893.

Best, Geoffrey. *Mid-Victorian Britain 1851–75*. London: Fontana Press, HarperCollins, 1985.

Black, Clementina. *An Agitato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95.

Blumenberg, Werner.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Bottigelli, Emile, ed. *Lettres et documents de Karl Marx*. Milan: Annali, 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1958.

Breuilly, John. *Austria, Prussia and Germany, 1806–1871*.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2002.

_____. ed. *19th-Century Germany: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18*. London: Edward Arnold, 2001.

Briggs, Asa, and John Callow. *Marx in Lond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008.

Brophy, James M.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Rhineland, 18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uchanan-Gould, Vera. *Not Without Hono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Olive Schreiner*. London: Gould Hutchinson, 1949.

Burn, W. L. *The Age of Equipoise*. New York: Norton, 1965.

Carr, E. H. *Michael Bakunin*. London: Macmillan, 1937.

Carver, Terrell. *Engel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_____. *Friedrich Engels: 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 St. Martin's, 1990.

Caygill, Marjorie. *The British Museum Reading Room*.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0.

Chancellor, E. Beresford. *The West End of Yesterday & Today*.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26.

Chernaik, Judith. *The Daughter: A Novel Based on the Life of Eleanor Marx*.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 Clark, T. J. *The Absolute Bourgeois: Artis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48–18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 Clayton, Joseph.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Great Britain, 1884–1924*. London: Faber & Gwyer, 1926.
- Clough, Arthur Hugh, ed. *Plutarch's Lives*, vol. 2.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1. Cole, G. D. H., and Raymond Postgate. *The British Common People 1746–1946*. London: University Paperbacks, Methuen, 1961.
- Collison, William. *The Apostle of Free Labour: The Life Story of William Collison*.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Paternoster House, 1913.
- Cowen, Anne, and Roger Cowen. *Victorian Jews Through British Eyes*. Oxford: The Littm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Davies, Norman.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Pimlico, Random House, 1997.
- Derfler, Leslie. *Paul Lafargue and the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1882–1911*.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_____. *Paul Lafargue and the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842–1882*.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Donelson, Andrew Jackson. "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Berlin on the Revolution of March, 18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3 (October 1917–July 1918): 355–371.
- Dornemann, Luise. *Jenny Marx: Der Lebensweg einer Sozialistin*. Berlin: Dietz, 1971.
- Draper, Hal.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1, *State and Bureaucracy*.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 Draper, Hal, and E. Haberkern.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5, *War & Revolution*. Alameda, CA: Center for Socialist History, 2005.
- Draznin, Yaffa Claire, ed. *My Other Self: The Letters of Olive Schreiner and Havelock Ellis, 1884–1920*. New York: Peter Lang, 1992.
- Eckert, Georg,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mit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The Hague: Monitor, 1963.
- Ellis, Havelock. "Havelock Ellis on Eleanor Marx." *Adelphi*. London: September/October 1935.
- _____. *My Life: Autobiography of Havelock Elli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9.
- Engels, Friedrich.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_____. *The Fourteenth of March 1883: Friedrich Engels on the Death of Karl Marx*. London: Martin Lawrence, 1933.
- Engels, Friedrich, Paul Lafargue, and Laura Lafargue. *Correspondence*. 3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9–1960.
- Evans, R. J. W., and 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 eds. *The Revolutions in Europe, 1848–49: From Reform to Re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Fejtő, François, ed. *The Opening of an Era: 1848*. New York: University Library, Grosset & Dunlap, 1973.
- Flanders, Judith. *The Victorian House*. London: HarperPerennial, 2003.
- Flaubert, Gustave. *Madame Bovary: Provincial Manners*, Eleanor Marx Aveling, trans. London: Vizetelly, 1886.

- Flourens, Gustave. *Ce qui est possible*.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64.
- Fomičev , Valerij. "Helene Demuth Without Brethren." *Motherland*. Moscow: August 9, 1992, 970–972.
- Frow, Edmund, and Ruth Frow. *Frederick Engels 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Working Class Movement Library, 1995.
- Gildea, Robert. *The Third Republic from 1870–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1988.
- Gilman, S. L. "Karl Marx and the Secret Language of Jews." Vol. 5, *Marx's Life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9.
- Giroud, Françoise. *Jenny Marx, ou la femme du diabl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2.
- Glazier, J. Bruce. *William Morris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London: Thoemmes Press, 1994.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5.
- Halliday, Stephen. *The Great Filth: The War Against Disease in Victorian England*. Stroud, UK: Sutton, 2007.
- Hamerow, Theodore S.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815–187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Hammen, Oscar J. *The Red 48er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9.
- Healey, Edna. *Wives of Fame: Mary Livingstone, Jenny Marx, Emma Darwin*.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86.
-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Abacus, 2004.
- _____.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London: Abacus, 2005.
- _____. *Revolutionaries*. London: Abacus, 2007.
- Hoffmann, Leni, ed. *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 Berlin: Dietz, 1983.
- Horn, Pamela. *Pleasures & Pastimes in Victorian Britain*. Stroud, UK: Sutton Publishing, 1999.
- Horne, Alistair.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don: Phoenix, 2004.
- Hudson, Derek. *Munby, Man of Two Worlds: The Life and Diaries of Arthur J. Munby, 1828–1920*. Boston: Gambit, 1972.
- Hulse, James, W. *Revolutionists in London: A Study of Five Unorthodox Socialis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Hunt, Tristram. *The Frock-Coated Communist: The Revolutionary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2009.
- Jenkins, Mick. *Frederick Engels 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Communist Party, 1951.
- Jones, Peter. *The 1848 Revolu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1992.
- Kapp, Yvonne. *Eleanor Marx*. Vol. I. New York: Pantheon, 1972.
- _____. *Eleanor Marx*. Vol. 2. New York: Pantheon, 1976.
- Kenafick, K. J.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Melbourne, Australia: A. Maller, Excelsior, 1948.
- Kisch, Egon Erwin. *Karl Marx in Karlsbad*. Berlin: Aufbau, 1953.

- Kolakowski, Leszek.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1, The Found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Krosigk, Lutz Graf Schwerin von. *Jenny Marx: Liebe und Leid im Schatten von Karl Marx*. Wuppertal: Verlag Fr. Staats, 1975.
- Lafargue, Paul. *Karl Marx*. New York: Labor News, 1947.
- _____. *The Right to Be Lazy*.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89.
- Lanjalley, Paul, and Paul Corriez.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u 18 Mars*. Boston: Adamant Media, 2006.
- Laurence, A. E., and A. N. Insole. *Prometheus Bound: Karl Marx on the Isle of Wight*. Isle of Wight, UK: Crossprint, 1981.
- Lea, F. A. *Shelley and the Romantic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45.
- Lenin, Vladimir. *Collected Works*, vol. 17.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 Liebknecht, Wilhelm. *Karl Marx: Biographical Memoirs*. London: Journeyman Press, 1975.
- Lissagaray, Prosper. *History of the Commune of 1871*, Eleanor Marx Aveling, trans. London: Reeves & Turner, 1886.
- Longuet, Robert-Jean. *Karl Marx: Mon Arrière- Grand-Père*. Paris: Editions Stock, 1977.
- Macdonnell, John. "Karl Marx and German Socialism." *Fortnightly Review*, London, March 1, 1875.
- Macé, Jacques. *Paul et Laura Lafargue: Du droit à la paresse au droit de choisir sa mort*. Paris: L'Harmattan, 2001.
- Maenchen-Helfen, J. Otto, and B. I. Nicolaievsky. *Karl und Jenny Marx: Ein Lebensweg*. Berlin: Verlag der Bücherkreis, 1933.
- Marx, Karl. *Value, Price and Profit*, Eleanor Marx Aveling, ed.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898.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awrence & Wishart, 1971.
- _____. *Letters to Americans, 1848–189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3.
- Marx, Karl, Jenny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Paris: Editions Social, 1971.
- Mayer, Gustav. *Friedrich Engels: A Biograph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6.
- _____. "Letters of Karl Marx to Karl Blind."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ocial History* 4 (1939): 154–155.
- _____. "Neu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10 (1922): 54–66.
- Mayhew, Henry.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London: Penguin, 1985.
- McLellan, David. *Karl Marx: A Biograph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_____. ed. *Karl Marx: Interviews & Recollec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1.
- Mehring, Franz. *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 Meier, Olga, Michèle Perrot, and Michel Trebitsch, eds. *The Daughters of Karl Marx: Family Correspondence 1866–1898*.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 Miliband, Ralph, and John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1976.
- Morgan, Kenneth. *The Birth of Industrial Britain: Social Change 1750–1850*. Harlow,

UK: Pearson Longman, 2004.

Morris, May. *William Morris: Artist, Writer, Socialist*. Vol. 2.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1936.

Morton, Grenfell. *Home Rule and the Irish Question*. Essex, UK: Longman Group, 1980.

Murger, Henry. *Bohemians of the Latin Quarter*. Charleston, SC: BiblioBazaar, 2007.

Nicolaievsky, Boris.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1847–185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1, pt. 2, 1956.

Nicolaievsky, Boris, and Otto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J. B. Lippincott, 1936.

O'Boyle, Lenore. "The Democratic Left in Germany, 184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3, no. 4 (1961): 379–380.

_____. "The Problem of an Excess of Educated Men in Western Europe, 1800–1850."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 no. 4 (December 1970): 476–477.

O'Donovan Rossa, Jeremiah. *My Years in English Jails: The Brutal Facts*. Tralee, Ireland: Anvil Books, 1967.

Offord, Derek.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Opposition to Autocracy*. Essex, UK: Longman, 1999.

Olsen, Donald J. *The Growth of Victorian London*. London: Peregrine Books, 1979.

Omura, Izumi, Valerij Fomičev, Rolf Hecker, and Shun-ichi Kubo, eds. *Familie Marx privat: Die Foto- und Fragebogen-Alben von Marx' Töchtern Laura und Jenny*. Berlin: Aka-demie, 2005.

O'Neill, Gilda. *The Good Old Days: Poverty, Crime and Terror in Victorian London*. London: Penguin, 2007.

Ozment, Steven. *A Mighty Fortress: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London: Granta, 2006.

Padover, Saul K. *Karl Marx: An Intimate Biograph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0.

Pawel, Ernst. *The Poet Dying: Heinrich Heine's Last Years in Pari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5.

Payne, Howard, and Henry Grosshans. "The Exiled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French Political Police in the 185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8, no. 4 (July 1963): 945–973.

Payne, Robert. *Marx: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8.

_____. ed. *The Unknown Karl Marx*.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1.

Peters, H. F. *Red Jenny: A Life with Karl Marx*. New York: St. Martin's, 1986.

Pike, E. Royston. "Hard Times": *Human Documen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Frederick A. Praeger, 1966.

Plekhanov, Georgy. *Anarch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Twentieth Century Press, 1906.

Pool, Daniel. *What Jane Austen Ate and Charles Dickens Knew: From Fox Hunting to Whist—The Facts of Daily Lif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Porter, Bernard. *The Refugee Question in Mid-Victorian Politics*. Cambridge,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reston, William C. *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 Bath, UK: Cedric Chivers, 1969.

Prolès, Charles. *Les hommes de la révolution de 1871: Gustave Flourens, Insurrection*

- Crétois, 1867–1868, Siège de Paris 1870–71*. Paris: Chamuel, 1898.
- Raddatz, Fritz J. *Karl Marx: A Political Biography*. 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1978.
- Reetz, Jürgen, ed. *Vier Briefe von Jenny Marx aus den Jahren, 1856–1860*. Trier, Germany: Karl-Marx-Haus, 1970.
-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70.
- Rive, Michael, ed. *Olive Schreiner Letters*. Vol. 1, 1871–189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Roberts, J. M. *A History of Europe*. New York: Penguin, 1997.
- Robertson, Priscilla. "Students on the Barricades: Germany and Austria, 1848."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4, no. 2 (June 1969): 375–376.
- Rose, Paul. *The Manchester Martyrs: The Story of a Fenian Traged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0.
- Royle, Edward. *Radical Politics, 1790–1900: Religion and Unbelief*. London: Longman Group, 1971.
- Salt, Henry S. *Company I Have Kep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0.
- Schiller, Friedrich von. *The Robbers*. London: Dodo Press, undated; first published 1781.
- Schröder, Wolfgang, ed. *Sie können sich denken, wie mir oft zu Muthe war: Jenny Marx in Briefen an eine vertraute Freundin*. Leipzig: Verlag für die Frau, 1989.
- Schurz, Carl. *The Reminiscences of Carl Schurz*. Vol. 1, 1829–1852. Boston: Adamant Media, 2006.
- Seigel, Jerrold. *Marx's Fate: The Shape of a Lif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hakespeare, William. *King Lear*. London: Penguin, 2005.
- _____. *Richard III*. London: Penguin, 2005.
- Shaw, George Bernard. *The Doctor's Dilemma*. Teddington, UK: Echo Library, 2006.
- Sheasby, Walt Contreras. "Marx at Karlsbad."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2, no. 3 (September 2001).
- Shelley, Percy Bysshe, *The Daemon of the World and Peter Bell the Third*. London: Dodo Press, undated.
- _____. *The Mask of Anarchy*. London: Reeves and Turner, 1887; New York: AMS Press, 1975.
- _____. *Prometheus Unbound*. Los Angeles: Black Box Press, 2007.
- Sheppard, Francis. *London 1808–1870: The Infernal W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Smethurst, John, Edmund Frow, and Ruth Frow. "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n Manchester, 1842–1844." *Marxism Today*, November 1970, 340–341.
- Smith, Warren Sylvester. *The London Heretics, 1870–1914*. London: Constable, 1967.
- Smith, W. H. C. *Second Empire and Commune: France 1848–1871*.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1985.
- Somerhausen, Luc. *L'Humanisme Agissant de Karl Marx*. Paris: Richard-Masse, 1946.
- Sperber, Jonathan, ed. *Germany, 1800–18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täel, Germaine de. Delphine. 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tearns, Peter. *1848: The Revolutionary Tide in Europe*. New York: Norton, 1974.
- Stepanova, Yelena. *Frederick Enge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8.
- Stewart, William. *J. Keir Hardie: A Biography*. London: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1921.
- Taylor, A. J. P.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1848–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Thomas, Edith. *The Women Incendiaries*.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7.
-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 Thomson, David. *Democracy in France Since 1870*. Lond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Thorne, Will. *My Life's Battles*. London: George Newnes, 1925.
- Tocqueville, Alexis de. *The Recollections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9.
- Tsuzuki, Chushichi. *The Life of Eleanor Marx, 1855–1898: A Socialist Trage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 Washburne, E. B. *Recollections of a Minister to France, Part 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7.
- Webb, Beatrice. *My Apprentice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Weissweiler, Eva. *Tussy Marx: Das Drama der Vätertochter Eine Biographie*. Cologne: Kiepenheuer & Witsch, 2002.
- Wetzel, David. *A Duel of Giants: Bismarck, Napoleon II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1.
- When, Francis. *Karl Marx: A Life*.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1999.
- _____. *Marx's Das Kapital: A Biograph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6.
- Whitridge, Arnold. *Men in Crisis: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9.
- Williamson, D. G. *Bismarck and Germany, 1862–189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1986.
- Wilson, A. N. *The Victorians*. London: Arrow Books, 2003.
- Winder, Robert. *Bloody Foreigners: The Story of Immigration to Britain*. London: Abacus, 2005.
- Wright, D. G. *Democracy and Reform, 1815–1885*. Essex, UK: Longman Group, 1970.
- _____. *Revolution and Terror in France, 1789–1795*. Essex, UK: Longman Group, 1974.
- Zola, Emile. *Germinal*. London: Penguin, 2004.

|| 注 释

In citing works here, short titles have been used, with full title and publishing details given in the Bibliography. Works or institutions frequently cited have been abbreviated as follows:

Dessau—Landeshauptarchiv Sachsen-Anhalt Abteilung Dessau

FE-PL—Friedrich Engels—Paul Lafargue and Laura Lafargue. *Correspondence, Volumes I–III*.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9, 1960.

Hamburg—Freie und Hansestadt Hamburg Kulturbehörde Staatsarchiv IISG—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Amsterdam KMI—McLellan, David (ed.), *Karl Marx, Interviews & Recollec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1.

MECW—*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s 1–50*. Moscow, London, New York: Progress Publisher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nd Lawrence & Wishart, 1975–2004.

MEGA—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rke, Schriften, Brief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27–ongoing.

Moscow—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sotsial'no -politicheskoi istorii, Moscow
REM—*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70.

序幕：1851年，伦敦

[1] MECW, Volume 16, 489.

[2] Henry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167.

[3] MECW, Volume 38, 325; MEGA, III, Band 4, 85–86.

第一部分 马克思和男爵的女儿

1 私定终身

[1] Honoré de Balzac, *Gambara*, 84.

[2] Robert Payne, *Marx: A Biography*, 25.

[3] H. F. Peters, *Red Jenny*, 5.

[4] 历史学家戴维·卡吉尔追溯燕妮的家族史时，认为燕妮一家源自首任阿盖尔伯爵科林，后者同时拥有坎贝尔爵士封号。不过，卡吉尔认为，燕妮一家与阿奇博尔德·阿盖尔并非直系亲属，虽然燕妮一家坚持如此认为。来源：Robert Payne, *Marx*, 26–27, 557.

[5] Peter Stearns, *1848: The Revolutionary Tide in Europe*, 232–233.

[6] Peters, *Red Jenny*, 15, 18;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to Wilhelm von Flourencourt, Nov. 26, 1830, Dessau.

[7] 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8–9, 13.

- [8] E. H. Carr, *Michael Bakunin*, 14.
- [9] Berlin, *Roots of Romanticism*, 70–71.
- [10] Peters, *Red Jenny*, 15.
- [11] Steven Ozment, *A Mighty Fortress*, 157, 159.
- [12]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29–32; Isaiah Berlin, *Political Ideas in the Romantic Age*, 80.
- [13]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35.
- [14] Peters, *Red Jenny*, 1, 8; Robert Payne, *Marx*, 28.
- [15] R. J. W. Evans and 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 (eds.), *The Revolutions in Europe, 1848–49*, 14; Paul Lafargue, *The Right to Be Lazy*, 77–78;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139–140.
- [16]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Recollections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66–67.
- [17]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140;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2–3.
- [18]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146.
- [19] Ozment, *Mighty Fortress*, 169; Carl Schurz, *The Reminiscences of Carl Schurz, Volume I, 1829–1852*, 104–105.
- [20] MECW, Volume 6, 21–22.
- [21] John Breuilly (ed.), *19th-Century Germany*, 113.
- [22] John Breuilly, *Austria, Prussia and Germany, 1806–1871*, 30.
- [23] Theodore S.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34.
- [24] Jerrold Seigel, *Marx's Fate*, 40–41.
- [25] Peters, *Red Jenny*, 15.
- [26] Robert Payne, *Marx*, 23–24.
- [27] Wilhelm Liebknecht, *Karl Marx: Biographical Memoirs*, 65.
- [28] Oscar J. Hammen, *The Red 48ers*, 9.
- [29]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History*, 6.
- [30] *Ibid.*, 6–7;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A Biography*, 2–3; Saul K. Padover, *Karl Marx: An Intimate Biography*, 2–3.
- [31] Blumenberg, *Illustrated*, 7; Jonathan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183.
- [32] 亨利希·马克思接受法律培训的具体情况，以及他成为律师的年份，均无从知晓。来源：McLellan, *Karl Marx*, 4; Berlin, *Karl Marx*, 23; Padover, *Karl Marx*, 4.
- [33] Eleanor Marx to “Comrade,” Oct. 1, 1893, Moscow; Liebknecht, *Karl Marx*, 163.
- [34] Boris Nicolaievsky and Otto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4.
- [35] McLellan, *Karl Marx*, 4; Blumenberg, *Illustrated*, 9; Berlin, *Karl Marx*, 17–2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4.
- [36] Padover, *Karl Marx*, 5–6.
- [37] McLellan, *Karl Marx*, 5; Blumenberg, *Illustrated*, 10; Padover, *Karl Marx*, 18.
- [38] Padover, *Karl Marx*, 17.
- [39] McLellan, *Karl Marx*, 1.

- [40] Berlin, *Karl Marx*, 23.
- [41] Ibid., 21; Padover, *Karl Marx*, 7; S. L. Gilman, “Karl Marx and the Secret Language of Jews,” 31.
- [42] McLellan, *Karl Marx*, 4.
- [43] Blumenberg, *Illustrated*, 13.
- [44] Hammen, *Red 48ers*, 16.
- [45]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150.
- [46] Fritz J. Raddatz, *Karl Marx: A Political Biography*, 11;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3.
- [47] McLellan, *Karl Marx*, 6; Blumenberg, *Illustrated*, 1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9; James M. Brophy,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Rhineland, 1800–1850*, 100–101.
- [48] Hal Draper and E. Haberkern,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V: War & Revolution*, 20.
- [4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8.
- [50] Ernst Pawel, *The Poet Dying*, 8.
- [51] MECW, Volume 1, 4–9.

2 学术与诗歌里的大学时光

- [1] Friedrich von Schiller, *The Robbers*, 14.
- [2] McLellan, *Karl Marx*, 13–14; Padover, *Karl Marx*, 23, 28; Robert Payne, *Karl Marx*, 42, 44; MECW, Volume 1, 689.
- [3] MECW, Volume 1, 646.
- [4] Ibid, 651.
- [5] Ibid, 648.
- [6] MECW, Volume 1, 657–658.
- [7] Françoise Giroud, *Jenny Marx ou la femme du diable*, 33.
- [8] MECW, Volume 1, 698.
- [9] Brophy,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271.
- [10] Giroud, *Femme du diable*, 24;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283.
- [11] MECW, Volume 1, 689.
- [12] Padover, *Karl Marx*, 31.
- [13] McLellan, *Karl Marx*, 15, 1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9; Padover, *Karl Marx*, 32; Robert Payne, *Karl Marx*, 47.
- [14]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150.
- [15] MECW, Volume 1, 688.
- [16] Ibid., 11–21.
- [17] Robert Payne, *Karl Marx*, 49.
- [18] MECW, Volume 1, 18–19.
- [19] MECW, Volume 25, 24.
- [20]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48, 75 ; J. M. Roberts, *A History of Europe*, 327–328;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46, 61, 340.
- [21]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304; Hammen, *Red 48ers*, 18;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33; McLellan, *Karl Marx*, 26.

- [22] MECW, Volume 1, 664–665.
 [23] *Ibid.*, 517–528.
 [24] *Ibid.*, 666–667.
 [25] *Ibid.*, 670–671.
 [26] Franz Mehring, *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 9.
 [27] Hammen, *Red 48ers*, 19–20; Robert Payne, *Karl Marx*, 79.
 [28] Ozment, *Mighty Fortress*, 187;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I, The Founders*, 88; Seigel, *Marx's Fate*, 77.
 [29] KMIR, 3.
 [30] MECW, Volume 1, 674–675.
 [31] *Ibid.*, 686–688.
 [32] *Ibid.*, 691–692.
 [33] Jenny von Westphalen to Karl Marx, after May 10, 1838, Moscow.
 [34]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tudienzentrums, Karl-Marx-Haus, Trier.
 [35] McLellan, *Karl Marx*, 27–28.

3 24岁的《莱茵报》主编

- [1] MECW, Volume 1, 707.
 [2] *Ibid.*, 704.
 [3] Giroud, *Femme du diable*, 38; Peters, Red Jenny, 26; Robert Payne, *Karl Marx*, 89.
 [4] MECW, Volume 1, 696–697.
 [5] *Ibid.*, 698.
 [6] Schurz, *Reminiscences*, 106–107; Hammen, *Red 48ers*, 23; Breuilley, *Austria, Prussia and Germany*, 29, 33.
 [7] Schurz, *Reminiscences*, 106–107.
 [8] Berlin, *Karl Marx*, 47.
 [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41.
 [10] MECW, Volume 1, 379; McLellan, *Karl Marx*, 33; Francis Wheen, *Karl Marx: A Life*, 33.
 [11] MECW, Volume 1, 27–28.
 [12]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41, 47; Mehring, *Karl Marx*, 32; Hammen, *Red 48ers*, 27; McLellan, *Karl Marx*, 42.
 [13] John Breuilley (ed.), *19th-Century Germany*, 99.
 [14] Lenore O'Boyle, "The Democratic Left in Germany, 1848," 379–380.
 [15] *Ibid.*, 379.
 [16] McLellan, *Karl Marx*, 32; Luc Somerhausen, *L'Humanisme Agissant de Karl Marx*, 10.
 [17] Robert-Jean Longuet, *Karl Marx: Mon Arrière-Grand-Père*, 70.
 [18] Padover, *Karl Marx*, 19.
 [19] Karl Marx to Arnold Ruge, May 1843, MEGA, III, Band 1, 48–53.
 [20]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53.
 [21] McLellan, *Karl Marx*, 34.
 [22] MECW, Volume 1, 707.

- [23] Ibid., 709.
- [24] Ibid., 707.
- [25] Giroud, *Femme du diable*, 39–40.
- [26] Jenny von Westphalen to Karl Marx, Sept. 13, 1841, MEGA, III, Band 1, 366–368.
- [27] Longuet, *Karl Marx*, 74; McLellan, *Karl Marx*, 35.
- [28] Padover, *Karl Marx*, 60–61; MECW, Volume 1, 109.
- [29] 根据法律, 检查员可以强迫出版商开除被认定为不可信任的编辑, 即便不开除, 也要有措施防范他们违反相关规定。来源: MECW, Volume 1, 116, 119, 120, 123, 125, 131.
- [30] McLellan, *Karl Marx*, 35; Hammen, *Red 48ers*, 19–20;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193.
- [31] McLellan, *Karl Marx*, 61; Giroud, *Femme du diable*, 45; Peters, *Red Jenny*, 30; Padover, *Karl Marx*, 73; Robert Payne, *Karl Marx*, 89.
- [32] McLellan, *Karl Marx*, 37–38.
- [33] Ibid., 38; Berlin, *Karl Marx*, 54.
- [34] McLellan, *Karl Marx*, 38; Stearns, 1848, 56;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47–48, 50.
- [35] MECW, Volume 11, 8–9;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7, 61–62.
- [36] Padover, *Karl Marx*, 65.
- [37] Brophy,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49, 162.
- [38] MECW, Volume 1, 155, 162.
- [39] KMIR, 2.
- [40] McLellan, *Karl Marx*, 41.
- [41] MECW, Volume 1, 389.
- [42] McLellan, *Karl Marx*, 42–43.
- [43] MECW, Volume 1, 392.
- [44] Ibid., 220.
- [45] KMIR, 3.
- [46] Ibid., 5.
- [47] McLellan, *Karl Marx*, 44.
- [48] Hammen, *Red 48ers*, 28.
- [49] MECW, Volume 1, 394.
- [50] Ibid., 395.
- [51] Izumi Omura, Valerij Fomicev, Rolf Hecker, and Shun-ichi Kubo (eds.), *Familie Marx privat*, 416; Padover, *Karl Marx*, 72.
- [52] MECW, Volume 50, 497.
- [53] McLellan, *Karl Marx*, 46;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51;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17, 19, 47, 52.
- [54] MECW, Volume 1, 234, 254.
- [55] Ibid., 340, 342.
- [56] McLellan, *Karl Marx*, 48–50.
- [57] Peters, *Red Jenny*, 36.

[58] MECW, Volume 1, 396–398; McLellan, *Karl Marx*, 47.

[59] McLellan, *Karl Marx*, 50; Peters, *Red Jenny*, 38; Berlin, *Karl Marx*, 56; Wheen, *Karl Marx*, 12.

[60] Padover, *Karl Marx*, 69; McLellan, *Karl Marx*, 50.

[61] MECW, Volume 1, 397–398.

4 在克罗茨纳赫终成眷属

[1] Pawel, *Poet Dying*, 271.

[2] MECW, Volume 3, 572.

[3] *Ibid.*, 134; Longuet, *Karl Marx*, 82.

[4] MECW, Volume 1, 728.

[5] Longuet, *Karl Marx*, 85; Maenchen-Helfen and Nicolaievsky, *Karl und Jenny Marx: Ein Lebensweg*.

[6] Arnold Ruge to Karl Marx, Aug. 10, 1843, MEGA, III, Band I, 409–410.

[7] McLellan, *Karl Marx*, 61.

[8] MECW, Volume 1, 399.

[9] *Ibid.*, 728.

[10] Berlin, *Roots of Romanticism*, 94.

[11] MECW, Volume 3, 573–574.

[12] Giroud, *Femme du diable*, 52–53; Robert Payne, *Karl Marx*, 92.

[13] MECW, Volume 1, 729.

[14] REM, 279; Padover, *Karl Marx*, 76; McLellan, *Karl Marx*, 62.

[15] Raddatz, *Karl Marx*, 77; Peters, *Red Jenny*, 41.

[16] MECW, Volume 3, 175, 187; Padover, *Karl Marx*, 79; Seigel, *Marx's Fate*, 106–107.

[17] Giroud, *Femme du diable*, 53–54.

[18] Berlin, *Karl Marx*, 59.

[19] Hammen, *Red 48ers*, 24; McLellan, *Karl Marx*, 63–64.

[20] McLellan, *Karl Marx*, 64–65; Breuilly (ed.), *19th-Century Germany*, 46.

[21] Padover, *Karl Marx*, 79.

[22] Karl Marx to Arnold Ruge, Sept. 1843, MEGA, III, Band I, 54–57.

第二部分 流亡的一家

5 巴黎的激情岁月

[1] Karl Marx to Arnold Ruge, Sept. 1843, MEGA, III, Band 1, 54–57.

[2] François Fejtö (ed.), *The Opening of an Era: 1848, 72–75*; Somerhausen, *L'Humanisme*, 51–52, 54.

[3] Edith Thomas, *The Women Incendiaries*, 3; Hammen, *Red 48ers*, 80.

[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66; Pavel Annenkov, *The Extraordinary Decade*, 63.

[5]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75.

[6] KMIR, 7; McLellan, *Karl Marx*, 73.

[7] KMIR, 6–7.

[8] REM, 82.

- [9] Peters, *Red Jenny*, 44–45; Hammen, *Red 48ers*, 64.
- [10] Carr, *Michael Bakunin*, 117; Peters, *Red Jenny*, 45.
- [11]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316–317;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1, State and Bureaucracy*, 136–137.
- [12]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151, 324.
- [13]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Sept. 7, 1895, Moscow;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72.
- [14] Robert Payne, *The Unknown Karl Marx*, 97–100.
- [15] Pawel, *Poet Dying*, 5–7, 13, 68; Robert Payne, *Unknown Marx*, 97–100
- [16]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Sept. 7, 1895, Moscow.
- [17] Hammen, *Red 48ers*, 70–71; McLellan, *Karl Marx*, 73.
- [18] McLellan, *Karl Marx*, 88–8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69; Padover, *Karl Marx*, 87.
- [19] 出自燕妮在 1865 年写的回忆录。回忆录没能完成，只是一些零散的笔记，直到 1965 年才被整理成书出版。来源：KMIR, 19.
- [20] Hammen, *Red 48ers*, 79; McLellan, *Karl Marx*, 89;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6;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70; Mehring, *Karl Marx*, 62.
- [21] McLellan, *Karl Marx*, 88; Mehring, *Karl Marx*, 67.
- [22] McLellan, *Karl Marx*, 80.
- [23] MECW, Volume 3, 187.
- [24] McLellan, *Karl Marx*, 77; MECW, Volume 3, 147–148, 173–174.
- [25] Hammen, *Red 48ers*, 79; McLellan, *Karl Marx*, 90; Raddatz, *Karl Marx*, 47.
- [26] McLellan, *Karl Marx*, 89; Hammen, *Red 48ers*, 79; Padover, *Karl Marx*, 87;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70.
- [27] McLellan, *Karl Marx*, 89; Padover, *Karl Marx*, 87.
- [28] Raddatz, *Karl Marx*, 47.
- [29] KMIR, 8–9.
- [30] MECW, Volume 11, 264–266.
- [31] 马克思家的女儿全都根据母亲的名字，取名“燕妮”，比如燕妮·茉莉亚·爱琳娜和燕妮·劳拉，但只有大女儿使用了“燕妮”这个正式名字，另外两个女儿的正式名字分别是“爱琳娜”和“劳拉”。来源：The other daughters were formally known as Eleanor and Laura. Omura, Fomičev, Hecker, and Kubo (eds.), *Familie Marx privat*, 447.
- [32]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Sept. 7, 1895, Moscow.
- [33] MECW, Volume 1, 581–584 and Volume 3, 581.

6 爱情的纽带

- [1] Carr, *Michael Bakunin*, 137.
- [2]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82.
- [3] 宴会人数众多，有来自俄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格里戈里·托尔斯泰伯爵和谢尔盖·博特金医生，来自法国的社会主义报人路易·勃朗和皮埃尔·勒鲁，以及来自德国的卢格、贝尔奈斯和马克思。来源：Raddatz, *Karl Marx*, 53;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6; Carr, *Michael Bakunin*, 126.

[4] K. J. Kenafick,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15; Carr, *Michael Bakunin*, 3, 5, 18, 86, 90, 94.

[5]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54.

[6] Carr, *Michael Bakunin*, 167.

[7] *Ibid.*, 129.

[8] KMIR, 11.

[9] Stearns, *1848*, 27, 50, 60–61; Arnold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50–51.

[10] Stearns, *1848*, 27, 50.

[11] Hammen, *Red 48ers*, 90; Stearns, *1848*, 46–47; Roberts, *History of Europe*, 338–339;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1848–49*, 10.

[12] Berlin, *Karl Marx*, 9–10.

[13] McLellan, *Karl Marx*, 79–80; Padover, *Karl Marx*, 91;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79.

[14] 恩格斯说同盟与法国秘密组织四季社联系紧密，后者的领袖是革命经验丰富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和阿蒙·巴尔贝斯。来源：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39–40.

[15] MECW, Volume 3, 313.

[16] 马克思研究的经济学家包括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奠定了他一生研究工作的基础，最终促成了《资本论》的面世。来源：MECW, Volume 3, xvi–xvii, 270–273; McLellan, *Karl Marx*, 94–98.

[17] MECW, Volume 3, 324.

[18] *Ibid.*, 273.

[19]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212;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68–69.

[20]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75.

[21] McLellan, *Karl Marx*, 103–104.

[22] Pawel, *Poet Dying*, 126.

[23] MECW, Volume 3, 313.

[24]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174–175, 177;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35.

[25] Longuet, *Karl Marx*, 107; Hammen, *Red 48ers*, 82; McLellan, *Karl Marx*, 103–104; Brophy,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87.

[26] MECW, Volume 38, 64; Raddatz, *Karl Marx*, 53; Carr, *Michael Bakunin*, 125.

[27] MECW, Volume 20, 28; McLellan, *Karl Marx*, 103–10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81; Hammen, *Red 48ers*, 82;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196–197.

[28] MECW, Volume 4, 24 and Volume 20, 28; McLellan, *Karl Marx*, 117.

[29] Wheen, *Karl Marx*, 67.

[30] 法国周边的君主国家认为巴黎的民主令人恐惧（当时有作家描述说巴黎“肆无忌惮且满是革命论调”），并派了大量间谍来加以控制。来源：The

Extraordinary Decade, 63; Robert Payne, *Karl Marx*, 106.

[31]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81–82.

[32] MECW, Volume 3, 576–579.

[33] 还有说法称刺客的动机是不满国王没有倾听他对腐败的控诉。枪手原来在一个村庄做邮递员，也算吃过公家饭，后被吊死。来源：He was executed. Brophy,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85.)

[34] MEGA, I, Band 2, 501.

[35]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82–83.

[36] Somerhausen, *L'Humanisme*, 69.

[37] MECW, Volume 3, 582–583.

7 初遇一生的守护者

[1] Wheen, *Karl Marx*, 17.

[2] McLellan, *Karl Marx*, 95, 115.

[3] *Ibid.*, 116; Seigel, *Marx's Fate*, 147.

[4] KMIR, 5.

[5]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44.

[6] Gustav Mayer, *Friedrich Engels: A Biography*, 3–4; Terrell Carver, *Engel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5;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His Life and Thought*, 3.

[7] MECW, Volume 2, 582.

[8] Carver, *Engels*, Short Introduction, 3; Seigel, *Marx's Fate*, 148.

[9] Mayer, *Friedrich Engels*, 9–10;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x; Hammen, *Red 48ers*, 30.

[10] MECW, Volume 2, 511–512.

[11] *Ibid.*, 525.

[12]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31; Carver, *Engels*, Short Introduction, 3; Yelena Stepanova, *Frederick Engels*, 22.

[13] MECW, Volume 2, 9.

[14] *Ibid.*, 10.

[15]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146.

[16] MECW, Volume 2, 493.

[17] Stepanova, *Frederick Engels*, 17.

[18] *Ibid.*, 19; Hammen, *Red 48ers*, 35–36; Mayer, *Friedrich Engels*, 19;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64; Hammen, *Red 48ers*, 36.

[19] Mayer, *Friedrich Engels*, 26; Hammen, *Red 48ers*, 39.

[20] Mayer, *Friedrich Engels*, 4.

[21] *Ibid.*, 30;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96–97.

[22] John Smethurst, Edmund Frow, and Ruth Frow, “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n Manchester, 1842–1844,” 340–341.

[23] *Ibid.*, 341.

[24] *Ibid.*, 342.

[25] Edmund Frow and Ruth Frow, *Frederick Engels in Manchester*, 9, 11;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Mar. 15, 1898, Moscow.

- [26] 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61, 63, 65, 66.
- [27] *Ibid.*, 91.
- [28] *Ibid.*, 148.
- [29] Smethurst, Frow, and Frow, “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342.
- [30] Mayer, *Friedrich Engels*, 44; Mick Jenkins, *Frederick Engels in Manchester*, 16.
- [31] Smethurst, Frow, and Frow, “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343–344.
- [32]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110–111; Hammen, *Red 48ers*, 77.
- [33] MECW, Volume 4, 8.
- [34] McLellan, *Karl Marx*, 118.
- [35] Giroud, *Femme du diable*, 62.
- [36] McLellan, *Karl Marx*, 116–117.
- [37] MECW, Volume 4, 55–76.
- [38] MECW, Volume 38, 9–10.
- [39] *Ibid.*, 4, 17–18.
- [4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83–84.
- [41] REM, 222.
- [42]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84.
- [43] *Ibid.*, 84–85.
- [44] REM, 222.
- [45] MECW, Volume 38, 525–526.
- [46] REM, 222.

8 幸福的婚姻

- [1] McLellan, *Karl Marx*, 143.
- [2]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161; Robert Payne, *Karl Marx*, 118.
- [3] MECW, Volume 4, 675.
- [4] *Ibid.*, 676–677.
- [5] Somerhausen, *L'Humanisme*, 76.
- [6] *Ibid.*, 75; Raddatz, *Karl Marx*, 284.
- [7] Longuet, *Karl Marx*, 114.
- [8] *Ibid.*, 118.
- [9] McLellan, *Karl Marx*, 141;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99–100.
- [1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00; Peters, *Red Jenny*, 62–63.
- [11]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00.
- [12] McLellan, *Karl Marx*, 129;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57; KMIR, 20; Robert Payne, *Karl Marx*, 118–119.
- [13] MECW, Volume 38, 21–22; McLellan, *Karl Marx*, 130; Longuet, *Karl Marx*, 118.
- [14] KMIR, 20; McLellan, *Karl Marx*, 130; Longuet, *Karl Marx*, 118.

- [15] KMIR, 5–6.
- [16] 直到 1852 年赫斯才结婚，这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来源：Shlomo Avineri, *Moses Hess*, 16; Longuet, *Karl Marx*, 118.
- [17] KMIR, 20.
- [18] Peters, *Red Jenny*, 60; McLellan, *Karl Marx*, 129–130; Edna Healey, *Wives of Fame*, 78.
- [19] KMIR, 20; Peters, *Red Jenny*, 60.
- [20] KMIR, 60; Valerij Fomičev, “Helene Demuth Without Brethren,” 970; Peters, *Red Jenny*, 61.
- [21] McLellan, *Karl Marx*, 130; Longuet, *Karl Marx*, 119; Mayer, *Friedrich Engels*, 66.
- [22] MECW, Volume 38, 9–10.
- [23] *Ibid.*, 19–20.
- [24] *Ibid.*, 10–11, 28–29.
- [25] *Ibid.*, 572(n)
- [26] Mayer, *Friedrich Engels*, 65.
- [27] MECW, Volume 38, 13.
- [28] McLellan, *Karl Marx*, 130.
- [29] MECW, Volume 38, 19.
- [30] McLellan, *Karl Marx*, 143;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33.
- [31] Longuet, *Karl Marx*, 120.
- [32]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293.
- [33] Stearns, *1848*, 31–32;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64; Roberts, *History of Europe*, 14.
- [34]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81.
- [35] Stearns, *1848*, 28; Roberts, *History of Europe*, 221, 913.
- [36]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169;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24.
- [37]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1848–49*, 3; Derek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20.
- [38] Annenkov, *Extraordinary Decade*, 62.
- [39]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10;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160, 162.
- [40]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60.

9 英国见闻

- [1]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296.
- [2] MECW, Volume 5, 3; McLellan, *Karl Marx*, 131–132.
- [3] MECW, Volume 5, 5.
- [4] McLellan, *Karl Marx*, 130.
- [5] G. D. H. Cole and Raymond Postgate, *The British Common People 1746–1946*, 302, 305; Stearns, *1848*, 22.
- [6] McLellan, *Karl Marx*, 133; “On Your Marx,” *The Guardian*, London, Feb. 4, 2006, 31; MECW, Volume 38, 574.

[7]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12–13, 15; 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80, 84.

[8] 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61, 72–73.

[9] *Ibid.*, 78–80.

[10] *Ibid.*, 153; Stephen Halliday, *The Great Filth*, 43.

[11] 在描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845年曼彻斯特之旅时，马克思传记作家一般侧重讲二人在图书馆里研究经济学，却忽视了切身感受的曼彻斯特生活对马克思的影响。这在部分上是因为恩格斯在多年后谈到这次曼彻斯特之行时，提到了他和马克思待在切特姆图书馆的时光。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关于他们这次旅程的记述。虽然并无信件表明他们有玛丽·白恩士陪同，但考虑到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城市，他们没有理由不让她来带他们看一看这座城市的工人阶级社区。马克思已经研究过众多经济学家的思想，却还未曾亲眼看到这些经济学家拥护的制度带来的社会苦难，很难想象他会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回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不再耐心于理论研究，对待其他社会主义者也变得更加强硬，这些都说明他在曼彻斯特定然不是仅仅待在舒适的图书馆里看书。

[12] 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36–37, 40.

[13] *Ibid.*, 58–59.

[14]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57–58.

[15] Robert Winder, *Bloody Foreigners*, 196–197.

[16] 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40.

[17]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111, 118.

[18] *Ibid.*, 167, 476.

[19] McLellan, *Karl Marx*, 133; Hammen, *Red 48ers*, 119.

[20]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40–41.

[21] *Ibid.*, 41.

[22] MECW, Volume 26, 315–317;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42–43.

[23]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7–19.

[24]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196.

[25] *Ibid.*, 202–203, 214.

[26] *Ibid.*, 249, 258; Francis Sheppard, *London 1808–1870*, 320–321.

[27]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261–262.

[28] Thompson,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4, 822.

[29] A. N. Wilson, *The Victorians*, 43; Kenneth Morgan, *The Birth of Industrial Britain*, 84;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280.

[30]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286; Sheppard, *London 1808–1870*, 327.

[31] McLellan, *Karl Marx*, 133.

[32]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44; McLellan, *Karl Marx*, 133; Hammen, *Red 48ers*, 120.

10 新思想的孕育

[1] MECW, Volume 5, 41.

- [2] MECW, Volume 38, 527–528.
- [3] Ibid.
- [4] Ibid., 528.
- [5] REM, 223; Longuet, *Karl Marx*, 121.
- [6] MECW, Volume 38, 528–529.
- [7] McLellan, *Karl Marx*, 133–134.
- [8] MECW, Volume 5, xvi, 24; McLellan, *Karl Marx*, 135;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03;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189.
- [9] MECW, Volume 5, 31.
- [10] MECW, Volume 26, 173 and Volume 5, 44; Carver, *Engels, Short Introduction*, 72.
- [11] MECW, Volume 5, 50.
- [12] Ibid., 52.
- [13] Ibid., 52, 74–75.
- [14] Ibid., 59.
- [15] MECW, Volume 47, 31.
- [16] *The German Ideology* was not published in full until 1932 in Moscow. McLellan, *Karl Marx*, 140–141.
- [17] MECW, Volume 4, 678–679, 721(n); Longuet, *Karl Marx*, 122–123;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01.
- [18] McLellan, *Karl Marx*, 143; MECW, volume 38, 39.
- [19] MECW, Volume 38, 573(n).
- [20] Longuet, *Karl Marx*, 124.
- [21] MECW, Volume 38, 533.
- [22] McLellan, *Karl Marx*, 143–14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08–109.
- [23]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46.
- [2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09.
- [25]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46.
- [26] McLellan, *Karl Marx*, 130.
- [27] Annenkov, *Extraordinary Decade*, 168–170; KMIR, 12–1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17–118.
- [28] McLellan, *Karl Marx*, 159.
- [29] MECW, Volume 6, 35–41; McLellan, *Karl Marx*, 146.
- [30] Annenkov, *Extraordinary Decade*, 171.
- [31]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362–365, 367.
- [32] MECW, Volume 38, 3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16–117.
- [33] McLellan, *Karl Marx*, 147.
- [34] MECW, Volume 38, 530–531;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150–151.
- [35] Blumenberg, *Illustrated*, 65; Hammen, *Red 48ers*, 140–141.
- [36] MECW, Volume 38, 576(n).
- [37] Ibid., 532.
- [38] Ibid., 36–37.

- [39] Ibid., 42–43.
 [40] MECW, Volume 24, 131; McLellan, *Karl Marx*, 142; REM, 223.
 [41] KMIR, 20; McLellan, *Karl Marx*, 142.
 [42] Mayer, *Friedrich Engels*, 76.
 [43] MECW, Volume 38, 82, 89.
 [44] Ibid., 92.
 [45] Longuet, *Karl Marx*, 125–126; McLellan, *Karl Marx*, 142; Peters, *Red Jenny*, 69.
 [46] MECW, Volume 38, 51.
 [47] Ibid., 105.
 [48] MECW, Volume 38, 95–97; Annenkov, *Extraordinary Decade*, 171–172.
 [49] MECW, Volume 38, 101–102.
 [50] Hammen, *Red 48ers*, 145.
 [51] MECW, Volume 6, 176.
 [52] McLellan, *Karl Marx*, 148.
 [53] MECW, Volume 38, 591(n); McLellan, *Karl Marx*, 152.
 [54] McLellan, *Karl Marx*, 157; Robert Payne, *Karl Marx*, 131.

11 壮丽的事业

- [1] MECW, Volume 38, 149.
 [2]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39–41; McLellan, *Karl Marx*, 154, 157.
 [3]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40, 47; McLellan, *Karl Marx*, 156–157;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11, 122–124.
 [4] Stearns, 1848, 33.
 [5] MECW, Volume 10, 495.
 [6]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26; Stearns, 1848, 34;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76–77.
 [7]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43–44.
 [8] 不同的马克思传记著作对埃德加·马克思的出生日期记述不尽相同。特里尔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研究中心认为埃德加出生在1847年2月3日。出生证上的名字是查理·路易·亨利·埃德加·马克思，不过家人都叫他埃德加或穆希。来源：*Genealogy Marx*, Friedrich-Ebert-Stiftung Museum/Studienzentrum, Trier; Omura, Fomichev, Hecker, and Kubo, *Familie Marx privat*, 447.
 [9] Padover, *Karl Marx*, 128; MECW, Volume 38, 121.
 [10] MECW, Volume 38, 154.
 [11] Ibid., 158.
 [12] Ibid., 576(n).
 [13] Ibid., 108.
 [14] Ibid., 55, 90.
 [15] Ibid., 153.
 [16] Ibid., 154.
 [17] Ibid., 115, 587(n).
 [18] Ibid., 117.

- [19] Ibid., 120, 588(n).
- [20] Ibid., 117.
- [21] MECW, Volume 6, 585 and Volume 38, 587–588(n); Carr, *Michael Bakunin*, 139; McLellan, *Karl Marx*, 156–157.
- [22] MECW, Volume 6, 96–103, 341–357.
- [23] Ibid., 600.
- [24] Boris Nicolaievsky,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1847–1852,” 241.
- [25] Robert Payne, *Unknown Marx*, 18; Padover, *Karl Marx*, 115; Robert Payne, *Karl Marx*, 131; McLellan, *Karl Marx*, 142–143.
- [26]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33.
- [27] MECW, Volume 38, 588(n).
- [28]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28–129; Hammen, *Red 48ers*, 163; Longuet, *Karl Marx*, 127–128. (Today the Café au Cygne is known as the Maison du Cygne.)
- [2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31–132; MECW, Volume 38, 122–130.
- [3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29.
- [31] MECW, Volume 38, 141.
- [32] Longuet, *Karl Marx*, 128; Hammen, *Red 48ers*, 190.
- [33] MECW, Volume 38, 122, 143.
- [34] McLellan, *Karl Marx*, 163; Carr, *Michael Bakunin*, 123, 131.
- [35] Carr, *Michael Bakunin*, 146.
- [36] Kenafick, *Bakunin and Marx*, 41–42.
- [37] Carr, *Michael Bakunin*, 146.
- [38] MECW, Volume 38, 150–151.
- [39] McLellan, *Karl Marx*, 160–161.
- [40] MECW, Volume 6, 388–389.
- [41] REM, 153.
- [42] 这年秋天参加同盟大会时，马克思实际上是 29 岁。来源：KMIR, 14.
- [43] MECW, Volume 38, 592; McLellan, *Karl Marx*, 154–155;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10–111.
- [44] MECW, Volume 6, 633–638.
- [45] Ibid., 585.
- [46] Ibid., 633.
- [47] MECW, Volume 38, 149.

12 《共产党宣言》的诞生

- [1]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11–12.
- [2] Giroud, *Femme du diable*, 92–93; Peters, *Red Jenny*, 73.
- [3] Jenny Marx to Lina Schöler, Dec. 17, 1847, Moscow.
- [4] Jenny Marx to Lina Schöler, mid-Jan. 1848, Moscow.
- [5] Giroud, *Femme du diable*, 92–93.

- [6] MECW, Volume 6, 639.
- [7] Giroud, *Femme du diable*, 92–93.
- [8] Jenny Marx to Lina Schöler, mid-Jan. 1848, Moscow.
- [9] McLellan, *Karl Marx*, 162; MECW, Volume 26, 523–524 and Volume 6, 695–696(n).
- [10] Roberts, *History of Europe*, 336.
- [11] MECW, Volume 6, 463, 465 and Volume 26, 523–524.
- [12] MECW, Volume 26, 523.
- [13] MECW, Volume 38, 152–154.
- [1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36; Raddatz, *Karl Marx*, 80.
- [15] MECW, Volume 6, 698.
- [16] *Ibid.*, 698(n); Padover, *Karl Marx*, 129.
- [17] MECW, Volume 39, 60; Padover, *Karl Marx*, 129.
- [18] MECW, Volume 6, 481.
- [19] *Ibid.*, 487–488.
- [20] *Ibid.*, 489.
- [21] *Ibid.*, 496.
- [22] *Ibid.*, 500.
- [23] *Ibid.*, 502.
- [24] *Ibid.*, 506.
- [25] *Ibid.*, 519.

13 燃起革命的火焰

- [1]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87.
- [2] MECW, Volume 6, 55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1–142.
- [3] Wilson, *Victorians*, 127.
- [4]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14.
- [5]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60–63, 65–66;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246–247.
- [6]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66.
- [7]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115–116; Stearns, *1848*, 123;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55.
- [8] Stearns, *1848*, 53;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56.
- [9]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116–118;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140–141, 146–147; Stearns, *1848*, 123, 125;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57, 60.
- [10] Stearns, *1848*, 57, 124;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147.
- [11]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1.
- [12] John J. Baughman, “The French Banquet Campaign of 1847–48,” 1; MECW, Volume 6, 375; Stearns, *1848*, 6;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32.

- [13] Pawel, *Poet Dying*, 17.
- [14] Stearns, 1848, 71;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32.
- [15] Baughman, "The French Banquet Campaign of 1847–48," 2–3, 6–9; MECW, Vol-ume 6, 393.
- [16] MECW, Volume 6, 375.
- [17] Baughman, "The French Banquet Campaign of 1847–48," 32;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29.
- [18] Baughman, "The French Banquet Campaign of 1847–48," 14; Stearns, 1848, 72.
- [19] Stearns, 1848, 73;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27, 31, 32.
- [20] Stearns, 1848, 73.
- [21] *Ibid.*, 73–74;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97;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36.
- [22]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11–12.
- [23]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164.
- [24]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1848–1918*, 6; Andrew Jackson Donelson, "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Berlin on the Revolution of March, 1848," 357;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98.
- [25] Longuet, *Karl Marx*, 131;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36.
- [26] Hammen, *Red 48ers*, 193.
- [27] MECW, Volume 38, 82.
- [28] Hammen, *Red 48ers*, 193.
- [29] MECW, Volume 6, 643.
- [3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38–139.
- [31]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163.
- [32]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3.
- [33] MECW, Volume 6, 567;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3.
- [34] Hammen, *Red 48ers*, 196.
- [35] MECW, Volume 6, 559 and Volume 24, 136–137; Hammen, *Red 48ers*, 196–197.
- [36]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3; MECW, Volume 24, 137.
- [37] MECW, Volume 6, 568, 581.
- [38] *Ibid.*, 560 and Volume 24, 137.
- [39] MECW, volume 6, 560.
- [40] KMIR, 20.
- [41]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3; McLellan, *Karl Marx*, 177;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17.
- [42] KMIR, 20.
- [43]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37, 245.
- [44] Peters, *Red Jenny*, 74.
- [45] McLellan, *Karl Marx*, 177–178;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45.

- [46] MECW, Volume 6, 651–652.
- [47] Ibid., 649.
- [48] Ibid., 650.
- [49] Hammen, *Red 48ers*, 198.
- [50]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4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4.
- [51]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39.
- [52] MECW, Volume 6, 561–562, 565;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39–24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4.
- [53]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40; KMIR, 20–21; MECW, Volume 6, 561, 565.
- [54] KMIR, 21;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40–241.
- [55] KMIR, 21;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41.
- [56] KMIR, 21.
- [57] MECW, Volume 6, 565;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42.
- [58] KMIR, 21.
- [59] MECW, Volume 6, 565.
- [60] Ibid., 562.
- [61] Somerhausen, *L'Humanisme*, 242.
- [62] KMIR, 21.
- [63] Peters, *Red Jenny*, 76.
- [6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6.
- [65] KMIR, 21.

14 人民之春

- [1] MECW, Volume 4, 82.
- [2] KMIR, 21.
- [3] Peter Amann, “The Changing Outlines of 1848,” 941;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6; Padover, *Karl Marx*, 133.
- [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47; Carr, *Michael Bakunin*, 149.
- [5] MECW, Volume 38, 169.
- [6] Raddatz, *Karl Marx*, 86.
- [7] Stearns, *1848*, 77.
- [8] MECW, Volume 7, 513.
- [9] Longuet, *Karl Marx*, 136.
- [10] Ibid., 135; McLellan, *Karl Marx*, 179.
- [11] Carr, *Michael Bakunin*, 149.
- [12]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26.
- [13] Amann, “The Changing Outlines of 1848,” 942.
- [14] Stearns, *1848*, 80.
- [15] Ibid., 179–180.
- [16]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21, 23.
- [17] Stearns, *1848*, 83.

- [18] Giroud, *Femme du diable*, 98.
- [19] MECW, Volume 21, 61.
- [20]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7;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76–79, 84.
- [21]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54; MECW, Volume 11, 19–20.
- [22]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54, 57.
- [23] Schurz, *Reminiscences*, 108–109.
- [24] Stearns, 1848, 64;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29.
- [25] Priscilla Robertson, “Students on the Barricades: Germany and Austria, 1848,” 375–376; Stearns, 1848, 95–96.
- [26]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99; Stearns, 1848, 96;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181.
- [27]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186; Robertson, “Students on the Barricades,” 376; Fejtö (eds.), *Opening of an Era*, 255.
- [28]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62–63; Stearns, 1848, 129–130.
- [29]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106.
- [30] Schurz, *Reminiscences*, 119; Donelson, “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Berlin,” 358; Stearns, 1848, 146;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218.
- [31] Schurz, *Reminiscences*, 119;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59.
- [32] Schurz, *Reminiscences*, 119.
- [33]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218.
- [34] Donelson, “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Berlin,” 358; Stearns, 1848, 147.
- [35] Donelson, “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Berlin,” 360–361.
- [36] *Ibid.*, 360.
- [37] *Ibid.*, 360–361.
- [38] *Ibid.*
- [39] Schurz, *Reminiscences*, 120–121; Donelson, “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Berlin,” 363.
- [40] Schurz, *Reminiscences*, 121.
- [41] Donelson, “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Berlin,” 362.
- [42] *Ibid.*, 370–371.
- [43]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39–40.
- [44] Carr, *Michael Bakunin*, 150.
- [45] Liebknecht, *Karl Marx*, 63.
- [46]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50; Amann, “Changing Outlines of 1848,” 940.
- [47] Carr, *Michael Bakunin*, 151–152.
- [48] REM, 1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50–151; MECW, Volume 26, 324.
- [49] MECW, Volume 6, 657.
- [50]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etters to Americans, 1848–1895*, 15.
- [51] Stearns, 1848, 142; McLellan, *Karl Marx*, 18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52–153.

[52] MECW, Volume 26, 32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52, 155; Hammen, *Red 48ers*, 214.

[53] McLellan, *Karl Marx*, 181.

[54] MECW, Volume 7, 3–7.

[55] McLellan, *Karl Marx*, 181.

[56] MECW, Volume 6, 558.

15 《新莱茵报》与新斗争

[1] Seigel, *Marx's Fate*, 173.

[2]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65;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60.

[3] McLellan, *Karl Marx*, 182; Stearns, *1848*, 145; Donelson, “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Berlin,” 365.

[4] Marx and Gottschalk's final falling-out was over funding the remnants of Herwegh's Legion, which Gottschalk favored but Marx did not. McLellan, *Karl Marx*, 182–183;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64, 166–167; Hammen, *Red 48ers*, 222.

[5] MECW, Volume 26, 122.

[6] 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时，马克思开始说自己要在一家报纸做编辑，不过最后提交申请时，他改变了说法，只是简单地说：“经过近期这些事情，我回到了祖国，想和家人一起在科隆定居。”六天后的一份警方报告提到，马克思向官方说明自己要写一部经济学著作，打算靠写作和妻子的私人财产为生。负责的警官认为马克思“政治上不可靠”，没有马上处理他的申请。来源：MECW, Volume 7, 537–538.

[7] Peters, *Red Jenny*, 82–83; McLellan, *Karl Marx*, 181.

[8] Hammen, *Red 48ers*, 222.

[9] Luise Dornemann, *Jenny Marx: Der Lebensweg einer Sozialistin*, 103.

[10] MECW, Volume 26, 127.

[11] MECW, Volume 7, 69–70.

[12] MECW, Volume 26, 127.

[13] MECW, Volume 7, 15.

[14]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47, 50; Stearns, *1848*, 76.

[15]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50;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35.

[16]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35;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51.

[17]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52–53, 71;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36.

[18]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95, 102; Amann, “Changing Outlines of 1848,” 946; Stearns, *1848*, 79;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66–67.

[19]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66–67.

[20]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39; Stearns, *1848*, 85.

- [21]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107.
- [22] *Ibid.*, 130–132;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1; Amann, “A Journée in the Making: May 15, 1848,” 44, 63–64; Stearns, *1848*, 86.
- [23]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66–67;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130.
- [24]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133–134.
- [25] Schurz, *Reminiscences*, 129.
- [26]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102–104, 107; Stearns, *1848*, 41.
- [27]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33.
- [28]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231.
- [29]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114.
- [30] *Ibid.*, 120–122; Breuilley, *Austria, Prussia and Germany*, 42–43.
- [31]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123–124.
- [32] MECW, Volume 7, 72.
- [33] MECW, Volume 11, 41–42; Breuilley, *Austria, Prussia and Germany*, 42–43.
- [34] Hammen, *Red 48ers*, 223–224.
- [35]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68.
- [36] MECW, Volume 26, 123.
- [37] Blumenberg, *Illustrated*, 86.
- [38] MECW, Volume 7, 45 and Volume 26, 126.

16 笔杆子不得不服从枪杆子

- [1]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156.
- [2] *Ibid.*, 146.
- [3] Stearns, *1848*, 88.
- [4]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90.
- [5]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99.
- [6] MECW, Volume 7, 124–127; Stearns, *1848*, 89;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99.
- [7] MECW, Volume 7, 128;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98.
- [8]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154, 175; MECW, Volume 7, 138.
- [9]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162;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100.
- [10]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150–151.
- [11] Stearns, *1848*, 92;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41;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101–102.
- [12] Stearns, *1848*, 93;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43; Pawel, *Poet Dying*, 53;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103.
- [13]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43;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103.
- [14] MECW, Volume 7, 128.
- [15] *Ibid.*, 130.
- [16] *Ibid.*, 144.
- [17] *Ibid.*, 146–147.

- [18] Ibid., 147 and Volume 10, 68.
- [19] MECW, Volume 7, 143.
- [20] Ibid., 478 and Volume 26, 126.
- [21] MECW, Volume 26, 126.
- [22] McLellan, *Karl Marx*, 183; Seigel, *Marx's Fate*, 199; REM, 156.
- [23] MECW, Volume 7, 74, 170, 194 and Volume 11, 36.
- [24] MECW, Volume 7, 176–179.
- [25] Ibid., 186.
- [26] Ibid., 554.
- [27] Ibid., 208.
- [28] Ibid., 383–384, 407–408, 581.
- [29] Ibid., 448, 452 and Volume 38, 182.
- [30] MECW, Volume 7, 653(n); Hammen, *Red 48ers*, 296;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73.
- [31] Hammen, *Red 48ers*, 296.
- [32] Brophy,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216–217, 224.
- [33] MECW, Volume 7, 582–583.
- [34] Hammen, *Red 48ers*, 297.
- [35] MECW, Volume 7, 574; Hammen, *Red 48ers*, 298.
- [36] Hammen, *Red 48ers*, 299–300.
- [37] MECW, Volume 7, 584.
- [38] Ibid., 442–443.
- [39] Hammen, *Red 48ers*, 287–289.
- [40] Ibid., 304.
- [41] Ibid., 304;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181.
- [42] MECW, Volume 7, 444, 589.
- [43] Ibid., 452.
- [44] Ibid., 452–453.
- [45] Hammen, *Red 48ers*, 307.
- [46] MECW, Volume 7, 463; Hammen, *Red 48ers*, 307–30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75.
- [47] MECW, Volume 7, 455, 642(n); Hammen, *Red 48ers*, 31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75.
- [48] MECW, Volume 7, 455–456, 590.
- [49] Ibid., 593.
- [50] MECW, Volume 24, 140.
- [51] MECW, Volume 38, 540–541.
- [52] MECW, Volume 7, 459–460, 594.
- [53] Ibid., 513–514.
- [54] Ibid., 511.
- [55] Ibid., 526, 528–539.
- [56] Ibid., 515.
- [57] Ibid., 456.
- [58] Hammen, *Red 48ers*, 316.

[59] Brophy,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59.

[60] MECW, Volume 38, 178.

[61] Dornemann, *Jenny Marx*, 103–139.

[62] KMIR, 16.

[63] 马克思和燕妮的传记作家经常强调马克思和燕妮与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对立，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这应该是真的，而且对立应该还不少。不过，无论面对多少困难，燕妮一生从未放弃与哥哥和嫂子的亲情，她经常与他们通信，说说家常，感情上极为亲密。燕妮与贵族阶层成员通信时，经常使用这个阶层特有的礼貌语言，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难判断她在言语间除了保持社交上的礼貌之外，是否还表达了真情实感。我相信在很多时候都是的：这些信表达了她对嫁给马克思后抛弃的原有生活和家庭的依恋和情感——并非她要放弃马克思，回到他们身边，她只是需要缓一口气，哪怕再简短，她也需要缓一缓，然后继续挣扎地生活。

[64]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June 10, 1847, Hamburg.

[65]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Oct. 23, 1848, Hamburg.

第十七章 坚守堡垒

[1] MECW, Volume 10, 70.

[2] Stearns, 1848, 119–121; Hammen, *Red 48ers*, 327–328, 330; MECW, Volume 11, 67; McLellan, *Karl Marx*, 193.

[3] Stearns, 1848, 121; Hammen, *Red 48ers*, 329, 331; Breuilly, *Austria, Prussia and Germany*, 49.

[4] MECW, Volume 9, 453.

[5] MECW, Volume 7, 477.

[6] MECW, Volume 11, 67; Hammen, *Red 48ers*, 340.

[7] MECW, Volume 8, 36; Hammen, *Red 48ers*, 342, 345.

[8] MECW, Volume 8, 36, 41.

[9] *Ibid.*, 46.

[10] Hammen, *Red 48ers*, 347.

[11] 马克思被传唤出庭，是由于黑克尔的起诉，后者已经从检察官升任检察长。事由是《新莱茵报》刊登的一份署名“黑克尔”的信件，这个黑克尔的身份设定是一名逃去纽约的共和主义者。普鲁士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检方控告马克思伪造信件，故意署名“黑克尔”，试图误导读者以为黑克尔检察长有共和主义倾向。马克思在11月14日出庭时，以为自己肯定会被逮捕。数百人聚集在法庭支持马克思，检方也许是担心引发社会动荡，并未将马克思下狱。来源：MECW, Volume 7, 485–487; Volume 8, 495–496, 501, 503; Volume 38, 180; McLellan, *Karl Marx*, 195.

[12] MECW, Volume 8, 504.

[13] *Ibid.*, 82.

[14] MECW, Volume 38, 179.

[15] MECW, Volume 8, 135, 588(n).

[16] MECW, Volume 38, 190.

- [17] MECW, Volume 8, 312.
- [18] *Ibid.*, 314.
- [19] *Ibid.*, 316–317.
- [20] *Ibid.*, 320, 322, 517–518.
- [21] *Ibid.*, 323, 335, 338.
- [22] *Ibid.*, 338–339.
- [23] *Ibid.*, 520–521; McLellan, *Karl Marx*, 19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92; Stearns, *1848*, 183.
- [24] MECW, Volume 8, 527–528.
- [25] MECW, Volume 9, 487, 492–493, 496–497.
- [26]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Feb. 10, 1849, Hamburg.
- [27]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91.
- [28] MECW, Volume 38, 192–193 and Volume 47, 613(n); McLellan, *Karl Marx*, 201–202;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91.
- [29] MECW, Volume 38, 193.
- [30] MECW, Volume 11, 80, 83–85.
- [31] McLellan, *Karl Marx*, 203;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95.
- [32] MECW, Volume 38, 196.
- [33] McLellan, *Karl Marx*, 202;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81, 193–194.
- [3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94.
- [35] McLellan, *Karl Marx*, 203.
- [36] Hammen, *Red 48ers*, 386.
- [37] MECW, Volume 9, 451, 509; McLellan, *Karl Marx*, 203.
- [38] Carr, Michael Bakunin, 186, 190, 193; McLellan, *Karl Marx*, 203;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95;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65.
- [39] Carr, *Michael Bakunin*, 166, 194.
- [40] MECW, Volume 9, 447; Hammen, *Red 48ers*, 391–392.
- [41] Mayer, *Friedrich Engels*, 13; Hammen, *Red 48ers*, 393.
- [42] MECW, Volume 9, 449, 508; Stearns, *1848*, 191;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204; Hammen, *Red 48ers*, 392–393.
- [43] MECW, Volume 9, 449 and Volume 10, 168, 602–603;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204.
- [44] MECW, Volume 9, 514, 524 and Volume 10, 602–604.
- [45] MECW, Volume 9, 417.
- [46] MECW, Volume 11, 68.
- [47]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97.
- [48] McLellan, *Karl Marx*, 203.
- [49] MECW, Volume 9, 418.
- [50] *Ibid.*, 453–454, 467.
- [51] McLellan, *Karl Marx*, 20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97.

- [52] MECW, Volume 26, 128.
- [53]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97.
- [54] Giroud, *Femme du diable*, 106.
- [55] MECW, Volume 9, 509; McLellan, *Karl Marx*, 204.
- [56] MECW, Volume, 24, 164.
- [57] MECW, Volume 9, 515; McLellan, *Karl Marx*, 204.
- [58] KMIR, 21.
- [59] McLellan, *Karl Marx*, 205.
- [60] KMIR, 21; McLellan, *Karl Marx*, 205;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205.
- [61] MECW, Volume 11, 86.

18 梦碎巴黎

- [1] MECW, Volume 11, 103.
- [2]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92.
- [3] W. H. C. Smith, *Second Empire and Commune*, 2.
- [4]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88.
- [5] W. H. C. Smith, *Second Empire*, 2, 7;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90.
- [6]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93; Stearns, *1848*, 216.
- [7]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91, 94.
- [8] *Ibid.*, 84, 104, 106.
- [9] *Ibid.*, 108.
- [10] MECW, Volume 9, 525 and Volume 38, 200; McLellan, *Karl Marx*, 205.
- [11] MECW, Volume 7, 150 and Volume 38, 209.
- [12] MECW, Volume 38, 199.
- [13] Stearns, *1848*, 217.
- [14]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179, 181–182.
- [15]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30.
- [16] Stearns, *1848*, 217.
- [17] MECW, Volume 9, 478.
- [18]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245–246, 272–274.
- [1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03.
- [20] MECW, Volume 38, 546.
- [21] *Ibid.*, 546–548; Pawel, *Poet Dying*, 46.
- [22] MECW, Volume 38, 202.
- [23] *Ibid.*, 201.
- [24] *Ibid.*, 200, 207.
- [25] KMIR, 22.
- [26] MECW, Volume 9, 480–481.
- [27] MECW, Volume 38, 211.
- [28] *Ibid.*, 210–211, 605(n) and Volume 9, 526.
- [29] MECW, Volume 38, 208.
- [30] *Ibid.*, 209–210.
- [31] Berlin, *Karl Marx*, 119.

- [32] MECW, Volume 38, 205.
- [33] Ibid., 209.
- [34] Ibid., 207–208.
- [35] McLellan, *Karl Marx*, 206.
- [36] MECW, Volume 38, 204–205.
- [37] Ibid., 212 and Volume 9, 527.
- [38] MECW, Volume 38, 212–213, 606.
- [39] Ibid., 212.
- [40] Ibid., 213.
- [41] Ibid., 606(n).
- [42] Ibid., 216.
- [43] Pawel, *Poet Dying*, 6–7, 71–72.
- [44] MECW, Volume 38, 216.
- [45] REM, 225.

第三部分 流寓伦敦的家庭苦难

19 伦敦新家

- [1] Percy Bysshe Shelley, “Peter Bell the Third,” *The Daemon of the World*, 39.
- [2] KMIR, 22; MECW, Volume 38, 607; Padover, *Karl Marx*, 151; Gustav Mayer, “Letters of Karl Marx to Karl Blind,” 154–155.
- [3] Bernard Porter, *The Refugee Question in Mid-Victorian Politics*, 2–3.
- [4] Ibid., 22.
- [5] Daniel Pool, *What Jane Austen Ate and Charles Dickens Knew*, 30.
- [6] Ibid., 30; Halliday, *Great Filth*, 79.
- [7] Halliday, *Great Filth*, 133.
- [8] Ibid., 135, 204; Gilda O’Neill, *The Good Old Days*, 10.
- [9] Halliday, *Great Filth*, 77.
- [10]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20, 25; Jenny Marx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Jan. 29, 1858, Moscow.
- [11] William C. Preston, *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 8; Donald J. Olsen, *The Growth of Victorian London*, 12.
- [12]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68–69, 104.
- [13] MECW, Volume 10, 280–282.
- [14] Ibid., 605–606.
- [15] MECW, Volume 38, 216.
- [16] Liebknecht, *Karl Marx*, 65, 68–69.
- [17] KMIR, 44–46; Liebknecht, *Karl Marx*, 69; McLellan, *Karl Marx*, 214.
- [18]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28; Berlin, *Karl Marx*, 137.
- [19]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25–26.
- [20] Liebknecht, *Karl Marx*, 82.
- [21] Berlin, *Karl Marx*, 13.
- [22] MECW, Volume 10, 596.
- [23] Ibid., 599 and Volume 38, 231; McLellan, *Karl Marx*, 214.
- [24] MECW, Volume 10, 623; McLellan, *Karl Marx*, 214.

- [25] MECW, Volume 38, 213; Hammen, *Red 48ers*, 403.
- [26] REM, 141.
- [27] MECW, Volume 38, 202–203.
- [28] REM, 142.
- [29] *Ibid.*, 143–144;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206; Hammen, *Red 48ers*, 403.
- [30] MECW, Volume 38, 217, 607(n);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272–273.
- [31] Winder, *Bloody Foreigners*, 179–181; KMIR, 22; Olsen, *The Growth of Victorian London*, 150.
- [32] KMIR, 22; Robert Payne, *Karl Marx*, 227–228; Wilson, *Victorians*, 141.
- [33] KMIR, 22.
- [34] MECW, Volume 38, 557–558.
- [35] *Ibid.*, 549–550.
- [36] *Ibid.*, 607(n).
- [37] MECW, Volume 10, 606.
- [38] *New York Daily Tribune*, December 1, 1852.
- [39] MECW, Volume 38, 219.
- [40] MECW, Volume 38, 224–225, 609(n).
- [41] Evans and von Strandmann (eds.), *Revolutions in Europe*, 166.
- [42] MECW, Volume 38, 226–227.
- [43] *Ibid.*, 608(n).
- [44] MECW, Volume 10, 69, 127, 135.
- [45] Mehring, *Karl Marx*, 194.
- [46] MECW, Volume 38, 605(n); McLellan, *Karl Marx*, 219.
- [47] MECW, Volume 38, 605(n).
- [48] *Ibid.*, 234.
- [49] *Ibid.*, 555.
- [50] *Ibid.*, 556–558.
- [51] KMIR, 23.
- [52] MECW, Volume 10, 281–285.
- [53] *Ibid.*, 375.
- [54] MECW, Volume 38, 610(n).
- [55] MECW, Volume 10, 370, 681(n)
- [56] Robert Payne, *Unknown Marx*, 103, 107, 109.
- [57] MECW, Volume 38, 237.
- [58] MECW, Volume 10, 378–386.
- [59] *Ibid.*, 381.
- [60]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76, 81.
- [61] KMIR, 17–18.
- [62] MECW, Volume 38, 607(n); McLellan, *Karl Marx*, 213.
- [63] MECW, Volume 1, 674.
- [64] MECW, Volume 38, 557–558.

20 小福克斯之死

- [1] Jenny Marx to Karl Marx, Aug. 1850, Moscow.

- [2] Marjorie Caygill, *The British Museum Reading Room*, 29; Asa Briggs and John Callow, *Marx in London*, 50.
- [3] Caygill, 5–6.
- [4] MECW, Volume 38, 239–240.
- [5] Mayer, *Friedrich Engels*, 136; Raddatz, *Karl Marx*, 139.
- [6] Mayer, *Friedrich Engels*, 137.
- [7]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139.
- [8] Mayer, *Friedrich Engels*, 138;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139.
- [9] KMIR, xvii.
- [10] MECW, Volume 38, 274.
- [11] Jenny Marx to Karl Marx, Aug. 1850, Moscow; KMIR, 24.
- [12] *Ibid.*, 24.
- [13] McLellan, *Karl Marx*, 228.
- [1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156, 205.
- [15] KMIR, 22.
- [16]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23.
- [17]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17; McLellan, *Karl Marx*, 228.
- [18] MECW, Volume 10, 614–615.
- [19] REM, 292.
- [20] Liebknecht, *Karl Marx*, 106–107.
- [21] Liebknecht, *Karl Marx*, 104.
- [22] *Ibid.*, 106–107.
- [23] McLellan, *Karl Marx*, 229.
- [24] Liebknecht, *Karl Marx*, 106–107; MECW, Volume 38, 618.
- [25] McLellan, *Karl Marx*, 229.
- [26] Liebknecht, *Karl Marx*, 106–107.
- [27] MECW, Volume 10, 625–626.
- [28] *Ibid.*, 626–627.
- [29] *Ibid.*, 628.
- [30] *Ibid.*, 629.
- [31] *Ibid.*, 483–484.
- [32] *Ibid.*, 625, 633;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62–63.
- [33] MECW, Volume 39, 60 and Volume 10, 627;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41.
- [34] MECW, Volume 38, 240–241.
- [35] *Ibid.*, 558–559.
- [36] *Ibid.*, 241.
- [37] *Ibid.*, 242.
- [38] *Ibid.*, 250.

21 黄金时代的艰辛

- [1]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53.
- [2] Wilson, *Victorians*, 137–138, 144;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328, 366; Judith Flanders, *The Victorian House*, 290.

- [3]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13; Roberts, *History of Europe*, 376.
- [4]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44–45;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73.
- [5] Sheppard, *London 1808–1870*, 98, 101.
- [6]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13; Hammen, *The Red 48ers*, 90.
- [7]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49–50; Sheppard, *London 1808–1870*, 71–72.
- [8]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51.
- [9] Roberts, *History of Europe*, 329.
- [10] MECW, Volume 39, 21 and Volume 10, 500–502.
- [11] MECW, Volume 39, 96 and Volume 10, 502.
- [12] REM, 98; Liebknecht, *Karl Marx*, 57.
- [13] Berlin, *Karl Marx*, 13.
- [14] MECW, Volume 38, 270.
- [15] REM, 185; Flanders, *Victorian House*, 105–106; MECW, Volume 38, 251.
- [16] Mayer, *Friedrich Engels*, 143, 155, 157; Grenfell Morton, *Home Rule and the Irish Question*, 10; Wilson, *Victorians*, 76; MECW, Volume 41, 634(n);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149.
- [17] MECW, Volume 38, 250.
- [18] *Ibid.*, 252.
- [19] *Ibid.*, 257.
- [20] *Ibid.*, 297, 561.
- [21] MECW, Volume 10, 535.
- [22] MECW, Volume 38, 257.
- [23] Briggs and Callow, *Marx in London*, 43; Robert Payne, *Karl Marx*, 289; MECW, Volume 38, 251, 257, 269.
- [24] Liebknecht, *Karl Marx*, 94.
- [25] Briggs and Callow, *Marx in London*, 43.
- [26] Liebknecht, *Karl Marx*, 6.
- [27] MECW, Volume 38, 361.
- [28] Liebknecht, *Karl Marx*, 85.
- [29] *Ibid.*, 54.
- [30] REM, 163–164.
- [31] Liebknecht, *Karl Marx*, 116.
- [32] *Ibid.*, 117–118.
- [33] Gustav Mayer, “Neu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 54–66.
- [34] Paul Lafargue, *Karl Marx*, 26.
- [35] Liebknecht, *Karl Marx*, 115.
- [36] MECW, Volume 38, 615(n) and Volume 39, 158.
- [37]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168.
- [38] Liebknecht, *Karl Marx*, 94.
- [39]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190.
- [40] MECW, Volume 38, 286.
- [41] *Ibid.*, 287, 289–291.
- [42] *Ibid.*, 325; MEGA, III, Band 4, 85–86.
- [43]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209; MECW, Volume 11,

304–305.

- [44]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33.
[45] *Ibid.*, 86–87.
[46] *Ibid.*, 48, 57.
[47] MECW, Volume 38, 355;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206;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205;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19.
[48] MECW, Volume 38, 338.
[49]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70.
[50]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20.
[51] *Ibid.*, 272.
[52] *Ibid.*, 19; MECW, Volume 38, 626–627(n).
[53] Peters, *Red Jenny*, 98; MECW, Volume 11, 410 and Volume 38, 183–184.
[54] KMIR, 24.
[55] Jenny Marx (daughter) to Laura Lafargue, Dec. 24, 1868, Moscow.
[56]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54–55, 59; MECW, Volume 38, 365 and Volume 11, 399.
[57] MECW, Volume 38, 355, 359, 366.
[58]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说，流亡者的这些臆想出来的阴谋活动反而使得政府有借口在德国对任何人实施逮捕，镇压本地运动，把伦敦这些悲惨的流亡者当作稻草人来恐吓德国中产阶级。来源：MECW, Volume 38, 366, 375;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215.
[59] MECW, Volume 38, 369.
[60] Raddatz, *Karl Marx*, 160.
[61] MECW, Volume 38, 398.
[62] MECW, Volume 38, 402–403.
[63] MECW, Volume 38, 432, 629(n);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25.
[64] MECW, Volume 38, 431–432, 628–629(n).
[65] *Ibid.*, 629(n);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25.
[66] MECW, Volume 38, 409, 627(n); Berlin, *Karl Marx*, 145.
[67]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36.
[68] MECW, Volume 38, 380; Berlin, *Karl Marx*, 146, 204;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44.
[69] MECW, Volume 38, 409.
[70] *Ibid.*, 425.

22 流亡者的指挥中心

- [1] MECW, Volume 11, 103–104.
[2] MECW, Volume 38, 489.
[3] *Ibid.*, 494.
[4] MECW, Volume 39, 569.
[5] MECW, Volume 38, 499–501.
[6] Schurz, *Reminiscences*, 384–386;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108–109;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280.

- [7] MECW, Volume 38, 488, 502, 508.
- [8] *Ibid.*, 635(n); Stearns, 1848, 221.
- [9] E. B.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of a Minister to France*, Part I, 35.
- [10] MECW, Volume 38, 635–636(n).
- [11] Schurz, *Reminiscences*, 398–400.
- [12] MECW, Volume 38, 508.
- [13] *Ibid.*, 519, 636(n).
- [14] *Ibid.*, 635–636(n); Stearns, 1848, 222.
- [15]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409.
- [16] MECW, Volume 38, 563.
- [17] KMIR, 24.
- [18] McLellan, *Karl Marx*, 233.
- [19] MECW, Volume 39, 3.
- [20] *Ibid.*, 16.
- [21] *Ibid.*, 6.
- [22] *Ibid.*, 567.
- [23] *Ibid.*, 20–21.
- [24] *Ibid.*, 9.
- [25] *Ibid.*, 570.
- [26] *Ibid.*, 28.
- [27]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386.
- [28] REM, 250–251; KMIR, 24–25, 99–100.
- [29] Liebknecht, *Karl Marx*, 97, 151–152.
- [30] Flanders, *Victorian House*, 170–172; W. L. Burn, *The Age of Equipoise*, 17.
- [31] MECW, Volume 38, 637(n) and Volume 39, 71, 603(n).
- [32] MECW, Volume 39, 33.
- [33] MECW, Volume 11, 103–104, 106.
- [34] MECW, Volume 38, 475, 490–491.
- [35] MECW, Volume 39, 50.
- [36] *Ibid.*, 59, 606(n).
- [37] *Ibid.*, 59;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86.
- [38] MECW, Volume 11, 426–427 and Volume 39, 59, 624–625(n).
- [39] MECW, Volume 39, 78–79, 81; KMIR, 25.
- [40] Halliday, *Great Filth*, 20.
- [41] KMIR, 25.
- [42] MECW, Volume 39, 85.
- [43] *Ibid.*, 84–85.
- [44] *Ibid.*, 85.
- [45] *Ibid.*, 216.
- [46] *Ibid.*, 93, 101, 611(n).
- [47] *Ibid.*, 98.
- [48]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276.
- [49] Laura Marx, writing for Edgar Marx, to Karl Marx, May 19, 1852, IISG.

[50] 对于燕妮写这封信的时间节点,不同作家看法各异。根据发生的事件、马克思一家经历悲惨境地时的通信内容、以及马克思的反应,我判断燕妮应该是这个时候写的这封信。来源: Jenny Marx to Karl Marx, undated, IISG.

[51] MECW, Volume 39, 116–117.

[52] Ibid., 124.

[53] Ibid., 208.

[54] Ibid., 148.

[55] Ibid., 594(n), 610(n).

[56] Ibid., 175.

[57] Ibid., 182.

[58] Ibid., 148–149.

[59] MECW, Volume 39, 149 and Volume 38, 323 and Volume 11, 254.

[60] MECW, Volume 39, 181–182.

[61] Liebknecht, *Karl Marx*, 164; Raddatz, *Karl Marx*, 176;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495.

[62] MECW, Volume 39, 576–578.

[63]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60.

[64] MECW, Volume 39, 144–145.

[65] Ibid., 134.

[66]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26.

[67] MECW, Volume 39, 142.

[68]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60, 114.

[69] Ibid., 25, 66.

[70] Ibid., 25.

[71] MECW, Volume 38, 521 and Volume 39, 222–223, 226, 229–230, 240, 576–577, 624–625(n);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87–88.

[72]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132.

[73] Ibid., 105; MECW, Volume 39, 236.

[74] MECW, Volume 39, 235, 247;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106.

[75]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80–95, 265–266.

[76] MECW, Volume 39, 215, 219.

[77] Raddatz, *Karl Marx*, 114.

[78] MECW, Volume 39, 241.

[79] Ibid., 221.

[80] Ibid., 216.

[81]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112.

[82] Marx and Engels,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29, 55, 112.

[83] MECW, Volume 39, 577.

[84] Ibid., 247.

[85] Ibid., 232–233, 242, 255–256;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22.

[86] MECW, Volume 39, 386.

[87] Ibid., 281.

- [88] Ibid., 264; Mehring, *Karl Marx*, 222.
- [89] MECW, Volume 39, 579.
- [90] Ibid., 259.
- [91] Ibid., 287, 580, 625(n).
- [92] Ibid., 288.
- [93] Mehring, *Karl Marx*, 223.

23 家庭生活的苦乐

- [1] Seigel, *Marx's Fate*, 274.
- [2] MECW, Volume 39, 386.
- [3] MECW, Volume 11, 621–625.
- [4] MECW, Volume 39, 272.
- [5] Ibid., 283.
- [6] Ibid., 273, 275.
- [7] KMIR, 25; REM, 230.
- [8]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57, 195–196, 284.
- [9]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478.
- [10] Derek Hudson, Munby, *Man of Two Worlds*, 22.
- [11] Liebknecht, *Karl Marx*, 131, 139.
- [12] Jenny Marx to Wilhelm von Florencourt, Aug. 10, 1855, Moscow.
- [13] MECW, Volume 39, 581.
- [14] Preston, *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 8.
- [15] Liebknecht, *Karl Marx*, 52.
- [16] Mayer, “Letters of Karl Marx to Karl Blind,” 155.
- [17] REM, 251; Lafargue, *Karl Marx*, 26.
- [18] KMIR, 60–61; Liebknecht, *Karl Marx*, 126, 128–129.
- [19] KMIR, 61–62.
- [20] Ibid., 56–57.
- [21] REM, 251.
- [22] Francis Wheen, *Marx's Das Kapital*, 8.
- [23] Mayer, “Neu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 54–66; KMIR, 34–36.
- [24] MECW, Volume 39, 315.
- [25] Ibid., 293, 309.
- [26] Ibid., 308–309.
- [27] “Aleph,” *London Scenes and London People*, 153–154.
- [28] KMIR, 101–102.
- [29] Jenny Marx (daughter) to Laura Lafargue, Dec. 24, 1868, Moscow.
- [30] KMIR, 25–26.
- [31] MECW, Volume 39, 406.
- [32] Ibid., 406, 453, 454, 458.
- [33] Ibid., 453.
- [34] Ibid., 589.
- [35] Ibid., 405, 646(n).

- [36] Ibid., 502, 506, 511.
- [37] Ibid., 481.
- [38] Halliday, *Great Filth*, 73, 143.
- [39] MECW, Volume 39, 483.
- [40] Halliday, *Great Filth*, 77–78.
- [41] MECW, Volume 39, 457, 462–463, 465.
- [42] Ibid., 464–465.
- [43] Ibid., 408, 423–426.
- [44] Ibid., 427–428.
- [45] Ibid., 434–436.
- [46] Ibid., 443.
- [47] Ibid., 436.
- [48] Ibid., 448–449.
- [49] Ibid., 421, 472, 477.
- [50] Ibid., 455.
- [51] Ibid., 485–486.
- [52] Ibid., 428.
- [53] Ibid., 421.
- [54] Edgar Marx to Karl Marx, Mar. 27, 1854, IISG.
- [55] MECW, Volume 39, 467, 469.
- [56] Ibid., 483–484.
- [57] Liebknecht, *Karl Marx*, 145.
- [58] KMIR, 63–65.
- [59] Laura Marx to Jenny Marx, Aug. 1854, IISG.
- [60] Jenny Marx (daughter) to Jenny Marx, July 10, 1854, Moscow; *Olsen, Growth of Victorian London*, 191.
- [61] Jenny Marx (daughter) to Jenny Marx, July 24, 1854, Moscow.

24 穆希之死

- [1] MECW, Volume 39, 544.
- [2] Ibid., 509.
- [3] Ibid., 505, 658(n).
- [4] Schurz, *Reminiscences*, 393–395.
- [5] MECW, Volume 39, 296, 299;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30.
- [6] Liebknecht, *Karl Marx*, 106–107.
- [7] MECW, Volume 39, 658; Liebknecht, *Karl Marx*, 109.
- [8] “Aleph,” *London Scenes*, 271.
- [9] MECW, Volume 39, 505.
- [10] Ibid., 524.
- [11] Ibid., 522, 524–525.
- [12] Ibid., 526.
- [13] Ibid., 528.
- [14] Ibid.
- [15] Jenny Marx to Wilhelm von Florencourt, Aug. 10, 1855, Moscow.

- [16] Ibid.
- [17] MECW, Volume 39, 529.
- [18] Ibid., 530.
- [19] KMIR, 63.
- [20] Halliday, *Great Filth*, 86.
- [21] Jenny Marx to Wilhelm von Florencourt, Aug. 10, 1855, Moscow.
- [22] KMIR, 85.
- [23] Liebknecht, *Karl Marx*, 133–134, 179.
- [24] Ibid., 133–134.
- [25] MECW, Volume 39, 533.

第四部分 贫病交困中携手前行

25 分离的痛苦

- [1] William Shakespeare, *Richard III*, 109.
- [2] MECW, Volume 39, 534, 613(n).
- [3] Ibid., 533, 534, 544.
- [4] Gosudarstvennaia Obschestvenno-Politicheskaiia Biblioteka, Moscow.
- [5]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May 5, 1861, Moscow.
- [6] MECW, Volume 39, 536.
- [7] Ibid., 535.
- [8] Ibid., 526.
- [9] Ibid., 541.
- [10] Ibid., 543; Briggs and Callow, *Marx in London*, 46.
- [11] MECW, Volume 39, 550; Briggs and Callow, *Marx in London*, 46.
- [12] Jenny Marx to Wilhelm von Florencourt, Aug. 10, 1855, Moscow.
- [13] Jenny Marx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Jan. 29, 1858, Moscow.
- [14] MECW, Volume 39, 546.
- [15] MECW, Volume 41, 454.
- [16] MECW, Volume 39, 545.
- [17] Jenny Marx to Wilhelm von Florencourt, Sept. 22, 1855, Moscow.
- [18]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99; Wilson, *Victorians*, 186, 199.
- [19] Wilson, *Victorians*, 178–179, 183.
- [20] Ibid., 173;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49, 52.
- [21] Draper and Haberkern,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V*, 82.
- [22]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45.
- [23] 在1848年后的一次事件中，沙皇下令逮捕了一个文学社团的49名成员。社团成员包括27岁的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研究外国作家的社团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被捕成员被宣判将在1849年5月被处死。行刑日这一天，他们被押解到了刑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同伴已经等在这里。恐惧笼罩着他们，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被赦免了死刑，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沙皇尼古拉冷酷地嘲弄了这些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被驱逐、鞭打、或吊死。
来源：Others he deported, lashed, or hanged. Fejtö (ed.), *Opening of an Era*, 397.
- [24] Ibid., 395.
- [25] MECW, Volume 39, 534.

- [26] Wilson, *Victorians*, 179–180, 193.
- [27] *Ibid.*, 181, 183, 186.
- [28] August Ludwig von Rochau coined the term “realpolitik” in 1853.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22; MECW, Volume 39, 663–664;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122, 165.
- [29]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81.
- [30] MECW, Volume 39, 548–549.
- [31] *Ibid.*, 550.
- [32] *Ibid.*, 562.
- [33] *Ibid.*, 557, 559–560.
- [34] KMIR, 26.
- [35] Wilson, *Victorians*, 411.
- [36] MECW, Volume 40, 8.
- [37] *Ibid.*, 14.
- [38]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mid-July 1856, Moscow.
- [39] MECW, Volume 40, 33.
- [40] *Ibid.*, 41.
- [41] *Ibid.*, 33.
- [42] MECW, Volume 40, 33, 44.
- [43] *Ibid.*, 45.
- [44] *Ibid.*, 46.
- [45] *Ibid.*
- [46] *Ibid.*, 54.
- [47] *Ibid.*, 49–50. (English men had been clean-shaved but began growing beards in tribute to fighters in the Crimea after the war.)
- [48] *Ibid.*, 54–56.
- [49]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mid-July 1856, Moscow.
- [50]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Mar. 31, 1876, Moscow.
- [51]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mid-July 1856, Moscow.
- [52] MECW, Volume 40, 59, 63, 588(n).
- [53] *Ibid.*, 63.
- [54] *Ibid.*, 61.
- [55] *Ibid.*, 66.
- [56] *Ibid.*, 64.
- [57] *Ibid.*, 67.
- [58] *Ibid.*, 67, 71.
- [59] Olsen, *Growth of Victorian London*, 238.
- [60] MECW, Volume 40, 67, 71.
- [61] Briggs and Callow, *Marx in London*, 58, 60; Jenny Marx to Wilhelm von Florencourt, Oct. 4, 1856, Moscow.
- [62] Edgar von Westphalen to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Aug. 22, 1856, Dessau.
- [63] MECW, Volume 40, 68.
- [64] Jenny Marx (daughter) to Karl Marx, September 28, 1856, IISG.

- [65] MECW, Volume 40, 68.
- [66] Shepard, *London 1808–1870*, 71–72;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49.
- [67]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348;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85.
- [68] MECW, Volume 40, 191.
- [69] *Ibid.*, 74.
- [70] *Ibid.*, 72.
- [71] Jenny Marx to Wilhelm von Florencourt, Oct. 4, 1856, Moscow.
- [72] *Ibid.*; KMIR, 26.
- [73] Jenny Marx to Wilhelm von Florencourt, Oct. 4, 1856, Moscow.
- [74] KMIR, 26.
- [75] Flanders, *Victorian House*, lii.
- [76] Jenny Marx to Wilhelm von Florencourt, Oct. 4, 1856, Moscow.
- [77] Briggs and Callow, *Marx in London*, 60.
- [78] Jenny Marx to Wilhelm von Florencourt, Oct. 4, 1856, Moscow.
- [79] *Ibid.*
- [80] *Ibid.*
- [81] KMIR, 26.
- [82] Raddatz, *Karl Marx*, 115.
- [83] MECW, Volume 40, 88.
- [84] *Ibid.*, 68, 590(n).
- [85] MECW, Volume 40, 69; Pawel, *Poet Dying*, 181.
- [86] KMIR, 26.
- [87] MECW, Volume 40, 87.
- [88] 美国《普特南氏月刊》稿酬丰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与其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马克思曾在1856年在伦敦与弗莱里格拉特、《普特南氏月刊》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以及另外一名美国人共进晚餐。马克思描述说奥姆斯特德“安静而友善”，分别时还特意向马克思征稿。来源：MECW, Volume 40, 68, 71, 88, 111.
- [89] Peters, *Red Jenny*, 118.

26 疾病缠身

- [1] MECW, Volume 41, 575.
- [2] MECW, Volume 40, 93–94.
- [3] MECW, Volume 41, 216.
- [4]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140.
- [5] MECW, Volume 40, 96–97.
- [6] *Ibid.*, 132, 563.
- [7] *Ibid.*, 111.
- [8] *Ibid.*, 564.
- [9] 这本百科全书在1858–1863年在纽约出版了16卷，参赛作品一般都是匿名的。来源：*Ibid.*, 122, 125, 599–600(n).
- [10] *Ibid.*, 124–125.
- [11] *Ibid.*, 565.

- [12] Caygill, *British Museum*, 12, 15, 29.
- [13] Jenny Marx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Jan. 19, 1858, Moscow; KMIR, 27.
- [14] MECW, Volume 40, 143, 146.
- [15] *Ibid.*, 148.
- [16] Jenny Marx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Jan. 19, 1858, Moscow.
- [17] MECW, Volume 40, 191.
- [18] *Ibid.*, 197.
- [19] *Ibid.*
- [20] *Ibid.*, 199.
- [21] *Ibid.*, 566.
- [22] *Ibid.*, 224, 226, 249.
- [23] *Ibid.*, 238.
- [24] *Ibid.*, 202, 213.
- [25] *Ibid.*, 203–204.
- [26] *Ibid.*, 236.
- [27] *Ibid.*, 215.
- [28] *Ibid.*, 220.

[29] 离婚获得批准后，财产的争夺仍在继续，直到拉萨尔通过并不完全合法的手段，得到哈茨费尔特公爵违法的证据，他威胁公爵如果不分割财产，就把证据公开。公爵权衡利弊之后，分给了公爵夫人和拉萨尔一生享用不尽的财产。来源： Raddatz, Karl Marx, 167, 171–172;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837; MECW, Volume 40, 23, 583–584(n).

- [30] MECW, Volume 40, 23.
- [31] *Ibid.*, 270, 286.
- [32] *Ibid.*, 255.
- [33] *Ibid.*
- [34] *Ibid.*, 273.
- [35] Jenny Marx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Jan. 29, 1858, Moscow.
- [36] Wilson, *Victorians*, 260, 263.
- [37] Jenny Marx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Jan. 29, 1858, Moscow.
- [38] MECW, Volume 41, 571; Longuet, *Karl Marx*, 201, 204.
- [39] Jenny Marx (daughter), May 1, 1857, IISG.
- [40] Jenny Marx to Berthe Markheim, July 6, 1863, Moscow.
- [41] MECW, Volume 40, 295.
- [42] MECW, Volume 40, 286.
- [43] *Ibid.*, 295.
- [44] *Ibid.*, 295, 297.
- [45] *Ibid.*, 304.
- [46] *Ibid.*, 569.
- [47] *Ibid.*, 374.
- [48] *Ibid.*, 309–310, 312.
- [49] *Ibid.*, 311.
- [50] *Ibid.*, 312.
- [51] *Ibid.*, 313.

- [52] Ibid., 315–316.
- [53] Ibid., 318.
- [54] O’Neill, *Good Old Days*, 10.
- [55] MECW, Volume 40, 328.
- [56] Ibid., 328–331.
- [57] Ibid., 332.
- [58] Ibid., 333–334, 347, 350.
- [59] Ibid., 335.
- [60] Pamela Horn, *Pleasures & Pastimes in Victorian Britain*, 125.
- [61] MECW, Volume 40, 339.
- [62] Yvonne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32; MECW, Volume 40, 337.
- [63] MECW, Volume 40, 340.
- [64] Ibid., 341.
- [65] Ibid., 351.
- [66] Ibid., 353–354.
- [67] Ibid., 358.
- [68] Ibid., 364.
- [69] Ibid., 368.
- [70] Ibid., 369.
- [71] Ibid., 371.
- [72] Ibid., 369.

27 福格特事件

- [1] MECW, Volume 40, 397.
- [2] Ibid., 620(n).
- [3] Breuilly, *Austria, Prussia and Germany*, 63; MECW, Volume 40, 620(n).
- [4]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240.
- [5] Taylor, *Struggle for the Mastery of Europe*, 58.
- [6] Breuilly, *Austria, Prussia and Germany*, 63; MECW, Volume 41, 617.
- [7] Jenny Marx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Feb. 10, 1859, Moscow.
- [8] MECW, Volume 40, 389–390.
- [9] Ibid., 400.
- [10] MECW, Volume 40, 547; KMIR, 27.
- [11] MECW, Volume 40, 402, 415.
- [12] Ibid., 406, 408.
- [13] Ibid., 404.
- [14] Ibid., 408.
- [15] Ibid., 416.
- [16] Ibid., 455.
- [17] Ibid., 435.
- [18] Ibid., 547.
- [19] Ibid., 446–447, 452.
- [20] Ibid., 454.
- [21] Ibid., 632–633(n).

- [22] Ibid., 520.
- [23] Ibid., 439.
- [24] Ibid.
- [25] Ibid., 462–463.
- [26] Padover, *Karl Marx*, 180; MECW, Volume 40, 635(n).
- [27] MECW, Volume 40, 457.
- [28] Ibid., 473.
- [29] McLellan, *Karl Marx*, 282, 286–288.
- [30] MECW, Volume 40, 471, 478.
- [31] McLellan, *Karl Marx*, 288.
- [32] MECW, Volume 40, 518.
- [33] Ibid., 473.
- [34] Ibid.
- [35] Ibid., 479.
- [36] Ibid., 572.
- [37] Ibid., 472.
- [38] Ibid., 484.
- [39] Ibid., 501.
- [40] Ibid., 489.
- [41] Ibid., 490.
- [42] Ibid., 491.
- [43] Ibid., 493.
- [44] Ibid., 575.
- [45] Ibid., 498–499.
- [46] Ibid., 511.
- [47] Ibid., 532–533.
- [48] Ibid., 496, 508, 548.
- [49] Ibid., 548.
- [50] Jenny Marx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Feb. 10, 1859, Moscow.
- [51] MECW, Volume 40, 569.
- [52] Ibid., 466.
- [53] Ibid., 572–573 and Volume 41, 571.
- [54] MECW, Volume 40, 573–576.
- [55] Ibid., 574.
- [56] Wilson, *Victorians*, 225–226.
- [57] MECW, Volume 40, 551.
- [58] MECW, Volume 41, 232, 246.
- [59] Liebknecht, *Karl Marx* 91.
- [60] MECW, Volume 40, 631; McLellan, *Karl Marx*, 289.
- [61] MECW, Volume 40, 434.
- [62] McLellan, *Karl Marx*, 289.
- [63] Ibid., 290; MECW, Volume 40, 521.
- [64] McLellan, *Karl Marx*, 290.
- [65] MECW, Volume 40, 514, 637–638(n); MECW, Volume 17, 10–11.

- [66] MECW, Volume 40, 515.
- [67] McLellan, *Karl Marx*, 290.
- [68] *Ibid.*, 291.
- [69] MECW, Volume 41, 80–83.
- [70] *Ibid.*, 188, 576.
- [71] *Ibid.*, 6.
- [72] *Ibid.*, 43 and Volume 17, 28–29, 41–43, 46–48, 89; McLellan, *Karl Marx*, 290.
- [73] McLellan, *Karl Marx*, 290.
- [74] MECW, Volume 41, 6, 69, 261; Mehring, *Karl Marx*, 288.
- [75] MECW, Volume 41, 9.
- [76] *Ibid.*, 13–14.
- [77] *Ibid.*, 22–23.
- [78] *Ibid.*, 24.
- [79] *Ibid.*, 572.
- [80] *Ibid.*, 114.
- [81] *Ibid.*, 28.
- [82] MECW, Volume 17, 12–13.
- [83] MECW, Volume 41, 29.
- [84] MECW, Volume 17, 14–15.
- [85] MECW, Volume 41, 75.
- [86] MECW, Volume 17, 259, 279.
- [87] MECW, Volume 41, 33.
- [88] *Ibid.*, 94.
- [89] *Ibid.*, 56.
- [90] *Ibid.*, 114.
- [91] *Ibid.*, 34, 77.
- [92] *Ibid.*, 567.
- [93] *Ibid.*, 157;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50;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200.
- [94] MECW, Volume 41, 567.
- [95] 燕妮的父母在世时，威斯特华伦家曾投了一笔钱（有些钱还是燕妮给父亲做秘书挣的）给另一家作为投资。这一家后来破产了，威斯特华伦家直到1860年（马克思一家搬去格拉弗顿坊4年之后）才拿回这笔钱，燕妮分到16英镑。来源：MECW, Volume 39, 526;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and Louise von Westphalen, June 4, 1860, Moscow.
- [96]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Oct. 13, 1863, Moscow.
- [97]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and Louise von Westphalen, June 4, 1860, Moscow.
- [98] Havelock Ellis; “Havelock Ellis on Eleanor Marx,” *Adelphi*, London, Sept.-Oct. 1935.
- [9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44.
- [100] MECW, Volume 41, 116.
- [101] *Ibid.*, 120–121.

- [102] Ibid., 121.
 [103] Ibid., 129, 609(n).
 [104] Ibid., 167.
 [105] Ibid., 175–176.
 [106] Ibid., 177.
 [107] Ibid., 568.
 [108] Ibid., 179.
 [109] Ibid., 190.
 [110] Ibid., 191, 198–199.
 [111] Ibid., 193.
 [112] Ibid., 195.
 [113] Jenny Marx (daughter) to Karl Marx, Sept. 17, 1862, Moscow.
 [114] MECW, Volume 41, 197–198.
 [115] Ibid., 202.
 [116] Ibid., 198, 205.
 [117] Ibid., 212.
 [118] Ibid., 207.
 [119] Ibid., 208, 211.
 [120] Ibid., 214.
 [121] Ibid., 216–217, 573.
 [122] MECW, Volume 41, 216; Halliday, *Great Filth*, 8, 9, 14, 16.
 [123] MECW, Volume 41, 573.
 [124] Halliday, *Great Filth*, 8–9, 58.
 [125] MECW, Volume 41, 216.
 [126] Ibid., 573.
 [127] Ibid., 220–221, 224; Liebknecht, *Karl Marx*, 180.
 [128] MECW, Volume 41, 222, 231.
 [129] MECW, Volume 17, 26, 50, 69.
 [130] MECW, Volume 41, 227, 234, 239, 327; McLellan, *Karl Marx*, 292.
 [131] MECW, Volume 41, 327–328; McLellan, *Karl Marx*, 292.
 [132] MECW, Volume 17, 26.
 [133] REM, 20; MECW, Volume 44, 130.

28 荷兰之行

- [1] MECW, Volume 41, 114.
 [2] Ibid., 573; Jenny Marx to Antoinette Philips, early May 1861, Moscow.
 [3] MECW, Volume 41, 574.
 [4] “Aleph,” *London Scenes*, 156.
 [5] MECW, Volume 41, 574.
 [6] Ibid., 231, 262.
 [7] Ibid., 231.
 [8] Ibid., 230, 232.
 [9] Ibid., 243.
 [10] Ibid., 252, 257.

- [11] Ibid., 263.
- [12] Ibid., 247.
- [13] Ibid., 617(n).
- [14] Ibid., 252.
- [15] Ibid., 261.
- [16] Ibid., 264–265.
- [17] REM, 252–253; Chushichi Tsuzuki, *Eleanor Marx*, 1855–1898, 12.
- [18]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Jan. 1, 1898, Moscow; Jenny Marx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Feb. 10, 1859, Moscow.
- [19]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Jan. 1, 1898, Moscow.
- [20] Jenny Marx to Louise von Westphalen, Feb. 10, 1859, Moscow; MECW, Volume 41, 582.
- [21] REM, 252–253.
- [22] MECW, Volume 41, 572.
- [23] Ibid., 258, 261.
- [24] Ibid., 264; Padover, *Karl Marx*, 185.
- [25] MECW, Volume 41, 264.
- [26] Ibid., 266.
- [27] Ibid., 268.
- [28] Ibid., 268–269.
- [29] Padover, *Karl Marx*, 186.
- [30] MECW, Volume 41, 503.
- [31] Ibid., 576–578.
- [32] Ibid., 576.
- [33] Ibid., 577–578.
- [34] Ibid., 269–271.
- [35] Ozment, *Mighty Fortress*, 165.
- [36] MECW, Volume 41, 269–271.
- [37] Ibid., 273.
- [38] Ibid., 578–579.
- [39] Ibid., 278.
- [40]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first half of April 1861, Moscow.
- [41] MECW, Volume 41, 275.
- [42] Ibid., 289.
- [43] Ibid., 279.
- [44] Ibid., 283.
- [45] Ibid., 279.
- [46] Ibid., 277.
- [47]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May 5, 1861, Moscow.
- [48] Ibid., MECW, Volume 41, 277.
- [49] MECW, Volume 41, 283.
- [50]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May 5, 1861, Moscow; Giroud, *Femme du diable*, 164.
- [51] MECW, Volume 41, 337–338.

- [1] MECW, Volume 41, 411.
- [2] Wilson, *Victorians*, 243–244; “Aleph,” *London Scenes*, 162; Hudson, *Munby*, 111.
- [3] “Aleph,” *London Scenes*, 162.
- [4] Edward Royle, *Radical Politics*, 1790–1900, 67.
- [5] MECW, Volume 41, 335–336; Hudson, *Munby*, 111–113.
- [6] MECW, Volume 19, 109.
- [7] MECW, Volume 41, 291.
- [8] *Ibid.*, 335–336.
- [9] MECW, Volume 19, 137–138; D. G. Wright, *Democracy and Reform, 1815–1885*, 64.
- [10] MECW, Volume 19, 137–138.
- [11] Hudson, *Munby*, 90, 113.
- [12] MECW, Volume 41, 376, 416.
- [13] *Ibid.*, 4 and Volume 19, 10.
- [14] MECW, Volume 41, 414.
- [15] *Ibid.*, 633(n).
- [16] *Ibid.*, 344, 347.
- [17] *Ibid.*, 402.
- [18] *Ibid.*, 341;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44.
- [19] MECW, Volume 41, 341.
- [20] *Ibid.*, 340–341.
- [21] *Ibid.*, 343–344.
- [22] *Ibid.*, 344, 354.
- [23] *Ibid.*, 344, 369, 376, 388.
- [24] *Ibid.*, 354.
- [25] *Ibid.*, 365.
- [26] *Ibid.*, 379.
- [27]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May 5, 1861, Moscow.
- [28] MECW, Volume 41, 380.
- [29] *Ibid.*, 383.
- [30] *Ibid.*, 389–390.
- [31] Robert Payne, *Karl Marx*, 334.
- [32] MECW, Volume 41, 389.
- [33] *Ibid.*, 390; Eduard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158.
- [34] MECW, Volume 41, 389, 399.
- [35] *Ibid.*, 389.
- [36] *Ibid.*, 390.
- [37] Robert Payne, *Karl Marx*, 335.
- [38] MECW, Volume 41, 399, 403.
- [39] *Ibid.*, 392.
- [40] *Ibid.*, 401.
- [41] *Ibid.*, 402.

- [42] Ibid., 401, 406.
- [43] Ibid., 405–406, 409.
- [44] Ibid., 411, 419.
- [45] Ibid., 411.
- [46] Ibid., 415–416.
- [47] Ibid., 417, 425.
- [48] Ibid., 414.
- [49] Ibid., 427.
- [50] Ibid., 582.
- [51] Ibid., 429.
- [52] MECW, Volume 19, 250.
- [53] MECW, Volume 41, 421.
- [54] Ibid., 436.
- [55] Ibid., 433;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Jan. 16, 1863, Moscow.
- [56]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Jan. 16, 1863, Moscow.
- [57] MECW, Volume 41, 433.
- [58]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Jan. 16, 1863, Moscow.
- [59] MECW, Volume 41, 441.
- [60] Ibid., 442.
- [61] Ibid., 443.
- [62] Ibid., 444–445.
- [63] Ibid., 446–448, 455.
- [64] Ibid., 468.
- [65] Ibid., 474, 481.
- [66] Ibid., 488.
- [67] Ibid., 481.
- [68] Ibid., 482, 582.
- [69] Ibid., 488;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Oct. 13, 1863, Moscow.
- [70] Jenny Marx to Karl Marx, early April 1862, Moscow.
- [71] MECW, Volume 41, 571.
- [72] Jenny Marx to Karl Marx, Aug. 1863, Moscow.
- [73] REM, 272; Longuet, *Karl Marx*, 204.
- [74] MECW, Volume 41, 571.
- [75] Jenny Marx to Karl Marx, early April 1862, Moscow.
- [76] MECW, Volume 41, 583; Jenny Marx to Karl Marx, Aug. 1863, Moscow.
- [77] MECW, Volume 41, 581.
- [78] Ibid., 584–585, 587.
- [79] Ibid., 585.
- [80] Ibid., 497, 587.
- [81] Ibid., 495.
- [82] Ibid., 500.
- [83] Ibid., 495.
- [84] Ibid., 499.
- [85] Ibid., 503.

- [86] Jenny Marx to Karl Marx, Jan. 1864, Moscow.
 [87] Ibid.
 [88]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Dec. 10, 1864, Moscow.
 [89] Hudson, Munby, 173.
 [90] MECW, Volume 41, 507, 510.
 [91] Ibid., 508, 511.
 [92] McLellan, Karl Marx, 304; Padover, *Karl Marx*, 192.
 [93] Briggs and Callow, *Marx in London*, 62; Sheppard, *London 1808–1870*, 156.
 [94] Padover, *Karl Marx*, 193.
 [95] McLellan, *Karl Marx*, 325.
 [96]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57; Briggs and Callow, *Marx in London*, 63.
 [97] MECW, Volume 41, 518, 520, 521, 522.
 [98] Ibid., 523.
 [99] Ibid., 524.
 [100] Ibid., 525.
 [101] Ibid., 170–171.

第五部分 从《资本论》到公社

30 流亡者的圣地

- [1] MECW, Volume 20, 12.
 [2] MECW, Volume 25, 266.
 [3] Sheppard, *London 1808–1870*, 118.
 [4] 直到 1865 年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通过，奴隶制才被完全禁止。
 [5]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57–59;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223.
 [6] 企业和政府都给了劳工组织一些活动的空间。法律也已经修改，允许建立部分工会和举行罢工。但对工人阶级来说，这远远不够。来源：Sheppard, *London 1808–1870*, 118.
 [7] MECW, Volume 41, 534.
 [8] 暴力事件出现，俄国政府指派的官员受到暗杀袭击。结果，有工人受到处罚，甚至被处死。波兰人一直期待相对自由民主的法国和英国能够给予帮助，但他们的期待落空了。来源：Davies, *Europe*, 828.
 [9] McLellan, *Karl Marx*, 340.
 [10] MECW, Volume 41, 546–547.
 [11] 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试水股票市场可能另有目的，他可能想让姨夫相信自己在进行资本交易，而不是在研究资本。来源：MECW, Volume 41, 543.
 [12]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Dec. 10, 1864, Moscow.
 [13] MECW, Volume 41, 546.
 [14]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July 16, 1864, Moscow.
 [15]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before May 29, 1865, Moscow.
 [16] Jenny Marx to Karl Marx and daughters, 1864, Moscow.
 [17] MECW, Volume 41, 552.
 [18] Ibid., 556.

- [19]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Spring 1866, Moscow.
- [20] MECW, Volume 41, 553–554.
- [21] Jenkins, *Engels in Manchester*, 18.
- [22] MECW, Volume 41, 555, 558; McLellan, *Karl Marx*, 327.
- [23] MECW, Volume 43, 88.
- [24]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73; Breuille (ed.), *19th-Century Germany*, 144, 151.
- [25] MECW, Volume 41, 556.
- [26] *Ibid.*, 560.
- [27] MECW, Volume 42, 15–16.
- [28]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49.
- [29] McLellan, *Karl Marx*, 341–342; Padover, *Karl Marx*, 223;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136; Sheppard, *London 1808–1870*, 336–337.
- [30] Padover, *Karl Marx*, 223.
- [31] MECW, Volume 42, 3–4, 587–588(n).
- [32] *Ibid.*, 3–4.
- [33] *Ibid.*, 17–18.
- [34] MECW, Volume 20, 9–11.
- [35] MECW, Volume 42, 43–44.
- [36] Raddatz, *Karl Marx*, 123.
- [37] Carr, *Michael Bakunin*, 197, 201.
- [38] *Ibid.*, 205, 207, 210.
- [39] *Ibid.*, 220.
- [40] *Ibid.*, 223.
- [41] *Ibid.*, 227.
- [42] *Ibid.*, 232–235.
- [43] *Ibid.*, 242.
- [44] MECW, Volume 41, 492.
- [45] Carr, *Michael Bakunin*, 305.
- [46] *Ibid.*, 308.
- [47] *Ibid.*, 287, 295, 299, 301.
- [48] MECW, Volume 42, 18–19.
- [49]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81.
- [50]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Dec. 10, 1864, Moscow.
- [51] Pool, *What Jane Austin Ate*, 53, 78.
- [52] Giroud, *Femme du diable*, 177.
- [53]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Dec. 10, 1864, Moscow.
- [54] MECW, Volume 20, 19–20.
- [55] MECW, Volume 42, 86, 161.
- [56] *The Times*, London, Feb. 6, 1865.
- [57] MECW, Volume 41, 582.
- [58] Eleanor Marx to Laura Marx, Dec. 29, 1868, Moscow.
- [59] Ernestine Liebknecht to Jenny Marx (daughter), late Dec. 1865, IISG.
- [60] Leslie Derfler, *Paul Lafargue and the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49.

- [61] Longuet, Karl Marx, 217–218.
- [62] Clemenceau became prime minister of France in 1906. Longuet, Karl Marx, 218.
- [63] Jacques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25.
- [64] Derfler, *Paul Lafargue and the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2.
- [65] 拉法格说自己曾在1865年受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分部委托来伦敦送信。不过，给拉法格写过传记的莱斯利·德夫勒对此表示怀疑，他怀疑拉法格在1866年是否待在伦敦，而且巴黎分部怎么会派一个新人去伦敦给中央委员会送信。来源：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33; Lafargue, *Karl Marx*, 11;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4–17.
- [66]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6.
- [67] Lafargue, *Karl Marx*, 11.
- [68] MECW, Volume 42, 106.
- [69] Lafargue, *Karl Marx*, 11.
- [70] *Ibid.*, 13–14.
- [71]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34.
- [72] Eleanor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Feb. 13, 1865, Moscow.
- [73] Eleanor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Feb. 1865, Moscow.
- [74] MECW, Volume 42, 129–130.
- [75]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名称在1866年改为总委员会。来源：MECW, Volume 42, 140 and Volume 43, 545.
- [76] MECW, Volume 42, 144.
- [77] *Ibid.*, 597(n).
- [78] *Ibid.*, 227.
- [79] *Ibid.*, 78.
- [80] MECW, Volume 20, 362.
- [81] Longuet, *Karl Marx*, 201.
- [82] MECW, Volume 42, 155.
- [83] *The Times*, London, Apr. 27, 1865.
- [84] MECW, Volume 42, 150.
- [85] MECW, Volume 20, 99–100.
- [86] MECW, Volume 42, 414.
- [87] *Ibid.*, 150.
- [88] *Ibid.*
- [89]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before May 27, 1865, Moscow.
- [90]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before May 29, 1865, Moscow;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before May 27, 1865, Moscow.
- [91]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before May 29, 1865, Moscow; Edgar von Westphalen to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May 26, 1865, Dessau; Jenny Marx (daughter)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Nov. 10, 1865, Moscow.
- [92] Edgar von Westphalen to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May 26, 1865, Dessau.
- [93]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to Edgar von Westphalen, Apr. 9, 1859, Dessau.

[94]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before May 29, 1865, Moscow.

[95] MECW, Volume 42, 160.

[96] Ibid., 159.

[97] Jenny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May 20, 1865, Moscow.

[98] MECW, Volume 42, 172–174.

[99] Ibid., 177

[100] Ibid., 175.

[101] Ibid., 178.

[102] Ibid., 180.

[103] Ibid., 183–184.

[104] Ibid., 180, 184, 193, 196.

[105] Ibid., 187–188.

[106] Ibid., 213, 221.

[107] Hudson, *Munby*, 216.

[108] MECW, Volume 42, 228.

[109] Ibid., 223–224, 228.

[110] Ibid., 227.

[111] Ibid., 249, 573–574,

[112] Ibid., 225–226, 233.

[113] Ibid., 233–234.

[114] Ibid., 236, 250.

[115] Ibid., 238.

31 拉法格之恋

[1] Germaine de Staël, *Delphine*, 371.

[2] MECW, Volume 42, 250; Longuet, *Karl Marx*, 211.

[3] Pawel, *Poet Dying*, 117–119.

[4]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21;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25.

[5]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26.

[6]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25.

[7] Ibid., 26;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27.

[8]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29.

[9]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27–28;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30–31.

[10]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Oct. 14, 1867, Moscow;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28;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32;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35;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101.

[11]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34.

[12] Longuet, *Karl Marx*, 220.

[13] MECW, Volume 20, 339.

[14] MECW, Volume 42, 243.

[15] Ibid., 243, 250.

[16] Raddatz, *Karl Marx*, 66.

- [17] MECW, Volume 42, 250–251.
- [18] *Ibid.*, 240; Olga Meier, Michèle Perrot, and Michel Trebitsch (eds.), *The Daughters of Karl Marx*, 5.
- [19] MECW, Volume 42, 241.
- [20] *Ibid.*, 245–246.
- [21]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5.
- [22] MECW, Volume 42, 246.
- [23] Longuet, *Karl Marx*, 220.
- [24] REM, 82.
- [25]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33.
- [26] MECW, Volume 42, 249.
- [27]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Spring 1866, Moscow.
- [28] Jenny Marx to Ferdinand von Westphalen, Aug. 8, 1865, Moscow.
- [29]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6–7.
- [30] *Ibid.*, 8.
- [31] MECW, Volume 42, 254.
- [32] *Ibid.*, 262.
- [33] *Ibid.*, 268;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Spring 1866, Moscow.
- [34] D. G.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10, 22–23; Breuille, *Austria, Prussia and Germany*, 7; Sperber (ed.), *Germany, 1800–1870*, 85; MECW, Volume 42, 288.
- [35] Robert Payne, *Karl Marx*, 390; Mayer, “Letters of Karl Marx to Karl Blind,” 155.
- [36] MECW, Volume 42, 272–273.
- [37] *Ibid.*, 273–274.
- [38] *Ibid.*, 274.
- [39] *Ibid.*, 287.
- [40] MECW, Volume 20, 411.
- [41] MECW, Volume 42, 303–304.
- [42]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Oct. 14, 1867, Moscow.
- [43] MECW, Volume 42, 306.
- [44] *Ibid.*, 307–308.
- [45] *Ibid.*, 308.
- [46] *Ibid.*, 308–309.
- [47] *Ibid.*, 309–310.
- [48] *Ibid.*, 310.
- [49] *Ibid.*, 313; Emile Bottigelli (ed.), *Lettres et documents de Karl Marx*, Karl Marx to Laura and Eleanor Marx, Aug. 28, 1866.
- [50] MECW, Volume 42, 313.
- [51] Jenny Marx (daughter) to Jenny Marx, Sept. 2, 1866, Moscow.
- [52] Jenny Marx (daughter) to Eleanor and Laura Marx, Sept. 6, 1866, Moscow; Eleanor Marx to Alice Liebknecht, Oct. 14, 1866, Moscow.
- [53]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9.
- [54]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Oct. 14, 1867, Moscow.

- [55] MECW, Volume 42, 328.
- [56] *Ibid.*, 321.
- [57] *Ibid.*, 398.
- [58] *Ibid.*, 331.
- [59] *Ibid.*, 332.
- [60] *Ibid.*
- [61] *Ibid.*, 576.
- [62] *Ibid.*, 343–344.
- [63] *Ibid.*, 383.
- [64] *Ibid.*, 350–351.
- [65]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6; MECW, Volume 42, 352.
- [66] MECW, Volume 3, 248.

32 《资本论》问世

- [1] Honoré de Balzac, *The Unknown Masterpiece*, 40.
- [2] MECW, Volume 42, 362–364.
- [3] *Ibid.*, 357.
- [4] *Ibid.*, 358.
- [5] *Ibid.*, 366.
- [6] *Ibid.*, 371.
- [7] *Ibid.*, 369.
- [8] *Ibid.*, 360–361.
- [9] MECW, Volume 42, 371–372.
- [10] *Ibid.*, 347–348.
- [11] *Ibid.*, 381–382.
- [12] *Ibid.*, 383, 394.
- [13]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7, 19.
- [14] *Ibid.*, 16.
- [15] Jenny Marx (daughter), undated Maitland Park, IISG.
- [16] Jenny Marx (daughter) notebook, IISG;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6–17; MECW, Volume 42, 369, 649(n).
- [17] MECW, Volume 42, 396–397.
- [18]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Oct. 14, 1867, Moscow.
- [19] Jenny Marx (daughter) to Jenny Marx, 1867, Moscow.
- [20] *Ibid.*
- [21] REM, 185.
- [22] MECW, Volume 42, 400.
- [23] *Ibid.*, 402–405.
- [24] *Ibid.*, 405.
- [25] REM, 26–27.
- [26] MECW, Volume 42, 405–406.
- [27] *Ibid.*, 431; Padover, *Karl Marx*, 208.
- [28] MECW, Volume 42, 428.
- [29] *Ibid.*, 451, 462; Carver, *Engels, Short Introduction*, 49–50.

- [30] MECW, Volume 42, 512.
[31] Ibid., 444, 467.
[32] Ibid., 443.
[33] Ibid., 490.
[34] McLellan, *Karl Marx*, 325.
[35] MECW, Volume 42, 549.
[36] Ibid., 453.
[37] Ibid., 453–454.
[38] Ibid., 458.
[39] Ibid., 507.
[40] Davies, *Europe*, 837.
[41] Berlin, *Karl Marx*, 15.
[42] KMIR, 145.
[43] MECW, Volume 35, 739.
[44] Ibid, 748.
[45] Ibid, 47–48.
[46] Ibid., 181–182.
[47] MECW, Volume 42, 514.
[48] MECW, Volume 35, 195.
[49] Ibid., 195.
[50] Ibid., 510.
[51] 马克思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法不同，后者认为资本控制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控制无偿劳动。来源：MECW, Volume 35, 219, 534。
[52] Ibid., 158–159.
[53] Ibid., 162–164.
[54] Ibid., 534.
[55] Ibid., 570–571.
[56] Ibid., 531.
[57] Ibid., 202.
[58] Ibid., 626.
[59] Berlin, *Karl Marx*, 176.
[60] MECW, Volume 35, 471, 87, 183.
[61] Ibid., 241.
[62] Ibid., 271.
[63] Ibid., 336.
[64] Ibid., 306–307.
[65] Ibid., 750.
[66] Ibid., 751.
[67] MECW, Volume 42, 578–579.

33 劳拉的婚礼

- [1] Lafargue, *Karl Marx*, 14.
[2] MECW, Volume 42, 519.
[3] Ibid., 535.

- [4] Ibid., 538.
- [5] Ibid., 517.
- [6] MECW, Volume 43, 25. (By way of comparison, Charles Dickens earned £33,000 in 1868 alone.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332.)
- [7] MECW, Volume 42, 579.
- [8] Jenny Marx to Ernestine Liebknecht, Oct. 14, 1867, Moscow.
- [9] MECW, Volume 42, 529.
- [10] Padover, *Karl Marx*, 195.
- [11] Morton, *Home Rule*, 1, 3, 5; Wilson, *Victorians*, 77, 79, 80, 83;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201–202.
- [12] MECW, Volume 21, 190, 192 and Volume 42, 486.
- [13] Paul Rose, *The Manchester Martyrs*, 16.
- [14] Ibid., 13.
- [15] Ibid., 17–19.
- [16] Jenkins, *Engels in Manchester*, 18; REM, 88.
- [17] Rose, *Manchester Martyrs*, 28; Annie Besant, *An Autobiography*, 73–74.
- [18] Mayer, *Friedrich Engels*, 202; REM, 88; Rose, *Manchester Martyrs*, 75.
- [19] Rose, *Manchester Martyrs*, 38, 42; Besant, *Autobiography*, 75.
- [20] MECW, Volume 42, 501.
- [21] Ibid., 483.
- [22] Ibid., 431.
- [23] Ibid., 444.
- [24] Rose, *Manchester Martyrs*, 46; Besant, *Autobiography*, 75–76.
- [25] Rose, *Manchester Martyrs*, 67.
- [26] MECW, Volume 42, 460 and Volume 21, 121.
- [27] Rose, *Manchester Martyrs*, 70.
- [28] Ibid., 11; MECW, Volume 42, 484; Morton, *Home Rule*, 19.
- [29] Morton, *Home Rule*, 19.
- [30] MECW, Volume 42, 474.
- [31] O'Neill, *Good Old Days*, 225; Winder, *Bloody Foreigners*, 205.
- [32] MECW, Volume 42, 505–506.
- [33] Ibid., 479.
- [34]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42–43.
- [35] MECW, Volume 42, 483, 492, 666(n).
- [36] Ibid., 501–502.
- [37] Ibid., 503.
- [38] Ibid., 542, 553.
- [39] Flanders, *Victorian House*, 197; MECW, Volume 42, 72.
- [40] MECW, Volume 42, 538.
- [41] Ibid., 542, 548.
- [42] MECW, Volume 42, 551.
- [43] Ibid., 554.
- [44] FE-PL, Volume I, 20.
- [45] Ibid., 22, 23.

- [46] MECW, Volume 42, 316.
- [47] *Ibid.*, 547, 556, 557.
- [48] Padover, *Karl Marx*, 284.
- [49]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58.
- [50]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32.
- [51] Jenny Marx (daughter) to Laura Lafargue, Apr. 7, 1868, Moscow.
- [52] MECW, Volume 43, 9–10.
- [53] *Ibid.*, 25.
- [54] *Ibid.*, 28.
- [55] Eleanor Marx, notebook, IISG.
- [56] Eleanor Marx to Lion Philips, undated (1863), Moscow.
- [57] MECW, Volume 42, 513, 525.
- [58] Lafargue, *Karl Marx*, 29.
- [59] O'Neill, *Good Old Days*, 225; Wilson, *Victorians*, 338.
- [60] Eleanor Marx to Lizzy Burns, Feb. 14, 1868, Moscow.
- [61] Jenny Marx (daughter) to Eleanor Marx, June 1868, Moscow.
- [62] MECW, Volume 43, 44.
- [63] *Ibid.*, 50.
- [64] *Ibid.*, 75.
- [65] *Ibid.*, 72.
- [66] Jenny Marx (daughter) to Laura Lafargue, Dec. 24, 1868; MECW, Volume 43, 171.
- [67] MECW, Volume 43, 171.
- [68] *Ibid.*, 213.
- [69] *Ibid.*, 199.
- [70] Jenny Marx (daughter) to Laura Lafargue, Jan. 7, 1869, Moscow.
- [71] *Ibid.*
- [72] MECW, Volume 43, 594(n).
- [73] *Ibid.*, 130–131.
- [74] *Ibid.*, 169–170.
- [75] *Ibid.*, 214.
- [76] Olsen, *Growth of Victorian London*, 237;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354.
- [77] MECW, Volume 43, 171–172.

34 小燕妮登上舞台

- [1] Charles Prolès, *Gustave Flourens*, 92.
- [2] MECW, Volume 20, 478(n);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83–284.
- [3]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85.
- [4] *Ibid.*, 286.
- [5] Mehring, *Karl Marx*, 394.
- [6] McLellan, *Karl Marx*, 360; MECW, Volume 44, 291.
- [7] MECW, Volume 43, 8.

- [8] Mehring, *Karl Marx*, 392.
- [9] MECW, Volume 42, 515, 520, 669(n); Mehring, *Karl Marx*, 393.
- [10] MECW, Volume 42, 520.
- [11] MECW, Volume 43, 173–174.
- [12]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61.
- [13] MECW, Volume 43, 155.
- [14]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33–34.
- [15] Laura Lafargue to Karl Marx, Nov. 2, 1868, Moscow.
- [16] MECW, Volume 42, 178.
- [17]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61.
- [18]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38.
- [19] MECW, Volume 43, 216.
- [20] *Ibid.*, 243.
- [21] *Ibid.*, 216.
- [22] *Ibid.*, 225.
- [23] *Ibid.*, 229.
- [24] *Ibid.*, 214.
- [25]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37.
- [26] MECW, Volume 43, 217, 608(n).
- [27] *Ibid.*, 287–288.
- [28] *Ibid.*, 290.
- [29]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66.
- [30] MECW, Volume 43, 243.
- [31] *Ibid.*
- [32]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34.
- [33]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63;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28.
- [34]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70.
- [35]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27.
- [36]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37.
- [37] *Ibid.*, 46.
- [38] MECW, Volume 43, 262.
- [39]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38.
- [40] *Contemporary Review*, London, No. 6, June 1868, 317.
- [41] Karl Marx, Jenny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186–187.
- [42] MECW, Volume 43, 410, 528.
- [43]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40.
- [44] MECW, Volume 43, 270.
- [45] *Ibid.*, 275.
- [46] Jenny Marx (daughter) to Jenny Marx, May 1869, Moscow; MECW, Volume 21, 48, 466(n).
- [47] MECW, Volume 43, 297; 618–619(n). (The upper ten thousand referred to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literary and political classes. Wilson, *Victorians*, 274.)

- [48] MECW, Volume 43, 310, 623(n).
- [49] *Ibid.*, 620(n).
- [50] 马克思和小燕妮在9月一起去了德国，在10月12日之前返回。他们在汉诺威与库格曼一家待在一起，马克思见了政治伙伴。来源：MECW, Volume 43, 353.
- [51]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49;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Mar. 15, 1898, Moscow.
- [52] MECW, Volume 43, 295, 308.
- [53] *Ibid.*, 303.
- [54] Jenkins, *Engels in Manchester*, 10; REM, 186.
- [55] MECW, Volume 43, 299.
- [56]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141; Hunt, *Frock-Coated Communist*, 240.
- [57] MECW, Volume 43, 302–303.
- [58] MECW, Volume 43, 311; Mayer, *Friedrich Engels*, 253.
- [59]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51–52; Eleanor Marx to Jenny Marx (daughter), July 1969, Moscow.
- [60] MECW, Volume 43, 356–357.
- [61] Jeremiah O'Donovan Rossa, *My Years in English Jails*, 8–9, 30.
- [62] MECW, Volume 21, 101.
- [63] Bert Andreas (ed.), *Briefe und Dokumente de Familie Marx*, 131.
- [64] MECW, Volume 43, 546.
- [65] *Ibid.*, 366.
- [66] *Ibid.*, 365.
- [67] Morton, *Home Rule*, 13.
- [68] O'Donovan Rossa, *My Years*, 214.
- [69] MECW, Volume 43, 387.
- [70] Andreas, *Briefe und Dokumente*, 205.
- [71] MECW, Volume 43, 449.
- [72] *Ibid.*, 640(n);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64(n).
- [73]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65; David Wetzell, *A Duel of Giants*, 44.
- [74]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3.
- [75]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75.
- [76]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7.
- [77] MECW, Volume 43, 419;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34.
- [78]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34.
- [79]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60–61.
- [80] MECW, Volume 43, 314–316.
- [81] *Ibid.*, 644(n).
- [82] *Ibid.*, 431.
- [83] Prolès, *Gustave Flourens*, 51.
- [84]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65–66.
- [85] MECW, Volume 43, 440.
- [86] *Ibid.*, 646(n).

- [87] MECW, Volume 21, 101–102.
- [88] MECW, Volume 43, 444–445.
- [89] Charles Habeneck to Jenny Marx (daughter), 1870, Moscow.
- [90] Jennychen published eight articles in *La Marseillaise* from March 1 to April 24, 1870. MECW, Volume 21, 414–416 and Volume 43, 646(n).
- [91] O'Donovan Rossa, *My Years*, 98; MECW, Volume 21, 417–418.
- [92] MECW, Volume 43, 497; Marx, Marx, and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192.
- [93] O'Donovan Rossa, *My Years*, 198; MECW, Volume 21, 417–418.
- [94] MECW, Volume 43, 454–455.
- [95] MECW, Volume 21, 420.
- [96] MECW, Volume 43, 458.
- [97] *Ibid.*, 461, 649(n); O'Donovan Rossa, *My Years*, 218.
- [98] MECW, Volume 43, 461.
- [99] *Ibid.*, 458.
- [100] *Ibid.*, 466.
- [101] *Ibid.*, 423, 559.
- [102] *Ibid.*, 559.
- [103] 拿破仑三世通过模糊的措辞，使得反对加强皇权的选票同时也反对立法议员要求的民主改革，而支持授予他更多权力的选票则能让他的统治更加合法，让他日渐衰弱的根基得到强化。来源：Washburne, *Recollections*, 26; MECW, Volume 43, 653(n), 656(n).
- [104] MECW, Volume 22, 3 and Volume 43, 522.
- [105] MECW, Volume 43, 656(n).
- [106] *Ibid.*, 444.
- [107]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65.
- [108] MECW, Volume 43, 446.
- [109]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66.
- [110] MECW, Volume 43, 486.
- [111] *Ibid.*, 556–557.
- [112]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62.
- [113] MECW, Volume 43, 497.
- [114] Andreas, *Briefe und Dokumente*, 217.
- [115] MECW, Volume 43, 504–505.
- [116] Prolès, *Gustave Flourens*, 52.
- [117] MECW, Volume 44, 558.
- [118] MECW, Volume 43, 495.
- [119] *Ibid.*, 442, 514.
- [120] Jenny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July 12, 1870, Moscow.

35 普法战争

- [1] MECW, Volume 49, 35.
- [2]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26; Wetzel, *Duel of Giants*, 31, 37–38, 96, 110;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203–204; Ozment, *Mighty Fortress*, 210.

- [3]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33–34.
- [4] *Ibid.*, 55.
- [5] Andreas, *Briefe und Dokumente*, 224.
- [6] MECW, Volume 44, 591(n).
- [7] The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was formed in August 1869 after breaking away from the General Union.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48.
- [8] MECW, Volume 44, 3–4.
- [9] MECW, Volume 22, 4.
- [10] *Ibid.*, 6.
- [11] *Ibid.*, 3–7.
- [12] MECW, Volume 44, 40, 598 (n).
- [13] *Ibid.*, 7, 35, 593(n).
- [14] *Ibid.*, 32, 58.
- [15] 小燕妮说自己称呼恩格斯“将军”是因为他的军事文章极为精彩，也因为《费加罗报》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好像就是在特指某个人。来源：Andreas, *Briefe und Dokumente*, 229.
- [16]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54–55.
- [17] *Ibid.*, 59–60.
- [18] MECW, Volume 44, 64–65, 71.
- [19] Prosper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of 1871*, 1.
- [20]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65.
- [21]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69, 72, 74–75, 77.
- [22] MECW, Volume 44, 59.
- [23] *Ibid.*, 65.
- [24]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100.
- [25] *Ibid.*, 105–106; W. H. C. Smith, *Second Empire*, 56–57.
- [26]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108.
- [27] *Ibid.*, 111.
- [28] *Ibid.*, 126.
- [29] *Ibid.*, 131.
- [30] *Ibid.*, 109.
- [31] *Ibid.*, 131.
- [32] Charles Longuet to Karl Marx, Sept. 5, 1870, Moscow.
- [33] MECW, Volume 44, 64–65.
- [34]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78–79.
- [35]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140–141.
- [36] *Ibid.*, 133.
- [37] MECW, Volume 44, 560.
- [38] Robert Gildea, *The Third Republic*, 3.
- [39]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0; W. H. C. Smith, *Second Empire*, 57.
- [40]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1.
- [41]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208–209;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2.

- [42]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210;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3.
- [43]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212;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5.
- [44]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2.
- [45]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201.
- [46] REM, 186.
- [47] MECW, Volume 42, 530;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72–74; Carr, *Michael Bakunin*, 446.
- [48] Lafargue, *Karl Marx*, 17.
- [49] MECW, Volume 44, 105.
- [50] Marx, Marx, and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171; MECW, Volume 43, 548.
- [51] MECW, Volume 44, 81, 102.
- [52] REM, 90; Lafargue, *Karl Marx*, 31.
- [53] Andreas, *Briefe und Dokumente*, 229.
- [54] Paul Lafargue to Karl Marx, late 1870, IISG.
- [55]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80–82.
- [56]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175, 267.
- [57]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82.
- [58]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235, 244, 271, 274.
- [59]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1.
- [60]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271.
- [61] MECW, Volume 44, 108.
- [62] MECW, Volume 22, 274 and Volume 44, 595(n), 606(n).
- [63] MECW, Volume 44, 97.
- [64] *Ibid.*, 95–96.
- [65] O'Donovan Rossa, *My Years*, 227; Jenny Marx (daughter) to Kugelmann, Jan. 27, 1871, Moscow.
- [66] O'Donovan Rossa, *My Years*, 227.
- [67] *Ibid.*, 237–238.
- [68]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290.
- [69] 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53.
- [70]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3.
- [71]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41, 65;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210.
- [72] Horne, *Terrible Year*, 59;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4–35.
- [73] Horne, *Terrible Year*, 60;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320–321.
- [74]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6, 36.
- [75] *Ibid.*, 36.
- [76]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323.
- [77] Horne, *Terrible Year*, 61;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324;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7.
- [78]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8–39.
- [79] Horne, *Terrible Year*, 61;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325.
- [80] Washburne, *Recollections*, 327–328;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41.

[81]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50.

[82] Horne, *Terrible Year*, 66;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56–57.

36 公社万岁

[1]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128.

[2] *Ibid.*, 51;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66.

[3]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70, 77; Horne, *Terrible Year*, 72.

[4]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07–209.

[5] *Ibid.*, 72.

[6] *Ibid.*, 72–73.

[7] *Ibid.*, 74.

[8] Prolès, *Gustave Flourens*, 81.

[9]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74.

[10]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52;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78–79.

[11] MECW, Volume 22, 323;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80.

[12]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54.

[13]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81.

[14] *Ibid.*, 84.

[15] *Ibid.*, 128–129.

[16] W. H. C. Smith, *Second Empire*, 63.

[17] MECW, Volume 22, 157, 288.

[18] *Ibid.*, 289.

[19] MECW, Volume 44, 130–131.

[20]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164.

[21] Prolès, *Gustave Flourens*, 85–87;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166.

[22] Prolès, *Gustave Flourens*, 87–90.

[23] *Ibid.*, 90; MECW, Volume 22, 326;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166.

[24]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167–168; Horne, *Terrible Year*, 95.

[25]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169.

[26] *Ibid.*, 185.

[27] *Ibid.*, 191.

[28] Prolès, *Gustave Flourens*, 91.

[29]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April 5, 1871, 4.

[30] Jenny Marx to Kugelmann, May 12, 1871, Moscow; MECW, Volume 22, 326.

[31] Marx, Marx, and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192; Andreas, *Briefe und Dokumente*, xvii.

[32] MECW, Volume 44, 129.

[33]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91–92.

[34] *Ibid.*, 87.

[35] *Ibid.*, 99.

[36] *Ibid.*, 98–99.

- [37] Marx, Marx, and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192.
- [38] Jenny Marx (daughter) to Laura Lafargue, Apr. 18, 1871, Moscow; Marx, Marx, and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192.
- [39]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99; Marx, Marx, and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192.
- [40]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73.
- [41]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03–106;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56–57.
- [42] Jenny Marx (daughter) to Karl and Jenny Marx, May 4, 1871, Moscow; Jenny Marx to Kugelmann, May 12, 1871, Moscow; Jenny Marx (daughter) to Friedrich Engels, May 9, 1871, Moscow.
- [43] Marx, Marx, and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173.
- [44] MECW, Volume 44, 131–132.
- [45]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95.
- [46] Horne, *Terrible Year*, 114–115;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90–291; *The Times*, London, May 17, 1871, 5.
- [47]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06.
- [48] Horne, *Terrible Year*, 121;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151;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12, 314.
- [49] Horne, *Terrible Year*, 121.
- [50] *Ibid.*, 112;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298, 314.
- [51]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00, 324;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x.
- [52] Horne, *Terrible Year*, 139;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29.
- [53] Horne, *Terrible Year*, 133; *The Times*, London, May 31, 1871, 9.
- [54] *The Eastern Post*, London, Apr. 20, 1872, 20.
- [55] Horne, *Terrible Year*, 129, 131; *The Evening Standard*, London, May 25, 1871, 1; *The Evening Standard*, London, May 26, 1871, 1; *The Standard*, London, May 29, 1871, 5.
- [56] Thomas, *Women Incendiaries*, 166.
- [57]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66.
- [58] *Ibid.*, 383.
- [59] MECW, Volume 44, 143.
- [60] *Ibid.*, 151.
- [61] Horne, *Terrible Year*, 126.
- [62] MECW, Volume 44, 151.
- [63] *Ibid.*, 153.
- [64] Jenny Marx to Karl Marx, undated (Spring 1871), Moscow.
- [65] *Ibid.*
- [66] Horne, *Terrible Year*, 137;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84–385, 489.
- [67]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484.
- [68] *Ibid.*, 491.
- [69] *The Evening Standard*, London, May 31, 1871, 1.

- [70] Ibid.
- [71]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90–391.
- [72] *The Standard*, London, June 2, 1871, 5.
- [73] Horne, *Terrible Year*, 139; W. H. C. Smith, *Second Empire*, 65;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95.
- [74]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397.
- [75] Horne, *Terrible Year*, 139;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458–459.
- [76] MECW, Volume 44, 159; McLellan, *Karl Marx*, 368; Berlin, *Karl Marx*, 189.
- [77] MECW, Volume 22, 336.
- [78] Ibid., 355.
- [79] McLellan, *Karl Marx*, 372.
- [8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333.
- [81] *Pall Mall Gazette*, London, May 1871, 2065.
- [82] *The New York World*, June 3, 1871, 1.
- [83] *Chicago Tribune*, June 5, 1871, 1.
- [84] *The Evening Standard*, London, June 23, 1871, 5.
- [85]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465.
- [86] McLellan, *Karl Marx*, 366.
- [87] MECW, Volume 23, 223.
- [88] MECW, Volume 44, 158, 680(n).
- [89] Ibid., 564;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08.
- [90] MECW, Volume 44, 153–154, 617(n);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08.
- [91] Jenny Marx (daughter) to Friedrich Engels, July 5, 1871, IISG.
- [92] Jenny Marx (daughter) to “doctor” [Ludwig Kugelmann], Oct. 3, 1871, Moscow.
- [93] MECW, Volume 24, 460–461;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09.
- [94] Georg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78.
- [95]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09.
- 37 姐妹被软禁
- [1] MECW, Volume 22, 632.
- [2]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78; MECW, Volume 22, 623.
- [3] Jenny Marx (daughter) to Friedrich Engels, July 5, 1871, IISG.
- [4]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78; MECW, Volume 22, 623.
- [5] Ibid.
- [6] MECW, Volume 24, 460–461.
- [7]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78–479, 484; MECW, Volume 22, 623–625 and Volume 44, 564.
- [8]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14.

- [9] Ibid., 479–480; MECW, Volume 22, 625.
- [10] MECW, Volume 24, 460–461.
- [11]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80–482; MECW, Volume 22, 625–627.
- [12]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82–483; MECW, Volume 22, 628–629.
- [13] McLellan, *Karl Marx*, 373;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13.
- [14]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83; MECW, Volume 22, 630.
- [15] Paul Lafargue to Karl Marx, Apr. 16, 1871, IISG.
- [16]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13.
- [17] W. H. C. Smith, *Second Empire*, 70; *The Standard, London*, June 3, 1871, 5.
- [18] MECW, Volume 44, 154.
- [19] Porter, *Refugee Question*, 217.

第六部分 马克思家庭的悲与欢

38 小燕妮恋爱

- [1] Vladimir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7, 143.
- [2]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413–414, 420–421; Horne, *Terrible Year*, 139.
- [3]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57, 158; REM, 29.
- [4] Lissagaray, *History of the Commune*, 109.
- [5] Longuet, *Karl Marx*, 221.
- [6] REM, 162.
- [7] Ibid., 82.
- [8] KMIR, 106.
- [9] Jenny Marx (daughter) to Kugelmann, Oct. 6, 1871, Moscow.
- [10] KMIR, 107.
- [11] *New York Herald*, Aug. 30, 1871.
- [12] *Chicago Tribune*, Dec. 18, 1871.
- [13] MECW, Volume 22, 600.
- [14] KMIR, 111; MECW, Volume 44, 213.
- [15] MECW, Volume 22, 398.
- [16] *Public Opinion*, London, Aug. 19, 1871, 229 and Aug. 26, 1871, 262; MECW, Volume 22, 393.
- [17] MECW, Volume 44, 176–177.
- [18] Ibid., 206–207.
- [19] Ibid., 207.
- [20] Bakunin's group was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 Carr, *Michael Bakunin*, 345, 352.
- [21] Ibid., 396, 404–407.
- [22] Ibid., 446.
- [23] Berlin, *Karl Marx*, 190.

- [24] REM, 290; KMIR, 103–105.
- [25] REM, 170–171.
- [26] MECW, Volume 22, 423–431.
- [27] *Ibid.*, 426–427.
- [28] Jenny Marx (daughter) to “doctor” [Ludwig Kugelmann], Oct. 3, 1871, Moscow; Robert Payne, Karl Marx, 429.
- [29] MECW, Volume 44, 186.
- [30] MECW, Volume 22, 633–634; McLellan, *Karl Marx*, 377.
- [31] MECW, Volume 44, 220.
- [32] *Ibid.*, 229.
- [33] *Ibid.*, 216.
- [34] *Ibid.*, 229.
- [35] Jenny Marx (daughter) to “doctor” [Ludwig Kugelmann], Oct. 3, 1871, Moscow.
- [36] MECW, Volume 44, 617(n).
- [37] *Ibid.*, 228–229.
- [38] REM, 299.
- [39]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308.
- [40] Jenny Marx (daughter) to the Kugelmanns, Dec. 21, 1871, Moscow.
- [41] MECW, Volume 44, 562.
- [42] MECW, Volume 23, 635.
- [43] Jenny Marx (daughter) to the Kugelmanns, Dec. 21, 1871, Moscow.
- [44] FE-PL, Volume I, 32.
- [45] Jenny Marx (daughter) to Charles Longuet, Friday evening (Feb. 1872), Moscow.
- [46] Charles Longuet to Jenny Marx (daughter), before Feb. 15, 1872, Moscow.
- [47] Jenny Marx (daughter) to Charles Longuet, Feb. 17, 1872, Moscow.
- [48] Jenny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May 26, 1872, Moscow.
- [49] FE-PL, Volume III, 403–405; MECW, Volume 44, 283;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14–115.
- [50] MECW, Volume 44, 574.
- [51] J. Roy to Charles Longuet, Jan. 19, 1872, Moscow.
- [52] FE-PL, Volume I, 46.
- [53] KMIR, 91.
- [54] *Longuet, Karl Marx*, 207.
- [55] Jenny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May 26, 1872, Moscow.
- [56] MECW, Volume 44, 32.
- [57] Jenny Marx (daughter) to the Kugelmanns, May 3, 1872, Moscow.
- [58] MECW, Volume 44, 575.
- [59]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13–415.
- [60] REM, 250.
- [61]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145.
- [62] *Ibid.*, 155–156.

- [63] Ibid., 160.
- [64] Jenny Marx (daughter) to the Kugelmanns, Dec. 21, 1871, Moscow.
- [65] FE-PL, Volume I, 46.
- [66] Jenny Marx (daughter) to Kugelmann, Jan. 22, 1872, IISG;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19.
- [67]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63.
- [68] MECW, Volume 44, 581.
- [69] Ibid., 327.
- [70] Ibid., 347.
- [71] Marx, Marx and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214–215.
- [72] Ibid., 216–217.
- [73]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42.
- [74] FE-PL, Volume III, 463.
- [75]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38.
- [76] FE-PL, Volume III, 428–429.
- [77]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38–141.
- [78] FE-PL, Volume III, 471.

39 杜西的烦恼

- [1] MECW, Volume 23, 256.
- [2] MECW, Volume 44, 386, 387.
- [3] Ibid., 346–347.
- [4] Ibid., 387.
- [5] Ibid., 100, 283, 607(n).
- [6] Ibid., 385.
- [7] Ibid., 390.
- [8] Ibid., 396.
- [9]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68; Carr, *Michael Bakunin*, 453.
- [10]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76.
- [11] Hobsbawm, *Age of Revolution*, 197.
- [12] Ibid., 198.
- [13] MECW, Volume 44, 399.
- [14] McLellan, *Karl Marx*, 395.
- [15] MECW, Volume 44, 400.
- [16]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308; MECW, Volume 44, 438.
- [17] McLellan, *Karl Marx*, 394.
- [18] MECW, Volume 44, 385.
- [19] Jenny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May 26, 1872, Moscow.
- [20] Carr, *Michael Bakunin*, 375–376;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64.
- [21]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347.
- [22] Ibid., 349; MECW, Volume 43, 595(n).
- [23]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350–351.
- [24] Fyodor Dostoevsky incorporated this crime into his novel *Demons*.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64.

- [25] MECW, Volume 44, 398.
- [26]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294.
- [27] REM, 163.
- [28]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358.
- [29] MECW, Volume 44, 426.
- [30]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359.
- [31]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360; Padover, *Karl Marx*, 244; REM, 208.
- [32] MECW, Volume 44, 438–439.
- [33] KMIR, 90.
- [34] *Ibid.*, 91.
- [35] *Ibid.*, 113; FE-PL, Volume III, 473.
- [36] Nicolaievsky and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360–361.
- [37] *Ibid.* 361; KMIR, 159.
- [38] MECW, Volume 44, 516.
- [39] REM, 210.
- [40] Bakunin's most notable International follower, James Guillaume, was also expelled. MECW, Volume 23, 249.
- [41] Padover, *Karl Marx*, 245.
- [42] *Ibid.*, 246; REM, 212.
- [43] MECW, Volume 23, 254–256.
- [44] Carr, *Michael Bakunin*, 430.
- [45] *Ibid.*, 418.
- [46]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65.
- [47] Carr, *Michael Bakunin*, 325, 353–354, 372.
- [48] *Ibid.*, 456–457.
- [49] *Ibid.*, 459, 461.
- [50] *Ibid.*, 408.
- [51] Bakunin died in 1876. Carr, *Michael Bakunin*, 461, 478.
- [52] Jenny Marx–Charles Longuet Certificate of Marriage, Moscow.
- [53] Jenny Longuet to the Kugelmanns, Dec. 23, 1872, Moscow.
- [54] Jenny Longuet to Karl Marx, Oct. 30, 1872, Moscow.
- [55] Jenny Longuet to Karl Marx, undated (likely Fall 1872), Moscow.
- [56] MECW, Volume 44, 450.
- [57] Jenny Longuet to the Kugelmanns, Dec. 23, 1872, Moscow; Jenny Marx to Johann Philip Becker, Nov. 7, 1872, Moscow.
- [58] MECW, Volume 44, 455.
- [59]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13–114.
- [60]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Mar. 1873, Moscow.
- [61]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68.
- [62] MECW, Volume 44, 457.
- [63] *Ibid.*, 472, 517;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53.
- [64] MECW, Volume 44, 527.
- [65] *Ibid.*, 544, 676(n) and Volume 45, 456; Jenny Marx to Madame Longuet,

Oct. 1874, Moscow; McLellan, *Karl Marx*, 389.

[66] MECW, Volume 45, 468.

[67]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54.

[68] Jenny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July 1873, Moscow.

[69] Jenny Marx to Eleanor Marx, May 1873, Moscow; Marx, Marx, and Engels, *Lettres à Kugelmann*, 224–225.

[70] Jenny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July 1873, Moscow.

[71] MECW, Volume 45, 457(n), 460(n) and Volume 44, 607(n).

[72] REM, 76; Berlin, *Karl Marx*, 213.

[73] Jenny Longuet to Karl Marx, Apr. 24, 1874, Moscow.

[74] REM, 76.

[75] Jenny Marx to Eleanor Marx, May 1873, Moscow; Jenny Marx to Eleanor Marx, June 1873, Moscow.

[76] Jenny Marx to Eleanor Marx, May 1873, Moscow.

[77]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146.

[78] Eleanor Marx to Karl Marx, May 3, 1873, Moscow.

[79] Jenny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July 1873, Moscow.

[80]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150.

[81] MECW, Volume 44, 496.

[82] MECW, Volume 44, 506.

[83] Jenny Marx to Eleanor Marx, June 1873, Moscow.

[84]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152.

[85] Jenny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July 1873, Moscow.

[86] Charles Longuet to Jenny Longuet, Friday morning, undated, Moscow.

[87] Jenny Marx to Eleanor Marx, June 1873, Moscow.

[88] Jenny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July 1873, Moscow.

[89] MECW, Volume 44, 516.

[90] Jenny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July 1873, Moscow.

[91] MECW, Volume 44, 516.

[92] *Ibid.*, 538.

[93] *Ibid.*, 550.

[94] MECW, Volume 45, 3.

[95] Walt Contreras Sheasby, "Marx at Karlsbad," 91–97.

[96]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219;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201.

[97] In Germany, for example, Liebknecht and Bebel were sentenced to two years in prison in 1872 for their political activism and for belonging to the IWMA. MECW, Volume 45, 466(n).

[98]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48;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62.

[99]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77; MECW, Volume 45, 461(n).

[100] MECW, Volume 45, 33, 35.

[101] MECW, Volume 24, 564.

[102] Paul Lafargue to Karl Marx, July 26, 1874, IISG;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55; FE-PL, Volume I, 48–49. (Between 1874 and 1878 Lafargue

wrote at least twenty-eight letters to Engels asking for money.)

[103] MECW, Volume 45, 21–22; Briggs and Callow, *Marx in London*, 71; A. E. Laurence and A. N. Insole, *Prometheus Bound*, 4.

[104] REM, 254.

[105] KMIR, 130.

[106] MECW, Volume 45, 26, 29.

[107] *Ibid.*, 28.

[108] *Ibid.*, 27.

[109] *Ibid.*

[110]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Aug. 1874, Moscow.

[111] MECW, Volume 45, 36.

[112]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153–154.

[113] Jenny Marx to Madame Longuet, Oct. 1874, Moscow.

[114] MECW, Volume 45, 34.

[115] *Ibid.*, 35.

[116] Sheasby, “Marx at Karlsbad,” 91–97.

[117] Egon Erwin Kisch, *Karl Marx at Karlsbad*, 5–46.

[118] MECW, Volume 45, 37.

[119] KMIR, 93.

[120]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18.

[121] MECW, Volume 45, 37.

[122] REM, 284–285; KMIR, 91.

[123] Eleanor Marx to Jenny Longuet, Sept. 5, 1874, Moscow; MECW, Volume 45, 46.

[124] MECW, Volume 45, 52–53.

[125] KMIR, 121.

[126] *Ibid.*, 165.

40 家庭转机

[1] MECW, Volume 45, 31.

[2]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mid-Aug. 1874, Moscow;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Aug. 8, 1874, Moscow;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Aug. 28, 1874, Moscow.

[3]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Aug. 1874, Moscow.

[4] MECW, Volume 45, 38.

[5]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Aug. 10, 1874, Moscow;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mid-Aug. 1874, Moscow.

[6]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Aug. 28, 1874, Moscow.

[7]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mid-Aug. 1874, Moscow.

[8]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Sept. 1, 1874, Moscow.

[9] Jenny Marx to Madame Longuet, Oct. 1874, Moscow.

[10] KMIR, 130.

[11] Jenny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May 26, 1872, Moscow.

[12] MECW, Volume 45, 446.

- [13] Jenny Longuet to Madame Longuet, Dec. 25, 1874, Moscow.
- [14] Longuet, *Karl Marx*, 224.
- [15] Jenny Longuet to Madame Longuet, Dec. 25, 1874, Moscow.
- [16] Jenny Longuet to Madame Longuet, July 27 [1875], Moscow.
- [17] MECW, Volume 45, 75; Jenny Marx to Madame Longuet, June 1875, Moscow.
- [18] Jenny Marx to Madame Longuet, June 1875, Moscow; MECW, Volume 45, 66.
- [19]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14.
- [20] *Ibid.*, 421.
- [21] 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83–184.
- [22] Gildea, *Third Republic*, 7–8.
- [23] MECW, Volume 45, 60–66.
- [24] *Ibid.*, 63.
- [25] *Ibid.*, 69.
- [26] *Ibid.*, 467(n).
- [27] MECW, Volume 24, 89–90.
- [28] *Ibid.*, 87.
- [29] *Ibid.*, 94–95.
- [30] *Ibid.*, 95.
- [31] *Ibid.*, 99.
- [32] Padover, *Karl Marx*, 219.
- [33] John Macdonnell, “Karl Marx and German Socialism,” 384.
- [34] Jenny Marx to Eleanor Marx, Sept. 1875, Moscow.
- [35]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Aug. 1875, Moscow.
- [36] MECW, Volume 45, 84–85.
- [37] *Ibid.*, 82.
- [38] Kisch, *Karl Marx at Karlsbad*, 20.
- [39] KMIR, 124–125.
- [40] Blumenberg, *Illustrated*, 152.
- [41] MECW, Volume 45, 518.
- [42] REM, 298–299.
- [43] Jenny Marx to Natalie Liebknecht, Jan. 18, 1876, Moscow.
- [44] Jenny Longuet to Madame Longuet, Dec. 31, 1875, Moscow.
- [45] MECW, Volume 45, 96.
- [46] *Ibid.*, 56.
- [47] REM, 217;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Nov. 28, 1873, Moscow.
- [48]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Apr. 5, 1876, Moscow.
- [49] MECW, Volume 45, 120–121.
- [50] Jenny Marx to Madame Longuet, June 1875, Moscow.
- [51] Jenny Longuet to Madame Longuet, Dec. 31, 1875, Moscow.
- [52] Jenny Marx to Natalie Liebknecht, Jan. 18, 1876, Moscow.
- [53] MECW, Volume 45, 135–137.
- [54] MECW, Volume 45, 143.

- [55] MECW, Volume 45, 149–150, 152.
 [56] *Ibid.*, 444.
 [57] Tsuzuki, *Eleanor Marx*, 57; MECW, Volume 45, 191, 446; Hudson, *Munby*, 123.
 [58] MECW, Volume 45, 191.
 [59] *Ibid.*, 446.
 [60] McLellan, *Karl Marx*, 407.
 [61] MECW, Volume 45, 122–123.
 [62] MECW, Volume 25, 27 and Volume 24, 195.
 [63] Draper and Haberkern,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V, 115.
 [64] MECW, Volume 25, 154.
 [65] MECW, Volume 45, 442.

41 外祖父的快乐

- [1] Madame de Staël, *Delphine*, 304.
 [2]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Sept. 1, 1874, Moscow; MECW, Volume 45, 104, 106.
 [3] MECW, Volume 45, 244.
 [4] *Ibid.*, 274.
 [5] *Ibid.*, 245.
 [6] *Ibid.*, 267–268.
 [7] KMIR, 98.
 [8] Jenny Marx to Eleanor Marx, Nov. 20, 1877, Moscow.
 [9] MECW, Volume 45, 320.
 [10] *Ibid.*, 447.
 [11] KMIR, 162.
 [12]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55; Ozment, *Mighty Fortress*, 219.
 [13]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58.
 [14] MECW, Volume 45, 312.
 [15]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Sept. 1878, Moscow; Jenny Marx to Eleanor Marx, Aug. 1878, Moscow.
 [16]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Sept. 14, 1878, Moscow.
 [17] MECW, Volume 45, 447.
 [18]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Sept. 14, 1878, Moscow.
 [19] MECW, Volume 45, 320; Hunt, *Frock-Coated Communist*, 271.
 [20]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mid-Sept. 1878, Moscow.
 [21]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Sept. 19, 1878, Moscow.
 [22] MECW, Volume 45, 361–362.
 [23] KMIR, 128.
 [24] MECW, Volume 45, 343.
 [25] *Ibid.*, 354–356.
 [26] *Ibid.*, 369.
 [27] *Ibid.*, 371–372.

- [28] Ibid., 376.
- [29] Ibid., 373.
- [30] Ibid., 388.
- [31] MECW, Volume 24, 669(n); KMIR, 140.
- [32] MECW, Volume 24, 580–582; KMIR, 140–142.
- [33]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Oct. 24, 1880, Moscow;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Nov. 17, 1880, Moscow.
- [34] Ernest Belfort Bax,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of a Mid and Late Victorian*, 70–71.
- [35] KMIR, 158–159
- [36] Ibid., 151.
- [37] Wilson, *Victorians*, 444.
- [38] KMIR, 144, 150.
- [39] MECW, Volume 46, 102–103.
- [40]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211.
- [41] Jenny Marx to Eleanor Marx, Aug. 1878, Moscow.
- [42]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late Sept. 1880, Moscow.
- [43] FE-PL, Volume I, 63–64.
- [44] MECW, Volume 46, 32;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54.
- [45] Longuet, *Karl Marx*, 228.
- [46] MECW, Volume 46, 95, 101.
- [47] MECW, Volume 45, 390.
- [48]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Aug. 1, 1880, Moscow.
- [49] MECW, Volume 46, 22–23 and Volume 24, 584–585.
- [50]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77, 183.
- [51] MECW, Volume 24, 585.
- [52] Charles Longuet to Jenny Longuet, Aug. 24, 1880, Moscow.
- [53]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Sept. 29, 1880, Moscow.
- [54] Liebknecht, *Karl Marx*, 114;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Sept. 29, 1880, Moscow.
- [55]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150.
- [56] Bax, *Reminiscences*, 48.
- [57]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81–82; MECW, Volume 46, 495(n).
- [58] KMIR, 150, 160; MECW, Volume 46, 95–96.
- [59]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152–153, 156–157.

42 燕妮离世

- [1] Dornemann, *Jenny Marx*, 318–326.
- [2]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Nov. 22, 1880, Moscow.
- [3]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Nov. 10, 1880, Moscow.
- [4]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undated, Moscow;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Nov. 1880, Moscow.
- [5]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Nov. 1880, Moscow.
- [6]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undated, Moscow.

- [7] Charles Longuet to Jenny Longuet, Nov. 1880, Moscow.
- [8]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Sunday morning, Dec. 1880, Moscow.
- [9]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Nov. 10, 1880, Moscow.
- [10] MECW, Volume 46, 61.
- [11]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Jan. 1881, Moscow.
- [12]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Feb. 1881, Moscow.
- [13]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Jan. 13, 1881, Moscow.
- [14] The Longuets' house in Argenteuil was on the Boulevard Thiers, which was in later years renamed Boulevard Karl Marx. Longuet, *Karl Marx*, 230.
- [15] Jenny Longuet to Laura Lafargue, Apr. 1881, Moscow.
- [16] Jenny Longuet to Laura Lafargue, Apr. 22, 1881, Moscow.
- [17] MECW, Volume 46, 81.
- [18] *Ibid.*, 81–82.
- [19] Kautsky's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was based on his edit of Marx's material for Capital, Volume IV. Blumenberg, *Illustrated*, 159.
- [20] KMIR, 154–155.
- [21]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Nov. 10, 1880, Moscow;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158.
- [22] MECW, Volume 46, 82.
- [23] *Ibid.*, 83.
- [24] *Ibid.*, 89.
- [25] *Ibid.*, 91.
- [26] *Ibid.*, 96.
- [27] *Ibid.*, 97.
- [28] *Ibid.*, 106.
- [29] *Ibid.*, 108.
- [30] Jenny Longuet to Jenny Marx, July 1881, Moscow.
- [31] MECW, Volume 46, 107.
- [32] *Ibid.*, 109.
- [33] *Ibid.*, 110.
- [34] *Ibid.*, 116; Giroud, *Femme du diable*, 224.
- [35] MECW, Volume 46, 124.
- [36] *Ibid.*, 124, 132.
- [37]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187.
- [38] Morton, *Home Rule*, 23.
- [39]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27–429; Morton, *Home Rule*, 25.
- [40] Bax, *Reminiscences*, 73–74; Joseph Clayt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Great Britain*, 9.
- [41] Later, Shaw abandoned Marxism. James W. Hulse, *Revolutionists in London*, 111.
- [42]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159–160.
- [43] MECW, Volume 46, 104.
- [44]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34–135.

- [45] Ibid., 133.
- [46] MECW, Volume 46, 133, 134–135.
- [47] Ibid., 475.
- [48] MECW, Volume 46, 161; Liebknecht, *Karl Marx*, 43–44.
- [49]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38–139.
- [50] Ibid., 139.
- [51] Eleanor Marx to Jenny Longuet, Oct. 31, 1881, Moscow.
- [52] Liebknecht, *Karl Marx*, 158.
- [53] KMIR, 1.
- [54]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58.
- [55] Eleanor Marx to Pytor Lavrov, Dec. 3, 1881, Moscow; Eleanor Marx to Jenny Longuet, Oct. 31, 1881, IISG; Jenny Longuet to Laura Lafargue, Dec. 2, 1881, Moscow.
- [56] MECW, Volume 46, 163; Bax, *Reminiscences*, 45.
- [57] Wheen, *Marx's Das Kapital*, 89.
- [58] MECW, Volume 46, 157, 165.
- [59] Ibid., 156.
- [60] MECW, Volume 24, 423–424; REM, 90.
- [61] MECW, Volume 46, 164.
- [62] Liebknecht, *Karl Marx*, 159.

43 两个女婿

- [1]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30.
- [2] KMIR, 159.
- [3]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155.
- [4] MECW, Volume 46, 156.
- [5] Ibid., 157–158.
- [6] Ibid., 161.
- [7] Ibid., 158.
- [8] Ibid., 161.
- [9] Ibid., 184.
- [10] Flanders, *Victorian House*, 182.
- [11] Eleanor Marx to Jenny Longuet, Jan. 16, 1881, Moscow.
- [12] Jenny Longuet to Karl Marx, Dec. 3, 1881, Moscow.
- [13] MECW, Volume 46, 169.
- [14] Eleanor Marx to Jenny Longuet, Jan. 8, 1882, Moscow.
- [15] Jenny Longuet to Laura Lafargue, Dec. 1881, Moscow.
- [16] Jenny Longuet to Laura Lafargue, Dec. 2, 1881, Moscow.
- [17] Jenny Longuet to Laura Lafargue, Dec. 1881, Moscow.
- [18] MECW, Volume 46, 176–177.
- [19] Eleanor Marx to Jenny Longuet, Jan. 15, 1882, Moscow.
- [20]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Jan. 23, 1882, Moscow.
- [21]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Thursday, Apr. 1882, Moscow.
- [22] MECW, Volume 46, 184.

- [23] Ibid., 199.
- [24] Ibid., 213–215.
- [25] Ibid., 218.
- [26] Ibid., 227.
- [27] Ibid., 249.
- [28] Ibid., 253–254.
- [29] Ibid., 269.
- [30] Ibid., 262.
- [31] Ibid., 271–272.
- [32] Jenny Longuet to Karl Marx, Feb. 24, 1882, Moscow.
- [33]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Mar. 23, 1882, Moscow.
- [34]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Jan. 23, 1882, Moscow;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June 10, 1882, Moscow;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May 3, 1882, Moscow.
- [35]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May 3, 1882, Moscow.
- [36]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May 17, 1882, Moscow.
- [37] Jenny Longuet to Charles Longuet, undated, Moscow.
- [38] Jenny Longuet to Laura Lafargue, Mar. 1882, Moscow.
- [39]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June 10, 1882, Moscow.
- [40]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May 1882, Moscow.
- [41] MECW, Volume 46, 276; Longuet, *Karl Marx*, 234.
- [42] FE-PL, Volume I, 82–83.
- [43] MECW, Volume 46, 303.
- [44] Jenny Longuet to Laura Lafargue, July 1881, Moscow.
- [45] REM, 258.
- [46] MECW, Volume 46, 303.
- [47]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54–155.
- [48] Tsuzuki, *Eleanor Marx*, 66–67.
- [49] MECW, Volume 46, 303.
- [50] Ibid., 308.
- [51] Ibid., 356.
- [52] FE-PL, Volume I, 88–89.
- [53] MECW, Volume 46, 291.
- [54] FE-PL, Volume I, 101;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4.
- [55] FE-PL, Volume III, 479–480.
- [56]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Sept. 5, 1882, Moscow.
- [57]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Sept. 23, 1882, Moscow.
- [58] FE-PL, Volume I, 100–101.
- [59] MECW, Volume 46, 221; Derfler, *Founding of French Marxism*, 167.
- [60]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5.
- [61] MECW, Volume 46, 375.
- [62] Ibid., 394.
- [63] Ibid., 529(n).
- [64] Ibid., 399.

- [65] FE-PL, Volume I, 119.
- [66]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Nov. 8, 1882, Moscow.
- [67] FE-PL, Volume I, 119.
- [68] Ibid., 117.
- [69]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Sept. 5, 1882, Moscow.
- [70]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Nov. 8, 1882, Moscow; Jenny Longuet to Eleanor Marx, Dec. 30, 1882, Moscow.
- [71] MECW, Volume 46, 419, 420.
- [72] Ibid., 425.
- [73] FE-PL, Volume III, 479–480.
- [74] MECW, Volume 46, 420–421.
- [75] Ibid., 421, 424.

44 伟人陨落

- [1] Honoré de Balzac, *Lost Illusions*, 60.
- [2] Liebknecht, *Karl Marx*, 160.
- [3] MECW, Volume 24, 460–461.
- [4] MECW, Volume 46, 434.
- [5] Ibid., 440–441.
- [6] MECW, Volume 46, 456; REM, 346.
- [7] Friedrich Engels, *The Fourteenth of March 1883*, 21; FE-PL, Volume I, 121.
- [8] MECW, Volume 24, 476.
- [9] MECW, Volume 46, 462–463.
- [10] Wheen, *Karl Marx*, 382; Robert Payne, *Karl Marx*, 500.
- [11] REM, 256–257.
- [12] MECW, Volume 24, 463.
- [13] REM, 348.
- [14] MECW, Volume 24, 464.
- [15] Engels, *The Fourteenth of March 1883*, 11–13; REM, 348.
- [16] MECW, Volume 24, 469; REM, 350.
- [17] MECW, Volume 24, 469.
- [18] *The Coming Nation*, March 18, 1911, Greensburg, Indiana, 8; Raddatz, *Karl Marx*, 272.
- [19] Berlin, *Karl Marx*, 206.

第七部分 共同的革命事业

45 杜西的幸与不幸

- [1] MECW, Volume 46, 462.
- [2] Ibid., 465.
- [3] MECW, Volume 47, 3.
- [4] MECW, Volume 36, 5.
- [5] MECW, Volume 47, 13.
- [6] MECW, Volume 46, 466; 533(n).

- [7] MECW, Volume 47, 12.
- [8] FE-PL, Volume I, 124–125.
- [9] MECW, Volume 47, 3, 26, 561(n).
- [10] Tsuzuki, *Eleanor Marx*, 71.
- [11] Eleanor Marx to Laura Lafargue, Mar. 26, 1883, IISG.
- [12] Warren Sylvester Smith, *The London Heretics*, 74; Tsuzuki, *Eleanor Marx*, 83.
- [13] Ellis quoted Shaw on Aveling. Ellis, “Havelock Ellis on Eleanor Marx,” *Adelphi*, London, Sept./Oct. 1935.
- [14] *KMIR*, 120.
- [15] Warren Sylvester Smith, *London Heretics*, 74.
- [16] Tsuzuki, *Eleanor Marx*, 91–92.
- [17] *Ibid.*, 91–92; Robert Payne, *Karl Marx*, 513.
- [18] Ellis, “Havelock Ellis on Eleanor Marx,” *Adelphi*, London, Sept./Oct. 1935; Warren Sylvester Smith, *London Heretics*, 74.
- [19]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I*, 204.
- [20]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Marx’s death, Engels wrote Zurich newspaper editor Eduard Bernstein on Aveling’s behalf. MECW, Volume 47, 7.
- [21] *Ibid.*, 26.
- [22] Aveling edited the newspapers *Progress* and *Freethinker*. Warren Sylvester Smith, *London Heretics*, 63–65; Besant, *Autobiography*, 288.
- [23] 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 301–302.
- [24] MECW, Volume 47, 28–29.
- [25]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6–7.
- [26] MECW, Volume 46, 375.
- [27]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8.
- [28] *Ibid.*, 11.
- [29]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12; FE-PL, Volume I, 132.
- [30] FE-PL, Volume I, 138–139.
- [31] *Ibid.*, 140.
- [32] *Ibid.*, 139.
- [33] *Ibid.*, 141–142.
- [34] MECW, Volume 47, 39–40.
- [35] Ellis, “Havelock Ellis on Eleanor Marx,” *Adelphi*, London, Sept./Oct. 1935.
- [36] Bax, *Reminiscences*, 75.
- [37] O’Neill, *Good Old Days*, 226; MECW, Volume 47, 583(n).
- [38] Wright, *Democracy and Reform*, 98.
- [39] Hulse, *Revolutionists in London*, 79.
- [40] J. Bruce Glasier, *William Morris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32.
- [41] Hulse, *Revolutionists in London*, 226.
- [42] May Morris, *William Morris: Artist, Writer, Socialist, Volume II*, xii.
- [43] MECW, Volume 47, 78.

- [44] Ibid., 60–61.
- [45] Gildea, *Third Republic*, 25.
- [46] FE-PL, Volume I, 162–163.
- [47] Gildea, *Third Republic*, 34.
- [48] Ibid., 35; FE-PL, Volume I, 148–150.
- [49] FE-PL, Volume I, 151.
- [50] Ibid.
- [51] Ibid., 155.
- [52]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75–176.
- [53] FE-PL, Volume I, 194–196.
- [54] MECW, Volume 47, 118, 122, 551(n).
- [55] FE-PL, Volume I, 217–219.
- [56] Eleanor Marx to Laura Lafargue, June 18, 1884, Moscow.
- [57]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161.
- [58]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Mrs. Bland, July 15, 1884, Moscow.
- [59] FE-PL, Volume I, 217–219.
- [60] MECW, Volume 47, 177.
- [61] Tsuzuki, *Eleanor Marx*, 99.
- [62] MECW, Volume 47, 167; Tsuzuki, *Eleanor Marx*, 107.
- [63] Michael Rive (ed.), *Olive Schreiner Letters, Volume I*, 48.
- [64] Ibid., 49.
- [65] Ellis, “Havelock Ellis on Eleanor Marx,” *Adelphi*, London, Sept./Oct. 1935.
- [66] Ibid.
- [67] Yaffa Claire Draznin (ed.), *My Other Self*, 140; Ellis, “Havelock Ellis on Eleanor Marx,” *Adelphi*, London, Sept./Oct. 1935.
- [68] Draznin, *My Other Self*, 141.
- [69] Tsuzuki, *Eleanor Marx*, 99.
- [70]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415–416, 421;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20–21; Bax, *Reminiscences*, 80.
- [71]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42.
- [72] 就成立社会主义同盟给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的告知书在 1885 年 1 月 10 日由爱德华·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罗伯特·班纳、E. B. 巴克斯、威廉·莫里斯、和约翰·曼恩等签署。
- [73] MECW, Volume 47, 248.

46 艾威林的传言

- [1]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George Bernard Shaw, June 2, 1885, Catalog of George Bernard Shaw Papers, British Library, London.
- [2] MECW, Volume 47, 244.
- [3] Ibid., 316.
- [4] Ibid., 244.
- [5] Ibid., 290.
- [6] Ibid., 244.

- [7] Ibid., 245, 249, 394.
- [8] Ibid., 394.
- [9] FE-PL, Volume I, 270–271.
- [10] MECW, Volume 36, 283.
- [11] Ibid., 235–236.
- [12] Ibid., 238–239.
- [13] MECW, Volume 47, 289, 296.
- [14]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80, 88; Hulse, *Revolutionists in London*, 32–33.
- [15] Tsuzuki, *Eleanor Marx*, 121.
- [16] MECW, Volume 47, 405; Tsuzuki, *Eleanor Marx*, 122.
- [17] *The National Reformer*, London, May 4, 1884, 310.
- [18] Bax, *Reminiscences*, 109.
- [19] MECW, Volume 47, 274.
- [20]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Laura Lafargue, Apr. 12, 1885, Moscow.
- [21]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George Bernard Shaw, June 2, 1885, London, British Library, GBS Papers.
- [22] Tsuzuki, *Eleanor Marx*, 127.
- [23] Ellis, “Havelock Ellis on Eleanor Marx,” *Adelphi*, London, Sept./Oct. 1935.
- [24] Ibid.
- [25] Ibid.
- [26] Miliband and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83–184, 187.
- [27] Vera Buchanan-Gould, *Not Without Hono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Olive Schreiner*, 221.
- [28] Tsuzuki, *Eleanor Marx*, 123–124.
- [29] Edward Aveling and Eleanor Marx Aveling, *The Woman Question*, 6, 8, 13, 16.
- [30]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George Bernard Shaw, June 2, 1885, London, British Library, GBS Papers; Tsuzuki, *Eleanor Marx*, 165.
- [31] 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 trans. Eleanor Marx-Aveling, xx.
- [32]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58–61.
- [33] Ibid., 46.
- [34]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26; MECW, Volume 47, 366.
- [35] O’Neill, *Good Old Days*, 156; Wilson, *Victorians*, 508.
- [36]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27.
- [37] MECW, Volume 47, 404, 408.
- [38]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27.
- [39] MECW, Volume 47, 413.
- [40]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48.
- [41] MECW, Volume 47, 413.
- [42] Ibid., 428.
- [43] Gildea, *Third Republic*, 35
- [44] MECW, Volume 47, 441, 452, 470.

- [45] Ibid., 436.
- [46]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93–194.
- [47] Ibid., 194.
- [48] Tsuzuki, *Eleanor Marx*, 135.
- [49] *Chicago Tribune*, Nov. 6, 1886, 9.
- [50]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94.
- [51] Tsuzuki, *Eleanor Marx*, 136.
- [52] Edward Aveling and Eleanor Marx Aveling,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n America*, 8.
- [53] *Chicago Tribune*, Nov. 6, 1886, 1.
- [54]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I*, 158.
- [55] Ibid., 153.
- [56] MECW, Volume 47, 525.
- [57] Ibid., 530–532, 628(n); Tsuzuki, *Eleanor Marx*, 140.
- [58] MECW, Volume 47, 494 and Volume 48, 3.
- [59] *New York Herald*, Jan. 8, 1887, 5.
- [60] *Evening Standard*, London, Jan. 13, 1887, 4.
- [61] *New York Herald*, Jan. 14, 1887, 5.
- [62] *Evening Standard*, London, Jan. 13, 1887, 4.
- [63] Warren Sylvester Smith, *London Heretics*, 79.
- [64] Tsuzuki, *Eleanor Marx*, 117.
- [65] MECW, Volume 26, 617; *New York Herald*, Jan. 14, 1887, 5.
- [66] MECW, Volume 48, 16–17.
- [67] Bax, *Reminiscences*, 52, 55.
- [68]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Doctor's Dilemma*.
- [69] Tsuzuki, *Eleanor Marx*, 165.

47 同床异梦

- [1] Tsuzuki, *Eleanor Marx*, 168.
- [2]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69.
- [3] 在 1875 年之后的 20 年里，世界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少数几个欧洲强国所控制。来源：Davies, *Europe, A History*, 848.
- [4] Hobsbawm, *Age of Capital*, 354–355.
- [5]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70.
- [6] MECW, Volume 47, 413.
- [7] Ibid., 5.
- [8]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90.
- [9] FE-PL, Volume II, 40.
- [10] MECW, Volume 48, 542(n).
- [11] FE-PL, Volume II, 34–36.
- [12] Ibid., 28.
- [13] Tsuzuki, *Eleanor Marx*, 79, 115; Morris, *William Morris*, 226.
- [14] MECW, Volume 48, 73–74, 83, 105.
- [15]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202.

- [16] MECW, Volume 48, 91.
- [17] Ellis, "Havelock Ellis on Eleanor Marx," *Adelphi*, London, Sept./Oct. 1935.
- [18] Tsuzuki, *Eleanor Marx*, 168.
- [19] *To-Day*, London, June 1887, No. 43.
- [20] Ellis, "Havelock Ellis on Eleanor Marx," *Adelphi*, London, Sept./Oct. 1935.
- [21]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197–198.
- [22] Wilson, *Victorians*, 508.
- [23] MECW, Volume 48, 57.
- [24] Wilson, *Victorians*, 508.
- [25] MECW, Volume 48, 79, 536–537(n).
- [26] Wilson, *Victorians*, 509.
- [27] *Pall Mall Gazette*, London, Nov. 14, 1887, 1.
- [28] MECW, Volume 48, 113.
- [29] *Pall Mall Gazette*, London, Nov. 14, 1887, 5.
- [30] Morris, *William Morris*, 263.
- [31] *Ibid.*, 252.
- [32] MECW, Volume 48, 113.
- [33] Wilson, *Victorians*, 510; Warren Sylvester Smith, *London Heretics*, 22.
- [34] Tsuzuki, *Eleanor Marx*, 155.
- [35]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202.
- [36] MECW, Volume 48, 119.
- [37] Tsuzuki, *Eleanor Marx*, 169–170.
- [38]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Laura Lafargue, Dec. 31, 1887, IISG.
- [39] Tsuzuki, *Eleanor Marx*, 173.
- [40] MECW, Volume 48, 198.
- [41] *Ibid.*, 183.
- [42] Mayer, *Friedrich Engels*, 294.
- [43]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George Bernard Shaw, Dec. 16, 1887, GBS Papers.
- [44] MECW, Volume 48, 184, 192.
- [45] *Ibid.*, 194.
- [46] Mayer, *Friedrich Engels*, 253.
- [47] MECW, Volume 48, 195, 202, 203.
- [48]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204–205.
- [49] *Ibid.*, 207.
- [50] MECW, Volume 48, 208.
- [51] *Ibid.*, 207.
- [52] *Ibid.*, 211.
- [53] Olsen, *Growth of Victorian London*, 122; Wilson, *Victorians*, 521.
- [54] Will Thorne, *My Life's Battles*, 13.
- [55] Flanders, *Victorian House*, 370.
- [56] Winder, *Bloody Foreigners*, 215.

[57] O'Neill, *Good Old Days*, 46; Anne Cowen and Roger Cowen, *Victorian Jews Through British Eyes*, xiv-xv.

[58]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Laura Lafargue, June 24, 1888, IISG.

[59] Paul Adelman, *The Rise of the Labour Party*, 12.

[60]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I, 260.

[61] *Ibid.*, 510.

[62]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Laura Lafargue, Dec. 31, 1888, IISG.

48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1] William Stewart, J. Keir Hardie: *A Biography*, 38.

[2] Adelman, *Rise of the Labour Party*, 10.

[3]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56.

[4] Thorne, *My Life's Battles*, 67.

[5]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62.

[6] MECW, Volume 48, 601(n); Adelman, *Rise of the Labour Party*, 12–13.

[7] Thorne and Mann would become MPs; Burns would become an MP and a minister in a Liberal government.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427.

[8] William Collison, *The Apostle of Free Labour*, 81.

[9]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55.

[10]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427–428.

[11] *Ibid.*, 427.

[12] Thorne, *My Life's Battles*, 13.

[13] *Ibid.*, 80–81.

[14] *Ibid.*, 81.

[15] MECW, Volume 48, 591(n);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428; Thorne, *My Life's Battles*, 80.

[16] Thorne, *My Life's Battles*, 86.

[17] MECW, Volume 48, 373, 379.

[18] Tsuzuki, *Eleanor Marx*, 197.

[19]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59.

[20]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429.

[21] MECW, Volume 48, 373.

[22]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430.

[23]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64.

[24] MECW, Volume 26, 545.

[25] MECW, Volume 48, 377, 487 and Volume 49, 479–480.

[26] MECW, Volume 48, 312–313.

[27] *Ibid.*, 313.

[28] *Ibid.*, 286.

[29] *Ibid.*, 286, 287.

[30] *Ibid.*, 316;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210.

[31]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75.

[32] FE-PL, Volume II, 285;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75.

[33] MECW, Volume 48, 348.

- [34] Ibid., 352;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74–75.
- [35] MECW, Volume 48, 353.
- [36]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76.
- [37] MECW, Volume 48, 352.
- [38] Ibid., 589(n);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77.
- [39] MECW, Volume 48, 392.
- [40] REM, 187.
- [41] MECW, Volume 48, 257–258.
- [42] FE-PL, Volume II, 363.
- [43] MECW, Volume 48, 605(n), 607(n).
- [44] Ozment, *Mighty Fortress*, 222;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62.
- [45]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62–63; Ozment, *Mighty Fortress*, 222.
- [46] Ozment, *Mighty Fortress*, 222–223.
- [47]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64.
- [48] MECW, Volume 48, 481.
- [49] FE-PL, Volume II, 374.
- [50] MECW, Volume 48, 493.
- [51] *People's Press*, London, May 10, 1890, 5.
- [52] MECW, Volume 48, 493–494.
- [53] Ibid., 409.
- [54] *People's Press*, London, May 10, 1890, 7.
- [55] MECW, Volume 48, 494–495, 496.
- [56] MECW, Volume 49, 14.
- [57] MECW, Volume 48, 470.
- [58] MECW, Volume 49, 67.
- [59] MECW, Volume 48, 200.
- [60] Ibid., 84.
- [61]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169.
- [62] Ibid., 192, 196.
- [63] Ibid., 197.
- [64] MECW, Volume 49, 53.
- [65] Ibid., 65–66.
- [66] MECW, Volume 49, 67; Fomičev, “Helene Demuth Without Brethren,” *Motherland*, 972.
- [67] MECW, Volume 49, 67.
- [68] Ibid., 67.

49 第二代革命者

- [1] MECW, Volume 49, 215.
- [2] Mayer, *Friedrich Engels*, 196.
- [3] REM, 191.
- [4] Tsuzuki, *Eleanor Marx*, 247.
- [5] MECW, Volume 49, 88.
- [6] MECW, Volume 47, 265.

- [7] MECW, Volume 48, 224–225, 235.
- [8] MECW, Volume 49, 68–69.
- [9] *Ibid.*, 72.
- [10] *Ibid.*, 71.
- [11] *Ibid.*, 87.
- [12] *Ibid.*, 73.
- [13] *Ibid.*, 82.
- [14] *Ibid.*, 76.
- [15]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Friedrich Engels, Oct. 14, 1890, Moscow.
- [16]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Edward Aveling, Oct. 16, 1890, Moscow.
- [17] *Justice*, London, Feb. 21, 1891, 1; MECW, Volume 49, 127.
- [18]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85, 87–88.
- [19] FE-PL, Volume III, 88.
- [20]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88.
- [21] *Ibid.*, 89.
- [22]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89–90;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10–111.
- [23]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90.
- [24] *Ibid.*, 91.
- [25] FE-PL, Volume III, 79(n).
- [26]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91–92.
- [27] *Ibid.*, 93–94.
- [28]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13;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94.
- [29] FE-PL, Volume III, 88.
- [30]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95.
- [31] FE-PL, Volume III, 106, 110–111.
- [32] *Ibid.*, 112–113.
- [33] MECW, Volume 49, 269;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98.
- [34] *Ibid.*, 288, 290.
- [35] FE-PL, Volume III, 127.
- [36] MECW, Volume 49, 293; FE-PL, Volume III, 131(n).
- [37] FE-PL, Volume III, 133.
- [38] *Ibid.*, 134–135.
- [39] MECW, Volume 49, 305.
- [40] FE-PL, Volume III, 137.
- [41] *Ibid.*, 138, 144; MECW, Volume 49, 306–307.
- [42] FE-PL, Volume III, 146(n).
- [43]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104–106.
- [44] FE-PL, Volume III, 145–146, 148.
- [45]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105.
- [46] FE-PL, Volume III, 150–151.
- [47] *Ibid.*, 112–113.
- [48] *Ibid.*, 114.

- [1]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110.
- [2]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Laura Lafargue, Dec. 19, 1895, Moscow.
- [3] MECW, Volume 49, 225, 584(n).
- [4]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37; MECW, Volume 49, 237, 238; Ferdinand Gilles, "Is He the Son-in-Law of Karl Marx?," London, Nov. 10, 1891.
- [5] MECW, Volume 49, 238.
- [6] *Ibid.*, 584(n).
- [7]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108.
- [8] MECW, Volume 49, 621–622(n);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110.
- [9] MECW, Volume 49, 409.
- [10]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434; MECW, Volume 49, 468;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61; Stewart, *J. Keir Hardie*, 6–7, 68.
- [11] Adelman, *Rise of the Labour Party*, 17.
- [12] *Ibid.*, 22.
- [13]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435;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75.
- [14] Clayton, *Rise and Decline of Socialism*, 72.
- [15] MECW, Volume 49, 479.
- [16] MECW, Volume 50, 154, 569(n).
- [17] Adelman, *Rise of the Labour Party*, 19–20; MECW, Volume 50, 574(n).
- [18] MECW, Volume 27, 404–405; Stepanova, *Frederick Engels*, 229.
- [19]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143; FE-PL, Volume III, 290; Gildea, *Third Republic*, 37.
- [20] MECW, Volume 50, 10, 113.
- [21]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140.
- [22] Tsuzuki, *Eleanor Marx*, 233, 237.
- [23] *Ibid.*, 239.
- [24] MECW, Volume 49, 357–358, 359 and Volume 46, xvii.
- [25] MECW, Volume 49, 357–358.
- [26]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246.
- [27]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Laura Lafargue, Mar. 22, 1894, Moscow.
- [28]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247, 248, 250;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Laura Lafargue, Mar. 22, 1894, Moscow.
- [29]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I, 560.
- [30]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248.
- [31] MECW, Volume 50, 299.
- [32] *Ibid.*, 308.
- [33] *Ibid.*, 300.
- [34] MECW, Volume 37, 436.
- [35] *Ibid.*, 541–542.
- [36] *Ibid.*, 590.
- [37] MECW, Volume 50, 386–387.

- [38] Eleanor Marx to Laura Lafargue, Nov. 5, 1894, Moscow.
 [39] Tsuzuki, *Eleanor Marx*, 252–253.
 [40]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Laura Lafargue, Nov. 5, 1894, Moscow.
 [41]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258, 260.
 [42] MECW, Volume 50, 537.
 [43] *Ibid.*, 395, 424–425.
 [44]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263; MECW, Volume 50, 425.
 [45] MECW, Volume 50, 364.

51 “将军” 逝世

- [1] REM, 65.
 [2] Halliday, *Great Filth*, 195; MECW, Volume 50, 441.
 [3]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94.
 [4] *Ibid.*, 97.
 [5] MECW, Volume 50, 455.
 [6] MECW, Volume 49, 538.
 [7] Offor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99.
 [8] Longuet, *Karl Marx*, 239.
 [9] MECW, Volume 50, 507.
 [10] *Ibid.*, 395.
 [11] *Ibid.*, 526.
 [12] Cole and Postgate, *British Common People*, 436–437; Adelman, *Rise of the Labour Party*, 23.
 [13] MECW, Volume 50, 526.
 [14] *Ibid.*, 535.
 [15] Liebknecht said that though Engels had throat cancer, he died of a stroke. REM, 148.
 [16] MECW, Volume 50, 612(n);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253. (Ludwig Freyberger asked Tussy shortly after Engels's death to remove Marx's chair and bookcases. Ludwig Freyberger to Eleanor Marx, Oct. 4, 1895, IISG.)
 [17] MECW, Volume 50, 537–538, 541–542.
 [18] Carver, *Friedrich Engels*, 253.
 [19]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I*, 611.
 [20] Fomichev, “Helene Demuth Without Brethren,” 972.
 [21]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Sept. 29, 1895, Moscow;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187, 191–192; Mayer, *Friedrich Engels*, 327; REM, 180. (Cremations began to be carried out in England only in 1885, and were still rare in the 1890s. Wilson, *Victorians*, 544.)
 [22] REM, 59.
 [23]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24]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285.
 [25]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 258.
 [26] Eleanor Marx Aveling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ct. 16, 1895, London,

IISG; Codicil, Nov. 28, 1896, IISG.

[27] Fomičev, “Helene Demuth Without Brethren,” 972.

[28] Frédérique Longuet-Marx, author interview;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I*, 505(n).

[29] FE-PL, Volume III, 26–27; MECW, Volume 49, 203.

[30]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53

[31] Jean Longuet to Friedrich Engels, Dec. 31, 1893, IISG.

[32]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Jean Longuet, July 14, 1895, Moscow.

[33]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Feb. 28, 1896, Moscow.

[34]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Sept. 28, 1897, Moscow.

[35] Tsuzuki, *Eleanor Marx*, 278–279.

[36] Thorne, *My Life's Battles*, 148.

[37]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I*, 632.

[38] *Ibid.*, 630.

[39]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Laura Lafargue, Dec. 24, 1896, Moscow.

[40]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I*, 631.

[41]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July 19, 1897, Moscow.

52 杜西走上绝路

[1]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2] Tsuzuki, *Eleanor Marx*, 296.

[3] *Ibid.*, 299.

[4]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55; Tsuzuki, *Eleanor Marx*, 300.

[5]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6]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Freddy Demuth, Aug. 30, 1897,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7] Tsuzuki, *Eleanor Marx*, 305.

[8] *Ibid.*, 306.

[9] Collison, *Apostle of Free Labour*, 81–83.

[10] Tsuzuki, *Eleanor Marx*, 306.

[11] Collison, *Apostle of Free Labour*, 84; Tsuzuki, *Eleanor Marx*, 303.

[12] Tsuzuki, *Eleanor Marx*, 307.

[13]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299; Tsuzuki, *Eleanor Marx*, 310.

[14] Tsuzuki, *Eleanor Marx*, 308–309.

[15]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Natalie Liebknecht, Feb. 1, 1898, Moscow.

[16] Tsuzuki, *Eleanor Marx*, 297.

[17]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Edith (no surname), [month illegible] 29, 1898, Moscow.

[18]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Freddy Demuth, Feb. 3, 1898,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19]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Freddy Demuth, Feb. 5, 1898,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 [20]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Freddy Demuth, Feb. 7, 1898,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 [21]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Jean Longuet, Feb. 9, 1898, Moscow.
- [22] Eckert (ed.), *Wilhelm Liebknecht Briefwechsel*, 463.
- [23]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Karl Kautsky, Mar. 15, 1898, Moscow.
- [24] Eleanor Marx Aveling to Freddy Demuth, Mar. 1, 1898,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3.
- [25] Tsuzuki, *Eleanor Marx*, 316.
- [26]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3.
- [27] *Sydenham Examiner*, London, Apr. 8, 1898, 5.
- [28] Tsuzuki, *Eleanor Marx*, 318–319.
- [29] Kapp, *Eleanor Marx*, Volume II, 697.
- [30] *Sydenham Examiner*, London, Apr. 8, 1898, 5.
- [31] Tsuzuki, *Eleanor Marx*, 319;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3.
- [32]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3.
- [33] *Ibid.*;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163; Tsuzuki, *Eleanor Marx*, 319.
- [34]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311.
- [35]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49; *Justice*, London, Apr. 9, 1898, 2.
- [36] *Justice*, London, Apr. 9, 1898, 2.
- [37] Tsuzuki, *Eleanor Marx*, 321.
- [38] *Justice*, London, Apr. 9, 1898, 2;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210.
- [39] *Sydenham Examiner*, London, Apr. 8, 1898, 5.
- [40] Fomičev , “Helene Demuth Without Brethren,” 971.
- [41] Tsuzuki, *Eleanor Marx*, 323;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 [42]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 [43] Probate of Eleanor Marx Aveling’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Apr. 16, 1898, London, IISG; Tsuzuki, *Eleanor Marx*, 324.
- [44]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Meier, Perrot, and Trebitsch (eds.), *Daughters*, 311, 312.
- [45] *Justice*, London, July 30, 1898, 2.
- [46] Tsuzuki, *Eleanor Marx*, 325.

53 拉法格夫妇自杀

- [1] Whitridge, *Men in Crisis*, 331.
- [2]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72;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277.
- [3]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222.
- [4] *Ibid.*, 225.
- [5] *Ibid.*, 278.
- [6]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72–173.
- [7] *Ibid.*, 194.
- [8] MECW, Volume 50, 567(n).
- [9] *Ibid.*, 216.
- [10] FE-PL, Volume III, 304–305.

- [11] MECW, Volume 47, 333.
- [12] FE-PL, Volume III, 304–305.
- [13]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158.
- [14] *Ibid.*, 270–271.
- [15] *Ibid.*, 158.
- [16] Longuet, *Karl Marx*, 243.
- [17] *L'Action Régionaliste, Paris*, undated, 235–239.
- [18] Frédérique Longuet-Marx, author interview.
- [19]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60.
- [20]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288;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8, 179.
- [21]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7–9.
- [22] *Ibid.*, 9–10.
- [23] *Ibid.*, 11–12.
- [24]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290; *Plutarch's Lives, Volume II*, 316.
- [25]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9.
- [26] *Ibid.*, 178.
- [27]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295.
- [28]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83.
- [29] *Ibid.*, 185; Louis Aragon, *The Bells of Basel*, 247.
- [30]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84.
- [31] Derfler,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300; Aragon, *Bells of Basel*, 248.
- [32] Macé, *Paul et Laura Lafargue*, 188.
- [33]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7, 304–305.